

中國社會科學院簡帛研究中心  
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所戰國秦漢室  
出土文獻與中國古代文明研究協同創新中心

鄔文玲 主編

# 簡帛研究

二〇一七  
· 春夏卷 ·



中國社會科學引文索引 (CSSCI) 來源集刊

廣西師範大學出

中國社會科學引文索引 (CSSCI) 來源集刊

# 簡帛研究

二〇一七  
· 春夏卷 ·



鄔文玲 主編

中國社會科學院簡帛研究中心  
中國社科院歷史所戰國秦漢室  
出土文獻與中國古代文明研究協同創新中心

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 桂林 ·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簡帛研究. 2017. 春夏卷 / 鄔文玲主編. —桂林:  
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2017.6  
ISBN 978-7-5598-0465-5

I. ①簡… II. ①鄔… III. ①竹簡—中國—文集②帛  
書—中國—文集 IV. ①K877.54-53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17）第 263004 號

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出版發行

（廣西桂林市五裏店路 9 號 郵政編碼：541004）  
網址：<http://www.bbtpress.com>

出版人：張藝兵

全國新華書店經銷

衡陽順地印務有限公司印刷

（湖南省衡陽市雁峰區園藝村 9 號 郵政編碼：421008）

開本：889 mm × 1 194 mm 1/16

印張：21.75 字數：400 千字

2017 年 6 月第 1 版 2017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0 001～1 200 冊 定價：100.00 元

---

如發現印裝質量問題，影響閱讀，請與印刷廠聯繫調換。

# 目 錄

釋清華簡第六冊中的“惹”字 .....	段 凱/1
說料 .....	羅小華/8
楚國政權的東遷與秦對南郡的統治 .....	張夢晗/15
論馬王堆帛書《春秋事語》的創作意圖、主旨及思想 .....	孫飛燕/31
秦及西漢前期的墾田統計與田租徵收	
——以墾田租簿為中心的考察 .....	高智敏/44
秦漢時期的女爵和女戶 .....	馮聞文/61
秦漢《亡律》“舍匿罪人”探析 .....	陳松長 劉欣欣/76
秦簡《為吏之道》的思想主體分析 .....	李 銳/86
秦簡所見地方行政制度研究的新進展 .....	吳方基/95
睡虎地秦墓竹簡法律簡字詞補釋 .....	雷海龍/114
關沮秦漢墓簡牘字詞釋讀七則 .....	湯志彪/121
再讀里耶秦簡 8-145+9-2294 號牘 .....	魯家亮/134
里耶秦簡 7-304 簡文解析	
——兼及秦遷陵縣徒隸人數問題 .....	劉自穩/151

秦漢“訾稅”補論

——從嶽麓秦簡“識劫媿案”說起 .....	齊繼偉/163
嶽麓書院藏秦簡《金布律》研究 .....	周海鋒/176
張家山漢簡《二年律令·秩律》編連商兌(續) .....	郭洪伯/196
說張家山漢簡《二年律令·秩律》的編聯及其相關問題 .....	周 波/200
銀雀山漢簡《唐勒》篇章結構芻議 .....	馬 楠/210
擇日術的起源	
——以《日書》為中心的考察 .....	董 濤/215
漢代“過所”考辨 .....	李銀良/227
西北漢簡所見吏卒家屬研究 .....	鍾良燦/237
西北漢簡所見民爵分布與變遷 .....	賈麗英/257
漢代肩水塞東部候長駐地在 A32 遺址考 .....	郭偉濤/270
長沙東牌樓漢簡校釋拾遺 .....	徐俊剛/287
論走馬樓吳簡親屬稱謂詞語在辭書編纂上的價值 .....	陳榮傑 賈利青/292
走馬樓吳簡《竹簡[柒]》、《竹簡[捌]》釋文、注釋補正 .....	黎石生/307
走馬樓吳簡研究方法述評 .....	蘇俊林/314
律令簡新獲與秦史研究	
——讀《嶽麓書院藏秦簡(肆)》 .....	孫聞博/328
“紀念走馬樓三國吳簡發現二十周年長沙簡帛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參加小記 .....	
..... [日]關尾史郎/336	
附录:《簡帛研究》文稿技術規範 .....	/340

## 釋清華簡第六冊中的“蒸”字\*

華東師範大學中國文字研究與應用中心 段凱

**內容提要** 參證傳世典籍和出土文獻，清華簡第六冊《子產》一篇中的𦵿字當分析為從𦵿從心兩部分，其上部所從的𦵿形當釋為“𦵿”。𦵿字可隸定為“蒸”，在簡文中當讀作“散”，為離散之義。《說文解字》“發”字引《左傳》“發夷蘊崇之”一句中的“發”今本《左傳》作“𦵿”，許慎所見《左傳》版本中的“發”字可能是“𦵿”字之訛。

**關鍵詞** 清華簡 蒸 𦵿 考釋

清華簡第六冊《子產》簡 18 有一句話作：

句(苟)我固善，不我能𦵿(亂)，我是亢(荒)𦵿(怠)，民屯蒸然。<sup>①</sup>







其中的“蒸”字整理者注【六〇】云：“蒸，疑從支聲，讀為‘剥’，《說文》：‘裂也。’在此為分裂離散之義。”<sup>②</sup>趙平安先生則認為：“這個字應當分析為從心、從𦵿兩個部分。𦵿是發的訛




\* 本文為 2014 年國家社科基金一般項目《戰國秦漢簡帛古書通假字聲系及數據庫建設》(項目號:14BYY163)、2016 年國家社科基金一般項目《近年出土戰國書籍類竹簡整理方法之研究》(項目號:16BZS013)、2016 年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重大項目《先秦古文字材料四種綜合整理與數據庫建設》(項目號:16JJD740009)中期成果。

① 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編，李學勤主編：《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陸)》，上海：中西書局，2016，138 頁。


② 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編，李學勤主編：《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陸)》，142 頁。




體字。”<sup>①</sup>按,趙平安先生對該字的字形分析可從,但認為“芟”是“發”的訛體字則不無可商之處。古文字中作為偏旁的“止”形和“屮”形雖然有時訛混,出土文獻中也不乏誤字、訛字的例子。但是,如果能夠通過字形分析考釋出其本字,嚴謹的做法應該是忠實其原本的字形結構進行分析。“莠”字在簡文中作形,可以分解為從芟()從心() ,而其所從的芟()旁又可進一步分析為從艸從支兩部分。據此,我們認為字上部所從的形其實就是“芟”字。


“芟”字小篆作形,漢碑中作、形。<sup>②</sup>《說文·艸部》:“芟,刈艸也,從艸從殳。”<sup>③</sup>段玉裁《說文解字注》云:“芟,刈艸也,從艸殳。錯有聲字,非。此會意,殳取殺意也。”<sup>④</sup>據此,結合“芟”字小篆與漢碑字形,“芟”字是一個從艸從殳會除草意的會意字。在古文字中,作為表意偏旁的殳旁和支旁常可互換,<sup>⑤</sup>如:


從殳

殺  (《侯馬盟書》156:24)

毆  (新鄭虎符)

毀  (鄂君啓節車節)

攻  (鄂君啓節車節)

敗  (鄂君啓節舟節)


教  (郭店簡《語叢一》簡 43)


敎  (郭店簡《語叢二》簡 42)


從支


𣎵  (《侯馬盟書》156:21)


𣎵  (上博簡第二冊《子羔》簡 9)

𣎵  (郭店簡《語叢一》簡 108)

𣎵  (郭店簡《老子(甲)》簡 39)

𣎵  (《包山楚簡》簡 141)

𣎵  (《包山楚簡》簡 99)

𣎵  (郭店簡《語叢二》簡 21)

所以,從艸從支的,與從艸從殳的、實為一字,當釋為“芟”。據此,簡文字可隸

① 趙平安:《〈清華簡(陸)〉文字補釋(六則)》,清華大學出土文獻與中國古代文明研究中心網站,2016年4月16日;又見其著《清華簡第六輯文字補釋六則》,《出土文獻》第9輯,上海:中西書局,2016,183-189頁。

② 臧克和主編:《漢魏六朝隋唐五代字形表》,廣州:南方日報出版社,2011,1270頁。

③ 關於“芟”字構形,徐鉉校訂的《說文解字》記為“從艸從殳”,是一個從艸從殳的會意字。而徐鍇校訂的《說文解字繫傳》(北京:中華書局,1987,20頁)則記為“從艸殳聲”,是一個從艸殳聲的形聲字。關於“芟”字是否從殳得聲,以及“芟”字究竟是形聲字還是會意字,抑或形聲兼會意字,清人已頗有分歧。段玉裁認為芟字不從殳聲,當分析為從艸從殳會意。朱駿聲引作“從艸殳聲”,但卻認為“芟”是會意字。桂馥引徐鉉本作“從艸從殳”,但在注文中亦注明徐鍇本作“殳聲”,蓋對大小徐本的記載持兩存的態度。除此之外,王筠《說文句讀》、鈕樹玉《說文解字校錄》等對此問題均有討論,詳見丁福保所編《說文解字詁林》(北京:中華書局,2014,1808-1809頁)一書。今按,芟為山母談部字,殳為禪母侯部字,兩字聲韻距離皆遠,難以通假,似當從徐鉉本及段玉裁說為是。

④ [清]段玉裁:《說文解字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42頁。

⑤ 何琳儀先生在《戰國文字通論(訂補)》(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2003,229、232頁)一書的第四章《戰國文字形體演變》的第四節第二小節《形符互作》中指出“合體字偏旁,尤其形聲字形符,往往可用與其義近的表意偏旁替換。”在文後的字形舉例中,何文舉出了“殺”“啓”“政”等數例從支與從殳互作的例子。

定爲惹。

下面討論惹字在簡文中的用法。雖然整理者對惹字“疑從支聲，讀爲‘剥’”的釋字有誤，但認爲惹在簡文中“爲分裂離散之義”則很有啓發性。循其音義求之，我們認爲惹字在簡文中正當讀爲“散”。惹字從芟從心，按照古文字的一般規律，惹字當從芟得聲。芟字和散字關係非常密切。首先，從字音上看，芟爲山母談部字，散爲心母元部字，兩字同爲齒音，韻則通轉。在聲母方面，如從散省聲的潛便讀入山母。至於韻部方面，按照王力先生的擬音，上古談部發“am”音，元部發“an”音，兩者主要元音相同。如𦵏爲談部字，而其所從聲符𦵏即爲元部字。又𦵏爲談部字，而《說文·竹部》云：“𦵏，蔽絮簣也，從竹沾聲，讀若錢。”錢即爲元部字。可見，芟、散二字聲韻俱近。其次，從字義來看，芟和散都可訓爲“殺也”。《淮南子·本經》：“芟野莠。”高誘注：“芟，殺也。”《文選·張衡〈東京賦〉》：“若薙氏之芟草。”薛綜注引《左傳》杜預曰：“芟，殺。”《方言》卷三“虔、散，殺也。東齊曰散，青徐淮楚之間曰虔。”其三，從兩字的造字本義來看，裘錫圭先生指出𦵏（散字所從聲符）字“本意應該是芟除草木”，<sup>①</sup>而芟字本義亦是手持殳杖一類工具除草。芟和散均可訓爲殺可能就是從此除草義引申而來，可以認爲在表示芟除草木的意義上兩字同義。此外，陳劍先生亦曾指出：“‘芟’、‘𦵏’、‘殺’等字，從字形看也都是像芟除、刈殺草木之形，它們的讀音又都有密切關係。”<sup>②</sup>可見，芟和散音義都極其相近，很可能就是一對同源字。

再從通假例證來看，芟和散有旁通的例子。《說文》“發”字“從屮從殳，春秋傳曰：‘發夷蘊崇之。’”惠棟《惠氏讀說文記》云：“發，今作芟音刪，形聲兩失。”<sup>③</sup>惠棟認爲《說文》“發”字所引《左傳》文句，在今本中“發”寫作“芟”，而“芟”音“刪”，與“發”聲韻皆遠，所以認爲其“形聲兩失”。由惠棟此言可知“芟”音“刪”，典籍中從刪聲字往往可與散字相通。《史記·平原君虞卿列傳》：“槃散行汲。”裴駰《集解》：“散，亦作𦵏。”司馬貞《索隱》：“散音先寒反，亦作‘𦵏’，同音。”《尚書·盤庚》：“相時儉民。”《說文·心部》“𦵏”字引作“相時𦵏民。”與“儉”“𦵏”對應之字漢石經《尚書》殘石作“散”。除此之外，《集韻·銜韻》：“芟、𦵏，《說文》：刈艸也。或作𦵏。”芟字異體作𦵏，典籍和出土文獻中從𦵏聲字和散字常可與𦵏聲字相通。《史記·秦始皇本紀》：“然後斬華爲城。”裴駰《集解》引徐廣曰：“斬，一作‘踐’。”司馬貞《索隱》：“斬，亦作‘踐’。”《史記·陳涉世家》《新書·過秦上》斬俱作踐。虎溪山漢簡《閻氏五勝》：“一斧之力不能踐一山之林。”白於藍師讀“踐”爲“斬”。<sup>④</sup>此爲斬與𦵏聲字相通之例。

① 裘錫圭：《甲骨文中所見的商代農業》，《裘錫圭學術文集（甲骨文卷）》，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2，252頁。

② 陳劍：《甲骨文“戔”字補釋》，收入其著《甲骨文考釋論集》，北京：綫裝書局，2007，105-106頁。

③ [清]惠棟：《惠氏讀說文記》，叢書集成初編影印借月山房本，上海：商務印書館，1936，42頁。又見丁福保《說文解字詁林》，2407頁。

④ 白於藍：《虎溪山漢簡〈閻氏五勝〉校讀二記》，《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第3輯，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0，341-342頁。

郭店楚簡《老子(甲)》：“其幾(微)也，易淺也。”今本淺作散。上博楚簡第二冊《容成氏》簡6有“𡗗𡗗”一詞，孫飛燕先生讀為“散施”；<sup>①</sup>同篇簡41“舜宗鹿族𡗗群安備”一句，鄧少平先生讀“𡗗”為“散”，又第五冊《融師有成氏》簡6“折毀鹿𡗗”一句，鄧少平先生亦將“𡗗”讀為“散”。<sup>②</sup>此為散與𡗗聲字相通之例。所以，𡗗當可讀為散。綜上所述，簡文𡗗當讀為散，簡文“民屯𡗗然”可寫作“民屯𡗗(散)然”。

簡文“民屯𡗗(散)然”中的“屯”，整理者訓為“皆”，<sup>③</sup>可從。“然”字整理者及諸家研究者無說，我們認為“然”在簡文中當為語末助詞，用法相當於“焉”。<sup>④</sup>《禮記·檀弓下》：“穆公召縣子而問然。”鄭玄注：“然之言焉也。”《論語·先進》：“不得其死然。”邢昺疏：“然猶焉也。”《詩·大雅·常武序》：“因以為戒然。”馬瑞辰注：“然，猶焉也。”而“散”在簡文中的意思當即整理者所說的“分裂離散之義”。《廣韻·翰韻》：“散，分離也……《說文》作𡗗，分離也。”離亦可訓為散。《莊子·山木》：“無須臾離居。”成玄英疏：“離，散也。”《呂氏春秋·大樂》：“離則復合，合則復離。”高誘注：“離，散。”所以，簡文“民屯𡗗(散)然”大意為人民都會離散啊。

典籍和出土文獻中關於“民散”的說法極其常見。見於出土文獻的例子有，清華簡第三冊《芮良夫毖》：“民之淺矣，而隹(惟)啻(謫)為王。”劉洪濤先生指出“淺”字可讀作“散”。<sup>⑤</sup>見於典籍文獻的例子有：

《論語·子張》：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

《毛詩·國風·山有樞序》：不能修道以正其國，有財不能用，有鐘鼓不能以自樂，有朝廷不能灑埽，政荒民散，將以危亡。

《禮記·大學》：是故財聚則民散。

《大戴禮記·盛德》：教訓失道，風俗淫僻，百姓流亡，人民散敗。

《漢書·東方朔傳》：夫殷作九市之宮而諸侯畔，靈王起章華之臺而楚民散。

《全漢文·孔臧〈諫格虎賦〉》：今君荒於游獵，莫恤國政。驅民入山林，格虎於其廷。妨害農業，殘夭民命。國政其必亂，民命其必散。國亂民散，君誰與處？

《晉書·劉曜載記》：是以災氣呈形，賊臣苞亂，政荒民散，可以危亡。

① 孫飛燕：《〈容成氏〉文本整理及研究》，清華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10，107-109頁；又見其著《〈容成氏〉字詞考釋二則》，《中國文字》新36期，臺北：藝文印書館，2011，47-49頁。

② 鄧少平：《試說楚簡中讀為“散”的“𡗗”字》，《中國文字研究》第17輯，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36-39頁。

③ 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編，李學勤主編：《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陸)》，142頁。

④ [清]王引之：《經傳釋詞》，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156頁。楊樹達：《詞詮》，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229頁。裴學海：《古書虛字集釋》，北京：中華書局，2004，574-575頁。

⑤ 見白於藍《清華簡〈芮良夫毖〉6—8號簡校釋》(《古文字研究》第31輯，北京：中華書局，2016，349頁)一文注⑩。

以上都是典籍中“民散”的例子，尤其需要注意的是上引例子中人民的離散往往都是統治者荒怠無道造成的，政荒與民散常常連言。如，《論語·子張》曾子所言“上失其道，民散久矣”，毛詩《山有樞》“詩序”和《晉書·劉曜載記》中的“政荒民散”。可見，統治者“失道”和“政荒”都會使人民離散。而《大戴禮記·盛德》記載的“教訓失道，風俗淫僻”；《漢書·東方朔傳》記載的“靈王起章華之台”和《諫格虎賦》中所言的“今君荒於游獵，莫恤國政。驅民入山林，格虎於其廷。妨害農業，殘夭民命”則都是統治者荒怠無道的具體表現和行爲。簡文“我是亢(荒)糾(怠)，民屯惹(散)然”與上引例子正可相互參照。

綜上所述，將簡文中的惹字釋爲惹，讀作散，訓爲離散，文從字順，與典籍文獻亦可互相照應。所以，本文對惹字的考釋應該是合理的。

需要指出的是，雖然趙平安先生將簡文惹字所從𠂔旁認爲是發字訛體的觀點并不可信，但典籍文獻中“芟”字和“發”字確實也有相混的例子。《說文·艸部》：“發，以足蹋夷艸，從艸從殳，春秋傳曰：‘發夷蘊崇之。’”《說文》所引文句見於今本《左傳》。《左傳·隱公六年》有：“爲國家者，見惡如農夫之務去草焉，芟夷蘊崇之。”杜預注：“芟，刈也。”可知，《左傳》之“芟”，《說文》引作“發”。就此分歧，歷代《說文》注家和研究者頗多爭議。據統計，有以下幾種說法。

第一種說法：認爲《左傳》中的“芟”是訛字或改字，鈕樹玉、王筠、承培元等主此說。第二種說法：認爲《左傳》作“芟”和《說文》作“發”雖然形聲俱異，但意思相近，兩字屬於異文關係；王玉樹、吳玉搢、高翔麟等主此說。第三種說法：注明異文但不做評價，段玉裁、錢坫等便如此處理。第四種說法：認爲艸形和艸形相近，後世釋古文者“或讀爲發或讀爲芟”；柳榮宗主此說。<sup>①</sup>今按，第三種說法其實與第二種說法比較類似，認爲兩字是異文的關係，取兩存的態度。第一種說法則拘泥於《說文》，認爲經典中的“芟”是訛字或後人所改，證據薄弱，難以令人信服。第四種說法從“發”“芟”兩字字形相似的角度分析，其說法可能更接近於事實。爲方便討論，先將柳榮宗的說法引錄如下：



發，以足蹋夷艸也，從艸從殳，春秋傳曰：‘發夷蘊崇之。’今桓（筆者按，當作隱）六年傳發作芟，杜預注云：‘芟，刈也。’案許書艸部芟下曰：‘刈艸也，從艸從殳。’是芟從殳取義而讀若杉，發從艸取義而讀若撥，同是去艸而音義絕殊。賈、服本不可見，許從賈遠受古學，其作《說文》又考之於遠，則賈《左氏解詁》作發夷矣。《周禮·地官·稻人》：“凡稼澤，夏以水殄草而芟夷之。”鄭注引鄭司農說：“芟夷以《春秋傳》曰：‘芟夷蘊崇之’。今時謂禾下麥爲萈下麥，言芟刈其禾，於下種麥也。”是先後鄭所見左氏俱作芟，與今本

① 各家說法詳見丁福保《說文解字詁林》，2407-2409 頁。



同。蓋從屮從艸形相近,釋古文者或讀爲發或讀爲芟耳。<sup>①</sup>

柳榮宗認爲許慎所引《左傳》可能出自賈逵所授,其字本作“發”,而鄭司農、鄭玄與杜預所見《左傳》則作“芟”,兩者的不同源自於各家所見的《左傳》版本不同。孫詒讓和馬宗霍亦持此說。<sup>②</sup>與諸家研究者不同的是,柳榮宗關注到了兩字在字形上的相似之處,指出“蓋從屮從艸形相近,釋古文者或讀爲發或讀爲芟耳。”雖然,柳榮宗最終並沒有給出《左傳》此句原本究竟爲何字的結論,但是其指出“從屮從艸形相近”的看法仍然相當敏銳。從現在大量的出土古文字字形來看,止形和中形確實經常有相混的情況。而《左傳》乃古文經,原本是用戰國文字書寫。所以,《說文》引《左傳》作“發”,而今本作“芟”很有可能是字形訛混造成的。我們推測,《左傳》此句原本很可能是“芟”字,而許慎所見版本作“發”則是“芟”字之訛。

首先,從字形上看,芟字從艸從發,發字從𠂔從殳,古文字中中形和止形確實經常相混。<sup>③</sup>如上引趙平安先生文中所引錄田煒先生的文章便舉出了數例古文字中中形和止形相混的例子。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田煒先生在文章中將上博楚簡第五冊《弟子問》簡5中的𠂔字釋爲“登”,認爲其上部所從的“艸”形即“𠂔”形之訛。<sup>④</sup>此說正確可信,這是兩止形訛爲兩中形的例子。又,曾侯乙墓出土的擲君戈“擲”字作形,這是兩中形訛爲兩止形的例子。<sup>⑤</sup>可見,古文字中兩止形與兩中形亦有互訛的情況。擲所從的兩中訛爲兩止與芟字所從艸形訛爲發字所從𠂔形可相類比。再看兩字下部所從偏旁,在《說文》中兩字都從殳作,但在古文字階段却并不完全如此。裘錫圭先生在《釋“勿”“發”》一文中曾指出“‘發’字從‘殳’的寫法晚於從‘支’的寫法。”在戰國文字階段,“六國官印‘發弩’之‘發’通常假借‘發’字,字作等形,也不從‘殳’。”<sup>⑥</sup>戰國文字階段“發”字通常寫作從支,而本文所釋的惹字其所從的芟旁亦寫作從支。由此可見,芟字訛爲發是完全有可能的。

再者,從諸家所引《左傳》的版本來看,若將許慎所見本計爲一例,則鄭司農、鄭玄以及杜預所見的版本似可計爲三例。<sup>⑦</sup>在沒有更多證據證明兩鄭與杜預所見的版本同出一源的情況下,似乎可以認爲三家所見的版本更爲主流。

① 丁福保:《說文解字詁林》,2409頁。

② [清]孫詒讓:《周禮正義》,北京:中華書局,1987,1192頁。馬宗霍:《說文解字引經考》,北京:中華書局,2013,803頁。

③ 何琳儀:《戰國文字通論(訂補)》,236頁。劉釗:《古文字構形學(修訂本)》,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11,337頁。

④ 田煒:《上博五〈弟子問〉“登年”小考》,簡帛網,2006年3月22日。

⑤ 陳劍:《郭店簡〈六德〉用爲“柔”之字考釋》,收入其著《戰國竹書論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101-102頁。

⑥ 裘錫圭:《釋“勿”“發”》,《裘錫圭學術文集(甲骨文卷)》,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2,150頁。

⑦ 除柳榮宗所引《周禮·地官·稻人》鄭玄引鄭司農注外,《周禮·秋官·序官》“蘿氏”下鄭玄引鄭司農說亦引《左傳》此文,“鄭司農云:‘掌殺草,故春秋傳曰:“如農夫之務去草,芟夷蕪崇之。”’又今俗間謂麥下爲夷下,言芟夷其麥,以其下種禾豆也。”鄭玄兩引鄭司農,兩處引文皆與今本《左傳》同,則鄭玄所見《左傳》本當與鄭司農、杜預所見本同。

最後，從典籍的用字習慣來看，“𦵑夷”一詞典籍繁出迭見，而“𦵑夷”一詞兩漢之前似僅《說文》所引這一例。特別是《左傳》一書，除本文所討論“隱公六年”的這一段文字外，“𦵑夷”一詞還見於“成公十三年”傳文，“入我河縣，焚我箕、郛，𦵑夷我農功，虔劉我邊垂。”所以，楊伯峻先生謂：“𦵑夷爲同義連綿詞”。<sup>①</sup>

據此，《左傳·隱公六年》“𦵑夷蘊崇之”一句很可能原本便是寫作“𦵑”字，許慎所見版本之“𦵑”爲“𦵑”字訛體。退一步講，如果說許慎所見版本確實爲“𦵑”并且淵源有自，但典籍中𦵑、𦵑容易相混的現象依然是顯而易見的。

附記：本文是在白於藍師的悉心指導下完成，在論文的審稿過程中《簡帛研究》編輯部寄來了寶貴而詳細的外審意見，謹致謝忱！

<sup>①</sup> 楊伯峻：《春秋左傳注》，北京：中華書局，2009，50頁。

## 說 料

長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 羅小華

**內容提要** 出土的漢代文物有自銘爲“釂”“斗”者,都應該讀爲“料”。“料”不僅見於傳世文獻,還見於出土文獻。目前,已有戰國時期的“料”出土。楚簡中的“料”,原釋爲“瓚”。現結合字形、辭例和實物來看,均應改釋。“斗”應是勺類器物的本字,因其質料爲木頭或金屬而加“木”“金”二旁成爲“料”“釂”。後來,“斗”被借用表示“十升”。“料”就成了勺類器物的專字。“釂”因與“鋹”字音近,而被借用指壺形器。

**關鍵詞** 釂 斗 料 勺類器物

2005年12月底,湖南省長沙市望城縣星城鎮銀星村風篷嶺漢墓出土2件殘損銅器。發掘者將其稱爲“勺”：“標本 M1:101-6,柄端圓闊,上鑄一獸首銜環,從柄端至勺端向下彎曲內凹。柄端寬 3.6、殘長 10.2 釐米。標本 M1:101-7,背面刻有銘文,陰文篆書,爲‘銅釂一重一斤九兩長沙元年造’。柄端寬 3.7、殘長 14.5 釐米。”<sup>①</sup>衆所周知,銅器自銘者習見。按理說,M1:101-7 銘文中的“釂”,應該就是該銅器的名稱。“釂”,亦見於成山宮銅渠釂:“成山宮銅渠釂重二斤神爵四年卒史任欣杜陽右尉司馬賞釐少內佐王宮等造。”此器著錄於《筠清館金文》,清人吳榮光云:“《六書溯源》:‘釂,俗鋹字。’《說文》:‘鋹,酒器也。’此器當亦是盛酒之物。”<sup>②</sup>馬衡指出:“蓋勺之爲用,所以斟酒於尊而注於爵,或有以爲飲器,挹取而飲之……

① 長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望城縣文物管理局:《湖南望城風篷嶺漢墓發掘簡報》,《文物》2007年第12期。

② [清]吳榮光:《筠清館金文》卷五,《金文文獻集成》第12冊,北京:綫裝書局,2005,136頁。

其名又謂之斗。《詩·行葦》云：‘酌以大斗。’《釋文》：‘字又作料。’《說文》（木部）：‘料，勺也。’與勺爲尊斗之說亦合。漢有神爵四年成山宮銅渠釂，其形如今之勺，其字又从金作釂，亦釂酒之勺也。”<sup>①</sup>

1977年春，安徽阜陽西漢汝陰侯墓頭箱中出土銅斗1件。發掘者稱之爲“斗”，括注爲“勺”：“銅質，勺橢圓，長柄，柄端有龍首銜環。”其尺寸爲“通長46、勺10.6×7.3釐米”，銘文爲“女陰侯斗重一斤八兩”。<sup>②</sup>1981年5月，漢武帝茂陵東側一號無名塚一號南端從葬坑中出土銅斗1件（K1:011）。該器“橢圓形，帶圓筒形短柄。柄端盃內殘留朽木痕，原另安木柄。短柄背面刻銘文‘□平邑家斗，重二斤’。通長16、深4.4、口徑11.3—13.8、短柄長11.2釐米。”<sup>③</sup>員安志先生根據馬衡關於成山宮銅渠釂的說法，對其作了探討：“此器是挹水或挹酒之器，其名又謂之曰斗……茂陵一號無名塚從葬坑中出土的‘□平邑家斗’，與其他銅酒器出土在一起，皆以證明其爲釂酒之用也。漢有神爵四年成山宮銅渠釂，其形如勺（參圖四、五）。‘□平邑家斗’，其形亦與勺相同，而字又作斗，亦見其料、釂與斗字相同也。都爲釂酒之勺器，是實用工具而不是量器。”<sup>④</sup>

據器物銘文，風篷嶺銅釂重一斤九兩，成山宮銅渠釂重二斤，女陰侯斗重一斤八兩，□平邑家斗重二斤，重量基本相同。從器形看，四者都是“勺”。成山宮銅渠釂，雖然沒有找到相關圖片，但是，徐中舒先生指明該器物“象勺而有柄”。<sup>⑤</sup>女陰侯斗和□平邑家斗，發掘報告中有相關圖片，其形如勺（參圖四、五）。風篷嶺出土銅釂，雖已殘損，但發掘者仍稱之爲“勺”。可見，這4件類似勺的器物，應該屬於同類。在它們的自銘中，有“釂”和“斗”兩種。哪一種纔是它們真正的名字呢？根據文獻記載，“釂”是“鋹”的假借字，而酒器“鋹”是“一種無蓋壺”。<sup>⑥</sup>“斗”是量器。《說文》卷一四上《斗部》：“斗，十升也。”<sup>⑦</sup>《說文》將“料”訓爲“勺”。因此，在當時“料”纔是這類器物的名稱，“斗”和“釂”都是借字。漢代銅器中的自銘常用通假字，如風篷嶺出土的銅壺自銘爲“榼”，銅燈自銘爲“登”。<sup>⑧</sup>由上可知，吳榮光是將“鋹”與“料”混淆了。馬衡之說可從。

① 馬衡：《凡將齋金石叢稿》，北京：中華書局，1977，15頁。

② 安徽省文物工作隊、阜陽地區博物館、阜陽縣文化局：《阜陽雙古堆西漢汝陰侯墓發掘簡報》，《文物》1978年第8期。

③ 咸陽地區文管會、茂陵博物館：《陝西茂陵一號無名一號塚從葬坑的發掘》，《文物》1982年第9期。

④ 員安志：《“陽信家”銅器銘考釋及對有關問題的探討》，陝西省文物事業管理局編《陝西省文博考古科研成果匯報會論文選集》，1982，263頁。

⑤ 徐中舒：《當塗出土晉代遺物考》，國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編輯委員會編《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3冊，北京：中華書局，1987，319頁。

⑥ 參李家浩：《談古代的酒器》，中國古文字研究會、中山大學古文字研究所編《古文字研究》第24輯，北京：中華書局，2002，454—458頁。

⑦ [漢]許慎撰，[宋]徐鉉校定：《說文解字》卷一四上《斗部》，北京：中華書局，1963，300頁。

⑧ 長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望城縣文物管理局：《湖南望城風篷嶺漢墓發掘簡報》，《文物》2007年第12期。



器物“料”不僅存在於漢代,還見於楚簡,并有相關器物出土。

二料。包山簡 266

二料。望山簡 2-45

二雕料。信陽簡 2-011

包山簡中的“料”,原篆作“𣎵”。望山簡中的“料”,原篆作“𣎵”。信陽簡中的“料”,原篆作“𣎵”。賈連敏先生指出,包山簡中的“料”字右旁所从“爲瓚之象形”。<sup>①</sup>李家浩先生認為:包山簡中的“料”字“應當是一個从‘毛’从‘瓚’字象形初文得聲的字,在此假借爲‘瓚’……望山簡的寫法與包山簡相同,信陽簡寫作从‘木’从‘𣎵’,大概是木瓚的專字。”<sup>②</sup>董珊先生指出,信陽墓中出土的 2 件被稱爲“勺”的“漆木斗”,就是“遣策 2-11 所記的‘二雕料(斗)’”。<sup>③</sup>陳偉師等將包山簡和望山簡中的“料”隸定爲“𣎵”,并指出:“‘𣎵’疑是‘料’字異體。《儀禮·少牢饋食禮》‘司宮設盥水於洗東有料’,鄭玄注:‘設水用盥,沃盥用料。’”將信陽簡中的“料”隸定爲“𣎵”,并指出:“右旁从‘主’从‘斗’,疑是‘料’字的異體。”<sup>④</sup>

就文字形體而言,“𣎵”、“𣎵”和“𣎵”都應从“斗”。長沙銅量中有字作“𣎵”。<sup>⑤</sup>李零先生懷疑是“稟字的異體(讀爲禾稟)”。<sup>⑥</sup>何琳儀師認為是“七月”合文。<sup>⑦</sup>董珊先生指出:“一般認為,其中的‘𣎵’字也應讀爲‘筴’……‘𣎵’是舊的量器筴。”<sup>⑧</sup>此字隸定爲“𣎵”是可取的。曾侯乙墓出土漆箱“蓋面當中朱書一個篆文大‘斗’字”作“𣎵”。<sup>⑨</sup>可資比較。另外,《中國科學技術史·度量衡卷》指出:該銅量“器容 2300 毫升……當爲一斗之量。”<sup>⑩</sup>我們懷疑,此字應讀爲“料”。銅量銘文中的“𣎵”字,可能就是對該器物容量的記載。因此,以上三個楚簡中的文字形體皆爲“料”的說法是正確的。在上文中,我們曾指出,4 件漢代的“料”都有自銘。據此,楚簡中被釋爲“瓚”的字,都應該是“料”。

① 賈連敏:《釋裸瓚》,中國古文字學研究會第九屆學術討論會論文,1992;轉引自李家浩《包山二六六號簡所記木器研究》,北京大學中國傳統文化研究中心編《國學研究》第 2 卷,北京大學出版社,1994,第 2 卷 538 頁。

② 李家浩:《包山二六六號簡所記木器研究》,北京大學中國傳統文化研究中心編《國學研究》,538 頁。

③ 董珊:《信陽楚墓遣策所記的陶壺和木壺》,簡帛網,2007 年 6 月 20 日;武漢大學簡帛研究中心主辦《簡帛》第 3 輯,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37 頁。

④ 陳偉等:《楚地出土戰國簡冊[十四種]》,北京:經濟科學出版社,2009,129 頁注 138、289 頁、388 頁注 68。

⑤ 周世榮:《楚邦客銅量銘文試釋》,《江漢考古》1987 年第 2 期。

⑥ 李零:《楚燕客銅量銘文補正》,《江漢考古》1988 年第 4 期。

⑦ 何琳儀:《長沙銅量銘文補釋》,《江漢考古》1988 年第 4 期。

⑧ 董珊:《楚簡簿記與楚國量制研究》,《考古學報》2010 年第 2 期。

⑨ 湖北省博物館:《曾侯乙墓》,北京:文物出版社,1989,354 頁、356 頁圖二一六:1。

⑩ 丘光明、邱隆、楊平:《中國科學技術史·度量衡卷》,北京:科學出版社,2001,134 頁。

此外，楚簡中有已經確釋的“料”：

日中見料。上博簡《周易》簡 51

根之以玉料。上博簡《天子建州(甲本)》簡 6

上博簡《周易》簡 51 中的“料”，原篆作“𣎵”，整理者徑釋為“斗”，并指出此字在馬王堆漢墓帛書《周易》和今本《周易》中均作“斗”。<sup>①</sup>《天子建州(甲本)》簡 6 中的“料”，原篆作“𣎵”，整理者隸定為“卦”，并認為：“‘卦’，即‘斗’字繁構，原篆从斗、从主(聲)，相同構形也見於戰國楚竹書《周易》的《豐》卦簡：‘九四：豐汦坴，日中見卦。’”(《上海博物館藏楚竹書(三)》)今本《周易》‘卦’作‘斗’。‘玉斗’，指北斗星，北斗七星形似酒器‘斗’，以色明朗如玉，所以簡文以‘玉斗’喻之。”<sup>②</sup>從形體上看，“𣎵”和“𣎵”二字均从“斗”得聲；從文義上看，“𣎵”和“玉𣎵”又都指的是北斗星。鑒於“斗”“料”二字的區別。我們認為，“𣎵”和“𣎵”均應讀為“料”。

雲夢大墳頭一號西漢墓出土木牘記有“一斗斜一”、“鐵(?)料金料各一”。<sup>③</sup>發掘者據《六書溯原》和《說文》認為“斜”是“一種溫酒器”，可對應“出土的一件銅蒜頭扁壺(頭箱 28 號)”；據《說文》指出：“墓內只出一件木柄銅勺(頭箱 17 號)，當即木牘所記的‘金料’；但木牘所記的‘鐵料’，未見實物。”<sup>④</sup>由此可見，當“斜”和“料”都出現的時候，二者還是會被區分開來的。而“料”記“勺”，更能證明，“料”才是這一勺類器具的名稱。

需要說明的是，“料”是挹水器，而“瓚”是裸祭中的挹酒禮器。這在傳世文獻中都是有明確記載的。如上文中陳偉師等所引《儀禮·少牢饋食禮》的相關文獻。再如《禮記注疏》卷四四《喪大記》“浴水用盆，沃水用料”。<sup>⑤</sup>《史記》卷四三《趙世家》：“使廚人操銅料以食代王及從者，行斟，陰令宰人各以料擊殺代王及從官，遂興兵平代地。”<sup>⑥</sup>這些都是“料”為水器的明證。祇不過《喪大記》中的“料”，是用來給屍體沐浴的，而《趙世家》中的“料”，是吃飯用的。《周禮》卷二〇《春官·典瑞》：“裸圭有瓚，以肆先王，以裸賓客。”鄭玄引鄭司農云：“於圭頭為器，可以挹鬯裸祭，謂之瓚。”<sup>⑦</sup>可見，“瓚”是“挹鬯”的酒器，而且形制特殊。董珊先生

① 馬承源主編：《上海博物館藏楚竹書(三)》，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206 頁。

② 馬承源主編：《上海博物館藏楚竹書(六)》，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319 頁。

③ 湖北省博物館、孝感地區文物局、雲夢縣文化館漢墓發掘組：《湖北雲夢西漢墓發掘簡報》；陳振裕：《雲夢西漢墓出土木方初釋》，《文物》1973 年第 9 期。

④ 湖北省博物館：《雲夢大墳頭一號墓》，文物編輯委員會編《文物資料叢刊(4)》，北京：文物出版社，1981，17-18 頁。

⑤ 《禮記注疏》卷四四《喪大記》，北京：中華書局，1980，1576 頁。

⑥ 《史記》卷四三《趙世家》，北京：中華書局，1959，1793 頁。

⑦ 《周禮》卷二〇《春官·典瑞》，北京：中華書局，1980，777 頁。

曾指出,“長台關 1 號墓所出與木壺相組合的器物還有瓚、斗,見《信陽楚墓》41 頁圖二九,1、3,兩件漆木斗(1-134、135)原稱‘勺’,即遣策 2-11 所記的‘二雕料(斗)’;漆木瓚(1-136)原稱‘窩形器’,應更名為‘瓚’,但遣策字迹難辨,暫未發現記載。”<sup>①</sup>這是對“瓚”和“料”的嚴格區分。“料”“瓚”二器之間的功用區別,亦可作為將包山簡“𣪠”、望山簡“𣪠”、信陽簡“𣪠”釋為“料”的旁證。

關於“瓚”的實物,賈連敏先生已經作了詳細討論。<sup>②</sup>茲不贅述。關於“料”的實物,曾侯乙墓出土 1 件折斷的“斗”(C.170),出土時置於“中室兩件盥缶(C.188、C.189)之上”。<sup>③</sup>包山 2 號墓東室出土 2 件“整木鑿成”的“勺”(2:112、2:178);望山 2 號墓出土 2 件“用整塊木料斫鑿而成”的 B 型勺;信陽楚墓前室出土的 3 件“窩形漆木器”(1—136、137、138),也都應該是“料”。<sup>④</sup>這是因為,一方面,它們能與簡文的內容相對應;另一方面,它們又都與食器記錄在一起,不太可能是禮器,而應該是實用器。

綜上所述,“成山宮銅渠釂”和風簫嶺漢墓出土“銅釂”之“釂”、“女陰侯斗”和“□平沱家斗”之“斗”,都應該是“料”字之假;長沙銅量銘文中的“𣪠”,應該隸定為“釂”,讀為“料”;包山簡中的“𣪠”、望山簡中的“𣪠”、信陽簡中的“𣪠”、上博簡中的“𣪠”和“𣪠”,都應該讀為“料”。從傳世文獻的記載來看,“料”是一種勺類挹水器。目前,已有戰國時期的“料”出土。另外,在古書中,勺類器物是個具體的概念,而“十升”却是個抽象的概念。《說文》斗部:“斗,象形。有柄。”<sup>⑤</sup>“斗”可能是勺類器物的本字,因其可以用木頭或金屬製作而加“木”“金”二旁成為“料”和“釂”。後來,由於“斗”被假借用以表示“十升”,而“料”就成了勺類器物的專字。至於“釂”,因其與“鏗”字音近而被假借用以表示壺形器。

附記一:楚簡中還有兩個从“斗”的形體。1、上博簡《周易》簡 42 中有“𣪠”字,整理者釋為“斛”。<sup>⑥</sup>2、清華簡《尹至》簡 5 中有“𣪠”字:“夏𣪠民內(入)于水曰畧(戰)”,整理者將“𣪠”隸定為“𣪠”,並認為:“𣪠,《說文》古文‘番’,讀為‘播’,《國語·晉語二》注:‘散也。’”<sup>⑦</sup>關於此字,有學者認為:“整理者釋‘夏’下一字為‘𣪠(播)’,大概根據的是《上博

① 董珊:《信陽楚墓遣策所記的陶壺和木壺》,武漢大學簡帛研究中心主辦《簡帛》第 3 輯,37 頁。

② 賈連敏:《釋裸瓚》,中國古文字學研究會第九屆學術討論會論文,1992;《古文字中的“裸”和“瓚”及相關問題》,《華夏考古》1998 年第 3 期;《甲骨文獻集成》第 14 冊,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2001,316 頁。


③ 湖北省博物館:《曾侯乙墓》,243 頁。




④ 湖北省荆沙鐵路考古隊:《包山楚墓》,北京:文物出版社,1991,147 頁;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江陵望山沙塚楚墓》,北京:文物出版社,1996,144 頁;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信陽楚墓》,北京:文物出版社,1986,69 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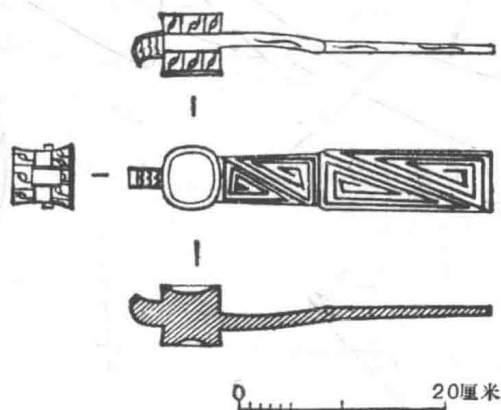
⑤ 《說文解字》卷一四上《斗部》,北京:中華書局,1963,300 頁。

⑥ 馬承源主編:《上海博物館藏楚竹書(三)》,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193—194 頁。

⑦ 李學勤主編:《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壹)》,上海:中西書局,2011,128 頁、130 頁注 27。

(一)·緇衣》簡 15 的𠂔字,此字今本《緇衣》作‘播’。不過,《尹至》此字原作,从‘米’从‘斗’,與上博簡《緇衣》用爲‘播’之字有異,可據形隸定爲‘料’。‘料’字見於《說文·斗部》,訓爲‘量也’,‘从斗、米在其中’(小徐本作‘从米在斗中’)。《國語·周語上》:‘宣王既喪南國之師,乃料民於太原。仲山父諫曰:民不可料也!夫古者不料民而知其少多……且無故而料民,天之所惡也……’韋昭注:‘料,數也。’”<sup>①</sup>從上文中的論述來看,此字的確應當釋爲“料”。

附記二:上博簡《緇衣》簡 15 中有字作“𠂔”,整理者隸定爲“𠂔”,并指出:“𠂔,字形从𠂔从少,‘𠂔’字中增‘少’字。《說文》所無,與郭店簡‘雀’字相對應。此句郭店簡作‘執型而翌雀’。今本作‘褻刑而輕爵’。”<sup>②</sup>我們認爲,“𠂔”字可分析爲从“斗”“少”聲,隸定爲“𠂔”。《說文》隹部:“雀,依人小鳥也。从小、隹。讀與爵同。”<sup>③</sup>而郭店簡《緇衣》簡 28 中,相對應的“雀”字寫作,从“少”作。<sup>④</sup>“𠂔”“雀”二字均从“少”,且“少”爲宵部字,“雀”爲藥部字,宵、藥二部爲陰入對轉。可見,“𠂔”與“雀”在形、音上都關係密切。據此,則“𠂔”疑從“少”得聲。另外,“𠂔”與長沙銅量中的,雖然都是从“少”“斗”,其讀音却完全不同——前者从“少”得聲;後者从“斗”得聲,“𠂔”可視爲的“異讀字”。<sup>⑤</sup>



圖一 包山 2 號墓出土木勺(2:178)<sup>⑥</sup>

① 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研究生讀書會:《清華簡〈尹至〉、〈尹誥〉研讀札記》,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2011 年 1 月 5 日。

② 馬承源主編:《上海博物館藏楚竹書(一)》,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59、191 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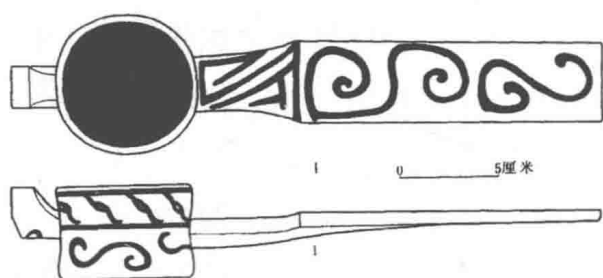
③ 《說文解字》卷四上《斗部》,北京:中華書局,1963,76 頁。

④ 荊門市博物館:《郭店楚墓竹簡》,北京:文物出版社,1998,19 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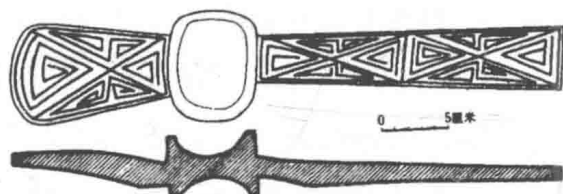
⑤ 參李家浩《從戰國“忠信”印談古文字中的異讀現象》,《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87 年第 2 期。

⑥ 湖北省荊沙鐵路考古隊:《包山楚墓》,149 頁圖九一: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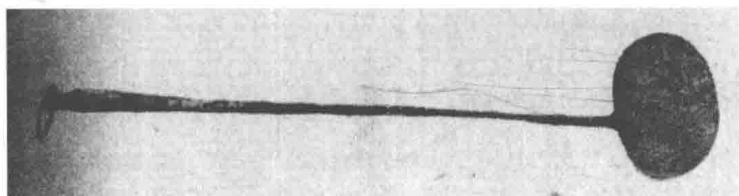
圖二 望山2號墓B型漆勺(WM2:B25)①



圖三 信陽楚墓出土“窩形漆木器”(1—136)②



圖四 口平邑家斗③



圖五 安徽阜陽西漢汝陰侯墓頭箱中出土銅斗④

①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江陵望山沙塚楚墓》，145 頁圖九六：1。

②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信陽楚墓》，41 頁圖二九：3。

③ 咸陽地區文管會、茂陵博物館：《陝西茂陵一號無名塚一號從葬坑的發掘》，《文物》1982 年第 9 期，圖二〇。

④ 安徽省文物工作隊、阜陽地區博物館、阜陽縣文化局：《阜陽雙古堆西漢汝陰侯墓發掘簡報》，《文物》1978 年第 8 期，圖三一。

## 楚國政權的東遷與秦對南郡的統治

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歷史系 張夢晗

**內容提要** 秦國攻占包括郢都在內的楚國統治中心并設置南郡,是戰國後期秦楚對抗中具有標誌性意義的事件。鑒於當時的列國形勢和秦國的威脅,楚國對其政權的遷徙理應有所準備。它使楚國或可較好地保存統治力量,并且減少了此後秦在南郡統治的阻力。秦對南郡的統治始於移民,為起到綱舉目張的效果,秦國移民多集中在南郡及周邊戰略要地,且以赦免的罪人為主。這種做法既是要強化對南郡的控制,也有建立新秩序的考量。新秩序將秦國移民和故楚人一并囊括在內,強調依靠推行秦的爵制,形成新的社會等級秩序,由此產生的受益者群體構成了新秩序的中堅力量。新秩序使秦國在南郡奠定了較為穩固的統治根基,對提升當地民衆的認同感也有促進作用。但不應忽視的是,秦在南郡的成功實際有其特定的背景和歷史條件,它的經驗是帶有局限性的。

**關鍵詞** 楚國政權 東遷 南郡 移民 新秩序

在戰國後期的秦楚對抗中,秦國攻占包括郢都在內的楚國統治中心并設置南郡,是一個具有標誌性意義的事件。由此導致的楚國政權的東遷,對秦在南郡乃至於後續占領的其他故楚地的統治,均產生了深遠的影響。秦在南郡施行的一系列統治措施,之所以能夠取得比較理想的效果,與楚國政權東遷這一大前提不無關係。當然,其中還有一些具體的合理性因

素值得深入探討。以往關於秦對南郡統治的研究可謂成果頗豐,<sup>①</sup>但對作為其歷史背景的楚國政權的東遷似乎仍重視不夠,同時對於秦在南郡所采取的諸如“赦罪人遷之”、推行爵制等統治措施的內在邏輯,亦缺乏較為完整的揭示。本文即試從這兩方面入手,綜合傳世文獻和考古資料,就相關問題略談一些粗淺的看法。

## 一 楚國政權的東遷與影響

公元前 278 年,楚都郢被秦軍攻陷,戰敗的楚國君臣被迫東遷。《史記·楚世家》:“二十一年,秦將白起遂拔我郢,燒先王墓夷陵。楚襄王兵散,遂不復戰,東北保於陳城。”<sup>②</sup>是知楚都東遷後乃以陳為落腳點。<sup>③</sup>不過,楚國統治者究竟是在郢都失陷後倉皇逃竄?還是對政權可能的遷徙有所預備?史籍並未給出明確且詳細的解答。這是一個值得考慮的問題,為此我們需要首先圍繞交戰雙方瞭解一些有關的背景。

作為戰爭的發動者,秦對楚國腹地的大規模進攻實際預謀已久。秦相張儀就曾對魏王說:“楚雖有富大之名而實空虛;其卒雖多,然而輕走易北,不能堅戰。”<sup>④</sup>從具體的軍事準備來說,由長江上游的蜀地順流東下破楚,是秦早在滅蜀之前已初露崢嶸的戰略方針。《華陽國志·蜀志》:

秦惠王方欲謀楚,群臣議曰:“夫蜀,西僻之國,戎狄為鄰,不如伐楚。”司馬錯、中尉田真黃曰:“蜀有桀、紂之亂,其國富饒,得其布帛金銀,足給軍用。水通於楚,有巴之勁卒,浮大船舶以東向楚,楚地可得。得蜀則得楚,楚亡則天下并矣。”惠王曰:“善”。<sup>⑤</sup>

至秦奪取漢中,不僅其本土得以與巴蜀聯成一片,消除了楚國的潛在威脅,而且擴大了對楚國的軍事地理優勢——江漢腹地失去至關重要的屏障,已經門戶大開。秦軍一路從武關出

① 相關研究成果主要有[日]工藤元男著,[日]廣瀨薰雄、曹峰譯《睡虎地秦簡所見秦代國家與社會》,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293-370 頁;陳蘇鎮《〈春秋〉與“漢道”:兩漢政治與政治文化研究》,北京:中華書局,2013,30-37 頁;[韓]琴載元《反秦戰爭時期南郡地區的政治動態與文化特徵——再論“亡秦必楚”形勢的具體層面》,西北師範大學文學院歷史系、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編《簡牘學研究》第 5 輯,蘭州:甘肅人民出版社,2014,129-140 頁;孫聞博《秦據漢水與南郡之置——以軍事交通與早期郡制為視角的考察》,曾磊等編《飛輅廣路:中國古代交通史論集》,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5,42-66 頁;[韓]琴載元《秦代南郡編戶民的秦、楚身份認同問題》,楊振紅、鄔文玲主編《簡帛研究二〇一五(秋冬卷)》,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5,78-92 頁。

② 《史記》卷四〇《楚世家》,北京:中華書局,1959,1735 頁。

③ 辛德勇先生指出,楚王起初尚存恢復故都的企圖,故陳祇是楚王的臨時行在,未得單稱為郢。後來在復國無望的情況下,纔不得不確定以壽春為新都,改稱為郢。參見辛德勇《〈楚居〉與楚都》,收入其著《舊史與地文編》,上海:中西書局,2015,90-91 頁。

④ 《史記》卷七〇《張儀列傳》,2286 頁。

⑤ [晉]常璩撰,劉琳校注:《華陽國志校注》,成都:巴蜀書社,1984,191 頁。

發，兵行丹水、漢水，一路自巴蜀順江而下，就能形成兩面夾擊之勢。志在必得的秦人，由是頻頻對楚國發出軍事恫嚇，張儀就直言不諱地告訴楚懷王：

秦西有巴蜀，大船積粟，起於汶山，浮江已下，至楚三千餘里。舫船載卒，一舫載五十人與三月之食，下水而浮，一日行三百餘里，里數雖多，然而不費牛馬之力，不至十日而距扞關。扞關驚，則從境以東盡城守矣，黔中、巫郡非王之有。秦舉甲出武關，南面而伐，則北地絕。秦兵之攻楚也，危難在三月之內，而楚待諸侯之救，在半歲之外，此其勢不相及也。<sup>①</sup>

類似的警告亦見於《史記·蘇秦列傳》。秦人敢於如此堂而皇之地袒露對楚地的覬覦之心，正是因為他們對進攻楚國的必要性和可行性都已進行了充分的論證和規劃。那麼，處於被動的楚國又如何應對呢？

事實上，秦國的野心早就引起楚國統治者的高度警覺。楚威王所云“寡人之國西與秦接境，秦有舉巴蜀并漢中之心。秦，虎狼之國，不可親也”，<sup>②</sup>便是明證。但這種憂慮後來竟被張儀鑽了空子。他以獻“商於之地六百里”，<sup>③</sup>即秦東出武關、進攻楚國的前沿陣地作為誘餌，騙過了貪圖眼前利益的楚懷王，致使齊楚聯盟破裂。得知實情的楚懷王惱羞成怒，貿然伐秦，結果正中秦人下懷，楚軍慘敗於丹陽，連漢中也被秦奪占。楚懷王不服，又試圖通過“悉發國中兵以深入擊秦”，<sup>④</sup>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的方式作殊死一搏。然而隨着藍田之戰的失利和韓魏的趁火打劫，<sup>⑤</sup>楚國竭盡所能的計畫功虧一簣不說，還蒙受了更大的損失，在與秦國的對抗中陷入了愈加劣勢的局面。

為保全江漢間以郢都為核心的地區，楚國此後主要采取了三方面措施：

其一，拒絕秦對黔中郡、巫郡的索取。藍田之戰後，秦國圖謀通過威逼利誘索取更多的楚地。扼守長江要衝的黔中郡和巫郡，由於正擋在秦軍自巴蜀沿長江而下進攻楚國腹地的路綫上，並且擁有豐富的自然資源，<sup>⑥</sup>成為秦國必欲得之的目標。楚懷王十八年，“秦要楚欲得黔中地，欲以武關外易之”。楚懷王先是聲稱“不願易地，願得張儀而獻黔中地”，<sup>⑦</sup>繼而張儀到了楚國，懷王又對他先擒後縱。既不割讓黔中郡，亦不給秦興兵討伐的口實。<sup>⑧</sup>楚懷王三十年，秦昭襄王復以盟會為由騙楚懷王入秦，將其扣為人質，“要以割巫、黔中之郡”。懷王

① 《史記》卷七〇《張儀列傳》，2290—2291 頁。

② 《史記》卷六九《蘇秦列傳》，2261 頁。

③ 《史記》卷七〇《張儀列傳》，2287 頁。

④ 《史記》卷八四《屈原賈生列傳》，2483 頁。

⑤ 《史記》卷四〇《楚世家》，1724 頁。

⑥ 參見趙炳清《楚國疆域變遷之研究》，復旦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13，209 頁。

⑦ 《史記》卷七〇《張儀列傳》，2288 頁。

⑧ 參見王健《縱橫戰爭與楚懷王擒縱張儀原因辨析》，《中國史研究》1998 年第 4 期。

怒曰：“秦詐我而又強要我以地。”寧死而不從。作為對訛詐的回擊，楚國不久即擁立太子橫為新君，告於秦曰：“賴社稷神靈，國有王矣。”<sup>①</sup>秦昭襄王雖出兵報復，但是秦國索取黔中郡、巫郡以包圍楚國腹地的企圖被遏制了。

其二，修築長城自衛。《史記·楚世家》載：“（懷王）二十八年，秦乃與齊、魏、韓共攻楚，殺楚將唐昧，取我重丘而去”；“二十九年，秦復攻楚，大破楚，楚軍死者二萬，殺我將軍景缺”；<sup>②</sup>“三十年，秦復伐楚，取八城”，“頃襄王橫元年……秦昭王怒，發兵出武關攻楚，大敗楚軍，斬首五萬，取析十五城而去”。<sup>③</sup>楚懷王末期到頃襄王初期，楚國相繼被秦國奪去宛、葉西部和北部許多城邑。為防止秦軍東出武關進一步蠶食楚國，楚人遂在宛、葉周邊地勢險要處修築長城，以為戰略屏障。<sup>④</sup>《史記正義·越王勾踐世家》引《括地志》曰：“故長城在鄧州內鄉縣東七十五里，南入穰縣，北連翼望山，無土之處累石為固。楚襄王控霸南土，爭強中國，多築列城於北方，以適華夏，號為方城。”<sup>⑤</sup>

其三，滅巴得枳。《輿地紀勝》卷一五九引《益州耆舊傳》：“昔楚襄王滅巴子，封庶子於濮江之南，號銅梁侯。”<sup>⑥</sup>此即《史記·蘇秦列傳》“楚得枳而國亡”<sup>⑦</sup>的前半所指。枳是巴國的政治中心之一，《華陽國志·巴志》稱“其先王陵墓多在枳”。<sup>⑧</sup>楚頃襄王所滅之巴，是秦滅巴後枳地殘餘的巴國政權。<sup>⑨</sup>史載楚頃襄王十八年“遣使於諸侯，復為縱，欲以伐秦”，<sup>⑩</sup>羅運環先生認為楚國滅巴得枳大約也在這時，是其不甘坐以待斃的具體表現。<sup>⑪</sup>由於枳地位於烏江

① 以上皆見《史記》卷四〇《楚世家》，1728頁。

② 《史記》卷一五《六國年表》同年記“秦取我襄城，殺景缺”，736頁。

③ 分見《史記》卷四〇《楚世家》，1727、1729頁。

④ 關於此段楚長城的地望和修築年代，可參見張維華《中國長城建置考》，北京：中華書局，1979，32-35頁；柴中慶《楚長城西段考》，楚文化研究會編《楚文化研究論集》第4集，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252-259頁；張卓遠《淺論楚方城》，《楚文化研究論集》第4集，260-268頁；肖華銀、艾廷和《楚長城的建築時間和形勢考》，《江漢考古》2003年第4期。

⑤ 《史記》卷四一《越王勾踐世家》，1750頁。按：張維華先生指出，《括地志》之文本出自《水經注》，而《水經注》原文并未明言楚長城的修築時間，因此如《括地志》不存在後人誤增的話，則其徑稱楚頃襄王築城有武斷之嫌（參見其著《中國長城建置考》，36-37頁）。綜合考慮當時的情勢，不能排除楚懷王末期即開始修築該段長城的可能性（參見陳偉《楚“東國”地理研究》，武漢大學出版社，1992，18-19頁）。

⑥ [宋]王象之撰：《輿地紀勝》，北京：中華書局，1992，4321頁。

⑦ 《史記》卷六九《蘇秦列傳》，2271頁。

⑧ [晉]常璩撰，劉琳校注：《華陽國志校注》，58頁。

⑨ 段渝：《論巴楚聯盟及其相關問題》，《楚學論叢》（江漢論壇增刊），1990年。

⑩ 《史記》卷四〇《楚世家》，1731頁。

⑪ 羅運環：《楚國八百年》，武漢大學出版社，1992，346頁。按：趙炳清先生將楚得枳的時間繫於公元前280年，與羅運環先生的推測相近（參見其著《楚國疆域變遷之研究》，216-217頁）。又，羅運環先生認為，“莊蹻開滇與楚人滅巴得枳一樣，是針對秦人滅蜀定蜀來的”（參見其著《楚國八百年》，346-351頁），鄧立勳先生也持類似觀點（參見其著《楚頃襄王“忘仇和秦”辨析》，《江漢論壇》1988年第9期）。然而對於莊蹻的真實身份及其入滇是否受到楚王派遣，學界實際頗有爭議（參見劉玉堂《論莊蹻其人其事》，《民族研究》1990年第3期；張正明《楚史》，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1995，344頁），筆者對此也抱以懷疑的態度，故未將相關內容列入楚國的應對措施中。



與長江的交匯處，乃浮江伐楚的交通要地，因而為緩解秦國盤踞長江上游所帶來的軍事壓力，並將戰綫向西推移，楚軍前出占領了此地。

綜上可見，楚國對秦國的戰略意圖有清醒的認識，且在秦可能發動進攻的兩個主要方向上保持着嚴密戒備。但楚國面對的畢竟是敵強我弱的不利形勢，縱然如此也無法確保江漢核心地區的安全，其內部顯露出的某些迹象，即說明楚人對抵禦秦軍的前景並不樂觀。根據何浩先生的研究，白起攻占郢都以前，為了躲避以秦國為首的北方諸侯的兵鋒，楚國的新的封君封地就已經出現了逐步東移的趨勢。<sup>①</sup> 加之此前秦國大兵壓境時，楚人確有過遷徙的想法和行動，如懷王的寵妃鄭袖云：“王未有禮而殺張儀，秦必大怒攻楚。妾請子母俱遷江南，毋為秦所魚肉也。”<sup>②</sup> 屈原《九章·哀郢》：“皇天之不純命兮，何百姓之震愆。民離散而相失兮，方仲春而東遷。”<sup>③</sup> 對楚國這樣幅員遼闊的大國而言，失却郢都并非就意味着無路可退。更何況自秦軍開啓戰端到攻陷郢都，前後兩年有餘，此間楚軍節節不利的戰況已經使郢都岌岌可危。退一步說，即便沒有提前進行準備，戰爭期間實際也足夠楚國統治者慎重考慮政權遷徙之事。因此我們認為，楚國政權的東遷并非完全是在倉促之中進行，而是應當有一定計劃性和組織性的。江漢地區迄今為止未見有元士級以上的楚遺民墓，大概就是楚國元士以上的貴族階層已基本遷走的證明。<sup>④</sup> 總之，東遷有利於保存楚國的統治力量，尤其是貴族群體，而不至於在秦軍“墮名城，殺豪俊”<sup>⑤</sup>的過程中遭受滅頂之災。

可以想見的是，除了楚國的上層，許多平民也應在逃亡的行列中。

一是躲避秦軍的屠戮。為奪取戰爭的勝利，秦軍不惜采取一些極端殘忍的手段，譬如白起攻打鄢時，就悍然以水灌城。<sup>⑥</sup> 同時在“計首授爵”的軍功獎勵制度的驅使下，秦軍還濫殺無辜。譙周所謂“秦用衛鞅計，制爵二十等，以戰獲首級者計而受爵。是以秦人每戰勝，老弱婦人皆死，計功賞至萬數，天下謂之‘上首功之國’，皆以惡之也”，<sup>⑦</sup>就充分說明了這一點。

① 何浩：《論楚國封君制的發展與演變》，《江漢論壇》1991年第5期。按：據鄭威先生統計，悼王之後至頃襄王前期江南地區和淮河中游地區的封君數量有了顯著增長，分別由楚惠王至悼王時期的0個和1個增長到7個和6個。其中江南地區封君的驟增與吳起變法“令貴人往實廣虛之地”（鄭威：《楚國封君研究》，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2012，196-214頁）的措施雖有一定關聯，但似乎還應考慮到懷王中後期以來秦國的軍事威脅對楚國所造成的影響。

② 《史記》卷七〇《張儀列傳》，2289頁。

③ 湯炳正等注：《楚辭今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135頁。按：關於《哀郢》中“東遷”的背景和時間，一直以來聚訟紛紜，在無法贊同東遷之“民”係屈原自指這種觀點的基礎之上，本文以楚頃襄王初年說為是。戴震《屈原賦注》附《音義》云：“屈原東遷，疑當即頃襄元年，秦發兵出武關攻楚，大敗楚軍，取析十五城而去。時懷王辱於秦，兵敗地喪，民散相失，故有‘皇天之不純命’之語。”（張岱年主編：《戴震全書》（三），合肥：黃山書社，1995，779頁）持此論者，大抵皆循戴氏理路，除前揭《楚辭今注》外，可參見趙逵夫《〈哀郢〉釋疑并探屈原的一段行蹤》，收入其著《屈原與他的時代》，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6，429-433頁。

④ 尹弘兵：《江陵地區戰國晚期至秦代墓葬初探》，武漢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05，90頁。

⑤ 《史記》卷四八《陳涉世家》，1963頁。

⑥ [北魏]酈道元撰，陳橋驛點校：《水經注》，北京：中華書局，2007，667-668頁。

⑦ 《史記》卷八三《魯仲連鄒陽列傳》，2461頁。



睡虎地秦簡《封診式》載有秦軍按驗首級的一個例子,當中講到“其頭所不齊賤賤然”,并要求“有失伍及遲不來者,遣來識戲次”。<sup>①</sup> 朱紹侯先生據此認為,秦軍中很可能存在着殺良冒功的現象。<sup>②</sup>

二是不願做秦民。出於對秦國的抵觸情緒,以及對“務苦而復爵重”<sup>③</sup>的懼怕,彼時東方各國民衆多不願接受秦國的統治。秦拔韓上黨,“上黨民不樂爲秦而歸趙”;<sup>④</sup>“周君、王赧卒,周民遂東亡”。<sup>⑤</sup> 此外,還有一些具有代表性的言論,也多少體現了東方各國的民意。如魯仲連即直抒其不爲秦民的決心:“彼秦者,棄禮義而上首功之國也,權使其士,虜使其民。彼即肆然而爲帝,過而爲政於天下,則連有蹈東海而死耳,吾不忍爲之民也。”<sup>⑥</sup> 蘇代說秦相應侯亦曰:“天下不樂爲秦民之日久矣。”<sup>⑦</sup> 故值此大背景之下,逃亡的人群中想必還有爲數不少的楚國普通民衆。

至於秦軍在多大程度上能够攔阻楚國政權和民衆的遷徙,這個問題要分開看。一來秦軍的兵力其實頗爲有限。《史記·平原君列傳》云:“白起,小豎子耳,率數萬之衆,興師以與楚戰,一戰而舉鄢郢,再戰而燒夷陵,三戰而辱王之先人。”<sup>⑧</sup> 爲了集中力量攻占郢都,秦軍或許不會將兵力分散在所有新占領的地區,因此“在一些駐點之間,仍會有很大空隙容楚王楚軍通過”。<sup>⑨</sup> 二來秦惠王到昭襄王時期,秦國曾在兼并他國領土後采取“出其人”的措施。例如:“爵樗里子右更,使將而伐曲沃,盡出其人,取其城,地入秦。”“使張儀伐取陝,出其人與魏。”“秦拔我曲沃,歸其人。”<sup>⑩</sup> 儘管自秦昭襄王二十一年以後,史籍不再有“出其人”的記載,但此時下距二十七年司馬錯拉開攻楚大幕不過短短六年。縱使秦國已不再沿襲“出其人”的做法,也很難講它內在的理念就出現了本質上的變化。<sup>⑪</sup> 甚至不排除正是楚人的紛紛出逃,爲秦國無形中達成了一些“出其人”的效果。

總而言之,由於秦國長期以來的恐嚇和軍事威脅,楚國對其政權的遷徙理應有所準備,

① 睡虎地秦墓竹簡整理小組:《睡虎地秦墓竹簡》,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153頁。

② 朱紹侯:《軍功爵制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163-164頁。

③ 蔣禮鴻:《商君書錐指》卷四《徠民》,北京:中華書局,1986,89頁。

④ 《史記》卷七三《白起王翦列傳》,2335頁。

⑤ 《史記》卷四《周本紀》,169頁。

⑥ 《史記》卷八三《魯仲連鄒陽列傳》,2461頁。

⑦ 《史記》卷七三《白起王翦列傳》,2336頁。

⑧ 《史記》卷七六《平原君虞卿列傳》,2367頁。

⑨ 郭德維:《試論秦拔郢之戰——兼探夷陵之所在》,《江漢論壇》1992年第5期。

⑩ 分見《史記》卷七一《樗里子甘茂列傳》,2307頁;《史記》卷五《秦本紀》,206頁;《史記》卷一五《六國年表》,732頁。

⑪ 琴載元先生認為,秦國對楚國江漢平原的占領是繼兼并蜀地後“廣地”政策的延續,旨在進一步解決秦國“地小民貧”的困難(參見其著《戰國時期秦領土擴張及置郡背景》,《首都師範大學學報》2016年第4期),此說甚是。楚國江漢核心地區人口本就十分密集,如不出現一定的外流,便難有足够的空間容納來自秦本土的移民。這種注重領土擴張而忽視當地人口的政策,直到秦昭襄王四十七年“秦已拔上黨,上黨民不樂爲秦而歸趙”,纔可看出比較明顯地發生了改變。

這使之可以較好地保存主要統治力量。白起拔郢後不過兩年，楚頃襄王就“收東地兵，得十餘萬，復西取秦所拔我江旁十五邑以爲郡，距秦”，<sup>①</sup>便是明證。同時，相當數量的楚國平民的逃亡，導致了江漢地區更大面積的人口流失，加之戰爭的損耗，往日繁華的盛景已蕩然無存。<sup>②</sup>留下的人口空缺，復由秦國通過移民和派駐官吏、軍隊予以填補。在上述過程中，原先楚國核心地區的人口結構產生了劇變，幾近於洗牌。這既是秦設置南郡之初的一個重要特徵，也凸顯了楚國政權東遷客觀上造成的另一方面影響，即減少了秦在南郡可能遇到的阻礙，有利於日後其統治的推行。

## 二 秦對南郡的統治及成效

考察秦對南郡的統治，需要首先關注的是秦國的移民情況。根據《史記·秦本紀》，早在南郡設置以前，秦國就曾三次向江漢及鄰近的南陽地區移民，分別是秦昭襄王“二十六年，赦罪人遷之穰”，“二十七年，錯攻楚。赦罪人遷之南陽”，以及“二十八年，大良造白起攻楚，取鄢、鄧，赦罪人遷之”。<sup>③</sup>對於這三次與南郡相關的移民記錄，我們認爲應從移民的遷入地着手加以探討。

具體而言，在秦楚戰爭一觸即發的形勢推動下，秦國統治者越發認識到加強對南陽地區控制的緊迫性。雖然南陽地區是距離江漢平原較遠的移民遷入地，屬於後來的南陽郡，但此地不僅繁榮富庶，曾是楚國封君封邑分布最集中的地區之一，<sup>④</sup>而且西通武關、南達於郢，堪稱秦軍奪取江漢地區的大本營。因此移民南陽既可在戰時充實後方力量，長遠地看，又相當於在南郡的大門外栓了把鎖，能夠起到輔助南郡統治的作用。

至於鄧和鄢，則是控制江漢地區的兩大戰略樞紐。

鄢亦屬南陽郡，位於南陽郡與南郡的交界，是漢水北岸的要津。《史記·屈原賈生列傳》注云：“此鄢在漢水之北，故鄢侯城也。”<sup>⑤</sup>石泉先生考證認爲即今湖北襄陽市的鄢城遺址。<sup>⑥</sup>作爲楚國水陸交通的節點之一，陸路方面，鄢是連接南陽盆地和江漢平原的必經之地；水路方面，也可由漢水支流唐白河至南陽盆地，北上中原。雖然根據《史記·秦本紀》，秦軍先取

① 《史記》卷四〇《楚世家》，1735 頁。

② 考古證實，郢都紀南城在戰國以後不再有秦漢地層堆積。參見湖北省博物館《楚都紀南城的勘查與發掘（下）》，《考古學報》1982 年第 4 期。

③ 以上皆見《史記》卷五《秦本紀》，213 頁。

④ 鄭威：《楚國封君研究》，197-198、206、208 頁。

⑤ 《史記》卷八四《屈原賈生列傳》，2484 頁。

⑥ 石泉：《古鄢國、鄢縣考》，《江漢論壇》1980 年第 3 期。

的是鄢,但對鄢的進攻實則早於鄢<sup>①</sup>。睡虎地秦簡《編年紀》繫攻鄢於秦昭襄王二十七年,在鄢之前,<sup>②</sup>可證。結合《史記·六國年表》同年“秦擊我,與秦漢北及上庸地”<sup>③</sup>的記載,不難發現楚國寧願割讓領土,也要阻止秦軍對鄢的攻勢。相似的事態在前述楚軍深入擊秦時也曾發生過,韓魏襲楚至鄢,“楚兵懼,自秦歸”。<sup>④</sup>鄢的重要性,由此可見一斑。

如果說鄢是據守漢水的咽喉,那麼鄢就是郢的門戶。秦軍克鄢次年便“取郢為南郡”,即其證。鄢和郢之間關係極為密切,以至於《史記》多有將鄢、郢連稱,以指代白起先取鄢後攻郢的史事的例子。如“白起為秦將,南征鄢郢,北阬馬服”<sup>⑤</sup>“秦前已使白起攻楚,取巫、黔中之郡,拔鄢郢,東至竟陵”<sup>⑥</sup>“當是時,昭王已立三十六年。南拔楚之鄢郢,楚懷王幽死於秦”<sup>⑦</sup>等等,足見鄢之於拱衛郢都的關鍵意義。除此以外,鄢的不凡之處還體現在它是楚國“最為著名,也最為重要的一座別都”。<sup>⑧</sup>有學者甚至推測,鄢就是之後南郡郡治的所在地。<sup>⑨</sup>儘管黃盛璋先生已指出,南郡的治所實則位於舊郢都東面不遠的郢城。但由於郢城的面積很小,祇有郢都紀南城的六分之一,<sup>⑩</sup>故而即使鄢不是郡治,憑藉其形勝和歷史積澱,也依然具有相對突出的影響力。

要之,秦向鄢、鄢移民的意圖十分清晰,就是務求將南下郢都沿綫的這兩座重鎮牢牢置於掌握之中。此舉對秦後續攻取郢都,特別是設立南郡,均有顯而易見的好處。據里耶秦簡及北京大學藏秦水陸里程簡冊可知,入秦後鄢和鄢仍是江漢地區重要的交通節點。<sup>⑪</sup>二者既能夠成為阻擋秦軍南下的障礙,無疑也可以搖身變成秦控制南郡的營壘。縱然鄢與前揭的“穰”“南陽”不在南郡的管轄範圍之內,但其緊要的位置,決定了一旦南郡發生變故,它們可隨時為南郡提供有力支援。

① 孫聞博先生認為白起率領的秦軍主力繞過秦、楚相持的鄢而直趨鄢,破鄢後復北取鄢,其說可從。參見其著《秦據漢水與南郡之置——以軍事交通與早期郡制為視角的考察》,曾磊等編《飛輪廣路:中國古代交通史論集》,57-58頁。

② 睡虎地秦墓竹簡整理小組:《睡虎地秦墓竹簡》,5、8頁。

③ 《史記》卷一五《六國年表》,741-742頁。

④ 《史記》卷八四《屈原賈生列傳》,2483頁。

⑤ 《史記》卷七《項羽本紀》,308頁。

⑥ 《史記》卷七八《春申君列傳》,2387頁。

⑦ 《史記》卷七九《範雎蔡澤列傳》,2404頁。

⑧ 辛德勇:《雲夢睡虎地秦人簡牘與李信、王翦南滅荆楚的地理進程》,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編《出土文獻》第5輯,上海:中西書局,2014,211頁。

⑨ 馬非百:《雲夢秦簡中所見的歷史新證舉例》,《鄭州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78年第2期;睡虎地秦簡研究班:《睡虎地秦簡校注》,《簡牘學報》1981年第10期。

⑩ 黃盛璋:《江陵鳳凰山漢墓簡牘及其在歷史地理研究上的價值》,《江陵鳳凰山漢墓出土簡牘、告地策與歷史地理問題》,收入其著《歷史地理與考古論叢》,濟南:齊魯書社,1982,187-188頁,210-212頁。

⑪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里耶發掘報告》,長沙:嶽麓書社,2006,198-199頁;辛德勇:《北京大學藏秦水陸里程簡冊初步研究》,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編《出土文獻》第4輯,上海:中西書局,2013,220、223、226、244、257、258、259頁。

當然，秦國移民在南郡的分布不會僅限於鄢，以上幾處移民遷入地，已為我們提示了秦選擇移民地點的某種規律。陳平先生總結，江漢地區秦墓較為集中的地點，多屬通都大邑和關塞險要，或是秦國移民的主要聚集地。<sup>①</sup>核以“白起攻楚，拔鄢、鄧五城。其明年，攻楚，拔鄢，燒夷陵，遂東至竟陵”，<sup>②</sup>及睡虎地秦簡《編年紀》“廿九年，攻安陸”<sup>③</sup>的記述，秦軍席卷之處，除了竟陵，其餘各地皆發掘有不少秦墓。如襄陽（鄢）的餘崗、鄭家山、王坡，<sup>④</sup>宜城（鄢）的楚皇城、雷家坡，<sup>⑤</sup>江陵（郢）的揚家山、王家臺、周家臺、嶽山、擂鼓臺、九店和子陵崗，<sup>⑥</sup>宜昌（夷陵）的前坪、葛洲壩，<sup>⑦</sup>以及雲夢（安陸）的睡虎地、龍崗等，<sup>⑧</sup>可知陳先生的推斷絕非無的放矢。這些墓葬涵蓋目前湖北地區的主要秦墓，雖然不完全是秦移民墓，但比之楚文化，它們受秦文化影響更為深刻則是毋庸置疑的。<sup>⑨</sup>秦文化之所以能在上述故楚核心地區後來居上，應與秦國移民到來所產生的潛移默化的作用有關。此種文化滲透，對移民來說是日常生活中自覺行為的結果，對秦的統治而言，則是其通過移民得以愈益加强的力量的直接反映。

除了移民的遷入地，這些移民的身份也值得揣摩。秦國將赦免的罪人遷徙到楚國故地的原因何在？我們認為可歸結為以下兩點：

其一，“赦罪人遷之”是當時秦國移徙人口的主要方式。縱觀秦昭襄王時期五次規模較大的移民，其中前述的三次都採取了“赦罪人遷之”的辦法，還有一次“秦與魏、韓上庸地為一郡，南陽免臣遷居之”，<sup>⑩</sup>性質與“赦罪人遷之”亦頗為相類。唯一的例外，昭襄王二十一年

① 陳平：《淺談江漢地區戰國秦漢墓的分期和秦墓的識別問題》，《江漢考古》1983年第3期。

② 《史記》卷七三《白起王翦列傳》，2331頁。

③ 睡虎地秦墓竹簡整理小組：《睡虎地秦墓竹簡》，5頁。

④ 分見襄樊市博物館《湖北襄陽餘崗戰國墓發掘簡報》，《考古》1992年第9期；襄樊市博物館《湖北襄樊市餘崗戰國至東漢墓發掘報告》，《考古學報》1996年第3期；襄樊市博物館《襄樊餘崗戰國秦漢墓第二次發掘簡報》，《江漢考古》2003年第2期；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襄樊市博物館《湖北襄樊鄭家山戰國秦漢墓》，《考古學報》1999年第3期；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襄樊市考古隊、襄陽區文物管理處編著《襄陽王坡東周秦漢墓》，北京：科學出版社，2005，213頁。

⑤ 分見楚皇城考古發掘隊《湖北宜城楚皇城戰國秦漢墓》，《考古》1980年第2期；武漢大學歷史系考古專業、宜城縣博物館《宜城雷家坡秦墓發掘報告》，《江漢考古》1986年第4期。

⑥ 分見湖北省荊州地區博物館《江陵揚家山135號秦墓發掘簡報》，《文物》1993年第8期；荊州地區博物館《江陵王家臺15號秦墓》，《文物》1995年第1期；湖北省荊州市周梁玉橋遺址博物館《關沮秦漢墓清理簡報》，《文物》1999年第6期；湖北省江陵縣文物局、荊州地區博物館《江陵嶽山秦漢墓》，《考古學報》2000年第4期；荊州市荊州區博物館《荊州擂鼓臺秦墓發掘簡報》，《江漢考古》2003年第2期；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江陵九店東周墓》，北京：科學出版社，1995，421頁；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荊門市博物館《荊門羅坡崗與子陵崗》，北京：科學出版社，2004，377頁。

⑦ 湖北省博物館：《宜昌前坪戰國兩漢墓》，《考古學報》1976年第2期。

⑧ 分見《雲夢睡虎地秦墓》編寫組《雲夢睡虎地秦墓》，北京：文物出版社，1981，68-69頁；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孝感地區博物館、雲夢縣博物館《雲夢龍崗秦漢墓地第一次發掘簡報》，《江漢考古》1990年第3期；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孝感地區博物館、雲夢縣博物館《湖北雲夢龍崗秦漢墓地第二次發掘簡報》，《江漢考古》1993年第1期。

⑨ 陳振裕：《略論湖北秦墓》，《文博》1986年第4期。按：“秦墓”也可能是以秦文化為主要特徵的故楚人墓，江陵鳳凰山M70墓就是一例。參見陳振裕《從湖北發現的秦墓談秦楚關係》，湖北省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編《楚文化新探》，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1981，205頁。

⑩ 《史記》卷五《秦本紀》，213頁。



“募徙河東賜爵”，<sup>①</sup>即招募平民遷徙并賜予爵位，也不是單獨進行，而是與“赦罪人遷之”同步展開的。至於犯罪後被直接判處遷刑的情況，則一來此期以個案居多，<sup>②</sup>二來遷刑犯人很可能和移民一樣不得返回故籍，<sup>③</sup>除重罪者還要受其他徒刑的懲罰外，與“赦罪人遷之”實無太大區別。<sup>④</sup>故此，“赦罪人遷之”應是當時比較常態化的移民方式。秦國有意識地以政府主導的移民，將不守律令者逐出統治中心，著籍後永居遷地，并利用他們充實新占領地區，加強對當地的掌控。<sup>⑤</sup>這種思維理念在戰國中後期的秦國一以貫之，睡虎地4號秦墓6號木牘所載“聞新地城多空不實者，且令故民有為不如令者實”，<sup>⑥</sup>便是其印證。

其二，“赦罪人遷之”的特殊性有利於新秩序的建立。日本學者西嶋定生提出：“赦，包含有更始自新的意思，它不僅有免罪這一個含義，還是預定了使這些人緊接着參加到新秩序中來的意思。”<sup>⑦</sup>也就是說，“赦罪人遷之”在移民的同時，亦開啓了南郡等地區新秩序的建立。這裏的“新秩序”，管見以爲，不祇是與本地舊傳統相割斷的新設縣的秩序，還是在此基礎上依靠推行秦的爵制形成的新的社會身份等級秩序：前者使後者的實施成爲可能，後者則爲鞏固前者做出貢獻。從秦國選擇因犯罪而喪失原有身份，同時由於赦免又有機會獲取新身份的罪人作爲移民對象不難推測，此新秩序不僅與楚國舊秩序無關，而且在其形成的過程中，它與秦國已有的秩序之間，更多的也祇是彼此內在法理的相通，二者的一致性實際突出體現在秩序的生成模式上。這也就能解釋爲什麼徙民賜爵的同時，又“赦罪人遷之”——關鍵乃在於徙民賜爵也好，派駐官吏和軍隊也好，都祇爲促進遷入地新秩序的形成，而不是將一個定型的秩序全然複製過去。“赦罪人遷之”作爲更主流的移民方式證明，秦國統治者傾向於爲新秩序的自行生長留下空間，并爲之提供具有積極能動性的力量。

綜合以上關於秦國移民的討論，可以發現無論是移民的遷入地，還是移民的對象，處處

① 《史記》卷五《秦本紀》，213、212頁。

② 按：由於政治原因而被集團性論以遷刑的情況，鮮見於秦昭襄王時期，而在秦王政在位期間則頻繁得多，如“八年，王弟長安君成蟄將軍擊趙，反，死屯留，軍吏皆斬死，遷其民於臨洮”；九年，嫪毐作亂被誅，“及其舍人，輕者爲鬼薪。及奪爵遷蜀四千餘家，家房陵”；以及“十二年，文信侯不韋死，竊葬。其舍人臨者，晉人也逐出之；秦人六百石以上奪爵，遷；五百石以下不臨，遷，勿奪爵”。以上分見《史記》卷六《秦始皇本紀》，224-225、227、231頁。

③ 參見宋傑《論秦漢刑罰中的“遷”、“徙”》，《北京師範學院學報》1992年第1期；曹旅寧《嶽麓書院新藏秦簡叢考》，《華東政法大學學報》2009年第6期；王戰國《秦代“遷”刑考辨》，《安陽師範學院學報》2013年第3期。

④ “赦罪人遷之”屬於被寬大地處以遷刑，與犯罪後被判處遷刑不同的是，其移民實邊的方面是主要的，而刑罰的方面則已在之前的赦免中被淡化。參見張晉藩總主編、徐世虹主編《中國法制通史》第2卷《戰國、秦漢》，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164-165頁；崔向東《論秦代的“遷”刑》，《廣西民族大學學報》2011年第5期。

⑤ 于振波先生認爲，赦免的罪人身爲秦人的優越感，有助於秦加強對新占領地區的控制（參見其著《秦律令中的“新黔首”與“新地吏”》，《中國史研究》2009年第3期）；王子今先生亦指出，“赦罪人遷之”有其積極作用，特別是對人口有限的經濟落後地區，或許更爲有效（參見其著《秦兼并戰爭中的“出其人”政策——上古移民史的特例》，《文史哲》2015年第4期）。

⑥ 《雲夢睡虎地秦墓》編寫組：《雲夢睡虎地秦墓》，25頁。

⑦ [日]西嶋定生著，伍尚清譯：《中國古代帝國的形與結構——二十等爵制研究》，北京：中華書局，2004，495頁。

滲透着秦國決策者對問題的多重考量。通過將赦免的罪人遷徙到南郡及其周邊的戰略要地，秦國以事半功倍的方式實現了利益的最大化。一則消除了統治中心可能的隱患，二則保證了既能利用秦故民強化對南郡等地的統治，又能以點帶面，推進新秩序的建立，達成一石二鳥之效。

不過，儘管秦故民理所當然是新秩序所倚重的力量，但在不斷擴張兼并的過程中，凡是納入秦國統治下的郡縣，其編戶民即是法律意義上的“秦人”。<sup>①</sup> 所以從這一層面來講，南郡的故楚人也是新秩序不可或缺的參與者。

更重要的是，地緣關係與血緣關係相雜糅的楚國舊秩序，極有可能已隨戰爭失敗和楚國統治階級的東遷受到嚴重破壞，在失去約束力的情況下，相當數量的平民的逃亡更使得舊秩序殘留的部分千瘡百孔。留在南郡的故楚人本就多處於舊秩序的金字塔底部，<sup>②</sup> 如此一來，舊秩序所能產生的影響便愈加衰微了。所謂“皮之不存，毛將焉附”，這就顯而易見地減少了瓦解舊秩序的阻力，有助於否定和粉碎舊有的族的結合，<sup>③</sup> 將中央集權性的縣制充分浸透到基層組織，為新秩序的確立創造更為理想的條件。

如前所述，新秩序是更新社會等級結構的秩序，其形成的主要方式就是推行秦的爵制，而最先將此付諸實踐的無疑是秦國本土。《商君書·去強》：“興兵而伐，則武爵武任，必勝；按兵而農，粟爵粟任，則國富。”<sup>④</sup> 經過孝公時期商鞅的爵制改革，秦人獲得爵位的途徑主要有軍功賜爵、納粟拜爵和告奸三種。其中軍功賜爵的地位尤為突出，在秦的爵制裏占據着絕對主導，商鞅甚至將實行軍功爵制視為關係國家命運的頭等大事：

行賞而兵強者，爵祿之謂也。爵祿者，兵之實也。是故人君之出爵祿也道明，道明則國日強，道幽則國日削。故爵祿之所道，存亡之機也。<sup>⑤</sup>

以軍功爵為核心的爵制之所以能起到調整社會等級結構的杠杆作用，或可從以上國家決策層面的高度重視中得到些許啟發，而在此前提下，還有兩條十分切要的原因。

第一，軍功為本位的原則決定了獲取爵位的開放性和公平性。商鞅變法以後的秦國建

① 參見沈剛《秦人與它邦人——新出秦簡所見秦代人口身份管理制度一個方面》，中國政法大學法律古籍整理研究所編《中國古代法律文獻研究》第9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5，145頁。

② 王淮先生按照楚墓現有的分類標準，對當陽趙家湖楚墓和江陵九店楚墓中庶民階層的比例進行統計，結果分別是50.5%和44.5%。王先生認為，楚國庶民階層的比例之所以偏低，與楚國庶民與貴族階層之間禮制的僭越有關（參見其著《秦、楚兩國庶民階層比較初探》，楚文化研究會編《楚文化研究論集》第6集，222-228頁）。是知楚國庶民階層的實際比例應該高於墓葬反映的情況，考慮到其中不乏有能力僭越者，則最終留在南郡的故楚人可能以庶民階層中相對貧困者為主，他們無疑是處於金字塔結構底部的。

③ [日]西嶋定生：《中國古代帝國的形成與結構——二十等爵制研究》，495頁。

④ 蔣禮鴻：《商君書錐指》卷一《去強》，34頁。

⑤ 蔣禮鴻：《商君書錐指》卷三《錯法》，63頁。



立了以普遍兵役制為基礎的常備軍制度，<sup>①</sup>凡達到法定年齡的男子均有義務為國家服兵役。加之此期官奴隸也仍然在軍隊的徵召行列，“隸臣斬首為公士，謁歸公士而免故妻隸妾一人者，許之，免以為庶人”，<sup>②</sup>軍功爵制可能惠及的對象非常廣泛。同時，由於軍功爵制按照“利祿官爵搏出於兵”“彼能戰者踐富貴之門”<sup>③</sup>的精神論功行賞，獲取爵位不再以出身門第為轉移，故而平民和官奴隸可憑藉軍功“各以率受上爵”，宗室貴族亦會因為寸功未建而“不得為屬籍”。<sup>④</sup>軍功爵制以其較低的准入門檻和唯軍功論的衡量標準，為秦人爭取更高的社會地位提供了上升管道。

第二，戰爭頻繁的現實決定了實施軍功爵制的可持續性。從商鞅變法到秦始皇翦滅六國，秦國由僻居西方的卑弱之邦成為大一統帝國，其間經歷了漫長且艱巨的兼并戰爭。在秦軍連戰連勝的背後，軍功爵制發揮了鼓舞士氣，促進軍隊戰鬥力提高的巨大作用。根據朱紹侯先生統計，在秦孝公至秦昭襄王五十一年前後 110 年內，秦軍的斬首數累計多達 1617000。<sup>⑤</sup>儘管史書記載的數字或許帶有誇張成分，但秦國“上首功之國”的惡名絕非虛言，這正是軍功爵制在秦國得到有力執行的必然結果。因之戰爭的曠日持久和規模空前，客觀上保障了軍功爵制實施的深度、廣度以及延續性。

總之，以上兩點使軍功爵制得以充分吸納上至宗室貴族、下至平民，乃至於官奴隸的不同階級，並通過平等的原則確定各人所能得到的爵位，進而依據爵位的差別，形成具有一定流動性的新的社會等級秩序。“明尊卑爵秩等級，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以家次。有功者顯榮，無功者雖富無所芬華。”<sup>⑥</sup>以爵級為座標享受相應的政治、經濟、法律權益<sup>⑦</sup>，實乃新秩序的核心特徵。

基於同樣的生成模式，如果以軍功爵為核心的爵制能在秦國本土有效地塑造新秩序，那麼聯繫前述南郡的情狀，在這樣一個舊貴族勢力的真空地帶，就更應該不難確立新秩序了。透過睡虎地秦簡可以看到，戰國後期爵制於包括南郡在內的秦國全境的普遍推行，不僅有專門規定軍功授爵對象、條件和有爵者法律特權的《軍爵律》，以及收錄士卒爭奪“斬首”等案例的《封診式》為證，而且在其他律文裏也留下了許多烙印，如《置吏律》特許官嗇夫不在時

① 參見陳恩林《先秦軍事制度研究》，長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1，163-164 頁；徐勇、黃樸民《論戰國軍事制度的嬗變及其特點》，《軍事歷史研究》1993 年第 2 期。

② 睡虎地秦墓竹簡整理小組：《睡虎地秦墓竹簡》，55 頁。

③ 蔣禮鴻：《商君書錐指》卷四《賞刑》，96、104-105 頁。

④ 《史記》卷六八《商君列傳》，2230 頁。

⑤ 朱紹侯：《軍功爵制研究》，163 頁。

⑥ 《史記》卷六八《商君列傳》，2230 頁。

⑦ 參見朱紹侯《軍功爵制研究》，179-191 頁；杜正勝《編戶齊民：傳統政治社會結構之形成》，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90，358-363 頁。

“無害”的有爵者可代理其任,《傳食律》要求驛傳按照爵級供給飯食,《秦律雜抄》論及對騙取爵位行為的懲罰等。由於睡虎地秦簡的主人喜生前曾擔任南郡安陸御史、安陸令史、鄢令史及鄢的獄吏,這些隨葬的法律文書很可能是其工作時所需使用的,故而也就更能說明爵制在南郡的推行。此外,在《日書》對不同日期生子的吉凶預測中,還出現過“必有爵”的結果。<sup>①</sup>考慮到《日書》的使用者以南郡的中下層人士為主,他們對子女的希望并不高,<sup>②</sup>則可見爵位作為社會地位的象徵既已植入普通民衆的觀念,又成為了一種相對切實的目標。當然,如果沒有深具開放性的秦的爵制為依托,一切恐怕將無從談起。

同“必有爵”近似的還有睡虎地4號秦墓11號木牘中的一個例子,在這封秦國士卒黑夫和驚寫給同母兄弟中的家信裏提到:“書到皆為報,報必言相家爵來未來,告黑夫其未來狀。聞王得苟得……(正面)毋恙也?辭相家爵不也?(背面)”<sup>③</sup>針對此處的“相家爵”,學者們提出了不同見解。一派的觀點是相家爵指軍功爵或榮立軍功的報書,<sup>④</sup>一派則認為相家爵乃人名。<sup>⑤</sup>持前一種看法的學者並未對相家爵給出明確的解釋,而祇是籠統地將之理解為致爵位於家中,且對下文“辭相家爵不也”亦有所失察,前後邏輯難以自洽。反觀後者將相家爵解釋為人名則通達得多,無論“辭”的意義是告訴還是辭別,都可言之成理。因此,相家爵之以“爵”為名,仍然反映的是人們在觀念上對爵位的推崇與渴求。儘管它不適合與軍功爵制直接相關聯,但對於秦的爵制在南郡的有效推行,亦不失為一有益的證明。

如果繼續追問,隨着秦的爵制在南郡的不斷深化,當地是否產生了一批受益者?答案是肯定的。

一方面,由黑夫和驚的家信可知,他們都是南郡安陸一帶人士。<sup>⑥</sup>兼及前揭的喜,同為安陸人的他也曾在秦王政十三年和十五年從軍,<sup>⑦</sup>並且與黑夫和驚一樣參加的是攻城的野戰軍,這表明秦的前綫部隊裏不乏來自南郡的兵源。里耶秦簡有“南里士五(伍)昇斬首一級”,<sup>⑧</sup>係對個人軍功的認定。鑒於里耶秦簡的時代在秦始皇二十五年到秦二世二年之間,則至少到秦始皇二十五年,軍功爵制還在有效地貫徹執行。那麼在此之前入役的南郡士卒,憑

① 以上分見睡虎地秦墓竹簡整理小組《睡虎地秦墓竹簡》,55、153、56、60、88、6-7、191、238頁。

② 參見《日書》研讀班《日書:秦國社會的一面鏡子》,《文博》1986年第5期;蒲慕州《睡虎地秦簡〈日書〉的世界》,《中國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62本第4分冊,1993,635-636頁。

③ 《雲夢睡虎地秦墓》編寫組:《雲夢睡虎地秦墓》,25頁。

④ 參見朱紹侯《軍功爵制研究》,46頁;杜正勝《編戶齊民:傳統政治社會結構之形成》,341-342頁;[韓]尹在碩《睡虎地秦簡〈日書〉所見“室”的結構與戰國末期秦的家族類型》,《中國史研究》1995年第3期。

⑤ 參見湯餘惠《戰國銘文選》,長春:吉林大學出版社,1993,175-176頁;王力鑫《睡虎地木牘家書研究》,中央民族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5,41頁。

⑥ 家信云:“今書節(即)到,母視安陸絲布賤,可以為禪裙襦者,母必為之,令與錢偕來。”《雲夢睡虎地秦墓》編寫組:《雲夢睡虎地秦墓》,25頁。

⑦ 睡虎地秦墓竹簡整理小組:《睡虎地秦墓竹簡》,7頁。

⑧ 陳偉主編:《里耶秦簡牘校釋(第一卷)》,武漢大學出版社,2012,403頁。

藉軍功獲得爵位者應不在少數。

另一方面,睡虎地秦簡《置吏律》有:“嗇夫之送見它官者,不得除其故官佐、吏以之新官。”<sup>①</sup>卜憲群先生據此認為:“不除故官佐吏,自然要在新任之地除吏,其中就包含秦吏要用本地人的含義。”<sup>②</sup>而由《語書》可知,之所以會造成“今法律令已具矣,而吏民莫用,鄉俗淫失(汙)之民不止”<sup>③</sup>這種令南郡守騰大為不滿的情況出現,也應與官吏中包括許多本地人有關。故此,可以確信本地人在南郡的官僚隊伍中占有相當的比重。

加之統一前秦的官職、爵位與軍功之間結合緊密,《商君書·境內》:“能得爵首一者,賞爵一級……乃得人兵官之吏。”<sup>④</sup>《韓非子·定法》:“商君之法曰:‘斬一首者爵一級,欲為官者為五十石之官;斬二首者爵二級,欲為官者為百石之官。’官爵之遷與斬首之功相稱也。”<sup>⑤</sup>裘錫圭先生就此指出:“爵和官是兩個系統,但是有功勞應受獎勵的人往往可以在受爵和為官吏這兩條道路裏任選一條。”<sup>⑥</sup>在軍功爵制推行之初,由於獲軍功者數量甚少,這種在爵位和官職間的選擇的確存在。然而隨着軍功爵制的發展,一方面選擇為官將愈發受到官吏員額、資質等條件的限制,能否繼續維持或存疑問;另一方面,有爵者數量的增長可能使有爵者不一定為官,但為官者必定有爵成為趨勢。睡虎地秦簡《內史雜》“除佐必當壯以上,毋除士五(伍)新傅”<sup>⑦</sup>,無爵者即便想做個佐吏,也會受到身份上的制約。由此反推,南郡官僚隊伍中的本地人應多屬於有爵者。在戰火紛飛的年代,正如《商君書》和《韓非子》所言,憑藉軍功獲取爵位是最普遍且直接的方式,故從這個角度也能得出南郡應當存在一批軍功受益者的結論。

爵制的深入推行和受益者的出現,意味着新秩序在南郡事實上的形成,而受益者本身亦是新秩序的重要組成部分,通過享受爵位帶來的各種利益,這一群體構成了新秩序賴以鞏固的基礎。同時因為受益者中不僅有故秦民,還可能包括故楚人及其後裔,所以新秩序對於增強南郡民衆的認同感也有突出的作用。如睡虎地秦簡《編年紀》於喜的家世和經歷之外,詳細記述了秦昭王元年至秦始皇三十年間秦國的軍政大事,即說明其作者對秦的統治的擁護。出生於故楚核心地區的黑夫和驚,不但參加了對楚國的軍事行動,而且在家信中稱楚軍據守的城池為“反城”,亦可見他們完全以秦人自居。驚的另一封家信提到“新地入盜,哀唯毋方

① 睡虎地秦墓竹簡整理小組:《睡虎地秦墓竹簡》,56頁。

② 卜憲群:《簡帛與秦漢地方行政制度史研究》,《國學學刊》2010年第4期。

③ 睡虎地秦墓竹簡整理小組:《睡虎地秦墓竹簡》,13頁。

④ 蔣禮鴻:《商君書錐指》卷五《境內》,119頁。

⑤ [戰國]韓非撰,[清]王先慎集解,鍾哲點校:《韓非子集解》卷一七《定法》,北京:中華書局,1998,399頁。

⑥ 裘錫圭:《古代文史研究新探》,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2,422頁。

⑦ 睡虎地秦墓竹簡整理小組:《睡虎地秦墓竹簡》,62頁。

行新地”，<sup>①</sup>這裏的“新地”不祇是指新占領地區，還是一個與故秦地相對的概念。驚提醒衷不要去新地，話語裏便暗含其家鄉安陸屬於故秦地之意。張家山漢簡《奏讞書·南郡卒史蓋廬、摯田、段（假）卒史鳴復攸庫等獄簿》中，秦以南郡作為治理“荆新地”的中心，將蒼梧郡攸縣庫案移交南郡調查，<sup>②</sup>可證驚代表的是一種獲得官方認可的普遍看法，即南郡是與滅楚後占領的新地截然不同的比較純粹的秦地，且地位亦凌駕於後者。明乎此，我們就不難理解為什麼秦末楚人首事、天下回應的反秦戰爭並未得到南郡民衆的積極回應。根據琴載元先生的研究，直到秦末甚至楚、漢交鋒時期，秦的法律還在南郡得以延續，<sup>③</sup>這就充分顯示出秦在南郡有着牢固的統治根基。因此即便存在前揭《語書》所反映的秦的法治與南郡本地風俗間的衝突矛盾，也不應否認南郡對秦的統治整體上有較高的認同。綜合前文的論述，這是白起拔郢導致楚國統治階級東遷背景下，秦移徙赦免的罪人到南郡及周邊戰略要地以加強控制，並依靠推行爵制在南郡建立原生性的新秩序，將統治紮根於當地所產生的合力的結果。雖然秦在南郡采取的統治措施不止於此，實際的情形可能更為複雜，但以上內容應是其中的一條主要脈絡。

### 三 結語

本文的研究以楚國政權的東遷為基礎展開，考慮到戰國中後期的列國形勢和楚國受到的秦國的威脅，我們認為楚國對秦國進攻江漢核心地區的意圖有準確的判斷和嚴密的戒備，故其政權的東遷應有一定計劃性和組織性，同時相當數量的楚國平民的隨之逃亡亦是可想見的。楚國政權東遷的重要影響在於，它使楚國或可較好地保存其統治力量，並且顯而易見地減少了此後秦在南郡統治的阻力。

具體來說，秦國對南郡的統治始於移民，早在南郡還未正式設立以前移民工作就已着手進行。為起到綱舉目張的效果，秦國移民多集中在南郡及周邊的戰略要地，彼此之間相互呼應。移民的對象推測以赦免的罪人為主，秦國遷徙赦免的罪人到南郡，既是對不守律令者的放逐，利用他們加強對南郡的控制，也有出於建立新秩序的考量，這是由赦免的罪人的身份特殊性決定的。新秩序將秦國移民和故楚人一并囊括在內，強調依靠推行秦的爵制，形成新的社會等級秩序。秦制下獲取爵位的開放性和公平性，以及兵燹頻仍的現實，為爵制的貫徹

① 《雲夢睡虎地秦墓》編寫組：《雲夢睡虎地秦墓》，25-26 頁。

② 張家山二四七號漢墓竹簡整理小組：《張家山漢墓竹簡〔二四七號墓〕（釋文修訂本）》，北京：文物出版社，2006，103-105 頁。

③ [韓]琴載元：《反秦戰爭時期南郡地區的政治動態與文化特徵——再論“亡秦必楚”形勢的具體層面》，西北師範大學文學院歷史系、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編《簡牘學研究》第 5 輯，蘭州：甘肅人民出版社，2014，134 頁。

落實提供了保證,由此產生的受益者群體構成了新秩序的中堅力量。新秩序在南郡的生根發芽使秦國有了夯實地方統治的資本,它對提升當地民衆的認同感也有一定促進作用。總之,以上勾勒的綫索有助於解釋秦國為什麼能在南郡維持較為穩固的統治。

由於南郡曾經是楚國統治中心的所在地,故而還應看到秦在南郡建立有效統治的示範性意義。前揭秦將蒼梧郡發生的案件移交南郡調查,即體現了南郡地位的不同凡響。以此為基本認識,則秦國很可能會把在南郡獲得的經驗推廣到後續占領的楚地。祇不過南郡的經驗已被後來的歷史證明具有局限性。衆所周知,秦末反秦戰爭就是在秦滅楚後占領的東南地區爆發、繼而形成燎原之勢的。究其原因,除了秦在南郡的統治時間長達七十年,遠超過大部分故楚地外,前述楚國政權東遷在南郡所造成的“真空效應”,亦值得高度重視。當然,統一後戰爭頻度的陡然下降,導致憑藉軍功爵制塑造新秩序的方式很難再大行其道,也可佐證秦在南郡的成功有其特定的背景和歷史條件。

進而言之,秦對江漢地區的占領不代表徹底消滅了楚國統治力量的核心,經過有計劃的東遷,這些力量依然植根於楚國土地。儘管其後作為國家個體的楚國滅亡了,但對秦而言,要想在郡縣制統治中泯滅楚國舊貴族的影響仍是殊為不易的。即便秦始皇采取大規模遷豪的措施,<sup>①</sup>也無法消弭其盤根錯節的勢力。漢初遷豪時楚國大族昭、屈、景氏赫然在列,<sup>②</sup>足見其生命力的頑強。而諸如項梁這樣的楚國名將之後,在看似密不透風的秦統治下却可以殺人後逍遙法外,甚至暗中有所圖謀——“陰以兵法部勒賓客及子弟”,<sup>③</sup>同樣很能說明問題。“楚雖三戶,亡秦必楚”這句讖言的現實依據,或許正來源於此。

附記:感謝匿名審稿專家提出的寶貴意見,在此謹致謝忱!

① 《史記》卷六《秦始皇本紀》載,始皇二十六年“徙天下豪富於咸陽十二萬戶”(239頁)。

② 《漢書》卷一下《高帝紀下》載,高祖九年“十一月,徙齊楚大族昭氏、屈氏、景氏、懷氏、田氏五姓關中,與利田宅”(北京:中華書局,1962,66頁)。

③ 《史記》卷七《項羽本紀》,296頁。



## 論馬王堆帛書《春秋事語》 的創作意圖、主旨及思想<sup>\*</sup>

廈門大學歷史系 孫飛燕

**內容提要** 《春秋事語》的創作目的是為統治者提供鑒戒，教他們如何在政治鬥爭中保全自身或在國家間的鬥爭中保全本國。從主旨上看，各章都反映了議論者非凡的洞察力，這與《說苑·權謀》性質相同，強調的是能察微知著、防患於未然的能力。從思想上說，有些篇章的評論受到儒家思想的影響，有些則帶有法家色彩，因此不是《說苑》那樣的儒家著作。作者沒有固守某一學派的主張，帛書所論屬於實用性的學術。《春秋事語》的創作目的、主旨及思想與《左傳》有本質的不同，不屬於《左傳》的傳流系統。

**關鍵詞** 《春秋事語》 創作意圖 主旨 思想

### 一 問題的提出

馬王堆帛書《春秋事語》是 1973 年馬王堆三號漢墓出土的一種帛書，這篇帛書原無標題，題目為整理者所加。《春秋事語》共十六章，每一章記有史事和議論，史事都發生在春秋時期。但各章不是按照時間順序排列，也不是按照國別分類。張政烺先生已經指出，帛書詳

<sup>\*</sup> 本文的寫作受到中央高校基本科研業務費專項資金資助(Supported by the Fundamental Research Funds for the Central universities)，項目編號：20720171032。



於議論而略於記事,其重點不在於講事實而在於記言論。<sup>①</sup>

關於這篇帛書的抄寫年代,《馬王堆漢墓帛書(叁)》的《出版說明》中說:“書法由篆變隸,不避邦字諱,當是漢初(公元前200年左右)或更早一些時候抄寫的。”<sup>②</sup>李學勤先生指出,古代最需要嚴格諱避的是“今上”之名,不避“邦”字諱說明應早於漢高祖的統一。他認為作為楚漢交爭時期的寫本,是最合理的。<sup>③</sup>裘錫圭先生認為李學勤先生的推測比較合理,他也認為:“此帛書字體為早期古隸,含有較多篆意,抄寫年代當不晚於漢初。從不避漢高祖諱的情況來看(書中‘邦’字屢見),大概抄寫於高祖稱帝之前(漢高祖五年——公元前202年——滅項羽而稱帝)。”<sup>④</sup>我贊成李學勤、裘錫圭等學者的看法。既然帛書抄寫於楚漢交爭時期,那麼它的成書時間更早。張政烺先生認為帛書的創作年代是戰國時期,<sup>⑤</sup>這是很有可能的。無論如何,帛書成書不可能晚至漢代,不可能是漢代初年的學者的著作。

《春秋事語》自出土以來,其性質就受到學者的廣泛關注。有些學者認為它與《左傳》的傳流有關係,如裘錫圭先生認為是《鐸氏微》一類的書,他指出:“據《經典釋文·序錄》,鐸椒是左丘明四傳弟子。這部帛書雖然記有《左傳》所沒有的事,并且所引用的議論也往往與《左傳》不同,但是所記的有關歷史事實則大部與《左傳》相合。”<sup>⑥</sup>張政烺先生也認為《春秋事語》的性質和《鐸氏微》一致,祇是編者文化水平的高低不同。<sup>⑦</sup>李學勤先生認為是早期《左傳》學的正宗作品,可能為荀子一系的學者所作。<sup>⑧</sup>吳榮曾先生認為《春秋事語》屬閔子騫的《春秋》學,和《左傳》相近。<sup>⑨</sup>有些學者意見相反,如唐蘭先生認為不是《左傳》系統而為另一本古書,他懷疑是《漢書·藝文志》的《公孫固》。<sup>⑩</sup>羅新慧先生認為《春秋事語》與《左傳》雖然記載的史實基本相同,但其旨趣明顯存在差異,二者的價值觀念也有明顯的區別。<sup>⑪</sup>劉偉先生認為《春秋事語》與《左傳》是兩種不同系統的史書,它與《國語》在編撰主旨和撰構手法上相似,可能是古本《國語》的一種選本。<sup>⑫</sup>趙爭先生則認為《春秋事語》很可能既非簡化《左傳》而成的《左傳》系統古書,也非《左傳》成書所參考的底本,而應是一種頗受《左傳》影響的

① 張政烺:《〈春秋事語〉解題》,《文物》1977年第1期。

② 馬王堆漢墓帛書整理小組編:《馬王堆漢墓帛書(叁)》,北京:文物出版社,1983,1頁。

③ 李學勤:《〈春秋事語〉與〈左傳〉的傳流》,《簡帛佚籍與學術史》,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2001,267頁。

④ 裘錫圭:《帛書〈春秋事語〉校讀》,《裘錫圭學術文集(簡牘帛書卷)》,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2,401頁。

⑤ 張政烺:《〈春秋事語〉解題》,《文物》1977年第1期。

⑥ 《座談長沙馬王堆漢墓帛書》,《文物》1974年第9期。

⑦ 張政烺:《〈春秋事語〉解題》,《文物》1977年第1期。

⑧ 李學勤:《〈春秋事語〉與〈左傳〉的傳流》,《簡帛佚籍與學術史》,275頁。

⑨ 吳榮曾:《讀帛書本〈春秋事語〉》,《文物》1998年第2期。

⑩ 《座談長沙馬王堆漢墓帛書》,《文物》1974年第9期。

⑪ 羅新慧:《馬王堆漢墓帛書〈春秋事語〉與〈左傳〉——兼論戰國時期的史學觀念》,《史學史研究》2009年第4期。

⑫ 劉偉:《馬王堆帛書〈春秋事語〉性質論略》,《古代文明》2010年第2期。

“語”類古佚書。雖然其形式特徵與《國語》接近,但帛書《春秋事語》是《國語》選本的有關推測尚缺乏充分依據。<sup>①</sup>

可以看出,學者在該篇文獻的性質這個問題上有很大的分歧。出土文獻性質的判定是出土文獻研究中十分重要的工作,祇有對文獻性質有正確的把握,纔能確定其在學術史中的位置,纔能真正利用這篇文獻。《春秋事語》的性質直接關係到《左傳》的傳流系統,十分重要。但是本文的寫作不從此處入手,而是試圖通過對各章內容的分析,探討其創作意圖、主旨、思想等問題,將其與《左傳》的關係問題留到最後討論。這主要是基於兩點考慮:首先,我們應該將《春秋事語》看作一篇獨立的文獻,是否屬於《左傳》的傳流系統,這祇是其性質的一個方面,這篇文獻反映的創作意圖、主旨及思想也應該受到關注,因為這些內容是該篇文獻在思想史、學術史上的價值所在。其次,根據帛書的文本內涵研究創作意圖、主旨及思想,纔能真正找出其與《左傳》的不同,推動其與《左傳》傳流的關係這一研究工作。本文所論並不成熟,不當之處,敬請方家批評指正。

## 二 《春秋事語》的創作意圖

關於帛書的創作意圖,張政烺先生認為是對貴族子弟進行啓蒙教育:

它的編者大約是個頭腦冬烘的教書先生。這樣的書當是兒童讀本,講些歷史故事,學點語言,為將來進一步學習《春秋》《世》《語》等等作準備。這和清代封建地主階級的啓蒙書《鑑略》《讀史論略》《幼學故事瓊林》等書有些相似。<sup>②</sup>

我對此持不同的意見。我認為設定的閱讀對象並非一般的貴族子弟,而應該是當政的君主和大臣。其目的是為統治者提供鑒戒,告訴統治者如何保全自身和本國。以下試從帛書各章所敘事件發展的最終結果以及各章對相關人物和事件的評論兩個角度進行分析,據此可以對帛書的創作意圖有深入的認識。

首先,從各章記載的史事結果來分析。除了第1章殺里克章殘缺過甚,無法討論外,其餘十五章可以分為四類:一、國君被殺;二、大臣被殺;三、國家(或卿大夫)戰敗或者被滅亡;四、正確處理國家間的關係。第一類包括:第11章魯桓公少章,事情的結果是魯隱公被殺;第12章長萬章,結果是宋君被長萬殺害;第14章吳伐越章,結果是吳子被殺;第15章魯莊公有疾章,結果是魯閔公被殺。第二類包括:第4章魯文公卒章,結果是叔仲惠伯被殺;第5章晉獻公欲得隨會章,結果是驍朝被殺;第6章伯有章,結果是伯有被殺;第9章衛獻公出亡

① 趙爭:《馬王堆帛書〈春秋事語〉性質再議》,《古代文明》2011年第1期。

② 張政烺:《〈春秋事語〉解題》,《文物》1977年第1期。

章,結果是寧召子被殺;第16章魯桓公與文姜會齊侯於樂章,結果是彭生被殺。第三類包括:第2章燕大夫章,結果是燕國戰敗;第3章韓魏章,結果是智氏被滅;第7章齊桓公與蔡夫人乘舟章,結果是蔡被滅;第8章晉獻公欲襲虢章,結果是虞被滅;第13章宋荊戰泓水之上章,結果是宋襄公戰敗。第四類包括:第10章吳人會諸侯章,內容是子貢勸說吳人釋放衛君,吳人聽從了子貢的建議。

從上文對各章內容的分析來看,除了第10章,涉及的都是國君或大臣身死、國家(或卿大夫)戰敗甚至被滅亡的事情,都關涉生死存亡。<sup>①</sup>總結亡國的經驗和教訓,先秦文獻中最有代表性的是《逸周書·史記》和《韓非子·亡徵》。《逸周書·史記》是說周王在成周,昧爽之時召見三公和左史戎夫,說晚上的時候歷史上的往事讓自己驚醒,要求戎夫“取遂事之要戒”“朔望以聞”,也就是命令史官將過去朝代滅亡的教訓總結出來讀給自己聽,以作警示。該篇記載了皮氏、華氏、夏后氏、殷商、有虞氏等多個政權滅亡的原因。如:

信不行,義不立,則哲士凌君,政禁而生亂,皮氏以亡。諂諛日近,方正日遠,則邪人專國,政禁而生亂,華氏以亡。好貨財珍怪,則邪人進。邪人進,則賢良日蔽而遠。賞罰無位,隨財而行,夏后氏以亡。嚴兵而不仁者,其臣懾。其臣懾而不敢忠,不敢忠則民不親其吏。刑始於親,遠者寒心,殷商以亡。樂專於君者,權專於臣。權專於臣,則刑專於民。君娛於樂,臣爭於權,民盡於刑,有虞氏以亡。

《韓非子·亡徵》列舉了四十七條國家滅亡的徵兆。如:

凡人主之國小而家大,權輕而臣重者,可亡也。簡法禁而務謀慮,荒封內而恃交援者,可亡也。群臣爲學,門子好辯,商賈外積,小民內困者,可亡也。好宮室臺榭陂池,事車服器玩好,罷露百姓,煎靡貨財者,可亡也。用時日,事鬼神,信卜筮而好祭祀者,可亡也。聽以爵不以衆言參驗,用一人爲門戶者,可亡也。官職可以重求,爵祿可以貨得者,可亡也。

這些篇章中的教訓是給統治者閱讀的,目的是吸取前車之鑒,避免重復同樣的錯誤和悲劇。帛書也是如此,有明確的政治指向,目的是爲統治者提供鑒戒。

其次,從各章所記的評論來分析。一方面,保全自身的重要性在評論中屢次被強調。例如第4章魯文公卒章:

魯文公卒,叔仲惠伯□□□佐之。東門襄仲殺嫡而佯以[君]命召惠[伯],

<sup>①</sup> 日本學者近藤則之先生已經指出,帛書選取的十六則故事的結局幾乎都是悲劇性的。參看[日]近藤則之《戰國より漢初に至る春秋說話傳承の一側面——讀馬王堆漢墓帛書〈春秋事語〉》,《中國哲學論集(九州島大學)》第10輯,1984。但他認爲《春秋事語》是用歷史上的悲劇性事件對貴族進行啓蒙教育的教材,我並不贊同。

□□□□，其宰公襄目人曰：“入必死。”[惠伯]曰：“入死，死者君命也。”其宰[公]襄負人曰：“□□□□□□□劫於禍而□□□□能無患，其次……也……何聽。”……□□之□□□也，非君命也，有子之所以去也。初□□□□□以召人，今禍滿矣，不與君者，顧真君命以召子，其事惡矣，而……无□初失備以□君，今其謀……入，東門襄[仲]殺而埋□□□□中。<sup>①</sup>

該章講的是魯文公去世後，叔仲惠伯立了文公的嫡子并輔佐他。襄仲殺了文公的嫡子，又假稱國君的命令召見惠伯，惠伯想去，他的家宰公襄目人說進去的話一定會死。惠伯認為可以因君命而死。公襄目人則認為襄仲假托君命，他說“□□□□□□□劫於禍而□□□□能無患，其次……”，顯然是認為能在禍亂中保全自身的人纔是最明智的人。

再如第 16 章魯桓公與文姜會齊侯於樂章：

魯桓公與文姜會齊侯於樂。文姜通於齊侯，桓公以訾文姜，文姜以告齊侯。齊侯使公子彭生載公，薨於車。醫寧曰：“吾聞之，賢者死忠以辱尤而百姓愚焉。智者瘖理長[慮]而身得庇焉。今彭生近君，□無盡言，容行阿君，使吾失親戚之，又力成吾君之過，以□二邦之惡，彭生其不免[乎]，禍理屬焉。君以怒遂禍，不畏惡也。親間容昏，生無惡也。豈[及]彭生而能貞之乎？魯若有誅，彭生必為說。”魯人請曰：“寡君來勤[舊]好，禮成而不返，惡諸侯，無所歸怨。”齊侯果殺彭生以說魯。

該章講的是魯桓公和文姜在濼地會見齊侯。文姜和齊侯私通，桓公厭惡文姜，文姜告訴了齊侯。齊侯派公子彭生幫助桓公乘車，桓公死在車中。醫寧預言“彭生其不免乎”，後來魯人追究此事，齊侯果真殺了彭生向魯國解釋。醫寧說“智者瘖理長[慮]而身得庇焉”，也是在說智者纔能深謀遠慮，保護自身免於禍亂。另一方面，從各章的評論中可以看出評論人對形勢有深刻的把握，能够預測處境的危險，但是大部分的當事人看不清形勢，或者不聽勸告，最終結局很不好。例如上引第 4 章章末文字殘缺，根據《左傳》文公十八年的記載，可知其結果是“弗聽，乃入，殺而埋之馬矢之中”。惠伯沒有聽從公襄目人的勸告，最終被襄仲殺死而埋在馬糞之中。再如上引第 16 章彭生果然像醫寧預測的那樣被齊侯殺死。這說明評論的目的是告誡統治者如何避免這些下場，從反面強調把握形勢的重要性。

綜上所述，編者的意圖是告訴統治者如何能認清形勢，在複雜的政治鬥爭中保全自身或在國家間的鬥爭中保全本國。

<sup>①</sup> 本文所引帛書各章釋文，采用的是裘錫圭先生的釋文，參見裘錫圭《帛書〈春秋事語〉校讀》，《裘錫圭學術文集（簡牘帛書卷）》，401-436 頁。下文所引不再加注。釋文中有幾處按照我的看法略作了改動。

### 三 《春秋事語》的主旨

前文說過,《春秋事語》的十六章既沒有按照時間順序排列,也沒有按照國別分類。但我認為,該篇文獻並非雜亂無章,應該有一個統一的主旨。而各章被編纂在一起,也正是為這個主旨服務。那麼這個主題是什麼呢?下文試做探討。

帛書各章的重點在於議論,這是把握帛書主旨的關鍵。首先需要討論的問題是,議論者是當時的人還是後世的人?張政烺先生認為第6、11、12、15章的議論者是後世之人。<sup>①</sup>李學勤先生認為第5章的議論者也是後世之人,文例作“某某聞之曰”。<sup>②</sup>在這幾章中,第5、12章由於殘缺已無法得知評論者的名字,第6、11、15章的評論者是閔子辛。張政烺先生認為:

這三條記載,先敘事,接着是“閔子辛聞之曰”,最後簡單敘述事情的結果。看上去好像是同時人在發議論,並補記出其言之是否應驗,事實上並非如此,而是閔子辛在作史論。這樣的議論有什麼用呢?那就是告訴學生如何分辨是非,遇到事情可以發議論。這種情況類似《資治通鑒》裏的“臣光曰”、《綱鑑易知錄》上的眉批。<sup>③</sup>

我的看法是,第5、6、11、15章都是當時人的預測。首先,第5章晉獻公欲得隨會章某人“聞之曰”,說了一段話,隨後說“隨會果使諜讒之曰……”;第11章“閔子辛聞之曰”,說了一段話,隨後說“公子翬果以其言詐之”。“果”字說明評論者的話是預言,這說明議論者不是後世之人,而是當時之人。其次,一般來說,後世之人的評論往往放在一篇文章的末尾,而不是插在中間。所以,按照我的理解,祇有第12章長萬章是在長萬殺宋公以後某人的事後評論,不是預言,其他都是當時人的預測,並記載了結果。這樣的話,除了第1章無法討論外,其他15章的結構可以分為兩類:第12章的結構是背景+結果+議論,其餘各章的結構都是背景+預測+結果。在第二類中,絕大部分的結果都證明預測的準確,祇有第10章吳人會諸侯章中子貢預測如果吳人拘禁衛君的話,吳難以稱霸。結果是吳人在子貢的勸說下釋放了衛君,所以子貢的預測就沒有驗證的可能了。因此,無論是從數量上,還是從事件的結果上,都可以看出帛書對預測的強調和重視。之所以強調預測,是因為與事後評論相比,預測更能反映出預測者非凡的洞察力、準確的判斷力。例如第8章晉獻公欲襲虢章:

晉獻[公]欲襲虢,□叔[曰]:“君胡[不以]屈產之乘與垂革璧假道於虞?”公曰:“是吾寶[也],且宮之柯奇在焉,何益。”對曰:“……宮之柯……且少長於君前,其勢又卑。夫位下而心懦□□□□也。不敢盡而……□其達不見薦言是不見亡之在一邦之後

① 張政烺:《〈春秋事語〉解題》,《文物》1977年第1期。

② 李學勤:《〈春秋事語〉與〈左傳〉的傳流》,《簡帛佚籍與學術史》,271頁。

③ 張政烺:《〈春秋事語〉解題》,《文物》1977年第1期。



而眷在耳目之前，夫……果以假道焉。宮之柯□曰：“不可。夫晉之使者幣厚而辭卑，……□□□□有□□□□。”[弗]聽，遂受其□而假之道。獻公之師襲虢還，遂□[虞]。

這一章講的是晉獻公想偷襲虢國，荀叔建議他以屈產之乘與垂革之璧向虞國假道。晉獻公捨不得自己的良馬和玉璧，而且認為宮之奇肯定會向虞國國君進諫，讓國君不要同意借路。荀叔對宮之奇和虞君的情況做了分析判斷，認為虞君不會聽宮之奇的話。事情果然如荀叔所預測。晉國假道，宮之奇進諫，但虞君不聽，接受了寶物而借道給晉國。晉國的軍隊偷襲虢國後回國，於是滅掉了虞國。這章的核心是荀叔的分析，其言語與《穀梁傳》中荀息的話非常近似：

荀息曰：“宮之奇之爲人也，達心而懦，又少長於君。達心則其言略，懦則不能強諫，少長於君則君輕之。且夫玩好在耳目之前，而患在一國之後，此中知以上乃能慮之。臣料虞君中知以下也。”

荀叔認為，宮之奇性格懦弱，而且從小和國君一起長大。性格懦弱就不會極力進諫，和國君一起長大就會受到國君的輕視，勢位比較卑下。另一方面，虞國的國君眼光短淺，智力在中等以下，祇會喜歡眼前的寶物，考慮不到國家的禍患在虢國之後。所以國君一定不會聽宮之奇的勸諫。荀叔這種超群的判斷力和預測力讓讀者印象深刻，而這也正是帛書要強調和突出的內容。

再如第9章衛獻公出亡章：

衛獻公出亡，公子伋□□[寧]召子在位。獻公使公子段謂寧召子，曰：“苟入我□政必[寧]氏之門出，祭則我也。”右□□曰：“不可。夫子失德以亡□亡而不改，其德惡矣。惡德者難以責。吾子試□□，且□□以義也。聞賂而起之，雖入不爲德。是權近斂以幾遠福，福有不必，難而不義，□爲勉者，復將惡之。且□所鄉□□□將□□□其心逆矣。知者弗親，仁者弗貞，負賂以塞後憂□之……功大矣而不賞，卒必畏之。亡者欲傳美，將以疑君；居者疾其功，必傷以傳君。□入而勒正，能反邦者弗與治，是以勞著惡也，必有後患。”寧召子弗聽，遂伐□□□君伋，而入……餘伐[寧]召子而尸之朝。公曰：太叔儀□□□□□不貳，以爲[卿]。

這一章講的是衛獻公出亡，想讓寧召子幫助自己回國，並說“政必寧氏之門出，祭則我也”。右宰穀勸諫寧召子不要答應，並且分析情況，認為一是衛獻公因為喪失道德導致出亡，而且毫無悔改之意，因此“其德惡矣”，惡德的人很難說話算話，即使回國也不會做有道德的事情。二是智者和仁者都不會對衛獻公親近。三是跟隨衛獻公逃亡的人和原本在國內的人都會對寧召子不滿。綜合這些情況，右宰穀認為寧召子如果幫助衛獻公回國的話“是以勞著惡也，



必有後患”。但寧召子不聽，納衛獻公，最終被殺。很顯然，該章強調的是右宰穀的智慧。

其他各章也是如此。例如第4章叔仲惠伯的家臣公襄目人分析當時的形勢，認為東門襄仲以君命召惠伯是假托君命；第5章某人預測秦大夫曉朝處境危險；第15章閔子辛預言魯閔公有難，等等，每一章都體現了議論者的深謀遠慮。

上文我討論了議論為預測的各章，而第12章的議論雖然屬事後評論，但也反映了評論者的深刻認識。因此，強調謀劃，是這十六章的共同特點。帛書這樣的特點與《新序·善謀》《說苑·權謀》性質相同。

《新序》和《說苑》都是劉向校書的成果，採用的是以類相從的編纂方式。《善謀》是《新序》中的一篇，從篇名就可以看出其中的故事都是關於善於謀劃一類的。《權謀》是《說苑》的一篇，劉向所說的權謀不是我們通常理解的權詐陰謀、暗中算計，而是指能察微知著、防患於未然的能力。《新序·善謀》《說苑·權謀》性質相同，由於《說苑》成書在後，從分類上和體例上都比《新序》更加完備，所以下文我就以《說苑·權謀》進行考察，與帛書對比。劉向在《說苑·權謀》的篇首說：

聖王之舉事，必先諦之於謀慮，而後考之於蓍龜。白屋之士，皆關其謀；芻蕘之役，咸盡其心。故萬舉而無遺籌失策。傳曰：“衆人之智，可以測天。兼聽獨斷，惟在一人。”此大謀之術也。謀有二端：上謀知命，其次知事。知命者預見存亡禍福之原，早知盛衰廢興之始，防事之未萌，避難於無形。若此人者，居亂世則不害於其身，在乎太平之世則必得天下之權。彼知事者亦尚矣，見事而知得失成敗之分，而究其所終極，故無敗業廢功。孔子曰：“可與適道，未可與權也。”夫非知命知事者，孰能行權謀之術？

根據劉向的說法，權謀分為兩種，上謀知命，其次知事。知命者能夠預見存亡禍福之原，提前知道盛衰廢興的始端，在事情尚未萌發之前就能夠預防，在災難無形的時候就能夠躲避。像這樣的人，在亂世不會傷害自身，在太平之世必定能得到天下的權柄。知事者也很超群了，碰到事情能夠知道得失成敗的區別，而推究其所終極，所以沒有失敗廢棄的功業。祇有知命知事的人纔能得權謀之術。《權謀》篇列舉了近五十個例子，說明的都是這個道理。比如：

蔡侯、宋公、鄭伯朝於晉。蔡侯謂叔向曰：“子亦奚以語我？”對曰：“蔡言地計衆，不若宋、鄭。其車馬衣裘，侈於二國。諸侯其有圖蔡者乎？”處期年，荆伐蔡而殘之。

蔡侯、宋公、鄭伯到晉國朝拜。蔡侯問叔向有沒有什麼話要告訴自己的。叔向預測會有諸侯圖謀蔡國，其根據是蔡國的土地和人口都不如宋、鄭，但車馬衣裘比宋、鄭奢侈。過了一年，楚國果然攻打蔡國。

韓昭侯造作高門。屈宜咎曰：“昭侯不出此門。”曰：“何也？”曰：“不時。吾所謂不

時者，非時日也。人固有利不利，昭侯當利矣，不作高門。往年秦拔宜陽，明年大旱民饑，不以此時恤民之急也，而顧反益奢，此所謂福不重至、禍必重來者也。”高門成，昭侯卒，竟不出此門。

韓昭侯建造了高門。屈宜咎預測韓昭侯不能走出此門。因為國家有內憂外患，他不體恤百姓的急困，反而更加奢侈。事情的結果是，高門建成，韓昭侯去世，終於沒有出此門。

田子顏自大術至乎平陵城下，見人子問其父，見人父問其子。田子方曰：“其以平陵反乎？吾聞行於內然後施於外。子顏欲使其衆甚矣。”後果以平陵叛。

田子顏從大術到平陵城下，見到人子問候他們的父親，見到人父問候他們的兒子。田子方預測田子顏會依據平陵反叛。因為他聽說，內心先有想法，然後會在外表表現出來，而田子顏想役使他的民衆表現得已經很明顯了。後來田子顏果然憑藉平陵反叛。

從這幾個例子來看，其結構都是簡單敘述事件的背景，然後記載當時人的預測，最後記載事件的結果，而這些結果都驗證了時人的預測。總之，帛書是強調智慧的謀劃一類的典籍，在這一點上它與《權謀》是完全相合的。

#### 四 《春秋事語》反映的思想

《說苑》在《漢書·藝文志》中被列入子部的儒家類。無論是從劉向在各篇中發揮的議論來看，還是從劉向編纂《說苑》選取的故事來看，都是以儒家思想為指導，至少也不違背儒家思想。因此，《說苑》屬於儒家著作是沒有太多的爭議的。就本文討論的《權謀》篇來說，劉向在該篇的首段專門提出權謀有正有邪，主張君子之權謀，正是儒家思想的體現：

夫權謀有正有邪，君子之權謀正，小人之權謀邪。夫正者，其權謀公，故其為百姓盡心也誠；彼邪者，好私尚利，故其為百姓也許。夫詐則亂，誠則平。是故堯之九臣誠而能興於朝，其四臣詐而誅於野。誠者隆至後世，詐者當身而滅。知命知事而能於權謀者，必察誠詐之原而以處身焉，則是亦權謀之術也。夫知者舉事也，滿則慮謙，平則慮險，安則慮危，曲則慮直。由重其豫，惟恐不及，是以百舉而不陷也。

他強調權謀要“公”，要為百姓盡心，這與法家有本質的區別。法家維護君主專制，因此主張國君一人專斷，用陰謀之術駕馭臣下。

那麼《春秋事語》是否也是儒家著作呢？仔細分析帛書並將它與《權謀》對比，可以發現《事語》的思想很複雜。綜觀帛書各章的評論，所反映的思想可以分為三類：有些篇章是歷史

教訓的總結,看不出明確的諸子思想;有些篇章明顯受到儒家思想的影響;有些則帶有濃厚的法家色彩。<sup>①</sup>

第一類總結歷史教訓的以第11章魯桓公少章為例:

魯桓公少,隱公立以奉孤,公子翬謂隱公曰:“胡不代之?”隱公弗聽,亦弗罪。閔子辛聞之,曰:“□□隱公。夫奉孤以君令者,百圖之召也。長將畏其威,次職其□。其□有……夫奉孤者□素以暴忠□伐以□□□懼□□□□有奸心而□□□□正也害君耳聞□□心不怒□志也。事□□□疾□□旌而素不匡,非備也。□□□之,其能久作人命,卒必詐之。”桓公長,公[子翬]果以其言詐之。公使人攻隱公□□圃。

這一章講的是魯桓公年少,隱公攝政輔佐他。公子翬建議隱公取而代之,隱公沒有聽從,但也沒有治公子翬的罪。閔子辛聽說之後預測隱公有危險,其結果確實如此,桓公長大後公子翬果然在桓公面前誣陷隱公,桓公聽信公子翬的詐言,派人殺了隱公。這段話的關鍵在於閔子辛認為隱公危險的理由,由於殘缺不少,所以不是很好理解。我發現,“夫奉孤以君令者,百圖之召也。長將畏其威,次職其□”與《逸周書·史記》平林滅亡的原因是一致的:“奉孤以專命者,謀主必畏其威而疑其前事,挾德而責數日疏,位均而爭,平林以亡。”這是說奉孤攝政的人專擅命令,等被輔佐的人長大後,會畏懼攝政者的威嚴而對他過去的事情有疑心。這種說法是對歷史上政權或者國君滅亡的原因的總結,不能認為是諸子中某個學派的專屬思想。

第二類反映儒家思想的以第6章和第16章為例。第6章伯有章:

□□伯有……是殺我也。遂弗聽。伯有亦弗芒,自歸其□。伯有閉室,懸鐘而長飲酒。閔子[辛聞之]曰:“[伯]有必及矣。吾聞之,□□事君無罪,禮下無怨,議賢讓能,同位之人弗與□,□德守也。其次明備以候敵。□□□有怨而使公子往,是以同位之人解邦惡也。□殯□□□□也。令有不行而□□咎君……懸鐘而長飲酒,是怒其心而藉之間,非□也。三者皆失而弗知畏,……[伯]有,而使[子]產相。

這一章前幾句殘缺過甚,結合《左傳》的記載,可知講的是鄭國的伯有想派公孫黑到楚國,公孫黑因為鄭楚關係不好不願意去,伯有想強迫他去。伯有回家以後懸鐘而長飲酒。閔子辛聽說了之後預測伯有危及自身,事情果然如閔子辛所預測。閔子辛認為大臣的最高境界(太上)是“事君無罪,禮下無怨,議賢讓能,同位之人弗與□,□德守也”,其中“議賢讓能”“□德守也”都是儒家思想的表現。

<sup>①</sup> 羅新慧先生曾通過分析第6、11、12、15章的評論,認為《春秋事語》體現的價值觀念與儒家思想相去甚遠,而是受到法家思想的影響。參看羅新慧《馬王堆漢墓帛書〈春秋事語〉與〈左傳〉——兼論戰國時期的史學觀念》,《史學史研究》2009年第4期。我與她的看法有所不同。

再如第 16 章魯桓公與文姜會齊侯於樂章，該章釋文已見於本文第二部分。醫寧說“吾聞之，賢者死忠以辱尤而百姓愚焉”，講的是賢者應該做的事情，“賢者死忠”明顯是儒家思想的表現。而彭生的做法與此相反，“彭生近君，□無盡言，容行阿君，使吾失親戚之，又力成吾君之過，以□二邦之惡”，因此難免被殺。

第三類有法家色彩的以第 12 章和 14 章為例。第 12 章長萬章：

長萬，宋之第士也。君使爲□。及魯宋戰，長[萬]□止焉。君使人請之，來而戲之，[曰：“始]吾敬子，今子魯之囚也，吾不敬子矣。”長萬病之。因田□□□□□□□曰：“□□□□□夫君者臣之所爲容也。朝夕自辱，日以有幾也。是故君人者，刑之所不及，弗措於心；[伐之]所未加，弗見於色；故刑伐已加而亂心不生。今罪而弗誅，耻而近之，是絕其幾而陷之惡□□□何□丘之聞之也，□□□□□於君，君鮮不害矣。”

該章講的是宋國的長萬在與魯的一次戰爭中被俘獲，宋君派人向魯國請求釋放長萬。長萬回國後宋君嘲弄他，說：“過去我尊敬你，現在你是魯國的囚犯，我不尊敬你了。”長萬認爲這是耻辱，借宋公田獵之時殺了宋公。某人對此事作了一番評論。其中“君人者，刑之所不及，弗措於心；伐之所未加，弗見於色；故刑伐已加而亂心不生”，這是說統治者對大臣沒有實施刑罰之前不要表現出來，這樣刑罰實行之後大臣纔不會有作亂之心。“今罪而弗誅，耻而近之，是絕其幾而陷之深……君鮮不害矣”，是說大臣有罪却不誅殺，看不起大臣却接近他，這是給大臣作亂提供了機會，國君很少沒有災害。反過來說，國君要想無害，就應對有罪的大臣立刻誅殺，遠離自己看不起的大臣。

《韓非子·亡徵》列舉可能亡國的徵兆，其中有一條是“藏怒而弗發，懸罪而弗誅，使群臣陰憎而愈憂懼，而久未可知者，可亡也”。意思是說心中藏怒但是没有發作出來，大臣有罪但是没有誅殺，這樣會使群臣暗中憎恨而且越發擔憂畏懼，長久不知道自己的結果如何，這樣的情況可能會亡國。帛書與《亡徵》表達的含義一致，說的都是國君應該如何駕馭臣下。<sup>①</sup>

再如第 14 章吳伐越章：

吳伐越，復其民，以歸，弗復□□刑之，使守布舟。紀譴曰：“刑不慎，使守布舟，留其禍也。刑人耻刑而哀不辜，□怨以伺間，千萬必有幸矣。”吳子餘蔡觀舟，闖人殺之。

這一章是說吳伐越，得到一個俘虜，對他施加刑罰後讓他看守舟船。紀譴預言這樣會留下禍患，果然這個受刑的人（闖人）在吳子餘蔡觀舟的時候殺死了他。“刑人耻刑而哀不辜，□怨以伺間，千萬必有幸矣”是說受刑的人因爲自己受刑而感到耻辱，哀憐自己無罪，會心懷怨恨

<sup>①</sup> 《亡徵》此條可以與《事語》對讀，日本學者吉本道雅先生已經指出。參看[日]吉本道雅《春秋事語考》，《泉屋博古館紀要》第 6 卷，1990。但我對他所說的其他三處對讀持不同意見，下文會直接談我的看法。

而尋找機會報仇。這與《韓非子·亡徵》“挫辱大臣而狎其身，刑戮小民而逆其使，懷怒思耻而專習，則賊生，賊生者，可亡也”反映的思想一致。《亡徵》這段話是說侮辱大臣却又親近他們，刑戮小民却又任用他們，大臣和小民就會心懷憤怒、感到耻辱，這樣就會產生禍害，國君就可能被滅亡。帛書和《亡徵》講的都是國君應該如何對待臣下和小民，反映的是法家的馭臣之術。

需要說明的是，除了第12、14章，《春秋事語》中還有多章體現的思想見於《韓非子·亡徵》，例如第7章齊桓公與蔡夫人乘舟章的思想與《亡徵》的“國小而不處卑，力少而不畏強，無禮而侮大鄰，貪愎而拙交者，可亡也”一致；第8章晉獻公欲襲虢章與《亡徵》“饕餮而無厭，近利而好得者，可亡也”可以對讀；第13章宋襄公戰敗章與《亡徵》“見大利而不趨，聞禍端而不備，淺薄於爭守之事，而務以仁義自飾者，可亡也”可以對讀。但是，我認為，雖然這些章見於《韓非子》，但不能說它們都是法家思想。因為《亡徵》是對歷史教訓的總結，有些觀點是當時人的共識。而第12、14章講的是馭臣之術，這無疑是法家的思想。

總之，從思想的角度來說，其成分比較複雜，不是儒家著作。《春秋事語》的作者將體現儒家思想的各章與體現法家思想的各章編纂在一起，說明作者並沒有固守某一學派的主張，而是根據現實需要兼收并蓄，因此，《春秋事語》屬於實用性的學術。

## 五 結語

綜上所述，帛書《春秋事語》有明確的政治指向，其創作目的恐怕不是對貴族子弟進行啓蒙教育。帛書設定的閱讀對象應該是當政的君主和大臣，也就是統治者。目的是為統治者提供鑒戒，教他們如何能認清形勢，在複雜的政治鬥爭中保全自身或在國家間的鬥爭中保全本國，避免重複同樣的錯誤和悲劇。

帛書各章的重點在於議論，這也正是把握帛書主旨的關鍵。按照我的理解，祇有第12章長萬章是在長萬殺宋公以後某人的事後評論，不是預言，其他都是當時人的預測，並記載了結果。這樣的話，除了第1章無法討論外，其他15章的結構可以分為兩類：第12章的結構是背景+結果+議論，其餘各章的結構都是背景+預測+結果。從內容上看，議論屬預測的各章都反映了預測者非凡的洞察力、準確的判斷力，議論屬事後評論的第12章也反映了評論者的深刻認識。二者體現的都是議論者的深謀遠慮。因此，強調謀劃，是這十六章的共同特點。這一特點與《新序·善謀》《說苑·權謀》性質相同。劉向所說的權謀不是我們通常理解的權詐陰謀、暗中算計，而是指能察微知著、防患於未然的能力。《權謀》篇列舉了近五十個例子，說明的都是這個道理。總之，帛書強調智慧的謀劃，這一點與《權謀》是完全相合的。

《說苑》在《漢書·藝文志》中被列入子部的儒家類。但是《春秋事語》的思想很複雜。



綜觀帛書各章的評論，所反映的思想可以分為三類：有些篇章是歷史教訓的總結，看不出明確的諸子思想；有些篇章明顯受到儒家思想的影響；有些則帶有濃厚的法家色彩。因此《春秋事語》不是《說苑》那樣的儒家著作。作者沒有固守某一學派的主張，而是根據現實需要兼收並蓄，帛書所論屬於實用性的學術。

關於帛書與《左傳》的差異，羅新慧、劉偉、趙爭等先生在文章中都討論過。<sup>①</sup> 總的來說，主要有以下幾點：一是《左傳》重事而帛書重議論；二是帛書不像《左傳》那樣按照時間順序編排；三是記載的史事有異；四是帛書與《左傳》的思想觀念有很大的差別。本文所討論的帛書的創作目的、主旨及思想也與《左傳》有本質的不同。根據《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序》的說法，《左傳》的創作原因是“魯君子左丘明懼弟子人人異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記具論其語，成《左氏春秋》”。《左傳》的寫作深受儒家思想的影響，反映的史觀是強調禮、德的道德史觀。因此，我認為帛書不屬於《左傳》的傳流系統。無論如何，正如本文第一部分所說，《春秋事語》以類相從的編纂方式、為統治者提供鑒戒的創作意圖、強調謀劃的主旨及受儒法影響的思想等問題有其自身的價值，值得引起重視。

附記：本文蒙匿名審稿專家提出寶貴的意見，謹致謝忱。

<sup>①</sup> 羅新慧：《馬王堆漢墓帛書〈春秋事語〉與〈左傳〉——兼論戰國時期的史學觀念》，《史學史研究》2009年第4期；劉偉：《馬王堆帛書〈春秋事語〉性質論略》，《古代文明》2010年第2期；趙爭：《馬王堆帛書〈春秋事語〉性質再議》，《古代文明》2011年第1期。

## 秦及西漢前期的墾田統計與田租徵收 ——以墾田租簿爲中心的考察

北京師範大學歷史學院 高智敏

**內容提要** 參據長沙走馬樓所出西漢前期《都鄉七年墾田租簿》，里耶 8-1519 號木牘可擬名爲《遷陵縣卅五年墾田租簿》。這兩份墾田租簿登載的應是當年五月已墾田數及應納田租額，統計的墾田是民戶所占民田。從兩份墾田租簿反映的畝租額看，秦及西漢前期實行的是程租稅田制。鄉吏每年五月調查民戶墾田，“度稼得租”，確定其應納田租額，製作墾田租簿。五月望日前逐級呈報至縣、郡。

**關鍵詞** 墾田租簿 墾田 田租徵收 上計

秦漢時期的田租徵收方式長期受到學界的關注。近年來由於出土簡牘資料如龍崗秦簡、嶽麓秦簡、張家山漢簡的公布，學界圍繞秦及漢初的土地制度及田租制度做了大量的研究，這些新材料中“程租”“稅田”“輿田”等展現出了秦及漢初獨特的田租徵收方式，但如何理解其含義及相互之間的關係，學界依然有分歧。上述材料主要集中於秦及漢初的律令及數學文獻中，《里耶秦簡(壹)》公布後，其中的 8-1519 號木牘記載了秦代遷陵縣的“輿田”“稅田”及租額等內容，爲理解這一問題提供了例證，其作爲實行的行政簿籍而受到學者的關注。2013 年，長沙簡牘博物館研究員馬代忠在《出土文獻研究》第 12 輯上披露了一枚題爲《都鄉七年墾田租簿》的走馬樓西漢竹牘(臨時編號 1056)，並做了相應的考釋。<sup>①</sup>《都鄉七年

<sup>①</sup> 馬代忠：《長沙走馬樓西漢簡〈都鄉七年墾田租簿〉初步考察》，中國文化遺產研究院編《出土文獻研究》第 12 輯，上海：中西書局，2013，213-222 頁。以下所述整理者意見皆出自該文。

《墾田租簿》記載的是西漢長沙王劉庸七年(武帝元狩元年,前 122)長沙王國臨湘縣都鄉的墾田及租額狀況,從記載內容來看,其與里耶秦簡 8-1519 號木牘是同一性質的文書,里耶秦木牘所載為秦始皇三十五年(前 212)遷陵縣所屬諸鄉墾田數、租額及戶數等內容。從走馬樓西漢竹牘自題為《都鄉七年墾田租簿》來看,里耶 8-1519 木牘或可稱為《遷陵縣卅五年墾田租簿》。這兩份《墾田租簿》是關於秦和西漢前期土地制度及田租徵收等內容的文書,但遺憾的是,無論是《都鄉七年墾田租簿》的整理者、研究者,<sup>①</sup>還是以《遷陵縣卅五年墾田租簿》為主要史料研究秦漢田租徵收方式的學者,<sup>②</sup>都未能將兩者結合起來進行研究。本文即對這兩份《墾田租簿》進行分析,明確其記載的內容,並從田租徵收方式的角度來判明墾田租簿的製作程序及其相關的行政環節,揭示其在秦漢時期土地及田租制度等方面的意義。<sup>③</sup>

## 一 《都鄉七年墾田租簿》概觀

在展開分析之前,本文先對《都鄉七年墾田租簿》的釋文進行校訂。據整理者介紹,竹牘整體保存較為完好,上部及中部略有殘缺,字迹部分漫漶,完整簡長 40.6 釐米,寬 3.5 釐米,厚 0.25 釐米,長度約合漢尺一尺八寸,文字分上、下欄書寫。儘管圖版並不十分清晰,但依然發現整理者的釋文及解釋有失誤之處,據整理者公布的釋文及圖版,校訂釋文如下:

### 1·都鄉七年墾田租簿

2 墾田六十頃二畝,租七百九十六石五斗七升半,率畝[1]斗三升,奇十六石三斗[2]一升[3]半。

3 凡墾田六十頃二畝,租七百九十六石五斗七升半。

4 出田十三頃四十五畝半,租百八十四石七斗,臨湘蠻夷歸義民不出租。

5 出田二頃六十一畝半,租卅三石八斗六升,樂人嬰給事柱下以命令田不出租。

(上欄)

1 凡出田十六頃七畝,租二百一十八石五斗六升。

2 定入田卅[4]三頃九十五畝,租五百七十八石一升[5]半。

3 提封四萬一千九百七十六頃十[6]畝百七十二步。

4 其八百一十三頃卅九畝二百二步可墾不墾。

① 朱德貴:《長沙走馬樓西漢簡牘所見“都鄉七年墾田租簿”及其相關問題分析》,《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2015 年第 2 期。

② 臧知非:《說稅田:秦漢田租徵收方式的歷史考察》,《歷史研究》2015 年第 3 期。

③ 本文中,“墾田租簿”加書名號特指兩枚木牘實物,無書名號則為泛稱。

5 四萬一千一百二頃六十八畝二百一十步群不可墾。

(下欄)

修訂釋文共六處,其中簡文缺釋一處:[1]畝,原釋文缺釋,今核對圖版, (率)下有一字,今檢此簡中“畝”字字形: ,睡虎地秦簡字形作 ,鳳凰山漢簡字形作 ,銀雀山漢簡字形作 ,字形相似,據文意當為“畝”無疑。此外,由於“升”與“斗”字形相似,釋文中因此錯誤三處:[2]、[3]原釋文作“三升一斗”,當為“三斗一升”;[5]升,原釋文作“斗”。另有數字修訂兩處:[4]卅,原釋文作“四十”,今核對圖版,作“卅”;[6]十,原釋文作“七十”,圖版不清,經計算後改正。秦漢制二百四十步一畝,百畝一頃,據牘文,其所見各項田畝數關係如下:

提封:41976.10 頃 172 步

可墾不墾:813.39 頃 202 步

群不可墾:41102.68 頃 210 步

墾 田:60.02 頃

出田:蠻夷歸義民 13.455 頃

樂人嬰給事柱下 2.615 頃

入田:43.95 頃

提封田分為可墾不墾、群不可墾及墾田三項,墾田又分為出田與入田。數字相加皆相等,田租的數額關係如下:

墾田租額:796.575 石 (=6002×0.13+16.315)

出田租額:218.56 石 (=184.7+33.86)

入田租額:578.015 石

經對釋文修訂後,各項皆準確無誤。《都鄉七年墾田租簿》上欄第一行以墨點標識,為簿書的標題。中以墾田諸項為主,上欄第1行至下欄第2行為簿書的主體部分,詳細說明了墾田中免租的田畝數、實際收租的田畝數及其租額。其中,上欄2-3行是墾田總數及田租的記錄,上欄第4行至下欄第1行記錄的是“出田”即免除田租的田畝數及租額,下欄第2行是根據以上的統計確定實際承擔租稅的田畝數及其租額。下欄第3-5行是對長沙國臨湘縣都鄉範圍內土地整體情況的說明。“七年”,整理者參據其他走馬樓西漢簡牘的紀年及月朔與漢武帝元朔、元狩諸年間月朔的對應關係認為是長沙國紀年,即長沙王劉庸七年。“都鄉”,為長沙國臨湘縣之都鄉。

《都鄉七年墾田租簿》中,可墾不墾、群不可墾與墾田三項之和為提封田之數。《漢書·

地理志》記載：“漢興……訖於孝平，凡郡國一百三，縣邑千三百一十四，道三十二，侯國二百四十一。地東西九千三百二里，南北萬三千三百六十八里。提封田一萬萬四千五百一十三萬六千四百五頃，其一萬萬二百五十二萬八千八百八十九頃，邑居道路，山川林澤，群不可墾，其三千二百二十九萬九百四十七頃，可墾不〔可〕墾，<sup>①</sup>定墾田八百二十七萬五百三十六頃。民戶千二百二十三萬三千六十二，口五千九百五十九萬四千九百七十八。”<sup>②</sup>《漢書》所錄資料來自郡國上計，胡廣《漢官解詁》言漢代地方上計郡國：“秋冬歲盡，各計縣戶口墾田，錢穀入出，盜賊多少，上其集簿。”<sup>③</sup>尹灣漢簡《集簿》中有相關的土地部分：

提封五十一萬二千九十二頃八十五畝二□……人，如前。

□國邑居園田廿一萬一千六百五十二□□十九萬百卅二……卅五(?)萬九千六

……

種宿麥十萬七千三百□十□頃，多前千九百廿頃八十二畝。

春種樹六十五萬六千七百九十四畝，多前四萬六千三百廿畝。<sup>④</sup>

墾田是地方上計的重要內容，漢志所載是郡國上計的總計。<sup>⑤</sup>臨湘縣都鄉《墾田租簿》由鄉吏製作後呈報縣廷，縣廷匯總後，將縣墾田租簿呈報長沙內史，最終上計至漢廷。漢初王國上計中央的情形不得而知，王國從文帝時即開始行用“漢法”，吳楚亂後，漢廷大範圍收奪諸侯王國權力，諸侯王封地日縮，且“名山陂海，咸納於漢”，劉氏長沙國時期所封僅有一郡之地，置吏理民之權也大大降低。王國行用“漢法”，不祇是諸侯國行用漢朝制度、行政程式，更是指漢廷能否以“漢法”控制諸侯國的人事權、治民權、財政權等諸多權力。<sup>⑥</sup>實際上，從漢初分封開始，諸侯國從中央官制到基層行政和漢廷所行用的制度是基本同一的。王國行用“漢法”，漢廷因之逐步打破其獨立性，進而在行政體制上與漢郡趨同。漢初不論，隨着景帝以後對王國控制的加強，上計制度必然扮演重要的角色。

“提封”是指政區內的土地總面積，“可墾不墾”是指可以開墾但尚未開墾的土地，邑居道路、山川林澤則是“群不可墾”。“墾田”項下分為“出田”與“入田”二項，“出田”是因某種

① “可墾不可墾”，《漢書補注》引宋祁說指出各本不同，并引王鳴盛說“此誤衍不可墾三字，南監本無”。見王先謙《漢書補注》，北京：中華書局，1983，844頁。據《都鄉七年墾田租簿》的記載，正作“可墾不墾”，王鳴盛說誤，當從邵本。

② 《漢書》卷二八下《地理志下》，北京：中華書局，1962，1639-1640頁。

③ 《續漢書·百官五》劉昭注引。見《後漢書志》卷二八，北京：中華書局，1965，3623頁。

④ 連雲港市博物館、東海縣博物館、中國社會科學院簡帛研究中心、中國文物研究所編：《尹灣漢墓簡牘》，北京：中華書局，1997，77-78頁。

⑤ 《漢書·地理志》所載戶口數和郡國領域并非是一年的版籍，戶口數來自平帝元始二年各郡國的戶籍，政區版圖則說法不一，周振鶴認為政區所據為成帝元延緩之際各郡國的版圖（周振鶴：《西漢政區地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22-24頁）；馬孟龍認為可斷限為元延三年（馬孟龍：《西漢侯國地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79-84頁）。

⑥ 陳蘇鎮：《〈春秋〉與“漢道”：兩漢政治與政治文化研究》，北京：中華書局，2011，122-130頁。



原因不繳納田租的田畝數,如牘文中“臨湘蠻夷歸義民不出租”和“樂人嬰給事柱下以命令田不出租”之例。秦漢國家对其控制下的蠻夷民有相應的優復政策,《後漢書·南蠻西南夷列傳》記秦時對板楯蠻“頃田不租”,漢代時又“不輸租賦”。<sup>①</sup> 臨湘縣的“蠻夷歸義民”由官府授田,但免除田租。“樂人嬰給事柱下以命令田不出租”整理者解釋為因“樂人嬰”的特殊身份或在某一段時間段因從事某種特殊職業而以“命令”的形式規定享受“田不出租”的特殊優待。<sup>②</sup> 所謂“柱下”,張蒼秦時曾為御史“主柱下方書”,顏師古注:“居殿柱之下,若今侍立御史矣。”<sup>③</sup> 這裏代指長沙國王。《二年律令·行書律》中郵人因其身份而享受“毋租其田一頃”的優待。<sup>④</sup> 樂人嬰因“給事柱下”而得以承長沙王的賞賜,賜以土地 2.615 頃并依長沙王之令得以免除田租。“入田”之數是實際應當徵收田租的田畝數。邢義田曾討論過尹灣漢簡中“定簿”的含義,他認為“定”字在漢代文書中是指在清查後表示實際情況的意思,而“定簿”是泛指一種經過清查記錄實際情況的簿冊。<sup>⑤</sup> 這裏的“定”正當做如是解,所謂“入田”,乃是指經清查統計後實際應當繳納田租的田畝數。

我們再回過頭來看田租的問題。第一行墾田數後的租稅額以“率畝斗三升”計,“率”即平均之意<sup>⑥</sup>,以平均畝租率 1.3 斗計,仍剩餘 16.315 石。各項土地平均畝租額列表如下:

表 1 《都鄉七年墾田租簿》土地租額關係表

土地種類	租額(斗)	面積(畝)	平均畝租額(斗)
墾田	7965.75	6002	1.327
入田	5780.15	4395	1.315
出田	2185.6	1607	1.360
蠻夷歸義民	1847	1345.5	1.373
樂人嬰	338.6	261.5	1.295

上表可見,每一項土地類別的平均畝租額皆不同,這反映了所徵收的并非是定額租,且各項的平均畝租額之間的差額並不整齊,這與後文中里耶秦簡 8-1519 號木牘的平均畝租額(見表 2)的差額是相似的,可見這一時期田租的徵收很有可能依然延續的是秦以來的程租稅田

① 《後漢書》卷八六《南蠻西南夷列傳》,2842 頁。

② 整理者猜測“樂人”和“嬰”是兩種不同職業的人群,我們認為“嬰”為樂人之名更為合適,如張家山漢簡《奏讞書》案例十七中黥城旦講自稱其以前身份即是“樂人”,見張家山二四七號漢墓竹簡整理小組編著《張家山漢墓竹簡[二四七號墓](釋文修訂本)》,簡 99,北京:文物出版社,2006,100 頁。

③ 《漢書》卷四二《張蒼傳》,2093 頁。

④ 《二年律令·行書律》簡 268,《張家山漢墓竹簡[二四七號墓](釋文修訂本)》,46 頁。

⑤ 邢義田:《尹灣漢墓木牘文書的名稱和性質——江蘇東海縣尹灣漢墓出土簡牘讀記之一》,原刊《大陸雜誌》1997 年第 3 期,收入其著《地不愛寶:漢代的簡牘》,北京:中華書局,2011,120-123 頁。

⑥ 李均明:《漢代統計中的指標與數列——從尹灣、居延、敦煌出土簡牘談起》,中國秦漢史研究會編《秦漢史論叢》第 7 輯,北京:中華書局,1997,352-366 頁。

之制,而不是分品定額租制。<sup>①</sup> 其平均畝租額與平均畝租率 1.3 斗基本持平。以三十稅一的租率計,每畝若課稅 1.3 斗,畝產則為 3.9 石,整理者推測其為水稻畝產,可從。

## 二 墾田的性質

作為同樣是墾田租簿性質的里耶秦簡 8-1519 號木牘,記載了遷陵縣秦始皇三十五年的墾田頃畝數及租額,唯其記載名目及格式與《都鄉七年墾田租簿》不同:

- 1 遷陵卅五年報(墾)田與五十二頃九十五畝,稅田四頃□□
- 2 戶百五十二,租六百七十七石。衡(率)之,畝一石五;
- 3 戶嬰四石四斗五升,奇不衡(率)六斗。

(8-1519 正)

- 1 啓田九頃十畝,租九十七石六斗。
- 2 都田十七頃五十一畝,租二百卅一石。
- 3 貳田廿六頃卅四畝,租三百卅九石三。
- 4 凡田七十頃卅二畝。·租凡九百一十。(上欄)
- 1 六百七十七石。(下欄)

(8-1519 背)<sup>②</sup>

木牘記錄了秦始皇三十五年遷陵縣的墾田及租額狀況。正面第 1 行記載遷陵縣的“與田”“稅田”;第 2-3 行記載遷陵縣的戶數、租額總數及“稅田”的平均租額、每戶的平均租額;背面上欄第 1-3 行記載遷陵縣所屬三個鄉各鄉的墾田數及租額,三個鄉田畝數額總和等於“與田”數,租額總和 677.9 石,與所記租額總數略同;背面上欄第 4 行的“凡”是總計的意思,但相較於“與田”52.95 頃及其租額 677 石,多出的部分并不清楚是什麼性質的土地;背面下欄 1 行記“六百七十七石”應當是對正面墾田租額的再確認,標明其實際應當徵收的意思。其中,“與田”及“稅田”的含義稍後再論,在此先對“墾田”作一說明。

“墾田”是秦漢土地制度中的一個專有名詞,墾即墾闢、耕墾之義,《後漢書·光武帝紀

① 雖然走馬樓西漢簡《都鄉七年墾田租簿》沒有“稅田”的直接用法,但我們仍不能將這一時期的田租徵收方式認為是分品定額租制。關於秦漢時期田租徵收方式由程租稅田制向分品定額制的演變可參看楊振紅《從新出簡牘看秦漢時期的田租徵收》(武漢大學簡帛研究中心主辦《簡帛》第 3 輯,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331-342 頁)及臧知非《說稅田:秦漢田租徵收方式的歷史考察》一文。秦漢時期田租徵收方式的演變牽涉甚廣,筆者擬將另文詳論。

② 錄文據陳偉主編《里耶秦簡牘校釋(第一卷)》,武漢大學出版社,2012,345-347 頁。本文所引里耶第五層、第八層簡牘皆出自該書,不另出注。

下》：“詔下州郡檢覈墾田頃畝及戶口年紀”，李賢注：“墾，闢也”。<sup>①</sup> 墾田是墾闢後可以耕種的土地。未墾闢耕種的荒田稱“萊田”“草田”，《漢書·東方朔傳》：“又詔中尉、左右內史表屬縣草田，欲以償鄠杜之民。”顏師古注：“草田謂荒田未耕墾也。”<sup>②</sup> 早期的農耕方式采取輪流休耕的方式。戰國以來列國推行國家授田制，盡地利乃是富國強兵之道，大量的荒田因之被墾闢出來。《商君書》言“制土分民”“任地待役”之律：

地方百里者：山陵處什一，藪澤處什一，谿谷流水處什一，都邑蹊道處什一，惡田處什二，良田處什四，以此食作夫五萬，其山陵、藪澤、谿谷可以給其材，都邑、蹊道足以處其民，先王制土分民之律也。<sup>③</sup>

故為國任地者，山陵居什一，藪澤居什一，谿谷流水居什一，都邑蹊道〔居什一，惡田居什二，良田〕居什四。此先王之正律也。故為國分田數小。畝五百足待一役，此地不任也。方土百里，出戰卒萬人者，數小也。此其墾田足以食其民，都邑遂路足以處其民；山陵藪澤谿谷足以供其利，藪澤隄防足以畜〔……〕。故兵出糧給而財有餘；兵休民作而畜長足。此所謂任地待役之律也。<sup>④</sup>

山陵藪澤、谿谷流水、都邑蹊道即上引《漢書·地理志》中的“群不可墾”之田。《商君書·算地》強調要“治草萊”，商君作“墾草令”，<sup>⑤</sup>《商君書·墾令》大講墾令所出之由，任地待役，制土分民，秦國因之以強。國家授田制下，民田授給以戶為單位，土地占有以爵制等級為差次，秦商鞅變法“明尊卑爵秩等級，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以家次”，<sup>⑥</sup>建立了一套以爵制為基礎的田宅占有制度，漢初頒布的“高帝五年詔”中也提到“法以有功勞行田宅”之制，<sup>⑦</sup>《二年律令·戶律》中以爵次授田宅的名田宅制律文，即從多方面反映了漢初名田宅制的實態。<sup>⑧</sup>

秦時，官府授田已存在不足的情況，《遷陵縣卅五年墾田租簿》戶均墾田不足 35 畝，下引 8-1763 則表明遷陵縣某戶的墾田數祇有 19 畝。秦始皇三十一年時“使黔首自實田”，<sup>⑨</sup>讓民眾墾闢土地後申報官府即可名田戶下。里耶秦簡中有相關的“自實田”文書：

卅五年三月庚寅朔丙辰，貳春鄉茲爰書：南里寡婦愁自言謁貍（墾）草田故桑（桑）

① 《後漢書》卷一下《光武帝紀下》，66 頁。

② 《漢書》卷六五《東方朔傳》，2847 頁。

③ 《商君書》卷四《徠民》，蔣禮鴻：《商君書錐指》，北京：中華書局，1986，86-87 頁。

④ 《商君書》卷二《算地》，《商君書錐指》，43-44 頁。所補文字據蔣氏意見依《徠民篇》增補。

⑤ 《商君書》卷一《更法》，《商君書錐指》，5 頁。

⑥ 《史記》卷六八《商君列傳》，北京：中華書局，1959，2230 頁。

⑦ 《漢書》卷一下《高帝紀下》，54 頁。

⑧ 楊振紅：《〈二年律令〉與秦漢“名田宅制”》，原題《秦漢“名田宅制”說——從張家山漢簡看戰國秦漢的土地制度》，刊於《中國史研究》2003 年第 3 期，後收入其著《出土簡牘與秦漢社會》，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9，126-146 頁。

⑨ 這條法令僅見於裴駰《史記集解》所引徐廣注，見《史記》卷六《秦始皇本紀》，251 頁。

地百廿步，在故步北，恒以爲桑(桑)田。

三月丙辰，貳春鄉茲敢言之：上。敢言之。/詘手。(正面)

四月壬戌日入，戌卒□以來。/暉發。 詘手。(背面)

(9-14)

卅三年六月庚子朔丁巳，【田】守武爰書：高里士五(伍)吾武自言謁狼(墾)草田六畝武門外，能恒籍以爲田。典繆占。(正面)

九月丁巳，田守武敢言之：上黔首狼(墾)草一牒，敢言之。 銜手。

【九】月丁巳日，水十一刻下四，佐銜以來。/□發。(背面)

(9-2350)<sup>①</sup>

里耶秦簡 9-14 與 9-2350 分別是貳春鄉鄉嗇夫茲、田守嗇夫武向縣廷呈報的民衆自言墾田數目內容的爰書，時間爲秦始皇三十五年、三十三年，在秦始皇三十一年“使黔首自實田”之後。<sup>②</sup>

國家授田制下不可耕墾的土地一般不授給民戶，《二年律令·田律》簡 239：“田不可田者，勿行；當受田者欲受，許之。”又簡 244“田不可狼(墾)而欲歸，勿受償者，許之”。同時對侵占道路者也有相應的懲罰(簡 245)。<sup>③</sup> 惡田可行輪耕法，如魏鄴下行田即因田惡獨以二百畝給授，以便民衆可得輪耕。里耶秦簡中有關於遷陵地區“槎田歲更”習俗的記載：

□【黔】首習俗好本事不好末作，其習俗槎田歲更，以異中縣。(8-355)

《里耶秦簡牘校釋》注釋：“槎田歲更，應是說一種耕作制度。《國語·魯語上》‘且夫山不槎蘖’韋昭注：‘槎，斫也。’《文選·張衡〈東京賦〉》‘山無槎枿’呂向注：‘斫木曰槎。’槎田，可能是指斫木爲田。歲更，每年更替。《漢書·食貨志上》：‘武帝末年……以趙過爲搜粟都尉。過能爲代田，一畝三畝。歲代處，故曰代田，古法也。’《史記·河渠書》集解引徐廣曰：‘《溝洫志》行田二百畝，分賦田與一夫二百畝，以田惡，故更歲耕之。’可參看。”遷陵地區的輪作方式與內地不同，《校釋》引代田法釋“歲更”，但“槎田歲更”顯然並非代田法，而是生產力低下的換田輪作制。“槎田歲更”的習俗表明遷陵地區一年中耕種的土地實際上祇是其占有土地

① 里耶秦簡博物館、出土文獻與中國古代文明研究協同創新中心中國人民大學中心編著：《里耶秦簡博物館藏秦簡》，上海：中西書局，2016，179、194 頁。9-2350 第 1 行“田”字據之前研究及牘背文字補。下引第 9 層簡牘皆出自該書，不另出注。

② 平中苓次認爲這裏的“自實”如同唐代“手實”，是從實自己申報的意思。[日]平中苓次：《中國古代の田制と税法——秦漢經濟史研究》，京都：東洋史研究會，1967，54-61 頁。

③ 張家山二四七號漢墓竹簡整理小組：《張家山漢墓竹簡〔二四七號墓〕（釋文修訂本）》，41-42 頁。

的一部分。<sup>①</sup>

民戶所得授田乃租稅之所從出。秦漢時期對土地的課稅,分爲禾、芻、稟三種。雲夢睡虎地秦簡《田律》:“入頃芻稟,以其受田之數,無狼(墾)不狼(墾),頃入芻三石、稟二石。”<sup>②</sup>張家山漢簡《二年律令·田律》對徵收芻稟也有專門的規定。<sup>③</sup>芻稟不論土地當年是否耕種都需繳納相應的實物或貨幣,田租的徵收與芻稟不同,是以當年實際墾種的土地進行徵收。因此,《墾田租簿》中所統計的該年度的“墾田”祇是當年實際耕種的土地,並非是其實際占有的全部耕地。

授田制下,授予民戶所占有的田稱作私田(民田),由官府直接經營的田稱作公田(官田)。“輿”即輿(與)田。“輿(與)田”見於張家山漢簡《算數書》及岳麓秦簡《數》,彭浩認爲“輿田”是指登記在圖、冊上的土地,也就是符合受田條件者得到的土地。<sup>④</sup>在彭浩解釋的基礎上,肖燦從“公田”和“私田”的角度來解釋“輿(與)田”及“稅田”,她認爲“輿田”即秦國家授田制下的民戶授田,“稅田”是由國家直接經營的公田。<sup>⑤</sup>肖燦將“輿(與)田”解釋爲授田制下民戶所得到的私田(民田)的看法是可取的,但其對“稅田”的解釋卻有待商榷。從牘文看,“輿田”與“稅田”並非是相對的概念。牘文正面第2行“戶百五十二,租六百七十七石。衡(率)之,畝一石五”是指遷陵縣152戶所承擔田租總額爲677石,按平均稅田畝租額爲1.5石計算,其田畝數量約爲4.51頃,這一數字應當與“稅田”數字是一致的。“稅田”的含義當如臧知非所論,是從“輿田”中劃定的用於納稅之田。<sup>⑥</sup>算數書等文獻所見稅田比例基本爲十稅一<sup>⑦</sup>,里耶《墾田租簿》所見稅田面積與墾田比低於十分之一,這應當是實際操作與理論計算上的不同。各鄉的畝租額也並不一致:

① 魏斌將“槎田歲更”解釋作刀耕火種,見其作《古人堤簡與東漢武陵蠻》,《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85本第1分,2014。

② 《秦律十八種·田律》簡8-9,睡虎地秦墓竹簡整理小組編《睡虎地秦墓竹簡》,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21頁。

③ 《二年律令·田律》簡240-242:“入頃芻稟,頃入芻三石;上郡地惡,頃入二石;稟皆二石。令各入其歲所有,毋入陳,不從令者罰黃金四兩。收入芻稟,縣各度一歲用芻稟,足其縣用,其餘令頃入五十五錢以當芻稟。芻一石當十五錢,稟一石當五錢。芻稟節貴於律,以入芻稟時平賈(價)入錢。”《張家山漢墓竹簡[二四七號墓](釋文修訂本)》,41頁。

④ 彭浩:《談秦漢數書中的“輿田”及相關問題》,簡帛網,2010年8月6日。

⑤ 肖燦:《從〈數〉的“輿(與)田”、“稅田”算題看秦田地租稅制度》,《湖南大學學報》2010年第4期。

⑥ 所謂的“劃出”,一般認爲是在實際地塊中進行的,但考慮到其實際操作及在其後賦稅徵納中的複雜性,我認爲“稅田”祇是鄉吏在度稼程租及租額統計時計算中的一種“概念”,而並不會在地理上劃出區域爲其後田租徵納的專門區塊。這一點將另文詳論。臧知非認爲“輿田”是耕地的統稱,不僅包括已墾田,也包括未墾田,進而認爲“墾田輿”是授田民新開墾之“輿田”。這樣的認識是將“墾田”之“墾”解釋爲動詞,而沒有將之理解爲漢代法定的土地名目。見臧知非《說稅田:秦漢田租徵收方式的歷史考察》,24-29頁。

⑦ 參見臧知非《說稅田:秦漢田租徵收方式的歷史考察》。



表 2 《遷陵縣卅五年墾田租簿》土地租額關係表

土地種類	租額(斗)	面積(畝)	平均畝租額(斗)
輿田	6770	5295	1.279
啟陵田	976	910	1.073
都鄉田	2410	1751	1.376
貳春田	3393	2634	1.288
總數	9100	7042	1.292
總數-輿田	2330	1747	1.334

這與西漢長沙國臨湘縣《都鄉七年墾田租簿》的情況是相同的。

“輿田”與“稅田”的含義如上，那麼，牘背第 4 行“凡田七十頃卅二畝”是對遷陵縣墾田數的總計，除去“輿田”52.95 頃外，另外的 17.47 頃的性質又當如何解釋呢？這一部分墾田數量登載於墾田租簿，且對其田租數量進行了計算，但在最終的結計環節並未包括這一部分田租。在這裏我們提出以下幾種可能：一，其為休耕的民田，由於田租繳納祇限於已墾田，因而不納田租；二，其有可能是官府直接經營的公田，但官府直接經營的公田並不繳納田租；三，也可能是官府“假”予民衆的公田。

第一種可能性，上文已根據秦代遷陵地區“槎田歲更”的習俗指出其一年中實際耕種的土地祇是其占有土地的一部分。官府在對墾田進行統計時，也會統計其應當墾種的土地及已經墾種的土地：

☐當耨(墾)田十六畝。

☐已耨(墾)田十九畝。

(8-1763)

這枚簡可見已墾田高於當墾田，應當是該戶在該年開闢了新的土地。官府在統計應當墾種的土地及已經墾種的土地時當然也會有未墾種的土地存在，這部分沒有墾種的土地會進行登記，但並不會徵收田租，祇會收取芻藁等物。

我們再來看秦代公田的具体情形。裘錫圭認為睡虎地秦律中的“田嗇夫”總管全縣田地等事，其部佐分管各鄉田地等事。<sup>①</sup> 秦代公田的經營，裘錫圭據璽印資料及睡虎地秦律指出，“在秦代，國家掌握着大量土地，直接為官府所經營的公田，數量也一定極為可觀”，“役使隸臣一類人耕種公田，應是秦代官府經營公田的重要方式”。<sup>②</sup>里耶秦簡的記載也能支持這一

① 裘錫圭：《嗇夫初探》，《裘錫圭學術文集》第 5 卷，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2，65-67 頁。

② 裘錫圭：《從出土文字資料看秦和西漢時代官有農田的經營》，《裘錫圭學術文集》第 5 卷，210-212 頁。

觀點。里耶秦簡中的“田”與“田官”的關係，學者多有所論，意見不一，陳偉以大量資料證明“田(嗇夫)”是全縣農事的主管官員，“田官”是隸屬於遷陵縣廷的一個官署，直接經營官府的公田，遷陵縣田部系統與田官系統是并存的。<sup>①</sup> 有力地支持了裘錫圭的觀點。新近披露的一枚里耶秦簡顯示田官須向縣廷上呈“墾田課”：

元年八月庚午朔庚寅，田官守穽敢言之：上報(墾)田課一牒。敢言之。□(正面)

八月庚寅日入，穽以來。／援發。穽手。(背面)

(9-1869)

遷陵縣的田官須向縣廷報告“墾田課”，其具體內容不得而知。里耶秦簡顯示秦遷陵縣的公田基本由官府所屬的徒隸進行勞作，其收穫物全部由地方官府支配，如里耶秦簡所出“續食”簡多處言“零陽田能自食”(5-1)、“遷陵田能自食”(8-50+8-422、8-169+8-233+8-407+8-416+8-1185)，這裏的“零陽田”“遷陵田”，我推測為縣廷田官所管理的公田。田官直接經營的公田不應當繳納田租，且如果是田官的公田，似乎當在牘文中記載清楚，而不應如此模糊。

裘錫圭又據龍崗秦簡資料指出，“漢代盛行的假民公田的辦法，在秦代已經實施了”。<sup>②</sup> 其所據的是《龍崗秦簡》以下兩簡：

黔首錢假其田已(?)□□□者，或□□□

(155)

諸以錢財它物假田□□

(178A)<sup>③</sup>

另外，嶽麓秦簡《數》也有關於“假田”的內容：

田五十五畝，租四石三斗而三室共段(假)之，一室十七畝，一室十五畝，一室廿三畝，今欲分其租。述(術)曰：以田提封數□法，以租乘分田，如法一斗，不盈斗者，十之，如法得一升。

(47-48)<sup>④</sup>

這裏的假田應當是官府的假民公田，國家對假與民衆的公田課以假稅。柳春藩認為漢代“假稅”分為“地租型”“地稅型”及“漁采稅型”，“地租型”假稅額遠高於“地稅型”，“地稅型”假稅的稅率相當於三十稅一，<sup>⑤</sup>即是相當於漢代民田田租的三十稅一。從里耶《墾田租簿》來看，多出部分徵收的租率與民田的租率大致是相同的。但上文已指出，牘文背面下欄一行所表示的多餘部分不納田租，如果這一部分是假民公田必然會繳納假稅，這與牘文的記載是相

① 陳偉：《里耶秦簡所見的“田”與“田官”》，《中國典籍與文化》2013年第4期。

② 裘錫圭：《從出土文字資料看秦和西漢時代官有農田的經營》，210-212頁。

③ 陳偉主編：《秦簡牘合集(貳)·龍崗秦墓簡牘》，武漢大學出版社，2014，90、96頁。

④ 朱漢民、陳松長主編：《嶽麓書院藏秦簡(貳)》，上海辭書出版社，2011，57頁。

⑤ 柳春藩：《論漢代“公田”的“假稅”》，《中國史研究》1983年第2期。高敏認為漢代“假民公田”制的兩種類型是“租佃型”及“授田型”，其中“授田型”的稅額為三十稅一，見《論漢代“假民公田”制的兩種類型》，《求索》1985年第1期。

互衝突的。

由此看來，里耶《遷陵縣卅五年墾田租簿》所登載的是民田，包括了該年度的已墾田及未墾田。走馬樓《都鄉七年墾田租簿》記載的也是民田。我們再回過頭來看《漢書·地理志》所記載的墾田數額。《漢書·地理志》所記天下郡國數、四至、土地狀況及戶口數的總計，這些資料基本上都來自於各郡國上計中央的簿籍資料。“提封田”之下包括有群不可墾、可墾不墾、墾田三項，三項之和： $102528889$  頃 +  $32290947$  頃 +  $8270536$  頃 =  $143090372$  頃，相較提封田數  $145136405$  頃，少  $2046033$  頃，其面積約相當於墾田數的四分之一，由於這一差額體現在多個計數單位上，我們基本可以排除《漢書》傳抄中的版本脫誤問題。考慮到漢代財政中“帝室財政”和“國家財政”的兩分，其管理機關也不一樣，帝室財政由少府、水衡都尉管理，因此猜測這一部分是“帝室財政”中的“禁苑”“公田”諸項。<sup>①</sup> 禁苑是皇家蓄養禽獸林木的苑囿，龍崗秦簡中有大量關於秦代禁苑設置、管理的律文，漢代禁苑著名者如上林苑、甘泉苑等，這些禁苑占地面積極為廣大。漢代的公田分為兩類，一種是由郡國農官、中央官署農官、邊郡的農都尉和其他屯田官經營，邊郡農都尉和郡國農官受郡國長官節制，又直屬大司農。此為國家財政所領有的“公田”；另一種是屬於少府和水衡都尉的大量公田，這些公田有的位於禁苑之中，有的位於其外，也有的公田分布在郡縣，《史記·平準書》：“水衡、少府、大農、太仆各置農官，往往即郡縣比沒入田田之。”<sup>②</sup> 這些屬於水衡、少府的公田成為帝室財政的一大來源。屬於帝室財政的禁苑、公田其所占面積（提封）、墾田數亦須進行統計，因此我懷疑漢志的墾田數祇是郡國的上計，而沒有將水衡、少府領有的禁苑、公田部分統計在內。而通過《遷陵縣卅五年墾田租簿》的相關分析，《漢書·地理志》中所缺略的部分有可能是該年度休耕的土地，“墾田”統計的祇是該年度實際耕種的土地。從邏輯來看，似乎以第二種理解為宜。<sup>③</sup>

### 三 墾田租簿的性質

整理者認為，《都鄉七年墾田租簿》是“一份已執行的臨湘縣都鄉七年的墾田租稅及土地度量總帳”。所謂“已執行”，即是對實際已繳納田租數量的統計。整理者的這一認識應當來自於對漢代上計制度的理解。田租的徵納時間是在作物成熟後不久，秦漢財政計斷九月，北

① 見[日]加藤繁《漢代國家財政和帝室財政的區別以及帝室財政一斑》，收入其著《中國經濟史考證》，吳傑譯，北京：中華書局，2012，57-59頁。

② 《史記》卷三〇《平準書》，1436頁。

③ 由於沒有其他史料佐證，歷來研究墾田數字的學者如梁方仲《中國歷代戶口、田地、田賦統計》、何炳棣《中國歷代土地數字考實》都對這一問題忽略不提。本文在這裏的解釋還有待以後進一步考慮修正。

方作物以粟為主,水稻成熟較粟晚,因此“計稻後年”。粟與稻雖為同一年墾種,但由於收穫時間與財政年度的關係,却會分屬不同的財政年度。<sup>①</sup> 漢代上計,“秋冬歲盡,各計縣戶口墾田,錢穀入出,盜賊多少,上其集簿。”集簿所載“錢穀入出”包括本年度已徵納田租的統計,如尹灣漢簡《集簿》背面最後一行“一歲諸穀入五十萬六千六百卅七石二斗二升少□升,出卅一万二千五百八十一石四斗□□升”。另外,作為上計的統計資料,還應當包括該年度逋欠田租的統計,這兩份《墾田租簿》木牘中并未有相應的記載,因此其恐怕并非是對已納田租的統計。新公布的嶽麓秦簡《田律》即有對逋欠田租的懲罰規定,可見田租逋欠的情況是普遍存在的。上計時所匯報的墾田數、租穀出入及逋欠情況是否需要製作專門的“墾田租簿”,由於并無相應的資料可茲參照因此目前祇能存疑。

墾田租簿是五月望日之前製作的。《二年律令·田律》規定:“縣道已墾(墾)田,上其數二千石官,以戶數嬰之,毋出五月望。”<sup>②</sup>臧知非已指出里耶所出《墾田租簿》與此律文的關係。值得注意的是在里耶秦簡中也有大致相同的律文:

律曰:已墾(墾)田輒上其數及戶數,戶嬰之。 (9-39)

漢律顯然承襲自秦律,秦律上報的主體機構不明確,亦沒有“毋出五月望”的時限規定。<sup>③</sup> “以戶數嬰之”,“嬰”,張家山漢簡整理小組認為當作繫解,指標明墾田對應的戶數。里耶秦簡所見秦代遷陵縣“見戶”指實際的戶口數字,<sup>④</sup>《遷陵卅五年墾田租簿》中確實在租額下記錄了戶數,另外又記“戶嬰四石四斗五升”,可見,“嬰”當作平均解,意思是求得每戶的平均租額。<sup>⑤</sup> 律文針對的是民衆已墾種土地的調查,具體形式為:

□當墾(墾)田十六畝。

□已墾(墾)田十九畝。 (8-1763)

① 張榮強:《從計斷九月到歲終為斷——漢唐間財政年度的演變》,原載《北京師範大學學報》2005年第1期,收入其著《漢唐籍帳制度研究》,北京:商務印書館,2010,187-221頁。

② 簡243,《張家山漢墓竹簡[二四七號墓](釋文修訂本)》,42頁。

③ 里耶秦簡9-1869田官呈報墾田課的時間是二世元年八月,這裏的墾田課是縣廷對田官的考課。與五月對民田進行的調查並無直接關係。秦代“課”的研究參徐世虹《秦“課”芻議》,載武漢大學簡帛研究中心主辦《簡帛》第8輯,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251-267頁。

④ 唐俊峰:《里耶秦簡所示秦代的“見戶”與“積戶”——兼論秦代遷陵縣的戶數》,簡帛網,2014年2月8日;王偉、孫兆華:《“積戶”與“見戶”:里耶秦簡所見遷陵編戶數量》,《四川文物》2014年第2期。

⑤ 《都鄉七年墾田租簿》中却并未有“戶數”,或許與漢文帝“不為民田及奴婢之限”,其後授田制的破壞有關。東漢建安末劉廙上表所提之議有“課之皆當以事,不得依名。事者,皆以戶口率其墾田之多少,及盜賊發興,民之亡叛者,為得負之計”。(見《三國志·魏書》卷二一《劉廙傳》注引《廙別傳》,北京:中華書局,1982,617頁)劉廙的建議“以戶口率其墾田之多少”,唐長孺已指出,晉代課田制為其制度化的表現。見《晉代田制試釋》,收入其著《魏晉南北朝史論叢》,北京:中華書局,2011,47頁注。“嬰”作為平均解,字書皆無此意,“以戶口率其墾田之多少”即是以戶數求得每戶平均墾田數,這裏的“率”與“嬰”的意思是一致的。另承石洋老師教示,嬰嬰字平仲,以名與字相通之法,或可見先秦時“嬰”有平均的意思。

該簡文上半部殘斷。《遷陵縣卅五年墾田租簿》戶均墾田(已墾田)約為 34.8 畝,結合來看,這是遷陵縣一戶墾田較少家庭所占有的墾田。各戶統計之後再由鄉吏將之匯總,呈報縣廷。“五月望”的時間節點,民衆墾種的狀況已經確定,鄉里吏根據墾種面積及莊稼長勢確定應納田租額,一方面製作“田租籍”,正本藏鄉,副本上縣廷,并據之製作墾田租簿,將之一併上報縣廷,縣廷匯總各鄉墾田租簿後再上報郡府,此須在五月望之前完成。墾田租簿如同戶口簿一樣,遵循“鄉—縣—郡”的逐級上報機制。<sup>①</sup>《都鄉七年墾田租簿》是鄉向縣呈報簿籍的正本實態,而《遷陵縣卅五年墾田租簿》乃是遷陵縣向郡所呈報的簿籍的副本,因而留存於遷陵縣廷。

地方官府在徵收租賦的過程中,會編製相應的簿籍,這些簿籍類目繁多。《二年律令·戶律》規定:“民宅園戶籍、年細籍、田比地籍、田命籍、田租籍,謹副上縣廷。”<sup>②</sup>“宅園戶籍”之外,“田比地籍、田命籍、田租籍”皆與土地占有狀況和租賦有關。“田比地籍”,整理者認為是“記錄田地比鄰次第的簿籍”;“田命籍”,彭浩、陳偉、王藤元男主編《二年律令與奏讞書》一書中釋“命”為“合”字,<sup>③</sup>張榮強則以“命”通“名”,認為是名田宅制下繫於個人名下的田籍,并認為其與“田比地籍”的區別在於形式上前者是以田繫人,後者則是以人繫田。<sup>④</sup>“田租籍”則與田租的徵收狀況有關。臧知非認為田租籍是每戶應繳納田租的數量,高敏則認為是所授田地應納田租和已納田租的數量。<sup>⑤</sup>田租籍同戶籍一樣須呈報副本藏於縣廷,從正副本的關係看,為了防止私意更改,這裏的田租籍當以記載應納田租為宜。

不論是田租籍還是墾田租簿,都與秦漢時期田租的徵收方式有關。秦漢時代的田租徵納有一定的程式,農作物成熟之前即須對民戶墾種土地的狀況作出統計,并對其土地確定相應的田租額。嶽麓秦簡《為吏治官及黔首》中言“度稼得租”,<sup>⑥</sup>即是說徵納田租之前須先進行“度稼”。“度稼”即是根據土地上相應的農作物確定其田租額。“度稼”的時間在作物收穫之前,一般是在五月份。秦及漢初,在調查墾田狀況的同時,官府會確定民戶應納的田租。

① 漢代戶籍八月算民後,鄉在製作戶籍呈報縣廷的同時也製作有《戶口簿》,如荊州松柏漢墓所出漢武帝早期的《二年西鄉戶口簿》。縣在統合各鄉之後會製作縣戶口簿上呈郡府,如天長紀莊西漢簡某縣《戶口簿》;准此,郡府上計中也會製作記載屬縣戶口狀況的戶口名簿,如平壤樂浪漢墓所出《樂浪郡初元四年縣別戶口多少集簿》及松柏漢簡所出的多種南郡的戶口簿籍。胡平生:《新出漢簡戶口名簿籍研究》,中國文化遺產研究院編《出土文獻研究》第 10 輯,北京:中華書局,2011,249-284 頁。

② 簡 331,《張家山漢墓竹簡[二四七號墓](釋文修訂本)》,54 頁。

③ 彭浩、陳偉、王藤元男主編:《二年律令與奏讞書——張家山二四七號漢墓出土法律文獻釋讀》,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223-225 頁。

④ 張榮強:《孫吳簡中的戶籍文書》,原載《歷史研究》2006 年第 4 期,收入其著《漢唐籍帳制度研究》,92 頁。

⑤ 參見臧知非《張家山漢簡所見西漢礦業稅收制度試析——兼談西漢前期“弛山澤之禁”及商人兼并農民問題》,《史學月刊》2003 年第 3 期;高敏《從張家山漢簡〈二年律令〉看西漢前期的土地制度——讀〈張家山漢簡〉札記之三》,《中國經濟史研究》2003 年第 3 期。

⑥ 朱漢民、陳松長主編:《嶽麓書院藏秦簡(壹)》,《為吏治官及黔首》第 10、11 簡,上海辭書出版社,2010,112-113 頁。



彭浩據嶽麓秦簡《數》及張家山漢簡《算數書》指出,田租的確定,首先須確定“稅田”的數量,并實測其面積,劃定稅田範圍,稱為“程田”;然後,測量“稅田”的“程”,“程”來自對稅田產量的測算。稅田的面積和應納之租與對應的“程”就是一種比例關係。在確定稅田上的作物種類和相應的“程”之後,就可得出應收的田租數量。稅田的田租及相關資料登記為“田租籍”。另外,彭浩還指出,《數》和《算數書》多見“誤券”“租誤券”,說明田租還需另記於券書。“誤券”“租誤券”之誤多是“程”所記租的出入,即計租單位的田租數錯誤:<sup>①</sup>

誤券 租禾誤券者,術(術)曰:毋升者直(置)稅田數以為實,而以券斗為一,以石為十,并以為法,如法得一步。其券有【斗】者,直(置)與(與)田步數以為實,而以券斗為一,以石為十,并以為法,如法得一步。其券有升者,直(置)與田步數以為實,而以券之升為一,以斗為十,并為法,如·【法】得一步。

(93-95)

租吳(誤)券 田一畝租之十步一斗,凡租二石四斗。今誤券二石五斗,欲益與其步數,問益與幾何。曰:九步五分步三而一斗。術(術)曰:以誤券為法,以與田為實。

(96-97)<sup>②</sup>

租誤券。田多若少,藉令田十畝,稅田二百冊步,三步一斗,租八石,·今誤券多五斗,欲益田,其述(術)曰:以八石五斗為八百。

(11)<sup>③</sup>

“度稼”之後,取程確定租額,劃定稅田範圍,據之製作租券,作為民戶農作物收穫後繳納田租的憑證,并兼具納稅通知的作用。<sup>④</sup>

“五月望”的時間節點與東漢時期“度田”的時間是一致的,東漢光武帝建武十五年詔稱:“詔下州郡檢核墾田頃畝及戶口年紀,又考實二千石長吏阿枉不平者”,詔書頒布於是年六月後,次年九月以“度田不實”的罪名將河南尹張伋等十餘人下獄。<sup>⑤</sup>武威旱灘坡東漢墓所

① 彭浩:《談秦漢數書中的“與田”及相關問題》。

② 誤券、租吳(誤)券條見《張家山漢墓竹簡[二四七號墓](釋文修訂本)》,145頁。

③ 朱漢民、陳松長主編:《嶽麓書院藏秦簡(貳)》,上海辭書出版社,2011,39頁。

④ 陳明光認為中國古代田租徵納之前,有一個納稅通知的環節,這一環節又以官方專門的簿書為依據,他認為《二年律令》的“田租籍”是記錄應納、已納田租數量的簿籍,“田租籍”藏於縣、鄉,鄉里的簿書應該兼有向納稅人下達納稅通知的作用。并認為走馬樓吳簡《嘉禾吏民田家莧》正是這一性質的券。陳明光:《中國古代的納稅與應役》,北京:商務印書館,2013,151-152頁。但據張榮強的研究,民戶在繳納田租後,官府會發給民戶相應的券書憑證,而後會由鄉吏將民衆繳納賦稅的券書進行匯總,呈報縣廷經田戶曹史進行檢校。《吏民田家莧》本質上是經田戶曹史檢校的鄉租稅簿。見張榮強《孫吳〈嘉禾吏民田家莧〉中的幾個問題》,原刊《中國史研究》2001年第3期,收入其著《漢唐籍帳制度研究》,295-298頁。長沙東牌樓東漢簡中有一枚關於租券的簽牌。關於其研究,參見莊小霞《東牌樓簡“中倉租券簽牌”考釋》,武漢大學簡帛研究中心主辦《簡帛》第5輯,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415-427頁。

⑤ 《後漢書》卷一下《光武帝紀下》,66頁。

出有建武十九年以前的度田律令：

鄉吏常以五月度田，七月舉畜害，匿田三畝以上坐。<sup>①</sup>

“度田”同樣常在五月進行。但“度田”與“度稼”却不同。“度稼”是在授田制下實行的。授田制下官府對民戶所占有的土地有直接的掌握，“度稼”須針對具體的土地確定不同的租額；而“度田”是在授田制廢弛、民衆尤其是豪強大姓隱匿土地的情況下展開的。由“度稼”到“度田”，田租徵收的方式也產生了變化，即由程租稅田制變爲了分品差額徵收制。《後漢書·秦彭傳》記載秦彭在漢章帝建初元年爲山陽太守時，“每於农月，親度頃畝，分別肥瘠，差爲三品，各立文簿，藏之鄉縣。於是奸吏跼蹐，無所容詐。彭乃上言，宜令天下齊同其制。詔書以其所立條式，班令三府，并下州郡。”<sup>②</sup>已有學者指出，實際上在秦彭之前田租徵收已經實行差額徵收制，如日本學者米田賢次郎推斷大約從西漢成帝建始元年（前32）起，開始根據年成將土地分爲三個等級徵收田租。<sup>③</sup>

五月的“度稼”“度田”無疑是鄉吏製作田租籍、墾田租簿的基礎調查。而製作成的“租券”則成爲民衆繳納田租的憑證。漢代的賦稅徵納由鄉吏負責，《續漢書·百官志》：

鄉置有秩、三老、游徼。本注曰：有秩，郡所署，秩百石，掌一鄉人；其鄉小者，縣置嗇夫一人。皆主知民善惡，爲役先後，知民貧富，爲賦多少，平其差品……又有鄉佐，屬鄉，主民收賦稅。<sup>④</sup>

從這則史料看，漢代鄉“主民收賦稅”，鄉吏負責徵收全鄉居民的賦稅，集中後統一上交縣廷。江陵鳳凰山漢簡可見鄉吏負責徵收算錢，但其他賦稅的徵納情況并不清楚，從吳簡嘉禾吏民田家莧來看，孫吳時期是民戶直接繳納田租入倉庫。民戶在繳納田租後，會將納稅憑證匯報於鄉吏，鄉吏將民戶佃田、賦稅繳納情況匯總成冊，上呈縣廷田戶曹史進行檢校。<sup>⑤</sup>縣廷根據鄉吏所呈報的匯總來統計年度內的已納、逋欠情況，並將其具體內容進行上計。上計時的墾田數據來自五月時的統計，而租稅情況則來自對該年度根據納稅情況製作的租稅簿，兩者是

① 武威地區博物館：《甘肅武威旱灘坡東漢墓》；李均明、劉軍：《武威旱灘坡出土漢簡考述——兼論“挈令”》。兩文均刊於《文物》1993年第10期。

② 《後漢書》卷七六《循吏列傳·秦彭傳》，2467頁。

③ [日]米田賢次郎：《漢代田租查定法管見》，姜鎮慶譯，收入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戰國秦漢史研究室編《簡牘研究譯叢》第2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7，272-294頁。楊振紅把田租徵收方式的轉變置於景武時期，她的這一看法來自對秦漢時期畝制的認識，見楊振紅《從新出簡牘看秦漢時期的田租徵收》一文。

④ 《續漢書·百官五》，《後漢書志》，3624頁。

⑤ 張榮強：《孫吳〈嘉禾吏民田家莧〉中的幾個問題》。

否還會登記在專門的“墾田租簿”上，暫且存疑。<sup>①</sup>

附記：本文在寫作過程中蒙導師張榮強先生悉心指導。拙稿曾報告於張老師“魏晉南北朝隋唐史基本問題”課堂、“新史料與新史學——武漢大學第三屆珞珈史學博士論壇”（2016年10月15日）及清華大學簡牘研讀班（2017年3月10日），老師、同學多有指正，審稿專家也指出本文的諸多問題。本文在修訂過程中對這些寶貴意見多有吸收，謹致謝忱！

<sup>①</sup> 可茲參照的是唐宋時的田簿及租稅簿。唐代諸州縣職田、公廩田所上有“白簿”與“黃籍”，《新唐書·食貨志》：“先是，州縣職田、公廩田，每歲六月以白簿上尚書省覆實；至十月輸送，則有黃籍，歲一易之。後不復簿上，唯授租清望要官，而職卑者稽留不付，黃籍亦不復更矣。德宗即位，詔黃籍與白簿皆上有司。”（《新唐書》卷五五《食貨五》，中華書局，1975，1400-1401頁）職田、公廩田屬於官田，六月所上“白簿”時農作物並未收穫，而到十月租稅輸納完畢後的“黃籍”則會反映當年的實收租稅情形。宋代的租稅簿有“空行簿”與“實行簿”兩種，“空行簿”是爲了“以待歲中催科”，是一種預製性質的簿書，“實行簿”與之相對，記錄政策措施實際落實完成情況。關於宋代租稅簿的研究參見戴建國《宋代籍帳制度探析——以戶口統計爲中心》，《歷史研究》2007年第3期；《宋代賦役徵差簿帳制度考述》，《歷史研究》2016年第3期。

## 秦漢時期的女爵和女戶

武漢大學歷史學院 馮聞文

**內容提要** 女子爵位和女性戶主問題是秦漢婦女史研究的重要內容，新出簡牘為探討秦漢時期的女子爵位和女性戶主身份提供了新材料。通過對里耶戶集計簡牘資料的分析可知，秦制中寡婦的比爵與漢制比子爵有所不同。出土漢律揭示，女性一般在無夫、喪夫，同時沒有繼承順位前列之人的情況下方能成為戶主。女性的戶主身份主要是為保障其所在家庭的財產不外流。女性戶主和女子爵位所起的主要作用是為家庭保持榮譽、財產等權利的過渡、接續。

**關鍵詞** 女子爵位 女性戶主 女戶

女子爵位和女性戶主的問題關乎秦漢時期女性的社會身份和地位，是秦漢婦女史研究的重要內容。其中，女子爵位的性質和女性戶主身份的獲得途徑是相關研究的重點。出土簡牘為相關制度細節的深入討論提供了可能。傳統觀點認為女子無爵，而可比爵。張家山漢簡《二年律令·置後律》則揭明女子可以承襲爵位。但對於女子擁有爵位是否為一普遍現象，學界認識不一。如劉敏認為秦漢時期女子可以占有爵位。<sup>①</sup> 王彥輝則認為女子有爵屬於特例。<sup>②</sup> 其中涉及對於出土簡牘中“關內侯寡”“大夫寡”身份的判斷。至於女性戶主的相關問題，從《二年律令》來看，女性戶主身份由繼承而來。其具體內容，前學在討論漢代繼承法

① 劉敏：《秦漢編戶民問題研究——以與吏民、爵制、皇權關係為重點》，北京：中華書局，2014，238-242 頁。

② 王彥輝：《張家山漢簡〈二年律令〉與漢代社會研究》，北京：中華書局，2006，119 頁。

時多有所歸納。<sup>①</sup>如尹在碩認為,秦漢時期婦女在沒有子嗣的娘家或是在夫家具有繼產承戶的權益。<sup>②</sup>但學界對於傳世文獻中“女子百戶”是否即女性戶主存在爭議。西嶋定生經文本分析認為非女性戶主,但因近年來出土簡牘中顯示秦漢社會中女性戶主的存在,學界多取“女子百戶”即女性戶主的觀點。<sup>③</sup>

## 一 里耶秦簡中的女戶

自2003年以來,里耶秦簡的部分材料得到披露。<sup>④</sup>學界對遷陵縣南陽里“戶版”及其家庭結構和小爵等問題做了充分討論,但對於零散的戶籍簡的研究則較少。<sup>⑤</sup>里耶秦簡(一)中有對邑中戶數的統計,“今見一邑二里:大夫七戶,大夫寡二戶,大夫子三戶,不更五戶,□□四戶,上造十二戶,公士二戶,從廿六戶。”<sup>⑥</sup>是按照戶主的身份等級進行排列和分類統計的。里耶簡中另有與此格式相似者,“□□二戶。大夫一戶。大夫寡三戶。不更一戶。小上造三戶。小公士一戶。士五(伍)七戶。司寇一[戶]。小男子□大女子□·凡廿五。”<sup>⑦</sup>亦依照身份等級排列和分類統計,而所見戶主的身份更為複雜。

里耶秦簡(一)中稱“戶人”者有:

### 1. 南里小女子苗,廿五年徙為陽里戶人大女嬰隸

(8-363+8-1504)

① 李均明:《張家山漢簡所見規範繼承關係的法律》,《中國歷史文物》2002年第2期。徐世虹:《張家山二年律令簡所見漢代的繼承法》,《政法論壇》2002年第5期。劉敏:《秦漢編戶民問題研究——以與吏民、爵制、皇權關係為重點》,189頁。王彥輝:《張家山漢簡〈二年律令〉與漢代社會研究》,111-121頁。

② 尹在碩:《秦漢婦女的繼產承戶》,《史學月刊》2009年第12期,115-125頁。

③ 于琨奇:《“賜女子百戶牛酒”解:兼論秦漢時期婦女的社會地位》,《中國歷史博物館館刊》1999年第1期。王彥輝:《張家山漢簡〈二年律令〉與漢代社會研究》,112頁。高凱:《從居延漢簡看漢代的“女戶”問題》,《史學月刊》2008年第9期。李欣:《秦漢時期“贅婿”和“女戶”的綜合考察》,《文博》2010年第2期。

④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湖南龍山里耶戰國—秦代古城一號井發掘簡報》,《文物》2003年第1期;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文物處:《湘西里耶秦代簡牘選釋》,《中國歷史文物》2003年第1期。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編著:《里耶發掘報告》,長沙:嶽麓書社,2007。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里耶秦簡(壹)》,北京:文物出版社,2012年。

⑤ 張榮強:《湖南里耶所出“秦代遷陵縣南陽里戶版”研究》,《北京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8年第4期。黎明釗:《里耶秦簡:戶籍檔案的探討》,《中國史研究》2009年第2期。陳絜:《里耶“戶籍簡”與戰國末期的基層社會》,《歷史研究》2009年第5期。邢義田:《龍山里耶秦遷陵縣城遺址出土某鄉南陽里戶籍簡試探》,簡帛網,2007年11月3日。劉瑞:《里耶古城北城壕出土戶籍簡牘的時代與性質》,《考古》2012年第9期。張春龍:《里耶簡所見的戶籍和人口管理》,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編《里耶古城·秦簡與秦文化研究》,北京:科學出版社,2009,188-195頁。

⑥ 陳偉主編:《里耶秦簡牘校釋(第一卷)》,武漢大學出版社,2012,297頁。戶主身份為“大夫子”亦較為特別。若是父死為後,依照《二年律令·置後律》,父死代戶,則大夫後子,父疾死的情況下爵位為簪褭,父死事的情況下爵位為大夫。若不為父後,依照《二年律令·傳律》,到傳籍年齡,則為公士。戶主為大夫子,可能是非父後,又未到傳籍年齡的析分之戶。

⑦ 陳偉主編:《里耶秦簡牘校釋(第一卷)》,32-33頁。



2. 東成戶人大夫印小臣邀, 廿六□ (8-1765)
3. □陵鄉成里戶人士五(伍)成隸□ (8-1813)
4. 南里戶人大夫寡茆。□ (8-1623)
5. 陽里戶人司寇寄□ (8-1946)
6. 成里戶人司寇宜□  
下妻齒。□ (8-1027)
7. 陽里戶人□□  
小妾無蒙□ (8-126)
8. 南里戶人大女子分□  
子小男子□□ (8-237)
9. 陽里戶人大夫刀。廿五年五月己丑朔[癸]□<sup>①</sup> (8-834+8-1609)

其中所見戶主的身份包括大夫、大夫寡、士伍、司寇、大女子。

從這些記錄戶主身份的簡來看, 女性為戶主的戶并不少。《二年律令·置後律》謂: “死毋子男代戶, 令父若母, 毋父母令寡, 毋寡令女, 毋女令孫, 毋孫令耳孫, 毋耳孫令大父母, 毋大父母令同產子代戶。”<sup>②</sup>據此, 劉敏認為女子成為戶主有四種情況,<sup>③</sup>簡言之, 即母親繼承兒子的戶主身份, 寡妻繼承丈夫的戶主身份, 女兒繼承父親的戶主身份, 同產姊妹繼承兄弟的戶主身份, 但前提是排在繼承順序前位的繼承人不在世。西嶋定生曾經指出漢代賞賜常見的“女子百戶”的“女子”并非戶主, 而“近於一般女性的用語”, 原因之一是他沿用沈欽韓的觀點, “女戶甚少, 百戶共賜, 如何分布?!”<sup>④</sup>而從里耶簡來看, 女戶雖然相對較少, 但有必要重新檢討秦漢時期女性戶主的具體情況。

“大夫寡”, 亦見於睡虎地秦簡《法律答問》: “大夫寡, 當伍及人不當? 不當。”<sup>⑤</sup>原釋文釋寡為少。伊強據湖北江陵毛家灣 1 號漢墓告地書“十二年八月壬寅朔己未, 建鄉疇敢告地下主, □陽關內侯寡大女精死, 自言以家屬、馬牛徙。今牒書所與徙者七三牒移。此家復不事。可令吏受數以從事, 它如律令。敢告主。”<sup>⑥</sup>業已指出大夫寡的寡當理解為寡婦。<sup>⑦</sup>劉欣寧認為“大夫寡”指已死大夫之寡婦, 或以大夫之寡婦為戶主之戶。<sup>⑧</sup>

① 陳偉主編:《里耶秦簡牘校釋(第一卷)》, 238、388、395、370、409、264、67、120、234 頁。

② 張家山二四七號漢墓竹簡整理小組:《張家山漢墓竹簡[二四七號墓]》, 北京:文物出版社, 2006, 60 頁。

③ 劉敏:《秦漢編戶民問題研究——以與吏民、爵制、皇權關係為重點》, 北京:中華書局, 2014, 189 頁。

④ [日]西嶋定生著, 武尚清譯:《中國古代帝國的形與結構——二十等爵制研究》, 北京:中華書局, 2004, 393 頁。

⑤ 睡虎地秦墓竹簡整理小組:《睡虎地秦墓竹簡》, 北京:文物出版社, 1990, 129 頁。

⑥ 劉國勝:《讀西漢喪葬文書札記》,《江漢考古》2011 年第 3 期。

⑦ 伊強:《小議睡虎地秦簡中的“大夫寡”》, 簡帛網, 2011 年 12 月 12 日。

⑧ 劉欣寧:《秦漢律令中的同居連坐》, 王沛主編《出土文獻與法律史研究》第 1 輯,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2, 149 頁。

大夫寡如何成為戶主？若據漢初《二年律令·置後律》推斷，寡婦成為戶主或是繼承戶主身份，“死毋子男代戶，令父若母，毋父母令寡”。或是析分為戶，寡“其不當為戶後，而欲為戶以受殺田宅，許以庶人予田宅”。此處仍得沾夫爵，可知其為戶當不屬於在丈夫死後分家自立的情況。

從字面上理解，“大夫寡”當指爵位為大夫男子的遺孀。但是否可以理解為寡婦自身具備了大夫爵呢？從戶集計來看，其位列大夫與大夫子之間，大夫子是不可能指具有大夫爵位的兒子，依照語言表達習慣，祇能理解為父親為大夫爵者之子。因而相應地，“大夫寡”也祇能理解為大夫之寡，即其先夫爵位為大夫。

那麼，“大夫寡”所標識的身份具體意味着什麼呢？《二年律令》顯示的情況較為複雜，稱“女子比其夫爵”，又有“寡為戶後，予田宅，比子為後者爵。”其中，“比夫爵”是丈夫生前的情形，“比子為後者爵”則是寡婦接替戶主身份的情形。值得注意的是，二者所指的爵等是有所差異的。若夫疾死，寡代戶，比子為後者爵，則要降級承襲，大夫寡所比爵當是簪裹一級。而在上述里耶簡戶集計中，大夫寡位列不更之前。不更是秦爵第四級，較簪裹高一級，若依照《二年律令》，大夫寡祇能排列於不更之後。因而，秦制或與漢制不同，寡婦承襲戶，其比爵的爵等較漢制高。

湖北荊州高臺墓所出編號為 M18:35 的木牘丙正面書：

新安戶人大女燕，關內侯寡。

大奴甲

大奴乙

大婢妨。家復，不筭(算)不徭。<sup>①</sup>

劉敏認為“成年女子燕是個具有關內侯爵位的寡婦”，<sup>②</sup>正與張朝陽認為里耶秦簡和荊州高臺漢墓中所見“關內侯寡”和“大夫寡”是具有相應爵位的寡婦的觀點相同。<sup>③</sup>此說不確，如上所論，當是燕的先夫是關內侯，這和燕自身具備關內侯這一爵位是不同的。先言明“戶人大女燕”，再說明“關內侯寡”，和上揭里耶簡戶集計的表達亦有所不同。里耶簡戶集計中記戶主直接記為“大夫寡”，則不言“大女”，應是戶集計以爵位為順序進行統計，比爵緊隨正爵之後。至於無爵、不沾爵的成年女性戶主則徑以“大女”稱之。由此，有必要重新梳理秦漢時期的女性戶主和女子爵位的相關問題。

① 湖北省荊州博物館：《荊州高臺漢墓》，北京：科學出版社，2000，222 頁。劉國勝：《江陵毛家園一號漢墓〈告地書〉牘補議》，簡帛網，2008 年 10 月 7 日。

② 劉敏：《秦漢編戶民問題研究——以與吏民、爵制、皇權關係為重點》，北京：中華書局，2014，239 頁。

③ 張朝陽：《中國早期民法的建構》，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14，118-122 頁。

## 二 女子比爵和女子爵的特例

《白虎通》中特別強調婦人無爵：

婦人無爵何？陰卑無外事，是以有三從之義：未嫁從父，既嫁從夫，夫死從子。故夫尊於朝，妻榮於室，隨夫之行，故《禮·郊特牲》曰：“婦人無爵，坐以夫之齒。”《禮》曰：“生無爵，死無諡。”《春秋》錄夫人皆有諡，何以知夫人非爵也？《論語》曰：“邦君之妻，君稱之曰夫人，國人稱之曰君夫人。”即令是爵，君稱之與國人稱之不當異也。<sup>①</sup>

是從稱謂與爵級身份的差異來說明女子無爵。至於女子比爵則具有附屬性、從屬性。《禮記·雜記》：“凡婦人，從其夫之爵位。”<sup>②</sup>《禮記·郊特牲》：“出乎大門而先，男帥女，女從男，夫婦之義由此始也。婦人者，從人者也：幼從父兄，嫁從夫，父死從子。”<sup>③</sup>《五經通義》：“婦人以隨從為義，故夫貴於朝，妻榮於室。”<sup>④</sup>因而女性的比爵，雖然具有身份性，但一般並不具有繼承性。

比爵亦見於《漢書·外戚傳》：

至武帝制婕妤、嬪娥、容華、充依，各有爵位，而元帝加昭儀之號，凡十四等云。昭儀位視丞相，爵比諸侯王。婕妤視上卿，比列侯。嬪娥視中二千石，比關內侯。容華視真二千石，比大上造。美人視二千石，比少上造。八子視千石，比中更。充依視千石，比左更。七子視八百石，比右庶長。良人視八百石，比左庶長。長使視六百石，比五大夫。少使視四百石，比公乘。五官視三百石。順常視二百石。無涓、共和、娛靈、保林、良使、夜者皆視百石。上家人子、中家人子視有秩斗食云。<sup>⑤</sup>

高級貴族女性有時能獲得一定的爵位。“案《漢書》婦人封侯者四：陰安之外，蕭何夫人為鄼侯，呂嬃為臨光侯，奚涓母疵為重平侯”。<sup>⑥</sup> 文獻所記分別為：

臣謹請陰安侯列侯頃王后。<sup>⑦</sup>

① [清]陳立：《白虎通疏證》卷一《爵》婦人無爵，北京：中華書局，1994，21-22 頁。

② 《禮記正義》卷四一《雜記》，[清]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北京：中華書局，1980，1556 頁上。

③ 《禮記正義》卷二六《郊特牲》，[清]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1456 頁下。

④ [唐]杜佑：《通典》卷一〇四，北京：中華書局，1988，2713 頁。

⑤ 《漢書》卷九七《外戚傳》，北京：中華書局，1962，3935 頁。

⑥ [清]錢大昭：《漢書辨疑》卷一，北京：商務印書館，1936，11 頁。

⑦ “陰安侯列侯頃王后”有二說，一蘇林、徐廣、韋昭以為陰安侯和頃王后是兩個人，蘇林指陰安侯是高帝兄伯妻羹頡侯信母，徐廣以為頃王后是代頃王劉仲之妻，二如淳則認為頃王后別封陰安侯，與《漢祠令》相合。《史記》卷一〇《文帝本紀》，北京：中華書局，2014，529 頁。

孝惠六年，樊噲卒，諡爲武侯。子伉代侯。而伉母呂嬃亦爲臨光侯。<sup>①</sup>

孝惠二年，何薨，諡曰文終侯。子祿嗣，薨，無子。高后乃封何夫人同爲鄼侯，小子延爲築陽侯。<sup>②</sup>

(奚涓)以舍人從起沛，至咸陽爲郎中，入漢，以將軍從定諸侯，侯，四千八百戶，功比舞陽侯。死事，母代侯。<sup>③</sup>

其中，以鄼侯爵位的傳承來看：

孝惠二年，何薨，諡曰文終侯。子祿嗣，薨，無子。高后乃封何夫人同爲鄼侯，小子延爲築陽侯。孝文元年，罷同，更封延爲鄼侯。薨，子遺嗣。薨，無子。文帝復以遺弟則嗣，有罪免。<sup>④</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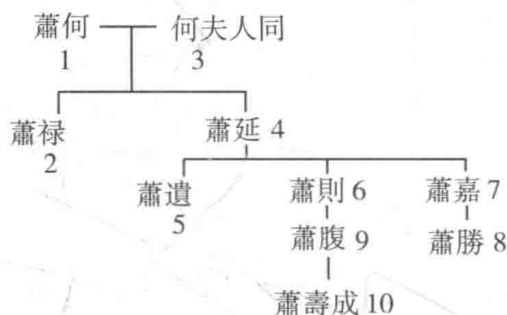


圖1 鄼侯的傳承

蕭何夫人同對鄼侯爵的承襲更像是一個特例，起到暫時保管家長爵位的功能。她是以寡母的身份，在其子蕭祿無子的情況下，繼承了蕭祿的爵位。奚涓母疵亦是以寡母的身份，在子奚涓無子的情況下，繼承了奚涓的爵位。因奚涓屬死事，其母疵的襲爵大抵如《二年律令·置後律》“母子男以女，母女以父，母父以母”。而像蕭何夫人同與呂嬃雖然都獲得了爵位，但同時都有子獲得爵位。同爲鄼侯，其小子延爲築陽侯。呂嬃爲臨光侯，其子伉乘樊噲爵爲舞陽侯。特別是同的鄼侯爵位在文帝元年即被罷，築陽侯蕭延改封爲鄼侯。也就不會對父傳子的基本爵位傳承秩序造成影響。

較爲特殊的是公主爵，《獨斷》：“帝之女曰公主，儀比諸侯。帝之姊妹曰長公主，儀比諸侯王。異姓婦女以恩澤封者曰君，比長公主。”<sup>⑤</sup>其特殊性不在於爵級高，而在於公主爵具有繼承性。《後漢書·皇后紀》載：

① 《史記》卷九五《樊鄼滕灌列傳》，3224 頁。

② 《漢書》卷三九《蕭何傳》，2012 頁。

③ 《史記》卷一八《高祖功臣侯者年表》，1089-1090 頁。《集解》引徐廣曰：“《漢書》云魯侯涓，涓死無子，封母疵。”

④ 《漢書》卷三九《蕭何傳》，2012-2013 頁。

⑤ [漢]蔡邕：《獨斷》卷上，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6 頁。

漢制，皇女皆封縣公主，儀服同列侯。其尊崇者，加號長公主，儀服同蕃王。諸王女皆封鄉、亭公主，儀服同鄉、亭侯。肅宗唯特封東平憲王蒼、琅邪孝王京女為縣公主。其後安帝、桓帝妹亦封長公主，同之皇女。其皇女封公主者，所生之子襲母封為列侯，皆傳國於後。鄉、亭之封，則不傳襲。<sup>①</sup>

李賢注謂：“馮定，獲嘉公主子，襲封獲嘉侯，馮奮，平陽公主子，襲封平陽侯，此其類也。”<sup>②</sup>獲嘉侯又見於《東觀漢記》：“馮石襲母公主，封獲嘉侯。”<sup>③</sup>據《馮魴傳》“子柱嗣，尚顯宗女獲嘉長公主，少為侍中，以恭肅謙約稱，位至將作大匠。柱卒，子定嗣，官至羽林中郎將。定卒，無子，國除。定弟石，襲母公主封獲嘉侯，亦為侍中，稍遷衛尉。”<sup>④</sup>可知當為《後漢書》注誤。另外，承襲母公主爵位的還有如西漢館陶公主劉嫖和堂邑侯陳午之子陳蟠“以長公主嫖子侯”<sup>⑤</sup>。而“(鄧)褒尚安帝妹舞陰長公主，桓帝時為少府，褒卒，長子某嗣，少子昌襲母爵為舞陰侯拜黃門侍郎”，<sup>⑥</sup>也是長子襲父爵，次子襲母公主爵。也有以長子襲母公主爵，以次子襲父爵的。《後漢書·鄧晨傳》：“光武即位，封晨房子侯。帝又感悼姊沒於亂兵，追封諡元為新野節義長公主，立廟於縣西，封晨長子汎為吳房侯，以奉公主之祀。”<sup>⑦</sup>是鄧晨長子繼承母親劉元的爵位為侯，以奉其祭祀。而鄧晨的爵位則由少子鄧棠繼承。三國時，魏之公主爵具有繼承性，“太和六年，明帝愛女淑薨，追封諡淑為平原懿公主，為之立廟。取後亡從孫黃與合葬，追封黃列侯，以夫人郭氏從弟德為之後，承甄氏姓，封德為平原侯，襲公主爵。”<sup>⑧</sup>

普通女子則應當無爵。《墨子·號令》載：

其疾門却敵於術，敵下終不能復上，賜上奉。而勝圍，城周里以上，封城將三十里地為關內侯，輔將如今賜上卿，丞及吏比於丞者賜爵五大夫，官吏、豪傑與計堅守者十人，及城上吏比五官者皆賜公乘，男子有守者爵，人二級，女子賜錢五千，男女、老少無分守者，人賜錢千，復之三歲（無有所與，不租稅），此所以勸民吏堅守勝圍也。<sup>⑨</sup>

男子和女子賞賜不同，男賜爵而女賜錢即可證女子無爵。

《二年律令·置後律》已明晰疾死置後，爵後祇能是子男：

① 《後漢書》卷一〇下《皇后紀》，北京：中華書局，1965，457頁。

② 《後漢書》卷一〇下《皇后紀》，457頁。

③ [漢]劉珍等撰，吳樹平校注：《東觀漢記校注》卷一五，北京：中華書局，2008，600頁。

④ 《後漢書》卷三三《馮魴傳》，1149頁。

⑤ 《史記》卷一九《惠景間侯者年表》，1214頁。

⑥ 《後漢書》卷一六《鄧寇傳》，606頁。

⑦ 《後漢書》卷一五《鄧晨傳》，583頁。

⑧ 《三國志》卷五《魏書·后妃傳》，北京：中華書局，1959，163頁。

⑨ 岑仲勉：《墨子城守各篇簡注》，北京：中華書局，1958，104頁。



疾死置後者，微侯後子爲微侯，其毋嫡子，以孺子□□□子。關內侯後子爲關內侯，卿侯後子爲公乘，五大夫後子爲公大夫，公乘後子爲官大夫，公大夫後子爲大夫，官大夫後子爲不更，大夫後子爲簪裹，不更後子爲上造，簪裹後子爲公士，其毋嫡子，以下妻子、偏妻子。<sup>①</sup>

這裏明確上一代有爵者自然死亡，爵後祇能爲子男。《漢書·平帝紀》：“又令諸侯王、公、列侯、關內侯亡子而有孫若子同產子者，皆得以爲嗣。”<sup>②</sup>子同產子是指養兄弟之子爲子。閻愛民認爲至此，承爵的範圍纔擴及侄、孫的範疇。<sup>③</sup>女性承襲爵位，祇能是當爲死事如今之烈士者置後之時，因獎掖事功，避免其爵位的繼承中斷，而在爵的繼承序列中加入了子男之外的親屬。

□□□□爲縣官有爲也，以其故死若傷二旬中死，皆爲死事者，令子男襲其爵。毋爵者，其後爲公士。母子男以女，母女以父，母父以母，母母以男同產，母男同產以女同產，母女同產以妻。諸死事當置後，母父母、妻子、同產者，以大父，母大父以大母與同居數者。<sup>④</sup>

馮卓慧指出“漢代的繼承分爲身份繼承與財產繼承”，<sup>⑤</sup>王彥輝認爲“身份繼承由法律予以規範，可以分爲爵位繼承和戶主繼承”。<sup>⑥</sup>戶後的繼承序列涉及的親屬較多。戶後和爵後不應當混淆。一般情況下，寡婦雖然代戶成爲戶主，但是不能承襲爵位。

吳簡中顯示的女子既是戶主又擁有爵位的情況：

高遷里戶人公乘大女侯葵年六十	(1·7804)
曼漚里戶人公乘大女黃客年五十算一	(1·8500)
戶人公乘大女朱妾年五十二	(1·8517)
小尚(?)里戶人公乘大女五西年□□算一	(1·10496) <sup>⑦</sup>

張朝陽據“爲人妻者不得爲戶”，推斷她們皆是寡婦。<sup>⑧</sup>然而亦有非寡婦女子繼承戶主身份的可能。如高敏認爲：“孫吳時期長沙郡地區推行賜爵制的顯著特徵之一”，是成爲戶主的婦

① 張家山二四七號漢墓竹簡整理小組：《張家山漢墓竹簡〔二四七號墓〕》，59頁。

② 《漢書》卷一二《平帝紀》，349頁。

③ 閻愛民：《湊聚之道：古代的家庭與社會群體》，天津古籍出版社，2012，14頁。

④ 張家山二四七號漢墓竹簡整理小組：《張家山漢墓竹簡〔二四七號墓〕》，59頁。

⑤ 馮卓慧：《漢代民事經濟法律制度研究》，北京：商務印書館，2014，129頁。

⑥ 王彥輝：《張家山漢簡〈二年律令〉與漢代社會研究》，北京：中華書局，2006，86頁。

⑦ 長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中國文物研究所、北京大學歷史系走馬樓竹簡整理組編著：《長沙走馬樓三國吳簡·竹簡（壹）》，北京：文物出版社，2003，釋文1056、1071、1110頁。

⑧ 張朝陽：《中國早期民法的建構》，120頁。

女“通過給‘爲父後者’賜爵的慣例而獲得賜爵”。<sup>①</sup> 沈剛認爲：“或者也可以理解爲，相對漢代嚴格的女子無爵而言，此時已顯示出賜爵制度發生紊亂”。<sup>②</sup> 楊振紅認爲：“由於戶主的爵位身份直接關係到其戶負擔賦役與否以及法律權益等等，因此，當女性爲戶主時也參照男性戶主賜予爵位。”<sup>③</sup>這可能是由於比爵除了標明女子本應無爵，女性身份的附屬性外，不具備其他制度意義造成的。

### 三 女性戶主的若干問題

《二年律令》對女子繼承戶主身份和獨立爲戶的具體情況進行了規定。《二年律令·置後律》和《二年律令·戶律》載：

寡爲戶後，予田宅，比子爲後者爵。其不當爲戶後，而欲爲戶以受殺田宅，許以庶人予田宅。母子，其夫；夫母子，其夫代爲戶。夫同產及子有與同居數者，令毋買賣田宅及入贅。其出爲人妻若死，令以次代戶。

孫爲戶，與大父母居，養之不善，令孫且外居，令大父母居其室，食其田，使其奴婢，勿買賣。孫死，其母而代爲戶。另毋敢逐夫父母及入贅，及道外取其子財。<sup>④</sup>

第一段簡文說明女子喪偶的三種去向，分別是爲戶後而代戶、不爲戶後而析分爲戶和再嫁。“其不當爲戶後，而欲爲戶以受殺田宅，許以庶人予田宅。”依照戶的繼承序列，因有列於前位的繼承人，寡婦無資格代戶的，但希望別立戶爲戶主的，不能比子爲後者爵，而祇能以庶人的身份給予田宅。“母子，其夫；夫母子，其夫而代爲戶。”別立爲戶，不干擾其先夫家庭的繼承序列的前提下，寡婦便可再次組建家庭，後夫則贅入這一新立的戶之下。對“夫同產及子有與同居數者，令毋買賣田宅及入贅。其出爲人妻若死，令以次代戶”的含義，學界存在分歧。主要是針對夫指其先夫，還是其招贅的後夫，及“令毋買賣田宅及入贅”針對的是寡婦還是“夫同產及子有與同居數者”。臧知非認爲“這裏的夫指後夫”，<sup>⑤</sup>“令毋買賣田宅”是針對後

① 高敏：《從〈長沙走馬樓三國吳簡·竹簡·壹〉看孫權時期的賜爵制度實況》，《中州學刊》2005年第4期。

② 沈剛：《長沙走馬樓三國竹簡研究》，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3，190頁，注2。

③ 楊振紅：《吳簡中的吏、吏民與漢魏時期官、吏的分野》，《出土簡牘與秦漢社會（續編）》，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5，77頁。

④ 張家山二四七號漢墓竹簡整理小組：《張家山漢墓竹簡〔二四七號墓〕》，61、55頁。

⑤ 臧知非：《張家山漢簡所見西漢繼承制度初論》，文史哲編輯部編《早期中國的政治與文明》，北京：商務印書館，2011，260頁。

夫的兄弟姐妹及其子女。<sup>①</sup>此說不確。當如魯家亮、李恒全等所論。<sup>②</sup>寡婦為戶主,如果和先夫的同產和同產之子共同生活,不能賣田宅和招贅。另外,尹灣漢簡中“臣請寡代戶者得以同居,毋次以不同居長者代”。<sup>③</sup>李解民將“寡代戶”理解為代寡婦為戶,不妥。<sup>④</sup>當如賈麗英所說“寡夫、寡婦代戶,也應該是同居優先”。<sup>⑤</sup>是細化對寡代戶的規定。

第二段簡文則是寡母代戶的情形。父死,子代戶,子又死,其寡母代戶,但家中有夫之父母,那麼,也不能招贅。即當先夫的繼承序列中仍有共同生活者,寡婦雖然代戶,但不能變易先夫財產。“其出為人妻若死,令以次代戶。”寡婦代戶後,若出嫁為人妻或者死亡,即原繼承序列的親屬依次繼承。這說明寡婦雖然經由代戶即繼承的程式成為戶主,但不能改變原有的繼承序列。寡婦代戶的意義是不使戶終絕,對其夫家而言是過渡性的,而寡婦作為戶主,仍需繼續履行其在家庭中贍養公婆、奉祭祀的職責。

還有一種女子為戶主的情況,並不屬於寡婦代戶或析分為戶。《二年律令·置後律》:“女子為戶毋後而出嫁者,令夫以妻田宅盈其田宅。宅不比,弗得。其弃妻,及夫死,妻得復取以為戶。弃妻,畀之其財。”<sup>⑥</sup>彭浩等將其改讀為“女子為戶,毋後而出嫁者”。<sup>⑦</sup>對於原釋文“女子為父母後出嫁者”,<sup>⑧</sup>楊振紅釋為“女子在出嫁前已成為其父母之‘後’”,“女子作為女方家庭的繼承人出嫁”,<sup>⑨</sup>雖經改訂,但一般仍認為女子為戶,指未嫁女,而非寡婦。這條律文與其是否為父母之後、女方家庭的繼承人無關。張朝陽推測如果女子為戶而有後,那麼則將戶產轉移給後,不帶入夫家。<sup>⑩</sup>依據前兩種情形中女性戶主在家庭中充當的過渡職能來看,張氏之說較為可信。

① 臧知非:《秦漢賦役與社會控制》,西安:三秦出版社,2012,51頁。

② 魯家亮:《張家山漢簡〈二年律令〉中的“分戶”與“代戶”》,四川大學歷史文化學院編《紀念徐中舒誕辰110周年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成都:巴蜀書社,2010,274頁。

③ 連雲港市博物館等:《尹灣漢墓簡牘》,北京:中華書局,1997,118頁。

④ 李解民:《揚州儀征胥浦簡書新考》,長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編《長沙三國吳簡暨百年來簡帛發現與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北京:中華書局,2005,456頁。

⑤ 賈麗英:《秦漢律簡“同居”考論》,王健主編《秦漢歷史文化的前沿視野:第二屆中國秦漢史高層論壇文集》,北京:知識產權出版社,2015,186頁。

⑥ 張家山二四七號漢墓竹簡整理小組:《張家山漢墓竹簡[二四七號墓]》,61頁。

⑦ 彭浩、陳偉、[日]工藤元男:《二年律令與奏讞書——張家山二四七號漢墓出土法律文獻釋讀》,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237頁。

⑧ 張家山漢簡研讀班:《張家山漢簡〈二年律令〉校讀記》,張家山二四七號漢墓竹簡整理小組《張家山漢墓竹簡[二四七號墓]》,222頁。

⑨ 彭衛、楊振紅著:《中國婦女通史(秦漢卷)》,杭州出版社,2010,93頁。

⑩ 張朝陽:《中國早期民法的建構》,122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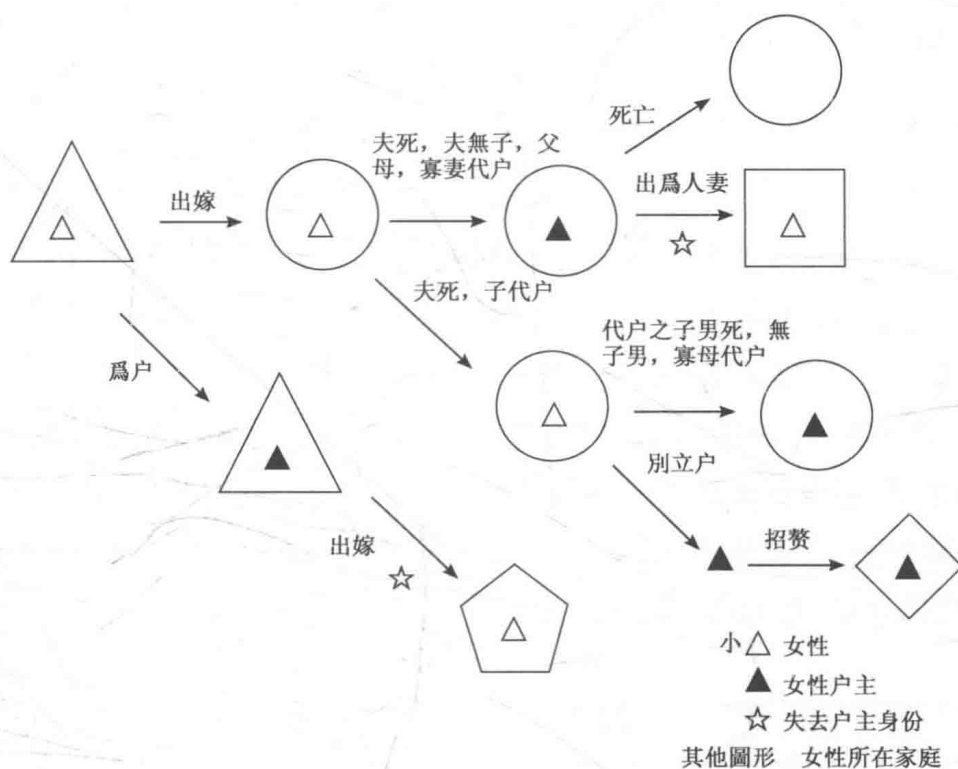


圖2 女子戶主身份的獲得與失去

《二年律令·收律》：“夫有罪，妻告之，除於收及論；妻有罪，夫告之，亦除其夫罪。毋夫，及為人偏妻，為戶若別居不同數者，有罪完春、白粲以上，收之，毋收其子。”<sup>①</sup>南玉泉釋為“女子無夫，及為人偏妻，與家人分開居住，不在同一戶籍的，犯有完春與白粲以上罪的，仍要被收，但不收其子”。<sup>②</sup>韓樹峰認為“婦女既然已被判完春與白粲，成為刑徒，却又規定將其收為奴婢。難道婦女被判此刑後，都要成為奴婢嗎？”<sup>③</sup>“收之”，當指收其卑幼、財物、田宅為官有。而子不收，如張伯元所說“偏房之子不收，其子歸於男主人”。<sup>④</sup>值得注意的是，律文亦涉及女子為獨立的戶主的情況，“毋夫，及為人偏妻，為戶若別居不同數者”，女性戶主，在非共同生活的事實性婚姻關係中，可以保持其戶主的身份，相應地也和男性戶主一樣，需要獨立承擔法律責任。《戶律》揭示了已婚女性不得著錄為戶人的原則，“為人妻者不得為戶”。<sup>⑤</sup>若不為戶主，出嫁，則喪失著錄為獨立戶主的權力；若先著錄為獨立戶主，其後出嫁，則會喪失原有的戶主身份。

結合漢律中的上述規定可知，未嫁者可繼承戶主身份；女性在特殊的婚姻關係中，如招

① 張家山二四七號漢墓竹簡整理小組：《張家山漢墓竹簡[二四七號墓]》，32頁。

② 南玉泉：《中華法律文明探賾》，北京：華齡出版社，2005，178頁。

③ 韓樹峰：《漢魏法律與社會——以簡牘、文書為中心的考察》，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0，55頁。

④ 張伯元：《出土法律文獻研究》，北京：商務印書館，2005，136頁。

⑤ 張家山二四七號漢墓竹簡整理小組：《張家山漢墓竹簡[二四七號墓]》，54頁。

贅、爲人偏妻,仍可保持户主身份。喪偶後,女性則有可能繼承户主身份,或選擇析分爲户。

#### 四 賜物令中的女子百户

易與女性户主問題相聯繫的是傳世文獻中的“女子百户”。對於“女子百户”的“女子”何解,存有數說,分別釋爲所有女性、女性户主、男性户主的妻子。樂彥認爲是“婦人無夫或無子不沾爵,故賜之。”<sup>①</sup>《漢舊儀》云:“立皇后、太子……賜天下男子爵;女子牛酒繒帛,夫增秩。”<sup>②</sup>“蘇林曰,男賜爵,女子賜牛酒。姚察云,女子謂賜爵者之妻”。<sup>③</sup>李賢則認爲:“此女子百户,若是户頭之妻,不得更稱爲户;此謂女户頭,即今之女户也。天下稱慶,恩當普洽,所以男户賜爵,女子賜牛酒。”<sup>④</sup>從史書記載來看,既有言“賜女子百户者”(見表一),也有不限於女子,而言“賜吏民百户、五十户”者(見表二)。

表一 賜女子百户

時間	原因	內容	備注
文帝初(前180)	文帝即位	女子百户牛酒	《漢書·文帝紀》
武帝元鼎四年(前113)	行幸雍	女子百户牛酒	《漢書·武帝紀》
元封元年(前110)	登封泰山	女子百户牛酒	同上
宣帝本始元年(前73)	祥瑞	女子百户牛酒	《漢書·宣帝紀》
本始二年(前72)	尊武帝廟爲世宗廟	女子百户牛酒	同上
元康元年(前65)	祥瑞	女子百户牛酒	同上
元康二年(前64)	同上	女子百户牛酒	同上
元康三年(前63)	同上	女子百户牛酒	同上
元康四年(前62)	同上	女子百户牛酒	同上
神爵元年(前61)	同上	女子百户牛酒	同上
神爵四年(前58)	同上	女子百户牛酒	同上
五鳳三年(前55)	匈奴來降、祥瑞	女子百户牛酒	同上
甘露二年(前52)	祥瑞	女子百户牛酒	同上
元帝初元二年(前47)	行幸甘泉、郊泰	女子百户牛酒	《漢書·元帝紀》

① 《史記》卷一〇《文帝本紀》“女子百户牛酒”句下司馬貞《索隱》引樂彥語,530頁。

② [漢]衛宏:《漢舊儀》卷下,[清]孫星衍輯《漢官六種》,北京:中華書局,1990,77頁。

③ 《後漢書》卷三《章帝紀》“加賜河南女子百户牛酒”李賢注引《前書音義》,152頁。

④ 《後漢書》卷三《章帝紀》“加賜河南女子百户牛酒”李賢注,152頁。



續表

時間	原因	內容	備注
初元四年(前45)	行幸河東、祠後土	女子百戶牛酒	同上
永光元年正月(前43)	行幸甘泉、郊泰	女子百戶牛酒	同上
永光元年二月	大赦天下	女子百戶牛酒	同上
永光二年(前42)	同上	女子百戶牛酒	同上
建昭五年(前34)	同上	女子百戶牛酒	同上
成帝鴻嘉元年(前20)	理冤獄	女子百戶牛酒	《漢書·成帝紀》
永始四年正月(前13)	行幸甘泉、郊泰	女子百戶牛酒	同上
永始四年三月	行幸河東、祠後土	女子百戶牛酒	同上

表二 賜五十戶、百戶

時間	原因	內容	範圍
漢武帝元封二年(前109)六月	祥瑞	百戶牛酒	雲陽都
昭帝始元元年(前86)秋七月		百戶牛酒	民
元鳳四年(前77)春正月	帝加元服	牛酒各有差	吏民
元帝初元元年(前48)夏四月	災害	五十戶牛酒	吏民
初元五年(前44)夏四月	災害	五十戶牛酒	吏民
成帝建始元年(前32)二月		五十戶牛酒	吏民
鴻嘉元年(前20)春二月		百戶牛酒	昌陵縣
元延四年(前9)三月	祥瑞	賜牛酒	長安民
綏和二年(前7)三月	即位	百戶牛酒	吏民

《後漢書·章帝紀》：“《經》曰：‘無侮鰥寡，惠此滫獨。’加賜河南女子百戶牛酒。”<sup>①</sup>似有邏輯關係。如“地節三年春三月詔，鰥、寡、孤、獨、高年、貧困之民，朕所憐也。前下詔假公田，貸種、食。其加賜鰥、寡、孤、獨、高年帛”。<sup>②</sup>皆先叙其因由，再論其舉措。因而王先謙認為李賢女戶主之說有理。<sup>③</sup>西嶋定生認為“賜河南女子以百戶牛酒一事，與哀矜鰥寡滫獨并無關係。”<sup>④</sup>而其對“女子百戶”的“百戶”之解讀，證明不應將其限定為女性戶主。賜牛酒的對象限定為女性，是為強化賜爵的旨趣。于琨奇則認為賜爵的對象是男戶主，賜牛酒的對象

① 《後漢書》卷三《章帝紀》，152 頁。

② 《漢書》卷八《宣帝紀》，248 頁。

③ 王先謙：《漢書補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162 頁。

④ [日]西嶋定生著，武尚清譯：《中國古代帝國的形與結構——二十等爵制研究》，391 頁。

是女户主,其依據就在於當與男户主受爵對稱。若是受爵男性家庭中的所有女性獲得賞賜,而同一户中的男性,則不能獲利,同时户主為女性的家庭亦不能由此獲利。<sup>①</sup> 此說不能解釋為何史籍中有不以女子為限定的賜百户、五十户牛酒,亦不能解釋為什麼以百户或五十户為單位進行賞賜。<sup>②</sup> 西嶋定生業已指出女子百户指代的女性“是更廣大的婦女”。<sup>③</sup> 雖然沒有指明,但已經揭示了賞賜的對象是一里或半里的所有女性。



圖3 偃師辛莊壁畫墓宴飲圖

(引自張國標《中原文化大典·文學藝術典·繪畫》,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8,49頁)

李志剛在《周代宴饗禮的功能》一文中指出:“婦人能參與宴饗之禮,是見於文獻記載的。”<sup>④</sup> 西嶋嘗通過鄉飲酒禮、社祭來說明賞賜女子百户牛酒的功能和其具體實施方法。《禮記·內則》“七年男女不同席,不共食。”<sup>⑤</sup> 賜吏户牛酒,男女分席飲食。漢墓宴飲圖的一種構圖方式即男女主人分開,男主人一邊全為男性,女主人一邊全為女性。<sup>⑥</sup> 如偃師辛莊壁畫墓宴飲圖,對立的兩面牆壁上一面所繪全為女性,一面全為男性(見圖3)。

① 于琨奇:《“賜女子百户牛酒”解:兼論秦漢時期婦女的社會地位》,《中國歷史博物館館刊》1999年第1期。

② 西嶋定生認為漢代的裏原則上為一百户,引宮崎市定《後漢書·百官志》本注“里魁掌一里百家”,沈約《宋書》卷四〇《百官志》稱漢制是十什為里,[日]西嶋定生著,武尚清譯:《中國古代帝國的形與結構——二十等爵制研究》,395頁。《鶡冠子》“五家為伍,伍為之長,十伍為里。”里的戶數為50戶。里耶簡中記錄一縣三鄉152戶。陳偉主編:《里耶秦簡牘校釋》(第一卷),345-346頁。馬王堆帛書《駐軍圖》顯示里的戶數平均為每里28戶,參見魯西奇《城牆內外:古代漢水流域城市的形態與空間結構》,北京:中華書局,2011,134-135頁。

③ [日]西嶋定生:《中國古代帝國的形與結構——二十等爵制研究》,438頁。

④ 李志剛:《周代宴饗禮的功能》,《古代文明》2012年第4期。

⑤ 《禮記正義》卷二八《內則》,[清]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1471頁中。

⑥ 汪小洋:《漢墓壁畫的宗教信仰及圖像表現》,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100頁。

賜女子百戶牛酒就是以百戶為單位對女性進行賞賜，每百戶賞賜一頭牛，十石酒，而不區分其歸屬的是男性戶主或女性戶主的家庭。按照西嶋之說，女性依據男性戶主的爵位進行飲宴，可使寡婦、未嫁女都能依據子或父的身份而獲得恩賞。事實上，以一里或半里的所有女性為對象，則戶主為女性的家庭亦在其中，賞賜女子百戶兼及樂彥所說的無夫無子不沾爵的女性，彌補爵制次序的缺陷，而并非完全用來強化爵制次序。

綜上所述，女子無爵仍應視為秦漢社會的主流。從里耶戶集計簡牘資料來看，在丈夫死後，寡婦的比爵應與漢制比子爵不同。《漢書》中幾例女子對爵位的承襲與《二年律令·置後律》的繼承順序吻合。通常女性在無夫、喪夫，同時沒有繼承順位前列之人的情況下方能成為戶主，招贅祇有在避免父家、先夫家絕後的情況下進行，成為戶主的女性有義務保障其所在家庭的財產不外流。女性戶主和女子爵位所起的主要作用是為家庭保持榮譽、財產等權利的過渡、接續。

## 秦漢《亡律》“舍匿罪人”探析

湖南大學嶽麓書院 陳松長 劉欣欣

**內容提要** 秦漢《亡律》中,“舍匿罪人”包括“舍罪人”和“匿罪人”兩種情況,這兩者的一個重要區別是舍匿者是否“知其情”,“舍罪人”經常還有一定的時間期限規定。另外,舍匿者所受的刑罰與被舍匿者的身份有密切關係。漢初對“舍匿罪人”的處罰比秦更為嚴厲,可能與當時的社會環境有很大關係。

**關鍵詞** 秦漢 《亡律》 舍匿罪人

秦漢時期社會逃亡現象嚴重,官府為了控制逃亡現象,不僅對逃亡者施行刑罰,而且禁止舍匿罪人的行為。現已公布的秦漢《亡律》除了規定對各種逃亡行為的刑罰外,還有相當篇幅的律文規定了對舍匿罪人行為的刑罰,如嶽麓秦簡《亡律》1966/001 簡規定:“匿罪人當貲二甲以上到贖死,室人存而年十八歲以上者,貲各一甲,其奴婢弗坐,典、田典”;<sup>①</sup>張家山漢簡《二年律令·亡律》167 簡規定:“匿罪人,死罪,黥為城旦舂,它各與同罪。其所匿未去而告之,除。諸舍匿罪人,罪人自出,若先自告,罪減,亦減舍匿者罪。”<sup>②</sup>傳世文獻中也有類似記載,如《史記·季布欒布列傳》曰:“季布者,楚人也,為氣任俠,有名於楚。項籍使將兵,數窘漢王,及項羽滅,高祖購求布千金,敢有舍匿,罪及三族。”<sup>③</sup>《漢書·淮南衡山濟北王傳》曰:

① 陳松長主編:《嶽麓書院藏秦簡(肆)》,上海辭書出版社,2015,39 頁。

② 彭浩、陳偉、[日]工藤元男主編:《二年律令與奏讞書:張家山二四七號漢墓出土法律文獻釋讀》,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157 頁。

③ 《史記》卷一〇〇《季布欒布列傳》,北京:中華書局,1959,2729 頁。

“亡之諸侯，游宦事人，及舍匿者，論皆有法。”顏師古注：“舍匿謂容止而藏隱也。”<sup>①</sup>

關於“舍匿罪人”的行爲，學術界已經有一些研究成果，但大多局限於對其含義的探討，對“舍匿罪人”的刑罰原則和秦漢《亡律》對“舍匿罪人”處罰的不同之處鮮有論及。本文主要依據出土文獻所見秦漢《亡律》中有關“舍匿罪人”的律文，結合傳世文獻相關記載，對秦漢《亡律》中的“舍匿罪人”做一考察。

## 一 “舍匿罪人”的含義

關於秦漢逃亡犯罪中的“罪人”與“亡人”身份之別，在嶽麓秦簡《亡律》公布之前已有學者對此作出分析，如張功先生提出犯罪者爲了躲避懲罰而逃亡，即“罪人亡”；民衆流亡則是普通民衆在沒有犯罪的前提下，因爲各種原因脫籍亡命。<sup>②</sup> 嶽麓秦簡《亡律》“亡不仁邑里、官”這組律文中規定了對“奴婢之母（無）罪者”逃亡的刑罰規範，嶽麓秦簡整理小組注釋“毋（無）罪者”是除逃亡外無其他罪者，<sup>③</sup>說明有的逃亡者除了逃亡外還有其他犯罪行爲。張家山漢簡《二年律令·亡律》168-169簡：“取（娶）人妻及亡人以爲妻，及爲亡人妻，取（娶）及所取（娶），爲謀（媒）者，智（知）其請（情），皆黥以爲城旦舂。其真罪重，以匿罪人律論。弗智（知）者不□”，<sup>④</sup>張家山漢簡整理小組注釋“真罪”是亡人本身之罪，<sup>⑤</sup>說明逃亡者在逃亡犯罪之前已有其他犯罪行爲，有“真罪”而逃亡之人的行爲屬於“罪人亡”。本文中“舍匿罪人”的“罪人”，其身份既包括僅犯逃亡罪的逃亡者，也包括先犯罪後逃亡的逃亡者，即“亡罪人”。

關於“舍匿罪人”的含義，張家山二四七號漢墓竹簡整理小組對“舍匿”的注釋爲：“舍匿，匿於家中。”<sup>⑥</sup>，其觀點是受顏師古“舍匿謂容止而藏隱也”這種說法的影響，將“舍匿”作

① 《漢書》卷四四《淮南衡山濟北王傳》，北京：中華書局，1962，2139、2140頁。

② 張功：《秦漢逃亡犯罪研究》，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2006，1頁。

③ 陳松長主編：《嶽麓書院藏秦簡（肆）》，75頁。

④ 彭浩、陳偉、[日]工藤元男主編：《二年律令與奏讞書：張家山二四七號漢墓出土法律文獻釋讀》，157頁。

⑤ 張家山二四七號漢墓竹簡整理小組：《張家山漢墓竹簡[二四七號墓]（釋文修訂本）》，北京：文物出版社，2006，31頁。

⑥ 張家山二四七號漢墓竹簡整理小組：《張家山漢墓竹簡[二四七號墓]（釋文修訂本）》，31頁。



爲一個詞語來解釋。對此,學界還有不少學者持類似觀點。<sup>①</sup>其中,閆曉君先生提出“舍匿罪人”屬於兩種犯罪情形,實指在知情的情況下舍匿犯罪和“不智(知)其亡”的情況下舍亡人。<sup>②</sup>但是,也有學者對此提出異議。如周海鋒先生明確提出“舍亡人”指給亡人提供住所,與“匿亡人”的性質不同,“匿”是故意隱藏,所以罪行也更重。<sup>③</sup>嶽麓秦簡整理小組注釋“諸舍匿罪人”是“匿罪人”和“舍罪人”等多類行爲的合稱。<sup>④</sup>筆者認爲,“舍罪人”和“匿罪人”都有隱藏罪人之意,但在秦漢《亡律》中,“舍罪人”和“匿罪人”分別指代不同性質的隱藏逃亡罪人的犯罪行爲,兩者之間含義不同。

嶽麓秦簡《亡律》:取罪人、群亡人以爲庸,智(知)其請(情),爲匿之;不智(知)其請(情),取過五日以上,以舍罪人律論之。(2012/075)<sup>⑤</sup>

僱傭罪人、群亡人勞動是隱藏罪人的一種方式,根據嶽麓秦簡 2012 簡的規定,舍匿者在“知其情”的情況下“取罪人、亡人以爲庸”的視爲“匿罪人”行爲論罪;<sup>⑥</sup>如果舍匿者“不知其情”且取過五日以上,就定性爲“舍罪人”。秦律中已分別出“舍罪人”和“匿罪人”的不同,這是因爲“舍罪人”和“匿罪人”的刑罰有輕重之別,下文將對此進行論述。

根據前引《二年律令》168-169 簡的規定,娶亡人爲妻是隱藏逃亡者的一種特殊方式,針對舍匿者在“知其情”的情況下娶亡人爲妻的行爲,如果亡人本身所犯之罪較重,律條將這種行爲定性爲“匿罪人”。

張家山漢簡《二年律令·亡律》:諸舍亡人及罪人亡者,不智(知)其亡,盈五日以上,所舍罪當黥<sub>一</sub>贖耐;完城旦舂以下到耐罪,及亡收、隸臣妾、奴婢亡盈十二月以上,贖

① 李力先生在《“隸臣妾”身份再研究》中分別集釋了飯尾秀幸先生、學習院大學漢簡研究會和閆曉君先生關於“舍匿”的觀點,並認爲“舍匿”一詞,當爲漢代習語,也見於《二年律令·亡律》:“諸舍匿罪人,罪人自出,若先自告,罪減,亦減舍匿者罪。所舍(簡 167)”,其整理小組注釋:“舍匿,藏匿於家”;三國時代出土文字資料研究班在《江陵張家山漢墓出土〈二年律令〉譯注稿》(二)中認爲“舍匿”是把人物隱匿於自己的管理之下;富谷至先生編的《江陵張家山二四七號墓出土漢律令の研究》(譯注篇)第 108 頁中對“舍匿”的解釋基本與三國時代出土文字資料研究班相同;朱紅林先生在《張家山漢簡〈二年律令〉集釋》中“舍匿罪人”的按語爲:《後漢書·梁統傳》追述漢武帝時期,“軍役數興,豪傑犯禁,奸吏弄法,故重首匿之科。”《漢書·宣帝紀》:“自今子首匿父母,妻匿夫,孫匿大父母,皆毋坐。其父母匿子,夫匿妻,大父母匿孫,罪殊死,皆上廷尉以聞。”陳偉先生在《張家山漢簡雜識》中認爲“舍匿猶今窩藏,並不一定藏匿於家中”;邢桂霞先生在《漢代“首匿罪”的歷史考察——兼論“首匿”與“親親得相首匿”二者之關係》中認爲漢代所謂“首匿”“舍匿”“遁匿”雖名稱各異,但含義相同,皆指主謀藏匿罪人。

② 閆曉君:《張家山漢簡〈亡律〉考論》,《法律科學(西北政法大學學報)》2009 年第 1 期,又見閆曉君編《秦漢法律研究》,北京:法律出版社,2012,231-249 頁。

③ 周海鋒:《〈嶽麓書院藏秦簡(肆)〉的內容與價值》,《文物》2015 年第 9 期。

④ 陳松長主編:《嶽麓書院藏秦簡(肆)》,79 頁。

⑤ 陳松長主編:《嶽麓書院藏秦簡(肆)》,63 頁。

⑥ 陳松長主編:《嶽麓書院藏秦簡(肆)》,79 頁。

耐。(170-171)<sup>①</sup>

富谷至先生對《二年律令》進行譯注時引用《後漢書·孔融傳》：“漢律：與罪人交關三日已上，皆應知情。”，他認為這條漢律的內容與《二年律令》170-171 簡有一定關聯。<sup>②</sup>《二年律令》中，舍匿者不知自己提供住所之人是亡人或亡罪人，且提供住所滿五日以上纔認定是“舍罪人”；在不知其亡的情況下“取亡罪人爲庸”是“舍亡人”的犯罪行爲。這裏，認定“舍罪人”的行爲有一定時間期限，或許與富谷至先生所引用的《後漢書·孔融傳》的律文有一些聯繫。

嶽麓秦簡《亡律》2150-1+2150-2/004 簡：“……匿罪人雖弗蔽(蔽)貍(埋)，智(知)其請(情)，舍其室，”<sup>③</sup>舍匿者知其情而匿罪人的行爲可能包括“匿罪人蔽埋”和“匿罪人弗蔽埋”兩種方式。

通過以上分析，我們可以認為秦漢《亡律》中“舍匿罪人”至少包括“舍罪人”和“匿罪人”這兩種行爲。“舍罪人”是舍匿者在不知其情的情況下爲逃亡者提供住所，通常情況下，認定爲“舍罪人”還需考慮時間期限；“匿罪人”是舍匿者知道自己所藏匿的人員是逃亡者的身份，屬於故意犯罪；有時“匿罪人”的行爲根據其犯罪方式還可能有“匿罪人蔽埋”和“匿罪人弗蔽埋”兩種情況。我們發現，針對秦漢《亡律》中各種逃亡情況以及舍匿罪人的行爲，嶽麓秦簡《亡律》中有“以舍匿罪人律論之”“以舍罪人律論之”等，張家山漢簡《二年律令·亡律》中有“以匿罪人律論”“以舍亡人律論”等。秦律和漢律之間有時代的差異，漢初律令對秦律有繼承和發展，嶽麓秦簡《亡律》中未出現“以舍亡人律論之”的用法而張家山漢簡《二年律令·亡律》却出現這種用法可能是由政權的更替導致而成。

傳世文獻和出土文獻中也都有“舍匿”作爲動詞出現的情況，秦漢《亡律》中舍匿罪人常泛指藏匿逃亡者的各種犯罪行爲。如嶽麓秦簡《亡律》1930/006 簡：“父母、子、同產、夫妻或有罪而舍匿之其室及蔽(蔽)匿之於外，皆以舍匿罪人律論之”。<sup>④</sup>我們發現，秦漢《亡律》中律條定性爲“舍匿罪人”的，通常在簡文中有相對應的“舍匿”行爲。簡文中的“舍匿罪人”應指的是廣泛意義上的藏匿罪人，其中包括“舍罪人”和“匿罪人”。張家山漢簡《奏讞書》案例 14 出現的“安陸丞忠刻(劾)獄史平舍匿無名數大男子種一月，平曰：誠智(知)種無數，舍匿之，罪，它如刻(劾)。鞫：平智(知)種毋名數，舍匿之，審……”<sup>⑤</sup>這裏的“舍匿”作爲一個動詞，指藏匿無名數之人。傳世文獻中也有關於“舍匿”一詞的記載，如前引《史記·季布樂布列傳》和《漢書·淮南衡山濟北王傳》中都出現“舍匿”一詞。

① 彭浩、陳偉、[日]工藤元男主編：《二年律令與奏讞書：張家山二四七號漢墓出土法律文獻釋讀》，158 頁。

② [日]富谷至：《江陵張家山二四七號墓出土漢律令の研究》(譯注篇)，京都：朋友書店，2006，110 頁。

③ 陳松長主編：《嶽麓書院藏秦簡(肆)》，40 頁。

④ 陳松長主編：《嶽麓書院藏秦簡(肆)》，40 頁。

⑤ 彭浩、陳偉、[日]工藤元男主編：《二年律令與奏讞書：張家山二四七號漢墓出土法律文獻釋讀》，351 頁。

“匿罪人”屬於故意犯罪的行為，理應受罰。那麼，不知其情的“舍罪人”行為受罰的原因需要探討。閆曉君先生認為“舍匿犯”是一個罪名，有逃亡者纔有舍匿者，舍匿者是被人連累的犯罪。<sup>①</sup>《史記·商君列傳》曰：“公子虔之徒告商鞅欲反，發吏捕商君。商君亡至關下，欲舍客舍。客人不知其是商君也，曰：‘商君之法，舍人無驗者坐之。’商君喟然長歎曰：‘嗟乎，為法之敝一至此哉！’”<sup>②</sup>商鞅變法之後，秦廷實行商君之法，舍人者應對住宿者給予核驗。《漢書·平帝紀》曰：“其當驗者，即驗問。”顏師古注：“就其所居而問。”<sup>③</sup>可知，舍人者應該核驗住宿者的基本身份信息，以此避免亡人、罪人投宿。假若舍人者沒有完成“驗”的職責，從而造成亡人、罪人住宿的情況，則構成了舍匿亡人或舍匿罪人的犯罪行為，因此要受罰。此條商君之法抑或是秦漢《亡律》中對“不知其情而舍之”行為進行懲罰的來源。

## 二 “舍匿罪人”的刑罰原則

在秦漢《亡律》中，“舍罪人”和“匿罪人”的行為都將受到刑罰，但兩者的具體刑罰輕重有異，以下從四個方面進行分析。

第一，從以上的論證可以看出，“舍”和“匿”在性質上顯著不同，故而兩者在刑罰上也有差異。根據出土文獻記載，一般情況下，窩藏同類的罪人、亡人，“舍罪人”的刑罰輕於“匿罪人”。

嶽麓秦簡《亡律》：郡及襄武、上雒、商、函谷關外人及遷(遷)郡、襄武、上雒、商、函谷關外男女去，闌亡、將陽，來入之中縣、道，無少長，舍人室，室主舍者，智(知)其請(情)，以律遷(遷)之。典伍不告，賞典一甲，伍一盾。不智(知)其請(情)，主舍，貲二甲，典、伍不告，貲一盾，舍之過旬乃論之。<sup>④</sup>舍，其鄉部課之，卒歲，鄉部吏弗能得，它人捕之，男女無少長，伍(五)人，誅鄉部嗇夫；廿人，貲鄉部嗇夫一盾；卅人以上，貲鄉

① 這種說法是閆曉君先生於2016年11月12日在華東政法大學古籍研究所舉辦的第六屆“出土文獻與法律史研究”學術研討會上提出的觀點。

② 《史記》卷六八《商君列傳》，2236-2237頁。

③ 《漢書》卷一二《平帝紀》，356頁。

④ 此組律文“舍之過旬乃論之”前後皆有鉤識符號“𠂔”，嶽麓秦簡(肆)《興律》中也有類似使用的鉤識符號“𠂔”。嶽麓秦簡(肆)中0798/281-0794/282簡釋文為“興律曰：諸書求報者，皆告，令署某曹發𠂔，弗告曹𠂔，報者署報書某手，告而弗署，署而環(還)及弗告𠂔，及不署手，貲各一甲。”整理者注：“‘弗告曹’前後的鉤識符號當為強調符號。”鉤識符號“𠂔”的使用具有一定的隨意性，“舍之過旬乃論之”前後的鉤識符號應該有表明律文層次、解釋相應的律文內容之意，主要是對上文“不智(知)其請(情)，主舍，貲二甲，典、伍不告，貲一盾”這一法律內容的解釋，表明官府對“舍罪人”這一犯罪現象應在何種程度給予追究。根據律文內容，舍“郡及襄武、上雒、商、函谷關外人及遷(遷)郡、襄武、上雒、商、函谷關外男女，闌亡、將陽者”在十天以上將予追究責任。因此，這裏的句讀應改為“……不智(知)其請(情)，主舍，貲二甲，典、伍不告，貲一盾，舍之過旬乃論之。舍，其鄉部課之，卒歲，鄉部吏弗能得，它人捕之……”

部嗇夫一甲，令丞詈，鄉部吏主者，與鄉部嗇夫同罪。其亡居日都官、執灋屬官<sup>ㄌ</sup>、禁苑<sup>ㄌ</sup>、園<sup>ㄌ</sup>、邑<sup>ㄌ</sup>、作務<sup>ㄌ</sup>、官道畝(界)中，其嗇夫吏、典伍及舍者坐之，如此律。(2106/053-2111/057)<sup>①</sup>

室主為擅自離開郡及襄武、上雒、商、函谷關外的闌亡、將陽者提供住所，若是知其情，認定為“匿罪人”，室主“以律畧(遷)之”，典伍不告“貲典一甲、伍一盾”；若是不知其情而且舍之超過十天因此被認定為“舍罪人”，室主“貲二甲”，典伍不告“貲一盾”。可見，匿罪人者“室主以律畧(遷)之”“貲典一甲、伍一盾”的刑罰要重於舍罪人者“室主貲二甲”“典伍貲一盾”的刑罰。

張家山漢簡《二年律令·亡律》：匿罪人，死罪，黥為城旦舂，它各與同罪。其所匿未去而告之，除。諸舍匿罪人，罪人自出，若先自告，罪減，亦減舍匿者罪。所舍(167)<sup>②</sup>

《二年律令》167 簡規定除匿死罪者黥為城旦舂外，匿罪人者與所匿之人同罪。嶽麓秦簡《亡律》中也有類似的簡文，如嶽麓秦簡《亡律》2088/045 簡規定“匿亡人及將陽者，其室主匿贖死罪以下，皆與同罪。”<sup>③</sup>也就是說，當所匿的罪人是完城旦舂以下到耐罪及逃亡的收人、隸臣妾時，匿罪人者所受的刑罰應與完城旦舂以下到耐罪及收人、隸臣妾的刑罰相當。前引《二年律令》170-171 簡規定，所舍的罪人是完城旦舂以下到耐罪及逃亡的收人、隸臣妾時，舍罪人所受的刑罰是贖耐。“贖耐”的刑罰要輕於“它各與同罪”。由此可見，漢律對於窩藏同類的罪人、亡人的犯罪行為，“舍罪人”的刑罰同樣輕於“匿罪人”。

第二，對舍匿者的刑罰與被舍匿者的罪刑輕重有密切關係，被舍匿的罪人、亡人所受刑罰越重，舍匿者所受的處罰也越重。閆曉君、朱紅林先生對此已有一定論述，<sup>④</sup>嶽麓秦簡《亡律》2011 組的律文也充分反映了這一刑罰原則。

嶽麓秦簡《亡律》：盜賊獲(遂)者及諸亡坐所去亡與盜同灋者當黥城旦舂以上及命者、亡城旦舂、鬼薪、白粲舍人室、人舍、官舍，主舍者不智(知)其亡，贖耐。其室人、舍人存而年十八歲者及典、田典不告，貲一甲。伍不告，貲一盾<sup>ㄌ</sup>。當完城旦舂<sup>⑤</sup>以下到耐罪及亡收、司寇、隸臣妾、奴婢闌亡者舍人室、人舍、官舍，主舍者不智(知)其亡，貲二甲。

① 陳松長主編：《嶽麓書院藏秦簡(肆)》，56-57 頁。

② 彭浩、陳偉、[日]工藤元男主編：《二年律令與奏讞書：張家山二四七號漢墓出土法律文獻釋讀》，2007，157 頁。

③ 陳松長主編：《嶽麓書院藏秦簡(肆)》，53 頁。

④ 閆曉君：《張家山漢簡〈亡律〉考論》；朱紅林：《〈嶽麓書院藏秦簡(肆)〉補注(一)》，《第六屆“出土文獻與法律史研究”暨慶祝華東政法大學法律古籍整理研究所成立三十周年學術研討會論文集》，99 頁。

⑤ 嶽麓秦簡(肆)1977 簡原釋文為“當完為城旦舂以下到耐罪及亡收”，而該簡的紅外圖版和彩色圖版簡中並無“為”字，故其釋文應為“當完城旦舂以下到耐罪及亡收”。

其室人、舍人存而年十八歲以上者及典、田典、伍不告貲一盾。(2011/060-1979/064)<sup>①</sup>

這裏,對於舍匿刑徒逃亡者這種行爲,主舍者及其室人、舍人存而年十八歲以上者及典、田典、伍所受的刑罰不相同。“盜賊旒(遂)者及諸亡坐所去亡與盜同灋者當黥城旦舂以上及命者、亡城旦舂、鬼薪、白粲”的刑罰要重於“當完城旦舂以下到耐罪及亡收、司寇、隸臣妾、奴婢闕亡者”,其相對應的主舍者及其他相關人員所受處罰也隨之加重。

第三,對於“舍匿罪人”這類犯罪行爲,主舍者受到相應的刑罰,律文也規定了對相關人員的處罰,但處罰輕重不同。

《史記·商君列傳》記載:“商君之法,令民爲什伍,而相收司連坐。不告奸者腰斬,告奸者與斬敵首同罪。”<sup>②</sup>在秦律中,針對“舍匿罪人”這類犯罪行爲,舍者及其相關人員都要受到刑罰。

前引嶽麓秦簡《亡律》2106 組中窩藏特定逃亡人員於人室,室主、典、伍、鄉部吏均受到相應的刑罰。室主所受的刑罰明顯重於其他人;鄉部吏要核查舍匿罪人的情況,並對亡人進行抓捕,滿一年,若他人捕得,鄉部吏受到相應的處罰,但其處罰相對較輕。今列表如下(表 1):

表 1 嶽麓秦簡《亡律》舍匿者及其連坐人員刑罰一覽表

		室主	典 (不告)	伍 (不告)	鄉部吏 (弗能得,他人捕之)
郡及襄武、上雒、商、函谷關外人及惡(遷)郡、襄武、上雒、商、函谷關外男女去,闕亡、將陽	知其情	以律惡(遷)之	貲一甲	貲一盾	五人→誅鄉部嗇夫 廿人→貲鄉部嗇夫一盾 卅人以上→貲鄉部嗇夫一甲,令丞誅,鄉部吏主者與鄉部嗇夫同罪
	不知其情;而且舍之過旬日	貲二甲	貲一盾	貲一盾	

再如,嶽麓秦簡《亡律》2011 組,窩藏逃亡刑徒,舍者及其他相關人員均受罰,但主舍者“贖耐”的處罰要重於室人、舍人存而年十八歲以上者及典、田典“貲一甲”及伍“貲一盾”的處罰。

第四,針對當時社會普遍的流亡現象,秦漢法律都對檢舉行爲予以獎勵,檢舉者可得到購賞,反之則受罰。

嶽麓秦簡《亡律》中 2106 組規定典、伍有舉報亡人的責任,鄉部吏要核查舍匿罪人的情

① 陳松長主編:《嶽麓書院藏秦簡(肆)》,58-60 頁。

② 《史記》卷六八《商君列傳》,2230 頁。



況,并對亡人進行追捕。嶽麓秦簡《亡律》中未見舍匿者誦告亡人的規定,或許是抄錄者未抄取與此相關的內容。張家山漢簡《二年律令·亡律》中政府鼓勵誦告亡人,并除誦告者之罪。

張家山漢簡《二年律令·亡律》:取亡罪人爲庸,不智(知)其亡,以舍亡人律論之。所舍取未去,若已去後,智(知)其請(情)而捕告,及誦(誦)告吏捕得之,皆除其罪,勿購賞。(172)<sup>①</sup>

《二年律令》167 簡、172 簡規定,舍匿者在“其舍匿未去而告之”的情況下,可免於刑罰;在其“所取已去”後知其情而捕告以及誦告吏而捕得亡人,也免於刑罰但不會得到購賞。

### 三 秦漢《亡律》對“舍匿罪人”處罰之比較

如前文所述,秦漢《亡律》對“舍匿罪人”的犯罪行爲都給予處罰,但兩者的處罰略有差異。現以嶽麓秦簡《亡律》和張家山漢簡《二年律令·亡律》中對“舍匿罪人”的處罰爲例,比較秦漢《亡律》中“舍匿罪人”處罰的不同之處。今列表如下(表 2):

表 2 秦漢《亡律》對“舍匿罪人”刑罰之比較一覽表

	張家山漢簡《二年律令·亡律》		嶽麓秦簡《亡律》	
匿罪人	罪人死罪→匿者黥爲城旦舂 (罪人自出,罪減)		(匿者)當貲二甲以上到贖死	
舍亡人及罪人亡者	不知其亡; 而且盈五日以上	所舍罪當黥 <sup>□</sup> 贖耐 完城旦舂以下到耐罪、亡收、隸臣妾、奴婢亡盈十二月以上→贖耐	不知其亡; 而且舍之過旬乃論	主舍者→貲二甲 典、伍不告→貲一盾
取亡罪人爲庸	不知其亡	以舍亡人律論之	知其情 不知其情; 而且取過五日以上	爲匿之 以舍罪人律論之

嶽麓秦簡《亡律》對於舍匿罪人的規定更爲詳細。例如,嶽麓秦簡中詳細規定了對舍亡人及罪人亡者之室主、室人、奴婢、典伍和負責抓捕亡人的鄉部吏的具體責任和刑罰;張家山漢簡則僅簡要規定對舍亡人者及亡者的處罰。

張家山漢簡《二年律令·亡律》中對舍匿罪人的刑罰要比嶽麓秦簡《亡律》更嚴格。如舍匿者在不知情的情況下“舍罪人”,《二年律令》規定的時間期限短於嶽麓秦簡《亡律》;《二

<sup>①</sup> 彭浩、陳偉、[日]工藤元男主編:《二年律令與奏讞書:張家山二四七號漢墓出土法律文獻釋讀》,158 頁。

年律令》對於雇傭亡罪人勞動這種犯罪行為不再考慮舍匿者雇傭時間長短而都以“舍亡人”律論之，嶽麓秦簡《亡律》中規定取過五日以上以“舍罪人”律論之；《二年律令》對於舍“完城旦舂以下到耐罪，及亡收、隸臣妾、奴婢亡盈十二月以上”者處以贖耐，這種處罰程度要明顯重於嶽麓秦簡《亡律》規定的“主舍者貲二甲、典伍不告貲一盾”。

關於漢律中對於舍匿罪人的犯罪行為更為嚴厲的原因，黃庭頌先生以秦漢兩代逃亡犯罪為例，剖析兩代律法之異同，認為秦代國祚雖短，但其律法編製乃注重平均各面向，因此未對逃亡犯罪特別重視；漢初則因秦帝國甫崩潰，黎民百姓流離失所，戶籍名數散佚，流亡者甚多，執政者無法有效掌控人民動向，故特別重視逃亡情事，往往祭以重法嚴懲逃亡罪犯，正是此歷史環境之差異，造成兩代律法注重面向不同。<sup>①</sup>

張家山漢簡《奏讞書》案例 14 講的是安陸獄史舍匿無名數大男子的案例，其中引令文曰：“諸無名數者，皆令自占書名數，令到縣道官，盈卅日，不自占書名數，皆耐為隸臣妾，銅，毋令以爵、賞免，舍匿者與同罪，以此當平。”<sup>②</sup>官府以三十日為限要求逃亡者自覺向官府登記戶籍，超過三十日而不自覺向官府登記戶籍的，逃亡者和舍匿逃亡者都將受到刑罰。傳世文獻中也有與此相關的記載，《漢書·高帝紀》曰：“民前或相聚保山澤，不書名數，今天下已定，令各歸其縣，復故爵田宅，吏以文法教訓辨告，勿笞辱。”<sup>③</sup>漢高祖為穩定社會局勢，規定逃亡之人要登記戶籍。此則案例的時間是“八年十月己未”，整理小組認為此處的“八年”指漢高祖八年（前 199）。<sup>④</sup>漢高祖五年稱帝，這條漢令應公布在漢高祖五年至八年之間，正是漢初結束長期戰爭之後的特殊時期，此令文應是漢廷為修生養息，恢復國力而頒布的特殊政策。一方面，漢政府規定所有的逃亡者都可以向官府登記戶籍為庶人，以擺脫刑徒、奴婢等身份；另一方面，漢政府又加重對超過三十日不去向官府登記戶籍的逃亡者及舍匿行為的刑罰。可見，漢政府當時採取寬鬆和嚴厲相結合的政策力求基本解決逃亡人口問題，以安定社會。所以，漢初的律令規定要比秦更為嚴格，其原因可能與漢初天下初定，國家需要穩定的社會背景有關。

① 黃庭頌：《從出土秦漢簡論“漢承秦制”之問題——以睡虎地秦簡與張家山漢簡逃亡案件為例》，簡帛網，2013 年 8 月 3 日；黃庭頌注：本文發表於 2012 年 6 月出版的《道南論衡——2011 年全國研究生漢學學術研討會論文集》，185-204 頁。

② 彭浩、陳偉、[日]工藤元男主編：《二年律令與奏讞書：張家山二四七號漢墓出土法律文獻釋讀》，351 頁。

③ 《漢書》卷一上《高帝紀上》，54 頁。

④ 張家山二四七號漢墓竹簡整理小組：《張家山漢墓竹簡〔二四七號墓〕（釋文修訂本）》，97 頁；李學勤先生在《〈奏讞書〉解說（上）》中認為此處“八年十月己未”係漢高祖八年十月十三日，尾云“八年四月甲辰朔己巳”係四月二日。

#### 四 結語

秦漢《亡律》不僅處罰逃亡犯罪，而且處罰舍匿罪人的行為。根據舍匿者的犯罪情節，舍匿罪人的行為至少可分為“舍罪人”和“匿罪人”兩種。“舍罪人”和“匿罪人”的主要認定依據是舍匿者是否知其情，判定舍罪人的行為經常有一定時間期限。

舍匿者及其相關人員所受的刑罰與被舍匿者的犯罪情況及刑罰程度有很大關係；針對舍匿同一類的逃亡罪人，一般而言“舍罪人”的刑罰輕於“匿罪人”；秦漢法律都鼓勵檢舉舍匿犯罪的行為。與嶽麓秦簡《亡律》相比，張家山漢簡《二年律令·亡律》對舍匿罪人的刑罰更為嚴厲，這或許與漢初國家的社會狀況有很大關係。

## 秦簡《爲吏之道》的思想主體分析\*

北京師範大學歷史學院史學研究所 李銳

**內容提要** 本文通過綜述各家對於睡虎地秦簡《爲吏之道》篇思想主體所屬學派的分析,指出雖然學界越來越傾向於其中包含有多家思想元素,但是分析方法仍然是將部分內容和傳世文獻對比,從而判斷其學派歸屬。但是,《爲吏之道》所談的內容,看似體現着某一學派的思想,其實很多思想內容已經是當時的“公言”,所以這種判定方法是有問題的。《爲吏之道》作爲雜抄,不必強求要有統一的中心思想或體現受某家思想影響。這些雜抄,對於小吏來說,可能有一定的實用性和指導性。

**關鍵詞** 秦簡 睡虎地 爲吏之道 學派 儒家

1975年出土的雲夢睡虎地秦簡中,《語書》與《爲吏之道》較多地受到思想研究者的關注。本文討論其中的《爲吏之道》篇。整理者指出:“《爲吏之道》由51支竹簡組成……分上下五欄書寫……第四、五兩欄後面字迹較草的部分,有可能是補寫上去的。簡文中‘除害興利’一節,每句四字,內容多爲官吏常用的詞語,有些地方文意不很連貫,推測是供學習做吏的人使用的識字課本……竹簡第五欄有韻文八首,由其格式可以判定是‘相’,即當時勞動人民舂米時歌唱的一種曲調……《爲吏之道》有不少地方與《禮記》《大戴禮記》《說苑》等相同。”<sup>②</sup>

\* 本文寫作得到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青年自選項目“新出簡帛與百家爭鳴的重要論題研究”(12CZS013)、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出土簡帛文獻與古代中國哲學新發現綜合研究”(11&ZD086)的資助。

② 睡虎地秦墓竹簡整理小組:《睡虎地秦墓竹簡》,北京:文物出版社,1978,280頁。

仔細考察整理者的注釋，實際上還與《老子》《墨子》《商君書》《呂氏春秋》《淮南子》的部分文句可以互相參考。當然，有些參考僅是出於訓詁語詞的關係而引用之。

《爲吏之道》的主要內容是爲吏者正當的行爲規範，也還包括律法等非思想性的內容。已經有不少學者討論了此篇的中心思想屬性，這主要是就其和古代思想相關的部分而論的，分析的是《爲吏之道》的思想主體，曾有學者作過總結：認爲屬法家的有張晉藩、高敏、蔣義斌、吳福助等先生；認爲屬儒家的有黃盛璋、徐富昌等先生；余宗發、張永成、余英時等先生則認爲屬於儒、道、法等思想的融合<sup>①</sup>。實際上，還有談論此篇與墨家、荀子、文子、黃老思想等相關者。

有關《爲吏之道》的思想屬性之說，筆者所掌握的資料如下。

《爲吏之道》最初是在當時中國特殊的“儒法鬥爭”的意識形態背景下被解讀的，它被認爲屬於法家文獻。因爲這一時期的特殊情況，本文就不具體討論了。

黃盛璋先生認爲《爲吏之道》“抄寫格式一律，必爲一人同時所抄”，可以分爲六種雜抄文書集，分別爲《爲吏之道》《從政之經》《治事》《魏戶律》《魏奔命律》《口舌》。《爲吏之道》祇是其中第一部分，而且除魏律外，其他的篇章也有拼集的現象。在此基礎之上，黃先生指出《爲吏之道》的“臨材(財)見利，不取句(苟)得，臨難見死，不取句(苟)免”“毋喜富，毋惡貧，正行修身，過(禍)去福存”“中(忠)信敬上”“龔(恭)敬多讓”，都是儒家思想。《從政》的“爲人君則鬼(懷)，爲人臣則忠；爲人父則慈，爲人子則孝……君鬼(懷)臣忠，父慈子孝，政之本也，志徹官治，上明下聖，治之紀也”，純粹爲儒家語言。“第二段除講官府瑣雜細事外，其餘的也全是儒家思想。”“《治事》的中心思想與《從政》同。”“最末一段《口舌》與《從政》‘慎之慎之(或戒之戒之)言不可追’，同屬儒家明哲保身思想。”因此這個雜抄集，“除兩種《魏律》外，其餘四篇具有共同的中心思想……全篇使用的語言，是符合儒家的信仰和教條的。”<sup>②</sup>

<sup>①</sup> 參見張晉藩《從秦簡〈爲吏之道〉看秦的“治吏”思想》，《吉林大學社會科學論叢》第4期，北京：法律出版社，1982；高敏《秦簡〈爲吏之道〉中所反映的儒法合流傾向——兼論儒法諸家思想融合的歷史演變》，《雲夢秦簡初探（增訂本）》，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1；蔣義斌《秦簡爲吏之道在思想史上的意義》，《簡牘學報》（臺灣）第10期，1981年；吳福助《睡虎地秦簡〈語書〉論究》，《簡牘學報》（臺灣）第10期，1981；黃盛璋《雲夢秦簡辨正》，《考古學報》1979年第1期；徐富昌《睡虎地秦簡研究》，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93；余宗發《〈雲夢秦簡〉中思想與制度鉤摭》，臺北：文津出版社，1992；張永成《秦簡爲吏之道篇的版式及其正附文問題》，《簡牘學報》（臺灣）第10期，1981；余英時《士與中國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轉摘自湯淺邦弘《戰國楚簡與秦簡之思想史研究》，臺北：萬卷樓圖書有限公司，2006，232頁。

<sup>②</sup> 黃盛璋：《雲夢秦簡辨正》，《考古學報》1979年第1期，15-19頁。



高敏先生指出：“秦簡《爲吏之道》中所反映出來的法家思想，同早期的法家思想已經產生了某些變異。這些變異主要表現爲儒、法、道幾家思想的雜湊。因此，這一事實向我們表明：先秦的法家思想確實處在一個逐步變化的過程中，它在吸收儒、法、道家的某些思想以充實自己，使之成爲更爲完備的統治思想。”<sup>①</sup>《爲吏之道》的簡文，以法家爲主。

江慶柏先生則認爲“這份簡書與墨家學派有關，或者說在它的寫作過程中受到了墨學的影響。”<sup>②</sup>並舉出了二者文句和思想相近之處的不少例子作爲證據；同時以《爲吏之道》與《荀子》的思想不同之處，反對季勳所指出的《爲吏之道》與《荀子》文句近似的看法。

余英時先生認爲“儒家仁愛教化的吏道觀念長期以來早已在大傳統中生根。秦代法令雖嚴苛，却始終不能把這種根深蒂固的觀念從一般人的心中完全消滅掉。這是政教分離的必然結果……秦代存在兩種不同的‘吏道’觀，分別代表着‘政’與‘教’兩個方面”，他區分了《語書》和《爲吏之道》的不同性質，“這兩個文件的性質恰好可以說明‘政’、‘教’兩種‘吏道’觀點的分歧。”前者“代表的是秦代官方對於‘吏道’的觀點。但是《爲吏之道》……是私人編寫的……《爲吏之道》在思想上的最大特色，便是混合了儒、法、道各家的成分。更值得注意的是其中儒家思想還占據着主要的位置……《爲吏之道》所反映的顯然是大傳統中的吏道觀……兼重吏的教化功能，在政治秩序之外還關心到文化秩序。”<sup>③</sup>

吳福助先生根據整理者的看法，認爲《爲吏之道》是“文武吏員學徒受訓學吏所用的道德教材……其中‘除害興利’以下四十九句，乃是嬴秦宦學識字教材”，但是卻又指出“全文未見押韻、分類，意義缺乏連貫”，“說明此篇確係由手抄者隨意雜湊而成，其篇章原貌已經過嚴重割裂而致泯滅，無從查考了。”<sup>④</sup>吳先生又提出“《爲吏之道》爲嬴秦宦學道德教材”之說，並指出“《爲吏之道》以法家思想爲主體，吸收和採納儒、道兩家思想中適合嬴秦統治階級需要的部分，用以充實和完備法家思想的傾向，並非個別的偶然現象。”<sup>⑤</sup>

劉天奇先生認爲“《爲吏之道》反映了黃老思想的傾向”<sup>⑥</sup>，劉先生的前提是同意《呂氏春秋》“是黃老文學而非雜家的作品的觀點”，以此書與《爲吏之道》多做對照。

魏啓鵬先生則認爲簡文的基本思想，與文子學派“循道寬緩”之旨吻合，並就簡文與《文子》書的關係，加以疏證闡釋<sup>⑦</sup>。

① 高敏：《秦簡〈爲吏之道〉中所反映的儒法合流傾向——兼論儒法諸家思想融合的歷史演變》，《雲夢秦簡初探（增訂本）》，242頁。

② 江慶柏：《〈睡簡〉〈爲吏之道〉與墨學》，《陝西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83年第4期，111頁。

③ 余英時：《士與中國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151頁。

④ 吳福助：《睡虎地秦簡論考》，139、143、149頁。

⑤ 吳福助：《睡虎地秦簡論考》，198頁。

⑥ 劉天奇：《黃老政治的初次實踐——從秦簡〈爲吏之道〉看秦國的黃老政治》，《唐都學刊》1994年第5期，28頁。

⑦ 魏啓鵬：《文子學派與秦簡〈爲吏之道〉》，《道家文化研究》第18輯，北京：三聯書店，2000。

歐陽禎人先生認爲：“從思想上來講，《爲吏之道》中儒、法、道各家是互補的，互滲的，當然各家的層次、地位還是有區別的。也就是說，法家的功利性雖然隨處可見，特別是在實踐中，在具體的操作上，法家的理念顯得行之有效；但是，儒家的思想却是《爲吏之道》的根本。”舉“爲人君則鬼（懷）”一段爲例，進而指出：“《爲吏之道》在思想內容上從以下八個方面體現了儒家的思想，筆者以爲其中還有內在的邏輯性”<sup>①</sup>。

劉文瑞先生認爲《爲吏之道》的本質仍然是法治的，將《爲吏之道》從官吏的道德修養角度做出規範的內容，認爲是儒家思想的體現，是把儒家思想中的思孟學派當做儒家思想主體的誤解<sup>②</sup>。

張敏先生認爲《爲吏之道》似乎不是識字課本，而是做官的教科書，是政治讀物，充滿儒家和道家的思想，尤其是戰國後期的儒家思想。《爲吏之道》要求官員們“除害興利，慈愛百姓”的主張，是繼承秦以前對官吏品格嚴格要求的思想<sup>③</sup>。

王化平先生認爲簡文的主要思想與法家有極大的反差，“弱民、重刑等法家的標準論點却難以在《爲吏之道》中發現”，《爲吏之道》具有很多儒、道的思想，遂以爲《爲吏之道》是以道家思想爲主的文獻，而不是以法家爲主且雜以諸家思想<sup>④</sup>。

陳戰峰先生則認爲“《爲吏之道》不是簡單對儒、道、法三家思想的拼湊雜糅，而是在具體的歷史時空中出現的法家作品。”<sup>⑤</sup>

湯淺邦弘先生在比對了所謂屬於儒家、道家的思想段落之後，提出《爲吏之道》最終的目標是貫徹法治在基層的統治，具有折衷思想傾向。湯淺先生比較《語書》和《爲吏之道》，指出秦國統治具有二重結構，中央和基層有差異，“吏的立場是處於秦國法治與地方習俗間的微妙地帶。”<sup>⑥</sup>這一點，與余英時之說不同，很富啓發意義。

俞志慧先生則認爲《爲吏之道》“雜取先秦各種思想於一體，具有集錦特色。”“這一特色使得《爲吏之道》具有以下的思想史意義：它體現了那一時期思想文化的融合趨勢，從草根文化層面體現得如此集中明顯，在此前的傳世文獻中尚未發現；這一特色也告訴我們先秦諸子有着共同的思想文化資源、相似的知識背景、話語平臺和相近的問題意識；在法術家思想大行其道的秦代，《爲吏之道》的思想基調與儒道思想更爲接近，證明了儒道思想的生命力。考

① 歐陽禎人：《〈爲吏之道〉的儒家思想發微》，《郭店楚簡與早期儒學》，臺北：臺灣古籍出版有限公司，2002；歐陽禎人：《略論〈爲吏之道〉的儒家思想》，丁四新主編《楚地出土簡帛文獻思想研究（一）》，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2002。

② 劉文瑞：《德、禮、法的嬗變與滲透——秦國政治思想雜論》，《秦文化論叢》第9輯，西安：西北大學出版社，2002。

③ 張敏：《秦代的官德——讀〈爲吏之道〉》，《秦文化論叢》第9輯。

④ 王化平：《秦簡〈爲吏之道〉及相關問題研究》，四川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03年5月。

⑤ 陳戰峰：《從睡虎地秦簡〈爲吏之道〉看秦思想文化的發展》，《西安電子科技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4年第2期，67頁。

⑥ [日]湯淺邦弘：《戰國楚簡與秦簡之思想史研究》，230-240頁。

慮到這份材料祇針對基層官吏,故不能將《爲吏之道》視爲秦代思想世界的簡單化約,專制者所奉行的還是法家思想;《爲吏之道》更多技術層面上的守則,缺乏儒道創始人對於大道的關懷,這又是其思想史意義的局限性所在。”<sup>①</sup>

趙書生先生贊同高敏的《爲吏之道》係儒、法、道等各家思想雜湊的觀點,也認同黃盛璋、歐陽禎人所說此篇以儒家思想爲本之論<sup>②</sup>。

魯普平先生在參考筆者關於學派等問題的意見後,提出“雲夢秦簡《爲吏之道》作爲官箴文獻,在文本內容上所反映的思想基本上是先秦一種共識思想。這種思想不能籠統地說屬於先秦哪一學派,因爲這些思想不祇一家涉及,其他各派或多或少都有涉及。”<sup>③</sup>

## 二

以上對於《爲吏之道》(除兩條魏律)思想特色的看法,越來越傾向於其中包含有多家思想元素。而判定思想元素的方法,則主要是摘取竹簡文句或關鍵字與傳世文獻對比,由傳世文獻所屬學派,來判定《爲吏之道》中部分文字的思想屬性。

筆者以爲,這種判定思想屬性的方法,存在一定的問題。

首先,先秦雖有“儒”“墨”之稱,也有“刑名之家”等名稱,甚至出現以“道”爲核心思想標誌者<sup>④</sup>。但是“道家”之所指以及這一名稱的時代性,則仍然比較含糊。目前所見,它最早出現於漢初,但是它到底是黃老道家還是河上丈人這一系抑或老莊之流,還需要考察。至於法家,司馬談雖然運用了這一名稱,但是司馬遷在《史記》中並沒有指實誰爲法家,祇有黃老刑名法術之類的說法。我們所熟悉的法家人物,實際上是根據《漢書·藝文志》的圖書分類法反推而得出的結論。而儒家、墨家之下,支流林立,似乎也需要進一步細分。像余英時先生那樣籠統地談論作爲大傳統的儒學,有可能對於孔子之前的文化傳統和孔門儒學的特色未作區分。

① 俞志慧:《秦簡〈爲吏之道〉的思想史意義——從其集錦特色談起》,《浙江社會科學》2007年第6期,又載“簡帛研究”網,2007年6月23日。

② 趙書生:《上博楚簡〈從政〉與睡虎地秦簡〈爲吏之道〉合論》,丁四新主編《楚地簡帛思想研究(三)》,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2007,253-256頁。

③ 魯普平:《雲夢秦簡〈爲吏之道〉倫理思想之分析》,“簡帛”網,2013年8月28日。

④ 參見李銳《“六家”、“九流十家”與“百家”》,《新出簡帛的學術探索》,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10。

其次，章學誠提出諸子“言公”：“古人之言，所以爲公也。未嘗矜於文辭而私據爲己有也。志期於道，言以明志，文以足言。其道果明於天下，而所志無不申，不必其言之果爲我有也”<sup>①</sup>，誠爲卓識。古書中出現與《爲吏之道》相近的文句，很值得重視。可是如果從“言公”的立場來看，那麼《爲吏之道》雖然有個別文句可與傳世的儒家等文獻對比，但却很可能祇是“言公”。我們今天所見先秦古籍非常少，而且不少傳世文獻成書或編定於後世（如《說苑》），其文本來源相當複雜，能否以內中出現與《爲吏之道》相關文句，就根據這些傳世文獻的思想屬性來推斷《爲吏之道》本文的思想特色，還值得懷疑。此外，諸子“言公”，但是公言之下往往藏有私意，這是更值得關注的情況<sup>②</sup>。

最後，《爲吏之道》的性質和特點還需要認真考慮。張永成先生曾根據竹簡形制，將黃盛璋所說六篇分爲正文和附文，雖與思想屬性沒有直接關係，但是對於文本分析而言，非常有價值。他認爲：“‘魏戶律’、‘魏奔命律’、‘口舌’三類，書寫於第十六至三十七枚簡第五欄，其下猶有十四行（第三十八至五十一枚）空白。又‘從政之經’類中，‘長不行’至‘貨不可歸’四十六字，書寫於第四十四至五十枚簡第四欄，其下亦有一行（第五十一枚）空白。這些部分字迹潦草且明顯地向左下角傾斜，類似左手執筆者，與其餘部分的端正平整不同，應係出自另一人手筆，爲補白而作者。而且兩條魏律內容與本書題旨全無關係……文中出現六個‘也’字，與出土秦簡一律用‘毆’字（凡出現 132 次），用字習慣尤其迥異。因而上述這些部分應可視爲本書的‘附文’，宜與‘正文’區別看待。”<sup>③</sup>如果《爲吏之道》確爲雜抄且有“正文”與“附文”之別，那麼籠統地判斷其中心思想的特點，到底有多大意義甚至於有沒有意義，值得重新考量。

### 三

根據這些疑問，筆者以爲，《爲吏之道》並沒有特別地體現出儒家的特點。所謂最能體現儒家思想特點的文句，主要是“爲人君則鬼（惠），爲人臣則忠；爲人父則慈，爲人子則孝……君鬼（惠）臣忠，父慈子孝，政之本也，志徹官治，上明下聖，治之紀也。”<sup>④</sup>

可是君臣、父子的倫理準則，歷來都受到重視，如《逸周書·常訓》已經提到“八政”：“夫妻、父子、兄弟、君臣。”相近討論其間關係之語有不少，如《左傳·隱公三年》：“君義，臣行，

① 參見葉瑛《文史通義校注》，北京：中華書局，1994，169 頁。按：章學誠《文史通義》中有《言公》上中下三篇，列舉了不少事例，上引文爲其主旨。

② 參見李銳《從“六位”到“三綱”》，《新出簡帛的學術探索》。

③ 轉引自吳福助《睡虎地秦簡論考》，176 頁。

④ “惠”字從蔡偉說，見抱小（蔡偉）《簡帛拾遺》，<http://www.guoxue.com/newbook/gx/020.htm>。

父慈,子孝,兄愛,弟敬,所謂六順也。”後來也并非祇有孔子說“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這一類話,如竹簡《文子》記文子答平王:“是以君臣之間有道,則[忠惠;父子之]間有道,則慈孝,士庶間有道,則[相愛]。”<sup>①</sup>《墨子·兼愛下》提出:“故兼者,聖王之道也,王公大人之所以安也,萬民衣食之所以足也。故君子莫若審兼而務行之,為人君必惠,為人臣必忠,為人父必慈,為人子必孝,為人兄必友,為人弟必悌。”《慎子》提出:“君明臣直,國之福也;父慈子孝,夫信妻貞,家之福也。”<sup>②</sup>《莊子》外篇《天道》有:“君先而臣從,父先而子從,兄先而弟從,長先而少從,男先而女從,夫先而婦從。夫尊卑先後,天地之行也,故聖人取象焉。”

這些話和《為吏之道》一樣,強調君臣、父子兩方面的標準(或者說特殊身份的人,處於雙重角色時的不同標準)。借用余英時先生的觀點,這反映了大傳統的意見(當然,不必將此大傳統看為儒家的)。所以,強調君惠臣忠、父慈子孝,這是“言公”之論。但是“公言”之下,諸子學派達到這個倫理的“私意”,則很不一樣<sup>③</sup>。

值得注意的是,與上述提倡兩方面的標準相反,《商君書·畫策》中提出:“所謂義者:為人臣忠,為人子孝;少長有禮;男女有別。”《韓非子·忠孝》指出:“父而讓子,君而讓臣,此非所以定位一教之道也。臣之所聞曰:‘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三者順,則天下治;三者逆,則天下亂。’此天下之常道也。”突出強調下位者單方面的服從,與後世“三綱”之說接近,和上述公言不同,可以說是所謂“法家”的特別觀點。而上引《為吏之道》恰恰是提倡兩方面的標準,因此,《為吏之道》的“為人君則鬼(惠),為人臣則忠;為人父則慈,為人子則孝……君鬼(惠)臣忠,父慈子孝,政之本也,志徹官治,上明下聖,治之紀也”這一段落,或許倒可以說明它們並沒有體現所謂“法家”的觀點。

准此,其餘的可以與傳世文獻對應的文句,似乎也應當從“言公”或所謂大傳統的角度去看待。比如可以與《為吏之道》對應的見諸《禮記》《大戴禮記》《說苑》之語,其實出於《禮記·曲禮》《大戴禮記·武王踐祚》《說苑·談叢》等篇,這些篇章的儒家特色並不強。而強調為人處世要謹慎、強調自身修養的一些話,見諸六藝經傳以及《逸周書》《國語》等。道術為天下裂,我們似乎不宜帶着《為吏之道》體現某家思想的意圖去刻意地尋章摘句。筆者以為,尋章摘句作為校勘訓詁是非常正當的,但是要由之進而推斷《為吏之道》的學派屬性,則很危險<sup>④</sup>。

①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定州漢簡整理小組:《定州西漢中山懷王墓竹簡〈文子〉釋文》,《文物》1995年第12期,29頁,據《通玄真經》補齊。

② 《慎子》佚文,“叢書集成初編”本,北京:中華書局,1985,15頁。

③ 參見李銳《從“六位”到“三綱”》,《新出簡帛的學術探索》。

④ 參見李銳《“對文”分析法評析》,《新出簡帛的學術探索》。



《爲吏之道》並沒有大量的非常明顯地體現某一家思想的言詞；仔細考察許多學者提出的學派意見及其證據，其實也很難成立——雖然不少學者懷有從這份文獻看出秦王朝實際上也是諸子百家的學術活動非常活躍的地區這種想法。比如江慶柏先生認爲簡書中的“除害興利”是墨學的專用名詞。但是余英時先生指出這四個字漢代常用在地方官身上，因此它有可能是“言公”而未必爲墨家之專門術語；或者說我們所見先秦書籍太少，所以僅見墨家較強地顯示了和“除害興利”的相關性，而漢代“除害興利”之語，未必一定是借用於墨家思想，很有可能自有淵源。

《爲吏之道》包含“正文”“附文”之說很值得重視。筆者以爲，作爲雜抄，我們不必強求《爲吏之道》要有統一的中心思想或體現受某家思想影響（即便真有某些文句是他抄自某家子書），它所能反映的，倒更在於持有者——小吏喜的身份特徵和思想傾向。這些雜抄，對於小吏喜來說，可能有一定的實用性和指導性，某些言語或不乏座右銘的性質。

與此類似的，是郭店楚簡中的《語叢》諸篇。《語叢》可能並非識字或教書課本，很可能祇是郭店墓主身前的雜抄（也有可能是通過某種途徑獲得的雜抄集），內容也相當龐雜。因爲墓主生前可能很喜歡學術書籍，身份爲士，所以這些雜抄就比較有思想性。我們也不必強求這些語叢有統一的思想或中心思想。

總之，《爲吏之道》篇作爲寶貴的秦文獻，還有許多值得研究的地方。與之類似的是近年來出現的大量簡帛文獻，在分析這些文獻的思想特色時，常常出現“百家爭鳴”的意見。也許，我們更應該反省我們的研究方法，避免過度地進行詮釋。

近來，江陵王家台十五號秦墓中出土了《效律》《日書》《歸藏》《政事之常》等竹簡。其中《政事之常》有不少內容可以與《爲吏之道》中《從政之經》的內容相對照，並且還有注疏，可惜全部材料還沒有完全公布<sup>①</sup>。王家台秦墓無槨室，無墓道，應該也是小吏的墓葬<sup>②</sup>。這或許也能表明，考察類似《爲吏之道》《政事之常》這樣的文獻，不宜將之與諸子百家之學聯繫起來進行過度詮釋。湖南大學嶽麓書院所購買的秦簡《爲吏治官及黔首》也有可與簡文對應的內容，材料已經公布<sup>③</sup>。北京大學2010年所獲秦簡之中，也有與《爲吏之道》《爲吏治官及黔首》內容相近者，曾被定名爲《爲吏之道》<sup>④</sup>，後來被命名爲《從政之經》<sup>⑤</sup>。北大簡的整理者曾經分析了《爲吏之道》與《爲吏治官及黔首》，指出“睡虎地秦簡與北大簡內容相對應的各節在節序上有別”，“這部分內容相合的簡文在當時已是一個較成熟的文本，各節文字基本穩

① 參見王明欽《王家台秦墓竹簡概述》，艾蘭、邢文編《新出簡帛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2004。

② 參見荊州地區博物館《江陵王家台15號秦墓》，《文物》1995年第1期。

③ 參見朱漢民、陳松長主編《嶽麓書院藏秦簡（壹）》，上海辭書出版社，2010。

④ 北京大學出土文獻研究所：《北京大學新獲秦簡牘概述》，《北京大學出土文獻研究所工作簡報》總第3期，2010年10月，3-4頁。

⑤ 北京大學出土文獻研究所：《北京大學藏秦簡牘概述》，《文物》2012年第6期，67頁。

定,而節序上的不同,體現了一定的文本差別,也說明各節原本是相對獨立的文章,這一部分簡文實際是由五節相對獨立的文章雜抄到一起。”

所以,《爲吏之道》等作爲雜抄,應該是我們進行分析的前提。故對其思想進行分析,就不能籠統地討論,必須要分章節來研究。研究時尤其要注意自己分析時的指導思想和方法論,否則很容易過於主觀地尋求有利於自己的結論。

## 秦簡所見地方行政制度研究的新進展<sup>\*</sup>

嘉應學院政法學院 吳方基

**內容提要** 秦代地方行政制度的探討主要依據出土秦簡。近年隨着新出秦簡的刊布,秦代地方行政制度研究取得許多新進展,郡縣行政建置、文書行政制度、政務運行機制等方面新研究成果頻出,尤其是在縣屬機構、郡縣治理模式、文書用語、郵傳制度研究等方面新觀點不斷產生。借助秦簡地方官府檔案,從“政務運行機制”入手,系統考察動態的行政運作與權力分配等問題是地方行政制度研究的新取向。

**關鍵詞** 秦簡 地方行政制度 文書行政制度 政務運行機制

限於傳世文獻記載,過去很少討論秦代地方行政制度,秦制的考察也往往據“漢承秦制”進行推理。隨着里耶、嶽麓等秦簡材料的不斷刊布,秦代地方行政制度研究取得新進展,相關研究成果主要集中於秦代郡級行政建置與治理、縣級行政組織機構與職官設置、官吏任用與管理、行政管理體制與法制、文書行政制度、政務運行機制研究等五個方面。

### 一 郡級行政研究

出土秦簡關於郡級行政的材料較少,郡級行政研究主要集中在郡級建置之考證、郡級行政治理之考察兩個方面。

<sup>\*</sup> 基金項目:本文為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青年項目“新出秦簡與秦代縣級政務運行機制研究”(16CZS029)之階段性成果。

(一)郡級建置研究。關於郡級建置,主要通過出土里耶、嶽麓秦簡考證新出郡(主要有洞庭、蒼梧、黔中、江湖、南郡等)及其屬縣的建置情況,以及討論內史、都官等問題。

圍繞里耶秦簡,對於洞庭郡的沿革及其與蒼梧、黔中郡的關係,周宏偉指出,戰國秦漢時洞庭郡經歷了戰國洞庭郡-秦洞庭郡-臨江國(南郡長沙國)-武陵郡之沿革。<sup>①</sup> 陳偉推定蒼梧、洞庭二郡是秦始皇二十五年將原黔中郡一分為二而來,西北一部分改稱“洞庭郡”;東南一部則稱作“蒼梧郡”,後世以“長沙郡”稱之。<sup>②</sup> 鐘煒認為秦黔中郡是“洞庭郡”之前身,洞庭郡又為《漢志》武陵郡之前身,三者轄境上有區別。<sup>③</sup> 趙炳清、周振鶴提出長沙、黔中二郡實際上並不存在,應以洞庭、蒼梧兩郡取代之。<sup>④</sup> 徐少華、李海勇、莊小霞探索秦楚洞庭、黔中、蒼梧、南郡諸郡縣的建置及地望。<sup>⑤</sup> 韓國全蕙蘭則綜合分析郡的作用和權限,考察秦及漢初郡的變化過程。<sup>⑥</sup>

對於郡治的考證,王煥林確定洞庭郡的郡治在今湖南常德,蒼梧郡的郡治在零陵(今湖南永州)。<sup>⑦</sup> 趙炳清考定洞庭郡的郡治在長沙。<sup>⑧</sup> 鐘煒、晏昌貴則認為秦洞庭郡治應在臨沅或索。<sup>⑨</sup>

嶽麓秦簡刊布,其中新出江湖郡,陳松長推測江湖郡有可能是秦為加強吳越江湖之地而設立的郡,地望可能在湖泊眾多的吳楚之地。<sup>⑩</sup> 于薇持不同意見,指出江湖郡即淮陽郡,設立區域可能是在古江、胡國的區域。<sup>⑪</sup> 王偉認為“州陵守”不是秦郡的名稱,州陵應該是南郡下轄的縣名。<sup>⑫</sup> 陳偉推測江湖郡應該在楚國故地九江以東,可能是會稽郡的前身。<sup>⑬</sup>

關於都官、內史,作為較特殊一級官府機構,學界討論較多。針對都官的關注點主要是都官的性質問題,存有分歧:一認為都官是中央京師諸卿部門直接下派的部屬機構;<sup>⑭</sup> 曹旅寧

① 周宏偉:《傳世文獻中沒有記載過洞庭郡嗎?》,《湖南師範大學學報》2003年第3期。

② 陳偉:《秦蒼梧、洞庭二郡芻論》,《歷史研究》2003年第5期。

③ 鐘煒:《楚秦黔中郡與洞庭郡關係初探》,《湖北大學學報》2005年第4期。

④ 趙炳清:《秦代無長沙、黔中二郡略論》,《中國歷史地理論叢》2005年第4期。周振鶴:《秦代洞庭、蒼梧兩郡懸想》,《復旦學報(社會科學版)》2005年第5期。

⑤ 徐少華、李海勇:《從出土文獻析楚秦洞庭、黔中、蒼梧諸郡縣的建置與地望》,《考古》2005年第11期。莊小霞:《〈里耶秦簡(壹)〉所見秦代洞庭郡、南郡屬縣考》,《簡帛研究二〇一二》,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3。

⑥ [韓]全蕙蘭:《秦、漢初郡的考察》,東洋史學研究會,2013。

⑦ 王煥林:《里耶秦簡釋地》,《社會科學戰線》2004年第3期。

⑧ 趙炳清:《秦洞庭郡略論》,《江漢考古》2005年第2期。

⑨ 鐘煒、晏昌貴:《楚秦洞庭蒼梧及源流演變》,《江漢考古》2008年第2期。

⑩ 陳松長:《嶽麓書院藏秦簡中的郡名考略》,《湖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9年第2期。

⑪ 于薇:《試論嶽麓秦簡中“江湖郡”即“淮陽郡”》,簡帛網,2009年6月18日。

⑫ 王偉:《嶽麓書院藏秦簡所見秦郡名稱補正》,《考古與文物》2010年第5期。

⑬ 陳偉:《“江湖”與“州陵”》,《中國歷史地理論叢》2010年第1期。

⑭ 高恒:《秦簡中與職官有關的幾個問題》,《雲夢秦簡研究》,北京:中華書局,1981。[日]江村治樹:《雲夢睡虎地出土秦律の性格をめぐって》,《東洋史研究》40-1,1981。

直接指出秦都官是秦內史的派出機構，職掌經濟。<sup>①</sup> 林少平則認為秦孝公以後都官為內史、尉及所屬各官吏，但不包括京畿各縣。<sup>②</sup> 二指出都官為中央官府及其地方派出機關的總稱，直屬中央；<sup>③</sup> 三推定都官為一種特殊的地方政府機構，是一種封邑管理體制。<sup>④</sup>

針對內史的研究主要集中於探討內史的發展變化和內史置縣問題。關於內史的變化，日本學者討論較多。工藤元男認為秦內史的職掌超越關中範圍，管轄秦的整個縣倉的倉籍和公器，其下配置太倉和大內，管理縣及都官的糧草和財貨，統一六國後，內史祇掌京師。<sup>⑤</sup> 森谷一樹通過分析漢初《二年律令》有關內史的情況補充工藤元男的論述，指出漢初內史的職掌與睡虎地秦簡所見的職掌有相同之處。<sup>⑥</sup> 江村治樹、藤田勝久持不同意見，指出難以確定內史與太倉、大內的關係，出土秦律中內史還是掌治京師的內史。<sup>⑦</sup> 此外韓國全惠蘭通過對比發現內史變化下地方行政體系的不同，指出睡虎地秦簡所見秦時期是“內史-縣”一元式體系，但里耶秦簡所見秦代“中央-郡-縣”體系已經確立。<sup>⑧</sup> 國內也有不少學者關注內史的變化問題，不過有些成果確定的變化時間節點與日韓學者不同。張金光斷言秦簡牘所見之內史絕非郡級地方行政一長官，內史的變化時間點推後至西漢之時。<sup>⑨</sup> 尹弘兵認為，漢興之初，全國財經事務由內史掌管，與戰國秦內史的職掌一致，高帝九年後內史兼掌全國財經事務與京師地區。呂后二年至呂后八年間始設治粟內史以專掌財經事務，內史則專治京師。趙志強考證，秦代至西漢早期內史一職的功能逐漸發生分化，內史祇負責職掌京師，而財政經濟職能由治粟內史充當。<sup>⑩</sup> 當然還有學者同樣把內史變化時間點定為秦統一時，彭邦炯認為戰國秦內史下設大內、少內和少府，主管全國財政經濟，秦統一後內史祇管理畿內之事。<sup>⑪</sup>

① 曹旅寧：《秦律都官新探》，《秦律新探》，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2。

② 林少平：《秦漢都與都官考》，簡帛網，2015年5月11日。

③ 于豪亮：《雲夢秦簡所見職官述略》，《于豪亮學術文存》，北京：中華書局，1985。王輝：《“都官”顏注申論》，《人文雜誌》1993年第6期。〔日〕高村武幸：《秦漢時代的都官》，《東洋學報》87-2，2005。王戰闊：《睡虎地秦簡“都官”新解》，《南都學壇》2013年第2期。

④ 高敏：《從雲夢秦簡看秦的幾項制度》，《雲夢秦簡初探》，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1。劉森：《秦都官考》，《人文雜誌》1991年第5期。〔日〕工藤元男：《秦都官與封建制》，《睡虎地秦簡所見秦代國家與社會》，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日〕青木俊介：《秦から漢初における都官と県官——睡虎地秦簡〈法律答問〉九五簡の解釋を通じて》，《中國出土資料研究》15，2011。周豔濤：《秦簡所記“都官”性質新議》，《中華文化論壇》2013年第12期。

⑤ 〔日〕工藤元男：《秦の內史——主として睡虎地秦墓竹簡にみる》，《史學雜誌》90-3，1981。

⑥ 〔日〕森谷一樹：《〈二年律令〉に見える內史について》，富谷至編：《江陵張家山二四七號墓出土漢律令の研究（論考篇）》，京都：朋友書店，2006。

⑦ 〔日〕江村治樹：《雲夢睡虎地出土秦律の性格をめぐって》，《東洋史研究》40-1，1981。〔日〕藤田勝久：《中國古代關中の開發》，《中國古代國家と郡縣社會》，東京：汲古書院，2005。

⑧ 〔韓〕全惠蘭：《秦漢初的內史和郡》，《중국고중세사연구》32，2014。

⑨ 張金光：《秦簡牘所見內史非郡辨》，《史學集刊》1992年第4期。

⑩ 趙志強：《關於秦漢內史的幾個問題》，《出土文獻》第8輯，上海：中西書局，2016。

⑪ 彭邦炯：《從出土秦簡再探秦內史與大內、少內和少府的關係和職掌》，《考古與文物》1987年第5期。



楊振紅指出在商鞅變法前,內史統治采取的仍然是西周的體制,即管轄都、鄉、邑、聚等。商鞅變法時,開始在內史(首都咸陽)下設三十一縣,將新的縣制與舊的內史制結合;秦統一後,為建立與之相適應的統一的中央集權郡縣制國家,廢除作為分封制基礎內容的王畿之制,將“邦”改稱為“都”,與“郡”相當,內史自此成為郡縣制的一環。<sup>①</sup> 關於內史置縣的討論,出現內史置縣數量上的差別。徐衛民考證的是 44 個縣;后曉榮、田小娟認為可確證的是 42 縣;吳良寶、秦鳳鶴指出戰國、秦代內史的轄縣有 35 個,傳世史書記載屬於內史轄縣的有 3 個,另有 11 個縣級資料尚有爭議。<sup>②</sup>

(二)郡級行政治理研究。因材料限制,郡級行政治理的探討主要是個案研究,以點見面。韓國李成珪認為秦代地方官制立足於法治,也非常重視鄉俗,這一矛盾促使秦帝國加強對舊東方六國地區的支配與地域限制。<sup>③</sup> 金秉駿考察樂浪郡治理形態,認為樂浪郡內與中國內地同樣實行律令體系。<sup>④</sup> 臺灣游逸飛以洞庭郡為個案探討郡級行政,認為秦郡太守、郡尉、監御史皆有獨立辦公的官署、屬吏,實為三府并立的地方政府組織;指出洞庭郡遷陵縣所見戍卒均為外郡人,所見官吏即便是最低級的屬吏亦為外郡人,外來官吏、戍卒、黔首與刑徒共同構成移民社會,洞庭郡遷陵縣是“強政府,弱社會”的代表。<sup>⑤</sup> 唐俊峰以巴、蜀兩郡屬縣之文書為中心,探討秦代跨縣行政。<sup>⑥</sup>

## 二 縣級行政組織機構與職官設置

關於縣級行政組織機構與職官設置的研究,主要考察縣級行政組織機構的建制、職官設置、職權及其發展變化,從研究內容看多屬於職官制度,為靜態的、微觀研究。

(一)綜合研究。袁剛、鄒水傑、王彥輝、單印飛、韓國金炯吾等綜合考論縣廷官吏設置、

① 楊振紅:《從秦“邦”、“內史”的演變看戰國秦漢時期郡縣制的發展》,《中國史研究》2013 年第 4 期。

② 徐衛民:《秦內史置縣研究》,《中國歷史地理論叢》2005 年第 1 期。后曉榮、田小娟:《秦內史置縣新證》,《西部考古》第 2 輯,西安:三秦出版社,2007。吳良寶、秦鳳鶴:《戰國至秦代內史轄縣新考》,《社會科學戰綫》2016 年第 2 期。

③ [韓]李成珪:《秦帝國的舊六國統治與其界限》,《閔錫泓博士華甲紀念史學論叢》,首爾:三英社,1985。

④ [韓]金秉駿:《中國古代簡牘資料所見的樂浪郡的郡縣支配》,《歷史學報》第 189 輯,2006。

⑤ 游逸飛:《守府、尉府、監府》,《簡帛》第 8 輯,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游逸飛:《戰國至漢初的郡制變革》,臺灣大學歷史學研究所博士論文,2014。游逸飛:《里耶秦簡所見的洞庭郡》,簡帛網,2015 年 9 月 29 日。

⑥ 唐俊峰:《里耶秦簡所見秦代跨縣行政初探》,“中國秦漢史研究會第十四屆年會暨國際學術研討會”,四川成都,2014 年 8 月 15-19 日。

行政職能、縣祿秩等級演變等。<sup>①</sup> 王彥輝分析得出秦代遷陵縣設有九曹：少內、尉曹、吏曹、戶曹、倉曹、庫曹、司空曹、獄曹、厩，發現遷陵縣田官系統與田部系統并存。黃海烈、陳松長對里耶、嶽麓秦簡所見職官進行考證。<sup>②</sup> 呂靜集中論析基層文吏情況，認為“文吏”是一個專心事主、曉習法令、熟擅簿書、破艱理煩、輔佐行政首腦執行公務的龐大職業化的官僚群體。<sup>③</sup> 日本土口史記指出，與官嗇夫為長官的“官”相比，縣令所統領的縣廷在人事權及文書傳達方面具有絕對的優勢地位，確保作為行政機關的縣的一體性。<sup>④</sup> 加拿大葉山認為縣行政組織由不同的單位所組成，有縣令、令的直接下屬丞，以及負責安全的官員尉，行政單位有：獄東曹、獄南曹、戶曹、倉曹、司空曹、金布曹、廷吏曹、尉曹等。<sup>⑤</sup>

（二）縣令、丞研究。于振波證實秦代縣的長官稱“縣令”。<sup>⑥</sup> 鄒水傑指出秦代縣行政主官稱謂有三種：令、嗇夫和守。<sup>⑦</sup> 李斯認為里耶秦簡中的“縣嗇夫”和“大嗇夫”並不完全等同於縣令、長，“縣嗇夫”祇是一種非正式的泛稱，意為縣的主官，可能指令，也可能指守；而“大嗇夫”作為“縣嗇夫”的助手處理行政事務，行使縣尉的職權。<sup>⑧</sup> 蘇衛國、崔殿堯同樣證實縣級政府實行的是一種縣令與縣嗇夫共同統治的模式，提出“縣嗇夫”是郡府長官為辦理軍政要務而派遣至所屬縣的吏員，管轄權主要集中在徭役、軍役及租賦上，在任期間，有監督監察所駐縣之令、丞之責。<sup>⑨</sup> 韓國李成珪、日本工藤元男也持縣嗇夫和縣令並列的看法。<sup>⑩</sup> 韓國任仲燮則強調縣令與縣嗇夫等同。<sup>⑪</sup>

（三）縣尉研究。由於材料所限，過去研究秦漢縣尉集中於漢代，主要考察漢代縣尉的設置及秩級、治所、屬吏、職掌、升遷、任用與管理等，然而，對於秦代縣尉，很少探討。隨著睡虎

① 袁剛：《秦漢縣政府機構設置與行政職能》，《南都學壇》2000年第2期。鄒水傑：《秦漢縣丞尉設置考》，《南都學壇》2006年第2期。鄒水傑：《簡牘所見秦漢縣祿秩等級演變考》，《北大史學》第12輯，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鄒水傑：《里耶簡牘所見秦代縣廷官吏設置》，《咸陽師範學院學報》2007年第3期。王彥輝：《〈里耶秦簡〉（壹）所見秦代縣鄉機構設置問題蠡測》，《古代文明》2012年第4期。單印飛：《略論秦代遷陵縣吏員設置》，《簡帛》第11輯，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韓]金炯吾：《秦帝國時期縣廷的構造》，東洋史學研究會，2013。

② 黃海烈：《里耶秦簡與秦地方官制》，《北方論叢》2005年第6期。陳松長：《嶽麓秦簡中的幾個官名考略》，《湖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5年第3期。

③ 呂靜：《秦漢官僚體制下的基層文吏研究》，《北京行政學院學報》2011年第6期。

④ [日]土口史記：《戰國・秦代の県》，《史林》95-1，2012。

⑤ [加]葉山：《解讀里耶秦簡——秦代地方行政制度》，《簡帛》第8輯，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

⑥ 于振波：《說“縣令”確為秦制》，《中國歷史文物》2006年第3期。

⑦ 鄒水傑：《秦代縣行政主官稱謂考》，《湖南師範大學社會科學學報》2006年第2期。

⑧ 李斯：《里耶秦簡所見縣主官稱謂新考》，《內蒙古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9年第3期。

⑨ 蘇衛國：《重新定位“縣嗇夫”的思考》，《史學月刊》2006年第4期。崔殿堯：《里耶秦簡中所見“縣嗇夫”新證》，《學理論》2010年第5期。

⑩ [韓]李成珪：《秦代的山林藪澤的開發結構》，《東洋史學研究》第29輯，1989。[日]工藤元男：《雲夢睡虎地秦墓竹簡に見える県・道嗇夫と大嗇夫について》，《中國禮法と日本律令制》，東京：東方書店，1992；《睡虎地秦簡よりみた秦代の国家と社會》第十章，東京：創文社，1998。

⑪ [韓]任仲燮：《戰國秦的地方行政組織》，《中國學論叢》第7輯，1993。

地秦墓竹簡和一些里耶秦簡等新材料的整理刊布,秦代設有縣尉得到證實,有關其設置、名稱、職掌等情況也有一定討論。不過對縣尉的名稱和一縣所設置數量問題存在爭論,關於名稱,一些研究對《漢書·樊噲傳》載“從攻圍都尉”顏師古注:“圍即陳留圍縣,是秦時縣尉原稱都尉”的說法有不同意見,一方贊成顏注所言“縣尉原稱都尉”;<sup>①</sup>另一方則指出顏注的說法證據不足。<sup>②</sup> 對於一縣所設縣尉的數量,主要有兩種意見,一種認為秦朝一縣設置四尉;<sup>③</sup> 另一種則指出除京縣外,一縣設一尉、二尉或不設尉。<sup>④</sup> 近來曹旅寧據最新公布的嶽麓秦簡(四)對秦縣尉所掌人事權、戶籍管理權、上計權及其行政依照法定治事程式等內容進行論述。<sup>⑤</sup> 但是還有一些問題可再討論,主要有縣尉及其下屬機構的吏員設置和縣尉的行政運作及其與縣令、丞的關係問題。

(四)縣屬機構研究。有關秦代縣屬機構,史籍記載很少,以往據漢代情況推理,大致分為綱紀、門下、列曹三類。睡虎地秦簡出土,發現諸多“官嗇夫”,引起很大關注,由於缺乏“曹”的記載,縣下屬吏的“官”與“曹”的關係少有研討。不過值得注意的是,日本仲山茂對“官”與“曹”進行分別論述。<sup>⑥</sup> 隨着衆多里耶秦簡整理刊布,縣之“官”“曹”記載頻現。日本青木俊介據先期公布的30余枚簡牘對縣下屬組織進行探討。<sup>⑦</sup> 其後《里耶秦簡(壹)》出版,郭洪伯以此區別“官”與“曹”,認為秦簡中稱“官”的基層機構表示“稗官”,是執行各項對外事務的職能部門,而與之相應的令史、尉史等組成基層機構的輔助部門,在縣廷分曹辦公。<sup>⑧</sup> 最近孫聞博又加以重新檢討,指出里耶秦簡所見秦代縣屬吏之“曹”“官”分立,并對“曹”“官”任職者初作一定論述,認為令史可被考慮從事列曹工作,顯示列曹地位稍高於諸官。<sup>⑨</sup> 同年,韓國學者金鐘希強調縣曹組織作為“縣廷”內部的部署,起到管理“官”的媒介體作用。<sup>⑩</sup> 之後,日本學者土口史記通過考察秦代縣令史與曹之關係,指出“曹”祇用於處理文檔,不進行行政事務,其職責由令史出任。<sup>⑪</sup> 李昭毅佐證了土口史記所揭示令史確為主列曹事者

① 于豪亮:《雲夢秦簡所見職官述略》。高恒:《秦簡中的職官及其有關的幾個問題》,《秦漢法制論考》,廈門大學出版社,1994。黃留珠:《戰國後期秦的職官與選官制度》,王子今、白建鋼、彭衛主編《紀念林劍鳴教授史學論文集》,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2。

② 張玉林:《秦漢縣尉設置考》,“甘肅省第二屆簡牘學國際學術研討會”,甘肅蘭州,2011年8月25-26日。

③ 于豪亮:《雲夢秦簡所見職官述略》。黃留珠:《戰國後期秦的職官與選官制度》。

④ 鄒水傑:《秦漢縣丞尉設置考》,《南都學壇》2006年第2期。張玉林:《秦漢縣尉設置考》。

⑤ 曹旅寧:《嶽麓秦簡(四)中所見秦郡尉與秦縣尉》,簡帛網,2015年1月26日。

⑥ [日]仲山茂:《秦漢時代の“官”と“曹”》,《東洋學報》82-4,2001。

⑦ [日]青木俊介:《里耶秦簡に見える県の部局組織について》,《中國出土資料研究》9,2005。

⑧ 郭洪伯:《稗官與諸曹》,《簡帛研究二〇一三》,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4。

⑨ 孫聞博:《秦縣的列曹與諸官》,《簡帛》第11輯,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

⑩ [韓]金鐘希:《秦代縣的曹組織與地方官制》,《東洋史學研究》第128輯,2014。

⑪ [日]土口史記:《里耶秦簡にみる秦代県下の官制構造》,《東洋史研究》73-4,2015;《秦代の令史と曹》,《東方學報》第90冊,2015。

的觀點。<sup>①</sup>

關於縣屬機構的研究，劉向明、劉曉滿考察秦漢令史分布及其變遷。<sup>②</sup> 鄒水傑指出，秦至漢縣屬吏的設置體現出逐漸制度化、科層化的發展趨勢。<sup>③</sup> 日本水間大輔還論述秦漢律中的“士吏”，指出“士吏”是作為縣常備軍骨幹的衆多少吏。<sup>④</sup>

針對“司空”，宋傑指出秦西漢政府在郡國縣鄉設置“司空”，掌管水利、土建工程及役使罪犯勞作，並負責徭役徵發等事務。<sup>⑤</sup> 鄒水傑認為縣司空設有秩、嗇夫或守，管理縣中徭役、刑徒和居貲贖債事務；秦簡“司空曹”表示的是縣廷中處理司空機構文書、事務的令史之辦公場所。<sup>⑥</sup>

“田”與“田官”問題研究有些爭議，主要分歧點是兩者的設置級別與區分問題。關於設置級別討論主要有兩種意見：一種意見認為“田”設於鄉一級，另一意見認為“田”設於縣一級。王彥輝認為秦及漢初國家在鄉里設置兩套平行的管理機構——鄉部和田部，田部的吏員有田嗇夫、田佐，里中有田典。縣級總管農田水利事務的職官為都田嗇夫。<sup>⑦</sup> 陳偉、鄒水傑、李勉等則認為“田”設置於縣一級，陳偉指出“田”之長官田嗇夫看作全縣農事的主管官員，應該是最合理的判斷；鄒水傑指出縣廷設有田嗇夫、田佐，有時也稱都田嗇夫和都田佐；各離鄉設有田部佐和田部史；李勉區別“田”與田部，認為“田”指的是田官署或田嗇夫，設置於縣一級，並非田部；縣廷列曹以事務為中心對田進行監督和審核，田與鄉的職權有重疊。<sup>⑧</sup> 同時里耶秦簡“田官”的出現引發討論“田”與“田官”的區分問題。對於“田官”的性質，張春龍、龍京沙先生認為是“鄉嗇夫的佐吏”；卜憲群指出“田官”設於鄉；王彥輝論證“田官”屬於都官系統。<sup>⑨</sup> 陳偉區分“田”與“田官”，證明“田”與“田官”均隸屬於縣，“田”主管全縣農事，“田官”可理解為屯田系統。<sup>⑩</sup>

① 李曉毅：《土口史記〈里耶秦簡所見的秦代文書行政〉讀後》，“‘中古中國的政治與制度’學術研討會”，北京，2014年5月24-25日。

② 劉向明：《從出土秦律看縣“令史”一職》，《齊魯學刊》2004年第3期。劉曉滿：《秦漢令史考》，《南都學壇》2011年第4期。

③ 鄒水傑：《簡牘所見秦漢縣屬吏設置及演變》，《中國史研究》2007年第3期。

④ [日]水間大輔：《秦、漢初縣的“士吏”》，《史學雜誌》120-2，2011。

⑤ 宋傑：《秦漢國家統治機構中的“司空”》，《歷史研究》2011年第4期。

⑥ 鄒水傑：《也論里耶秦簡之“司空”》，《南都學壇》2014年第5期。

⑦ 王彥輝：《田嗇夫、田典考釋——對秦及漢初設置兩套基層管理機構的一點思考》，《東北師大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0年第2期。

⑧ 陳偉：《里耶秦簡所見的“田”與“田官”》，《中國典籍與文化》2013年第4期。鄒水傑：《再論秦簡中的田嗇夫及其屬吏》，《中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4年第5期。李勉：《再論秦及漢初的“田”與“田部”》，《中國農史》2015年第3期。

⑨ 張春龍、龍京沙：《湘西里耶秦代簡牘選釋》，《中國歷史文物》2003年第1期。卜憲群：《秦漢之際鄉里吏員雜考——以里耶秦簡為中心的探討》，《南都學壇》2006年第1期。王彥輝：《〈里耶秦簡〉（壹）所見秦代縣鄉機構設置問題蠡測》。

⑩ 陳偉：《里耶秦簡所見的“田”與“田官”》。



有關少內，羅開玉認為秦國“少內”是設立在各縣政府、京師各官署內掌管現金的機構；行政上受所在官署的管轄，業務上受其監督而不受其管轄，直接受中央有關機構（可能是大內）統轄。<sup>①</sup> 彭邦炯、陳治國、張立瑩、日本工藤元男、山田勝芳探討少內與大內的關係。<sup>②</sup> 陳治國、張立瑩指出秦代少內主管縣財政收入與支出，大內是國家的國庫；秦代少內與大內有業務上的往來，在行政管理上服從縣長官的領導。

其他還有張春龍等討論秦遷陵縣學官。<sup>③</sup> 高士榮發現農官在縣、鄉、里均有設置。<sup>④</sup> 韓國崔昌大對縣倉機構進行研究。<sup>⑤</sup> 日本水間大輔重點探析縣獄吏員設置與職責。<sup>⑥</sup> 王煥林、王彥輝、朱紅林、吳方基考察金布機構。<sup>⑦</sup> 吳方基指出金布不是以往認為隸屬於少內，而是直接隸屬於縣廷，為縣列曹之一，主管統計庫中的兵、車、工用、工用器和少內機構中的器物、金錢等財物，核准縣屬各機構“課”。

（五）鄉、亭、里研究。關於鄉亭里之間的關係，一度是學界爭論的熱點。張金光、劉海年、高榮、卜憲群等再考察鄉亭里之間的關係，<sup>⑧</sup> 並逐步取得共識，認為鄉里與亭分屬於不同系統，亭的設置與行政組織無關。日本水間大輔、佐竹靖彥、堀敏一、富谷至也探討鄉亭諸問題。<sup>⑨</sup> 水間大輔認為秦漢時期的亭是直屬於縣的機關，與鄉相互補充承擔維護治安的任務，兩者之間沒有統屬關係。富谷至指出“亭”是行政機關的附屬設施，與“驛”不同，是另類文

① 羅開玉：《秦國“少內”考》，《西北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81年第3期。

② 彭邦炯：《從出土秦簡再探秦內史與大內、少內和少府的關係與職掌》。陳治國、張立瑩：《從新出簡牘再探秦漢的大內與少內》，《江漢考古》2010年第3期。〔日〕工藤元男：《睡虎地秦墓竹簡にみえる大内と少内》，《史觀》105，1981。〔日〕山田勝芳：《秦漢時代の大内と少内》，《集刊東洋學》57，1987。

③ 張春龍：《里耶秦簡中遷陵縣學官和相關記錄》，《出土文獻》第1輯，上海：中西書局，2010。

④ 高士榮：《秦國及秦朝地方農官制度研究》，《西安財經學院學報》2011年第6期。

⑤ 〔韓〕崔昌大：《通過倉律所見的縣倉》，《釜山工業大學論文集》第32輯，1990。

⑥ 〔日〕水間大輔：《秦漢時期縣獄史的職責》，王沛主編《出土文獻與法律史研究》第1輯，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日〕水間大輔：《秦漢縣獄吏考》，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等編《漢代城市和聚落考古與漢文化》，北京：科學出版社，2012；〔日〕水間大輔：《里耶秦簡所見的“牢監”與“牢人”》，王沛主編《出土文獻與法律史研究》第2輯，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

⑦ 王煥林：《里耶秦簡校詁》，北京：中國文聯出版社，2007，50頁。王彥輝：《〈里耶秦簡〉（壹）所見秦代縣鄉機構設置問題蠡測》。朱紅林：《里耶秦簡“金布”與〈周禮〉中的相關制度》，《華夏考古》2007年第2期。吳方基：《論秦代金布的隸屬及其性質》，《古代文明》2015年第2期。

⑧ 張金光：《秦鄉官制度及鄉、亭、里關係》，《歷史研究》1997年第6期。劉海年：《秦的治安機構及有關治安的法律規定》，《戰國秦代法制管窺》，北京：法律出版社，2006。高榮：《“十里一亭”說考辨》，《南都學壇》2008年第3期；高榮：《論秦漢的都亭與鄉亭》，《歷史教學》2008年第11期。卜憲群：《簡帛與秦漢地方行政制度史研究》，《國學學刊》2010年第4期。

⑨ 〔日〕水間大輔：《秦漢的亭卒》，《東亞古代出土文字資料研究》，2009；〔日〕水間大輔：《秦漢的亭吏及與他官的關係》，《中國出土資料研究》13，2009；〔日〕水間大輔：《秦漢亭的治安維持機能》，鈴木秀光等編《法的流通》，東京：慈學社，2009；〔日〕水間大輔：《秦漢鄉的治安維持機能》，《史滴》31，2009。〔日〕佐竹靖彥：《里鄉亭里制度攷証》，《東京都立大學・人文學報》199，1988。〔日〕堀敏一：《中国古代の亭をめぐる諸問題》，《中国古代の家と聚落》，東京：汲古書院，1996。〔日〕富谷至：《有關亭制的一個考察》，轉引自村松弘一撰、李冬君譯《2003年日本史學界關於戰國、秦漢史的研究》，《中國史研究動態》2005年第5期。



書的傳達站。

關於鄉里，全晰綱、楊劍虹探析里的起源、里吏的職能及選用和里的社會職能。<sup>①</sup> 王彥輝、徐傑令、卜憲群、王愛清、孫聞博等考察鄉里組織、吏員設置與鄉行政。<sup>②</sup> 卜憲群指出鄉里除了鄉嗇夫、鄉主、鄉守、鄉佐、里典、里佐、郵人等官職之外，還有隸屬於都官系統的鄉司空、倉主、田官、田典等；秦代鄉里吏員擔負有文書行政、文書傳遞、簿籍管理、法律事務、家庭糾紛處理、債務糾紛處理、複雜的經濟事務等職責。

日本重近启树、堀敏一、橋本健史、飯尾秀幸、高村武幸、韓國金燁、李裕成等考察鄉里問題。<sup>③</sup> 橋本健史認為鄉在當地社會和國家間發揮媒介作用，將當地共同體的職能納入到國家統治中；飯尾秀幸指出位於里門與邑門內側的村落中存在着源於“共同體”的習俗，國家把習俗納入自己的法律體系；高村武幸則強調秦代與西漢初期的鄉是統屬於縣的行政機構，不存在“共同體”；金燁指出秦帝國並不用冷酷、整齊劃一的法治方式來統治地方，而是通過寬容的統治來維護地方自律的民間秩序。

### 三 官吏任用與管理

孫鴻燕、楊振紅、戴衛紅、陳侃理、黃可佳等綜合論述郡縣官吏的任用、遷轉、罷免、為吏條件等問題。<sup>④</sup> 楊振紅提出秦漢時期由“尉”負責吏的任免。陳侃理補全喜的升遷履歷，為研究秦代基層官吏升遷途徑，提供目前最完整的案例。黃可佳說明，對基層官吏進行考核選拔上，存在多個人選的競爭，擬推薦的任職人員，也有被否決的可能；同屬縣廷直屬的各曹，也

① 全晰綱：《秦漢時期的里》，《山東師大學報》1988年第4期；全晰綱：《秦漢鄉官里吏考》，《山東師範大學學報》1995年第6期。楊劍虹：《從簡牘看秦漢時期的鄉與里組織》，《陝西歷史博物館館刊》第3輯，西安：西北大學出版社，1996。

② 王彥輝、徐傑令：《論東周秦漢時代的鄉官》，《史學集刊》2001年第3期。卜憲群：《秦漢之際鄉里吏員雜考——以里耶秦簡為中心的探討》，卜憲群：《從簡帛看秦漢鄉里組織的經濟職能問題》，《史學月刊》2008年第3期；卜憲群：《從簡牘看秦代鄉里的吏員設置與行政功能》，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編：《里耶古城·秦簡與秦文化研究：中國里耶古城@秦簡與秦文化國際學術研會討論文集》，北京：科學出版社，2009。王愛清：《秦漢鄉里控制研究》，濟南：山東大學出版社，2010。孫聞博：《秦漢三國鄉吏與鄉政研究述評》，《秦漢研究》第3輯，西安：陝西人民出版社，2010；孫聞博：《簡牘所見秦漢鄉政新探》，《簡帛》第6輯，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

③ [日]重近启树：《秦漢の鄉里制をめぐる諸問題》，《歷史評論》403-11，1983。[日]堀敏一：《中国古代の里》，《中国都市の歴史的研究》，唐代史研究会報告第VI集，1988。[日]橋本健史：《統一秦の鄉的職能》，《中國前近代史論集》，東京：汲古書院，2007。[日]飯尾秀幸：《秦・前漢初期における里の内と外》，《中國前近代史論集》，東京：汲古書院，2007。[日]高村武幸：《秦・漢初の鄉》，《漢代の地方官吏と地域社會》，東京：汲古書院，2008。[韓]金燁：《中国古代的地方統治與鄉里社會》，《大丘史學》第37輯，1989。[韓]李裕成：《關於戰國秦的鄉村支配政策的考察》，《中國學報》第33輯，1993。

④ 孫鴻燕：《秦漢時期郡縣屬吏辟除問題研究》，《秦漢研究》第1輯，西安：三秦出版社，2007。楊振紅：《秦漢時期的“尉”、“尉律”與“置吏”、“除吏”》，《簡帛》第8輯，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戴衛紅：《湖南里耶秦簡所見“伐閱”文書》，《簡帛研究二〇一三》，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4。陳侃理：《睡虎地秦簡〈編年記〉中“喜”的宦歷》，《國學學刊》2015年第4期。黃可佳：《秦代基層小吏的升遷模式》，《南都學壇》2016年第2期。

有權重權輕之分,并據此形成升遷過程的隱形階梯和步驟。再有,斯琴畢力格、羅見今、于洪濤、朱紅林、何晉等討論官吏日常值班問題。<sup>①</sup>

特別提出的是針對秦代地方“守”官的探討。里耶秦簡出現很多“守”官記載,對於“守”的含義,學界爭論很大,主要有三種觀點:一方認為“守”是掌管、主管的意思,“××守”就是××官署的最高長官和實際負責人,持這一觀點的學者有楊宗兵、陳松長、陸德富等。<sup>②</sup> 另一方則意見相反,他們認為“守”是“試守”“代理”之意,持這一觀點的學者有張春龍、龍京沙、李學勤、馬怡、陳治國、農茜、王彥輝、孫聞博、秦濤、沈剛等。<sup>③</sup> 張春龍、龍京沙同時又有所修正說,秦時縣、鄉吏員的設置較傳世文獻記載要複雜得多,“守”也不一定是“試守”或“代理”之意。王彥輝也有保留的指出,“守”的含義,可以確定者有“試官”“臨時代理”之義,其餘義項尚有待進一步分析。孫聞博從時間上探討“守”官的性質,指出“守”產生的時間是在官吏不在官署,“真官”歸署守官即罷。第三種為并存說,認為正式長官與“守官”在秦代地方職官系統中同時存在,持這一觀點的學者有鄒水傑、張朝陽、高震寰等。<sup>④</sup>

## 四 行政管理體制與法制研究

(一)行政管理體制研究。袁剛指出,秦漢帝國地方政府郡、縣、鄉三級管理體制從行政意義上講還是相當有成效的。<sup>⑤</sup> 全晰綱強調,秦漢的鄉里管理體制別具特色,包括鄉里“自治”體制、行政管理體制、治安管理制度三個層面。<sup>⑥</sup> 鐘煒考證,遷陵縣下轄鄉,鄉下轄里,與

① 斯琴畢力格、羅見今:《嶽麓書院秦簡三年〈質日〉初探》,《內蒙古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2年第3期。于洪濤:《秦簡牘“質日”考釋三則》,《魯東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3年第4期。朱紅林:《里耶秦簡視事簡研究》,王沛主編《出土文獻與法律史研究》第4輯,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何晉:《秦簡“質日”小識》,《出土文獻研究》第14輯,上海:中西書局,2016。

② 楊宗兵:《里耶秦簡縣“守”、“丞”、“守丞”同義說》,《北方論叢》2004年第6期。陳松長:《〈湘西里耶秦代簡牘校釋〉校讀》,《簡牘學研究》第4輯,蘭州:甘肅人民出版社,2004。陸德富:《試說戰國至秦代的縣級職官名稱“守”》,《中國國家博物館館刊》2013年第1期。

③ 張春龍、龍京沙:《湘西里耶秦代簡牘選釋》。李學勤:《初讀里耶秦簡》,《文物》2003年第1期。馬怡:《里耶秦簡選校》,簡帛網,2005年11月14日。陳治國:《里耶秦簡“守”和“守丞”釋義及其他》,《中國歷史文物》2006年第3期。陳治國、農茜:《從出土文獻再釋秦漢守官》,《陝西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7年第S2期。王彥輝:《〈里耶秦簡〉(壹)所見秦代縣鄉機構設置問題蠡測》,《古代文明》2012年第4期。孫聞博:《里耶秦簡“守”、“守丞”新考》,《簡帛研究二〇一〇》,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2。秦濤:《秦律中的“官”釋義》,《西南政法大學學報》2014年第2期。沈剛:《也談秦簡所見之“守官”》,“‘中古中國的政治與制度’學術研討會”,北京,2014年5月24-25日。

④ 鄒水傑:《里耶簡牘所見秦代縣廷官吏設置》;鄒水傑:《秦代縣行政主官稱謂考》。張朝陽:《也從里耶簡談秦代鄉嗇夫與鄉守:論基層管理的雙頭模式》,《史林》2013年第1期。高震寰:《試論秦漢簡牘中的“守”、“假”、“行”》,王沛主編《出土文獻與法律史研究》第4輯,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

⑤ 袁剛:《秦漢地方政府郡、縣、鄉三級管理體制》,《地方政府管理》1996年第3期。

⑥ 全晰綱:《秦漢時期的鄉里管理體制》,《東岳論叢》1999年第4期。

包山楚簡所見縣轄里的結構有所不同。<sup>①</sup> 張朝陽論證鄉採用雙頭模式管理：鄉嗇夫是名義上的一鄉之長，而鄉守實際上主管一鄉事務，鄉守和鄉嗇夫是並列、平行的關係，不互相隸屬。<sup>②</sup> 張信通論述秦漢里行政職能、里自治功能和里行政、自治的二元演進。<sup>③</sup> 李曉筠、晏昌貴、郭濤、魯家亮全面復原秦遷陵縣的鄉里建置。<sup>④</sup>

韓國李成珪、金慶浩、日本藤田勝久等分析秦代郡縣社會的社會結構。<sup>⑤</sup> 金慶浩指出，秦始皇二十四年（223）秦滅楚以後，在該地區迅速設置了洞庭郡—遷陵縣的郡縣體系，並與鄰近的郡縣行政組織建立緊密的聯繫；確認的縣級行政單位具體業務內容則意味着秦國的統治方式在故楚地得到貫徹。

（二）行政管理法制研究。閻曉君、武玉環、周生春、王凱旋、趙理平、劉曉滿、卜憲群、艾永明、王彥輝、薛洪波、于振波、劉太祥、裴永亮、吳方基、荷蘭何四維、日本上田早苗、德國何意志、加拿大葉山等具體討論行政法規、行政問責與處罰、地方性法規、行政官吏管理立法等諸問題。<sup>⑥</sup> 其中安作璋、陳華全面論述秦漢時期關於官吏的立法理念與政策，以及具體法制實踐中對官吏實行的各種法律控制。武玉環認為，秦國地方官吏犯罪主要有任用官吏不當

① 鐘煒：《里耶秦簡所見遷陵的鄉里結構》，簡帛網，2005年12月5日。

② 張朝陽：《也從里耶簡談秦代鄉嗇夫與鄉守：論基層管理的雙頭模式》。

③ 張信通：《秦漢里治研究》，河南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13。

④ 李曉筠：《論秦漢時期鄉村機構的設置》，《魯東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1年第2期。晏昌貴、郭濤：《里耶簡牘所見秦遷陵縣鄉里考》，《簡帛》第10輯，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魯家亮：《里耶秦簡所見遷陵三鄉補論》，《國學學刊》2015年第4期。

⑤ [韓]李成珪：《秦代地方行政組織及其性質》，《東洋史學研究》第31輯，1989。[韓]金慶浩：《里耶秦簡中所反映的秦對南方的統治》，《秦俑博物館開館三十周年秦俑學第七屆年會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西安：三秦出版社，2010。[日]藤田勝久：《里耶秦簡和秦代郡縣社會》，《愛媛大學法文學部論集》人文學科編19，2005；[日]藤田勝久《中國古代國家と郡県社會》，東京：汲古書院，2005；《中國古代國家と社會システム：長江流域出土資料の研究》，第三、四章，東京：汲古書院，2009。

⑥ 閻曉君：《略論秦漢時期地方性立法》，《江西師範大學學報》2000年第3期。武玉環：《從〈睡虎地秦墓竹簡〉看秦國地方官吏的犯罪與處罰》，《吉林大學社會科學學報》2003年第5期。周生春：《雲夢秦簡行政法文獻新論》，《浙江大學學報》2005年第1期。王凱旋：《小議秦漢懲治官吏的立法》，《史學月刊》2006年第6期。趙理平：《秦簡所見官吏的崗位責任制度》，《溫州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7年第1期。劉曉滿：《中國封建社會的行政問責機制》，《鄭州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2年第1期。劉曉滿、卜憲群：《秦漢行政中的效率規定與問責》，《安徽史學》2012年第2期。艾永明：《官員問責：秦律的規範及其評析》，《華東政法大學學報》2012年第3期。王彥輝、薛洪波：《從戶的相關立法談秦漢政府對人口的控制》，《東北師大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3年第1期。于振波：《秦代吏治管窺》，《湖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3年第3期。劉太祥：《簡牘所見秦漢律令行政》，《南都學壇》2013年第4期；劉太祥：《秦漢行政懲罰機制》，《南都學壇》2014年第3期；劉太祥：《簡牘所見秦漢行政法的基本特點》，“‘出土文獻與中國古代文明’學術研討會”，北京，2015年6月6-7日。裴永亮：《〈雲夢睡虎地秦簡〉見秦地方官職務連坐》，《青海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6年第1期。吳方基：《簡牘所見秦代地方性法規與行政管理》，《魯東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6年第5期。[荷]何四維：《秦律遺文》，Sinica Leidensia 17, Leiden: Brill, 1985。[日]上田早苗：《“秦律”における責任》，《中國貴族制社會の研究》，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1987。[德]何意志：《秦始皇時期的法律與官制》，in Jenseits der Grossen Mauer. Der Erste Kaiser von China und seine Terrbkotta-Armee, ed Lothar LEDDEROSE und Adele SCHLOMERS, Gütersloh-München: Bertelsmann Lexikon Verlag, 1990。[加]葉山：《秦朝對官員控制的技術與程式》，《古代中國》20，1995。

罪、失職瀆職罪、經濟與管理方面的犯罪、欺騙上級弄虛作假罪等,說明地方官吏在職責上有明確規定和要求。王彥輝、薛洪波指出,秦漢時期通過“戶”和“邑”兩種途徑實現對人口的控制。于振波提示,秦代嚴格的吏治既可以使勵精圖治的君主政令得到有效貫徹,也可以使暴政的危害迅速擴大。劉曉滿說明行政問責程式是,行政問責主要圍繞特定的問責主體和客體展開,受質詢者在接受質詢者的問責後,一般按規定的時間採取驗問和推辟等形式,對檢舉官吏行政違法的問責中提出的問題進行案驗,調查事實真相後向上級回復,對構成行政犯罪的官吏移交司法審判機關進行驗問,根據責任的大小依法確定不同的處罰形式,主要有行政處分、開除公職、賠償損失、追究刑事責任等。

## 五 文書行政制度研究

關於文書行政制度的研究,主要考察縣級行政文書管理、文書形態與運作、文書用語與文書郵傳制度等。

(一)綜合研究。潘玉民、王光宇、卜憲群、王春芳、吳紅松、汪桂海、陳治國、黎明釗、馬增榮、吳榮政、日本永田英正、土口史記、鷹取祐司等綜合論述文書的種類、體式、術語以及文書處理等。<sup>①</sup> 卜憲群細緻考察鄉里多種類型文書,指出鄉要以文書行政,鄉有秩、鄉嗇夫、鄉佐等鄉官直接管理文書;里除了貫徹上級文書制度外,里吏、里民與其上下級之間可能沒有文書往來,而以“自言”行事。<sup>②</sup> 韓國吳峻錫通過里耶秦簡中記錄的公文書的書寫形式,考察秦代的文書行政方式及其特徵。<sup>③</sup>

(二)文書管理研究。劉太祥、沈剛、吳榮政、劉向明、呂靜、賀科偉等探討秦代官文書的

① 潘玉民:《從雲夢秦簡看秦代的文書工作制度》,《中國檔案》1986年第2期。王光宇:《從雲夢秦簡看秦代官府的文書工作》,《中國檔案》1987年第6期。卜憲群:《秦漢公文文書與官僚行政管理》,《歷史研究》1997年第4期。王春芳、吳紅松:《從里耶簡看秦代文書和文書工作》,《大學圖書情報學刊》2005年第2期。汪桂海:《從湘西里耶秦簡看秦官文書制度》,《簡帛研究二〇〇四》,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6。陳治國:《從里耶秦簡看秦的公文制度》,《中國歷史文物》2007年第1期。黎明釗、馬增榮:《試論里耶秦牘與秦代文書學的幾個問題》,《簡帛》第5輯,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吳榮政:《睡虎地秦簡文書檔案探析》,《檔案學研究》2013年第2期;吳榮政:《里耶秦簡文書檔案初探》,《湘潭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3年第6期。[日]永田英正:《文書行政》,殷周秦漢時代史的基本問題編集委員會《殷周秦漢時代史的基本問題》,汲古書院,2001。[日]土口史記:《中國古代文書行政制度》,《中國史學》23,2013。[日]鷹取祐司:《秦漢官文書的基礎的研究》第一、二部,汲古書院,2015。

② 卜憲群:《從簡帛看秦漢鄉里的文書問題》,《文史哲》2007年第6期。

③ [韓]吳峻錫:《里耶秦簡을 통해 본秦代文書行政方式과 그 특징》,《中國古中世史研究》第21輯,2009。



嚴格管理制度。<sup>①</sup> 沈剛指出,秦代規範行政文書措施主要包括對行政文書做合理的分類;統一文書書寫格式;明確文書內容書寫的細節;保障文書正常傳遞。劉向明分析,秦縣令史承擔文書檔案的管理職能。

(三) 文書形態與運作研究。邢義田認為秦代行政文書依性質可粗分為兩類:一是書寫本單位送出的公文;二是抄錄其他單位的來文,不但抄錄來文內容,還一并抄錄原“某手”。<sup>②</sup> 從不同角度,呂靜也分析里耶秦文書兩種類型:一種是“一事一文一牘”的單件文書,是進入行政傳遞流程的原件文書;另一種是“一事多文一牘”的多件文書,都是具備獨立意義的行政公函,其性質隨着文書處理的不同方式和結果發生質的變化。<sup>③</sup> 呂靜還指出,文書副本也是以行政文書為媒介的郡縣制管理系統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各級官署成為副本使用最密集的場所。<sup>④</sup> 胡平生、游逸飛、于洪濤、楊振紅、單印飛、鄔文玲、單育辰、趙炳清、日本鷹取祐司等考察文書的製作與傳遞。<sup>⑤</sup> 其中鷹取祐司推定 16-5 簡是從洞庭郡“以縣次”的方式經過幾個縣,之後到達遷陵縣的文書;16-6 簡是從洞庭郡依靠郵直接送到遷陵縣的文書;指出如此將同樣的文書傳達兩次,是通過“文書的確切傳達”來確實執行上級命令。楊振紅、單印飛則認為里耶秦簡 J1(16)5、J1(16)6 是一封洞庭郡守分別下達縣嗇夫和郡卒史、屬兩個群體的文書,故出現一式兩份,但最終都經縣傳達至縣尉。李超專論法律文書運作程式:1. 官方文書寫作;2. 文書的審核;3. 郵人送達;4. 原判地守丞對於上報文書處理情況的說明;5. 洞庭郡尉的下達文書。<sup>⑥</sup>

① 劉太祥:《秦漢文書管理制度》,《南都學壇》1992 年第 3 期。黃海烈:《里耶秦簡與秦地方官署檔案管理》,《黑龍江史志》2006 年第 1 期。沈剛:《秦簡所見秦代行政文書標準化問題》,《檔案學通訊》2014 年第 2 期。吳榮政:《秦朝文書檔案事業發展的體制、機制保障》,《檔案學通訊》2013 年第 1 期。劉向明:《從睡虎地秦簡看縣令史與文書檔案管理》,《中國歷史文物》2009 年第 3 期。呂靜:《關於秦代行政文書管理的考察》,《東洋文化研究所紀要》158,2010 年。賀科偉:《秦漢簡牘官文書檔案管理制度初探》,《蘭台世界》2015 年第 2 期。

② 邢義田:《湖南龍山里耶 J1(8)157 和 J1(9)1-12 號秦牘的文書構成、筆迹和原檔存放形式》,《簡帛》第 1 輯,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③ 呂靜:《關於秦代行政文書管理形態之考察》,簡帛網,2010 年 2 月 22 日。

④ 呂靜:《關於秦代文書形態與運作流程的考察》,《傳統中國研究集刊》第 8 輯,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中國古代文書副本之考察》,《史林》2010 年第 5 期。

⑤ 胡平生:《里耶簡所見秦朝行政文書的製作與傳送》,《簡帛研究二〇〇八》,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0。游逸飛:《再論里耶秦牘 8-157 的文書構成與存放形式》,《簡帛研究二〇一二》,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3。于洪濤:《里耶簡“御史問直絡裙程書”傳遞復原》,王沛主編《出土文獻與法律史研究》第 2 輯,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楊振紅、單印飛:《里耶秦簡 J1(16)5、J1(16)6 的釋讀與文書的製作、傳遞》,《浙江學刊》2014 年第 3 期。鄔文玲:《里耶秦簡所見“續食”簡牘及其文書構成》,《簡牘學研究》第 5 輯,蘭州:甘肅人民出版社,2014。單育辰:《里耶秦公文書流轉研究》,《簡帛》第 9 輯,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趙炳清:《秦代地方行政文書運作形態之考察》,《史學月刊》2015 年第 4 期。[日]鷹取祐司:《秦漢時代公文書の下達形態》,《立命館東洋史學》31,2008;[日]鷹取祐司:《秦漢時代の文書伝達形態》,《中國古中世史研究》第 24 輯,2010。

⑥ 李超:《由里耶幾條秦簡看秦代的法律文書程式》,簡帛網,2008 年 11 月 29 日。



日本廣瀨薰雄關注“令書”形態問題。<sup>①</sup> 角谷常子認為,在文書行政的草創期,情報的集中實際上大多采用單獨簡。<sup>②</sup> 法國王德邁長時段探討官方文書書寫手續的演變。<sup>③</sup>

(四)文書用語研究。文書用語研究主要針對探討“如律令”“某手”、收文者稱“主”現象、“却之”等。

關於“如律令”的含義,王國維、陳直、裘錫圭、李均明和日本大庭脩、鷹取祐司等都有研究,主要有三種看法:一是其律令就是法令,要求照此辦理;二是固定的一種下行文書用語,是官府文書的一種常用格式,與具體法令無關;三是符咒用語。<sup>④</sup> 張伯元、王煥林認為“如律令”的含義有一個發展演變的過程,從秦至漢初,“如律令”具有實際內容,有具體法令可按,大致在漢武帝時代,始逐漸成為一種固定的文書格式,為催促命令習語,魏晉以降演變為道家符篆術語。<sup>⑤</sup> 邢義田、劉太祥同樣認為秦代文書中的“如律令”就是強調要求以律令行政。<sup>⑥</sup>

關於“某手”問題,爭論很大,先前主要有三種觀點:抄手說、簽署說和經手說。<sup>⑦</sup> 後又有新的研究提出責任者說和製作者所為說,例如林進忠指出,“某手”是承辦業務的責任者,但并非木牘文字的書寫者。<sup>⑧</sup> 張樂認為,秦代公文書運營過程中,抄手并不留名,文書背面左下角的“某手”署名是多件文書中最早一件文書的製作者所為。<sup>⑨</sup> 也有學者認識到“某手”在文書運營過程中的變化,如日本藤田勝久表示前有“/”號的“某手”指責任者,否則多是抄錄者;<sup>⑩</sup> 韓國吳峻錫指出,隨着文書上記載位置的不同,“手”的意義不同。<sup>⑪</sup> 王曉光認為“某手”有的是經辦人,有的是書手具名,并具體考察其身份。<sup>⑫</sup> 此外,臺灣學者邢義田探討里耶秦簡文書用語“手、半”時發現,以目前已刊布秦簡來說,凡有紀年的用“半”當“發”的文書,全屬始皇廿六至卅一年;出現“發”字的又全屬卅一年及卅一年以後,以此提出“半”“發”二字絕大部分不同時出現是否意味着在卅一年左右曾另有某些文書用語的改變。<sup>⑬</sup>

① [日]廣瀨薰雄:《里耶秦簡所見的“令書”》,《中國簡帛學國際論壇 2009:秦簡牘研究論文集》,2012。

② [日]角谷常子:《里耶秦簡中的單獨簡》,《奈良史學》30,2013。

③ [法]王德邁:《中國古代官方書寫手續的發展》,迪特·艾克邁爾、傅海波《東亞國家與法律》,Weisbaden Harrassowitz,1981。

④ 張伯元:《出土法律文獻研究》,北京:商務印書館,2005,268-284頁。

⑤ 王煥林:《里耶秦簡校詁》,174-175頁。

⑥ 邢義田:《漢代書佐、文書用語“它如某某”及“建武三年十二月候粟君責寇恩事”簡冊檔案的構成》,《治國安邦:法制、行政與軍事》,北京:中華書局,2011;劉太祥:《簡牘所見秦漢律令行政》。

⑦ 陳偉主編:《里耶秦簡牘校釋(第一卷)》,武漢大學出版社,2012,5頁。楊振紅、單印飛:《里耶秦簡 J1(16)5、J1(16)6的釋讀與文書的製作、傳遞》。

⑧ 林進忠:《里耶秦簡“貲贖文書”的書手探析》,《湖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0年第4期。

⑨ 張樂:《里耶簡牘“某手”考》,簡帛網,2011年4月18日。

⑩ 藤田勝久:《里耶秦簡和秦代郡縣社會》,《愛媛大學法文學部論集》人文學科編 19,2005。

⑪ [韓]吳峻錫:《里耶秦簡“手”、“半”의 의미와 釋讀》,《中國古中世史研究》第35輯,2015。

⑫ 王曉光:《里耶秦簡署名與書手略考》,《中國書法》2016年第6期。

⑬ 邢義田:《“手”、“半”、“曰梧曰荆”與“遷陵公”》,簡帛網,2012年5月7日。

關於收文者稱“主”現象，已有研究大致可劃分兩派，一派認為“主”表示“負責人”之意，但有不同理解，卜憲群主張里耶秦簡所見鄉主、縣主未必一定是鄉嗇夫、縣令長，祇是鄉或縣中某事負責人；<sup>①</sup>陳治國指出“都鄉主”應該是一個籠統的稱謂，意為“都鄉負責官員”；<sup>②</sup>劉曉滿從行政責任的角度，不局限於里耶秦簡，而是縱觀秦及兩漢有關某位或某些官員以“主”為中心的稱謂界定，認為官吏稱“主”，反映出秦漢政府在行政運作中對相關責任人的主與次的區分，以特意強調“主要負責人”身份，稱“主”官吏通常處於統攝全局的職位或需要對某事直接負責。<sup>③</sup>另一派持反對意見，主張“主”並不表示“負責人”，而是一種官文書用語。其中陳松長解釋“主”是秦漢官府文書中常用的一種尊稱；<sup>④</sup>鄒文玲對照里耶秦簡“守”“主”稱謂，指出“尉主”“司空主”等“某主”的使用語境分別與“尉守”“司空守”等“某守”相對，主要用於發文者對收文主官的稱謂，帶有示敬成分。<sup>⑤</sup>鄒水傑著文兩篇堅持收文方官職名稱或機構後面的“主”，不表示“負責人”之意，已經符號化為一種文書程式用語。<sup>⑥</sup>兩派意見從“主”稱謂是否“負責人”的分析框架出發，都是從一個完整時間段的角度看待里耶秦簡文書所見“主”稱謂現象，未進一步區分發文者對收文者的稱謂在不同時間段呈現的變化。最近吳方基通過發現秦始皇三十五年五月前後收文者稱“主”的變化，具體分析縣內或縣際之間往來政務運作流程中政務涉及者與收文者所稱“主”的對應關係，證明收文者稱“主”，實指冠於某官名的收文者個人或某機構的實際長官，體現的更多是其在政務處理上具有的權力，而不單純是責任。<sup>⑦</sup>

對於“却之”的解釋，主要有兩種觀點，一種訓“却”為詰問、詰難之意，“却之”即上級官吏對下級官吏上報的文書有疑問而提出質詢；<sup>⑧</sup>另一種認為却訓退，“却之”乃秦代行政司法公文中的術語之一，用於公文下達，理解為“未獲批准，特此批復”。<sup>⑨</sup>

其他有高榮、楊芬、日本高村武幸等分析文書記錄、開啓用語。<sup>⑩</sup>楊芬認為文書開啓者、

① 卜憲群：《秦漢之際鄉里吏員雜考——以里耶秦簡為中心的探討》。

② 陳治國：《里耶秦簡“守”和“守丞”釋義及其他》，《中國歷史文物》2006年第3期。

③ 劉曉滿：《秦漢官吏稱“主”與行政責任》，《史學月刊》2015年第12期。

④ 陳松長：《〈湘西里耶秦代簡牘選釋〉校讀》。

⑤ 鄒文玲：《“守”、“主”稱謂與秦代官文書用語》，《出土文獻研究》第12輯，上海：中西書局，2014。

⑥ 鄒水傑：《秦代簡牘文書“敢告某某主”格式考》，《簡帛研究二〇〇九》，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2011；《里耶秦簡“敢告某主”文書格式再考》，《魯東大學學報》2014年第5期。

⑦ 吳方基：《里耶秦簡“主”稱謂再考察》，《檔案學通訊》2016年第6期。

⑧ 胡平生：《讀里耶秦簡札記》，《簡牘學研究》第4輯，蘭州：甘肅人民出版社，2004。

⑨ 王煥林：《里耶秦簡叢考》，《吉首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5年第4期。陳偉主編：《里耶秦簡牘校釋（第一卷）》中對諸家解釋“却之”的觀點作了介紹，可參看68-69頁。

⑩ 高榮：《秦代的公文記錄》，《魯東大學學報》2006年第3期。楊芬：《里耶秦簡所見官文書的開啓記錄》，《四川文物》2015年第3期。〔日〕高村武幸：《公文書の書記官署名》，《中國出土資料研究》第9號，2005；〔日〕高村武幸：《“発く”と“発る”》，《古代文化》60-4，2009。

“某手”記錄的簽名者,其身份多為史,而縣廷文書的處理者則多為令史。高村武幸指出里耶秦簡“署 X 發”是指定文書開封者的一種表達方式。

(五)郵傳制度研究。于振波、王子今、鐘煒、陳偉、陳松長、易桂花、劉俊男、魯家亮、趙寵亮、支強等探討文書郵傳制度、行書律令、傳遞路線等問題。<sup>①</sup> 于振波指出秦代郵人由郵所在鄉的鄉嗇夫從當地平民中選用,并經縣令或縣尉批准。支強認為在秦代公文傳遞過程中,“別書”是一個獨立的程式,應是文書下至縣後,在縣域內傳遞的一種方式。

德國紀安諾指出長距離的文書傳送,采用數名脚夫以郵為中轉站的接力方式,近距離傳送則由一名送達。<sup>②</sup> 日本藤田勝久討論文書行政作為中央和地方情報信息溝通手段的各種情況,認為縣是文書的集中匯總單位,郡是文書傳遞的管轄單位。<sup>③</sup> 飯島和俊探討了“郵”的問題。<sup>④</sup> 鷹取祐司考察官府間三種基本的文書傳遞方式:以郵行、以縣次傳、以亭行,認為主要傳遞方式是縣次方式。<sup>⑤</sup> 土口史記主張,秦的情報傳遞、處理方法在漢代邊郡木簡中也可以見到,已經形成全國共同的規則。<sup>⑥</sup> 畑野吉則也指出里耶秦簡郵書記錄與居延、敦煌等漢簡之間的共通性。<sup>⑦</sup> 韓國吳峻錫指出文書傳達順序為以次傳、以縣次傳、以道次傳、隧次行,行書的方式為走行、急行、馬行等,根據文書的傳達距離,也可分為以郵行與以亭行的方式。<sup>⑧</sup> 金慶浩重點考察行書律法制繼承關係與文書傳達方式,違反行書律時的處罰規定,以及行書

① 陳松長:《嶽麓書院藏秦簡中的行書律令初論》,《中國史研究》2009年第3期。于振波:《里耶秦簡中的“除郵人”簡》,《湖南大學學報》2003年第3期。王子今:《秦漢時期湘江洞庭水路郵驛的初步考察》,《湖南社會科學》2004年第5期。鐘煒:《試探洞庭兵輪內史及公文傳遞之路線》,《長沙大學學報》2007年第1期。陳偉:《里耶秦簡中公文傳遞記錄的初步分析》,《歷史地理學研究的新探索與新動向》,西安:三秦出版社,2008;陳偉:《秦與漢初的文書傳遞系統》,《里耶古城·秦簡與秦文化研究:中國里耶古城·秦簡與秦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陳偉:《嶽麓書院秦簡行書律令校讀》,簡帛網,2009年11月21日。易桂花、劉俊男:《從出土簡牘看秦漢時期的行書制度》,《中國歷史文物》2009年第4期。魯家亮:《讀嶽麓書院秦簡行書律令札記》,簡帛網,2009年11月21日。趙寵亮:《嶽麓書院秦簡行書律令釋讀補正》,簡帛網,2009年12月7日。支強:《秦簡中所見的“別書”》,簡帛網,2012年9月10日。

② [德]紀安諾:《“郵”制攷》,《東洋史研究》63-2,2004。

③ [日]藤田勝久:《里耶秦簡的文書形態與信息傳遞》,《中國社會科學院簡帛學國際論壇論文集》,2006;[日]藤田勝久:《秦漢時期的交通和情報傳遞》,《愛媛大學法文學部論集》人文學科編24,2008;[日]藤田勝久:《里耶秦簡的文書與信息系統》,《簡帛》第3輯,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日]藤田勝久:《里耶秦簡與秦帝國的文書情報傳達》,《里耶古城·秦簡與秦文化研究:中國里耶古城·秦簡與秦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日]藤田勝久:《中國簡牘的文書、記錄與情報傳遞》,《東亞的資料學和情報傳遞》,2013;[日]藤田勝久:《里耶秦簡所見秦代郡縣的文書傳遞》,《愛媛大學法文學部論集》人文學科編34,2013。

④ [日]飯島和俊:《關於“以郵行”》,《中央大學亞洲史研究》32,2008。

⑤ [日]鷹取祐司:《秦漢時代的文書傳送方式》,《立命館文學》619,2010。

⑥ [日]土口史記:《里耶秦簡與出土資料學》,《中國新出資料學的發展》,2013。

⑦ [日]畑野吉則:《里耶秦簡の郵書記錄と文書傳達》,《資料學の方法を拓く》12,2013。

⑧ [韓]吳峻錫:《秦漢代의 郵傳機構의 文書傳達體系》,《東洋史學研究》第109輯,2009。

律的政治目的。<sup>①</sup>

## 六 政務運行機制研究

政務運行機制研究是政治制度史研究的新取向，主要依托出土資料，結合傳世文獻，從政務文書入手，深入政治體制和行政運作的內部，探討政務處理流程及其運行機制，考察作為“過程”的制度史、作為“關係”的制度史為核心的“活的制度史”，進而揭示制度運行中權力與責任的分配及其關係。它有別於傳統的“職官制度史”研究。

（一）綜合研究。胡平生、卜憲群、劉楊、吳方基、日本藤田勝久、土口史記、韓國吳峻錫、李成珪等綜合考察政務運行機制及相關問題。<sup>②</sup> 其中土口史記認為，秦縣的行政機構在制度設計上，有縣廷與“官”的區別，且縣廷對“官”有着絕對優勢的地位。吳峻錫指出縣廷向郡廷報告管轄鄉的文書，一定是再作成爲縣的文書以後報告。吳方基從地方視角和法治模式重新審視秦代中央與地方關係：在立法關係上，中央雖主導立法，但地方有一定自主立法權；但是在裁決關係上，地方政務主要依律令裁決，自主裁決較少，說明中央通過法律確立權威，地方自主行政空間還是很小。

（二）單項事務運作研究。單項事務運作研究主要討論作徒、公船、糧倉、考課、上計、戶稅徵收、財政管理與運作等問題；大都以“事任”為中心，圍繞某一方面事務的處理和裁決，提出許多涉及到政府管理權限和程式的問題。

1. 作徒、公船、糧倉管理與運作。賈麗英、沈剛、于洪濤、韓國金垆吾等考察作徒管理機構

① [韓]金慶浩：《秦漢里程簡初探》，《“第四屆白沙歷史地理國際學術研討會：區域歷史地理的時間、空間與結構”論文集》，臺灣彰化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2010；[韓]金慶浩：《秦、漢初行書律の内容と地方統治》，《史叢》第73輯，2011；[韓]金慶浩：《秦漢簡牘〈行書律〉〈里程簡〉所反映的地域統治》，“甘肅省第二屆簡牘學國際學術研討會”，甘肅蘭州，2011年8月25-26日。

② 胡平生：《從里耶行政文書的運作看秦王朝的基層統治》，權仁瀚、金慶浩、李承律主編《竹簡、木簡中的古代東亞》，首爾：成均館大學出版部，2010。卜憲群：《秦漢公文書與國家行政管理》，《文史知識》1998年第8期。卜憲群、劉楊：《秦漢日常秩序中的社會與行政關係初探》，《文史哲》2013年第4期。吳方基：《秦代中央與地方關係的重新審視》，《史林》2016年第1期；吳方基：《從出土文書論秦代縣政令的下達與執行機制》，《簡帛研究二〇一六（春夏卷）》，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6。[日]藤田勝久：《里耶秦簡的記錄簡和實際事務》，《愛媛大學法文學部論集》人文學科編25，2008；《里耶秦簡與秦代政府之運作》，《秦俑博物館開館三十周年國際學術研討會暨秦俑學第七屆年會會議論文集》，2009。[日]土口史記：《里耶秦簡所見的秦代文書行政：以縣廷與“官”的關係為中心》，《“中古中國的政治與制度”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首都師範大學歷史學院，2014。[韓]吳峻錫：《里耶秦簡과秦代縣廷의 문서 행정》，《中國古中世史研究》第30輯，2013。[韓]李成珪：《秦漢帝國의計時行政》，《역사학보》，2014。



及其運作。<sup>①</sup> 賈麗英指出,隸臣妾由倉管理,居貲贖責劃歸司空管理。沈剛考證,秦代各級地方機構對刑徒管理的分工為:郡提出指導原則,縣掌握本縣刑徒的數據,縣屬機構負責具體管理。金桐吾分析,遷陵縣徒隸的主要勞作可以分類為行政雜役,土木工程,手工業生產,狩獵、采集、飼養和其他勞作;遷陵縣耕種勞作,以隸妾和城旦舂為主的,遷陵縣的隸臣主要從事行政雜役。

楊延霞、王君、朱聖明等探討公船管理與船官機構運作問題。<sup>②</sup> 朱聖明認為,遷陵縣內與公船相關的職事之人有津渡船人、津吏、船官、縣司空、縣丞等,津渡船人為官府雇用、駕駛公船在渡口工作,津吏管理渡口公船之事務,船官總攬一縣公船、具體執行縣內船務,縣司空指導船官工作,是其直接上級,縣丞負責審批縣內公船的借出。

宮長為、盧鷹、李孔懷、黃浩波、吳方浪、吳方基、日本大櫛敦弘等考察糧倉的種類、正倉儲糧的分配、倉政管理與運作制度。<sup>③</sup> 吳方浪、吳方基考證,秦代地方稟食標準不存在社會階級劃分,而是因其自然身份和勞作不同大致分成三類情況。

2. 考課、上計、戶稅徵收與財政管理。沈剛認為,戰國時期僅依靠上計制度,秦代計、課分離,漢代又恢復上計制度,輔之嚴密的監察體制。<sup>④</sup> 李均明解釋,“計”針對客觀事實,“錄”之意義包含對客觀事實的調查;“課”側重主觀認識,“志”包含主觀判斷的字義,相關項目設置及操作方式都以具體的法律條款為依據。<sup>⑤</sup> 徐世虹指出,“課”除動詞考課之意外,作為名詞有二義:一是文書名稱或類別,如漢簡所見郵書課等;二是法律形式之一,即睡虎地秦簡所見“牛羊課”;新見里耶秦簡中的課文書,其性質仍不出行政文書的範圍,是依據既定的標準對機構或管理職責予以核驗而產生的文書,與睡虎地秦簡中的“牛羊課”性質不一。<sup>⑥</sup>

① 賈麗英:《里耶秦簡牘所見“徒隸”身份及監管官署》,《簡帛研究二〇一三》,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4。高震寰:《從〈里耶秦簡(壹)〉“作徒簿”管窺秦代刑徒制度》,《出土文獻研究》第12輯,上海:中西書局,2014。沈剛:《〈里耶秦簡(壹)〉所見作徒管理問題探討》,《史學月刊》2015年第2期。于洪濤:《里耶簡“司空厭弗令田當坐”文書研究》,《古代文明》2016年第1期。[韓]金桐吾:《秦代縣的徒隸運用和其特點》,《中國古中世史研究》第40輯,2016。

② 楊延霞、王君:《秦代船及船官的考察》,《魯東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4年第1期。朱聖明:《里耶秦簡所見秦代遷陵縣公船相關問題研究》,《古代文明》2014年第2期。

③ 宮長為:《秦代的糧倉管理》,《東北師大學報》1986年第2期。盧鷹:《秦倉政研究》,《人文雜誌》1989年第2期。李孔懷:《秦代的糧倉管理制度》,《上海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0年第1期。黃浩波:《里耶秦簡(壹)所見稟食記錄》,《簡帛》第11輯,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吳方浪、吳方基:《簡牘所見秦代地方稟食標準考論》,《農業考古》2015年第1期。[日]大櫛敦弘:《秦代國家の穀倉制度》,《海南史學》28,1990;[日]大櫛敦弘:《雲夢秦簡倉律より見た戦国秦の穀倉制度》,《海南史學》30,1992。

④ 沈剛:《〈里耶秦簡(壹)〉中的“課”與“計”》,《魯東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3年第1期。

⑤ 李均明:《里耶秦簡“計錄”與“課志”解》,《簡帛》第8輯。

⑥ 徐世虹:《秦“課”芻議》,《簡帛》第8輯,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



張信通、李恒全、于振波、鄔文玲等透過秦簡探析戶稅徵收與運作。<sup>①</sup> 于振波認為，秦國實行授田制，田租徵收採取寓“公田”於“私田”中的辦法，田租屬分成租而非定額租。李孝林、宮長為、葉青、黎檸、王遂昆、康均、朱紅林等探析秦代縣級財政管理情況。<sup>②</sup>

綜上所述，秦簡所見地方行政制度研究成果豐富，尤以縣級行政組織機構、具體單項職官、文書形態與運作、郵傳制度、戶籍管理等討論為多。但是，從研究內容上看，已有研究多屬靜態研究，側重於職官的考論，對於地方行政運作的動態分析較少，尤其缺乏從“機制”入手整體而系統考察行政權力運作與分配等問題；從研究視角來看，多是從官僚制度和政治學的角度展開探討，較少跨學科從行政學、行政法學、文書學的角度挖掘和審視材料，展現地方行政運作的另一剖面。依托秦簡，秦代地方行政制度研究有很大開拓空間：一、郡級行政研究有待加強；二、以文書行政為中心，可進一步考察郡縣之間權力分配與調協問題；三、通過綜合考察豐富的縣級政務文書材料，可進一步進行理論問題的探討，如秦代法律與地方具體落實的協調問題，國家以法治國理念下縣域法治模式問題，法治模式下中央與地方的關係問題等。

① 張信通：《秦漢鄉里賦稅制度與賦稅徵收》，《中國經濟史研究》2012年第1期。李恒全：《從出土簡牘看秦漢時期的戶稅徵收》，《甘肅社會科學》2012年第6期。于振波：《秦簡所見田租的徵收》，《湖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2年第5期。鄔文玲：《里耶秦簡所見“戶賦”及相關問題瑣議》，《簡帛》第8輯，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

② 李孝林：《從雲夢秦簡看秦朝的會計管理》，《江漢考古》1984年第3期。宮長為：《雲夢秦簡所見財政管理》，《史學集刊》1996年第3期。葉青、黎檸：《秦漢時期的財政監督制度與思想》，《財政監督》2006年第21期。王遂昆、康均：《睡虎地秦簡會計法制論考》，《中南財經政法大學學報》2012年第5期。朱紅林：《睡虎地秦簡和張家山漢簡〈效律〉研究》，《社會科學戰綫》2014年第3期。

## 睡虎地秦墓竹簡法律簡字詞補釋\*

武漢大學歷史學院、簡帛研究中心 雷海龍

**內容提要** 睡虎地秦墓竹簡《秦律十八種》簡 14“治卅”之卅可改釋為廿。《法律答問》簡 72 原釋“官”字可改釋為“宦”；簡 148 倒數第 2 字或可釋為“鼠”。《封診式》簡 22 簡首漏釋“一”，其為簡 21 所記“緹複衣”的數詞；簡 23 原釋“曼”字或可釋為“完”；簡 54“到”字下一字或可釋為“骨”；簡 66 原釋“吻”字可改釋為𠂔(吻)，其他簡中有多個原釋“診”字可改釋為𠂔(診)；簡 71 首字可能是“解”字；簡 75“與鄉”後未釋二字或可釋為“史某”；簡 90 最後一字或可釋為“告”。

**關鍵詞** 睡虎地秦墓竹簡 《秦律十八種》 《法律答問》 《封診式》

自 1990 年精裝本《睡虎地秦墓竹簡》系統發表睡虎地 11 號秦墓竹簡的圖版、釋文、注釋及譯文以來<sup>①</sup>，學界對這批竹簡進行了多層次、多角度的研究，成果豐碩。2014 年出版的《秦簡牘合集[壹]睡虎地秦墓簡牘》綜合整理了睡虎地秦簡自出土以來國內外近四十年的研究成果<sup>②</sup>，刊布了迄今為止最為清晰的圖版，並在此基礎上進行了卓有成效的深入研究，是睡虎地秦簡整理與研究的集大成者。藉助《秦簡牘合集[壹]》刊布的高質量竹簡圖像，筆者在研

\* 本文寫作得到湖北省教育廳哲學社會科學研究重大項目“楚簡與楚文化研究——以名物制度為中心”(項目批准號: 13zd001)資助。

① 睡虎地秦墓竹簡整理小組:《睡虎地秦墓竹簡》，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




② 陳偉主編，彭浩、劉樂賢等撰著:《秦簡牘合集[壹]睡虎地秦墓簡牘》，武漢大學出版社，2014。本文中所引睡虎地秦簡釋文均引自《秦簡牘合集[壹]》，頁碼不一一注明。

讀過程中對睡虎地秦簡法律簡中的部分字詞有些淺見，祈盼指正。

### 《秦律十八種·廩苑律》簡 13-14 釋文作：





以四月、七月、十月、正月膚田牛。卒歲，以正月大課之，最，賜田嗇夫壺酉（酒）束脯，爲早（皂）者除一更，賜牛長日三旬；殿者，（13）誅田嗇夫，罰冗皂者二月。其以牛田，牛減絜，治（筰）主者寸十。有（又）里課之，最者，賜田典日旬；殿，治（筰）卅。

廩苑律（14）

簡 14 末尾“殿，治（筰）卅”之“卅”，圖版作，《睡虎地秦墓竹簡》精裝本（文物出版社 1990 年）圖版作。對照此二圖版，後者的縱向竹纖維凹凸形態更爲明顯，其拍攝時間應晚於前者。細審《秦簡牘合集》圖版，此字橫筆的中部，並無明顯的上下走向的墨迹：假設此字上中部的殘留爲“墨迹”，從上下筆畫書寫走勢來看，此字中下部也應該有墨迹殘留纔是，但此字中下部是空心的，並未見到墨迹的存在；若將此字上中部的殘留與竹簡本身的顏色進行比對，其爲竹簡本身材質的顏色的可能性更大。以 1990 年版圖版來看，可能是因竹簡脫水，致使竹纖維凹凸形態更明顯之影響，及拍攝條件等其他因素，纔呈現疑似“墨迹”的形態。文物出版社 1977 年出版的《睡虎地秦墓竹簡》綫裝本中，此字圖版作，基本無筆畫缺失，也最清晰，基本可以確定是“廿”字。要之，“殿，治（筰）卅”之“卅”可據圖版改釋爲“廿”。

### 《法律答問》簡 72 釋文作：

“擅殺、刑、髡其後子，灑之。”·可（何）謂“後子”？·官其男爲爵後，及臣邦君長所置爲後大（太）子，皆爲“後子”。





原釋“官”之字，圖版作。今按：細審圖版，此字所從“宀”下之部分，中間尚有豎筆可辨。結合周圍筆畫，“宀”下所從當是“臣”。在睡虎地秦簡中，宦、官二字的常見寫法分別如（《日書乙種》141）、（《日書乙種》227）。通過比對可以發現，的寫法與“宦”更相類，可釋爲“宦”。《左傳》宣公二年：“及成公即位，乃宦卿之適而爲之田，以爲公族，又宦其餘子亦爲餘子，其庶子爲公行”。“宦”，杜預《集解》：“仕也”。楊伯峻注曰：“宦，仕也。授卿之嫡子

以官職。”<sup>①</sup>本簡所記“宦其男爲爵後”即任命其嗣子爲爵位繼承人。

### 三

《法律答問》簡 148 釋文作：


“百姓有責(債)，勿敢擅強質，擅強質及和受質者，皆貲二甲。”廷行事強質人者論，鼠(予)者不論；和受質者，鼠(予)者□論。

倒數第二字整理者未釋，其紅外圖版作。今按：本簡已有的兩個“鼠”字圖版前後作、，《法律答問》簡 140 亦有“鼠”字圖版作，前兩個鼠字稍模糊，後一個則很清晰。通過比對可以發現，原未釋之字很可能也是“鼠”字，尚可辨鼠所從之牙齒“臼”與鼠腿、鼠尾的殘筆。此處的“鼠”也可讀爲“予”，給予之義。

### 四

《封診式》簡 21-22 釋文作：

盜馬。爰書：市南街亭求盜才(在)某里曰甲縛詣男子丙，及馬一匹，騅牝右剽；緹復(複)衣，(21)帛裏莽緣領袞(袖)，及履，告曰：“丙盜此馬、衣，今日見亭旁，而捕來詣。”(22)









從紅外圖像看，簡 22“帛”字上方尚有墨迹，作，當爲“一”字。諸家皆漏釋。“一”爲簡 21 所記“緹複衣”的數詞。此處釋文當作：緹復(複)衣一，帛裏，莽緣、領、袞(袖)，及履。“緹複衣一”指男子丙盜竊的物品中含有緹複衣一件。

### 五

《封診式》簡 23-24 釋文作：

爭牛。爰書：某里公士甲、士五(伍)乙詣牛一，黑牝曼摩(縻)有角，告曰：“此甲、乙牛毆(也)，而亡，各識，共詣來(23)爭之。”即令令史某齒牛，牛六歲矣。(24)


<sup>①</sup> 楊伯峻編著：《春秋左傳注》修訂本，北京：中華書局，2009，665 頁。

簡 23“牝”下一字，黑白圖像作, 紅外圖像作。《睡虎地秦墓竹簡》原整理者疑此字爲“曼”，《詩·閟宮》傳：“長也”。<sup>①</sup> 今按：秦簡“曼”字形如(里耶秦簡 8-1995)、(北大秦簡《魯久次問數於陳起》04-132)<sup>②</sup>，秦印“曼”字字形如(“曼印”之“曼”)<sup>③</sup>。將簡 23 原釋“曼”字字形與可確釋的“曼”字進行比對，可以發現簡 23 此字的構件中没有“曼”字所從之“目”，故其非“曼”字。從更清晰的紅外圖版看，更可能是“完”。秦簡典型的“完”字寫法如(《法律答問》簡 81)、(《日書乙種》簡 81)。《封診式》此字寫法更近後者。廡，《睡虎地秦簡》原整理者讀爲“廡”，《說文》：“牛轡也。”即牛的套繩。<sup>④</sup> 魯家亮先生認爲，“完”如果單獨使用，可表示外形上是否有傷痕，《封診式·賊死》令史某爰書中，描述死者傷口之後，有“它完”。如果與後文的“廡(廡)”連用，則是形容有完整的套繩。<sup>⑤</sup> 班固《東都賦》“壑無完樞，郭罔遺室”，李翰注曰：“完，全”。<sup>⑥</sup>

## 六

《封診式》簡 53-54 釋文作：

……肘韜(膝)(53)□□□到□兩足下奇(跂)，潰一所……(54)

“到”下一字，圖版作。今按：此字或爲“骨”字，參看睡虎地秦簡《封診式》簡 35 之“骨”(骨)。若然，“骨”後或當着句讀。“肘膝□□□到骨”，可能是說肘膝皮膚潰爛到能見到骨頭。《素問·風論》：“癘者，有榮氣熱肘，其氣不清，故使其鼻柱壞而色敗，皮膚瘍潰。”<sup>⑦</sup>

奇，整理者讀爲跂，《尚書大傳》注：“步足不能相過也。”今按：從簡 52—54 所描述的特徵來看，此處的癘也即麻風病。據研究，麻風病的原發性損害中，皮損以“斑疹、丘疹、斑塊、瀰漫浸潤、結節、潰瘍爲常見”，神經損傷“如爪形手、腕下垂、足下垂等”。<sup>⑧</sup> “奇(跂)”疑指蹠曲。兩足下奇(跂)，即兩腳下垂，可能是神經損傷所致。

① 睡虎地秦墓竹簡整理小組：《睡虎地秦墓竹簡》，152 頁。

② 韓巍、鄒大海整理：《北大秦簡〈魯久次問數於陳起〉今譯、圖版和專家筆談》，《自然科學史研究》2015 年第 2 期。

③ 珍秦齋 146 號藏印，釋文疑爲“曼”，參蕭春源《珍秦齋古印展》，澳門市政廳出版，1993。王輝、程學華先生認爲此字就是曼字，參見王輝、程學華撰《秦文字集證》，臺北：藝文印書館，1999，286 頁。

④ 睡虎地秦墓竹簡整理小組：《睡虎地秦墓竹簡》，第 152 頁。

⑤ 此意見爲魯家亮先生私下告知筆者。




⑥ 《六臣注文選》卷一《賦甲·班固東都賦》，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9，17 頁。







⑦ 郭霽春主編：《黃帝內經素問校注》，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2013，386-387 頁。

⑧ 劉寶錄主編：《麻風病、地方病臨床診治指南》，蘭州：甘肅科學技術出版社，2008，10 頁。



## 七





《封診式》簡 66 原釋文“舌出齊脣吻,下遺矢弱(溺)”之“吻”,圖版作。簡 68“診”字作,比對可知二者右所從相同。故簡 66 之從口從參,當釋診。聯繫前後文意來看,將其視為“吻”之訛寫可讀通簡文。“脣吻”連言,指嘴唇,此於文獻有徵。《漢書·東方朔傳》載東方朔回答武帝提問時說“臣觀其舌齒牙,樹頰脰,吐脣吻,擢項頤”。<sup>①</sup>王充《論衡·率性》:“揚脣吻之音,聒賢聖之耳。”<sup>②</sup>《呂氏春秋·恃君覽》:“古之善相馬者管青相臚胸。”<sup>③</sup>《淮南子·主術訓》:“聖主之治也,其猶造父之御:齊輯之於轡銜之際,而急緩之於脣吻之和。”<sup>④</sup>

作為其他文字構件部分的參、勿在秦簡文字中形近,除了筆畫數不同(參為五畫,勿為四畫)之外,尚有其他區別可辨認:構件參的左側一般為四條斜筆,右側筆畫的末尾不向左下彎曲;構件勿的左側為三條斜筆,右側筆畫末尾向左下彎曲。<sup>⑤</sup>以此規律出發,《封診式》尚有如下原徑釋“診”之字當改釋為“訥(診)”:簡 74 之診()、簡 75 之“診”()、簡 86 之兩個“診”(,)、簡 89 之“診”()、簡 98 之“診”()。

## 八

《封診式》簡 70-71 釋文:

弱(溺)不毆(也)。乃解索,視口鼻渭(喟)然不毆(也)。及視索迹鬱之狀。道索終所試脫頭;能脫,乃(70)□其衣,盡視其身、頭髮中及篡。舌不出,口鼻不渭(喟)然,索迹不鬱,索終急不能脫,(71)

簡 71 首字整理者未釋,其黑白及紅外圖像分別作:,。李力先生將此字補作“脫”<sup>⑥</sup>。今按:簡 70“試”字後的“脫”字作。仔細比對,其與簡 71 未釋之字不類。我們懷疑此字有可能是“解”字。簡 70 有“解”字作,可資比對。“乃解其衣”,然後解開其所穿之衣。睡虎地《日書甲種·詰》簡 68 背貳/99 反貳“乃解衣弗衽”,簡 46 背叁/121 反叁“解髮奮以過之”,

① 《漢書》卷六五《東方朔傳》,北京:中華書局,1962,2863 頁。

② 黃暉:《論衡校釋》,北京:中華書局,1990,73 頁。

③ 臚胸,陳奇猷先生指出其為“脣吻”之別構。參見陳奇猷校注《呂氏春秋新校釋》卷二〇《恃君覽·觀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1423、1430-1431 頁。

④ 何寧:《淮南子集釋》卷九《主術訓》,北京:中華書局,1998,663 頁。

⑤ 黃文傑先生曾對“勿”“參”二形近字進行過辨析,其意見與本文意見不盡相同,讀者可參看。參見黃文傑《秦至漢初簡帛文字研究》,北京:商務印書館,2008,128-130 頁。





⑥ 李力:《“隸臣妾”身份再研究》,北京:中國法制出版社,2007,435 頁。

《封診式·經死》簡 66“解索”，簡 70“乃解索”中的解，均為解開之義。

## 九

《封診式》簡 74-75 釋文：



……·即令令史某往診，求其盜。令(74)史某爰書：與鄉□□隸臣某即乙、典丁診乙房內……(75)

簡 74、75 中的兩個“診”字，前已說明當釋“訥〈診〉”。簡 75“與鄉”後未釋二字，整理者注釋曰：“疑應補為‘鄉某、牢隸臣某’。鄉某，見上《封守》條注 1(引者按，彼處注曰：鄉某，係鄉的負責人，《漢書·百官表》：‘鄉有三老、有秩嗇夫、游徼。’)。典，即里典的省稱。”今按：未釋二字圖像分別作、。前一字的下方可辨構件“又”，其上方類似“口”形，整體特徵符合“史”字寫法；後一字上方類似楷體的“甘”，下方筆迹較淡，橫豎撇捺的筆畫隱約可見，整體特徵與“某”字寫法類似。簡 74“令史某”的“史某”二字分別作：、，可資比對。改釋之後，此處釋文為：與鄉史某、隸臣某即乙、典丁訥〈診〉乙房內。“鄉史”這一官職又見於里耶秦簡 8-269“資中令史陽里釗伐閱：……為鄉史九歲一日……”，以及 8-342“□今貳春鄉史□”。<sup>①</sup>

## 十

《封診式》簡 90 釋文作：

非朔事毆(也)。某賞(嘗)懷子而變，其前及血出如甲□。(90)

末字未釋的圖版作。今按：可辨下方有口形，上方有一近似✓的曲筆，中部有橫筆，疑為“告”字。其接近睡虎地秦簡《法律答問》簡 48 告()字寫法。此案例開頭言“某里士五(伍)妻甲告曰……”(簡 84)，末尾他人省略甲所告內容時用“如甲告”，當為指代省語。《封診式》“遷(遷)子”案例中，亦有相似的情形，“某里士五(伍)甲告曰……”(簡 46)，後省略某某內容與甲所告內容相同時，亦是用的“如甲告”一語(簡 48)，詳參：

遷(遷)子 爰書：某里士五(伍)甲告曰：“謁盜親子同里士五(伍)丙足，遷(遷)蜀邊縣，令終身毋得去遷(遷)所。(46)敢告。”告灋(廢)丘主：士五(伍)咸陽才(在)某里

① 陳偉主編：《里耶秦簡牘校釋(第一卷)》，武漢大學出版社，2012，125、135 頁。

曰丙,坐父甲謁盜其足,𡇗(遷)蜀邊縣,令終身毋得(47)去𡇗(遷)所。論之,𡇗(遷)丙如甲告,以律包。今盜丙足,令吏徒將傳及恒書一封詣。令史可受(48)代吏徒,以縣次傳詣成都,成都上恒書大(太)守處,以律食。灋(廢)丘已傳,爲報。敢告主。(49)

附記:本文草成之後,蒙劉國勝先生、魯家亮先生審閱指正。投稿《簡帛研究》之後,匿名審稿專家提出了非常寶貴的修改意見,謹致謝忱!唯本文文責,概由本人負責。

## 關沮秦漢墓簡牘字詞釋讀七則<sup>\*</sup>

華東師範大學中國文字研究與應用中心 湯志彪

**內容提要** 關沮秦漢墓出土簡牘很多字詞有重新釋讀的必要,其中簡 320 用“醞”指代“酒”字;簡 338-339 中“某癰某波”的“波”讀作“疲”訓作“病”,簡文“某癰某波”是說“某癰”導致“某波(疲病)”的意思;簡 340 中的“哀”當讀作“縮”,在簡文中是指用手卷(抓/拽)着繩子;簡 345-346 的“高郭”當重新釋作“高綜”讀作“高京”,“京”訓作“丘”;簡 368-370 是浴蠶之辭,此句簡文需重新斷句,其中的“辟”字當讀作“睥”;簡 373 言“飲以鉢”的“鉢”當讀作“糝”即“粥”;簡 377 的“桐”字當讀作“甌”,是一種與瓶相類似的器物。

**關鍵詞** 關沮秦漢墓簡牘 傳世文獻 字詞

1992 年,湖北省考古工作者發掘了蕭家草場 26 號漢墓,1993 年又發掘了周家臺 30 號秦墓,並出土了一批竹木簡牘,後來發掘者整理出版了《關沮秦漢墓簡牘》一書,旋即引起了不少學者的關注。下面,筆者擬在以往學者研究的基礎上,將筆者在閱讀這批簡牘過程中發現的問題提出來,以就正於方家讀者。

<sup>\*</sup> 本文是 2012 年中央校基本科研業務費專項資金項目(項目編號:12QN044)、2013 年度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青年基金項目(項目批准號:13YJC740085)、2015 年度國家社科基金一般項目階段性成果。

簡 320 言(除需要討論的文字,簡文一般用通行文字,下同):

東首卧到晦,朔復到南卧。晦起,即以▲賁(噴),以羽漬,稍去之,以粉傅之。<sup>①</sup>

簡文▲字原作:



對於此字,整理者釋作“酒”,無說。<sup>②</sup>方勇先生則改釋作“温”,并舉關沮秦簡中“温”字作“𩚑”、“𩚒”、“𩚓”、“𩚔”等形、“𩚕”字作“𩚖”形為例進行說明。此外,對於此處簡文之所以出現“温”字,方勇先生認為存在兩種情況,“一是有可能漏寫了‘酒’字,簡文應該是以‘温酒賁(噴)’;二是‘温’字應為‘酒’字誤字。因為二者形體有相似之處,所以造成訛誤。這種情況發生的可能性是極大的。因為在關沮秦簡中這種訛誤是有的,如三二二簡的欲字為飲字誤字,三一五簡和三七五簡東字和東字混同。所以說,後一種情況的可能性是很大的。”<sup>③</sup>

按,方勇先生把此字改釋作“温”,甚是。但認為此處簡文可能是“酒”字的誤抄則可商。秦簡“酒”字一般作“𩚑”“𩚒”形,<sup>④</sup>與關沮秦簡中的“温”字差別明顯。可見,“誤抄”說很難讓人信服。至於是否漏抄之後所補,目前尚需更強有力證據;同時,本支竹簡文字簡煉,語義明朗,字與字之間間距相近,漏抄的可能性很小。因此,簡文中的“温”字當重新考慮。

我認為,簡文中的“温”當讀作“醞(醞)”。“温”與“醞(醞)”均从“𩚑”得聲,兩字自可通。<sup>⑤</sup>“醞(醞)”在此也是“酒”的意思。《說文》:“醞(醞),釀也。”<sup>⑥</sup>“醞(醞)”本來是釀造的意思,但後來逐漸演變成為一種酒的代稱。《西京雜記》卷一:“漢制:宗廟八月飲酎,用九醞太牢,皇帝侍祠。以正月旦作酒,八月成,名曰酎,一曰九醞,一名醇酎。”<sup>⑦</sup>《文選·王僧達

① 湖北省荆州市周梁玉橋遺址博物館:《關沮秦漢墓簡牘》,北京:中華書局,2001,128頁。

② 湖北省荆州市周梁玉橋遺址博物館:《關沮秦漢墓簡牘》,128頁。

③ 方勇:《讀關沮秦簡札記四則》,簡帛網,2009年8月25日。

④ 陳振裕、劉信芳:《睡虎地秦簡文字編》,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222頁。

⑤ “温”可與“蘊”通(參高亨、董治安《古字通假會典》,濟南:齊魯書社,1989,111頁),“醞(醞)”亦可與“蘊”通(參宗福邦、陳世鏡、蕭海波《故訓彙纂》,北京:商務印書館,2003,2347頁“醞”字條)。故“温”“醞(醞)”音義均可通。

⑥ [漢]許慎:《說文解字》,北京:中華書局,1963,311頁下。下文凡出自此書者,如無特別說明,不再一一注明。

⑦ [晉]葛洪:《西京雜記》卷一《燕丹子西京雜記》,北京:中華書局,1985,1頁。



《答顏延年》》：“寒榮共偃曝，春醞時獻斟。”劉良注：“醞，酒也。”<sup>①</sup>《文選·張平子〈南都賦〉》：“酒則九醞甘醴，十旬兼清。”劉良注：“九醞、十旬皆酒名。”<sup>②</sup>據此可知，簡文顯然是同義互換，即用“醞(醴)”代替了“酒”字。

## 二

簡 338-339 有如下文字：

操杯米之沱(池)，東鄉(向)，禹【(步)三】步，投米，祝曰：“畢(皋)！敢告曲沱(池)，某癰某波。禹步擯房桀(眉)，<sup>③</sup>令某癰數去。”

“波”整理小組認為借作“破”，并引《莊子·列禦寇》“秦王有病召醫，破癰潰痊者，得車一乘”之例為證。<sup>④</sup>

按，《莊子·列禦寇》中的“破”用作動詞，是“剖開”的意思。而簡文中的“波”顯然是形容詞，是說“某”因為“癰”而導致“波”的意思。“某”當指某人，按照整理小組的意見，“某波(破)”頗為不辭。此外，簡文最後言“令某癰數去”，祇是要求“癰”“數去”，而不牽涉“波”，可見“波”也不會是名詞。因此，“波”當別解。

筆者認為此處的“波”當讀作“疲”。“波”“疲”均从“皮”聲，自可通。罷、疲為古今字，古書中互相通用的例子習見。“罷”字可與“陂”通，“波”字亦可與“陂”字通。<sup>⑤</sup>“波”从“皮”聲，而出土材料中“皮”與“疲”相通的例子十分常見。<sup>⑥</sup>然則“波”可讀作“疲”。《爾雅·釋詁下》：“疢，病也。”陸德明《釋文》：“本作‘疲’。字書云：疲，病也。”<sup>⑦</sup>“疲”文獻中常用作“罷”。“罷”亦有“病”義。《逸周書·大匡》：“問罷病之故、政事之失”。朱右曾集訓校釋：“罷，亦病也。”<sup>⑧</sup>《楚辭·九辯》：“顏淫溢而將罷兮，柯仿佛而萎黃”朱熹集注：“罷，毀也，乏也。”<sup>⑨</sup>據此，簡文“某癰某波”當讀作“某癰，某波”，是指“某癰”導致“某波(疲病)”的意思。

① [梁]蕭統編，[唐]李善等注：《六臣注文選》卷二六，北京：中華書局，1987，484 頁。

② [梁]蕭統編，[唐]李善等注：《六臣注文選》卷四，86 頁。

③ 方勇：《讀秦簡札記兩則》，《江漢考古》2011 年第 3 期。

④ 湖北省荆州市周梁玉橋遺址博物館：《關沮秦漢墓簡牘》，131 頁。

⑤ 高亨、董治安：《古字通假會典》，濟南：齊魯書社，1989，688、690 頁。白於藍：《戰國秦漢簡帛古書通假字彙纂》，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12，291 頁。

⑥ 白於藍：《戰國秦漢簡帛古書通假字彙纂》，291 頁。

⑦ 黃焯：《經典釋文彙校》卷二，北京：中華書局，1980，249 頁。

⑧ 黃懷信、張懋鎔、田旭東：《逸周書彙校集注》卷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158 頁。

⑨ [宋]朱熹撰，蔣立甫點校：《楚辭集注》卷六，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119 頁。

—  
—  
—

簡 340 有如下文字：

禹步三，汲井，以左手▲緇，令可下免甕。<sup>①</sup>

▲字,原作:



整理者釋作“衺”，讀作“牽”。<sup>②</sup> 方勇先生認為此字从衣从吊（或“叔”）旁，而不从“矛”旁，所以字當隸爲“衺”或“衺”形。<sup>③</sup> 後來又說，“至於關沮秦簡的▲形，整理者把它讀爲‘牽’，應該是能說得通的，並且從簡文的具體語境上來看，釋爲‘牽’也是較爲合理的。所以，如果▲是‘牽’字不誤的話，我們說其所從的‘吊’或者說‘叔’形應該是‘矛’旁的進一步訛形。”<sup>④</sup>

按,“▲”字不从“矛”,方勇先生一開始就已經指出來了。可見,把“▲”字釋作“𣎵”是錯誤的。但後來方勇先生又同意整理者的意見,認為此字可讀作“牽”,并謂此字“釋為‘牽’也是較為合理的”,進而認為簡文的“▲”字所从是“矛”字訛變。從這些行文中可知,方勇先生似乎是采信整理者的意見的。

從嚴格意義上來講，“▲”字應該隸作“𢇛”（或“𢇛”）。爲行文方便，下文徑隸寫作“𢇛”。此字內部所从不必是“矛”字訛體；另外，“𢇛”字也無法讀作“牽”。上古音“叔”是書母覺部字，“牽”是溪母真部字。兩者韻部相隔殊遠。

從文意上來看，把“▲”字讀作“牽”也無法通讀簡文。簡文“汲井，以左手▲繻，令可下免甕”一句的大意是說：“汲井時用左手‘卷（抓/拽）’着井繩子，令可下……。”“牽”的動作表示的是人在人或物之前“拖/拉”着後者往前走，如牽着鼻子走、牽牛等，用在井繩上則是不恰當的。據此可知，無論如何“褻”是不能讀作“牽”的。

由上文分析可知，本簡文說的是某人用左手把繩子卷（抓／拽）起來，令人可“免甕”的意思。據此，筆者認為，“褻”在此當讀作“縮”。“褻”从“衣”从“弔”聲，“弔”即“叔”的古字。

① 湖北省荆州市周梁玉橋遺址博物館編：《關沮秦漢墓簡牘》，51頁。

② 湖北省荆州市周梁玉橋遺址博物館：《關沮秦漢墓簡牘》，131頁。

③ 方勇：《讀關沮秦簡札記四則》，簡帛網，2009年8月25日。

④ 方勇：《讀關沮秦簡札記四則》，簡帛網，2009年8月25日。

古文字“叔”字可與“縮”通。<sup>①</sup>“縮”在此當訓作“綸”或“抽”。《爾雅·釋詁下》：“縮，綸也。”郭璞注：“綸者繩也，謂牽縛縮貉之。”<sup>②</sup>“綸”本身有“糾”“絡”義。《說文》：“綸，青絲綬也。”朱駿聲《定聲》：“綸糾而成，故糾之即曰綸。”<sup>③</sup>《易·系辭上》：“易與天地準，故能彌綸天下之道。”虞翻曰：“綸，絡。”<sup>④</sup>

“縮”也可訓作“抽”。《小爾雅·廣言》：“縮，抽也。”<sup>⑤</sup>“抽”在此當理解為“握”“收”等意思。《淮南子·齊俗》：“抽箕踞備之奸。”高誘注：“抽，握也。”<sup>⑥</sup>

可見，不管把“縮”訓作“綸”還是“抽”，用在簡文中都是合適的，均是指某人用左手卷（抓/拽）着繩子，“令可下免甕”。

#### 四

簡 345-346 言：

馬心：禹步三，鄉（向）馬祝曰：“高山高郭，某馬心天，并□侍之。”即午畫地，而最（撮）其土，以摩（摩）其鼻中。

馬心，整理者懷疑是“指馬的某種疾病”。又謂：“心”字或讀為“駭”，引《說文》“馬行疾也”為證，認為“此為使馬疾行的方術”。<sup>⑦</sup>至於簡文的“天”字，整理者未作解釋。

按，簡 345-346 前後簡文均是描述“病方”的，因此，此處簡文亦當如此看待。所以整理者所懷疑“馬心”是“指馬的某種疾病”的說法，當是。既如此，則簡文的“天”字當理解為表示某種疾病的詞。方勇先生認為此處的“天”當讀作“瘡”或者“癩”。<sup>⑧</sup>當是。上古音“天”是透母真部字，“瘡”是端母真部字，兩字雙聲疊韻，當可通假。甲骨文有“天”字，于省吾先生認為“天”可以讀作“顛”。<sup>⑨</sup>甚是。“顛”字从頁真聲。“瘡”字从疒真聲。馬王堆《養生方》有“瘡”字，裘錫圭先生直接用作“顛”。<sup>⑩</sup>正確可從。據此，關沮秦漢簡此字讀作“瘡”當無問

① 高亨、董治安：《古字通假會典》，747-748 頁。

② [晉]郭璞注，[宋]邢昺疏：《爾雅注疏》卷二《釋詁下》，李學勤主編《十三經注疏》，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54 頁。

③ [清]朱駿聲：《說文通訓定聲》屯部第十五，武漢市古籍書店影印，1983，799 頁。

④ [清]李道平撰，潘雨廷點校：《周易集解纂疏》卷八，北京：中華書局，2004，553 頁。

⑤ 楊琳：《小爾雅今注》，上海：漢語大詞典出版社，2002，109 頁。

⑥ 劉文典撰，馮逸、喬華點校：《淮南鴻烈集解》卷一一，北京：中華書局，1989，344 頁。

⑦ 湖北省荆州市周梁玉橋遺址博物館：《關沮秦漢墓簡牘》，132 頁。

⑧ 方勇：《秦簡零拾二則》，簡帛網，2012 年 1 月 15 日。

⑨ 于省吾：《釋具有部分表音的獨體象形字》，《甲骨文字釋林》，北京：中華書局，1979，435-443 頁。

⑩ 裘錫圭：《馬王堆醫書釋讀瑣議》，收入其著《古文字論集》，北京：中華書局，1992，534 頁。周波：《馬王堆簡帛〈養生方〉、〈雜禁方〉校讀》，《文史》2012 年第 2 輯。

題。“瘕”在此訓作“病”。《說文》：“瘕，病也。”“癰”字古書中常訓作“疾”“病”等。據此，簡文“馬心天”當讀作“馬心瘕/癰”，是指馬心臟有病。

下面，順便說說“高山高”後面的那個字的釋讀問題。整理者認為：“字左似从‘京’，即‘郭’字誤寫。”<sup>①</sup>方勇、潘飛兩位先生直接釋作“郭”。<sup>②</sup>所謂的“郭”字，原作：



字稍殘，但是基本筆劃依然可以辨認。筆者試摹作：



此字左邊所从，與秦漢簡牘常見的“京”<sup>③</sup>字與从“京”的“就”<sup>④</sup>“掠”<sup>⑤</sup>等字相同，可見，整理者將這個偏旁看作是“京”的意見是可信的。但這個偏旁不會是“郭”字所从的訛誤。秦漢簡牘中有“郭”字。睡虎地秦簡作“𡩂”形，<sup>⑥</sup>銀雀山漢簡作“郭”“郭”<sup>⑦</sup>等形，馬王堆漢墓帛書則作“郭”“郭”等形，<sup>⑧</sup>與本文所要討論的字所从完全不同。

此外，此字右邊偏旁也不是“邑”。上引秦漢簡牘的“郭”字所从“邑”旁下面一筆一般豎直或者稍微彎曲，“邑”字下面“卩”形與下拉筆劃之間是沒有多餘筆劃的，非常乾淨利索。但本文所要討論的字的“卩”旁與下拉筆劃之間尚有一捺，清晰可見。因此，把這個偏旁看作“邑”甚為牽強。

還有一點需要注意的是，從古代祭祀以及為某人舉行祈禱、卜筮等活動來看，未見對“高郭”進行祭禱的。可見，將此字釋作“郭”也與文意不協。

誠如上文所言，“郭”字左从“京”。右部所从當是“糸”旁。漢簡中从“糸”的字常作此形。《銀雀山漢簡文字編》“絕”字作“𦃟”，“終”作“終”，“維”作“維”，“緝”作“緝”，“繼”字

① 湖北省荆州市周梁玉橋遺址博物館：《關沮秦漢墓簡牘》，132 頁。

② 方勇：《秦簡零拾二則》，簡帛網，2012 年 1 月 15 日。潘飛：《〈關沮秦簡〉文字編》，安徽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0，58 頁。

③ 漢語大字典字形組：《秦漢魏晉篆隸字形表》，成都：四川辭書出版社，1985，348 頁。

④ 漢語大字典字形組：《秦漢魏晉篆隸字形表》，1985，348 頁。

⑤ 漢語大字典字形組：《秦漢魏晉篆隸字形表》，1985，877 頁。

⑥ 張守中：《睡虎地秦簡文字編》，北京：文物出版社，1994，100 頁。

⑦ 駢宇騫：《銀雀山漢簡文字編》，北京：文物出版社，2001，235 頁。

⑧ 陳松長：《馬王堆漢墓帛書文字編》，北京：文物出版社，2001，269 頁。

作“𣎵”形<sup>①</sup>，均可證。這些字所从的“糸”旁，可能是殘孚。當然，并不排除秦漢簡中“糸”旁確有如此簡省的寫法。據此，“𣎵”字當釋作从“糸”从“京”，即“綰”字。

“綰”字不見於《說文》，但見於後世字書《玉篇》《廣韻》，訓作“冠纒”。但簡文顯然不取此義。筆者認為“綰”在此當讀作“京”。古文字“綰”从“京”聲，則“綰”讀作“京”在讀音上是沒有問題的。《詩·鄘風·定之方中》：“升彼虛矣，以望楚矣。望楚與堂，景山與京。”毛傳：“京，高丘也。”<sup>②</sup>《詩·大雅·公劉》：“乃陟南岡，乃覲于京。”孔穎達《正義》引李巡曰：“丘之高大者曰京。”<sup>③</sup>《漢書·翟義傳》：“封以為大戮，於是乎有京觀以懲淫慝。”顏師古注：“京，高丘也。”<sup>④</sup>據此，簡文“高綰(京)”顯然是指“高丘”。

《包山楚簡》簡237有“高(享)祭筭之高丘、下丘”這樣的話，學者或以為是地名，或以為是山名。李零先生則認為“高丘”可能即《楚辭·離騷》中“哀高丘之無女”的“高丘”。晏昌貴先生從之，並進一步申論之：“高丘”“下丘”應理解為兩個“丘”神名。又引游國恩先生的觀點指出，“高丘泛指天門外之高山，固不當以為楚地，亦不指閬風。”“高丘”或即“高山”，古有“高山君”<sup>⑤</sup>。包山簡與關沮秦簡均是楚地出土文獻。包山簡可證，楚人有向“高丘”祭祀和祈禱的習俗，無論包山簡中的“高丘”作何解釋，包山簡這條簡文可為本文的佳證。

綜上，簡文是說“馬”心臟罹患某種疾病，所以楚人向高山高丘進行祭祀，祈求去病。

## 五

簡368-370，有這樣的話，整理者點讀作：

“今日庚午利浴𣎵(蠶)，女毋辟(避)𣎵暮=(瞋瞋)者，目毋辟(避)胡者，腹毋辟(避)男女牝牡者。”以脩(滄)清一栢(杯)，𣎵赤叔(菽)各二七，并之，用水多少，次(恣)毆(也)。浴𣎵(蠶)必以日冕(纓)始出時浴之，十五日乃已。<sup>⑥</sup>

整理者將“𣎵”字釋作“蠶”；“辟”讀作“避”，雖無說，但顯然理解為“躲避”“避開”；“𣎵”通作

① 駢字騷：《銀雀山漢簡文字編》，413、414、415、416頁。

② [漢]毛公傳，[唐]孔穎達等正義：《毛詩正義》卷三，李學勤主編《十三經注疏》，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199頁。

③ [漢]毛公傳，[唐]孔穎達等正義：《毛詩正義》卷一七，李學勤主編《十三經注疏》，1115頁。

④ 《漢書》卷八六《翟方進傳》，北京：中華書局，1964，3439頁。

⑤ 李零：《考古發現與神話傳說》，《學人》第5輯，南京：江蘇文藝出版社，1994；又見其著《李零自選集》，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1998，58-84頁，行文有所改動（本文引用後者）。晏昌貴：《楚卜筮簡所見地祇考》，《石泉先生九十誕辰紀念文集》，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2007，341-367頁，又見其著《簡帛術數與歷史地理論集》，北京：商務印書館，2010，181-217頁。上述文獻均轉引自朱曉雪《包山楚簡綜述》，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13，606-607頁。

⑥ 湖北省荆州市周梁玉橋遺址博物館：《關沮秦漢墓簡牘》，134頁。



“眚”，引《集韻》訓作“多白眼也”；“瞽”通作“瞶”，引《玉篇》訓作“目不明”；“胡”，釋作“老壽”；“瞽”即“瞶”，引《說文》“玉石之白也”，又謂“疑即白石”。指出“以”字前部分屬於“祝浴蠶之辭”，“浴蠶”是育蠶選種的一種方法，並指出簡文可與傳世農書《齊民要術·種桑柘》《歲時廣記·立春浴蠶種》和《農政全書·養蠶法》相參看。<sup>①</sup>

按，整理者將簡文與傳世農書聯繫起來考慮，是很敏銳的，同時對“蠶”“瞽”“瞶”“胡”等字的釋讀亦可從。然而，“祝浴蠶之辭”的斷句及“辟”字的釋讀均有可商之處。

據整理者的斷句和釋讀意見，這段簡文當理解為：庚午利於浴蠶，女子不要避開多白眼的人，眼睛不要避開老壽的人，腹部不要避開男女牝牡者。以此觀之，整理者顯然認為簡文中的“眼睛多白眼的人”和“老壽的人”對浴蠶是無害的。然而，從語法角度來看，“祝浴蠶之辭”的主語應當是“女”，而不應在此後出現另外兩個主語“目”和“腹”；同時，“毋”是一個表示禁止性的語詞，帶有警告性質，簡文本意是“禁止”浴蠶者做某些事情。若將“辟”讀作“避”，則簡文變成“禁止”避開某些人，這背離了簡文原意，也與日書性質不符。而“腹毋避男女牝牡者”一句，若按整理者的理解則頗為不辭。其實“祝浴蠶之辭”是有韻的。這段簡文當重新斷讀作：“今日庚午利浴蠶，女毋辟瞽瞶（瞶瞶）者目，毋辟胡者腹，毋辟男女牝牡者。”簡文以“蠶”“目”“腹”“牡”為韻。上古音“蠶”是從母侵部字，“目”是明母覺部字，“腹”是幫母覺部字，“牡”是明母幽部字，其中的“目”“腹”兩字疊韻，又與“牡”字陰入對轉，古音“冬”“侵”合韻，而“冬”又是“幽”“覺”部的陽韻。另外，如此斷讀，則“瞽瞶瞶者”恰與這類人的特徵“目”相連，語義甚明。

循此，則簡文的“辟”字當讀作“睥”。上古音“辟”是幫母錫部字，“睥”是滂母支部字，兩字韻部陰入對轉，聲母均是唇音，例可通假。典籍中“卑”字及從“卑”聲的字與“辟”字及從“辟”聲的字相通的例子十分常見，<sup>②</sup>“睥”正從“卑”聲，因此，“辟”讀作“睥”是沒有問題的。典籍有徵。《史記·魏其武安侯列傳》：“辟倪兩宮間”，司馬貞索引《埤蒼》“辟倪”作“睥睨”。<sup>③</sup>《廣雅·釋詁一》：“睥，視也。”<sup>④</sup>《集韻·霽韻》：“睥，睥睨，視也。”<sup>⑤</sup>古“睥”“睨”同義，是連綿詞。典籍“睨”往往作“倪”。上引《史記·魏其武安侯列傳》：“辟倪兩宮間”，司馬貞索隱引《埤蒼》云：“睥睨，邪視也。”顏之推《顏氏家訓·誠兵》：“若居承平之世，睥睨宮闈，幸災樂禍，首為逆亂，誑誤善良。”<sup>⑥</sup>這裏的“睥睨”是（不懷好意的）窺視、注視的意思。“祝浴蠶之辭”中的“辟”亦當如此理解。尋繹文義，簡文當是說，在庚午利浴蠶，女子不要睥睨多白

① 湖北省荆州市周梁玉橋遺址博物館：《關沮秦漢墓簡牘》，134頁。

② 高亨、董治安：《古字通假會典》，478-480頁。

③ 高亨、董治安：《古字通假會典》，479頁。

④ [清]王念孫撰，鍾宇訊點校：《廣雅疏證》卷一下，北京：中華書局，1983，32頁。

⑤ [宋]丁度等編：《集韻》卷七，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503頁。

⑥ 王利器撰：《顏氏家訓集解》（增補本）卷五，北京：中華書局，1993，354頁。

眼的人的眼睛,不要睥睨老壽的人的腹部,不要睥睨男女雌雄類物體。

《齊民要術·種桑柘》:“藏卵時,勿令見人。應用二七赤豆,安器底,臈月桑柴二七枚,以麻卵紙,當令水高下,與重卵相齊。若外水高,則卵死不復出;若外水下,卵則冷氣少,不能折其出勢。”<sup>①</sup>“藏卵時,勿令見人”這種禁忌,與簡文所言相若。而簡文比《齊民要術》更加明確浴蠶者不能“睥睨”哪幾類人。

接下來順便看看“礬”字的釋讀。整理者已經指出此字當即“皦”,并引《說文》訓作“玉石之白也”,文意已足,却又在最後認為“疑即白石”,乃蛇足。簡文言“礬赤叔(菽)各二七,并之”,“各”“并”兩字已明示前文的“菽”起碼不止一種。可見,“礬”當與“赤”一樣表示一種顏色,在此當是指白色,除整理者所引《說文》外,典籍有徵。《詩·王風·大車》:“謂予不信,有如皦日。”毛傳:“皦,白也。”<sup>②</sup>《玉篇·白部》:“皦,白也。”<sup>③</sup>由此,簡文當重新斷讀作“礬、赤叔(菽)各二七,并之”,當是指白色和紅色兩種菽各取二七,并一起使用。

最後需要指出的是,上引整理者認為簡文的“暮”當通作“瞶”的說法是不準確的。簡文的“暮”字與《玉篇》中的“瞶”均从莫从目,祇是兩個偏旁的位置有所變動而已,這種偏旁變動不居的例子習見於古文字,因此這兩個字當是一字無疑,并非通假關係。

## 六

簡 373 言:

肥牛,善食之,而飲以秣,一月已。<sup>④</sup>

肥牛,整理小組認為是“使牛肥壯之術。”“善食”,整理小組認為“指精心餵養。”所言甚是。

對於“秣”字,整理小組懷疑讀作“沫”。并引《淮南子·說山》“人莫鑒於沫雨”,《注》或作“流潦”為證,認為“沫”當為雨潦之水。對此,方勇先生有不同看法。方先生認為整理小組的解釋“有些迂曲”,認為“雨潦之水”即是“雨積之水,所以原簡文說是飲牛以雨積之水”。據段玉裁《說文解字注》言“秣同秣”的解釋,方先生又認為簡文的“秣(秣)”用為本字,無需通假。“‘秣’字的本義就是指餵養牛馬的穀物或者飼料。”<sup>⑤</sup>從方勇先生行文來看,“秣”是固體穀物飼料。然而固體穀物飼料“秣”是不能與簡文的“飲”字相搭配的。對此,方勇先生也作了解釋,他說:

① [後魏]賈思勰撰,繆啓愉校釋:《齊民要術校釋》卷五,北京:農業出版社,1982,233頁。

② [漢]毛公傳,[唐]孔穎達等正義:《毛詩正義》卷第四,李學勤主編《十三經注疏》,270頁。

③ [梁]顧野王:《宋本玉篇》卷二〇,北京市中國書店影印,1983,371頁。

④ 湖北省荆州市周梁玉橋遺址博物館:《關沮秦漢墓簡牘》,135頁。

⑤ 方勇:《秦簡札記四則》,《長春師範學院學報(人文社會科學)》2009年第3期。

我們回頭再看原簡的內容,其說“飲以秣”,既然我們解釋“秣”為固體的穀物飼料,怎麼會飲給牛喝呢?這就讓人費解了,實則不然,在我國北方的一些地區還保留這樣的習慣,就是在給牛馬之類的牲畜育肥時除了給好一點的飼料餵養外,還要在飲水中添加一定的穀物飼料或者用泡過飼料的水來飲牛馬,這樣牛馬會長得肥大。這樣解釋,原簡文的意思就很明瞭了。<sup>①</sup>

按,所謂的“雨潦之水”,方勇先生已經指出是“雨積之水”。<sup>②</sup>既然是“雨積之水”,就無法與簡文所言的“善食”對應了。至於方勇先生把“秣”如字讀,並解釋為固體的穀物飼料這個觀點,也是有問題的。

上引方勇先生的解釋中所說的“給牛馬之類的牲畜育肥時除了給好一點的飼料餵養外,還要在飲水中添加一定的穀物飼料或者用泡過飼料的水來飲牛馬”包含着兩種不同喂牛馬的方式。方先生所說的“用泡過飼料的水來飲牛馬”,顯然是指用水“飲”牛馬,這裏自然可以使用“飲”字搭配,但這就無法與簡文的固體飼料相對應了。至於方先生所言“在飲水中添加一定的穀物飼料”用於“飲牛馬”的說法,可能欠妥當。如果飼料中水為主,則顯然是為了讓牛馬補充水分,固然可以用“飲”字;但如果固體飼料多於水,僅僅是為了讓飼料濕潤利於牛馬吃食和消化,則應該還是用“飼”或“喂”之類的動詞,而不應該用“飲”這個詞。後世農書有明確記載。元王禎《農書》有專門的論述:

方舊草凋朽,新草未生之時,宜取潔淨藁草細剉之,和以麥麸、穀糠、碎豆之屬,使之微濕,槽盛而飽飼之。春秋草茂放牧,飲水,然後與草,則腹不脹。至冬月,天氣積陰,風雪嚴凜,即宜處暖燠之地,煮糜粥以啖之。又當預收豆、楮之葉,舂碎而漬之以米泔,和剉草、糠麸以飼之。<sup>③</sup>

明徐光啓《農政全書》亦有類似記載:

牛一具三隻,每日前後餉,約飼草三束,豆料八升。或用蠶沙幹桑葉,水三桶浸之。<sup>④</sup>

從上引兩農書來看,餵養牛時,若是液體,則用“飲”這個詞;若是固體食物,即使這些固體食物需要用水“漬”,均用“飼”這個詞。可見,固體食物是不能與“飲”字搭配使用的。所以,此處的“秣”不能如字讀。筆者認為,“秣”當讀作“秣”。“秣”“秣”俱从“末”聲,故可通。“秣”字見於《說文》,是“鬻”字或體。《說文》:“鬻,凉州謂鬻為鬻。”《玉篇·米部》:“秣,糜也,

① 方勇:《秦簡札記四則》,《長春師範學院學報(人文社會科學)》2009年第3期。

② 方勇先生開始說“原簡文說是飲牛以雨積之水”,後來又把“秣”解釋為固體穀物或飼料,可能有筆誤。

③ [元]王禎撰,繆啓愉譯注:《東魯王氏農書譯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493-494頁。

④ [明]徐光啓撰,石聲漢校注:《農政全書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1157頁。

《說文》作‘鬻’。”<sup>①</sup>《廣韻·末韻》：“秣，糜也。”<sup>②</sup>慧琳《一切經音義》卷二七：“秣，粥糜也。”<sup>③</sup>古“糜”與“粥”同義。《說文》：“糜，糝也。”段《注》：“糜，亦謂之鬻，亦謂之饘。”<sup>④</sup>徐鍇《繫傳》：“糜，即粥也。”<sup>⑤</sup>據此可知，“秣”即是“粥”或者“粥糜”。上引王禎《農書》亦講到喂牛需要用“糜粥”，可證。《關沮秦漢墓簡牘》有“粥”與“飲”字搭配的用法。《關沮秦漢墓簡牘》簡309、301：“取肥牛膽盛黑叔（菽）中，盛之而係（繫），縣（懸）陰所，幹。用之，取十餘叔（菽）置鬻（粥）中而飲之，已腸辟。不已，復益飲之。鬻（粥）足已入之腸。”對於末一句，整理者認為是“飲粥之量應足以送黑豆入腸。”<sup>⑥</sup>甚是。簡312言：“取車前草實，以三指竄（撮），入酒若鬻（粥）中，飲之，下氣。”<sup>⑦</sup>亦可證。漢晉典籍也可見“粥”與“飲”字搭配的例子。《肘後備急方》卷四：“慈彌草三十斤，水三石，煮取一石，去滓，更湯上煎，令可丸。服如皂莢子三丸至五六丸，水隨小便去，即飲糜粥養之。”<sup>⑧</sup>《金匱要略·腹滿寒疝宿食病脈證治》：“右三味，以水四升，煮取二升，去滓，內膠飴一升。微火煎取一升半，分溫再服；如一炊頃。可飲粥二升。後更服。當一日食糜，溫覆之。”<sup>⑨</sup>《三國志·魏書·曹爽傳》：“宣王稱疾困篤，示以羸形，勝不能覺，謂之信然。”裴松之注引《魏末傳》曰：“宣王持杯飲粥，粥皆流出沾胸。”<sup>⑩</sup>據此可知，“飲”字可以與“粥”搭配使用。據此，簡文“秣”讀作“秣”訓作“糜”“粥”，文從字順。

需要指出的是，目前所見漢代之後的農書，均沒有記載如何“肥牛”的方法。所幸，關沮秦漢簡牘的出土，為我們瞭解秦漢時期“肥牛”的方法提供了證據，補充了傳世文獻的不足。

## 七

簡377言：

并命和之，即取守室二七，置桐中，而食以丹，各盡其復（腹），□

對於“守室”一詞，整理者認為即“守宮”，并引《馬王堆漢墓帛書·養生方》二九條所云“取守

① [梁]顧野王：《宋本玉篇》卷一五，293頁。

② 沈兼士主編：《廣韻聲系》，北京：文字改革出版社，1960，440頁。

③ [唐]慧琳撰，徐時儀校注：《一切經音義三種校本合刊》，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984頁。

④ [清]段玉裁：《說文解字注》七篇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332頁。

⑤ [南唐]徐鍇：《說文解字繫傳》卷一三，北京：中華書局，1987，145頁。

⑥ 湖北省荆州市周梁玉橋遺址博物館：《關沮秦漢墓簡牘》，126頁。

⑦ 湖北省荆州市周梁玉橋遺址博物館：《關沮秦漢墓簡牘》，127頁。

⑧ [晉]葛洪撰，文體端、蔡鐵如整理：《肘後備急方》卷四，吳潤秋等主編《中華醫書集成》第八冊“方書類一”，北京：中醫古籍出版社，1997，46頁。

⑨ [晉]葛洪撰，陸淵雷釋：《金匱要略今釋》卷三，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1955，171頁。

⑩ 《三國志》卷九《諸夏侯曹傳》，北京：中華書局，1964，285頁。

宮置新甕中，而置丹甕中，令守宮食之”爲證，指出兩條簡文內容相似。至於“桐”字，整理者認爲此字“右側不清，當爲容器名”<sup>①</sup>。

按，所謂的“桐”字原作：



此字原模糊不清，筆者摹作：



此字左旁从“木”是很明顯的。右側則作“周”形。睡虎地秦簡“周”字作“𠂔”形<sup>②</sup>。這一形體的“周”字爲銀雀山漢簡所繼承<sup>③</sup>。所以整理者釋作“桐”，不誤。結合竹簡與整理者所引《馬王堆漢墓帛書·養生方》所記可知，既然要對守宮（壁虎）餵食丹，則裝載守宮之器物不能讓守宮輕易逃脫，此容器當與馬王堆《養生方》中的“甕”相當。准此，筆者認爲“桐”字當讀作“甕”。“桐”从“周”聲，上古音“周”是章母幽部字，“甕”从“朱”聲，上古音“朱”是章母侯部字，“桐”“甕”兩字聲母均是舌音，韻部關係密切。典籍中有从“朱”聲的字與从“周”聲的字相通的例證。<sup>④</sup> 上古音“舟”是章母幽部字，則“舟”“桐”雙聲疊韻，例可通假。典籍中“周”字與“舟”字、从“周”聲的字與从“舟”聲的字相通的例子亦十分常見。<sup>⑤</sup> 另外，“舟”“朱”聲字多見相通例子。<sup>⑥</sup> 可作旁證。

《廣雅·釋器》：“甕，瓶也。”<sup>⑦</sup>《玉篇·瓦部》：“甕，小甕也。”<sup>⑧</sup>《方言》卷五：“甕，陳魏宋楚之間甕，或曰甕。”<sup>⑨</sup>《說文》：“甕，甕也。”“甕”即“甕”。《墨子·備城門》：“用瓦木甕容十升以上者，五十步而十，盛水，且用之。”孫詒讓《閒詁》：“甕、甕同。”<sup>⑩</sup>古“甕”亦作“甕”。《廣

① 湖北省荆州市周梁玉橋遺址博物館：《關沮秦漢墓簡牘》，136 頁。

② 張守中：《睡虎地秦簡文字編》，15 頁。

③ 駢宇騫：《銀雀山漢簡文字編》，44 頁。

④ 高亨、董治安：《古字通假會典》，352 頁。

⑤ 高亨、董治安：《古字通假會典》，778-780 頁。

⑥ 高亨、董治安：《古字通假會典》，351-352 頁。

⑦ [清]王念孫撰，鍾宇訊點校：《廣雅疏證》卷七下，北京：中華書局，1983，218 頁。

⑧ [梁]顧野王：《宋本玉篇》卷一六，306 頁。

⑨ [漢]揚雄撰，華學誠匯證：《揚雄方言校釋匯證》卷五，北京：中華書局，2006，353 頁。

⑩ [清]孫詒讓撰，孫啓治點校：《墨子閒詁》，北京：中華書局，2001，525 頁。



雅·釋器》：“瓮，瓶也。”“罍，瓶也。”“罍，瓶也。”<sup>①</sup>可見，古代“甗”“甗(瓮)”“罍”是形體相若的器物，可通用。綜上，簡文“取守室二七，置桐中，而食以丹”部分當是說，“捉取守宮二七，并放到桐(甗)中，而餵之丹”的意思。

<sup>①</sup> [清]王念孫撰，鍾宇訊點校：《廣雅疏證》卷七下，北京：中華書局，1983，218頁。

## 再讀里耶秦簡 8-145+9-2294 號牘\*

武漢大學歷史學院、簡帛研究中心 魯家亮

**內容提要** 里耶秦簡 8-145+9-2294 號牘所載文書是目前所見最為完整、重要的一份秦代“徒作簿”記錄。本文依據新刊布的簡牘圖像資料,對部分文字進行了補釋和改釋。在此基礎上,進一步就該文書所涉及的與秦代“作徒”“徒簿”等相關問題加以考察,具體包括作徒的監管、里耶秦簡所見“徒簿”的分類、“徒簿”的記錄形式以及記錄載體等。

**關鍵詞** 里耶秦簡 8-145+9-2294 號牘 徒簿

2012 年初,《里耶秦簡(壹)》出版,刊布了里耶古城遺址一號井中第五、第六及第八層簡牘的全部釋文和圖版。<sup>②</sup> 在該書的《前言》部分,整理者依據簡牘所記內容和題名情況將這批簡牘劃分為十類,其中第四大類“簿籍類”的第一小類為“簿”,具體包括作徒簿、倉徒最簿、畜員簿、度簿、獄簿、尉徼簿、見戶數簿、器物簿、校簿等。<sup>③</sup> 此處提到的“作徒簿”在《里耶秦簡(壹)》中即收錄不少,典型者如 8-686+8-973 所見“庫守悍作徒簿”、8-1143+8-1631 所

\* 本文為武漢大學自主科研項目(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成果,寫作得到國家社科基金青年項目“漢初律令體系研究”(12CZS014)、武漢大學青年學者團隊“史前至秦漢漢水流域人類文化的跨學科研究”和“中央高校基本科研業務費專項資金”資助(supported by “the Fundamental Research Funds for the Central Universities”)。

②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編著:《里耶秦簡(壹)》,北京:文物出版社,2012。

③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編著:《里耶秦簡(壹)·前言》,3 頁。

見“貳春鄉作徒簿”等。<sup>①</sup>此類文書，在漢代簡牘中亦有發現，<sup>②</sup>但主要與漢代西北地區戍卒的活動有關。<sup>③</sup>資料公布後，學界圍繞里耶秦簡所見“作徒簿”的種類、編製機構以及其所反映的秦代作徒管理等問題展開了討論。<sup>④</sup>與此同時，游逸飛、陳弘音二先生將湖南里耶秦簡博物館所藏簡牘的部分釋文加以整理公布，其中的 9-2294 與“徒簿”相關。<sup>⑤</sup>整理者也集中對里耶秦簡中與“徒簿”有關的簡文進行了公布，共計 178 條。<sup>⑥</sup>至此，里耶秦簡中此類文獻大體已全部公布出來。但這些簡牘多有殘斷，且部分簡文未附圖版，給我們利用這些資料進行“徒簿”的深入討論帶來了一定的困難。比較幸運的是，《湖南出土簡牘選編》和《湖南出土簡牘選編①》二書先後出版，<sup>⑦</sup>新公布了部分簡文的圖版，我們曾據此做過初步的綴合、校釋工作。<sup>⑧</sup>這其中 10-1170 所見“倉徒簿取”和 8-145+9-2294 所見“司空守圜徒作簿”最為完整、重要。<sup>⑨</sup>隨後，上述兩牘最新的紅外圖版也被公布出來，<sup>⑩</sup>為我們再作討論提供了便利。今擬在進一步校讀 8-145+9-2294 號牘的基礎上，進而對其所見與“作徒”“徒簿”相關的問題再作補充。

① 簡文的綴合及釋文見陳偉主編，何有祖、魯家亮、凡國棟撰著《里耶秦簡牘校釋（第一卷）》，武漢大學出版社，2012，203、283 頁。又，下文所引里耶秦簡釋文，如無特別說明，均出自該書，不再一一注明。

② 可參看李天虹《居延漢簡簿籍分類研究》，北京：科學出版社，2003，130-135 頁；李均明：《秦漢簡牘文書分類輯解》，北京：文物出版社，2009，335-337 頁。

③ 張春龍先生已經注意到里耶秦簡的“徒簿”與居延漢簡中“作簿”的關係，並進一步指出居延漢簡中的“日迹簿”也應與此相類。見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龍山里耶秦簡之“徒簿”》，《出土文獻研究》第 12 輯，上海：中西書局，2013，131 頁注釋 3。

④ 主要的相關討論如梁煒傑《讀〈里耶秦簡（壹）〉札記——“作徒簿”類型反映的秦“取”意義》，簡帛網，2013 年 11 月 9 日；胡平生《也說“作徒簿及最”》，簡帛網，2014 年 5 月 31 日；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龍山里耶秦簡之“徒簿”》，129-131 頁；高震寰《從〈里耶秦簡（壹）〉“作徒簿”管窺秦代刑徒制度》，《出土文獻研究》第 12 輯，上海：中西書局，2013，132-143 頁；曹書林《“受倉隸妾”解》，《魯東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3 年第 5 期，71-75 頁；賈麗英《里耶秦簡牘所見“徒隸”身份及監管官署》，《簡帛研究二〇一三》，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4，68-81 頁；沈剛《〈里耶秦簡〉（壹）所見作徒管理問題探討》，《史學月刊》2015 年第 2 期，22-29 頁；何有祖《從里耶秦簡徒作簿“（牢）司寇守囚”看秦刑徒刑期問題》，簡帛網，2015 年 9 月 7 日。

⑤ 游逸飛、陳弘音：《里耶秦簡博物館藏第九層簡牘釋文校釋》，簡帛網，2013 年 12 月 22 日。

⑥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龍山里耶秦簡之“徒簿”》，101-131 頁。今按，整理者亦同時指出這 178 條簡文中還包括吏員簿、刑案判決記錄等內容。因此，我們在考察“徒簿”時，應注意對這部分資料的甄別與篩選。

⑦ 鄭曙斌、張春龍、宋少華、黃朴華編著：《湖南出土簡牘選編》，長沙：嶽麓書社，2013；宋少華、張春龍、鄭曙斌、黃朴華編著：《湖南出土簡牘選編①》，長沙：嶽麓書社，2013。

⑧ 里耶秦簡牘校釋小組：《新見里耶秦簡牘資料選校（一）》，簡帛網，2014 年 9 月 1 日；《新見里耶秦簡牘資料選校（二）》，簡帛網，2014 年 9 月 3 日。二文又載《簡帛》第 10 輯，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

⑨ 10-1170 號簡在更早的時候也有介紹，見張春龍《里耶秦簡中遷陵縣之刑徒》，李宗焜主編《古文字與古代史》第 3 輯，台北：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2012，453-464 頁。

⑩ 里耶秦簡博物館、出土文獻與中國古代文明研究協同創新中心中國人民大學中心編著：《里耶秦簡博物館藏秦簡》，上海：中西書局，2016。

## — 8-145+9-2294 牘釋文校讀

8-145+9-2294 實際由三片殘簡拼合而成,整理者已將其中兩片拼合為9-2294。8-145與9-2294 拼合後,整塊木牘基本完整,主要內容為秦始皇三十二年十月二十七日遷陵縣司空守園所上報的“徒作簿”(以下簡稱“司空守園徒作簿”)。為方便討論,我們先將該牘綴合、改釋後的釋文引述如下:

廿二年十月己酉朔乙亥,司空守園徒作簿。A I

城旦司寇一人。A II

鬼薪廿人。A III

城旦八十七人。A IV

仗(丈)城旦九人。A V

隸臣穀(繫)城旦三人。A VI

隸臣居貲五人。A VII

·凡百廿五人。A VIII

其五人付貳春。A IX

一人付少內。A X

四人有逮。A XI

二人付庫。A XII

二人作園:平、□。A X III

二人付畜官。A X IV

二人徒養:臣、益。A X V

二人作務:驚、亥。<sup>①</sup> B I

四人與吏上事守府。B II

五人除道沅陵。B III

三人作廟。B IV

廿三人付田官。B V

三人削廷:央、閒、赫。B VI

一人學車酉陽。B VII

<sup>①</sup> 驚,原釋文未釋,《新見里耶秦簡牘資料選校(二)》釋作“瞿”;《里耶秦簡博物館藏秦簡》改釋為“驚”,可從。詳見里耶秦簡博物館、出土文獻與中國古代文明研究協同創新中心中國人民大學中心編著《里耶秦簡博物館藏秦簡》,192-193頁。

- 五人繕官：宵、金、□、稗、鯉。<sup>①</sup> BVIII  
 三人付段（假）倉信。BIX  
 二人付倉。BX  
 六人治邸。BXI  
 一人取筮（筮）：<sup>②</sup>廐。BXII  
 二人伐槩：强、童。<sup>③</sup> BX III  
 二人伐材：□、聚。<sup>④</sup> CI  
 二人付都鄉。C II  
 三人付尉。C III  
 一人治觀。CIV  
 一人付啓陵。CV  
 二人爲筭：移、昭。CVI  
 八人捕羽：操、寬、未、衷、丁、圉、辰、却。<sup>⑤</sup> CVII  
 七人市工用。CVIII  
 八人與吏上計。CIX  
 一人爲炭：<sup>⑥</sup>劇。CX  
 九人上省。CXI  
 二人病：復、卯。CXII  
 一人【傳】送酉陽。<sup>⑦</sup> CX III  
 □【槃八】人。DI  
 □□十三人。DII  
 隸妾塹（繫）舂八人。DIII  
 隸妾居貲十一人。DIV  
 受倉隸妾七人。DV

① □，《新見里耶秦簡牘資料選校（二）》釋作“應”；《里耶秦簡博物館藏秦簡》釋爲“應”，存疑。

② 筮，本牘凡兩見，《新見里耶秦簡牘資料選校（二）》均釋作“簫”，後陳劍先生將其改釋爲“筮”，並指出其應讀爲“筮/蒸”，或可逕看作“蒸”字異體，即薪蒸、柴火。詳見方勇《讀里耶秦簡札記六則》一文中的轉述，簡帛網，2015 年 11 月 13 日。

③ 强，《里耶秦簡博物館藏秦簡》釋，可從。

④ □，《里耶秦簡博物館藏秦簡》釋作“剛”，可參看。

⑤ 未、衷、辰，《里耶秦簡博物館藏秦簡》釋，可從。

⑥ 炭，《里耶秦簡牘校釋（第一卷）》釋作“烏”，何有祖先生將其改釋爲“炭”，可從。詳見何有祖《釋里耶秦簡牘“炭”字》，簡帛網，2014 年 9 月 16 日。

⑦ 送，《新見里耶秦簡牘資料選校（二）》釋作“徙”；《里耶秦簡博物館藏秦簡》改釋爲“送”，可從。



- 凡八十七人。DVI
- 其二人付畜官。DVII
- 四人付貳春。DVIII
- 廿四人付田官。DIX
- 二人除道沅陵。DX
- 四人徒養: 棠、瘞、□、□。<sup>①</sup> DXI
- 二人取芒: 阮、道。EI
- 一人守船: 遏。EII
- 三人司寇: 莢、類、款。<sup>②</sup> EIII
- 二人付都鄉。EIV
- 三人付尉。EV
- 一人付田。<sup>③</sup> EVI
- 二人付少內。EVII
- 七人取筮(蒸): □、林、嬈、榮、鮮、夜、吳。<sup>④</sup> EVIII
- 六人捕羽: 刻、嫪、卑、□、娃、變。<sup>⑤</sup> EIX
- 二人付啓陵。EX
- 三人付倉。EXI
- 二人付庫。EXII
- 二人傳送酉陽。FI
- 一人爲筭: 齊。FII
- 一人爲席: 嫪。FIII
- 三人治泉: 挾、茲、緣。FIV
- 五人塹: 嫪、般、橐、南、儋。FV
- 二人上青(省)。FVI
- 一人作廟。FVII
- 一人作務: 青。FVIII

① “瘞”下一字,原釋文作“帶”,《里耶秦簡博物館藏秦簡》改釋作“蔡”,存疑。

② 類,原釋文作“類”,《新見里耶秦簡牘資料選校(二)》釋作“猯”;《里耶秦簡博物館藏秦簡》改釋爲“類”,可從。

③ 田,原釋文作“臣”,方勇先生將其改釋爲“田”,可從。詳見方勇《讀里耶秦簡札記六則》。

④ □,原釋文作“繪”,《新見里耶秦簡牘資料選校(二)》釋作“繪”;《里耶秦簡博物館藏秦簡》改釋爲“紵”,存疑。吳,原釋文作“喪”,《里耶秦簡博物館藏秦簡》改釋爲“吳”,可從。

⑤ 嫪,原釋文作“綽”,《新見里耶秦簡牘資料選校(二)》釋作“婢”;《里耶秦簡博物館藏秦簡》改釋爲“嫪”,可從。□,《里耶秦簡博物館藏秦簡》釋作“鬻”,存疑。

一人作園：夕。F IX

· 小城旦九人：G I

其一人付少內。G II

六人付田官。G III

一人捕羽：强。G IV

一人與吏上計。G V

· 小春五人。G VI

其三人付田官。G VII

一人徒養：姊。G VIII







一人病：談。G IX 8-145+9-2294

【卅】二年十月己酉朔乙亥，司空守園敢言之：寫上，敢言之。/ 瘞手。I

十月乙亥水十一刻刻下二，佐瘞以來。II 8-145 背+9-2294 背<sup>①</sup>

第二欄第八行(B VIII)有：“五人繕官：宵、金、□、稗、鯉”。其中最末一個人名，原整理者釋作“觸”。<sup>②</sup> 今按，此字(A)恰巧位於三枚木牘殘片的斷裂之處，8-145 上殘留此字少量筆畫，拼合後可以發現其左半的筆畫多有剝落，原均認為左半為“角”，何有祖先生指出其左半當為“魚”，<sup>③</sup>應是。A 的右半所從也當非“蜀”，本牘在書寫時，均有向右傾斜的趨勢，懷疑右半所從為“里”。相關字形的比對，如表一所見：

表一

A	蜀	獨	里	鯉	
					
8-145+9-2294	8-660	8-141+8-686	8-1546	8-2296	馬王堆 1 號墓竹簡遣策 48 號簡 <sup>④</sup>

① 其中 8-145 的圖版，見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編著《里耶秦簡(壹)》彩版 15 頁，圖版 34 頁；9-2294 的圖版，見鄭曙斌、張春龍、宋少華、黃朴華編著《湖南出土簡牘選編》，112-113 頁；又宋少華、張春龍、鄭曙斌、黃朴華編著《湖南出土簡牘選編①》，145 頁。綴合後的彩色與紅外圖版則可參看里耶秦簡博物館、出土文獻與中國古代文明研究協同創新中心中國人民大學中心編著《里耶秦簡博物館藏秦簡》，50-51、124-125 頁。綴合意見則可參看里耶秦簡牘校釋小組《新見里耶秦簡牘資料選校(二)》，204-208 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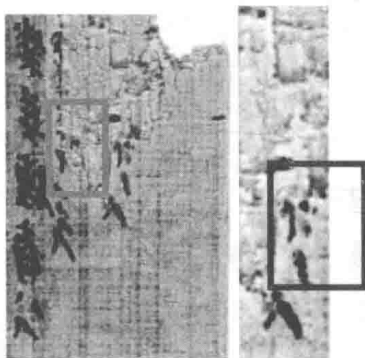
② 鄭曙斌、張春龍、宋少華、黃朴華編著：《湖南出土簡牘選編》，112 頁。

③ 今按，此承何有祖先生來信見告。

④ 裘錫圭主編：《長沙馬王堆漢墓簡帛集成(貳)》，北京：中華書局，2014，225 頁。

準此,A字可釋作“鯉”,此處用作人名。



第四欄第一行(DI)有:“□【粲八】人”。原釋文認為“人”上有三字,但未釋。我們將8-145+9-2294綴合後,指出“人”上一字當為“八”字右半殘留,并從書寫空間以及與男性作徒的對應推測,第一、二字當是“白粲”。<sup>①</sup>今按,對於“人”上三個殘缺字的推測應是可信的,沈剛先生對第一、二字亦有推測,認為當是“白粲”。<sup>②</sup>細看圖版,不僅“八”字右半的殘筆存在,“粲”字的下部所從“米”的殘劃亦存在,如下所見:



因此,釋文也應將“粲”字補出。此外,還有一個現象值得關注,即第四欄第一行的右側尚有2-3行文字的書寫空間,但似乎并未書寫文字,而是留空。巧合的是,此處也正是該木牘所記男、女作徒情況的分野處。

第四欄第十一行(DXI)有:“四人徒養:桀、瘞、□、□”。其中最後一個人名,原整理者疑是“復”字,并依體例外加“□”。<sup>③</sup>我們在校釋時則認為“復”字釋讀可信。<sup>④</sup>今按,同牘上有用作人名的“復”字,見於第三欄第十二行(CXII),可將兩字的字形對比如下:

表二

B	復
	

不難發現,此字(B)不應釋作“復”。具體釋作何字,待定。

第五欄第六行(EVI)有:“一人付田”。“付”下一字,原釋文作“臣”。<sup>⑤</sup>我們在校釋時認




① 里耶秦簡牘校釋小組:《新見里耶秦簡牘資料選校(二)》,207頁。

② 沈剛:《〈里耶秦簡〉(壹)所見作徒管理問題探討》,24頁。

③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編著:《里耶秦簡(壹)》釋文,18頁。

④ 陳偉主編,何有祖、魯家亮、凡國棟撰著:《里耶秦簡牘校釋(第一卷)》,85頁。

⑤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編著:《里耶秦簡(壹)》釋文,18頁。

爲此字釋“臣”不可信，將此字存疑。<sup>①</sup> 後方勇先生指出此字是“田”的訛字，同時懷疑“付田”的內容可能是里耶秦簡牘中常見“付田官”內容的省略形式，簡文中的“田官”應爲官署名。<sup>②</sup> 陳劍先生則認爲此字也可能是“園”字殘形。<sup>③</sup> 《里耶秦簡博物館藏秦簡》則將其釋作“邑”。<sup>④</sup> 今按，方先生將其釋作“田”字，可從。其字形作：，應是“田”字，祇是該字寫得不够規整，里耶秦簡中類似寫法的“田”字還有： (8-162)、 (8-764) 等。但方先生將“付田”理解爲“付田官”之省，則存在問題。里耶秦簡“徒簿”中“付”後之字多爲遷陵縣官署或鄉的名稱，本牘所見有“付貳春、付少內、付庫、付畜官、付田官、付倉、付都鄉、付尉、付啓陵”等，另有一例爲交付個人的記載，即“付假倉信”。其他徒簿所見則還有“付田”(8-239、8-2101)、“付司空”(8-663、8-2101、10-1160、10-1170)等，田和司空均爲官署之名。本牘中“付田官”凡四見。本牘所涉及四大類作徒均有交付田官的記錄，如第四欄第九行(DIX)所見，成年女性作徒有24人交付田官支配。如果將“付田”理解爲“付田官”之省，則此類作徒有兩條交付“田官”的記錄，必然重複。因此，此處的“付田”不可能是“付田官”之省。此外，“付田”在徒簿中多有記載，除本牘外，前引8-239、8-2101等簡亦見。田與田官是兩個不同的官署，<sup>⑤</sup> 因此同一份徒簿中同時出現“付田”和“付田官”的記載並不矛盾。陳劍先生疑其爲“付園”，似也不符合徒簿的記載，“園”不是官署，徒簿中與“園”有關的記載有“作園”(8-145+9-2294、8-162)、“守園”(8-663/8-2101)、“治徒園”(8-1636)等，多與具體的勞作有關。

## 二 “司空守園徒作簿”所見秦代作徒的監管

里耶秦簡所見秦代作徒的管理，學界已有大體共識，即隸臣妾由倉管理，其他作徒由司空管理。<sup>⑥</sup> 8-145+9-2294 以及 10-1170 兩牘進一步坐實并豐富了這一認識。以兩牘所見，司空、倉在對這些作徒進行描述時，還從性別及大小兩個層面加以細分。沈剛先生指出這種分類的目的既有勞動能力的考量，又與衣食供給的差异相關。<sup>⑦</sup> 倉管理的作徒種類較爲簡

① 陳偉主編，何有祖、魯家亮、凡國棟撰著：《里耶秦簡牘校釋（第一卷）》，85、87 頁。

② 方勇：《讀里耶秦簡札記六則》。

③ 轉引自方勇《讀里耶秦簡札記六則》。

④ 里耶秦簡博物館、出土文獻與中國古代文明研究協同創新中心中國人民大學中心編著：《里耶秦簡博物館藏秦簡》，194 頁。

⑤ 參看陳偉《里耶秦簡所見“田”與“田官”》，《中國典籍與文化》2013 年第 4 期，140-146 頁。

⑥ 可參看高震寰《從〈里耶秦簡（壹）〉“作徒簿”管窺秦代刑徒制度》、曹書林《“受倉隸妾”解》、賈麗英《里耶秦簡牘所見“徒隸”身份及監管官署》等。今按，需要注意的是曹文和賈文，對秦縣的官與曹存在誤解，因此將具體的管理機構看成了司空曹、倉曹。

⑦ 沈剛：《〈里耶秦簡〉（壹）所見作徒管理問題探討》，24 頁。

明,而司空管理的作徒類別則比較龐雜。以“司空守圜徒作簿”所見,包括城旦司寇、鬼薪、城旦、仗(丈)城旦、隸臣毆(繫)城旦、隸臣居貲(以上為成年男性);白粲、舂、隸妾毆(繫)舂、隸妾居貲(以上為成年女性);小城旦;小舂。共計4大類12種。

這其中“城旦司寇”較為特殊,其又見於8-2151+8-2169、<sup>①</sup>8-2156、10-81、11-249等簡,<sup>②</sup>這些簡牘均與“徒簿”相關。游逸飛、陳弘音二先生在注釋9-2294時指出“(城旦司寇)又見於司空作徒簿(簡8-2156)及作徒簿(簡8-2151),均僅一人,應為刑徒中的監督、領導者。睡虎地《秦律十八種·司空律》規定城旦司寇一人監領二十名刑徒,本簡刑徒共125人,超過六倍不止”。<sup>③</sup>睡虎地秦簡《秦律十八種》中與此相關的簡文有三條:<sup>④</sup>

城旦之垣及它事而勞與垣等者,旦半夕參;其守署及為它事者,參食之。其病者,稱議食之,令吏主。城旦舂、舂司寇、白粲操土攻(功),參食之;不操土攻(功),以律食之。

(《秦律十八種·倉》55-56號簡)

隸臣妾、城旦舂之司寇;居貲贖責(債);毆(繫)城旦舂者,勿責衣食;其與城旦舂作者,衣食之如城旦舂。

(《秦律十八種·司空》141號簡)<sup>⑤</sup>

毋令居貲贖責(債)將城旦舂。城旦司寇不足以將,令隸臣妾將。居貲贖責(債)當與城旦舂作者,及城旦傅堅、城旦舂當將司者,廿人,城旦司寇一人將。司寇不踐,免城旦勞三歲以上者,以為城旦司寇。

(《秦律十八種·司空》145-146號簡)

睡虎地秦簡的原整理者在55-56號簡和141號簡下分別注釋云:“簡文有城旦司寇、舂司寇,均不見於古籍。據下文《司空律》,城旦可減刑為城旦司寇,此處舂司寇可能也是由舂減刑的一種刑徒。”“城旦舂之司寇,據簡文應為城旦舂減刑為司寇者,簡中有時分稱城旦司

① 綴合見何有祖《里耶秦簡牘綴合(六)》,簡帛網,2012年6月4日。

② 10-81和11-249兩簡的釋文分別見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龍山里耶秦簡之“徒簿”》第123、105頁。今按,其中11-249號簡的釋文將“城旦”與“司寇”斷讀,今依據8-145+9-2294等簡可知,不應斷讀。

③ 游逸飛、陳弘音:《里耶秦簡博物館藏第九層簡牘釋文校釋》,注122。

④ 釋文可參看睡虎地秦墓竹簡整理小組《睡虎地秦墓竹簡》,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33、52、53頁;陳偉主編,彭浩、劉樂賢、萬全文、晏昌貴、伊強撰著:《秦簡牘合集(壹)上》,武漢大學出版社,2014,85、126、128頁。

⑤ “隸臣妾、城旦舂之司寇;居貲贖責(債);毆(繫)城旦舂者”一句的句讀,原釋文作“隸臣妾、城旦舂之司寇、居貲贖責(債)毆(繫)城旦舂者”,並語譯為“隸臣妾、城旦舂之司寇,或以勞役抵償贖責債務而被拘繫服城旦舂勞役的人”(睡虎地秦墓竹簡整理小組:《睡虎地秦墓竹簡》,52-53頁)。《秦簡牘合集》將句讀調整為“隸臣妾、城旦舂之司寇居貲贖責(債)、毆(繫)城旦舂者”,並指出簡文是指隸臣妾與城旦舂之司寇中居貲贖責(債)或者繫城旦舂的人(陳偉主編,彭浩、劉樂賢、萬全文、晏昌貴、伊強撰著:《秦簡牘合集(壹)上》,126-127頁)。今按,《秦簡牘合集》的句讀調整有一定道理,尤其指出里耶秦簡作徒簿中幾類刑徒分別記列與本條律文的理解有關,使我們對此句話的理解豁然開朗。但是將“居貲贖責(債)或者繫城旦舂的人”限定在“隸臣妾與城旦舂之司寇中”則過於狹隘。我們認為此句的句讀當作“隸臣妾、城旦舂之司寇;居貲贖責(債);毆(繫)城旦舂者”,其義指隸臣妾與城旦舂中為司寇者、居貲贖責(債)者以及毆(繫)城旦舂者,共三類人。

寇、春司寇。”<sup>①</sup>富谷至先生則認為：“司寇是對受刑囚進行司法管制的刑役。但同時，司寇還有捕盜即對勞役刑徒進行監督的刑役內容。”“這裏的‘城旦司寇’就是司寇對城旦刑徒進行監督的意思。”<sup>②</sup>沈剛先生大體贊同原整理者的說法，並說這些城旦即使減刑為司寇，其作為城旦的一些義務依然存在。<sup>③</sup>何有祖先生則折中原整理者和富谷至先生的看法，指出從隸臣妾、城旦春到司寇的轉換，既有工作角色的變化，也有刑徒身份上的變化。<sup>④</sup>準此，城旦司寇具有監督刑徒勞動的職責，應無疑問。但與之相應的“春司寇”却未在“司空守圜徒作簿”中發現。

對於“城旦司寇”監管的人數，游逸飛、陳弘音二先生感歎以“司空守圜徒作簿”所見“城旦司寇”一人監管的刑徒過多，達到 125 人。今以綴合後釋文所見的情況來看，“司空守圜徒作簿”所見作徒多達 226 人，這樣祇有一位監督、領導者確實不合常理。

睡虎地秦簡一般稱這種對刑徒的監管、領導作“將司”，有時亦可省稱作“將”，如上引《秦律十八種·司空》145-146 號簡所見。《秦律十八種·司空》也同時規定哪些刑徒需要“將司”，如：<sup>⑤</sup>

公士以下居贖刑臯(罪)、死臯(罪)者，居於城旦春，毋赤其衣，勿枸櫨櫟杖。鬼薪白粲，群下吏毋耐者，人奴妾居贖賞責(債)於城旦，皆赤其衣，枸櫨櫟杖，將司之；其或亡之，有臯(罪)。葆子以上居贖刑以上到贖死，居於官府，皆勿將司。

(《秦律十八種·司空》134-35 號簡)

城旦春衣赤衣，冒赤幘(氈)，枸櫨櫟杖之。仗城旦勿將司；其名將司者，將司之。

(《秦律十八種·司空》147 號簡)

從上引兩條律文來看，並非所有刑徒均需要將司，如仗城旦就不需要。這可能是考慮到仗城旦年齡較大的因素，相應地我們懷疑小城旦、小春可能也不受將司。簡文提及“葆子以上居贖刑以上到贖死，居於官府者”也不受將司。此外，律文也提及公士以下以居贖的方式居於城旦春者，不用穿赤色的衣服，也不用帶刑具，簡文雖未明言其是否需要將司，但是結合上下文來看，其受將司的可能性很小。以此標準再來審視“司空守圜徒作簿”所見作徒，其中的仗(丈)城旦 9 人、小城旦 9 人、小春 5 人，共計 23 人應不受將司；隸臣居贖 5 人、隸妾居贖 11 人，如果比照公士以下以居贖的方式居於城旦春者，其受將司的可能性很小。這樣“城旦司

① 睡虎地秦墓竹簡整理小組：《睡虎地秦墓竹簡》，34、52 頁。

② [日]富谷至著，柴生芳、朱恒曄譯：《秦漢刑罰制度研究》，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6，31 頁。

③ 沈剛：《〈里耶秦簡〉(壹)所見作徒管理問題探討》，28 頁注 5。

④ 何有祖：《從里耶秦簡徒作簿“(牢)司寇守囚”看秦刑徒刑期問題》。

⑤ 釋文可參看睡虎地秦墓竹簡整理小組《睡虎地秦墓竹簡》，51、53 頁；陳偉主編，彭浩、劉樂賢、萬全文、晏昌貴、伊強撰著：《秦簡牘合集(壹)上》，120-121、130 頁。



寇”實際監管、領導的人數可能應為 187 人。但一人監管 187 人，仍然不盡合理。

我們還注意到《秦律十八種·司空》記云“城旦司寇不足以將，令隸臣妾將”，據此隸臣妾是可以代替城旦司寇行“將司”之責的。我們知道秦代隸臣妾主要歸倉管，“司空守圜徒作簿”記載有“受倉隸妾七人”，10-1170 亦記載“男卅人付司空”“女三百六十人付司空”。<sup>①</sup> 因此，司空使用的隸臣妾必然來自倉。里耶秦簡徒簿所見，倉與司空之間也多有作徒交換，司空也會將作徒交付給倉使用，如“司空守圜徒作簿”中兩次提及付倉，共 5 人。此外，10-1170 也多次提及“男百五十人居貲司空”“男九十人貲(繫)城旦”“女百卅五人貲(繫)春”“女三百一十人居貲司空”。顯然“司空守圜徒作簿”中的隸臣貲(繫)城旦、隸臣居貲、隸妾繫(繫)春、隸妾居貲這四類作徒也來自倉。這種不同官署之間作徒相互調派，其目的可能並非出於作徒不足的考慮，如“司空守圜徒作簿”所見，同一天中司空付倉 5 人，而同時受倉 7 人。我們推測，其目的可能與具體勞役種類安排以及刑徒監管、領導有關。由倉調入的隸妾 7 人，除特殊勞動技能的需要外，極有可能是因為“城旦司寇”不足，而調入司空監管、領導刑徒的。因此“司空守圜徒作簿”所見作徒監管者應不止一人，將司者也非城旦司寇一種。

綜上所述，里耶秦簡所見各類作徒主要由司空和倉管理，但是在具體的日常勞役之中，則由作徒自己承擔監管與代領之責，主要的承擔者為城旦司寇，這一稱謂應源於司寇，<sup>②</sup> 據法律規定一般“免城旦勞三歲以上者”充當城旦司寇；在城旦司寇不足時，隸臣妾也可代替其行事。里耶秦簡“徒簿”中所見倉向司空調派隸臣妾或與作徒監管、領導的需求有關。

### 三 “徒簿”的記錄形式與書寫載體

對於里耶秦簡“徒簿”的記錄形式和書寫載體，原整理者有一個比較綜合的描述：

其記錄的一般形式是：年、月、日、經辦單位、主管官吏。單面書寫時此項內容居於簡牘之右側，雙面書寫則位於正面。三[10-1124]“牘北〈背〉上”，即是指徒隸的具體人數和工作記錄於牘之背面，如此則呈報文書正文為正面。<sup>③</sup> 徒隸名、人數即事項分欄書寫。因所記內容較多，其完整形制長多為 46 釐米，寬約 3 釐米。<sup>④</sup>

① 今按，此為倉一月交付司空刑徒的累積人次，並非實際人數。

② 秦及漢初的“司寇”屬國家編戶，籍附縣鄉，可單獨立戶，其所從事的工作多與備守、監管等有關，與隸臣妾、戍卒從事的日常工作多有不同。可參看[日]富谷至著，柴生芳、朱恒曄譯《秦漢刑罰制度研究》，31 頁；沈剛《〈里耶秦簡〉(壹)所見作徒管理問題探討》，28-29 頁；孫聞博《秦及漢初的司寇與徒隸》，《中國史研究》2015 年第 3 期，76-80 頁。

③ 今按，所舉 10-1124 之例似非徒簿，疑與 8-1566 比較接近。如此，則背面記錄具體人數和工作內容的情況似不存在。

④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龍山里耶秦簡之“徒簿”》，129 頁。

高震寰先生的考察則較為具體，他以 8-1069+8-1434+8-1520、8-2034 和 8-145、8-663、8-2101 等簡為例，對兩類作徒簿的內容、格式分別加以概括：

至此，我們可以發現，由庫、少內、畜官這類單位製作的作徒簿，內容應包括日期、單位、負責人名稱、自倉與司空各收到多少人手及合計多少、今日勞動項目，其下書寫執勤徒隸名稱。之後視簡牘殘留空間，在正面或反面書寫上呈文句，就送到縣廷。由縣廷小吏打開後書寫收文記錄。

若是倉、司空的作徒簿，由於它們各是隸臣妾與較重刑徒的主要管控單位，會在勞動項目中說明“若干人付某單位”。奇怪的是，凡是倉與司空的作徒簿，其上均沒有收文記錄，而僅僅祇有作徒簿的內容。不禁讓人懷疑倉與司空是否與縣廷距離很近，或者根本就在縣廷裏，所以上呈文書時沒有收文記錄。不過由於沒有進一步證據，祇是一種推測。<sup>①</sup>

上引二文對徒簿的基本記錄形式和書寫載體均有討論，尤其是將徒簿區分為兩類加以考察，甚是。這其中，對於接受作徒單位所編製的作徒簿考察較為詳細。但在一些細節上，還可藉由新刊布或綴合的徒簿資料再作一些補充說明。

其一，由“司空守圉徒作簿”可知，司空所派出之作徒去往的官署或鄉有貳春鄉、少內、庫、畜官、田官、倉、都鄉、尉、啓陵鄉、田等，此外司空作為官署也會收到倉所派出的作徒（8-663、8-2101、10-1160、10-1170）。與之相對應，目前可以見到這些官署或鄉上報的作徒簿，其大體情況如下：貳春鄉（8-787+8-1327、<sup>②</sup>8-1143+8-1631、8-1146、8-1207+8-1255+8-1323、8-1280）、少內（8-2034）、庫（8-686+8-973）、畜官（8-199+8-688）、田官（9-2303<sup>③</sup>）、倉（8-663、8-736）、都鄉（8-142、8-196+8-1521、8-1095、8-2011）、啓陵鄉（8-801、8-1278+8-1757、8-1759）、田（8-179）、司空（8-1665、8-2008、8-2111+8-2136、<sup>④</sup>8-2151+8-2169<sup>⑤</sup>）。上述官署中，祇有尉目前未發現上報作徒簿的記錄。但總體上，受、付作徒及其所對應的官署或鄉的情形當無大的出入。

在整理者新公布的“徒簿”資料中，我們發現有一枚木牘比較特殊，即 10-1160：

□□年四月丁酉，發弩守蒼薄（簿）。冗戌四人

① 高震寰：《從〈里耶秦簡（壹）〉“作徒簿”管窺秦代刑徒制度》，138 頁。

② 綴合見何有祖《里耶秦簡牘綴合（二）》，簡帛網，2012 年 5 月 14 日。

③ 此例見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龍山里耶秦簡之“徒簿”》，122 頁。其文云：“將田鄉守敬作徒簿”，8-672、8-764 等簡有“田官守敬”，懷疑幾處的“敬”是同一人，但 9-2303 簡的記載比較特殊，是否一定為田官作徒簿，還可討論，暫將此例附於此。

④ 綴合見何有祖《里耶秦簡牘綴合（七則）》，簡帛網，2012 年 5 月 1 日。

⑤ 綴合見何有祖《里耶秦簡牘綴合（六）》。

□人求盜，  
一人□責司空，(第一欄)  
一人行書夷新亭□  
見一人得付司空□(第二欄)10-1160<sup>①</sup>

此牘應非一般意義上的徒簿，其自名“發弩守蒼簿”，似有缺文。從發弩守的職官名以及後文“冗戍”的記載來看，可能是某種卒簿，與居延漢簡中所見戍卒的迹簿、作簿比較相似。<sup>②</sup> 比較特別的是，其中兩處均提及這些戍卒會交付司空，其中一人可能還是去司空居責(債)。8-666+8-2006 亦顯示司空對冗戍士伍負管理之責。<sup>③</sup> 如此理解不誤，則從事“作徒”事務的人員來源比較複雜，除一般意義上的刑徒外，部分戍卒也可能以居債的身份或直接交付給司空使用。司空還有可能再將這些居債者調派至其他官署或鄉，如 8-787+8-1327 所見“貳春鄉守綽作徒簿(簿)，受司空居責(債)、城旦”。<sup>④</sup> 因此，高震寰先生所概括的第二類作徒簿應包含司空、倉和發弩三個官署。或許以後還會發現其他官署派出作徒的記載。

其二，高震寰先生指出第一類作徒簿中在具體勞動項目之下還要寫上執勤隸徒的名稱。<sup>⑤</sup> 沈剛先生在考察 8-145 號牘中分工情況時，指出“簡中作徒大致有兩類，一類是分配到政府相關機構以及屬鄉中；一類是服各種勞役，這類人通常都標注具體人名，這可能是因為司空在管理刑徒的同時，還要負責勞役，並且從這些勞役的種類看，似乎還很難歸屬到具體的部門或機構”。<sup>⑥</sup> 我們在對“司空守圜徒作簿”的分工再作梳理時，發現標注姓名者，一般都指某種具體的勞作，如徒養、捕羽等。但是沒有標注姓名時，則有兩種情況，一是沈剛先生所說分配至其他官署或鄉中者，另外一種則是也有具體勞作名稱者，且數量還不少。如下表所見，成年男性作徒外派其他官署、鄉中或個人者 44 人，均無具體姓名記載；而從事具體勞作者中，有姓名記錄者 32 人，無姓名記錄者多達 49 人。成年女性刑徒中從事具體勞作而無姓名記錄者則祇有 7 名，小城旦中此種情況者祇有 1 名，小春中則無。

①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龍山里耶秦簡之“徒簿”》，124 頁。

② 可參看李天虹《居延漢簡簿籍分類研究》，121-135 頁。

③ 8-66+8-2006 云：“卅年五月戊午朔辛巳，司空守敞敢言之：冗戍士五(伍)【秭】I 歸高成免衣用當傳。謁遣吏傳。謁報。II 敢言之。III”

④ 綴合見何有祖《里耶秦簡牘綴合(二)》。今按，“居責(債)”與“城旦”似應斷讀。

⑤ 高震寰：《從〈里耶秦簡(壹)〉“作徒簿”管窺秦代刑徒制度》，138 頁。

⑥ 沈剛：《〈里耶秦簡〉(壹)所見作徒管理問題探討》，24 頁。

表三

	無姓名者				有姓名者	
	付其他官署、鄉或個人		具體勞作		具體勞作	
成年男性刑徒	付貳春	5	有逮	4	作園	2
	付少內	1	與吏上事守府	4	徒養	2
	付庫	2	除道沅陵	5	作務	2
	付畜官	2	作廟	3	削廷	3
	付田官	23	學車酉陽	1	繕官	5
	付段(假)倉信	3	治邸	6	取簍	1
	付倉	2	治觀	1	伐槩	2
	付都鄉	2	市工用	7	伐材	2
	付尉	3	與吏上計	8	爲筭	2
	付啓陵	1	上省	9	捕羽	8
			【傳】送酉陽	1	爲炭	1
					病	2
	小計	44		49		32
成年女性刑徒	付畜官	2	除道沅陵	2	徒養	4
	付貳春	4	傳送酉陽	2	取芒	2
	付田官	24	上青(省)	2	守船	1
	付都鄉	2	作廟	1	司寇	3
	付尉	3			取簍	7
	付田	1			捕羽	6
	付少內	2			爲筭	1
	付啓陵	2			爲席	1
	付倉	3			治泉	3
	付庫	2			壑	5
					作務	1
					作園	1
	小計	45		7		35
小城旦	付少內	1	與吏上計	1	捕羽	1
	付田官	6				
小計		7		1		1
小春	付田官	3			徒養	1
					病	1
小計		3				2

爲什麼會出現這種情況,我們推測還是與當時的作徒使用制度有關。交付其他官署或

鄉者,其具體的勞作分工由接受官署或鄉具體安排,相應的具體勞作名稱和參與勞作者的姓名在這些官署或鄉所上報的作徒簿中均有記載。因此,司空對這部分作徒的記錄,在“徒簿”上祇需保留具體人數和交付對象,以供後期核查即可。換言之,這部分刑徒雖隸屬於司空管轄,但在交付出去後,其短期的管轄職權或發生轉移。在作徒們歸建之後,<sup>①</sup>司空纔會重新擁有其管轄之權。

我們發現不標注勞作者姓名的具體勞作有一些特殊之處,比如有不少分工可能會產生離開遷陵本縣的結果,如“與吏上事守府”“除道沅陵”“學車西陽”“市工用”“與吏上計”“傳送西陽”等;還有一些分工或涉及其他官署、或超出司空的職權範圍,如“有逮”與司法事務有關;“作廟”<sup>②</sup>“上省”可能與祭祀有關;<sup>③</sup>“治邸”“治觀”的情況則不甚明了,謝坤先生指出治觀與“治邸”應屬於同一類勞作,大致與修治闕樓相關。<sup>④</sup>又 8-904+8-1343 云:

城旦瑣以三月乙酉有逮。今隸妾益行書守府,因之令益治邸【代】Ⅰ處。謁令倉、司空薄(簿)瑣以三月乙酉不治邸。<sup>⑤</sup>敢言之。/五月丙子Ⅱ朔甲午,遷陵守丞色告倉、司空主,以律令從事,傳書。/圉手。Ⅲ8-904+8-1343

這份文書中,城旦瑣原來的任務安排應是治邸,但因三月乙酉日有逮,導致這天不能去治邸。而隸妾益這天恰好安排的是行書守府的工作,因此主管之人順道又安排隸妾益代替城旦瑣治邸。我們懷疑治邸的工作可能不在縣內進行,或有可能在守府工作。否則,便不會出現以行書守府的隸妾順道代替城旦治邸的情況。也因此纔有文書中所見,主管之人將此分工安排的變動告訴遷陵守丞,遷陵守丞再告知倉和司空,令其以律令行事。由此,可知主管之人或不屬遷陵縣。

綜上,“司空守圉徒作簿”中不標記勞作者姓名時,有兩種情況,一為直接將這些刑徒交付其他官署或鄉者,二為派出的這些刑徒所從事的勞作會離開本縣或超出司空所管轄事務範圍者。凡書寫勞作者姓名者,應是司空自己直接使用刑徒勞作的記錄,<sup>⑥</sup>這部分作徒的記錄與其他接收作徒勞作的官署或鄉上報的“作徒簿”在形式上是一致的。倉“徒簿”的情況也應如此。

① 今按,作徒勞作結束後歸建的記載,如 8-1515 所見:“卅年十月辛卯朔乙未,貳春鄉守綽敢告司空主,主Ⅰ令鬼薪軫、小城旦乾人為貳春鄉捕鳥及羽。羽皆已Ⅱ備,今已以甲午屬司空佐田,可定薄(簿)。敢告主。Ⅲ”。

② 嶽麓秦簡記載秦時縣道設有秦上皇祠廟(參看歐陽《嶽麓秦簡所見比初探》,北京大學出土文獻研究所、湖南大學嶽麓書院主辦,“秦簡牘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長沙,2014年12月,77頁)。里耶秦簡 8-138+8-174-522+8-523 記載有“令史行廟”文書,結合前述嶽麓秦簡的記載來看,縣道似對廟行主要管理的責任。

③ “上省”與祭祀有關,可參陳偉主編,何有祖、魯家亮、凡國棟撰著《里耶秦簡牘校釋(第一卷)》,86頁。

④ 謝坤:《〈里耶秦簡(壹)〉綴合一則》,簡帛網,2015年8月4日。

⑤ 今按,簡文中兩處“倉”與“司空”之間均應斷讀。

⑥ 我們在不同官署或鄉的徒簿中,也會看到相同的勞作類型,如捕羽、求羽見於都鄉(8-142)、庫、(8-1069+8-1434+8-1520)、貳春鄉(8-1515)、少內(8-2034)、倉(8-663)、司空(8-145+9-2294)等,這是因為每個官署或鄉均有這方面的需求。這些勞作類型就不好歸屬到某一個官署或鄉之中。

其三,整理者指出此類徒簿因內容較多而多書寫在木牘之上,并給出了其完整的形制,一般長 46 釐米,寬 3 釐米。<sup>①</sup> 沈剛先生在考察 8-663 和 8-2008 這兩份徒簿時,則指出其皆有結尾而無標題,不符合秦漢簡牘文書書寫的一般規律,我們推測,標題可能是寫在另外一支簡上。<sup>②</sup> 觀察 8-663 和 8-2008 兩牘的圖版,可以發現此兩牘均存在右半殘斷的可能。如此,是否存在標題另寫他簡的情況尚難斷定。但沈先生的這個想法促使我們去找尋里耶秦簡中有無單獨書寫徒簿標題的情況。我們發現 8-9 有可能就是這種單獨書寫的徒簿的標題,可惜的是此簡殘缺不全,尚難完全確定。梁煒傑先生則將其看作作徒簿有按年記錄的證據,<sup>③</sup>亦有待檢驗。

雖未發現單獨書寫的作徒簿標題,但是我們在梳理里耶秦簡徒簿資料時發現徒簿除書寫於木牘之上外,也有在單簡上書寫并編聯成冊的情況(圖一),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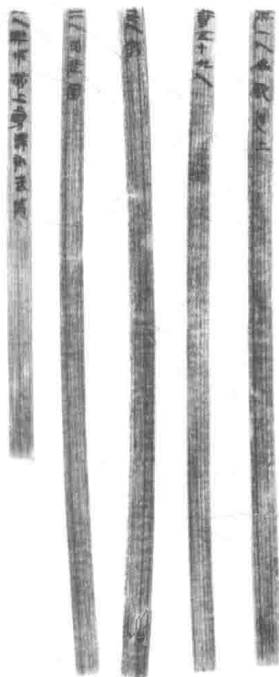
其一人爲甄運土。8-31

舂五十九人。8-59

三人病。8-471

二人治徒園。8-1636

一人與佐帶上虜課新武陵。8-1677



圖一

①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龍山里耶秦簡之“徒簿”》,129 頁。

② 沈剛:《〈里耶秦簡〉(壹)所見作徒管理問題探討》,23 頁。

③ 梁煒傑:《讀〈里耶秦簡(壹)〉記——“作徒簿”類型反映的秦“取”意義》。



五簡的書風比較接近,完整簡的長度似也大體相當,從內容上看均與“徒簿”有關。因此,五簡應屬於同一簡冊。雖殘缺較多,但可據此推測除書寫在木牘之上外,“徒簿”也可以寫在單簡上再編聯成冊上報。<sup>①</sup> 角谷常子先生注意到里耶秦簡中多使用單獨簡的現象,並推測其原因或由於當時還處於文書行政的草創期,相應的制度也不盡成熟有關。<sup>②</sup> 這種編聯成冊“徒簿”的出現,或許正好說明當時的文書行政以及相應的制度正在緩慢發生轉變。對於這類編聯成冊文書的復原,還有待里耶秦簡的資料進一步公布纔能進行。

附記:小文在寫作時得何有祖先生、雷海龍先生幫助。論文初稿於2016年1月29日,在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舉辦之“第二屆古文字學青年論壇”上宣讀,論文評議人陳文豪先生、參與本次會議的陳劍先生、許名瑯先生均指出了文中存在的錯漏。《簡帛研究》的匿名審稿專家也提出不少寶貴意見。謹向諸位先生致謝!

<sup>①</sup> 居延漢簡中,此類作簿的標題、正文、統計記錄乃至呈報均有分簡書寫的情況,其原始狀況可能也是編聯成冊的。參看李天虹《居延漢簡簿籍分類研究》,130-134頁。

<sup>②</sup> [日]角谷常子:《論里耶秦簡的單獨簡》,《簡帛》第8輯,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161-178頁。

# 里耶秦簡 7-304 簡文解析<sup>\*</sup>

## ——兼及秦遷陵縣徒隸人數問題

中國人民大學歷史學院

劉自穩

出土文獻與中國古代文明研究協同創新中心

**內容提要** 里耶秦簡 7-304 是秦始皇二十八年遷陵縣隸臣妾及黔首居貲贖債作官府課，正面簡文中的死亡率數值有誤，背面簡文中的重文符又疑為勾識符之誤。結合 7-304 簡和里耶秦簡“作徒簿”可以考察出秦時遷陵縣徒隸規模大概在 340 人左右，與遷陵縣編戶人口數相比遠未達到“赭衣半道”的誇張程度。

**關鍵詞** 里耶秦簡 7-304 死亡率 勾識符 徒隸人數

### 一 簡 7-304 正面死亡率考察

里耶秦簡 7-304 是一枚統計秦始皇二十八年（前 219）遷陵縣隸臣妾及黔首居貲贖債作官府者死亡狀況的簡牘，其正面釋文如下：

廿八年遷陵隸臣妾及黔首居貲贖責〈債〉作官府課。·泰凡百八十九人。死亡·衡（率）之六人六十三分人五而死亡一人。

<sup>\*</sup> 本文係中國人民大學科學研究基金（中央高校基本科研業務費專項資金資助）項目成果（批准號 17XNH060）。

已計廿七年餘隸臣妾百一十六人。

廿八年新・入卅五人。

・凡百五十一人,其廿八死亡。・黔道〈首〉居貲贖責〈債〉作官[府]卅八人,其一人死。<sup>①</sup>

該簡牘正面文字據語義可分為兩部分,第一列總敘遷陵縣始皇二十八年隸臣妾及黔首居貲贖債者作官府的人數及死亡率,后三列分言兩類徒隸的總人數及死亡人數。但是,計算所得兩組數據的死亡率並不一致。

第一部分中,始皇二十八年遷陵縣“隸臣妾及黔首居貲贖責”的總人數為 189 人,“六人六十三分人五而死亡一人”即死亡率為  $\frac{63}{383}$ ,則死亡人數為  $31\frac{34}{383}$ 。此數字在死亡人數上出現分數,這顯然不符合常理。第二部分中,已統計二十七年(前 220)剩餘隸臣妾 116 人,在二十八年又新收錄 35 人,則二十八年隸臣妾總人數應是 151 人;但此年又有 28 人死掉或逃亡,則實際剩餘隸臣妾是 123 人。同時,這一年“黔首居貲贖債”有 38 人,其中有 1 人死,則剩 37 人。則二十八年兩種身份徒隸總人數為 189 人,總死亡人數為 29 人,死亡率為  $\frac{29}{189}$ ,即六人二十九分人十五而死亡一人。

比較兩部分數據,二者記錄始皇二十八年兩種身份徒隸總人數都為 189 人,而根據第一部分死亡率計算所得死亡人數與第二部分分列情況不一致且存在分數。所以,第一部分的死亡率應當有誤。以下根據張家山漢簡《算數書》《九章算術》等材料,嘗試還原該簡數值計算過程,從而找出其錯誤的可能性原因。

簡文第二部分揭示二十八年的總人數是 189 人,死亡人數是 29 人,死亡率即求 189 對 29 的比值。整個計算可以分為兩步:第一步求整數部分,第二步將分數部分約分。

先看第一步。《算數書》《九章算術》中有大量求假分數的整數部分的描述,即“母乘母為法,子羨乘母為實,(實)如法而一”<sup>②</sup>。“實”是分子,“法”是分母,也就是說分子里每有一個等於分母的數,整數部分就加 1。計算過程是:先設定“實”189,“法”29,整數部分 0。 $189-29=160$ ,得到新的“實”160,整數部分為 1。 $160-29=131$ ,得到新的“實”131,整數部分為 2。以此類推,可得到下表:

① 里耶秦簡博物館、出土文獻與中國古代文明研究協同創新中心中國人民大學中心編著:《里耶秦簡博物館藏秦簡》(精裝本),上海:中西書局,2016,164 頁。該簡圖版或釋文又見於以下諸書及文章,鄭署斌、張春龍等編著《湖南出土簡牘選編》,長沙:嶽麓書社,2013,18 頁;宋少華、張春龍等編著《湖南出土簡牘選〇》(湖湘文庫本),長沙:湖南大學出版社,2013,23 頁;里耶秦簡牘校釋小組:《新見里耶秦簡牘資料選校(一)》,簡帛網,2014 年 9 月 1 日。

② 彭浩:《張家山漢簡〈算術書〉注釋》,北京:科學出版社,2001,46 頁。

表一

計算步數	實	法	整數部分
0	189	29	0
1	160		1
2	131		2
3	102		3
4	73		4
5	44		5
6	15		6

結果為：“實”189，“法”29，整數部分 6，餘數（也就是新的“實”）15。

再看第二步。《算數書》《九章算術》中記載的約分術基本相同，以《九章算術·方田·約分》為例，其內容為：“約分術曰：可半者半之；不可半者，副置分母、子之數，以少減多，更相減損，求其等也。以等數約之。”<sup>①</sup>也就是說，當時有兩種約分方法，一種是直觀法，看看分子、分母能否同時被 2、3 等簡單的整數整除，一種是用更相減損法以求得最大公約數。

在此題中，“法”為 29，“實”為第一步得到的 15，很顯然不能用直觀法，祇能用更相減損法，計算過程如下：

表二

計算步數	實	法
0	15	29
1		$29 - 15 = 14$
2	$15 - 14 = 1$	
3		$14 - 1 = 13$
4		$13 - 1 = 12$
5		$12 - 1 = 11$
.....		.....
15		$2 - 1 = 1$

可見兩者的最大公約數為 1，没法進行約分。說明“實”為 15，“法”為 29 時，兩者不能進行約分，則正確的死亡率應該是  $1:6\frac{15}{29}$ 。

① 李繼閔：《九章算術校證》，西安：陝西科學技術出版社，1993，136 頁。

但是,如果在“法”“實”置換過程中出現錯誤,也就是在“副置分母、子之數”時,將第一步的“實”189 誤為“法”,結果就會不同。其計算過程為:

表三

計算步數	實	法
0	15	189
1		$189 - 15 = 174$
2		$174 - 15 = 159$
.....		.....
12		$24 - 15 = 9$
13	$15 - 9 = 6$	
14		$9 - 6 = 3$
15	$6 - 3 = 3$	

可見兩者的最大公約數為3,約分得“法”為63,“實”為5,此時即得出錯誤的死亡率 $1:6\frac{5}{63}$ 。

值得注意的是,整個計算過程中需要不斷確定新的“法”與“實”,產生“法”或“實”的誤置是很正常的。

近百年來,地不愛寶,大量出土文獻豐富了歷史學研究。但并不意味着出土文獻的真實性和可靠性就一定大於傳世文獻,傳世文獻存在的文字錯訛、邏輯混亂等問題在出土文獻中同樣存在。單就數字計算錯誤現象在出土材料中也并不少見,張家山二四七號墓的抄本《算術書》,脫文、衍文、訛文數量較多,且存在算題計算錯誤的情況<sup>①</sup>;胡平生先生曾指出《簡牘名迹選2》所見“走馬樓前漢簡牘”的一份文書中就存在人口統計數字算錯的現象<sup>②</sup>。里耶秦簡中數字計算錯誤也并非僅此一處,簡10-1170是一更為明顯的例子,該簡文第一段匯總所有大隸妾時的數值2876人就比所列各項大隸妾分工數值相加的2886人少了10人<sup>③</sup>。所以,當出土文獻中出現語義矛盾時,同樣需要利用文獻學等知識進行辨析。下面要考察的7-304簡牘背面釋文以符號錯誤的形式再次說明了這一現象。

① 彭浩:《張家山漢簡〈算術書〉注釋》,32-35頁。

② 胡平生:《〈簡牘名迹選2〉所刊“走馬樓前漢簡”釋文校訂》,《簡帛》第7輯,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211-212頁。

③ 里耶秦簡博物館、出土文獻與中國古代文明研究協同創新中心中國人民大學中心編著:《里耶秦簡博物館藏秦簡》(精裝本),197-199頁。

## 二 簡 7-304 背面符號考察

根據圖版所示,7-304 簡背面文字及符號信息如下:

令拔丞昌守丞臚之倉武令史上=逐∠除倉佐尚司空長史郢當坐

《新見里耶秦簡牘資料選校(一)》一文和《里耶秦簡博物館藏秦簡》斷句方式相同,其釋文如下:

令拔、丞昌、守丞臚之、倉武、令史上、上逐∠除,倉佐尚、司空長、史郢當坐。<sup>①</sup>

圖版顯示“令史上”後有重文符號,整理者嚴格按照圖版信息移錄簡文并作出斷句。《新見里耶秦簡牘資料選校(一)》注釋認為“拔、昌、臚之、武、上、上逐,人名。除,免除,這裏指免除其罪”。<sup>②</sup>按照整理者的理解,令拔、丞昌、守丞臚之、倉武、令史上、令史上逐諸人皆免除罪罰,而倉佐尚、司空長、史郢當坐罪。這種斷句方式雖然在符號上符合原簡牘,但在文意上却有不通之處。首先,倉武、令史上、令史上逐無需坐罪,而倉佐尚需要坐罪,同為倉的官吏動却受到不同處置難以理解。其次,簡文中的處置辦法與秦基層徒隸管理制度不符。該簡正面是關於隸臣妾和黔首居貲贖債者的徒死亡課,里耶秦簡中的課文書是依據既定的標準對機構或管理人員予以核驗而產生的文書<sup>③</sup>。學者已根據里耶秦簡作徒簿揭示出隸臣妾由倉管理,城旦舂、鬼薪白粲和居貲贖債者皆屬司空管理<sup>④</sup>,故而該簡所統計“隸臣妾及黔首居貲贖債”的管理涉及司空和倉兩個部門。然而,整理者釋文斷句中司空長官需要坐罪,倉的長官却無需坐罪,兩個部門長官不同的處置方式難以理解,而根據正面第二部分簡文可知隸臣妾的死亡率遠高於黔首居貲贖債者,倉的長官無需坐罪則更無法解釋。最後,就行文格式而言,當前所見里耶秦簡中並無分別記錄免責人員和坐罪人員的文書形式。

《里耶秦簡博物館藏秦簡》斷句方式雖同於《新見里耶秦簡牘資料選校(一)》,但在文字校釋部分指出另外一種斷句可能:

因令史上、令史逐、令史除均見於《里耶秦簡(壹)》,或疑重文符號為勾識符之誤。

① 里耶秦簡博物館、出土文獻與中國古代文明研究協同創新中心中國人民大學中心編著:《里耶秦簡博物館藏秦簡》(精裝本),164 頁。

② 里耶秦簡牘校釋小組:《新見里耶秦簡牘資料選校(一)》,簡帛網,2014 年 9 月 1 日。

③ 徐世虹:《秦“課”芻議》,《簡帛》第 8 輯,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251-265 頁。

④ 關於徒隸管理研究參見李學勤《初讀里耶秦簡》,《文物》2003 年第 1 期;張金光《秦貲、贖之罰的清償與結算問題——里耶秦簡 J1(9)1~12 簡小記》,《西安財經學院學報》2010 年第 4 期;高震寰《從〈里耶秦簡〉(壹)“作徒簿”管窺秦代刑徒制度》,《出土文獻研究》第 12 輯,上海:中西書局,2014,132-143 頁;賈麗英《里耶秦簡所見徒隸身份及監管官署》,《簡帛研究二〇一三》,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4,68-81 頁。



如此,所列諸人均當坐罪,而非部分免除。聊備一說,暫不改動。<sup>①</sup>

整理者雖提出“重文符號爲勾識符之誤”,但囿於體例所限未改動釋文,也沒有給出詳盡的解釋。有鑒於當前斷句存在諸多疑問,若將重文符號視爲勾識符之誤更爲合理,則新的斷句方式如下:

令拔、丞昌、守丞臚之、倉武、令史上、逐、除、倉佐尚、司空長、史郤當坐。

新的斷句方式將重文符看作勾識符,則“上”“逐”“除”被看作三個倉令史的名字。調整後的斷句方式使語義得以明晰,所列諸官吏皆需坐罪,避免了一部分免罪而一部分治罪的情況。除了語義更加合理,新斷句方式所反映的處罰方式符合秦基層徒隸管理制度。學者在考察里耶秦簡所見刑徒管理問題中指出“縣對刑徒勞作進行統計、監督;具體執行主要是司空和倉以及接受刑徒的各部門和屬鄉”<sup>②</sup>。新的斷句方式中坐罪對象分三個層次,遷陵縣一級的令拔、縣丞昌和縣守丞臚之,他們作爲倉和司空的上層領導需要對兩個單位徒隸死亡現象負領導責任;隸臣妾的管理機構倉負責人武、倉令史上、倉令史逐、倉令史除和倉佐尚對隸臣妾的死亡現象負直接責任;黔首居貲贖債者的管理機構司空負責人長和司空史郤對黔首居貲贖債者死亡現象負直接責任。由於管理不善,倉分管的隸臣妾和司空分管的黔首居貲贖債者出現死亡狀況後,上至縣官下至具體職能部門的倉和司空人員都要受到相應的治罪。

新的斷句方式能夠成立,需要證明令史上、逐、除在當時的遷陵官吏體系中確有其人。正如整理者釋文校訂所言,令史上、令史逐和令史除的名字確實多見於里耶秦簡它處。令史上見於簡 8-137+8-175+8-525+8-526、8-260、8-1480、8-1570。特別是 8-260 簡“丞昌令史上主”<sup>③</sup>中同時出現“丞昌”“令史上”,可以確定此兩處“令史上”爲同一人。令史逐見於簡 8-673、8-782+8-1102、8-1331、8-1341、8-1410、8-1565、8-1583+8-1795、8-1847、8-2256。這些“令史逐”大多作爲監視者出現在稟食簡中,可能與 7-304 簡中的逐同爲倉令史。“令史除”見於簡 8-137+8-175+8-525+8-526、8-211。“令史上”和“令史除”同出現在簡 8-137+8-175+8-525+8-526,二人與 7-304 簡同名者爲一人可能極大。在里耶秦簡中又并無人名爲“上逐”文例的情況下,結合里耶簡中它處屢見“令史上”“令史逐”和“令史除”的人名文例,則此處斷句爲三人更爲合適。

<sup>①</sup> 里耶秦簡博物館、出土文獻與中國古代文明研究協同創新中心中國人民大學中心編著:《里耶秦簡博物館藏秦簡》(精裝本),164 頁。

<sup>②</sup> 沈剛:《〈里耶秦簡〉(壹)所見作徒管理問題探討》,《史學月刊》2015 年第 2 期。

<sup>③</sup> 陳偉主編:《里耶秦簡牘校釋(第一卷)》,123 頁。

另外，結合里耶秦簡所見勾識符的使用方法，此句爲并列三個人名更爲合適。■是簡牘材料中句讀符號的一種常見形式，“施於人名及數詞之間，其作用猶今之逗號與頓號”<sup>①</sup>。《流沙墜簡》載“第四十六簡，隧長四人，前三人名下皆書┐以正之，如後世之施句讀。”<sup>②</sup>里耶秦簡中此種用法十分常見，如 9-2294+9-2305+8-145 正面第三列“八人捕羽：操┐、寬┐、未┐、衷┐、丁┐、囡┐、辰┐、却”<sup>③</sup>，所列八位捕羽人名中間皆以■式勾識符標注；又如簡 8-134 正面有“今寫校券一牒，上謁言巴卒史衰┐義所”<sup>④</sup>一句，在衰和義二人名中間即以■勾識符隔開。里耶秦簡中■勾識符的使用慣例說明 7-304 中“逐”“除”皆爲人名，而“上”和“逐”中間的■若爲■之誤，更加符合勾識符的使用原則。

通過以上分析，可以發現 7-304 簡背面的重文符號當爲勾識符之誤，該簡正面記載秦始皇二十八年遷陵縣隸臣妾及黔首居貲贖債者的死亡狀況致使背面記載的相關人員都要坐罪。

### 三 秦遷陵縣徒隸人數蠡測

上文分析了里耶秦簡 7-304 的簡文，在第一部分的考察中指出遷陵縣在秦始皇二十八年的隸臣妾數量爲 151 人。隸臣妾屬於徒隸<sup>⑤</sup>的一種，而結合 7-304 及里耶秦簡相關材料有無可能統計出秦遷陵縣徒隸人數，從而進一步考察有關秦“赭衣半道”的認識？里耶秦簡中一類自名爲“作徒簿”“徒簿”或“徒作簿”<sup>⑥</sup>的材料爲我們認識這一問題提供了可能。這類材料雖名稱有別，但根據其格式及內容可以確定實爲同一性質簿籍文書，都是徒隸使用單位提交到縣廷進行存檔、校驗的簿籍文書，其中記載了徒隸的分工情況及人員數量。

① 李均明：《簡牘符號考述》，《華學》第 2 輯，廣州：中山大學出版社，1996，102 頁。

② 羅振玉、王國維：《流沙墜簡》，北京：中華書局，1993，142 頁。

③ 里耶秦簡博物館、出土文獻與中國古代文明研究協同創新中心中國人民大學中心編著：《里耶秦簡博物館藏秦簡》（精裝本），192 頁。

④ 里耶秦簡博物館、出土文獻與中國古代文明研究協同創新中心中國人民大學中心編著：《里耶秦簡博物館藏秦簡》（精裝本），165 頁。

⑤ 本文考察的對象以“徒隸”而非“刑徒”命名，因爲兩者在概念上存在差別。雖然“徒隸”的概念因語境不同而并不固定，但是在里耶秦簡的作徒簿中大致可以看作包含倉管理的隸臣妾和司空管理的城旦舂、鬼薪白粲和居貲贖債者。至於刑徒，張金光先生指出秦的刑徒等級序列是城旦舂——鬼薪白粲——隸臣妾——司寇——候。兩相比較，顯然徒隸中没有司寇和候，所以不能等同。本文考察對象爲刑徒意義上的徒隸，則不包含黔首居貲贖債者。相關研究參見李學勤《初讀里耶秦簡》；張金光《秦制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533 頁；李力《論“徒隸”的身份》，《出土文獻研究》第 8 輯，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33-42 頁；曹旅寧《釋“徒隸”兼論秦刑徒的身份及刑期問題》，《上海師範大學學報》2008 年第 5 期；賈麗英《里耶秦簡所見“徒隸”身份及監管官署》；沈剛《〈里耶秦簡〉（壹）所見作徒管理問題探討》；孫聞博《簡帛學的史料辨析與理論探求》，《中國史研究動態》2016 年第 2 期。

⑥ 以下爲行文方便，統稱爲“作徒簿”。

目前公布的里耶秦簡所見作徒簿數量并不少,但大多殘缺不全,可供利用者并不多,而且并非所有類別的作徒簿都可以作為討論徒隸總數量的材料,使用時需要辨別其性質和類型。根據編製部門和統計時段的不同可以對“作徒簿”進行分類。就編製部門而言,可以分為付授方作徒簿和接受方作徒簿。倉主管隸臣妾,司空主管城旦舂、鬼薪白粲和居費贖債,兩者皆是徒隸的付授方。此類作徒簿如簡 9-2294+9-2305+8-145“卅二年十月己酉朔乙亥司空守囷徒作簿”<sup>①</sup>和簡 8-734“卅一年四月癸未朔甲午,【倉是】□□”<sup>②</sup>。徒隸的接收方包括庫、田官、畜官、少內和各屬鄉等部門。此類作徒簿簡在里耶秦簡中數量最多,諸如簡 8-2011“卅一年五月壬子朔壬戌,都鄉守是徒簿(簿)”<sup>③</sup>。就統計時段而言,當前所見作徒簿可以分為日計簿和月計簿。<sup>④</sup> 日計簿一般具體到某一天的干支,上引三條皆是日計簿。月計簿是合計該月每天作徒人數總和、各自作務分工、疾病、逃亡、死去情形的文書,這類材料通常名為“徒簿取”<sup>⑤</sup>。付授方和接受方都會製作日計簿和月計簿。但是,作為徒隸接受方的庫、田官和屬鄉,其製作的作徒簿祇能反映本部門從倉和司空接收到的徒隸使用情況,所以祇能部分反映徒隸數量。因為遷陵縣所有的徒隸都由倉和司空管理,所以祇有這兩個部門製成的作徒簿才能作為討論遷陵縣徒隸總數的材料。

首先討論倉作徒簿所能反映的隸臣妾數量。根據倉作徒簿格式,明確屬於倉的作徒簿有簡 8-734、8-445<sup>⑥</sup>、8-664<sup>⑦</sup>、8-2106、8-2110、10-1170。由於殘斷嚴重,倉作徒簿中可以拿來討論的祇有簡 10-1170。該簡保存十分完整,分七欄書寫,簡文可分為兩個部分,第一部分說明該作徒簿的名稱及不同類型徒隸的人數及其總人數,第二部分是徒隸的詳細分工和人數。第一部分釋文如下:

卅四年十二月倉徒簿最。大隸臣積九百九十人。小臣積五百一十人。大隸妾積二

① 里耶秦簡博物館、出土文獻與中國古代文明研究協同創新中心中國人民大學中心編著:《里耶秦簡博物館藏秦簡》(精裝本),192-194 頁。

② 陳偉主編:《里耶秦簡牘校釋(第一卷)》,212 頁。

③ 陳偉主編:《里耶秦簡牘校釋(第一卷)》,417 頁。

④ 梁煒傑和賈麗英認為還存在“年作簿”,高震寰認為此外可能還存在“季作簿”。但所列“年作簿”實為“月作簿”,且目前所見秦簡中并未出現“季作簿”,故不採用。相關研究參見梁煒傑《讀〈里耶秦簡(壹)〉札記——“作徒簿”類型反映的秦“取”意義》,簡帛網,2013 年 11 月 9 日;高震寰《從〈里耶秦簡〉(壹)“作徒簿”管窺秦代刑徒制度》;賈麗英《里耶秦簡所見徒隸身份及監管官署》。

⑤ 胡平生:《也說“作徒簿及最”》,簡帛網,2014 年 5 月 31 日。

⑥ 該簡上端殘端,缺“某部門作徒簿”信息,但根據其保留“六人付田官”可知是徒隸付授方作徒簿,又根據其“小隸妾八人”統計小隸妾人數信息,可知其為倉作徒簿。簡 8-2106 和 8-2110 認識方式與此同。

⑦ 該簡正面上端無殘缺,但開頭直接書寫“二人付□□□”,可能前有其他簡相連。根據簡牘背面“五月甲寅,倉是敢言之”知提交者為倉負責人是,可知其為倉作徒簿。

千八百七十六。·凡積四千三百七十六。<sup>①</sup>

由上可知大隸臣積 990 人,小隸臣積 510 人,則男性隸臣的總積數是 1400 人,與簡文第二部分詳細羅列的男性徒隸總數相符。同時,大隸妾積 2876 人,而無小隸妾,但後文詳細羅列的女性徒隸各項相加之和為 2886 人,原因可能在於統計者計算失誤漏掉積 10 人,所以應當採用實際相加的 2886 人。由“卅四年十二月倉徒簿最”可知這是一份月作徒簿,隸臣人數 1400 人和隸妾人數 2886 人不能看作倉這一個月實際掌握的隸臣妾總人數,而是所有隸臣妾一個月內勞作天數的總和。<sup>②</sup> 簡文第一部分中大隸臣積 990 人、小隸臣積 510 人和第二部分中男 30 人廷走、女 90 人居貲臨沅等大部分數字都能被 30 整除,顯然這個月有 30 天。

那麼,用簡文第一部分中的總數除以 30 有以下結果:

大隸臣:  $990 \div 30 = 33$

小隸臣:  $510 \div 30 = 17$

大隸妾:  $2886 \div 30 = 96 \cdots 6$

三個類別的徒隸中,祇有大隸妾是除不盡的,又根據詳細分工記錄中似沒有像男性隸臣那樣書寫死亡人數,除不盡的原因可能是這個月中有新的隸妾加入進來。當大隸妾總數是 2886 時,餘數 6 可以是最後一天加入,則沒有積累,即有 102 人;餘數 6 也可能是祇增加了 1 人,即 1 人積累了 6 天,即有 97 人。所以,大隸妾的人數區間是 97 到 102,加上大隸臣 33 人和小隸臣 17 人,則這個月隸臣妾人數區間是 147 人到 152 人。至此,以始皇三十四年(前 213)十二月為樣本,可知倉所掌握的隸臣妾人數大概在 150 人左右。

再來考察司空所能掌管的徒隸數量。明確屬於司空的作徒簿有 8-162<sup>③</sup>、8-240、8-696、8-1649、8-1670、8-2020、8-2165、8-2151、9-1079、9-1779、9-2294+9-2305+8-145、11-2499。司空作徒簿較完整的也僅為經過綴合後的簡 9-2294+9-2305+8-145。與 10-1170 倉月作徒簿不同,該簡是始皇三十二年(前 215)十月乙亥這一天的日計徒簿,其統計內容按照統計對象性別和成年與否可以分為四個部分。以下移錄各部分徒隸總數,省去詳細分工記錄:

第一部分成年男性徒隸:城旦司寇一人、鬼薪廿人、城旦八十七人、仗城旦九人、隸臣繫

① 里耶秦簡博物館、出土文獻與中國古代文明研究協同創新中心中國人民大學中心編著:《里耶秦簡博物館藏秦簡》(精裝本),197 頁。

② 唐俊峰、王偉等在討論里耶秦簡“見戶”和“積戶”概念中指出“月作徒簿”材料中的數字是該月徒隸數累加的結果,其數字能被該月天數整除。相關研究參見王偉、孫兆華《“積戶”與“見戶”:里耶秦簡所見遷陵編戶數量》,《四川文物》2014 年第 2 期;唐俊峰《里耶秦簡所示秦代的“見戶”與“積戶”——兼論秦代遷陵縣的戶數》,簡帛網,2014 年 2 月 8 日。

③ 該簡上端殘端,缺“某部門作徒簿”信息,但根據其保留“二人付少內”可知是徒隸付授方作徒簿,又根據其“小城旦十人”統計小城旦人數信息,可知其為司空作徒簿。簡 8-240、8-1649 認識方式與此同。

城旦三人、隸臣居貲五人·凡百廿五人。

第二部分成年女性徒隸：白粲八人、舂五十三人、隸妾繫舂八人、隸妾居貲十一人、受倉隸妾七人·凡八十七人<sup>①</sup>。

第三部分未成年男性徒隸：小城旦九人。

第四部分未成年女性徒隸：小舂五人。

四部分徒隸總數為 226 人，此雖為司空在始皇三十二年十月乙亥日所能實際掌握的徒隸數量，但統計遷陵徒隸總數時，簡文中有些徒隸數量需要減掉。在 10-1170 簡中記錄的倉作徒簿分工中，可以發現有“男百五十人居貲司空”“男九十人繫城旦”“男卅人付司空”的統計項目，所以隸臣妾繫城旦舂和付司空者已經被統計到倉徒隸數目中，那麼在統計司空徒隸數量時就需要將這些身份的人數減掉，否則就存在重復統計。該司空作徒簿中的隸臣繫城旦三人、隸臣居貲五人、隸妾繫舂八人、隸妾居貲十一人和受倉隸妾七人，共計 34 人。所以，除了從倉接收的徒隸，司空在始皇三十二年十月乙亥日所能實際掌握的徒隸數量為 192 人。

前文根據 10-1170 考察始皇三十四年十二月倉所管理隸臣妾的數量為 147 人至 152 人，這一數值與本文第一部分 7-304 所揭示的始皇二十八年隸臣妾 151 人相當。兩者相差七年之久，數值相當是否意味着包括隸臣妾在內的遷陵縣徒隸數量一直保持在某個常數？由於目前所見里耶秦簡作徒簿大多數數量有限且殘斷不全，以上對秦遷陵縣倉和司空所能掌握的徒隸人數祇是某一時間節點上的數值，並不能反映出動態變化。目前祇能根據所見部分殘簡數字及徒隸管理制度對這一問題做出推測。

上文所引簡 9-2294+9-2305+8-145 統計的是始皇三十二年十月乙亥日這一天司空掌握徒隸的數量，《龍山里耶秦簡之“徒簿”》一文中披露的殘簡 11-249 統計的是司空在始皇三十一年（前 216）九月癸亥日的徒隸信息<sup>②</sup>，兩簡日期相隔 71 天，比較兩簡內容存在多處相同。首先，兩簡都記載“鬼薪廿人”，可見在這個時段內鬼薪的數量並沒有變化。其次，比較具體分工信息。簡 11-249 中名為“平”的徒隸“一人佐園”，而在 71 天後的作徒簿中“平”還是“二人佐園”中的一人，同樣反映徒隸工作和規模的穩定性。同時，在一些缺失紀年信息的司空作徒簿中，也反映了司空掌握徒隸數量的穩定性。如 8-2165“城旦司寇一人”和“鬼薪十九人”，8-2151“城旦司寇一人”和“□薪廿人”，8-162“小城旦十人”，8-240“小舂五人”，8-1649 記載女性成年徒隸“凡八十五人”，這些殘缺且可能屬於不同日期的司空作徒簿中記載數字都和簡 9-2294+9-2305+8-145 中對應類型的徒隸數值相同或相當。殘缺的倉作徒

① 簡文中“白粲八人、舂五十三人”依據圖版僅能釋出為“□□【八】人、□□十三人”。里耶秦簡牘校釋小組據文例及簡牘形制認為“【八】人”前為“白粲”，“十三人”前為“舂五”，可從。參見里耶秦簡牘校釋小組《新見里耶秦簡牘資料選校（一）》，簡帛網，2014 年 9 月 1 日。

②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龍山里耶秦簡之“徒簿”》，《出土文獻研究》第 12 輯，上海：中西書局，2012，105 頁。



簿也有同樣的現象，簡 8-734“大隸臣廿口人”，簡 8-445“小隸妾八人”，簡 8-2106 記載女性成年徒隸“凡八十三人”，這些數值也與簡 10-1170 中對應類別的徒隸數值大致相當。

另外，里耶簡有關徒隸制度的材料表明遷陵縣徒隸數量在一些目前還沒有被認識到的律令制度規定下保持某個常數。里耶秦簡 8-986 記載“遷陵隸臣員不備十五人”<sup>①</sup>，意即當遷陵縣隸臣數量不足時，需要向上級彙報，從而補齊到某一數額。補充徒隸的重要方式可能是購買，簡 9-1408 記載少內購買徒隸的情況“廿九年少內口，買徒隸用錢三萬三千口口，少內根佐之主口”<sup>②</sup>，同時有律令規定縣廷要在規定日期上報購買徒隸情況，如里耶秦簡 8-154 記載“恒以朔日上所買徒隸數”<sup>③</sup>。

里耶秦簡的時代為秦始皇二十五年（前 222）至秦二世元年（前 209），其中明確紀年的作徒簿時限為秦始皇二十七年至三十五年（前 212）。基於以上分析，可以發現秦遷陵縣在這一時段內倉日常所掌握的隸臣妾數量在 150 人左右，司空所能掌握的城旦舂和鬼薪白粲的數量在 190 人左右，兩者之和即遷陵縣日常掌握的徒隸人數，即 340 人左右。

#### 四 結語

上文通過對里耶秦簡 7-304 和相關作徒簿材料的分析，得出秦時遷陵縣的徒隸規模，在此基礎上有助於觀照秦“赭衣半道，群盜滿山”<sup>④</sup>的認識。學者歷來將刑法嚴苛、輕罪重治看作秦二世而亡的原因之一，而其造成的直接後果即是整個社會充斥着大量刑徒。漢人鑒於秦之短祚興起的“過秦”思想<sup>⑤</sup>曾批判秦時“赭衣半道，群盜滿山”，其意為刑徒人數約占總人口數的半數之多。“赭衣半道”之說不免有誇張之嫌，況且呂思勉先生曾評論漢人論秦“輕事重言，述事多不審諦”<sup>⑥</sup>，然秦時徒隸所占人口比重較大的印象當不誤。張金光先生就曾在《秦制研究》中指出“秦刑徒不僅數量驚人，而且其中多城旦等重刑”，<sup>⑦</sup>然這也祇是推測無法予以坐實。總之，此前學者一貫認為秦時刑徒數量巨大，但是對於大到何種程度受制於材料一直未能有直觀認識。里耶秦簡作徒簿及其他有關徒隸管理的簡牘為進一步認識這一問題

① 陳偉主編：《里耶秦簡牘校釋（第一卷）》，257 頁。

② 里耶秦簡博物館、出土文獻與中國古代文明研究協同創新中心中國人民大學中心編著：《里耶秦簡博物館藏秦簡》（精裝本），186 頁。

③ 陳偉主編：《里耶秦簡牘校釋（第一卷）》，93 頁。

④ 《漢書》卷五一《賈山傳》，北京：中華書局，1962，2327 頁。同書卷二四《食貨志》也有類似說法，即“民愁亡聊，亡逃山林，轉為盜賊，赭衣半道”。

⑤ 孫家洲：《漢初的“過秦”思潮及其影響》，《光明日報》2008 年 1 月 1 日第 3 版；王紹東：《論漢代“過秦”思想的歷史局限》，《史學史研究》2009 年第 3 期。

⑥ 呂思勉：《秦漢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13 頁。

⑦ 張金光：《秦制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545 頁。



提供了新的材料。王偉、孫兆華考察遷陵縣編戶數量認為秦時當地編戶人口數量為一兩千人,而其中不包括外地戶籍的官吏、戍卒、居貨贖責者等以及城旦舂、鬼薪白粲、隸臣妾。<sup>①</sup>將上文得到的徒隸 340 人與編戶人口數量為一兩千人比較,秦朝在遷陵這一地區徒隸所占的比重雖然遠未達到“赭衣半道”的誇張程度,但是在總人口中所占的比重依然不低。

附記:文章完成後,承中國人民大學孫家洲先生、張忠煒先生、孫聞博先生與匿名評審專家提供寶貴意見,謹致謝忱。

<sup>①</sup> 王偉、孫兆華:《“積戶”與“見戶”:里耶秦簡所見遷陵編戶數量》。

## 秦漢“訾稅”補論\*

### ——從嶽麓秦簡“識劫嫺案”說起

湖南大學嶽麓書院 齊繼偉

**內容提要** 秦時確已出現“訾稅”為代表的財產稅，“訾稅”的徵收主要針對從事商業活動的黔首，田畝不在“訾稅”徵收之列。漢初沿襲了秦代“訾稅”的特點，“算輶車”“算緡錢”實屬“訾稅”稅目徵收的拓展。漢代官、商、地主的“三結合”以及“百姓終莫分財佐縣官”的出現，促使武帝時期原本針對商賈的“訾稅”推及所有的百姓，武帝之後，“訾稅”具有了普遍財產稅的意義。

**關鍵詞** 秦漢 訾稅 占訾 財產稅

關於秦漢財產稅的問題，學界有過眾多討論。谷霽光先生認為：漢代的“訾賦”從漢武帝開始是按戶賁出錢的，稅率在王莽時為三十而稅一。<sup>①</sup>高敏先生認為：（漢代）“訾算”是對商賈以外居民徵收的財產稅，秦時有無對商賈以外居民徵收的財產稅，史無明確記載。<sup>②</sup>黃今言先生認為：“訾算”“訾賦”是指漢政權對普通吏民（商賈除外）徵收的一種財產稅，而“占租”之制即對工商業主徵收的財產稅。<sup>③</sup>平中苓次先生認為：居延漢簡中所見“禮忠簡”及

\* 基金項目：湖南省研究生科研創新項目“秦漢時期的戶籍等級劃分研究”（編號：CX2016BD71）。

① 谷霽光：《論漢唐間賦稅制度的變化——封建社會前期賦稅制度中地、資、丁、戶之間的關係研究》，《江西大學學報》1964年第2期。

② 高敏：《秦漢史論集》，鄭州：中州書畫社，1982，96頁。

③ 黃今言：《漢代的訾算》，《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1984年第1期。

“徐宗簡”是漢代邊地政府對民衆財產稅徵收的調查記錄，屬於“算賦申報書”的範疇。<sup>①</sup> 永田英正先生雖否認這種“算賦申報書”的說法，但是認可平中苓次先生對於漢代財產稅研究的論述。<sup>②</sup> 馬大英先生認為：稅民資是就人民財產總額的估價徵稅，它是一般財產稅或總額財產稅。<sup>③</sup> 錢劍夫先生認為：“徐禮”簡為兼收緡算的第一手資料，則應無問題。<sup>④</sup> 楊振紅先生認為：算緡錢不同於市租，它是在市租之外對工商業者的營業資產徵收的另一種稅，應屬於財產稅範疇，且這一制度一直到漢末都在實行，從未被廢止過。<sup>⑤</sup>

另一方面，田澤濱先生認為：“算貲”是否徵財產稅？文獻上找不到正面答案。相反，可以推知其非稅更非財產稅。<sup>⑥</sup> 王彥輝先生認為：“訾算”的“算”為計量單位并非祇和賦稅有關，從秦及漢初的稅種來說不存在財產稅，且在當時的法律文獻及國家減免政策中亦不見其名目。<sup>⑦</sup> 汪桂海先生認為：將居延漢簡所見“徐禮”簡確定為“累重訾直簿”更為合適，並指出它是登記邊塞亭長、隧長以上官吏功勞、資歷及其家屬、資產等情況的簿書。<sup>⑧</sup> 可以說，這些著作都從不同角度對於秦漢財產稅的相關問題做了細緻、深入的探討。總的來說上述討論的焦點圍繞在：1. 秦及漢初有無財產稅的徵收，漢代是否存在恒常性財產稅；2. 秦漢財產稅的徵收範圍及其徵收對象問題；3. “訾算”“算緡”及“以訾徵賦”的性質問題；4. “徐宗簡”“禮忠簡”所反映的漢代“占訾”的屬性界定等一系列的討論。然而，遺憾的是，源於文獻不足徵，關於秦至漢初財產稅問題的討論卻顯得十分滯後。近年來，隨着出土簡牘材料的進一步公布，《嶽麓書院藏秦簡(叁)》中披露的“識劫媿案”為我們提供了“訾稅”這一新線索。其後，又有諸多學者據此對秦漢財產稅問題提出新的理解，其中不乏灼見。但是目前學界對“訾稅”問題的理解，以及牽涉而來的對秦漢財產稅問題的認識仍有很多值得商榷的餘地。本文擬以“識劫媿案”的重新解讀為起點，並結合前人研究成果，對於學界熱議之秦漢“訾稅”問題，提出自己的看法，希望得到有關學者的批評指正。

① [日]平中苓次：《居延漢簡と漢代の財産税》，《立命館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紀要》1953年第1號。

② [日]永田英正：《禮忠簡と徐宗簡について：平中氏の算賦申告書説の再検討》，《東洋史研究》1969年第28卷。

③ 馬大英：《漢代財政史》，北京：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1983，75頁。

④ 錢劍夫：《秦漢賦役制度考略》，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1984，4頁。

⑤ 楊振紅：《漢代算車、船、緡錢制度新考——以〈史記·平准書〉為中心》，收入其著《出土簡牘與秦漢社會》（續編），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5，264-268頁。

⑥ 田澤濱：《漢代的“更賦”、“訾算”與“戶賦”》，《東北師大學報》1984年第6期。

⑦ 王彥輝：《論漢代的“訾算”與“以訾徵賦”》，《中國史研究》2012年第1期。

⑧ 汪桂海：《漢簡叢考（一）》，收入李學勤主編《簡帛研究二〇〇一》，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1，382-384頁。除此之外，關於財產稅的相關討論，還有山田勝芳《算賦をめぐる諸問題》，收入其著《秦漢財政收入の研究》，東京：汲古書院，1993，189頁；重近啓樹《算賦制の起源と展開》，收入其著《秦漢稅役體系の研究》，東京：汲古書院，1999，107頁。

## 一 “訾稅”屬工商活動者的財產稅

關於秦代“訾稅”的記載，目前祇見於《嶽麓書院藏秦簡(叁)》所載“識劫媿案”中。實際上，賈麗英先生很早就以此為例，指出秦代已經存在“貨產稅”。<sup>①</sup>之後，王彥輝先生也以“識劫媿案”分析了秦代的“占訾”問題，並認為“訾稅”當為經營稅。<sup>②</sup>石洋先生利用“識劫媿案”證明了“訾算”之“算”應是訾稅計徵單位，認為漢景帝時已經有了恒常性財產稅。<sup>③</sup>朱德貴、莊小霞先生則再以“識劫媿案”中的“訾稅”為例，否定了“秦及漢初不存在財產稅”的觀點，且以漢代財產稅徵收範圍推演秦制，認為秦時財產稅的徵收“諸如肆、宅、馬、稻田和奴婢等財產，皆應屬‘計訾’之範圍。”<sup>④</sup>然而，細考“識劫媿案”中所反映的“訾稅”概念、涉案人員從業身份以及案件所涉及的匿訾內容，可以發現，秦“訾稅”的概念與漢武帝之後的“以訾徵賦”仍有差異，秦代“訾稅”的對象及範圍需重新認定。為便於討論，我們摘錄案例如下：

【敢讞(讞)】之：十八年八月丙戌，大女子媿自告曰：“七月為子小走馬第(義)占家訾(貨)。第(義)當□大夫建、公卒<sub>108</sub>昌、士五(伍)積、喜、遺錢六萬八千三百，有券，媿匿不占吏為訾(貨)。媿有市布肆一、舍客室一。公士<sub>109</sub>識劫媿曰：‘以肆、室鼠(予)識。不鼠(予)識，識且告媿匿訾(貨)’。媿恐，即以肆、室鼠(予)識；為建等折弃<sub>110</sub>券，弗責。先自告，告識劫媿。”<sub>111</sub>

●問：“匿訾(貨)稅及室、肆，臧(贓)直(值)<sub>130</sub>各過六百六十錢。”它如辭(辭)。

●鞠之：“媿為大夫沛妾。沛御媿，媿產第(義)、媿。沛妻危死，沛免媿為庶人，以<sub>131</sub>為妻，有(又)產必、若。籍為免妾。沛死，第(義)代為戶後，有肆、宅。媿匿訾(貨)，稅直(值)過六百六十錢。先自告，告<sub>132</sub>識劫。識為沛隸。沛為取(娶)妻，欲以肆、舍客室鼠(予)識。後弗鼠(予)，為買室，分馬一匹、田廿(二十)畝，异識。沛死，<sub>133</sub>識後求肆、室。媿弗鼠(予)，識恐謂媿：且告媿匿訾(貨)。媿以故鼠(予)肆、室。肆、室直(值)過六百六十錢。得。”皆審。<sup>⑤</sup>

文中“訾稅”所見兩處，整理者未對其作直接注釋，其中第二處，整理者以“訾，稅直XX錢”斷句。顯然，“訾”與“稅”是否連讀，整理者對其概念的理解模稜兩可。實際上，參照簡文判

① 賈麗英：《秦簡〈識劫冤案〉反映的秦代貨產稅》，《光明日報》2014年9月3日，第14版。

② 王彥輝：《秦簡“識劫媿案”發微》，《古代文明》2015年第1期。

③ 石洋：《〈漢書·景帝紀〉“訾算十”“訾算四”新詮——關於西漢前期一條經濟史料的辯證》，《簡帛研究二〇一五(春夏卷)》，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5。

④ 朱德貴、莊小霞：《嶽麓秦簡所見“訾稅”問題新證》，《中國經濟史研究》2016年第4期。

⑤ 朱漢民、陳松長主編：《嶽麓書院藏秦簡(叁)》，上海辭書出版社，2013，153-162頁。

斷,問:“匿訾稅及室、肆,臧(贓)直(值)各過六百六十錢”中的“各”,指的是“媿”所匿“訾稅”及“識”所劫“肆”“室”分別超過六百六十錢,若以“匿訾,稅及室、肆”斷句,顯然與“媿”所匿之“訾稅”及“識”所劫之“室”“肆”的理解相去甚遠,且文意不通,故後文“媿”所匿之“訾稅”連讀沒有問題。<sup>①</sup> 按照供訴所言“有券,媿匿不占吏爲訾”,其“匿訾稅”所指當是“媿”所持有應當統計并需繳納的對於“建”等人的債券之稅。故據此判斷秦有“訾稅”亦不成問題。但是以“媿”所匿“訾稅”推論秦時普遍存在財產稅,以及據《居延漢簡》所記漢代占訾情況反推秦制却容易出現問題。其一,以“媿”所匿“訾稅”無法普遍代表秦民“訾稅”的特徵;其二,秦代“田產”是否包含在“訾稅”的範圍中無法從此案獲取明確的證據。況且,以材料所見,漢代“稅民訾”的範圍相比於秦代呈現出擴大的態勢,以漢制反推秦制,更容易造成不必要的誤解。<sup>②</sup> 試加以證之。

首先,“沛”及其爵後者“義”之戶籍身份是否爲“市籍”,<sup>③</sup>簡文中不可得知。案件涉及“沛”的家產有市布肆、舍客室、田宅、馬、奴婢等,供詞稱:“【沛】織(貸)建等錢,以市販,共分贏。”可見“沛”實則參與商業經營,并從事放貸業務,其身份決非一般自耕農,家庭經濟也屬於典型的多種經營模式。因其身份的特殊性,我們暫無法以“媿”所匿“訾稅”推及秦代一般民衆的情況。

其次,“媿”所匿“訾稅”實指放貸出去的債券資金,其目的是用於“市販”,屬於行販資金,且“沛”本有肆舍,并以列肆販賣、開館攬客營利,那麼,若將“媿”所匿“訾稅”視爲對工商資本的徵稅亦無不可?《漢書·食貨志》云:

士工商家受田,五口乃當農夫一人,此謂平土可以爲法者也。若山林藪澤原陵淳鹵之地,各以肥磽多少爲差。有賦有稅。稅謂公田什一及工商衡虞之入也。<sup>④</sup>

顯然,這裏的“稅”包含農夫田畝之稅以及工商衡虞之稅,師古注:“工、商、衡、虞雖不墾殖,亦取其稅者,工有技巧之作,商有行販之利,衡、虞取山澤之材產也。”<sup>⑤</sup>秦漢以商賈之稅見於史料的,秦有“關市之賦”“市利之租”,即:關稅和營業稅;漢有“算軺車”“算緡錢”“占租”“馬口錢”“六畜稅”及鹽鐵酒等諸多稅目,又據楊振紅先生考證:“算緡錢不同於市租,它是在市

① 案《說文》曰:“貲,小罰以財自贖。”秦時“貲”與“訾”意向分明,兩者的混用是到了漢代時期,故此釋文勿用標注異體或釋作假借。參見石洋《戰國秦漢間“貲”的字義演變與其意義》,《華東政法大學學報》2013年第4期。

② “漢人計訾範圍,包括貨幣財富,也包括馬牛、驢車、糧食、布帛、六畜、奴婢以及房屋、珍寶等實物財富,動產不動產皆含其中。有時甚至衣履斧鬲也在計訾範圍。”參見黃今言《漢代的訾算》,《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1984年第1期。

③ 據李洪財先生考釋,嶽麓秦簡中被釋作“義”的字形,下部的“弗”形,是“我”形的草化訛變,都可以直接釋作“義”。同時,王引之對傳世文獻中“氣”形的意見是正確的,不存在從“弗”的“氣”字。參見李洪財《秦漢簡文字考釋二則》,《湖南大學學報》2016年第4期。

④ 《漢書》卷二四《食貨志上》,北京:中華書局,1962,1120頁。

⑤ 《漢書》卷二四《食貨志上》,1120頁。

租之外對工商業者的營業資產徵收的另一種稅，應屬於財產稅範疇。”<sup>①</sup>那麼“算輶車”自然也是財產稅，秦時有無類似財產稅之名目，此前確無史料佐證，然而以“識劫媿案”所見秦“訾稅”之對象及其內容來看，似可歸入此類，也應屬於財產稅無疑。<sup>②</sup>祇是“識劫媿案”所見“訾稅”的對象似應限定在從事工商活動者，即“行販取利”者範圍，而不能無限擴展到所有黔首。

另，“訾”字在戰國及秦代多作計算、衡量之意，《商君書·墾令篇》曰：“訾粟而稅，則上壹而民平。”蔣禮鴻雖指“李奇曰：‘訾，量也。’蓋謂案畝而稅，量一畝所出粟而賦之，額既一定，故上壹而民平。”<sup>③</sup>關於秦代糧食稅的徵收方法我們暫且不論，若秦代“訾粟而稅”，是依據掌握當地糧食產量情況劃定稅入標準的方式，作為“田稅”之徵收辦法的話，那麼“工商衡虞之人”中很可能也存在採取類似“訾X而稅”的稅入方式。簡文中“媿”匿“訾稅”屬於債券資金，其行販及肆舍資本很可能也屬於“訾稅”之範疇，祇是不同於市租、關稅，而是依據家訾儲錢劃定財產稅入的標準，按訾納稅。若此，則“識劫媿案”所見“訾稅”確係財產稅無疑。“沛”作為“訾稅”徵收的對象，家訾中有市布肆、客舍，並從事放貸、參與市販，雖不見“沛”市籍身份，其所涉“訾稅”至少與行商有關，當歸入“工商衡虞之人”的範圍。至於普遍民眾是否也存在有類似“訾稅”，目前仍並不能獲得肯定的答案。

## 二 秦至漢初“田畝”不在“訾稅”徵收之列

秦代“田畝”是否被納入“訾稅”之範圍，意義十分重大。秦自商鞅變法以來實行名田制，據《二年律令》關於漢初授田的記載，上到關內侯，下及司寇、隱官皆得名田宅，秦至漢初，授田的對象相對比較寬泛。<sup>④</sup>《漢書·食貨志》：“士工商家受田，五口乃當農夫一人，此謂平土可以為法者也。”<sup>⑤</sup>可見商賈亦在授田之列。武帝時期，隨着抑商政策的強化，針對商賈的法令也日益嚴苛，律法有：“賈人有市籍者，及其家屬，皆無得籍名田，以便農。敢犯令，沒入田儻”；<sup>⑥</sup>哀帝時又重申：“賈人皆不得名田、為吏，犯者以律論”，<sup>⑦</sup>此言“律論”概“沒入田儻（或田貨）”是也。<sup>⑧</sup>據此，秦至漢初，商賈可以授田，祇是到了西漢武帝之後情況纔發生轉

① 楊振紅：《出土簡牘與秦漢社會》（續編），264頁。

② 營業稅主要是針對營業額徵取的一種稅，上文所言“財產稅”主要是針對工商業者的營業資產徵收的另一種稅，兩者均應包含在“工商衡虞之人”的範圍，又“媿”案所匿“訾稅”是在統計資產的過程中發生的，其顯然屬財產稅無疑。

③ 蔣禮鴻：《商君書錐指》卷一《墾令篇》，北京：中華書局，1986，6-7頁。

④ 彭浩、陳偉等主編：《二年律令與奏讞書》，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216頁。

⑤ 《漢書》卷二四《食貨志上》，1120頁。

⑥ 《史記》卷三〇《平準書》，北京：中華書局，1959，1430頁。

⑦ 《漢書》卷一一《哀帝紀》，336頁。

⑧ 《史記》卷三〇《平準書》作“田儻”；《漢書》卷二四《食貨志》作“田貨”。



變。且漢初土地允許買賣,《二年律令·戶律》曰:“代戶、買賣田宅,鄉部、田嗇夫、吏留弗爲定籍,盈一日,罰金各二兩。”<sup>①</sup>故商賈“以末致財,用本守之”者史書中多有所見,秦代可能也是如此。正因為秦至漢初授田範圍的相對寬泛,以及土地買賣的流通,使得關於“田畝”問題的討論具有一定的普遍意義。故其在秦至漢初是否被納入“訾稅”的徵收範圍,關係着這一時期財產稅推及範圍的問題。那麼“識劫媼案”中有無相關“訾稅”範圍的記載,秦代“訾稅”徵收範圍到了何種程度?我們再引簡文如下,并試作分析。

先自告,告識劫曰:“與蕘(義)同居,故大夫沛妾。沛御媼,媼產蕘(義)、女媵。沛妻危以十歲時死,沛不取(娶)妻。居可二<sub>112</sub>歲,沛免媼爲庶人,妻媼。媼有(又)產男必、女若。

居二歲,沛告宗人、里人大夫快、臣、走馬拳、上造嘉、頡曰:<sub>113</sub>‘沛有子媼所四人,不取(娶)妻矣。欲令媼入宗,出里單賦,與里人通飲(飲)食。’快等曰:‘可。’媼即入宗,里<sub>114</sub>人不幸死者出單賦,如它人妻。

居六歲,沛死。蕘(義)代爲戶、爵後,有肆、宅。識故爲沛隸,同居。沛<sub>115</sub>以三歲時爲識取(娶)妻;居一歲爲識買室,賈(價)五千錢;分馬一匹、稻田廿畝,異識。識從軍,沛死。來歸<sub>116</sub>,謂媼曰:‘沛未死時言以肆、舍客室鼠(予)識,識欲得。’媼謂:‘沛死時不令鼠(予)識,識弗當得。’識曰:‘媼<sub>117</sub>匿訾(貲),不鼠(予)識,識且告媼。’媼以匿訾(貲)故,即鼠(予)肆、室。沛未死,弗欲以肆、舍客室鼠(予)識。不告媼,不智(知)戶<sub>118</sub>籍不爲妻、爲免妾故。”<sup>②</sup>

如簡文所述,“居六歲,沛死,義代爲戶、爵後,有肆、宅”,據《二年律令·戶律》可知:“代戶”需向鄉部、田嗇夫及吏定籍,戶籍藏鄉部,田嗇夫屬田部,兩者并列似“定籍”內容各有別分。“媼”已於七月占家訾,其所占家訾中,田畝及其他家產可能是分開統計的。另,漢初《戶律》規定:

民宅園戶籍,年細籍、田比地籍、田合籍、田租籍,謹副上縣廷,皆以篋若匣匱盛,緘閉,以令若丞、<sub>331</sub>官嗇夫印封,獨別爲府,封府戶;節(即)有當治爲者,令史、吏主者完封奏(湊)令若丞印,嗇夫發,即襍治爲;<sub>332</sub>臧(藏)府已,輒復緘閉封臧(藏),不從律者罰金各四兩。其或爲詐(詐)僞,有增減也,而弗能得,贖耐。官恒先計讎,<sub>333</sub>□籍□不相(?)復者,輒劾論之。<sup>③</sup>

參照簡文所見,縣廷及鄉部定籍、存檔的簿籍文件包括:“宅園戶籍”“年細籍”“田比地籍”

① 彭浩、陳偉等主編:《二年律令與奏讞書》,220頁。

② 朱漢民、陳松長主編:《嶽麓書院藏秦簡(叁)》,154-162頁。

③ 彭浩、陳偉等主編:《二年律令與奏讞書》,223頁。

“田合籍”“田租籍”。目前，學界對這些簿籍的理解存在一定的差異，傳統認為“宅園戶籍”是國家授田下居民住宅與田園的登記總簿；“年細籍”為記錄戶內人口年齡的簿籍；而“田比地籍”“田合籍”“田租籍”則是關於田畝“比鄰次第之記錄”、田畝合數及有關田租統計之簿籍。<sup>①</sup>然而，我們重新審定這些概念發現，“田畝”作為國家授予的居民“資產”，按此則統計結果有相當重複之嫌。實際上，張榮強先生就曾指出：“唐代的戶籍與漢代不同，是‘戶口名簿’與‘地籍’合一。”<sup>②</sup>實則認為張家山漢簡所反映的漢初的“戶口名簿”與“地籍”似應分別統計。王彥輝先生就此進一步認為：民間通過遺囑處分財產時，鄉部要“參辦券書之，輒上如戶籍”，其中雖涉及田宅、奴婢、財物，却并不代表田地需登記於“宅園戶籍”，而是遺囑生效時，“宅”入戶籍，“田入地籍”，況且，以“宅園”指代“田宅”或“田字”不符合秦漢習語。<sup>③</sup>其觀點似應引起我們重視。事實上，秦至漢初，在名田制的嚴格執行下，土地雖允許買賣，然而“輒為定籍”“上如戶籍”等無不顯示了土地的國有屬性，“田畝”是否可以作為“民訾”，是否可以如“奴婢”“財物”算入“宅園”私產，至少在秦至漢初本身就是很大的問題。相反，我們在秦至漢初的法律及相關文件中却可以看到很多“田畝”不在私產登記之列的例證。里耶秦簡中有關於查封民戶財產的爰書記錄：

1. 廿二年六月乙巳朔壬申，都鄉守武爰書：高里士五（伍）武自言以大奴幸、甘多，大婢言、言子益等，牝馬一匹予子小男子產。典私占。初手。<sup>④</sup> 8-1443+8-1455

2. 廿五年七月戊子朔己酉，都鄉守沈爰書：高里士五（伍）廣自言：謁以大奴良、完，小奴疇、饒，大婢闌、願、多、□，禾稼、衣器、錢六萬，盡以予子大女子陽里胡，凡十一物，同券齒。典弘占。<sup>⑤</sup> 8-1554

可見，秦代典老統計的民訾中包含有：奴婢、牝馬、禾稼、衣器、錢六萬等資產，獨不見田畝一項。這和睡虎地秦簡《封診式·封守》中所記內容大體一致。

① 參見高敏《從張家山漢簡〈二年律令〉看西漢前期的土地制度——讀張家山漢簡札記之三》，《中國經濟史研究》2003年第3期；楊振紅《秦漢“名田宅制”說——從張家山漢簡看戰國秦漢的土地制度》，《中國史研究》2003年第3期；朱紹侯《論漢代的名田（受田）制及其破壞》，《河南大學學報》2004年第1期；于振波《張家山漢簡中的名田制及其在漢代的實施情況》，《中國史研究》2004年第1期；臧知非《秦漢“傳籍”制度與社會結構的變遷——以張家山漢簡〈二年律令〉為中心》，《人文雜誌》2005年第1期；何有祖《讀〈二年律令〉札記》，《楚地簡帛思想研究（二）》，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2005。

② 張榮強：《孫吳簡中的戶籍文書》，《歷史研究》2006年第4期。

③ 王彥輝：《出土秦漢戶籍簡的類別及登記內容的演變》，《史學集刊》2013年第3期。另，里耶秦簡、放馬灘秦簡等均見“田宅”“田字”稱謂，以“宅園”指代前者并未見到。且《張家山漢簡·戶律》：“宅之大方卅步……”，顯然，這裏的“宅”指的是宅基地，陳劍先生在《讀秦漢簡札記三篇》中指出《二年律令·戶律》中的“宅園”可能為“宅圖”，宅圖應該是將更大範圍內的若干住宅一并繪出，以確定其相對大小和相對位置之圖。詳見陳劍《讀秦漢簡札記三篇》，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站，2011年6月4日。可與上文參看。

④ 陳偉主編：《里耶秦簡牘校釋（第一卷）》，武漢大學出版社，2012，326頁。

⑤ 陳偉主編：《里耶秦簡牘校釋（第一卷）》，356-357頁。

3.鄉某爰書：以某縣丞某書，封有鞠者某里士五(伍)甲家室、妻、子、臣妾、衣器、畜產。<sup>①</sup>《封守》

另，漢初《戶律》關於家庭分戶析產中財物“定籍”的登記亦不見“田畝”。

4.民大父母、父母、子、孫、同產、同產子，欲相分予奴婢者、馬牛羊、它財物者，皆許之，輒爲定籍。<sup>②</sup><sub>337</sub>

雖然上述所舉案例多爲爰書，並非是戶籍文件，但是可以看出的是，秦至漢初“田畝”與“奴婢”“畜產”“衣器”別籍統計確是不爭的事實，故這些簿籍文件需“獨別爲府”，分屬不同部門管理，并在需要時“即雜治爲”。此外，《二年律令·收律》規定：“罪人完城旦、鬼薪以上，及坐奸府(腐)者，皆收其妻、子、財、田宅。”<sup>③</sup>顯然因罪沒入縣官之物，“財”與“田宅”并列別分，而秦所見“封守”“爰書”中“典占”的家訾亦不見田畝也可爲證。再者，如前文所述“田畝”隸屬於田部管理，授田以戶爲單位，故鄉部祇在上報授田統計時纔參與其中，<sup>④</sup>按龍崗秦簡《田律》及銀雀山漢簡《田法》中對於“田籍”“田租”及授田相關的記載，其直接參與者均爲：田嗇夫、部佐、田典、田部史等田官。可見關於黔首之“田畝”的“收”與“受”都是獨別於財物之外由國家統一管理，這也進一步從側面印證了秦至漢初“田畝”的國有屬性，故呂思勉先生在敘述漢代“訾產”問題時，特別注釋“地權”曰：“漢人計訾土田不在其列”<sup>⑤</sup>，其判斷至少在秦至漢初確實如此，至於武帝之後，制度實爲之大變，學者用“徐宗簡”“禮忠簡”來批駁呂思勉先生亦未免缺然。<sup>⑥</sup>

那麼，以此我們再反觀“識劫媿案”中所涉及的占訾問題，“沛”分戶析產“爲識買室，賈(價)五千錢；分馬一匹、稻田廿畝，異識。”用此可反推“沛”所擁有的家產狀況無疑，然而需要注意的是，“占訾”與“訾稅”畢竟是兩種不同的概念，其所屬範圍也決然不能劃等號。秦至漢初，“土地”的國有屬性使其管理與統計有別於“衣物”“畜產”，並非被計入“私產”作爲“訾稅”的主要對象。秦至漢初“財產稅”的徵收內容是包含“田畝”之外的動產與不動產似乎更符合當時的實情。故此將肆、宅、馬、稻田和奴婢等一并納入“占訾”的範疇並無疑義，然而將其一并算入“訾稅”的範圍就不合適了。另，占訾雖然是訾稅的前提條件，但却不是唯一目

① 陳偉主編：《秦簡牘合集(一)》上，武漢大學出版社，2014，288頁。

② 彭浩、陳偉等主編：《二年律令與秦讞書》，225頁。

③ 彭浩、陳偉等主編：《二年律令與秦讞書》，159頁。

④ 王彥輝：《田嗇夫、田典考釋——對秦及漢初設置兩套基層管理機構的一點思考》，《東北師大學報》2010年第2期。

⑤ 呂思勉：《秦漢史》下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477頁。

⑥ 勞榘先生指出：“漢世算訾之日見於文獻中，今有漢簡爲證，則不動產所有者爲田及宅，而動產中所有者爲奴隸、車(牛車及輅車)、牛、馬，其他用具衣物，則不在算訾之中。”參見勞榘《居延漢簡考證》，臺北：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1959，337頁。

的，秦漢“占訾”的目的更多的是作為財產調查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其關係到政府對於徭役徵發、官吏任免、徙民甚至“振業貧民”的重要參證，對此已有學者進行過很多討論，故在此略而不論。<sup>①</sup>總而言之，“田畝”必然不在“訾稅”之列，然而秦至漢初“馬牛”“衣器”“錢物”“禾稼”等作為吏民“私產”調查的主要對象並無異議，至於是否都被算入“訾稅”之範圍，在“識劫輓案”中亦不能看到直接的證據，那麼將“識劫輓案”所見“訾稅”看作秦至漢初民衆普遍財產稅的論斷是難以成立的。相反，如前文所述，以“識劫輓案”所見秦“訾稅”之對象及其內容來看，其又確係財產稅無疑，祇是需要將“識劫輓案”所見“訾稅”的對象限定在從事工商業活動的黔首，而不能無限擴展到所有的百姓。

### 三 西漢武帝後“訾稅”範圍的拓展

若上述論證無誤，則秦至漢初財產稅的徵收主要是針對從事商業活動的黔首，土地不在“訾稅”徵收的範圍，秦至漢初對於廣大民衆的“占訾”屬政府對民間財產調查制度的一部分，其主要作用體現在“徭役徵發”“官吏任免”“徙民”甚至“振業貧民”等層面上。需要注意的是，“占訾”雖涵蓋了一部分“訾稅”的對象人群，但却與“訾稅”無必然聯繫。然而到了武帝時期，伴隨着名田制的逐步破壞，官、商、地主之間出現了“三位一體”的現象，貧者尤貧、富者尤富，武帝時期之財力消耗而導致的“賦稅不足用”成為一時常態，而與之對應的是“百姓終莫分財佐縣官”，於是“抑商”政策擴大化，表現在“訾稅”問題中即為兩點：其一，內容上徵收範圍的擴展；其二，對象上徵收範圍的擴大。另外，“占訾”的性質也發生了很大的變化，財產稅的徵收成為“占訾”的重要目的之一，但仍不是唯一目的。

漢代傳世及出土文獻中雖沒有“訾稅”一詞的直接記載，然而漢承秦制，漢初對於商賈財產稅的徵收亦不應有間斷。《史記·平準書》記：“高祖乃令賈人不得衣絲乘車，重租稅以困辱之。”<sup>②</sup>高祖八年春三月又令“賈人毋得衣錦繡、綺縠絺紵，操兵，乘騎馬。”<sup>③</sup>“重租稅”中除常見的“市租”“關稅”“人頭稅”之外還應包含“訾稅”的內容。如前述秦時“訾稅”不見“車船”，漢初高祖又令賈人毋“衣絲乘車”，然而《漢書·武帝紀》載：元光六年（前129）冬，“初算商車”，元狩四年（前119）冬，“初算緡錢”。<sup>④</sup>楊振紅先生業已考證：《史記》《漢書》所

① 參見田澤濱《漢代的“更賦”、“訾算”與“戶賦”》，《東北師大學報》1984年第6期；傅舉有《論漢代“民貲”的登記及有關問題——兼答楊作龍同志》，《中國史研究》1988年第3期；于振波《漢代的家貲與貲家》，收入卜憲群、楊振紅主編《簡帛研究二〇〇四》，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6，306-316頁；王彥輝《論漢代的“訾算”與“以訾徵賦”》，《中國史研究》2012年第1期；石洋《秦漢財產調查制度初探》，《漢學研究》（臺北）第33卷，2015年第1期。

② 《史記》卷三〇《平準書》，1418頁。

③ 《漢書》卷一下《高帝紀下》，65頁。

④ 《漢書》卷六《武帝紀》，165、178頁。

用“初”除個別事例存在疑問外，均是“初次”“初創”的意思，且論證了“算緡錢”“算輶車”均屬於財產稅目之一。<sup>①</sup>據此，我們進一步認為武帝時期針對賈人的“初算商車”“初算緡錢”之“初”絕非財產稅徵收之“首創”的意思，漢代財產稅的出現亦不至武帝時無緣而起。實際上，“初”的含義實指“車船”“緡錢”初次被納入賈人“訾稅”範圍之“首創”。其祇是在秦“訾稅”範圍的基礎上，對於賈人“財產稅”徵收範圍的進一步擴展，秦代對於商賈的“訾稅”早已有之。

其次，在徵收對象上，“訾稅”範圍也呈現出擴大的趨勢。《史記·平準書》記載：

商賈以幣之變，多積貨逐利。於是公卿言：郡國頗被災害，貧民無產業者，募徙廣饒之地。陛下損膳省用，出禁錢以振元元，寬貸賦，而民不齊出於南畝，商賈滋衆。貧者畜積無有，皆仰縣官。異時算輶車賈人緡錢皆有差，請算如故。諸賈人末作賁貸買，居邑稽諸物，及商以取利者，雖無市籍，各以其物自占，率緡錢二千而一算。諸作有租及鑄，率緡錢四千一算。非吏比者三老、北邊騎士，輶車以一算；商賈人輶車二算，船五丈以上一算。匿不自占，占不悉，戍邊一歲，沒入緡錢。有能告者，以其半畀之。賈人有市籍者，及其家屬，皆無得籍名田，以便農。敢犯令，沒入田儻。<sup>②</sup>

楊振紅先生據“公卿所言”指出，元狩四年“初算緡錢”的對象是有市籍的“賈人”，而第二次算緡錢的範圍擴大到“雖無市籍”之“諸賈人末作賁貸買居邑稽諸物，及商以取利者”以及“諸作有租及鑄”者。<sup>③</sup>其又引馬端臨《文獻通考·徵權考一·徵商》中言：“按算緡之法，其初亦祇爲商賈居貨者設，至其後告緡遍天下，則凡不爲商賈而有蓄積者皆被害矣。”<sup>④</sup>雖然政府對於算緡錢對象的擴大仍指向有從事、參與手工業、商業及高利貸等末作活動者，然而對“訾稅”徵收對象的界定已然沒有實質的參照可言。漢代以來其“章章尤異者”無不“以末致財，用本守之”，漢代官、商、地主“三結合”的問題使得這一政策的施行難以爲繼，更何況匿訾問題的廣泛存在，故“天子既下緡錢令而尊卜式，百姓終莫分財佐縣官，於是楊可告緡錢縱矣。”<sup>⑤</sup>賈人“訾稅”的徵收原本就要依賴於政府財產調查的統計，告緡令既出，“緡錢”“車船”等“訾稅”的徵收不再強調有無“市籍”之賈人，而是按物納稅，遍諸於民。“訾稅”的範圍涵及普遍民衆，“按物納稅”使得打擊的對象仍指向工商業者。但是“占訾”的性質發生了極大的轉變，“訾稅”的內容被納入“占訾”的評定中，“訾稅”開始有了普遍財產稅的意涵。《史記·平準書》曰：

① 楊振紅：《出土簡牘與秦漢社會》（續編），246頁。

② 《史記》卷三〇《平準書》，1430頁。

③ 楊振紅：《出土簡牘與秦漢社會》（續編），265頁。

④ 《文獻通考》卷一四《徵權考》，143頁。

⑤ 《史記》卷三〇《平準書》，1432頁。



卜式相齊而楊可告緡遍天下，中家以上大抵皆遇告。杜周治之，獄少反者。乃分遣御史廷尉正監分曹往，即治郡國緡錢，得民財物以億計，奴婢以千萬數，田大縣數百頃，小縣百餘頃，宅亦如之。於是商賈中家以上大率破，民偷甘食好衣，不事畜藏之產業，而縣官有鹽鐵緡錢之故，用益饒矣。<sup>①</sup>

“中家”“大家”之別，在“平訾”的過程中業已分出，“家訾”自占之後，政府對民戶進行核算和“平訾”從而劃分戶等。<sup>②</sup> 商賈身份的難以界定及有意隱瞞，使得告緡令祇能面向全體民戶，並通過“占訾”的過程實現，“家訾”多者自然成為告發的主要對象，故《平準書》所言“中家以上大抵皆遇告”，然而政府劃定“訾稅”徵收的範圍標準，凡以“以物繫稅”，商賈之“訾”則無以遁形，於是後文曰“商賈中家以上大率破”的說法便承接前文。實際上，政府擴大“訾稅”徵收的對象人群，實質上打擊的目標仍是從事工商取利者及轉化而來的地主豪強，這正是告緡令頒發的用意所在，故“中家”與“商賈中家”前後並不矛盾。學者稱“中家”可能為“商賈中家”之省稱的推測似乎不能成立，況且以“前文”省稱“後文”者鮮聞。<sup>③</sup> 另外，昭帝時期關於漢代“占租”的記載亦可補證此說。《漢書·昭帝紀》：

始元六年秋七月，罷榷酤官，令民得以律占租。如淳曰：“律：諸當占租者，家長身各以其物占，占不以實，家長不身自書，皆罰金二斤，沒入所不自占物及買錢縣官也。”<sup>④</sup>

秦時有“市利之租”，是關於工商業者的一種營業稅，“占租”即對商賈營業稅的申報記錄，其與“算緡錢”不同，非財產稅範疇。<sup>⑤</sup> 所謂“令民得以律占租”而不言“商賈”，大概也是與“諸賈人，未作賁貸買，居邑稽諸物，商以取利者，雖無市籍”而難以統計有關，將“占租”的範圍擴大到所有百姓，實際上仍是效法“算緡”“告緡”政策的一種表現，因為“訾稅”及“市租”的徵收面向全體百姓，皆以“占”實物的方式實現，匿訾及有無市籍不再成為稅收的障礙，相應的政策才能得以施行。

明乎此，我們再看居延漢簡所見“徐宗簡”“禮忠簡”所記“家訾”記錄就不難理解了。

① 《史記》卷三〇《平準書》，1431 頁。

② 黃今言：《漢代的訾算》，《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1984 年第 1 期。

③ 楊振紅先生認為據平中苓次、錢劍夫先生論證“告緡之對象仍應以商賈為主，否則無法解釋‘商賈中家以上大率破’的說法，而且從這句話可推前文中‘中家以上大抵皆遇告’的‘中家’很可能是‘商賈中家’的省稱”。參見楊振紅《出土簡牘與秦漢社會》（續編），265 頁。

④ 《漢書》卷七《昭帝紀》，224 頁。

⑤ 高敏先生將“市租”定義為“關於工商業主的營業稅”；“占租”認定為“對工商業主的全部資財徵收的財產稅”。參見高敏《秦漢史論集》，90—95 頁。筆者不從此說，按《漢書》卷一五上《王子侯表表第三上》：“旁光侯殷，河間獻王子。十月癸酉封，十年，元鼎元年，坐貸子錢不占租，取息過律，會赦，免。”師古曰：“以子錢出貸人，律合收租，匿不占，取息利又多也。”顯然“租”指營業稅，與全部資財徵收的財產稅無關。參見《漢書》卷一五上《王子侯表上》，447 頁。另，楊振紅先生亦指出“市租”是秦漢時期針對在“市”場中出售商品的商人徵收的商品交易稅。詳見楊振紅《秦漢時期的市租》，收入其著《出土簡牘與秦漢社會》（續編），273 頁。



簡 1. 三樵隤長居延西道里公乘徐宗年五十 徐宗年五十

妻	宅一區直三千
子男一人	田五十畝直五千
男同產二人	用牛二直五千
女同產二人	

24.1B<sup>①</sup>

簡 2. 候長鯨得廣昌里公乘禮忠年卅

小奴二人直三萬	用馬五匹直二萬	宅一區萬
大婢一人二萬	牛車二兩直四千	田五頃五萬
輶車二乘直萬	服牛二六千	●凡訾直十五萬

37.35<sup>②</sup>

按簡文所記“占訾”內容,這一時期“田宅”“奴婢”“畜產”“輶車”等均在其列,與秦至漢初“計訾”內容不同的是,田畝與其他財物不再分別登記;其次凡登記物皆明碼標價。“輶車”屬財產稅徵收內容,武帝之後,“訾稅”的徵收顯然是通過“占訾”的過程擴展至全體百姓,政府掌握“訾稅”的標準“以物繫稅”,其祇需在“占訾”記錄中如實登記“家物”的價錢,并計算總價,這樣一來“家訾”的評定有了直接的參照,即“凡訾 XX 萬”。政府通過“占訾”調查,除了先前作為徭役徵發、官吏任用、徙民甚至振業貧民上的主要參照,“占訾”調查的分類統計亦成為“訾稅”徵收的前提條件,而“訾稅”的徵收對象,實則經歷針對工商衡虞者到全體百姓的一個轉變過程,繼而實現了財產稅的普及。武帝之後,這一做法逐漸被確立起來,例如鹽鐵會議中,賢良、文學們提到“以訾徵賦”說:“往者軍陣數起,用度不足,以訾徵賦,常取給見民。”<sup>③</sup>張守節《史記正義》曰:“武帝伐四夷,國用不足,故稅民田宅船乘畜產奴婢等,皆平作錢數,每千錢一算,出一等,賈人倍之;若隱不稅,有告之,半與告人,餘半入官,謂繒。出此令,用鋤築豪強兼并富商大賈之家也。”<sup>④</sup>其內容皆言稅“民”而不言“商賈”,然後文“出此令,用鋤築豪強兼并富商大賈之家也”,實則指出了政策施行的用意所在。

## 四 結語

需要注意的是,隨着名田制的破壞,土地兼并日益嚴重,武帝之後“田畝”與“奴婢”“車馬”等均被納為民訾(私產)調查統計之列,“徐禮簡”中“田畝”按畝計價上報,成帝時翟方進

① 簡牘整理小組編:《居延漢簡(壹)》,臺北: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2014,72 頁。

② 簡牘整理小組編:《居延漢簡(壹)》,120 頁。

③ 王利器:《鹽鐵論校注》,北京:中華書局,1992,191 頁。

④ 《史記》卷一二二《酷吏列傳》,3141 頁。

言：“用度不足，奏請一切增賦，稅城郭墾及園田，過更，算馬牛羊。”<sup>①</sup>顯然這裏的稅園田及算馬牛羊并非當時首創，又《後漢書·西域傳》記載陳忠上疏說漢武帝時“算至舟車，貲及六畜。”<sup>②</sup>故張守節所謂：“稅民田宅船乘畜產奴婢等”可能正是武帝時期“以訾徵賦”的具體內容，且這一制度在武帝時期基本定型。另，漢代雖“以訾徵賦”或“稅民訾”，然而其皆言“用度不足”“國用不足”纔會“取給見民”，王莽天鳳六年“一切稅天下吏民，訾三十取一”，<sup>③</sup>如淳曰“一切，權時也”，且如此高額的稅率也非西漢常制。東漢光武帝時，劉平任全椒縣長“政有恩惠，百姓懷感，人或增貲就賦，或減年從役。”<sup>④</sup>這也祇是因百姓懷感劉平恩惠，予以報答的特例；《說文》曰：“就，高也。”<sup>⑤</sup>“增訾就賦”是以“訾稅”補“賦稅”之不足，漢代財產稅的徵收似乎祇是作為“租賦”之輔助而存在，具有權時的考慮，而秦漢的“田租”“算賦”“更賦”等却是一直作為常入稅目而存在。

① 《漢書》卷八四《翟方進傳》，3423 頁。

② 《後漢書》卷八八《西域傳》，2912 頁。

③ 《漢書》卷九九《王莽傳》，4155 頁。

④ 《後漢書》卷三九《劉平傳》，1296 頁。

⑤ 《說文解字》卷五下《京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256 頁。

## 嶽麓書院藏秦簡《金布律》研究

湖南大學嶽麓書院

周海鋒

出土文獻與中國古代文明研究協同創新中心

**內容提要** 嶽麓秦簡《內史旁金布令》的出現可以打消學者對秦代是否存在《金布令》的疑慮。秦代戶賦在每年五月和十月徵收,所徵收者既有錢、布,也有芻、繭、絲等實物,實物部分是按照各地所產而繳納,無需統一,但實物換算成的金錢數額當是相等的。秦代戶賦徵收對象是爵位在大庶長以下者。秦代對於某些重要的物資,如馬匹,即使是私人擁有,也要強制加以標識。“質”乃大宗物品交易過程中必須履行的手續,買賣雙方各繳納廿二錢予市亭,市亭官吏與買賣雙方共同立下“質”文書。“質錢”乃官府為質時所收取的費用,按照交易次數收取,或要考慮交易數額。漢初《金布律》有承襲秦律者,但并非一成不變。

**關鍵詞** 金布律 嶽麓書院藏秦簡 睡虎地秦墓竹簡 張家山漢墓竹簡

之前刊布的簡牘材料中,睡虎地秦簡、張家山漢簡中均有《金布律》,新近出版的《嶽麓書院藏秦簡(肆)》中也有《金布律》。嶽麓秦簡《金布律》共7則,均以“金布律曰”起首,可以明確其所屬律篇。7則律文共包括竹簡25支,律文計797字,內容涉及遺失官府財物之處置,商品交易時需標明價錢,戶賦繳納,官府入錢貯藏,規範市販活動,馬匹管理以及對奴婢、馬、牛、羊等大宗物品交易的規定等。

嶽麓秦簡《金布律》有些內容是其他兩批《金布律》材料中沒有的。茲以前輩學者所取得的成果為基點,結合相關材料,試對嶽麓秦簡《金布律》中所涉及的某些問題稍加探討。

## 一 “金布律”律名所涉及的幾個問題

傳世典籍中關於《金布律》內容介紹首見於《晉書·刑法志》，其載漢代“《金布律》有毀傷亡失縣官財物”，又有“罰贖入責以呈黃金爲價”。<sup>①</sup> 睡虎地秦墓竹簡整理小組據簡文早已指出《金布律》是“關於貨幣、財物方面的法律”。<sup>②</sup> 以睡虎地秦簡、張家山漢簡所見《金布律》條文驗之，《金布律》的確是與貨幣、財物相關的法律，然嶽麓秦簡《金布律》中有數則律文是關於規範市場買賣的，並未直接涉及貨幣或財物，又有關於戶賦繳納的條文。由此可見《金布律》所涵括的內容可能比原先推定的要寬泛些，貨幣流通、公有財物管理、政府收入處置、市場規範等經濟行爲都是《金布律》所涵括的內容。又里耶秦簡有一機構名爲“金布”，專理經濟事務，《金布律》與“金布”當有一定關聯。

研究《金布律》的篇名，不得不談及《金布令》，傳世典籍中數次提及《金布令》，并有學者對令名加以解說。如《漢書·高帝紀》顏師古注“金布者，令篇（者）【名】，若今言《倉庫令》也。”<sup>③</sup>《漢書·蕭望之傳》顏師古注曰：“金布者，令篇名也。其上有府庫金錢布帛之事，因以名篇。”<sup>④</sup>以保留下來的幾則《金布令》驗之，顏師古的注解是可取的。爲便於研討，茲錄令文如下：

《漢書·高帝紀》臣瓚曰：“金布令曰‘不幸死，死所爲櫛，傳歸所居縣，賜以衣棺’也。”<sup>⑤</sup>

《金布令甲》曰：“邊郡數被兵，離饑寒，夭絕天年，父子相失，令天下共給其費。”<sup>⑥</sup>

漢律《金布令》曰：“皇帝齋宿，親帥群臣承祠宗廟，群臣宜分奉請。諸侯、列侯各以民口數，率千口奉金四兩，奇不滿千口至五百口亦四兩，皆會酎，少府受。又大鴻臚食邑九真、交趾、日南者，用犀角長九寸以上若瑇瑁甲一，鬱林用象牙長三尺以上若翡翠各二十，准以當金。”<sup>⑦</sup>

從上面引述材料可知《金布令》與《金布律》雖然爲不同的法律形式，但其實質內容應該並無區別。從傳世文獻存留的幾則《金布令》可知，其亦是與貨幣、財物有關，與出土文獻所見《金布律》所涵括的內容有相同點。然《金布律》與《金布令》究竟有何區別？爲何傳世文獻中祇

① 《晉書》卷三〇《刑法志》，北京：中華書局，1974，924 頁。

② 睡虎地秦墓竹簡整理小組：《睡虎地秦墓竹簡》，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55 頁。

③ 《漢書》卷一《高帝紀》，北京：中華書局，1962，65 頁。

④ 《漢書》卷七八《蕭望之傳》，3278 頁。

⑤ 《漢書》卷一《高帝紀》，65 頁。

⑥ 《漢書》卷七八《蕭望之傳》，3278 頁。

⑦ 《後漢書》志第四《禮儀志上》，北京：中華書局，1965，3104 頁。

見《金布令》條文？漢代是否經歷過《金布律》《金布令》并存而後以《金布令》替代《金布律》的過程？這些問題均值得研討。

睡虎地秦簡和張家山漢簡均有《金布律》而無《金布令》，傳世典籍中唯見《金布令》條文，如顏師古注《漢書·高帝紀》和《漢書·蕭何列傳》正文均徵引了《金布令》，《續漢書·禮儀志》注又有“漢律《金布令》”的說法。這難免會給人一種《金布律》《金布令》不分的感覺，或者《金布令》逐漸代替了《金布律》。這個問題早已引起一些學者的討論。高恒先生認為：“漢既有《金布律》，又有《金布令》，各書所言均不誤”，“凡對於某一類或某一部門事務作的規範性規定，稱之為律”，“凡為解決某類具體事情，而頒布的單行詔令，後經編纂成集者即稱之為某某令”。<sup>①</sup> 筆者也認為漢代同時存在《金布律》和《金布令》，《續漢書·禮儀志》注中之所以會出現“漢律《金布令》”這樣讓人疑惑的文字，是因為有些律條由令條轉化而成，內容上極為相近，後代學者在徵引時難免混淆。又“漢律《金布令》”之“律”或為衍文。

日本學者大庭脩先生認為，秦朝《金布律》大致包括了魏律《序略》中作為漢《金布律》而記載的內容；而《蕭望之傳》和臣瓚注中作為《金布令》所引用的內容可能是漢朝規定的；《續漢書·禮儀志上》注所引用則屬於武帝時代的規定。這樣看來，儘管《漢儀》中漢律《金布令》的名稱造成混淆，但仍可以推斷，繼承秦《金布律》的漢《金布律》與漢代重新制定的《金布令》可能是并存的。<sup>②</sup> 另一日本學者崛敏一先生也指出：“漢代文獻中，不僅有上述律名，而且可以看到田令、水令、緡錢令、盜鑄錢令、金布令、戍卒令、功令、品令、秩祿令、任子令、宮衛令、祀令、齋令、養老令、獄官令、笞令等許多稱作令的法律名”；“在秦律那裏，是將作為單行法令的令，集中并分類而構成律；至於漢代，則應該認為也在搜集單行法令後，將其稱作令。在此狀況下，作為追加法的律與令，可以認為沒有什麼實質上的區別。”<sup>③</sup> 高恒和大庭脩先生均認為在漢代《金布律》與《金布令》是并存的。大庭脩先生據內容對《金布令》條文的產生時間作了推測，其判定是可信的。某些令文祇能出現在某個特定的歷史時期，這也是“令以補律”的絕好證據。

其實，秦就有《金布令》存在，嶽麓秦簡有“內史旁金布令【第】乙四”“內史旁金布令第乙九”“內史旁金布令第乙十八”三則令文，漢代《金布令》極有可能是承《內史旁金布令》而來。又據律令形成的一般規律，先有王命或詔令，然後將其一部分編纂成令，令經過一定的程式升格為律。從詔令到令再到律，是律條形成的一般途徑，但是也不排除直接將王命或詔令編入律典的情形。祇有先有了《金布令》之名，然後纔會有《金布律》這一名稱之出現。

① 高恒：《漢律論考》，見楊一凡主編《中國法制史考證甲編》卷三，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3，7頁。

② [日]大庭脩著，林劍鳴等譯：《秦漢法制史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64頁。

③ [日]崛敏一：《晉泰始律令的制定》，見楊一凡主編《中國法制史考證丙編》卷二，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3，284-285頁。

《內史旁金布令》是新見於嶽麓秦簡的令名，有必要討論一下。在嶽麓秦簡中與《內史旁金布令》這一令名類似的令尚有《內史郡二千石官共令》《內史官共令》《內史戶曹令》《內史倉曹令》《廷內史二千石官共令》《食官共令》《四司空卒令》等。尤其是《內史戶曹令》《內史倉曹令》二令的出現對於考察《內史旁金布令》之性質頗為重要。內史是秦京畿所在，在行政區劃上雖與其他郡并無不同，有“內史郡”之稱，但其重要性却非其他郡所能比。內史所轄各縣分曹辦公，這一點與里耶秦簡中所見遷陵縣的情形當無二致，故會出現“內史戶曹令”“內史倉曹令”這樣的令名。依此程式，金布若為列曹之一，當有“內史金布曹令”，然在嶽麓秦簡中三見“內史旁金布令”而不稱“內史金布曹令”。由此可以推定金布與戶曹、倉曹等曹署機構或有不同。“金布曹”之稱呼未見於傳世典籍，在里耶秦簡牘中所見縣屬機構有金布，但其後均未附“曹”字。游逸飛、陳弘音在給里耶秦簡第9層部分簡牘作注釋時認為“金布”乃“金布曹”之省稱<sup>①</sup>，筆者認為此說有一定道理。然“金布曹”或與一般的曹署有某些本質區別，故與金布這一機構有關聯的令被命名為《內史旁金布令》。

《內史旁金布令》中的“旁”可通“傍”，有依附義，朱駿聲《說文通訓定聲·壯部》：“旁，假借為傍”<sup>②</sup>，《莊子·齊物論》：“奚旁日月，挾宇宙”，成玄英疏：“依附也”<sup>③</sup>。法律條文以“旁”命名的尚有漢代的《旁（傍）章》，《晉書·刑法志》載：“漢承秦制，蕭何定律，除參夷連坐之罪，增部主見知之條，益事律興、廐、戶三篇，合為九篇。叔孫通益律所不及，傍章十八篇，張湯越宮律二十七篇，趙禹朝律六篇，合六十篇。”<sup>④</sup>張建國先生已經指出此《傍章》，其本名當為《旁章》，“漢代人將漢律分成兩類，旁章是漢律裏的一類，它相對於漢律中的正律而得名”。<sup>⑤</sup>張先生的觀點是極富啟發意義的，若循此論，《內史旁金布令》也應當是相對正令而言的。但是很遺憾，在秦簡中尚未找到所謂的《金布令》正令。《內史旁金布令》與《傍章》是否是一回事，尚不敢輕易斷定。

## 二 嶽麓書院藏秦簡《金布律》之價值

嶽麓秦簡《金布律》的價值是多方面的，通過這批律文我們對秦代的戶賦制度、市場規範、官府財產管理、官府入錢貯藏以及馬政和大宗商品交易等問題會有全新的認識。其次是

① 游逸飛、陳弘音：《里耶秦簡博物館藏第九層簡牘釋文校釋》，簡帛網，2013年12月22日。

② 朱駿聲：《說文通訓定聲》，武漢市古籍書店影印臨嘯閣藏版，1983，916頁。

③ 郭象注、成玄英疏：《南華真經注疏》，北京：中華書局，1998，51頁。

④ 《晉書》卷三〇《刑法志》，922頁。

⑤ 張建國：《叔孫通定〈傍章〉質疑——兼析張家山漢簡所載律篇名》，《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7年第6期。



這批律文對於研究簡冊制度也極有用處。最後是其在法制史研究方面的意義,《金布律》在睡虎地秦簡中就已出現,之後出土的張家山漢簡《二年律令》和睡虎地 77 號漢墓均有《金布律》出土,可以進行比對研究。下面我們將逐次介紹嶽麓秦簡《金布律》的價值。

### (一) 改變對秦代戶賦制度的看法

學界對於“戶賦”的探討由來已久,觀點也隨着新材料的不斷面世而幾經翻新,在簡牘材料出土之前,學者甚至懷疑秦代是沒有“戶賦”的,更不承認其為單一的稅種。<sup>①</sup> 里耶秦簡刊布後,有學者正確指出戶賦在秦至漢初是作為一種專門稅目而存在的,並認為秦代戶賦繳納繭、絲等實物,到了漢代轉變成繳納十六錢。<sup>②</sup> 鄔文玲先生通過系統梳理里耶秦簡有關戶賦的材料後認為:

戶賦是秦代的稅目之一;秦代戶賦的徵收總額和徵收時間是相對固定的,即每年分五月和十月兩次徵收,總額為三十二錢;戶賦的徵收內容包括現錢和實物兩部分,其中實物的品類是不固定的,可根據各地的實際情況和需求來確定,目前所見有繭和芻;戶賦的收受和支付由少內負責;從目前所見的資料來看,戶賦中繭、芻等實物部分當主要是供應本縣所用;戶賦中現錢部分的歸屬和使用問題尚需進一步討論。<sup>③</sup>

鄔文玲先生關於秦代戶賦徵收、收受的判斷是十分正確的,從嶽麓秦簡《金布律》中可以得到進一步證實:

1287·金布律曰:出戶賦者,自泰庶長以下,十月戶出芻一石十五斤;五月戶出十六錢,其欲出布者,許 1230 之。十月戶賦,以十二月朔日入之,五月戶賦,以六月望日入之,歲輸泰(太)守。十月戶賦不入芻而入錢 1280 者,入十六錢。吏先為?印斂,毋令典、老挾戶賦錢。<sup>④</sup>

從《金布律》可知秦代戶賦的確在每年五月和十月徵收,徵收內容有既有錢、布,也有芻等實物,實物部分的確是按照各地所產而繳納,無需統一,但實物換算成的金額當是相等的。鄔文玲先生認為五月和十月兩次繳納的金額均為十六錢,也是頗具預見性的。然鄔文玲先生根據嶽麓秦簡《數》中兩個算題裏提及“芻一石十六錢”<sup>⑤</sup>和《二年律令·田律》“十月戶出

① 于琨奇《秦漢“戶賦”、“軍賦”考》(《中國史研究》1989年第4期)認為戶賦乃軍賦之一種,是一種戰時以戶為單位按照家產多少為依據而徵收,具有臨時性。田澤濱《漢代的“更賦”、“貲算”與“賦”》(《東北師大學報》1984年第6期)認為不存在一種單獨的稅目叫做“戶賦”,“戶賦”乃“徭賦”之總稱。

② 朱聖明:《秦至漢初戶賦詳考——以秦漢簡牘為中心》,《中國經濟史研究》2014年第1期。

③ 鄔文玲:《里耶秦簡所見戶賦及相關問題瑣議》,《簡帛》第8輯,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224頁。

④ 陳松長主編:《嶽麓書院藏秦簡(肆)》,上海辭書出版社,2015,107頁。

⑤ 朱漢民、陳松長主編:《嶽麓書院藏秦簡(貳)》,上海辭書出版社,2011,73-74頁。

芻一石”<sup>①</sup>來推算秦代十月戶賦徵收金額亦為十六錢。嚴格來講，這兩處材料均不足以完全支撐所得出的結論。算題中所涉及物品的價格均有假設性，雖然與真實價格不會相差太遠。其次，在涉及具體的數字時，以西漢推算秦代，恐怕有風險，畢竟是兩個不一樣的朝代，經過秦末戰爭之後，漢初的國力已不能與秦相提並論，物價必受影響。而且，漢承秦制也并非一成不變。漢初統治者親眼目睹過秦代興亡，實行休養生息政策，故百姓在徭役賦稅方面的負擔理應比秦代輕。當然，在沒有更加便捷的材料可以利用時，又不得不利用間接材料，祇要運用得當，依舊能得出接近歷史事實的結論。

目前能確定秦代五月戶賦徵收十六錢，十月所繳納的芻按石計算，且所繳納的芻之價值必為十六錢。然《金布律》和《二年律令·田律》中所規定繳納芻之重量並不一致。《二年律令·田律》規定“卿以下，五月戶出賦十六錢，十月戶出芻一石，足其縣用，餘以入頃芻律入錢。”<sup>②</sup>《二年律令·田律》承襲《金布律》的痕迹較為明顯，但又有所差別。秦代“十月戶出芻一石十五斤”到漢代變成“出芻一石”，我們認為並非百姓戶賦負擔減輕了，而是芻本身價錢發生了變化。嶽麓秦簡《金布律》明確記載不繳納芻者可納錢十六，依此計算，芻一石值 $14\frac{2}{9}$ （約 14.22）錢。秦代十月所繳納芻之價值與五月所繳納錢數必須一樣，漢初該無變化，《二年律令·田律》規定“五月戶出賦十六錢，十月戶出芻一石”，表明律令制定時芻一石值十六錢。然這又與《二年律令·田律》規定“芻一石當十五錢，稟一石當五錢”<sup>③</sup>不符了。

《二年律令》中所見芻一石有十六和十五錢兩個價格，這的確需要解釋一下。《二年律令》通常認為是呂后二年（前 186）時抄錄，但所載律令並非同時制定，《田律》和《戶律》所載當有先後之別。漢代立國之初，物資匱乏，芻價錢高至十六錢一石也是情理之中，隨着經濟的復甦，其價錢或又降低至十五錢一石。

秦漢芻價差異也坐實了嶽麓秦簡《數》載“芻一石十六錢，稟一石六錢”<sup>④</sup>或許根本就是一個假設值，秦代“芻一石十六錢”並非常態。而從里耶秦簡出現的“戶芻錢六十四”<sup>⑤</sup>（8-1165），並不能反推芻一石值錢十六，戶芻錢正好是十六的倍數，是因為秦律規定不出芻者可出錢十六。

既然已經確定五月和十月所繳納戶賦的金額是等值的，且十月徵收之芻，雖然在某段時間內重量是確定的，但其折算成金錢的數額會因時地而有差異，故《二年律令·田律》中規定

① 張家山二四七號漢墓竹簡整理小組：《張家山漢墓竹簡〔二四七號墓〕（釋文修訂本）》，北京：文物出版社，2006，43 頁。

② 張家山二四七號漢墓竹簡整理小組：《張家山漢墓竹簡〔二四七號墓〕（釋文修訂本）》，43 頁。

③ 張家山二四七號漢墓竹簡整理小組：《張家山漢墓竹簡〔二四七號墓〕（釋文修訂本）》，41 頁。

④ 朱漢民、陳松長主編：《嶽麓書院藏秦簡（貳）》，上海辭書出版社，2012，73 頁。

⑤ 陳偉主編：《里耶秦簡牘校釋（第一卷）》，武漢大學出版社，2012，286 頁。

“芻稟節(即)貴於律,以入芻稟時平賈(價)入錢”,<sup>①</sup>以當時狀況而言,要制定一個全國統一價是不現實的,“平價”也祇能是各個郡縣統一平均價格。

關於秦代戶賦的徵收對象問題,之前並無直接材料提及。朱聖明先生通過里耶秦簡以及漢初相關材料推測秦到漢初戶賦的徵課對象是五大夫(包括五大夫)以下凡有立戶者。<sup>②</sup>朱先生關於秦代戶賦徵收下限的推斷是可信的,但上限不可靠。從嶽麓秦簡《金布律》可知,秦代戶賦徵收對象是爵位在大庶長以下者,大庶長乃二十等爵之第十八級,之上祇有關內侯和徹侯,可見能免繳戶賦的人數是極少的。

西漢初年的《二年律令·田律》中規定卿以下爵位者,均需繳納戶賦,“卿”通常指第十八級大庶長以下至第十級左庶長。<sup>③</sup>“卿以下”是否包括“卿”,學界尚有不同看法。于振波先生認為漢代戶賦的徵收對象是從大庶長以下到無爵者(庶人),包含卿級爵位。<sup>④</sup>朱繼平先生却認為“卿以下”並不包括卿級爵位,漢代戶賦的徵收對象是從五大夫至公士,五大夫以上的卿爵不用繳納。<sup>⑤</sup>

本人贊同于振波先生的觀點,“卿以下”當包括卿爵在內。秦漢簡牘中的“某某以上”和“某某以下”常包括“某某”本身,比如《二年律令·傳律》:“不更以下子年廿歲,大夫以上至五大夫子及小爵不更以下至上造年廿二歲,卿以上子及小爵大夫以上年廿四歲,皆傳之。”<sup>⑥</sup>“不更以下”顯然包括有“不更”爵位者,“大夫以上”也包括有“大夫”爵位者,否則就會出現指稱對象不全,這在措辭謹嚴的法律條文中是不可能出現的。又比如睡虎地秦簡《語書》“今法律令已布聞,吏民犯法為閒私者不止,私好、鄉俗之心不變,自從令、丞以下智(知)而弗舉論,是即明避主之明法毆(也)”,<sup>⑦</sup>“令丞以下”顯然包括令和丞,《語書》乃南郡守騰向郡內“縣、道嗇夫”發布的文告,豈能沒有令與丞。

故《二年律令·田律》中“卿以下,五月戶出賦十六錢”祇不過是對嶽麓秦簡“出戶賦者,自泰(大)庶長以下……五月戶出十六錢”的改寫而已,“卿以下”即“大庶長以下”。從《二年律令·賜律》:“賜不為吏及宦皇帝者,關內侯以上比二千石,卿比千石,五大夫比八百石,公乘比六百石,公大夫、官大夫比五百石,大夫比三百石,不更比有秩,簪裹比斗食,上造、公士比佐史”,<sup>⑧</sup>可以推測卿指擁有大庶長、駟車庶長、大上造、少上造、右更、中更、左更、右庶長和

① 張家山二四七號漢墓竹簡整理小組:《張家山漢墓竹簡[二四七號墓](釋文修訂本)》,41頁。

② 朱聖明:《秦至漢初戶賦詳考——以秦漢簡牘為中心》,《中國經濟史研究》2014年第1期。

③ 李均明:《張家山漢簡所反映的二十等爵制》,《中國史研究》2002年第2期。

④ 于振波:《從簡牘看漢代的戶賦與芻稟稅》,《故宮博物院院刊》2005年第2期。

⑤ 朱繼平:《從〈張家山漢簡〉談漢初的戶賦與戶芻》,《江漢考古》2011年第4期。

⑥ 張家山二四七號漢墓竹簡整理小組:《張家山漢墓竹簡[二四七號墓](釋文修訂本)》,58頁。

⑦ 睡虎地秦墓竹簡整理小組:《睡虎地秦墓竹簡》,13頁。

⑧ 張家山二四七號漢墓竹簡整理小組:《張家山漢墓竹簡[二四七號墓](釋文修訂本)》,49頁。

左庶長等九種爵位任何一等者。

鄔文玲先生據里耶秦簡材料指出“戶賦中繭、芻等實物部分當主要是供應本縣所用”，限於材料，對於“戶賦中現錢部分的歸屬和使用問題”并未加以交代。<sup>①</sup> 依據嶽麓秦簡《金布律》可知秦代戶賦每年都要輸送到郡守處。雖然沒有規定其接下來將流向何處，但極有可能是由郡轉輸到中央相關部門，有漢初材料可供比照，《二年律令·金布律》載“租、質、戶賦、園池入錢縣道官，勿敢擅用，三月壹上見金、錢數二千石官，二千石官上丞相、御史”。<sup>②</sup>

賦稅徵收任務一般由鄉里的基層行政人員負責，從里耶秦簡相關材料亦可得到反映。嶽麓秦簡《金布律》1280 簡也可以幫助我們瞭解戶賦徵收程式，“吏先爲？印斂，毋令典、老挾戶賦錢”，應當是由鄉或縣派直接派官吏去各里徵收戶賦，典、老祇協助收取，戶賦錢不經過典、老之手。秦律有此規定，或是爲了防止基層里吏盤剝百姓。

## （二）加深對秦代市場交易活動的認識

提及秦代的商貿活動，最先映入腦海的是“重農抑商”四字，帶着此種偏執和成見考慮問題，是難以得出與史實接近的結論的。事實上，春秋戰國以來中國的商業得到極大程度的發展，就算對商業採取抑制政策的秦國也不例外，從《史記·貨殖列傳》可知秦國境內有“禮抗萬乘”的大商賈，如烏氏倮、寡婦清等<sup>③</sup>，而對秦政局產生重要影響的呂不韋本人也是大富商。然秦日常交易活動究竟是怎樣一幅圖景，由於傳世文獻缺少此方面的記載，我們不得而知。所幸出土材料能够提供一些可貴的信息。

從嶽麓秦簡《金布律》可知，秦代法律對日常交易活動有相應的規範，包括交易場所劃定、稅收收取、交易憑證取得以及對違犯交易規範者之懲罰等等，相關簡文如下：

1289：·金布律曰：市衡術者，沒入其賣毆（也）於縣官，吏循行弗得，貲一循（盾）。縣官有賣毆（也），不用 1288 此律。有販毆（也），旬以上必於市，不者令續（贖）遷（遷），沒入其所販及買錢於縣官。典、老、伍人見及或告之 1233 而弗告，貲二甲。有能捕告贖遷（遷）辜一人，購金一兩<sup>④</sup>。賣瓦土毆（墜）糞者，得販賣室中、舍中，租如律令。<sup>⑤</sup>

“衡”指道路交叉之處，《左傳·昭公元年》“及衡，擊之以戈”，杜預注曰：“衡，交道”<sup>⑥</sup>。“衡術”連用則指通途大道，《墨子·號令》：“因城中里爲八部，部一吏，吏各從四人，以行衡術及里中。”<sup>⑦</sup>秦律禁止百姓在通衢大道上進行貿易，可能出於以下幾方面的原因：一是爲了保證

① 鄔文玲：《里耶秦簡所見戶賦及相關問題瑣議》，《簡帛》第 8 輯，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224 頁。

② 張家山二四七號漢墓竹簡整理小組：《張家山漢墓竹簡[二四七號墓]》（釋文修訂本），67 頁。

③ 《史記》卷一二九《貨殖列傳》，3957 頁。

④ 陳松長主編：《嶽麓書院藏秦簡（肆）》，109 頁。

⑤ 杜預：《春秋經傳集解》，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1190 頁。

⑥ 孫詒讓：《墨子閒詁》，北京：中華書局，2001，590 頁。

道路順暢；二是爲了規範商業活動。然秦律并非禁止正當的買賣行爲，而是規定長期性的貿易活動必須在市中進行。城中往往劃定一塊區域設置貿易區，秦漢時期的“市”與居住區“里”是分離的。

“販”既可指買賣行爲，也可指做買賣者。《說文·貝部》：“販，買賤賣貴者。”<sup>①</sup>《史記·樊鄴滕灌列傳》：“潁陰侯灌嬰者，睢陽販繒者也。”<sup>②</sup>瓦土即用土燒制而成的器物。《說文》：“瓦，土器已燒之總名。”<sup>③</sup>《漢書·文帝紀》：“治霸陵，皆瓦器，不得以金銀銅錫爲飾，因其山，不起墳。”<sup>④</sup>《史記·太史公自序》：“啜土刑”，《正義》：“顏云：‘簋，所以盛飯也。刑，所以盛羹也。土謂燒土爲之，即瓦器也。’”<sup>⑤</sup>

《嶽麓書院藏秦簡(肆)》整理小組將塹與糞分別加以解釋，並認爲“糞”指“廢棄的粗劣之物”，<sup>⑥</sup>恐未達一間。筆者認爲塹糞當指用糞便壓制而成的磚狀物。《農桑輯要·養蠶》：“冬月多收牛糞堆聚。春暖，踏成塹子，曬乾；苫起。燒時，香氣宜蠶。”<sup>⑦</sup>歐陽脩《歸田錄》卷一：“時丁方爲群牧判官，乃戲晁曰：‘啓事更不奉答，當以糞塹一車爲報。’”<sup>⑧</sup>將動物糞便晾乾後作爲柴火使用之做法，一直延續至今。

“室中”“舍中”傳世文獻多見，指私人屋舍之中，《史記·五宗世家》：“夜使人迎與奸服舍中”，<sup>⑨</sup>《史記·匈奴列傳》司馬貞《索隱》引如淳曰：“言汝漢人多居室中，固自宜著冠，且不足貴也。”<sup>⑩</sup>律文中“室中”“舍中”與“市肆”相對而言，指里邑中專門用以交易的房舍。嶽麓秦簡《金布律》1226+J42 簡載“舍室爲里人盜賣馬牛人，典、老見其盜及雖弗見或告盜，爲占質，黥爲城旦，弗見及莫告盜，贖耐，其伍同居及一典，弗坐。”<sup>⑪</sup>“舍室”即“舍中室中”之省稱，舍室當有專人打理並負責管理貿易活動。秦律規定“賣瓦土塹(塹)糞者，得販賣室中舍中”，是有一定道理的。燒制的陶器易碎，不便於輾轉運輸；而在市肆出賣糞磚，又實在不雅。從此規定亦可推測出一般的商品交易，都要到正規的市肆中進行。

“縣官有賣毆”可爲嶽麓秦簡 1411 組《金布律》“官府爲作務市受錢”一段的句讀提供參考。縣官可以在交通要道出售物品，表明秦代官府有專門從事貿易者，據此可知“官府市”與

① 《說文解字》卷六下《貝部》，北京：中華書局，2013，127 頁。

② 《史記》卷九五《樊鄴滕灌列傳》，3233 頁。

③ 《說文解字》卷一二下《瓦部》，269 頁。

④ 《漢書》卷四《文帝紀》，134 頁。

⑤ 《史記》卷一三〇《太史公自序》，3995-3996 頁。

⑥ 陳松長主編：《嶽麓書院藏秦簡(肆)》，164 頁。

⑦ 石聲漢：《農桑輯要校注》，北京：農業出版社，1982，118 頁。

⑧ [宋]歐陽脩：《歸田錄》，北京：中華書局，1981，2 頁。

⑨ 《史記》卷五九《五宗世家》，北京：中華書局，2013，2550 頁。

⑩ 《史記》卷一一〇《匈奴列傳》，3506 頁。

⑪ 陳松長主編：《嶽麓書院藏秦簡(肆)》，135-136 頁。



“官府作務”乃并列的行爲，故“官府爲作務市受錢”一段宜句讀爲“官府爲作務、市受錢”。

### (三) 爲秦代馬政研究提供重要素材

嶽麓秦簡《金布律》的價值還表現在一定程度上豐富了此律的內容，扭轉學者們對《金布律》內涵的固有認識。例如嶽麓秦簡《金布律》中有幾則律文與“馬政”有關，這在之前的睡虎地秦簡、張家山漢簡《金布律》中是沒有出現的。律文如下：

1229·金布律曰：禁毋敢以牡馬、牝馬高五尺五寸以上，而齒未盈至四以下，服輦車及犂(墾)田、爲人 1279 就(僦)載，及禁賈人毋得以牡馬、牝馬高五尺五寸以上者載以賈市及爲人就(僦)載，犯令者，皆 1410 貲各二甲，沒入馬縣官。有能捕告者，以馬予之。鄉亭嗇夫吏弗得，貲各一甲；丞、令、令史貲 1398 各一盾。馬齒盈四以上當服輦車、犂(墾)田、就(僦)載者，令廐嗇夫丈齒令、丞前，久(灸)右肩，章曰：當乘。1365 不當乘，竊久(灸)及詐(詐)僞令人久(灸)，皆遷(遷)之，沒入馬縣官。<sup>①</sup>

1229 組律文由 5 枚簡組成，規定了身高超過五尺五寸但年齡未滿四歲的馬匹均不可用來拉車、墾田以及租賃予人拉載貨物。明令禁止商賈以身高五尺五寸以上的馬匹來載物經商、租賃。年滿四歲的馬匹若要用來拉車、墾田、租賃，事先須讓廐嗇夫當着縣令、縣丞的面進行丈量檢驗，并在右肩烙上“當乘”二字。馬匹不當乘而私下烙上“當乘”印的以及弄虛作假讓別人烙印的，均要處以遷刑，馬匹充公。

馬匹在歷史上發揮的重要作用，早已被人稱道，《後漢書·馬援列傳》曰：“馬者甲兵之本，國之大用。安寧則以別尊卑之序，有變則以濟遠近之難。”<sup>②</sup>加之秦人之先祖有善於牧馬、駕車而得到周天子青睞者，故秦歷代統治者均十分重視馬政。秦律之所以對身高五尺五寸以上的馬匹管理格外嚴格，或是因爲超過該尺寸的馬匹常常用以拉車、郵驛傳遞和作戰。這一點從漢代馬政相關情形可以推知：

《漢書·景帝紀》：“御史大夫綰奏禁馬高五尺九寸以上，齒未平，不得出關。”<sup>③</sup>

《居延漢簡釋文合校》：驛馬一匹驛駁牡齒四歲高五尺八寸上調習(142.26)<sup>④</sup>

《肩水金關漢簡》：□□尺八寸一匹驛駁齒四歲高五尺八寸□(73EJT4:54)

《傳馬名籍》：傳馬一匹，驪，牡，左剝，決兩鼻兩耳數，齒十九歲，高五尺九寸……

私財物馬一匹，驪，牡，左剝，齒九歲，白背，高六尺一寸，小育。補縣(懸)泉置傳馬缺。

① 陳松長主編：《嶽麓書院藏秦簡(肆)》，110 頁。

② 《後漢書》卷二四《馬援列傳》，840 頁。

③ 《漢書》卷五《景帝紀》，147 頁。

④ 謝桂華、李均明、朱國韶：《居延漢簡釋文合校》，北京：文物出版社，1987，234 頁。



傳馬一匹，驪，乘，白鼻，左剽，齒八歲，高六尺，駕，翟聖，名曰全？廐。厶卩(12簡)  
……尺六寸，駕，名曰葆橐。

傳馬一匹，騶，乘，左剽，決右鼻，齒八歲，高五尺九寸半寸，驂，名曰黃雀。

傳馬一匹，驪，乘，左剽，八歲，高五尺八寸，中，名曰倉(蒼)波，柱。

傳馬一匹，騶，乘，左剽，決兩鼻，白背，齒九歲，高五尺八寸，中，名曰佳□，柱，駕。

傳馬一匹，赤騶，牡，左剽，齒八歲，高五尺八寸，駕，名曰鐵柱。

傳馬一匹，騂駒，乘，左剽，齒九歲，高五尺八寸，驂，呂戟，名曰完幸。厶卩

私財務馬一匹，驪，牡，左剽，齒七歲，高五尺九寸，補縣(懸)泉置傳馬缺。

建始二年三月戊子朔庚寅，縣(懸)泉廐嗇夫欣敢言之：謹移傳馬名籍一編，敢言之。

(V1610②:10-20)<sup>①</sup>

從居延漢簡、懸泉漢簡材料可知，漢代傳馬、驛馬的身高均在五尺八寸以上。日本學者森鹿三在《論居延簡所見的馬》一文中指出漢代馬的平均年齡為八點二歲，漢代馬的平均身高為五尺九寸。<sup>②</sup> 參照西北漢簡相關材料，可知對《漢書·景帝紀》“禁馬高五尺九寸以上，齒未平，不得出關”的規定之貫徹是十分到位的。秦律規定身高達五尺五寸以上的馬匹不可隨意役使，此與漢相比，則更顯嚴格。

需要補充的是，秦代一般百姓蓄養的馬匹作為私人財產的一部分是受到法律保護的<sup>③</sup>，然商賈使用身高超過五尺五寸的馬匹運載貨物和從事商業貿易，馬匹將被充公。“禁賈人毋得以牡馬、牝馬高五尺五寸以上者載以賈市及為人就(僦)載，犯令者，皆貲各二甲，沒入馬縣官”，這樣的規定顯然是為了打擊商賈、抑制商業。商賈祇能驅使身高在五尺五寸以下的馬匹從事商貿活動。這與漢高祖劉邦“令賈人不得衣絲乘車，重稅租以困辱之”<sup>④</sup>的做法如出一轍。

秦代烙馬印抑壓在馬的右肩，而漢代在左肩，這是秦漢馬政顯著差異之一。《睡虎地秦墓竹簡·封診式》“盜馬”爰書中出現“右剽”：

爰書：市南街亭求盜才(在)某里曰：甲縛詣男子丙，及馬一匹，騅牝右剽……及履，告曰：“丙盜此馬、衣，今日見亭旁，而捕來詣。”<sup>⑤</sup>

“右剽”一詞鮮見於傳世文獻，睡虎地秦墓竹簡整理小組在給“剽”作注釋時曰：“剽，疑讀為

① 胡平生、張德芳：《敦煌懸泉漢簡釋粹》，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81-82頁。

② [日]森鹿三著，姜鎮慶譯：《論居延簡所見的馬》，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戰國秦漢史研究室編《簡牘研究譯叢》第1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3，89頁。

③ 《里耶秦簡》8-1433載秦始皇卅二年爰書一份，涉及財產繼承，在武贈予兒子產的財物之中有牝馬一匹。

④ 《漢書》卷二四《食貨志》，北京：中華書局，1153頁。

⑤ 睡虎地秦墓竹簡整理小組：《睡虎地秦墓竹簡》，151頁。

瞽。《廣韻》引《埤蒼》：‘一目病也。’《居延漢簡甲編》八七八有‘□駁乘兩剽，齒十六……’，一九七三有‘……左剽，齒五歲，高五尺九寸’。”<sup>①</sup>驗之後來公布的材料，整理小組的注釋顯然是有問題的，如上文提及的《傳馬名籍》中所有馬匹均“左剽”，而傳馬擔負着重要的傳載任務，怎麼可能專挑有目病的馬匹來充當。學者們或意識到這一點，故胡平生、張德芳先生在《敦煌懸泉漢簡釋粹》一書中對“剽”進行了重新解讀：

左剽，剽，標識。左剽，即在馬的左部烙上徽記。《集韻·宵韻》：“表，識也。或作剽。”《周禮·春官·肆師》：“表染盛。”鄭玄注：“故書‘表’爲‘剽’。剽、表皆爲徽識也。”<sup>②</sup>

這裏對“剽”的解釋是可信的。參照嶽麓秦簡《金布律》的記載，秦代“右剽”馬可能是在馬的右肩烙上徽記。秦代有一套嚴格的公物標識制度，官有馬匹無疑均要烙上徽記，官員在烙記過程中若出現失誤，會受到相應的處罰，《效律》載“馬牛誤職（識）耳，及物之不能相易者，貲官嗇夫一盾”。<sup>③</sup>然這種徽記制度又不僅限於官有財物，某些重要的物資，如馬匹，即使是私人擁有，也要強制加以標識。如嶽麓秦簡《金布律》規定馬年齡超過四歲，“令厩嗇夫丈齒令、丞前，久（灸）右肩，章曰：當乘”。故判定馬匹是否爲官有，不能光看其身上是否有徽記，重要的是徽記的內容。據此還可以推測秦代一般的官馬，身上至少有兩個徽記，一個標明其所屬情況，似後代的“靈丘騎馬”“遼侯騎馬”印之類；<sup>④</sup>一個標明其是否堪用，如“當乘”章之類。

#### （四）加深對質、質錢以及秦代大宗物品交易流程之認識

嶽麓秦簡《金布律》條文對牛、馬、奴婢交易相關程式進行了規定，這是之前的文獻中見不到的，一定程度上填補了歷史空白。爲了便於討論，先引用律文如下：

1415：·金布律曰：黔首賣馬牛勿獻（獻）廷，縣官其買毆（也），與和市若室，勿敢強<sup>L</sup>。買及賣馬、牛、奴婢它鄉、它縣，吏 1428 爲（？）取傳書及致以歸，及（？）免（？），弗爲書，官嗇夫吏主者，貲各二甲，丞、令、令史弗得，貲各一甲。其有事關外，以私馬 1300 牛羊行而欲行賣之及取傳賣它縣，縣皆爲傳，而欲徙賣它縣者，發其傳爲質。黔首賣奴婢（婢）、1301 馬牛及買者，各出廿二錢以質市亭。皇帝其買奴婢（婢）、馬，以縣官馬牛羊質黔首馬牛羊及買以爲義 1351 者，以平賈（價）買之，輒予其主錢。而令虛質、毋出錢、過旬不質，貲吏主者一甲，而以不質律論<sup>L</sup>。黔首自 0990 告，吏弗爲質，除。黔首其爲

① 睡虎地秦墓竹簡整理小組：《睡虎地秦墓竹簡》，151 頁。

② 胡平生、張德芳：《敦煌懸泉漢簡釋粹》，25-26 頁。

③ 睡虎地秦墓竹簡整理小組：《睡虎地秦墓竹簡》，74 頁。

④ 劉釗：《說秦簡“右剽”一語并論歷史上的官馬標識制度》，收入其著《書馨集——出土文獻與古文字論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193 頁。“靈丘騎馬”“遼侯騎馬”爲漢代烙馬印，秦代烙馬印目前尚未見著錄或出土。

大隲取義,亦先以平賈(價)直之<sup>①</sup>。質奴婢、馬、牛者,各質其鄉,鄉遠都市,欲徙<sup>①</sup>

(缺簡)

1226 老爲占者皆遷(遷)之。舍室爲里人盜賣馬牛人,典、老見其盜及雖弗見或告盜,爲占質,黥爲 J42 城旦,弗見及莫告盜,贖耐,其伍同居及一典,弗坐。賣奴婢(婢)馬牛者,皆以帛書質,不從令者,1263 貲一甲<sup>②</sup>。賣半馬半牛者,毋質諸鄉。<sup>②</sup>

1415 組律文由 9 支竹簡組成,然律文并不完整,中間尚缺簡。此則律文對牛、馬、奴婢等大宗商品的交易程式作了規定。律文中多次提及“質”,“質”應爲黔首交易大宗物品過程中必須履行的一項手續。然“質”之深層含義究竟爲何,“質”與“質錢”是否有關聯,均是值得探索的重要議題。也祇有厘清了這兩個問題,纔能說真正讀懂了此則律文。

秦漢簡牘中多次出現“質”和“質錢”,學者們多有討論,但尚未達成一致看法。《睡虎地秦墓竹簡·法律答問》:“百姓有責(債),毋敢擅強質,擅強質及和受質者,皆貲二甲。”“強質”“和質”之“質”,整理小組注釋曰:“質,抵押。古書中‘質’常以人作爲抵押。”整理小組給出的譯文爲:“百姓間有債務,不准擅自强行索取人質,擅自强行索取人質以及雙方同意質押的,均罰二甲。”<sup>③</sup>張家山漢簡《二年律令·金布律》“質錢”之“質”,整理小組注釋:“質,抵押。”<sup>④</sup>《二年律令·雜律》:“諸有責(債)而敢強質者”,整理小組注釋:“強質,強以人或物爲質。”<sup>⑤</sup>陳偉先生認爲秦漢《金布律》中“質錢”之“質”與《法律答問》148 簡所見“擅強質”“和受質”之“質”不是一回事。質錢是官府爲大型交易提供質劑而收取的税金。<sup>⑥</sup>徐世虹先生《也說質錢》一文也指出了傳世文獻與出土文獻中“質錢”含義有別,“質仍作質押解釋,質錢也許與官方行爲下的經濟活動或債務關係有關”。<sup>⑦</sup>李力先生推測秦漢律所見“質錢”是因官府(債權人)占有民(債務人)之物以保證其借貨而產生的,是官府在借貨期限屆滿時所收到的、由民交來的款項(本錢與子錢之和)。<sup>⑧</sup>

陳偉、徐世虹和李力先生關於“質”和“質錢”的論斷均有可取之處,然尚有進一步討論的餘地。傳世文獻以及部分簡牘材料中的“質”的確相當於現代語境中的“抵押”,但并非所有的“質”均如是解。秦漢《金布律》中的“質錢”乃官方收入之重要組成部分,與傳世文獻中“質錢”表示以人或物作爲抵押以借錢之義完全不同。參之嶽麓秦簡《金布律》,“質”乃大宗

① 陳松長主編:《嶽麓書院藏秦簡(肆)》,133-135 頁。

② 陳松長主編:《嶽麓書院藏秦簡(肆)》,135-136 頁。

③ 睡虎地秦墓竹簡整理小組:《睡虎地秦墓竹簡》,127-128 頁。

④ 張家山二四七號漢墓竹簡整理小組:《張家山漢墓竹簡[二四七號墓](釋文修訂本)》,67 頁。

⑤ 張家山二四七號漢墓竹簡整理小組:《張家山漢墓竹簡[二四七號墓](釋文修訂本)》,33-34 頁。

⑥ 陳偉:《關於秦與漢初“入錢鑄中”律的几个問題》,《考古》2012 年第 8 期。

⑦ 徐世虹:《也說質錢》,見王沛主編《出土文獻與法律史研究》第 2 輯,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1-9 頁。

⑧ 李力:《秦漢律所見“質錢”考辨》,《法學研究》2015 年第 2 期。

物品交易過程中必須履行的手續，買賣雙方各繳納廿二錢予市亭，相關官吏與買賣雙方共同見證“質”文書的生成。“質”是官府為了保證貿易公平進行而採取的一種舉動。專門從事“質”的官吏或稱為“質人”，《周禮·夏官·馬質》：“馬質掌質馬”，賈公彥疏云：“質，平也，主平馬力及毛色與賈直之等。”<sup>①</sup>“質馬”之“質”與嶽麓秦簡 1415 組律文出現之“質”當是一回事。

市吏主持質并立文書，一是充當了貿易中間人的角色并依平價對交易物品進行估值，再則保證了交易的合法性和有效性。“皇帝其買奴婢(婢)、馬，以縣官馬牛羊質黔首馬牛羊及買以為義者，以平賈(價)買之，輒予其主錢”，表明皇帝購買奴婢、馬、牛等是不必履行“質”程式的，然亦要“以平價買之”。“黔首其為大賂取義，亦先以平賈(價)直之”，“大賂取義”可依整理小組作“大大超過了平價”<sup>②</sup>解，當賣方要價偏離平價過多時，市吏要以平價對物品進行估值，至於交易最終能否達成，完全看買賣雙方的意願。通過嶽麓秦簡 J42 可知質文書均以帛書為之，應當是一式三份，賣方、買方、官府各持有一份。

厘清了“質”在律文中的含義，“質錢”便毫無奧義可言。“質錢”乃官府為質時所收取的費用，按照交易次數收取，或要考慮交易數額。嶽麓秦簡《金布律》規定“質奴婢、馬、牛者，各質其鄉”的同時又規定“賣半馬半牛者，毋質諸鄉”，可見為質時會考慮交易額度。又“質”與“占質”恐非一事，“舍室為里盜賣馬牛人，典、老見其盜及雖弗見或告盜，為占質，黥為城旦，弗見及莫告盜，贖耐，其伍、同居及一典，弗坐”。依律文，“占質”是典、老可以履行的手續，此“占”應當作“申報”解。因為里典、老並沒有為質的權力，他們祇負責將相關的情況上報到鄉一級行政單位所在的市亭，由市亭來“質”。祇有在交易無需質諸鄉的情況下，如“賣半牛半馬”或其他小型交易，典、老在室舍中所充當的角色與市亭中的市吏纔無差別。

1415 簡起首“黔首賣馬牛勿獻廷”一句，整理小組沒有給出注釋，祇是隨釋文將“獻”注為“讞”的通假字。“獻”有進獻之義，凡身份較低者向身份高貴者輸送財物都可稱作“獻”，律文中顯然不可以此義解。“讞”指請求上級審理疑難案件，《漢書·景帝紀》：“獄疑者讞有司”，<sup>③</sup>《後漢書·孔融列傳》：“郡縣疑不能決，乃上讞之。”<sup>④</sup>“讞”或可由此引申出向上報告之義。“黔首賣馬牛勿獻廷”或可理解為黔首出售牛馬不必事先請示縣廷，祇需要質諸市亭即可。後文“黔首賣奴婢(婢)馬牛及買者，各出廿二錢以質市亭”可以極好地佐證此論斷。“廷”乃“縣廷”之省稱，秦律中習見，如《秦律十八種·倉律》：“禾、芻稾積索(索)出日，上贏不備縣廷。出之未索(索)而已備者，言縣廷，廷令長吏雜封其廩，與出之，輒上數廷；其少，欲

① 李學勤主編：《十三經注疏·周禮注疏》，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789 頁。

② 陳松長主編：《嶽麓書院藏秦簡(肆)》，170 頁。

③ 《漢書》卷五《景帝紀》，150 頁。

④ 《後漢書》卷七〇《孔融列傳》，2262 頁。

一縣之，可毆(也)”。<sup>①</sup>律文中兩處“廷”顯然是指“縣廷”。

從 1415 組《金布律》可知，賣牛馬它縣、它鄉以及關外，則需要縣批發“傳”文書，主事官吏祇有見到“傳”文書之後纔可“爲質”。此舉大約是爲了打擊非法盜賣馬牛，漢初《二年律令·津關令》中亦規定馬匹出關需要“傳”。<sup>②</sup>“傳”即通行證，《漢書·宣帝紀》本始四年(前 70)，“民以車船載穀入關者，得毋用傳”，師古注：“傳，符也。”<sup>③</sup>《釋名·釋書契》：“傳，轉也，轉移所在，執以爲信也。亦曰過所，過所至關津以示之也。”<sup>④</sup>傳又有公務用傳和私事用傳之分，“私事用傳是因私事出行持用的通行證，有一定的申請報批程式：出行者首先必須向所在鄉提出申請，經鄉政府審核通過，然後報請所在縣批轉發放。私傳須蓋有縣令、丞或相當等級的官印才有效”。<sup>⑤</sup>《金布律》中所見“傳”當是私事用傳。符傳是有效掌控流動入口的工具之一，秦國很早就使用之，如《法律答問》云“詣符傳於吏是謂‘布吏’”。<sup>⑥</sup>

秦律嚴懲不依法爲質的行爲，“虛質毋出錢、過旬不質，貲吏主者一甲，而以不質律論”，“而”表遞進，不僅僅要貲罰一甲，又要因“不質”而按律處理。至於“不質”該如何處理，律文沒有明說。從 1226 號簡文可推測對“不質”的懲處不會很輕。1226 號簡的大致內容爲：典、老知曉有人盜買馬、牛、奴婢而替他“占質”，將黥爲城旦。在秦代的刑罰體系中，黥爲城旦春是僅次於死刑的重刑，多用懲罰影響極壞的惡性案件製造者，如“擅殺子”“毆大父母”，故意以箴(針)、鉢、錐傷人等，都要黥爲城旦春<sup>⑦</sup>。可見，秦律對不依法爲質和盜賣大宗物品的打擊力度是很大的。這是因爲牛、馬、奴婢在當時社會生活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是比較貴重的財產。

### 三 秦漢《金布律》比較研究

嶽麓秦簡《金布律》中有一則與《秦律十八種·關市律》和《二年律令·金布律》內容十分相近的律條。這則律文已被學者們注意到，並對它進行了較爲深入的研究，然仍有可以探討的空間，茲依律文抄寫年代先後將其摘錄於下：

《秦律十八種·關市律》：爲作務及官府市，受錢必輒入其錢鉅中，令市者見其入，不

① 睡虎地秦墓竹簡整理小組：《睡虎地秦墓竹簡》，27 頁。

② 參《二年律令·津關令》第十二則令文，見張家山二四七號漢墓竹簡整理小組《張家山漢墓竹簡[二四七號墓]（釋文修訂本）》，86 頁。

③ 《漢書》卷八《宣帝紀》，245 頁。

④ [漢]劉熙撰，[清]畢沅疏證，[清]王先謙補：《釋名疏證補》卷六《釋書契》，北京：中華書局，2008，205 頁。

⑤ 李均明：《秦漢簡牘文書分類輯解》，北京：文物出版社，2009，68 頁。

⑥ 睡虎地秦墓竹簡整理小組：《睡虎地秦墓竹簡》，137 頁。

⑦ 睡虎地秦墓竹簡整理小組：《睡虎地秦墓竹簡》，109、111、113 頁。



從令者貲一甲。關市<sup>①</sup>

嶽麓秦簡：1411·金布律曰：官府爲作務、市受錢，及受齋、租、質、它稍入錢，皆官爲鈔，謹爲鈔空（孔），嬰（須）毋令錢 1399 能出，以令若丞印封鈔而入，與入錢者參（叁）辨券之，輒入錢鈔中，令入錢者見其入。月壹輸 1403 鈔錢，及上券中辨其縣廷，月未盡而鈔盈者，輒輸之，不如律，貲一甲。<sup>②</sup>

《二年律令·金布律》：官爲作務、市及受租、質錢，皆爲鈔，封以令、丞印而入，與參辨券之，輒入錢鈔中，上中辨其廷。質者勿與券。租、質、戶賦、園池入錢縣道官，勿敢擅用，三月壹上見金、錢數二千石官，二千石官上丞相、御史。<sup>③</sup>

通過比較三則律文，不難知曉其必有前後承繼關係，但又并非一字不落的全盤承襲，而是有所訂補。這其中有幾個問題尤其值得關注。首先是內容相似的律條爲何會分別出現在時代有先後的《關市律》和《金布律》之中。陳松長先生認爲睡虎地秦簡中僅存的一則《關市律》，“其實應該是‘金布律’的內容，其所以題署爲‘關市’，很可能是抄手誤記所至。”<sup>④</sup>陳松長先生的判斷是有可能的，但筆者認爲尚有其他可能性。產生時代一致、內容相同或相似的法律條文有可能分別位於不同的律篇之下，如：

《效律》：入禾，萬石一積而比黎之爲戶，及籍之曰：“某廩禾若干石，倉嗇夫某、佐某、史某、稟人某。”是縣入之，縣嗇夫若丞及倉、鄉相雜以封印之，而遺倉嗇夫及離邑倉佐主稟者各一戶，以氣（飭）人。其出禾，有（又）書其出者，如入禾然。嗇夫免而效，效者見其封及隄（題）以效之，勿度縣，唯倉所自封印是度縣。終歲而爲出凡曰：“某廩出禾若干石，其餘若干石。”<sup>⑤</sup>

《秦律十八種·倉律》：入禾倉，萬石一積而比黎之爲戶。縣嗇夫若丞及倉、鄉相雜以印之，而遺倉嗇夫及離邑倉佐主稟者各一戶以氣（飭），自封印，皆輒出，余之索而更爲發戶。嗇夫免，效者發，見雜封者，以隄（題）效之，而復雜封之，勿度縣，唯倉自封印者是度縣……<sup>⑥</sup>

筆者認爲對於內容相近而歸屬不一的律文，如果二者時代不一，可能是後來修訂時對其進行了調整；如果二者處於同一時代，也未必是誤抄所致。文獻學中有一個術語叫“互著”，指的

① 睡虎地秦墓竹簡整理小組：《睡虎地秦墓竹簡》，42 頁。

② 陳松長主編：《嶽麓書院藏秦簡（肆）》，108 頁。

③ 張家山二四七號漢墓竹簡整理小組：《張家山漢墓竹簡〔二四七號墓〕（釋文修訂本）》，67 頁。

④ 陳松長：《睡虎地秦簡“關市律”辨證》，《史學集刊》2010 年第 4 期。

⑤ 睡虎地秦墓竹簡整理小組：《睡虎地秦墓竹簡》，73 頁。

⑥ 睡虎地秦墓竹簡整理小組：《睡虎地秦墓竹簡》，25 頁。上面所引用的律文均出自《睡虎地秦墓竹簡》一書，用着重號標注的爲內容相同或相似部分。



是同一部典籍分別著錄於不同的門類之下，章學誠在《文史通義》中指出：

《七略》於兵書權謀家有《伊尹》《太公》《管子》《荀卿子》（自注：《漢書》作《孫卿子》）《鶡冠子》《蘇子》《蒯通》《陸賈》《淮南王》九家之書，而儒家復有《荀卿子》《陸賈》二家之書，道家復有《伊尹》《太公》《管子》《鶡冠子》四家之書，縱橫家復有《蘇子》《蒯通》二家之書，雜家復有《淮南王》一家之書；兵書技巧家有《墨子》，而墨家復有《墨子》之書。<sup>①</sup>

劉向、劉歆父子在整理漢代典籍時所採納的“互著”之法，其實在秦漢律條的編纂過程中早就運用過，內容相同相近的律條被分別編入不同律篇之下。這是由於各個部門職能有交叉所致，《效律》是關於核查案驗官有財物的律條，而《倉律》是關於官有糧草儲存、出入的律條，官有糧草需不時核查，故類似內容的律文會同時出現在《效律》和《倉律》中。同樣的道理，《關市律》與《金布律》也有交叉之處，均要涉及官府所得金錢如何處理問題，將官府所得金錢入鈔，其時當為常例。

當然，這也有另外一種可能性：由於嶽麓秦簡抄纂時代晚於睡虎地秦簡，而律條會不時進行修訂、調整和增刪，之前的律條會被調整到其他律篇之下。

至於上面引述嶽麓秦簡《金布律》與《二年律令·金布律》之間的異同也是顯而易見的，後者承襲前者之痕迹是十分明顯的，這是“漢承秦律”的絕好證據。同時，漢律較秦律文字更為精煉，這或與漢初整個社會氛圍以及訂律者理念有關係。然又并非完全雷同，有幾處明顯的差异是需要討論的。

其一，嶽麓秦簡《金布律》規定需要入鈔的錢有作務錢、市錢、齋、租、質所得，以及“它稍入錢”，《二年律令·金布律》却少了“齋”和“它稍入錢”。出現這種情況有兩種可能，一是漢官方對秦律進行了修訂，故律文會出現差異；二是抄寫者并非如實完整地謄抄律條，而是節錄了大概。筆者認為就此則律文而言，後一種可能性更大。齋錢指那些因損毀官有物資而償還的錢，《周禮·春官·巾車》：“毀折入齋於職幣”，鄭玄注引“杜子春云：‘齋，讀為資。資謂財也。乘官車毀折者，入財以償繕治之直。’”<sup>②</sup>《秦律十八種·工律》：“其久靡不可智（知）者，令齋賞（償）”。<sup>③</sup> 睡虎地 77 號漢墓有《齋律》，此墓年代略晚於張家山 247 號。既然漢代有專門的律類來規範官有物資賠償問題，齋錢作為官有收入之一，理應入鈔，漢律原本應該有齋錢入鈔的內容，祇是被抄寫者漏失。又“稍入錢”為秦漢時期政府收入構成之一，<sup>④</sup>關於

① 章學誠著，葉瑛校注：《文史通義校注·校讎通義》，北京：中華書局，1985，966 頁。

② 李學勤主編：《十三經注疏·周禮注疏》，726 頁。

③ 睡虎地秦墓竹簡整理小組：《睡虎地秦墓竹簡》，45 頁。

④ 關於“稍入”“稍入錢”，學者們有不同意見，李力先生進行過極好的評述，詳參李力《關於秦漢簡牘所見“稍入錢”一詞的討論》，《國學學刊》2015 年第 4 期。

“稍入”“稍入錢”的材料屢見於秦漢簡牘之中，如里耶秦簡載“稍入不能自給卅六年徒□□”（8-427），<sup>①</sup>居延新簡有“稍入簿”（EPT5.124A）“□□稍入錢出入簿”（EPT5.124B）“□□出稍入錢市社具□”（EPT54.22B）。<sup>②</sup>又《漢書·溝洫志》載“久之，河東渠田廢，予越人，令少府以爲稍入”，顏師古注：“稍，漸也。其入未多，故謂之稍也。”<sup>③</sup>既然稍入錢是政府財政收入的一部分，漢初《金布律》中也應該有相關條文規定其如何管理和使用。我們懷疑是抄寫者漏抄了這部分內容。

負責抄錄《二年律令·金布律》的書手比較馬虎，常將內容有別、甚至毫不相干的東西抄錄在一枚簡上，例如：

質者勿與券。租、質、戶賦、園池入錢<sub>四二九</sub>縣道官，勿敢擅用，三月壹上見金、錢數二千石官，二千石官上丞相、御史。不幸流，或能產拯一人，購金二兩；拯死者，購一兩；不智（知）何人<sub>四三〇</sub>

縣官器敝不可繕者，賣之。諸收人，皆入以爲隸臣妾。<sub>四三五</sub>

有贖買其親者，以爲庶人，勿得奴婢。諸私爲鹵（鹵）鹽，煮濟、漢，及有私鹽井煮者，稅之，縣官取一，主取五。<sub>四三六</sub><sup>④</sup>

《二年律令·金布律》祇有 10 則律文，上面徵引的 3 則或沒有及時換行，或有其他律篇內容竄入。四三〇簡從“縣道官”到“御史”與四二九簡內容相關，可以極好的繫聯到一起；然從“不幸流”開始，講購賞之規定，與前文內容似關聯不大，書手在抄完“御史”二字之後，理應再取一支簡謄寫下一則律文。或是因爲購賞與金錢有關，本屬於《金布律》，書手懶得換簡，故將兩則律文抄在同一支簡上。

四三五和四三六簡上前後內容完全不搭，顯然是將本屬於其他律篇的條文誤抄到《金布律》中。“諸收人，皆入以爲隸臣妾”，更像是《收律》中的條文。“有贖買其親者，以爲庶人，勿得奴婢”，據內容，不當入《金布律》，相似內容的律文見於睡虎地秦簡《司空律》：

百姓有母及同姓（生）爲隸妾，非適（謫）罪毆（也）而欲爲冗邊五歲，毋賞（償）興日，以免一人爲庶人，許之。·或贖遷（遷），欲入錢者，日八錢。司空<sup>⑤</sup>

摘錄不當在《二年律令》中并非孤例，一則可以在里耶秦簡中找到對應律文的《田律》亦可證

① 陳偉主編：《里耶秦簡牘校釋（第一卷）》，146 頁。

② 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甘肅省博物館、文化部古文獻研究室、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居延新簡——甲渠候官與第四燧》，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25，302 頁。

③ 《漢書》卷二九《溝洫志》，1680-1681 頁。

④ 張家山二四七號漢墓竹簡整理小組：《張家山漢墓竹簡〔二四七號墓〕（釋文修訂本）》，67、68 頁。

⑤ 睡虎地秦墓竹簡整理小組：《睡虎地秦墓竹簡》，54 頁。

明之：

《二年律令·田律》：縣道已𡔷(墾)田，上其數二千石官，以戶數嬰之，毋出五月望。<sup>①</sup>

里耶秦簡：律曰：已𡔷(墾)田，輒上其數及戶數。戶嬰之。(9-39)<sup>②</sup>

顯而易見，《二年律令·田律》是承襲秦律而成。秦律“上其數及戶數”，在《二年律令·田律》中變成“上其數”，漏抄了“戶數”，而後文“以戶數嬰之”之“數”又顯然是衍文。“戶嬰”乃固定搭配，里耶秦簡8-1519有“戶嬰四石四斗五升”，<sup>③</sup>即遷陵縣卅五年平均每戶應繳納的田租數。“數及戶數”是絕對不能統稱為“數”的，前一個“數”表示墾田的畝數，後面的“戶數”之“數”指名數，這是兩個完全不同的概念；且祇有同時知曉田畝數和戶籍名數，才能做到“戶嬰”之。

其二，《二年律令·金布律》“上中辨其廷”之後緊接“質者勿與券”，而對嶽麓秦簡《金布律》“月未盡而鈔盈者，輒輸之，不如律，貲一甲”一段完全沒有摘錄。這就會產生如下問題：(1)大家知道錢應該入鈔，鈔滿以後該怎麼辦却不得而知。筆者依然相信漢律修訂者定不會刪除“月未盡”之後的文字。此種誤會，乃律文抄錄者造成。(2)“質者勿與券”的理解問題。律文前面提到“質錢”，此處“質者”祇能理解為“質錢者”的省稱。上文已經論證，秦漢“質錢”乃官府對大宗物品交易徵收的一種稅金，交易達成時必須以帛立下“質”文書，買賣雙方和官府各持一份，以此保證貿易的有效性、防止不公平現象產生。“質者勿與券”很可能是“質者與券”之訛，“勿”疑為衍文。

綜上可知，由於今天所見到的法律簡並非當時官府使用的律令原本，而是摘錄本，而在摘錄律文時往往取其大概，常常會漏失甚至誤抄一些重要的信息。因此，我們在使用這些材料時，必須先加以仔細考辨。尤其在碰到時代相近而內容同中有異的材料時，不能輕易相互否定，而要多思考差異產生的緣由，然後進行取捨。

“漢承秦律”並非一成不變，如嶽麓秦簡和張家山漢簡《金布律》均有關於丟失、損毀官有財物將如何處理的條款，面對相同的事件，秦漢律的處置却極為不同。現將律文移錄於下：

嶽麓秦簡：1402 金布律曰：諸亡縣官器者，必獄治，臧(贓)不盈百廿錢，其官自治，

① 張家山二四七號漢墓竹簡整理小組：《張家山漢墓竹簡[二四七號墓](釋文修訂本)》，42頁。

② 鄭曙斌、張春龍、宋少華、黃朴華編著：《湖南出土簡牘選編》，長沙：嶽麓書社，2013，102頁；個別字詞釋讀和句讀參照游逸飛、陳弘音《里耶秦簡博物館藏第九層簡牘釋文校釋》，簡帛網，2013年12月22日。

③ 陳偉主編：《里耶秦簡牘校釋(第一卷)》，345頁；同書347頁認為“嬰”可引申為折合、計算。

勿獄。<sup>①</sup>

張家山漢簡：亡、毀、傷縣官器財物，令以平賈（價）償。入毀傷縣官，賈（價）以減償。<sup>②</sup>

秦律規定丟失縣官器，價值超過百二十錢者“必獄治”，而漢律祇需按價賠償，甚至歸還損壞之物可以抵消部分賠償。就公物賠償這一點，秦律的確比漢律嚴厲得多。所謂“獄治”即立案偵訊，由專門掌管獄案的官署治其罪。“獄治”與“自治”相對成文，“自治”相當於內部處理。需“獄治”之事，情節一般較為嚴重，《為獄等狀四種》案例十四“學為偽書案”中，學冒充馮毋擇兒子癸，偽造書信被羈押，後又矯為私書，胡陽丞贈揭發其偽，並請求胡陽縣“即獄治求請（情）”。<sup>③</sup> 里耶秦簡 8-1562 號文書載尉史文詈罵小史適，又用舟楫趕跑啓陵鄉守趙，且以言語辱罵趙，趙向遷陵縣報告，“謁上獄治”。<sup>④</sup> 偽造文書和毆打辱罵官員均為重罪，故要“獄治”。秦律規定丟失縣官器，價值超過百二十錢者“必獄治”，可見其對公產之重視程度。

由上可知，漢律確有較秦律寬緩之處，這或是漢初統治者之前深受秦法嚴酷之苦，加之處於休養生息期，法律不得不放寬鬆之故。

① 陳松長主編：《嶽麓書院藏秦簡（肆）》，106 頁。

② 張家山二四七號漢墓竹簡整理小組：《張家山漢墓竹簡〔二四七號墓〕（釋文修訂本）》，68 頁。

③ 朱漢民、陳松長主編：《嶽麓書院藏秦簡（叁）》，上海辭書出版社，2013，223 頁。

④ 陳偉主編：《里耶秦簡牘校釋（第一卷）》，359-360 頁。

## 張家山漢簡《二年律令·秩律》編連商兌(續)

北京大學歷史學系 郭洪伯

**內容提要** 張家山漢簡《二年律令·秩律》465 簡與 466 簡直接相連會造成條文內容自相矛盾,其間應有缺簡;缺失部分有“秩各四百石”以及對應三百石的“它縣邑道”字樣。完全分裂為兩截的 467 簡應為兩支簡的殘片。所謂 467 簡的後半應在 465 簡之前,但中間存在缺失;所謂 467 簡的前半應在 466 簡之後,中間也存在缺失。當時漢朝所轄縣邑道與都官的名目並沒有以窮舉的形式列於《秩律》。

**關鍵詞** 張家山漢簡 《二年律令·秩律》 編連

張家山二四七號漢墓所出《二年律令·秩律》,對研究西漢時期官僚制度而言是非常重要的材料。但竹簡出土時已經嚴重散亂,整理編排難免出現“錯簡”。我先前已就涉及千石長吏的 442、443、444、468 簡進行了重新編排<sup>①</sup>,仍有未盡之處。465、466、467 三支簡的編連也值得商榷(釋文採用武大本):

陰平道,甸氏道,縣遞道,湍氏道長,秩各五百石,丞、尉三百石。太醫、祝長及它都官長,黃鄉長,萬年邑長,長安廚 465 長,秩各三百石,有丞、尉者二百石,鄉部百六十石。未央宦者宦者監僕射,未央永巷永巷監,長信宦者中監,長信永巷永巷 466

□室僕射,室僕射,太官·未央食官食監,長信食□宕三楊關,長信詹事私官長,詹事

<sup>①</sup> 郭洪伯:《張家山漢簡〈二年律令·秩律〉編連商兌》,卜憲群、楊振紅主編《簡帛研究二〇一二》,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3,92 頁。

祠祀長,詹事廐長,月氏 467<sup>①</sup>

按原先的編排,465 簡與 466 簡為完全銜接的條文內容,467 簡無所屬。表面上看似乎沒什麼問題,細究却有不和諧之處。

將 465 簡與 466 簡直接相連,五百石長與三百石長之間沒有“四百石長”,令人生疑。再看其中一段話:

太醫、祝長及它都官長,黃鄉長,萬年邑長,長安廚長,秩各三百石

都官是秦漢時期與縣平級的機構,多屬諸卿<sup>②</sup>,詳細名目可參看《漢書·百官公卿表》。“長安廚”就是都官之一,漢初由內史府統轄<sup>③</sup>。長安廚長之前的“它都官長”是收尾性質的用詞,將當時存在但《秩律》至此尚未枚舉列出的都官長“一言以蔽之”,其後不應也沒必要再出現都官長。“長安廚”後面應為其他文字,按《效律》:

縣道官令長及官無長而有丞者即免、徙,二千石官遣都吏效代者。348<sup>④</sup>

這裏提到“官無長而有丞”,說明有些機構直接以丞為首長。儘管“長安廚長”導致律文自相矛盾,“長安廚丞”卻不會。而且在沒有長的情況下,丞的秩級無法以“有丞尉者”形式附於長的秩級之後,必須單列。因此,“長安廚丞”既符合當時的規定,也能化解條文的矛盾。“長安廚丞”作為(長安廚)都官事實上的首長,與黃鄉、萬年兩個縣邑首長并列,類似《秩律》其他條款中縣道邑與都官并列的情況。

既然“長安廚”後面應該接“丞”,則意味着 466 簡不應直接與 465 簡相連,兩者之間存在缺失。而缺失的部分應該有“秩各四百石,有丞尉者半之”<sup>⑤</sup>,亦即“它都官長”與長安廚丞實為四百石而非三百石,《秩律》原本不缺少四百石的部分。同時這也意味着“秩各三百石,有丞尉者二百石,鄉部百六十石”對應的具體內容完全缺失。接下來考慮缺失部分包含何種內容。

首先是和長安廚丞類似作為都官首長的“都官丞”,四百石或三百石;其次,縣與都官平級,既然存在收尾性質的“它都官長”,也應有收尾性質的“它縣邑道長”以概括先前條文中

① 彭浩、陳偉、工藤元男主編:《二年律令與奏讞書:張家山二四七號漢墓出土法律文獻釋讀》,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290、291 頁。

② 于振波:《漢代的都官與離官》,李學勤、謝桂華主編《簡帛研究二〇〇二、二〇〇三》,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5,223 頁。又見高恒《秦漢簡牘中法制文書輯考》,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8,54-55 頁。

③ 《漢書》卷一九上《百官公卿表上》,北京:中華書局,1962,736 頁。

④ 彭浩、陳偉、工藤元男主編:《二年律令與奏讞書:張家山二四七號漢墓出土法律文獻釋讀》,228 頁。

⑤ 所謂“有丞尉者云云”是一種表示“如果有丞尉則如何”的說法。比如《秩律》六百石條目附帶“有丞尉者半之”字樣,但六百石條目中的長信詹事丞與詹事丞都是二千石機構的丞,不可能再有“丞的丞”,“有丞尉者半之”不適用於長信詹事丞或詹事丞。類似地“有丞尉者半之”也不適用於四百石的長安廚丞,僅適用於長。



沒有枚舉的縣、邑、道，對應三百石。值得注意的是，根據《興律》，後世稱作侯國的縣級行政機構在當時的正式名稱爲“徹侯邑”<sup>①</sup>。除少數重要功臣，絕大部分徹侯所食戶數寡少，規模約爲一鄉，不及萬年邑與黃鄉，“徹侯邑長”秩三百石完全合理。以此結合《秩律》前面出現過的平陽、絳、鄴、潁陰、舞陽、汝陰等知名功臣徹侯邑，《秩律》應包含所有漢朝境內徹侯邑的長吏。

解決 465 簡與 466 簡的問題之後，再看 467 簡。466 簡後半出現的“監”“僕射”都是宮中特有的職位，與 467 簡開頭的內容類似，整理者或許是基於此給 467 簡編號（但沒有直接編連）。不過轉到 467 簡的後半再次不和諧：這裏的若干“長”皆屬於“都官長”，由於 465 簡已經有收尾性質的概括，這些“長”不應出現在 465 簡之後，也與 467 簡前半的內容不搭調。“月氏”在漢代有兩種含義：其一是西方部族政權，其二是《漢書·地理志》屬安定郡的道<sup>②</sup>。鑒於《秩律》很多條款將縣道邑與都官相提並論，則這裏出現的“月氏”祇能是“月氏道”。而 465 簡的開頭恰恰是四個“道長”，與“月氏道”屬於同類。從都官與道兩方面來看，467 簡後半的內容應在 465 簡之前。

前面指出 465 簡和 466 簡雖然不能直接相連，但順序沒問題（祇是中間缺簡）。然而 467 簡前半在 466 簡之後、後半在 465 簡之前，導致三支簡“循環”。問題還出在 467 簡。根據圖版，所謂 467 簡是中間斷開不能綴連的兩截，總長也不够一支完整簡<sup>③</sup>。儘管將兩截視爲一支簡會造成“循環”，但視爲兩支簡即可化解矛盾。

考慮缺簡的情況下，按 467 簡後半、465 簡、466 簡、467 簡前半的順序排列但不直接相連，可以解決所有條文的不和諧之處：

□宕三楊關，長信詹事私官長，詹事祠祀長，詹事廐長，月氏 467-2

〔道……〕

陰平道，甸氏道，縣遞道，湍氏道長，秩各五百石，丞、尉三百石。太醫、祝長及它都官長，黃鄉長，萬年邑長，長安廚 465

〔丞……秩各四百石，有丞、尉者半之。〕

〔……及它縣邑道〕

長，秩各三百石，有丞、尉者二百石，鄉部百六十石。未央宦者宦者監僕射，未央永巷永巷監，長信宦者中監，長信永巷永巷 466

① 彭浩、陳偉、王藤元男主編：《二年律令與奏讞書：張家山二四七號漢墓出土法律文獻釋讀》，242 頁。

② 《漢書》卷二八下《地理志下》，1615 頁。漢初無安定郡，或屬北地郡。

③ 彭浩、陳偉、王藤元男主編：《二年律令與奏讞書：張家山二四七號漢墓出土法律文獻釋讀》，49 頁。

[ 監…… ]

□室僕射,室僕射,太官·未央食官食監,長信食 467-1

[ 官食監…… ]

這裏用“[ ]”標注缺失部分。由此不難看出,《秩律》不會窮舉所有當時有秩的職位。某種職位没有被《秩律》枚舉,不能簡單地等同於該職位在《秩律》上“没有”,還需要進一步結合其他信息判斷。比如關東縣的戶口數量有多有少(與漢朝縣一樣),其首長不可能概括為某一個秩級的“它縣邑道長”,再加上《秩律》各處都見不到關東縣令長,可以推論關東縣長吏不存於《秩律》,不由漢朝署置;又如有《秩律》之外的條文提示當時稱作“宦皇帝者”的郎、大夫之類祇能“比照若干石”,再結合《秩律》具體內容,可以推論《秩律》中没有“宦皇帝者”。徹侯邑的戶口則普遍偏少,其行政首長大多可以概括為三百石的“它縣邑道長”,即使《秩律》不枚舉也不能認為其中没有徹侯邑。根據《秩律》考察漢初官僚制度與政區地理時,還需要綜合多種因素。

## 說張家山漢簡《二年律令·秩律》 的編聯及其相關問題\*

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  
出土文獻與中國古代文明研究協同創新中心

周波

**內容提要** 張家山漢簡《二年律令·秩律》幾枚單列竹簡的編聯是有疑問的。郭洪伯將原單列的簡 468 與簡 444 連讀,編聯於簡 442 之後,其說可從。而通過進一步分析可知,新近公布的一枚散簡 X4 屬於《秩律》,應編聯在《秩律》簡 466 之後。此外,原單列的簡 445、簡 446、簡 467 亦應重新調整,簡 445 應編聯於簡 450 之後,簡 446 應編聯於簡 464 之後,簡 467 應編聯於簡 465 之前。

**關鍵詞** 張家山漢簡 《二年律令·秩律》 編聯 考釋

張家山漢簡《二年律令·秩律》原整理者釋文共分為十二條律文:簡 440 至簡 441 為一條;簡 442 為一條;簡 443 至簡 444 為一條;簡 445、簡 446 分別為一條;簡 447 至簡 450 為一條;簡 451 至簡 460 為一條;簡 465 至簡 466 為一條;簡 467、簡 468 分別為一條;簡 469 至 470 為一條;簡 471 至簡 472 為一條;標題簡《秩律》則為單簡抄寫,屬最末。原整理者將上述律文按官秩等級由高至低為序編排,從簡文內容及竹簡位置來看,這一總體編排方案應大致可行。

\* 本文寫作得到 2016 年度上海市哲學社會科學規劃課題“戰國至秦漢時代漆木器文字的搜集、整理與研究”(批准號 2016BYY008)、2015 年度上海市教育委員會科研創新項目“新出秦漢郡、縣資料的整理與研究”(批准號 15ZS005)支持。

《張家山漢墓竹簡(二四七號墓)》“前言”云:“從殘存的竹編可知,竹簡原置於竹筩中。由於受到淤泥及其他文物的擠壓,竹簡已有損壞,卷束已散開,並有不同程度的移動。從竹簡的堆積狀況可以判斷,各種書籍是各自成卷,然後堆放在一起的……整理時參照竹簡堆積情況,按竹簡形制、字體和簡文內容分篇、繫聯,也祇能恢復該書的大致編聯次序。”“凡例”中又云:“竹簡在墓中已散亂,在整理過程中,盡可能將已折斷的簡綴合復原,並根據文句銜接情況和出土位置編排。不能這樣確定編排次序的,按內容性質試排。”上述幾枚單列的竹簡應當就屬於整理者所說的“按內容性質試排(就《秩律》來說主要是以秩級為參照)”者。

張家山漢簡各種書籍是整卷書寫並且編聯成冊而存放於竹筩的,因此所入藏的各卷皆應視為完本。<sup>①</sup>此外,全部竹簡皆經考古工作者的科學發掘,其保存位置亦集中,竹簡遺失的可能性不是沒有,但總數目應相對較少。從已整理的《二年律令》所保留的律令名及其律令內容來看,也可以側證上述說法。張家山漢簡原整理者彭浩先生指出:“張家山漢墓《二年律令》現存律名二十七種,令一種。其中的《津關令》因體例不同,很容易與律文區分開來。各種律名都單獨書寫在一枚竹簡上,與相關的律文簡失去聯繫,加之律文簡在墓葬中無規律的位移、殘斷、朽爛等原因,竹簡的繫連已非原貌。恢復律文原有的分類和編連次序,對於準確地理解漢律,進行深入研究無疑是一項十分重要的基礎工作。隨着研究的開展,已有學者指出,《張家山漢墓竹簡(二四七號墓)》對律令的分類和編連尚有若干不足。”<sup>②</sup>已經指出了現有編聯問題所產生的一些原因。綜合學者們已有的研究和我們的考察,目前《二年律令》尚有少部分竹簡無法編聯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幾點:一、竹簡在埋藏時及發掘、揭取時已有毀折殘損。二、部分竹簡分類不當。三、部分律文為單條書寫,難以從其內容確定其邏輯上的先後順序。

就《秩律》來說,此篇律文文意完整,邏輯清晰,個別竹簡亦可重新拼綴、<sup>③</sup>編聯。我們認為,《秩律》的編聯問題應主要從律文本身的內容和邏輯聯繫入手解決。在這一方面,郭洪伯先生《張家山漢簡〈二年律令·秩律〉編聯商兌》一文已經做了比較好的工作。

原整理者所編聯《秩律》律文中簡 443—444 是關於千石縣及兩千石屬官秩級的規定。其釋文如下:<sup>④</sup>

① 完本非全本。有研究者認為《二年律令》為摘錄本。但所錄各條律文本身首尾應是完整的。

② 彭浩:《談二年律令中幾種律的分類與編連》,《出土文獻研究》第 6 輯,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61 頁。

③ 《張家山漢墓竹簡》圖版 125 頁所附竹簡殘片中第 5 列第 3 段殘簡屬《秩律》。此殘簡應拼合在簡 447 中段左側,從而可將相關文字補齊作“胸忍、鄴、資中、閭中”。參王元鈞《張家山漢墓殘簡綴合五例》,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2011 年 3 月 14 日。

④ 參彭浩、陳偉、王藤元男主編《二年律令與奏讞書——張家山二四七號漢墓出土法律文獻釋讀》,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260 頁。又簡 444“二千石”後一字原釋為“尉”,此從游逸飛先生改釋為“官”。參游逸飛《張家山漢簡〈二年律令·秩律〉所見郡吏補考》,《出土文獻研究》第 12 輯,上海:中西書局,2013,262—263 頁。

櫟陽、長安、頻陽、臨晉、成都、□、雒、雒陽、鄴、雲中、□、高(?)□□□、新豐、槐里、雍、好畤、沛、郃陽、郎中<sup>443</sup>司馬，衛〈衛〉尉司馬，秩各千石，丞四百石。·丞相長史正、監，衛〈衛〉將軍長史，秩各八百石。二千石官丞六百石。<sup>444</sup>

郭先生撰文指出，上述兩簡的編聯方案是存在問題的。<sup>①</sup> 原因主要有兩點：一、千石的“郎中司馬”於史無徵。《漢書·百官公卿表》“郎中令”下與“郎中”有關的高級官員皆有明確記載，沒有“郎中司馬”的跡象。二、令秩八百石和六百石的縣道“有丞、尉者半之”，令秩千石的縣道也應如此，而簡 444 祇提到“丞四百石”，却未提“尉”，不合體例，也與京縣等必設縣尉的史實不合。而“秩各千石，有丞、尉者半之”見於簡 442。又令秩八百石和六百石的律文在“有丞、尉者半之”之後接有“田、鄉部二百石”云云，簡 442 既然以“有丞、尉者半之”結尾，其後也應如此。

他認為相關簡文可重排如下(此處釋文據郭文)：

櫟陽、長安、頻陽、臨晉、成都、□、雒、雒陽、鄴、雲中、□、高(?)□□□、新豐、槐里、雍、好畤、沛、郃陽、郎中<sup>443</sup>(……中間或缺簡……)□□，長信將行、中傳，長信謁者令，□大僕，秩各千石，有丞、尉者半之。<sup>442</sup>

田、鄉部二百石，司空二百五十石。中司馬，郡司馬，騎司馬，中輕車司馬，備盜賊，關中司馬□□關司<sup>468</sup>司馬，衛尉司馬，秩各千石，丞四百石。·丞相長史正、監，衛將軍長史，秩各八百石。二千石□丞六百石。<sup>444</sup>

郭先生將簡 442 編聯於簡 443 之後，又將原先單列的簡 468 與簡 444 連讀，編聯於簡 442 之後，均歸屬於千石秩條。<sup>②</sup> 如此編聯，前述千石縣無其所屬的尉及司空、田、鄉部等問題可得到合理的解決，從簡文內容來看，要優於原整理者的編聯方案。我們也信從此說。不過，郭先生的文章所涉諸簡在編聯、考釋、文意理解等方面似仍遺留有一些問題，值得進一步討論。



簡 443“雲中”之後，“新豐”之前的文字，原整理者釋文作“□□□□□”。《二年律令與奏讞書——張家山二四七號漢墓出土法律文獻釋讀》(下簡稱爲《二年律令與奏讞書》)釋文作“□、高(?)□□□”。其校釋云：“原釋文作‘□□□□□’。第二字疑爲‘高’。末字紅外線影像右從‘邑’旁。”




晏昌貴先生曾指出，《秩律》中的縣名排列是有規律的，即各縣等均以内史屬縣開始，從西北始，又以西北終，形成拱衛內史的格局。他還認為，“雲中下缺 5 字，從排列規律看，必爲

① 郭洪伯：《張家山漢簡〈二年律令·秩律〉編連商兌》，卜憲群、楊振紅主編《簡帛研究二〇一二》，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3，90-93 頁。

② 游逸飛先生指出簡 444 標識符“·”及其後文字應爲另一條律文，可從；又認為此部分簡文應接於簡 440—441 之後，恐不可信。參游逸飛《張家山漢簡〈二年律令·秩律〉所見郡吏補考》，264-265 頁。

內史屬縣。”<sup>①</sup>我們認為晏先生總結的規律是可信的。下面就結合字形及排列規律，先對此處文字進行討論。

第二字紅外照片作，僅餘右部筆畫。《二年律令》簡 449“高”字圖版作，上字殘形與之正合，釋為“高”當無問題。後一字原未釋，據字形及辭例可定為“陵”字。《二年律令》簡 228“諸乘傳起長安之高陵、池陽、槐里，高陵、池陽、槐里之長[安]□”，<sup>②</sup>可以參看。“高陵”《漢書·地理志》屬左馮翊，漢初應為內史所轄，故城在今陝西省高陵縣西南。其地理位置重要，故其縣令秩次高，定為千石。

“高陵”下一字紅外照片作，僅餘右部筆畫。《二年律令》簡 289“享”字或作，睡虎地秦簡《為吏之道》簡 8“郭”字作，上字整體筆畫與“享”字或“享”旁相合。上字左从“享”旁，頗疑為“郭”之殘。相家巷秦封泥有“郭丞之印”，龐任隆先生認為“郭同號”，即號縣。<sup>③</sup>此說當可信。如果我們所釋不誤，“郭”也應讀為“號”。“號”《漢書·地理志》屬右扶風，漢初應屬內史。故城在今陝西省寶雞市號鎮。<sup>④</sup>

簡 443 末尾的“郎中”，郭先生文擬補作“郎中將”，認為其與《漢書·百官公卿表》郎中將秩比千石相合。據《漢書·百官公卿表》《史記·高祖功臣侯者年表》《史記·西南夷傳》等文獻，“郎中將”為“將千人”之軍官。若《秩律》千石秩確有“郎中將”，似應與簡 444“衛尉司馬”同抄一處，此為其疑點。《二年律令·津關令》有與“中大夫謁者”并稱之“郎中”。《津關令》簡 504：“□、相國上中大夫書，請中大夫謁者、郎中、執盾、執戟家在關外者，得私置馬關中。”又 513：“十五、相國、御史請郎騎家在關外，騎馬節（即）死，得買馬關中，人一匹以補。郎中為致告買所縣道，縣道官聽，為質（致）告居縣，受數而籍書。”原整理者於簡 504 下注云：“中大夫謁者、郎中、執盾、執戟，均屬郎中令。”《漢書·百官公卿表》郎中令屬官有“郎中”“中郎”等，秦印有“中郎監印”，則秦至漢初或應有“郎中監”一職（《秩律》下文有“丞相長史監”“御府監”“私府監”，可以參看）。<sup>⑤</sup>總之，這裏的“郎中”或“郎中……”應為郎中令屬官，秩千石。

簡 467 記載的是天子、太后、皇后系統諸中官、內官。原整理者將之單獨排列，附在三百

① 晏昌貴：《〈二年律令·秩律〉與漢初政區地理》，《歷史地理》第 21 輯，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47-48 頁。

② 此簡釋讀參游逸飛、周波《高陵、池陽、槐里——張家山漢簡〈二年律令·傳食律〉所見漢初長安驛傳路線》，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2013 年 3 月 20 日。

③ 龐任隆：《秦郡縣封泥的歷史地理學意義》附表，《文博》2009 年第 3 期。

④ 張莉先生《西漢呂后二年郡國政區面貌考》（簡帛網 2013 年 1 月 21 日）曾推測，簡 443 所缺內史轄縣應有“杜”“號”“郿”（參其所引釋文及注 9）。因筆者疏失，初稿未及引用該文，此承馬孟龍先生告知。






⑤ 此印多讀作“郎中監印”，王偉先生改讀作“中郎監印”。參王偉《秦璽印封泥職官地理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4，121 頁。



石秩條之後,這顯然是有問題的。從《秩律》簡文來看,八百石、六百石秩條有關中官、內官的簡文皆無缺簡,此簡似祇能歸屬於千石秩條或五百石秩條。若簡 467 記載的是千石官,則簡 467 可能應編聯於簡 443 之後,簡 442 之前。若此簡記載的是五百石官,則簡 467 可能應編聯於簡 465 之前。結合官秩及書寫情況等來看,我們傾向於後一種意見。其理由如下:一、《漢書·百官公卿表》詹事屬官有“中長秋、私府、永巷、倉、廐、祠祀、食官令長丞,諸宦官”。《秩律》中屬詹事之“詹事私府長”秩五百石,屬呂后長信詹事之“長信永巷”“長信倉”“長信祠祀”秩六百石。與前者相比較,簡 467 中屬詹事之“詹事廐長”“詹事祠祀長”以及屬呂后長信詹事之“長信食官”“長信詹事私官長”之秩級似不應相差太多。二、《漢舊儀》:“太官尚食,用黃金釭器;中官私官尚食,用白銀釭器,如祠廟器云。”“太官”為少府令屬官,已見《秩律》簡 461,秩六百石,其他系統之“太官”“私官”似不應高於此秩次。三、如此編聯,則五百石秩條、三百石秩條職官排列皆是以中官、內官——邑、道為序。

簡 467 起首處稍有殘斷,原釋文作“□室僕射,室僕射大官”,《二年律令與奏讞書》從原釋文。這一釋讀意見並不可信。從原簡形制和整簡長度來看,簡首應僅有一至二字缺失。考慮到重文號所占字位這一情況,簡 467 很可能僅殘去一字。此處簡文可擬補作“□室僕射。(□室僕射、□室僕射)大(太)官”。“僕射”見《漢書·百官公卿表》“少府”條:“諸僕射、署長、中黃門皆屬焉”。又《漢書·百官公卿表》“郎中令”條:“僕射,秦官,自侍中、尚書、博士、郎皆有。古者重武官,有主射以督課之,軍屯吏、騶、宰、永巷官人皆有,取其領事之號。”孟康注曰:“皆有僕射,隨所領之事以為號也。若軍屯吏則曰軍屯僕射,永巷則曰永巷僕射。”《秩律》簡 466 有“未央宦者監僕射”,屬少府令;《秩律》簡 461 有“大(太)官”,亦屬少府令,則“□室僕射”、“室僕射大官”應為少府以外其他系統之中官或內官。

簡 467 之“未央食官、食監”即未央食官令,未央食官監。未央食官令、未央食官監漢初當屬少府令,掌未央宮之飲食,“以養天子也”。

“長信食官、□□三楊關”,原釋文作“長信食□□宕三,楊關”。《二年律令與奏讞書》釋文作“長信食□宕三楊關”。此簡尾部保存較完好,僅簡首及中間略有殘缺,整簡保留字數亦較多。從整簡長度來看,“食”之後,原釋文“宕”之前可能僅能容納二至三字。我們這裏據殘存字形補作“長信食官、□□三楊關”。“□□三楊關”可能應斷讀作“□□、三楊關”。“信”後一字原圖版作,僅餘左上筆畫。上文“未央食官”之“食”字原圖版作,其起首筆畫與上殘字正合,此殘字釋為“食”當可信。下段殘簡起首端原圖版作,紅外照片作,僅餘右部殘筆。上文“未央食官”之“官”作,其右部寫法與上字殘筆相合。結合字形及辭例,我們認為此字應釋為“官”。《漢書·百官公卿表》詹事下有“食官令長丞”,則“長信食官”即“長信食官令(或長)”,為呂后長信宮食官之長,屬長信詹事。

鄭威先生在談到簡 467 之“月氏”時云：“此簡所載以中央官員為主，疑月氏初為秦中央處理與月氏國關係的專門官員，漢初承襲之，秦末漢初月氏國逐漸西遷，則轉而負責與尚未遷走和投附漢廷的月氏遺族的聯繫，直至月氏道的設立。”又疑“月氏”即《漢書·地理志》之“月氏道”，在今寧夏固原市西南，漢初屬北地郡。<sup>①</sup> 我們認為後說當可信。根據我們新的編聯方案，簡 467 末尾之“月氏”當與簡 465 諸道連讀作“月氏、陰平道、蜀〈甸〉氏道、縣〈縣〉遞道、湍氏道長，秩各五百石，丞、尉三百石”。《漢書·百官公卿表》：“縣令、長，皆秦官，掌治其縣。萬戶以上為令，秩千石至六百石。減萬戶為長，秩五百石至三百石。”《秩律》所載諸道之長秩皆在六百石以下。將“月氏”看作“月氏道”，從秩級上來看是很合適的。又“月氏”屬北地郡，“陰平道”“甸氏道”屬廣漢郡，“縣遞道”“湍氏道”屬蜀郡。上引晏昌貴先生文指出，《秩律》諸縣排列從西北始，遵循內史——北地郡、上郡、隴西郡——巴郡、蜀郡、廣漢郡、漢中郡這一書寫規律，千石秩條、八百石秩條、六百石秩條皆如是。<sup>②</sup> 從我們的編聯來看，五百石秩條亦符合這一書寫規律。

郭文將簡 468 編聯於簡 442 之後，但分為兩段，我們認為兩簡應接排連讀。郭文云：“鄒水傑認為簡 468 號簡的‘田、鄉部二百石，司空二百五十石’是千石縣的情況，其說可從。那麼就內容而言，468 號簡是 442 號簡的後續。不過根據圖版，442 號簡殘，下部有留空，468 號簡的‘田、鄉部二百石’則是另外提行書寫，此種原因尚不明晰。”按簡 468 所說的“田、鄉部二百石，司空二百五十石”秩在八百石縣相應屬官之上（為二百石），從簡文內容可證其確為千石縣的情況。簡 442、468 接排連讀從內容、文例上來看當無問題。至於簡 442 在“有丞、尉者半之”後留空，這恐怕是抄寫者一時疏忽所致，並沒有什麼特別的原因。馬王堆漢墓竹簡《天下至道談》簡 6 簡首抄寫“天下至道談”五字，原整理者取以為篇名。李銳先生指出，“天下至道談”可能不是標題，此五字當與下文連讀作“天下至道談（淡）如水”。<sup>③</sup> 此說應可信。馬王堆漢墓竹簡的抄寫情況正可與《秩律》相參照。

郭文指出簡 444 應接排於簡 468 之後，此兩簡的司馬官與軍事二千石官中尉、郡尉等有對應關係，這是很好的意見。游逸飛先生已經據八百石、六百石郡級官吏書於別簡，因而推測簡 468“郡司馬”等官應為千石秩，<sup>④</sup> 其說可信。這也是 468、444 兩簡應連讀的一大證據。不過，郭文認為“中輕車司馬和騎司馬對應車騎尉”，恐有問題。簡 468 之“騎司馬”，列於“中司馬，郡司馬”之後，“中輕車司馬”之前。居延簡所見屯兵系統有“騎司馬”，為都尉屬




① 鄭威：《試析西漢“道”的分布與變化——從張家山漢簡〈二年律令·秩律〉談起》，《江漢考古》2008 年第 3 期。

② 晏昌貴：《〈二年律令·秩律〉與漢初政區地理》，47 頁。

③ 李銳：《讀〈天下至道談〉札記一則》，《簡帛語言文字研究》第 5 輯，成都：巴蜀書社，2010，469-471 頁。






④ 游逸飛：《張家山漢簡〈二年律令·秩律〉所見郡吏補考》，266-267 頁。

吏<sup>①</sup>。漢初封泥有“中騎司馬”<sup>②</sup>，《秦漢南北朝官印徵存》卷三收西漢“騎司馬印”。《史記·項羽本紀》有“漢騎司馬呂馬童”，又作“騎司馬呂馬童。”《二年律令與奏讞書》已經據上述材料指出，此處“騎司馬”似兼指中央和地方（邊郡設）兩種情況。從書寫順序來看，此說應可信。此與《秩律》簡 446 之“騎千人”可兼指“中騎千人”及邊郡之“騎千人”相一致。中央之“騎司馬”當即“中騎司馬”，應屬中尉。《漢書·百官公卿表》：“中尉，秦官，掌徼循京師，有兩丞、候、司馬、千人。”“車騎尉”即“車騎都尉”，主車士。《漢書·馮唐傳》：“拜唐為車騎都尉，主中尉及郡國車士。”王先謙《補注》：“中尉之車士及郡國之車士皆得主之，《漢紀》作主中尉及郡車騎士。表無車騎都尉官。”“騎司馬”似與“車騎尉”無涉。又郭文云車騎尉或可讀為“車、騎尉”，即車尉與騎尉，恐亦無甚根據。《漢書·百官公卿表》：“虎賁校尉掌輕車。凡八校尉，皆武帝初置，有丞、司馬。”漢初無虎賁校尉，“中輕車司馬”或即屬“車騎尉”。

郭文還推測，簡 468 結尾和簡 444 起首的“關司馬”應為“關司馬衛將軍司馬”。其說可從。簡 468“關司”後一字紅外照片作<sup>③</sup>，此殘形與上文“馬”紅外照片作相符，將之釋為“馬”當無問題。“關司馬”後一字紅外照片作，僅餘左部“彳”旁。郭文據文例補為“衛”。按《秩律》“衛”均誤作“衛”。從紅外照片來看此字亦當是“衛”，用作“衛”。簡 468、簡 444 接續處之“衛〈衛〉將軍司馬、衛〈衛〉尉司馬”這一抄寫順序與簡 441“衛〈衛〉將軍、衛〈衛〉尉”，簡 446“衛〈衛〉將軍候，衛〈衛〉尉候”，簡 471“衛〈衛〉將軍、衛〈衛〉尉士吏”皆相一致，由此也可證明“衛〈衛〉將軍司馬”之釋讀當無問題。

簡 468 下接簡 444 這一方案還有助於我們重新認識原單列的簡 X4 的編聯問題。

《二年律令與奏讞書》著錄有一枚殘簡 X4，其釋文作“□□縣衛〈衛〉尉五百將秩各減(?)□□”。校釋云：“此殘簡原與出土號 F6 殘片粘黏，現已分離。此簡應歸入《秩律》，或接於四六八號簡之後。”




說此簡應歸入《秩律》，可從；說此簡或接於簡 468 之後，則不可信。上文已經指出，從簡文的書寫順序來看，“衛〈衛〉將軍”“衛〈衛〉尉”屬吏總是前後相次出現。我們認為簡 X4 也不例外。所謂“縣”字紅外照片作，僅餘左半。簡 446“軍”字圖版作，簡 471 字圖版作，兩“軍”字字形寫法與上殘字正合。“軍”上一字紅外照片作<sup>④</sup>，僅餘左、下方殘筆。此簡下文“五百將”之“將”紅外照片作，整字書寫亦頗狹長，其字形寫法也與上字殘筆相合。“將







① 陳夢家：《漢簡綴述》，北京：中華書局，1980，69 頁。

② 孫慰祖：《中國古代封泥》，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117 頁。

③ 此字形在原紅外照片的基礎上有拼合處理。

④ 此字形在原紅外照片的基礎上有拼合處理。又紅外照片上半左端附著有一小殘片，已剔除。

軍”前一字紅外照片作, 僅餘左半。簡 446 兩“衛”字分別作、。與兩“衛”字相比較, 前一殘字所从“率”旁仍很明顯。從紅外照片來看, “率”旁左部仍應有筆畫, 惜皆已磨損。結合字形和辭例, 可證“衛〈衛〉尉”前三殘字應當釋為“衛〈衛〉將軍”。

簡 X4 所謂“減(?)”字, 紅外照片作, 僅餘左半。我們認為此字應為“三”字之殘。其下一字紅外照片作, 亦僅餘左半。上文“百”字紅外照片作, 與之相比較, 我們認為上一殘字也應釋為“百”。“三百”後一字紅外照片作, 亦僅殘存左部筆畫。簡 472 兩“石”字圖版分別作、, 上字左部殘留筆畫與“石”字寫法正合。結合字形和辭例, 我們可將此三殘字定為“三百石”。

西漢晚期的上孫家寨漢簡云:“匚犯令者一人, 拜爵一級。其官吏卒長、五百將當百一下及同……”又“色别别, 五百以旃上齒色别, 士吏以下旃下齒色别, 什以肩章别, 伍以肩左右别, 士以肩章尾色别。”又“匚干行, 五百將斬; 以曲干行, 候斬; 以部干行, 司馬斬; 以校干行, 軍尉斬。”“五百”或即“五百將”之省, 也可能是漏寫了一“將”字。李零先生曾討論過上孫家寨漢簡所反映的軍隊編制問題, 認為其編制由高至低依次為“軍”“校”“部”“曲”“官”“隊”“什”“伍”, 五百將是“官”這一層級的長官, 卒長是名襲古制, 同五百將是一官兩名, “官”這一級的規模大致為百人。<sup>①</sup> 萬堯緒先生指出, 卒長同五百將是兩個官職, 《秩律》簡 445 明確記載了“卒長五百石”, 很顯然與五百將并非一官。他說:

然而, 上孫家寨漢簡記載的內容又確實能證明五百將與卒長都是“官”一級的長官。唯一的解釋就是兩者都是“官”的主管軍官, 一主一次, 一高一低。上引大通上孫家寨漢簡的第一條似乎說明了卒長為主, 五百將為次。從秩級上講, 卒長為五百石, 僅次於候六百石。五百將雖然沒有記載, 但應該是低於卒長的, 李零推測為五百石, 筆者並不贊同。五百將高於士吏的秩級百廿石, 則最有可能的秩級是四百石至二百石之間。據《續百官志》記載, 曲候之下的屯長秩二百石, 《二年律令·均輸律》簡 225 記載有“敦長”, “敦長”即“屯長”, 說明屯長在西漢初就存在。如果屯長的秩級為二百石, 五百將的秩級應該高於它, 所以五百將的秩級最有可能是四百石或三百石。<sup>②</sup>

從簡 X4 新釋文字來看, “衛將軍五百將”“衛尉五百將”秩應為三百石。《秩律》將“卒長”與“五百將”分列, 且秩次有別, 可證卒長同五百將不是一官兩名而應為兩種職官。《秩律》簡 446 云“衛將軍候, 衛尉候, 秩各六百石”, 又簡 471—472 “衛將軍、衛尉士吏, 都市亭廚有秩者

① 李零:《青海大通縣上孫家寨漢簡性質小議》,《考古》1983 年第 6 期。

② 萬堯緒:《漢初衛尉屬官考》,楊振紅、鄒文玲主編《簡帛研究二〇一五(春夏卷)》,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2015, 119-120 頁。



及毋乘車之鄉部,秩各百廿石。”“衛將軍候”“衛尉候”“衛將軍士吏”“衛尉士吏”分別屬上孫家寨漢簡所說的“曲”“隊”這一層級,而“卒長”“五百將”在兩層級之間。《秩律》規定“衛將軍五百將”“衛尉五百將”秩為三百石,低於“衛將軍候”“衛尉候”而高於“衛將軍士吏”“衛尉士吏”,從《秩律》律文的邏輯來看也是很合適的。

《二年律令與奏讞書》認為簡 X4 為殘簡,恐不可信。從紅外照片來看,此簡“石”字以下再無文字,其後尚餘大段空白。從文字內容而言,此簡文意亦已足。據此,我們認為此簡當為完簡,舊將之視為殘簡的觀點應訂正。

從上述編聯意見來看,《秩律》千石秩條在書寫順序上是按照縣——中官、內官——軍官依次排列的。根據《秩律》這一行文邏輯,我們認為簡 X4 應編聯在《秩律》簡 466 之後。經我們重新整理、編聯的相關簡文如後:

□室<sub>僕</sub>射<sub>射</sub>(□室僕射、□室僕射)大(太)官,未央食官、食監,長信食官、□□三楊關,長信詹事和〈私〉官長,詹事祠祀長,詹事廐長,月氏、<sup>467</sup>陰平道、蜀〈甸〉氏道、縣〈縣〉遞道、湍氏道長,秩各五百石,丞、尉三百石。大(太)醫、祝長及它都官長,黃鄉長,萬年邑長,長安尉<sup>465</sup>長,秩各三百石,有丞、尉者二百石,鄉部百六十石。未央宦者,宦者監僕射,未央光〈永〉巷,光〈永〉巷監,長信宦者中監,長信光〈永〉巷,光〈永〉巷,<sup>466</sup>衛〈衛〉將軍、衛〈衛〉尉五百將,秩各三百石。○X4

原整理者於“長信宦者中監,長信光〈永〉巷,光〈永〉巷”下注云:“以上為長信官屬官。此簡續接簡殘缺。”《二年律令與奏讞書》校釋云:“‘長信永巷’為‘長信永巷令’屬官,與‘長信宦者中監’并屬長信詹事。‘永巷’為‘永巷令’屬官,屬少府。”《秩律》簡 463 規定“長信永巷令”“永巷令”秩六百石,則其屬吏“長信永巷”“永巷”秩次顯然應低於六百石。我們將簡 X4 編聯在簡 466 之後,則“長信永巷”“永巷”秩均為三百石,這是符合《秩律》律文邏輯的。根據這一編聯方案,簡文文意亦頗完整,舊以為“簡 466 末尾‘光〈永〉巷’後文意未完,應有一枚缺簡”這一問題也可迎刃而解。

《秩律》簡 445 是關於八百石軍官的規定,<sup>①</sup>簡 446 是關於六百石軍官的規定,原整理者將兩簡分別列為一條,置於千石秩條簡文與八百石秩條簡文之間。這一編聯意見乃權宜為之,並沒有多少根據。根據我們上面的觀點來看,此兩簡的歸屬問題亦有必要重新討論。

《續漢書·百官志》云:“大將軍營五部,部校尉一人,比二千石;軍司馬一人,比千石。部下曲,曲有軍候一人,比六百石。曲下有屯,屯長一人,比二百石。”上引李零先生文據之與上孫家寨漢簡“將卒吏二千石以上”“及吏皆千石以下至六百石”“軍吏六百以上”等相比較,指出:其大將軍所設之營與簡文校相當,部校尉一人當即領五部之官,軍司馬則是各部長官,

① 簡 445 末尾有“·卒長五百石”,從標識符及內容可知此 5 字應屬另一條律文。

曲的長官是軍候，這些與簡文是一樣的，唯一不同的祇是曲的下一級叫屯，但屯可能是官或卒的異稱或某種特殊編制，二者並沒有矛盾。他還將上孫家寨漢簡所見官秩由高到低排列如下：將軍——校尉（二千石）——司馬（千石）——候（軍吏，六百石）——卒長（官吏，五百石）——隊的長官（士吏，三百石？）——什長、伍長、士（百石以下）。值得注意的是，《秩律》律文也將軍官分為多個秩級：將軍、諸尉（二千石）——司馬（千石）——候（六百石）——卒長（五百石）——五百將（三百石）——士吏（百廿石）。《秩律》關於諸尉、司馬、候、卒長、士吏秩次的規定，多與上孫家寨漢簡、《續漢書·百官志》相一致。這表明《秩律》律文的規定在其後被較為完好地繼承下來了。總的說來，《秩律》律文在書寫規律上是按照二千石秩、千石秩、八百石秩、六百石秩、五百石至三百石秩、三百石秩以下（以上屬官附於主官之後）由高至低排列的。其中縣依其長吏俸祿的高下可分為千石秩、八百石秩、六百石秩、五百石秩、三百石秩共五等。<sup>①</sup> 兩千石秩之下的軍官，《秩律》也可分為上述五等，與縣一致。由此，我們可以按照上文總結的縣——中官、內官——軍官這一書寫規律，將簡 445、簡 446 編聯入相應秩級的律文中。

在上面的討論中，我們已經將“司馬”類簡文編聯入千石秩條下，將“五百將”編聯入三百石秩條下。與之相類，簡 445 很可能應編聯入八百石秩條下，簡 446 很可能應編聯入六百石秩條下。據此，簡 445 應編聯於簡 450 之後，簡 447—450 為八百石官及其屬吏之規定，與簡 445 秩級一致；簡 446 應編聯於簡 464 之後，簡 451—464 為六百石官及其屬吏之規定，亦與簡 446 秩級一致。

頗值得注意的是，六百石秩條中簡 451—453 出土號分別為 C117、C118、C119，簡 446 出土號則為 C116。從出土位置來看，簡 446 應與上述諸簡緊鄰，這恐怕不會是偶然的。總之，如此編聯，五等軍官皆可編入相應秩級律文之下，簡文邏輯清晰，文意完整，也有出土位置方面的線索，應屬目前最優方案。

附記：本文初稿承蒙何有祖、馬孟龍二位先生指正，文中也吸收了評審專家的意見，在此一併致謝。

<sup>①</sup> 周振鶴：《〈二年律令·秩律〉的历史地理意义》，《學術月刊》2003 年第 1 期。



## 銀雀山漢簡《唐勒》篇章結構芻議

清華大學歷史系 馬楠

**內容提要** 銀雀山漢簡《唐勒》篇為唐勒、宋玉共論御術，分作唐勒論御術和宋玉論御術兩部分，按照此類文章的通例，後者所論當較前者高明；進一步推求，唐勒論御術和宋玉論御術又各自分作兩部分，各自的兩部分也存在御術的高下之別，即《唐勒》篇分唐勒、宋玉兩大節，凡四小節。該篇當如《古文苑》宋玉諸賦通例稱作“御賦”，與銀雀山漢簡多為兵書頗有關係。

**關鍵詞** 銀雀山漢簡 唐勒 宋玉

《唐勒》篇是銀雀山漢簡中少有的文學作品，在古代文學史研究中具有重要意義，材料刊布之後引起了廣泛關注。

整理小組已經明確指出：

本篇為賦體，陳述唐勒與宋玉在楚襄王前議論御馬之術的高下。《漢書·藝文志》著錄唐勒賦四篇，或以為此篇即其中之一。但賦體通例，凡二人或數人共論一事，多以先發言者為客，後發言者為主。如《古文苑》所載宋玉《大言賦》、《小言賦》，即置唐勒、景差之言於前，宋玉之言於後。此篇文字雖不全，但篇首明言“唐勒先稱”，疑非唐勒所作，而為宋玉佚賦，或為戰國末至漢初間人所擬作。篇名題為“唐勒”，蓋取其篇首二字，與《詩經》之《螽斯》、《羔羊》等篇同例，并不能作為此賦出於唐勒之證。此賦文字多與

《淮南子·覽冥》篇中論御一段相合，當是《淮南子》襲用此賦。<sup>①</sup>

李學勤先生也認為：此篇雖題“唐勒”，却并非唐勒賦，而是宋玉賦的佚篇，以篇中首句為“唐勒與宋玉言御襄王前”，故題為“唐勒”，如張家山竹簡《蓋廬》全篇多申胥語，而以篇首數語題作“蓋廬”。<sup>②</sup>

整理小組與李先生的意見是非常正確的<sup>③</sup>，《唐勒》篇當是唐勒、宋玉共論御術，分作唐勒論御術和宋玉論御術兩部分，按照此類文章的通例，後者所論也應當較前者高明。我們在整理小組的意見基礎上進一步推求，認為唐勒論御術和宋玉論御術又各自分作兩部分，各自的兩部分也存在御術的高下之別。

首先，與此篇內容多有重合的《淮南子·覽冥》存在兩兩對比或兩兩并舉的文本特點，如以赤螭、青虬—蛇鰻與鳳凰—燕雀并舉，鉗且、大丙之御對比王良、造父之御，處戲、女媧之治對比黃帝之治，皆以虛無純一、大通混冥為上，知能聰明、刻削煩苛為劣。<sup>④</sup>《古文苑》所載《大言賦》《小言賦》文義相貫，本可視作一篇，“大言”“小言”也各以楚襄王、唐勒、景差、宋玉所言逐層遞進；同為《古文苑》所載之《釣賦》亦以登徒子論玄洲之釣、宋玉論堯舜禹湯之釣為高下之別。<sup>⑤</sup>

而更為主要的依據是，銀雀山漢簡《唐勒》篇論御術存在比較固定的“套語”，以最為完整的唐勒“先稱曰”的第一部分（造父之御術）為例：

唐革（勒）與宋玉言御襄王前。唐革（勒）先再（稱）曰：

人謂就（造）父登車噤（攬）蓀（轡），馬汁（協）險（斂）正（整）齊，周（調）均不摯（繫）。步騶（趨）兢（恒）久疾數（速），<sub>〔一一三〕</sub>馬心俞（愉）也，而安勞、輕車、樂進，<sup>⑥</sup>騁若蜚（飛）蜚（龍），免若歸風，反騶（趨）逆駟，夜趨夕日而入日千里。<sub>〔一一四〕</sub>

先言御術，車馬銜轡如何；後言效果，以“步騶（/趨）”如何，“反騶（/趨）逆□”，“夜趨夕日而

① 銀雀山漢墓竹簡整理小組編：《銀雀山漢墓竹簡（貳）》，北京：文物出版社，2010，250頁。《唐勒》篇見123-124頁圖版，249-251頁釋文注釋。下文引用此篇不出注者并同。

② 說詳李學勤《〈唐勒〉、〈小言賦〉和〈易傳〉》，《齊魯學刊》1990年第4期，109-112頁。

③ 楊安先生又指出，首簡簡背“唐革”二字寫法草率，為後來補加（楊安：《〈銀雀山漢墓竹簡·佚書叢殘〉集釋》，吉林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3，357頁）。這一意見也是正確的，清華簡《封許之命》《厚父》等篇篇題與正文書手皆非一人。

④ 《淮南子·覽冥》，依據劉文典《淮南鴻烈集解》，北京：中華書局，1997，191-217頁。

⑤ 嚴可均輯：《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卷一〇，北京：中華書局，1958，72、75頁。

⑥ “兢”從蔡偉先生說讀為“恒”；“俞也”，整理小組釋作“愈”，鄒可晶先生認為實為“俞”“也”二字誤合，“安勞、輕車、樂進”平列，謂“以勞為安、以車為輕、以進為樂”。詳鄒可晶《〈墨子〉“畢劫”、“畢強”解》，《文史》2014年第3輯，275-280頁。

入日”某地(或里程)作結。<sup>①</sup>

而全篇的“反趨/騶”出現了四次,證明全篇所論御術凡四。唐勒“先稱曰”的造父是第一次,下文又有:

今之人則不然,白□堅<sub>[二一一四]</sub>……不能及就(造)父趨步御者誦<sub>[二一一五]</sub>

那麼“今之人”是唐勒“先稱曰”的第二部分,也就是論“今之人”之御術,顯然在唐勒所論的御術中,造父要比今之人高明。“白□堅”當爲今之人御術車馬銜轡的部分,下面也有“步騶”“反騶”之語,詳下。

唐勒之言結束後應當是宋玉論御術,我們認爲,宋玉所論的開端應當是:

……知也。此不如望(望)子葦大仟者,<sub>[二一二二]</sub>去噬(銜)臻(轡),弊(撤)筴鞮,馬<sub>[□□□]</sub>自駕,車莫<sub>[二一一六]</sub><sup>②</sup>

根據竹簡形制,原二一二二簡爲簡尾,二一一六簡爲簡首,文意相連。經此次銀雀山漢簡再整理工作小組紅外攝影,獲得較清晰照片,改釋原整理報告“也”“仟”兩字。“……知也”正是宋玉評價唐勒所論的口吻,而“望子葦大仟”是宋玉論御術的第一部分,也是以車馬銜轡開端的。這一部分的結尾則是:

步趨<sub>[二一一七]</sub>襲□,緩急若意,□若蜚(飛),免若絕,反趨逆□,夜趨夕日而入日蒙汜<sub>[二一一八]</sub>

而下文又有:

反趨逆<sub>[二一二〇]</sub>……入日上皇<sub>[二一二一]</sub>

則是宋玉論御術的第二部分,顯然是要比“望子葦大仟”御術更爲高明的。

在上述基礎上,我們將全篇分作如下四個部分(以通行字寫出):

① “步”“騶(趨)”一謂徐行,一謂疾行,渾言無別,如《莊子·田子方》“夫子步亦步,夫子趨亦趨”,《荀子·正論》“步中武象,騶中韶護”。“步騶(趨)”連用即言行走,此篇之中疑與“反趨”相對,尤云往駕、反駕。入日,整理小組:“《山海經·海外北經》‘夸父與日逐走,入日’,郭璞注:‘言及日於將入也。’《淮南子·覽冥》‘鳳皇之翔……徑躡都廣,入日抑節’,高注:‘言鳳皇過都廣之野,送日入於抑節之地’。簡文‘入日’當與之同意。”

② 整理小組:“據《覽冥》,以上二句似可補爲‘馬[莫□而]自駕,車莫[□而自□]’”,這一意見是正確且審慎的。《覽冥》原文爲“車莫動而自舉,馬莫使而自走也。”

	A 御術	B 效用
唐勒甲	人謂造父登車攬轡，馬協斂整齊，調均不紮。	步騶競久疾速， <sub>[二一一三]</sub> 馬心愉也，而安勞、輕車、樂進，騁若飛龍，免若歸風， <u>反騶逆駟</u> ， <u>夜趨夕日而入日千里</u> 。 <sub>[二一一四]</sub>
唐勒乙	今之人則不然，白□堅 <sub>[二一一四]</sub>	
	……不能及造父趨步御者詘 <sub>[二一一五]</sub>	
宋玉甲	……知也。此不如望子葦大仵者， <sub>[二一二二]</sub> 去銜轡，撤筴鞞，馬 <sub>[□□□]</sub> 自駕，車莫 <sub>[二一一六]</sub> ……胸中，精神喻六馬。不叱嗜，不撓指。	<u>步趨</u> <sub>[二一一七]</sub> 襲□，緩急若意，□若飛，免若絕， <u>反趨逆</u> □， <u>夜趨夕日而入日蒙汜</u> 。 <sub>[二一一八]</sub>
宋玉乙	此□ <sub>[二一一八]</sub> ……月行而日動，星躍而玄運，子神奔而鬼走，進退屈伸，莫見其塵埃 <sup>①</sup> ，均□ <sub>[二一一九]</sub>	……□ <u>反趨逆</u> <sub>[二一二〇]</sub> …… <u>入日上皇</u> 。 <sub>[二一二一]</sub>

唐勒甲可與《淮南子·覽冥》王良、造父之御相對應；而宋玉甲、宋玉乙可與《覽冥》鉗且、大丙之御相對應。

如推論正確，“入日上皇”之後所謂“故論義御有三，而王良、造[父]<sub>[二一二一]</sub>”的“義”可訓為善，不必破讀為義，<sup>②</sup>而“義御有三”的“三”，應當是指唐勒甲、宋玉甲、宋玉乙三段所論的御術，不包括唐勒乙所論的“今之人”。

而屬於此篇的殘簡：

……慮發□□竟反趨<sub>[二一二四]</sub>……

顯然應當歸入唐勒乙的 B 部分。

另一殘簡：

……□行雷與□□□□<sub>[二一二五]</sub>……

似當排入宋玉乙的 A 部分。

總之，《唐勒》篇分唐勒、宋玉兩大節四小節總論御術，確當如《古文苑》宋玉諸賦通例稱作“御賦”<sup>③</sup>，與銀雀山漢簡多為兵書似乎頗有關係。

① “塵”，字形作“埃”，當隸作“埃”，右半“竹”與“真”共用兩豎筆，“埃埃”當同張家山漢簡《蓋廬》“慎其填埃”，讀為“塵埃”。說詳李零《簡帛古書與學術源流》，北京：三聯書店，2008，376 頁。王輝《出土秦漢典籍詞語釋讀八則》，《中國典籍與文化》2013 年第 3 期，152-155 頁。

② 劉信芳：《漢簡〈唐勒〉重編分章考釋》，《江漢考古》2016 年第 6 期，110-115 頁。

③ 說詳李學勤《〈唐勒〉、〈小言賦〉和〈易傳〉》。

以上是銀雀山漢簡再整理過程中得到的一點新認識,希望日後能夠通過綴合編連,呈現出此篇更為完整的面貌。

本文2016年9月於銀雀山漢簡再整理工作會議上經胡平生、李均明、駢宇騫、李家浩、劉紹剛、陳偉武、馮勝君等專家審正,2016年11月於第二屆“簡帛學的理論與實踐學術研討會”上報告論文內容,與會學者也提出許多寶貴意見。論文於審稿、待刊期間得見《江漢考古》2016年第6期劉信芳先生《漢簡〈唐勒〉重編分章考釋》一文,并據之修訂了一些釋讀;由於拙作與劉文結論有較大分歧,謹存原貌,請讀者鑒閱批評。



## 擇日術的起源 ——以《日書》為中心的考察

重慶大學人文社會科學高等研究院 董濤

**內容提要** 擇日術歸根到底是人們對時間的認知和理解,它起源於避忌和順時,考慮的是自然的秩序和人們的生活以及心理等方面的習俗。擇日術首先要避忌的是親屬、重要或者著名人物,或者傳說人物遭受厄運的日子,其中對親屬去世日子的避忌可能源自傷感、懷念等人類基本的情感,後來逐漸演化成“紀念”,這是最為原始的避忌形式;而擇日術另外一個起源則是對自然規律的遵從,人們對時間的認知來源於對天體的觀測,因而天體的規律運行也對人們的思想和生活產生影響。擇日術在歷史後期逐漸發展成繁冗龐大的體系,但其思想源頭却不外乎避忌凶惡與尊天順時。

**關鍵詞** 日者 日書 避忌 順時 四時

### 一 避忌凶惡與人們對時間的認識

擇日的初始形態是避忌,首先要避忌的是親屬、重要或者著名人物,以及傳說人物遭受厄運的日子,其中對親屬去世日子的避忌可能源自傷感、懷念等人類基本的情感,後來逐漸演化成“紀念”,這是最為原始的避忌形式。

父母或者重要親屬過世的日子對於個人無疑具有重要的意義,也會有一定的禁忌習俗產生。誠然,現在的“忌日”“忌辰”等觀念更多受到佛教的影響,但“忌日”的觀念其實早已產生。例如《禮記·檀弓上》說:“喪三年以為極,亡則弗之忘矣。故君子有終身之憂,而無一

朝之患。故忌日不樂。”<sup>①</sup>所謂“忌日不樂”，鄭玄注云：“謂死日，言忌日不用舉吉事”，也就是說逢父母的死日某些樂事、吉事是不應去做的，這其實就是一種避忌。另外《禮記·喪大記》說：“大夫、士父母之葬，既練而歸。朔月忌日，則歸哭於宗室。諸父兄弟之喪，既卒哭而歸”。鄭玄說忌日也就是死日，賈公彥疏說朔月也就是朔望，包括每個月的朔日和望日，則對親人的“紀念”似不僅限於忌日。再者，《禮記·祭義》也說：“君子有終身之喪，忌日之謂也。忌日不用，非不祥也。言夫日，志有所至，而不敢盡其私也”，鄭玄注云：“忌日親亡之日，忌日者不用舉他事，如有時日之禁也。祥，善也，志有所至，至於親於此日亡，其哀心如喪時。”<sup>②</sup>

另外，《禮記·祭義》以及《孔子家語·哀公問政》中都有關於“忌日必哀”的記載。《左傳》昭公三年記載了當時人們自覺遵守忌日禁忌的例子：“五月，叔弓如滕，葬滕成公，子服椒爲介。及郊，遇懿伯之忌，敬子不入。惠伯曰：‘公事有公利，無私忌，椒請先入。乃先受館，敬子從之。’”<sup>③</sup>劉瑛在分析這段材料時指出，子服椒作爲叔弓的助手出使滕國，正遇到他的叔父懿伯的忌日，所以決定當日不進城，因爲按照當時的禮儀，入城之後就要舉行郊勞、授館等吉禮，這不符合忌日不舉行吉禮的禁忌<sup>④</sup>，此說甚確，也可知當時的忌日也包含了父母以外其他重要親屬過世的日子。

在時代稍晚一些的材料中可以看到，忌日除了不能參加吉事和樂事，還具體到不能飲酒和吃肉，例如《孔叢子·執節》提到：

季節見於子順，子順賜之酒，辭。問其故，對曰：“今日家之忌日也，故不敢飲。”子順曰：“飲也。禮，雖服衰麻，見於君及先生，與之梁肉，無辭，所以敬尊長而不敢遂其私也。忌日方於有服，則輕矣。”<sup>⑤</sup>

是知在當時人看來，忌日的禁忌和服喪的禁忌略同，都不能飲酒食肉，然兩者有輕重不同。另外，據《後漢書·申屠蟠傳》記載：“（申屠蟠）九歲喪父，哀毀過禮。服除，不進酒肉十餘年。每忌日，輒三日不食”。<sup>⑥</sup>申屠蟠的行爲有些極端，十餘年不進酒肉，且遇到忌日就三天不吃飯的行爲恐非一般要求。同樣的例子還有東漢末年的王修：“年七歲喪母，母以社日亡，來歲鄰里社，修感念母，哀甚。鄰里聞之，爲之罷社。”<sup>⑦</sup>王修的母親在社日亡故，而在這一天通常會有聚會飲酒等娛樂活動，鄰里被王修的孝行感動，爲他取消了社日活動。由以上幾例

① 《十三經注疏》，北京：中華書局，1980，1275 頁。

② 《十三經注疏》，1592 頁。

③ 《十三經注疏》，2032 頁。

④ 劉瑛：《〈左傳〉、〈國語〉方術研究》，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6，213 頁。

⑤ 傅亞庶：《孔叢子校釋》，北京：中華書局，2011，373 頁。

⑥ 《後漢書》卷五三《申屠蟠傳》，北京：中華書局，1965，1750 頁。

⑦ 《三國志》卷一一《魏書·王修傳》，北京：中華書局，1959，345 頁。

可得知,某些需要聚會飲酒食肉的樂事和吉事應避免在父母或重要親屬的忌日舉行,這可能是擇日最先要避忌的內容。

清代咸豐二年(1852)浙江余姚曾出土一件“漢代三老忌日碑”,確定為東漢初年之物。碑文完好者二百十七字,主要內容是“三老”的九個孫子和兩個孫女記載祖父(三老,諱通,字小父)、祖母(失諱字宗君)、父親(掾,諱忽,字子儀)、母親(諱捐,字謁君)的諱字和忌日,其中母親的名諱和忌日比較完整:“母諱捐,字謁君,建武廿八年歲在壬子五月十日甲戌忌日”。<sup>①</sup>此碑的用意大約是為了“紀念”已故的親人,所以重名諱,而其中關於忌日的內容應當是要子孫避免在親人的忌日舉行樂事、吉事,由此可見漢代人在進行擇日時避忌重要親屬忌日的具體情形。

除了父母和重要親屬的忌日之外,某些歷史人物,或者是神話傳說人物的死日也會逐漸形成禁忌。王充在《論衡·譏日》中曾提到當時有忌諱丙日和子、卯日的習俗:“又學書諱丙日,云倉頡以丙日死也。禮不以子、卯舉樂,殷、夏以子、卯日亡也”<sup>②</sup>,王充所謂學書忌諱丙日的原因是倉頡就是天干為丙的這一天死亡。傳說倉頡造字,所以如果他在這一天死去,這一天就不適合學習寫字,這樣的邏輯雖然簡易但却比較容易深入人心,但這個說法少見記載<sup>③</sup>,而王充提到的“殷、夏以子、卯日亡”的觀念則更為源遠流長且影響深遠。例如《左傳》昭公九年提到了所謂“疾日”:

晉荀盈如齊逆女,還,六月,卒於戲陽。殯於絳,未葬。晉侯飲酒樂,膳宰屠蒯趨入,請佐公使尊,許之。而遂酌以飲工,曰:“女為君耳,將司聽也。辰在子卯,謂之疾日,君徹宴樂,學人舍業,為疾故也。君之卿佐,是謂股肱,股肱或虧,何痛如之?女弗聞而樂,是不聽也。”<sup>④</sup>

膳宰屠蒯其實要勸諫晉侯停止音樂和宴飲活動,因為他的大臣荀盈剛剛死去,尚未下葬。但屠蒯認為要停止宴飲活動的另外一個原因是“辰在子卯,謂之疾日”,這在當時是一個非常重要的禁忌,這一天要停止宴飲和音樂,即便是學人也要停止學習等事。而究其原因,正如王充所說,這兩日分別是夏桀和商紂王的“忌日”。

① [日]永田英正:《漢代石刻集成[圖版·釋文篇]》,京都:同朋舍,1994,18-19頁,另參見呂以春《“漢三老碑”拾零》,《杭州大學學報》1981年第2期。

② 黃暉:《論衡校釋》,北京:中華書局,1990,995-996頁。岑仲勉統計金文中出現的甲子、乙卯日,認為周人可能并不以這兩日為禁忌,見《周金文所見之吉凶宜忌日》,收入其著《兩周文史論叢(外一種)西周社會制度問題》,北京:中華書局,2004,157頁。

③ 睡虎地秦墓竹簡《日書》甲種有“祠史先龍丙望(一二五背)”的記載,劉樂賢推測,“史先”有可能是《淮南子·修務》所謂“史皇”,據說他“產而能書”,應當就是倉頡,此說可參。見劉樂賢《睡虎地秦簡日書研究》,台北:文津出版社,1994,122-123頁。

④ 《十三經注疏》,2057頁。

周滅商的牧野之戰發生在甲子日,據《尚書·牧誓》:“時甲子昧爽,王朝至於商郊牧野,乃誓”<sup>①</sup>,隨後牧野之戰開始,紂王兵敗自焚,《史記·周本紀》說:“紂走,反入登於鹿台之上,蒙衣其殊玉,自燔於火而死”<sup>②</sup>,另外《逸周書·世俘》也說:“時甲子夕,商王紂取天智玉琰及庶玉環身以自焚。”<sup>③</sup>自此,“甲子日”成了先秦秦漢時期的知識階層在回顧這一段歷史時最喜歡引用的內容,例如《荀子·議兵》說:“武王之誅紂也,非以甲子之朝而後勝之也”,大致相同的言論也見於《管子·制分》:“武王非於甲子之朝而後勝也,其前政多善矣”,以及《淮南子·泛論》:“故聖人見存亡之迹,成敗之際也,非待鳴條之野,甲子之日也”。另外《呂氏春秋》的《首時》《貴因》《簡選》等篇章也都提到了甲子這一日,可見當時人們對於這一個干支的記憶深刻,而擇日也必然會注意到甲子日的特殊情況。

乙卯爲夏桀死日說法見於杜預和鄭玄對經典的解讀,《左傳》昭公十八年:“二月,乙卯,周毛得殺毛伯過而代之,萇弘曰,毛得必亡,是昆吾稔之日也,侈故之以,而毛得以濟侈於王都,不亡何待”,杜預解釋說:“昆吾夏伯也……以乙卯日與桀同日誅”。<sup>④</sup>另據《史記·夏本紀》:“湯修德,諸侯皆歸湯,湯遂率兵以伐夏桀。桀走鳴條,遂放而死”<sup>⑤</sup>,《詩·商頌·長髮》也說:“韋顧既伐,昆吾夏桀”,鄭玄認爲昆吾和夏桀同時被誅,而《禮記·檀弓下》提到:“子卯不樂”,鄭玄也說:“紂以甲子日死,桀以乙卯亡,王者謂之疾日,不以舉樂、爲吉事,所以自戒懼。”<sup>⑥</sup>可見擇日避乙卯思想流布久遠。

另外,《日書》中還有一些傳說人物的死日也被認爲是忌日,例如巫咸、女媧的死日都有相關的禁忌。睡虎地秦簡《日書》甲種有“弦望及五辰不可以興樂口,五丑不可以巫,帝以殺巫咸。(一七正壹)”整理小組認爲,巫咸的身份有兩種,一是商太戊時期的賢臣,另一種是巫祝之神,但帝殺巫咸的說法不見於記載。<sup>⑦</sup>五丑是乙丑、丁丑、己丑、辛丑、癸丑,這一天巫咸被帝所殺,所以有關“巫”的活動被禁止。另外,五丑似乎祇是禁巫術,其他活動是允許的,例如甲種有“禾良日,己亥、癸亥、五酉、五丑”,知五丑是宜於禾類的日子,而且《日書》還說五丑也是蠶良日,也宜於製作衣服。

此外,睡虎地秦墓竹簡《日書》甲種有“作女子”篇,是關於女媧死日的禁忌:

月生一日、十一日、廿一日,女果以死,以作女子事,必死。毋以戌亥家(嫁)子、取

① 《十三經注疏》,182頁。

② 《史記》卷四《周本紀》,122頁。

③ 黃懷信:《逸周書匯校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435頁。

④ 《十三經注疏》,2085頁。

⑤ 《史記》卷二《夏本紀》,88頁。

⑥ 《十三經注疏》,1305頁。

⑦ 睡虎地秦墓竹簡整理小組編:《睡虎地秦墓竹簡》,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186頁。

婦，是謂相。(一五五正)<sup>①</sup>

整理小組在注釋中提到，果疑讀爲媧。女果確實可能是女媧，但劉樂賢認爲，女媧在月生一日、十一日、廿一日死不見於史料記載，從該日不能做女子事的記載來看，她可能是當時人們都知曉的一位女神<sup>②</sup>，那麼《日書》中這條記載的含義就是在女果死的這幾日，如果做女子事，也會有死亡的後果，事實上也是一種基於對傳說人物死亡時間的禁忌。

除了禁忌巫咸被殺和女媧死之日外，《日書》中還記載農業神的死日應禁忌農業活動，如甲種“田忌篇”云：

田亳主以乙巳死，杜主以乙酉死，雨師（師）以辛未死，田大人以癸亥死。（一四九背）

田忌：丁亥、戊戌，不可田及興土攻（功）。（一五〇背）

同樣，睡虎地秦簡《日書》乙種也有與田忌有關的內容：

初田毋以丁亥、戊戌。（三〇貳）<sup>③</sup>

劉樂賢認爲田亳主、杜主、雨師、田大人應當都是當時的農業神，本篇標明農業神的目的當是教人不要在這些神死日種植或收穫穀物。農業神的死日禁忌農業，與巫咸的死日禁忌巫術，女媧的死日禁忌女子事，本意大概是相同的。另外劉樂賢提到，農業神的死日爲禁忌的習俗在後世的擇日通書中也可見到記載，例如《新刊陰陽寶鑑克擇通書·前集》卷四提到：

田事實門：田祖甲寅日死，田父丁亥日死、丁未日葬，田母丙戌日死、丁亥日葬，田主乙巳日死、辛亥日葬，田夫丁亥日死、辛亥日葬，后稷癸巳日死，播種五穀，已上并忌田事。<sup>④</sup>

看來，農業生產活動中確實有忌諱農業神死日的傳統，而且這些干支的安排雖然看起來有些隨意，但也有規律可循。王子今曾引湖北江陵岳山秦墓《日書》“田□人丁亥死，夕以祠之”（M36:43 背面）<sup>⑤</sup>，“田□人”可能就是睡虎地簡中的“田大人”。再者，劉樂賢引敦煌遺書“吉凶避忌條項”云：“田公丁亥日死，勿此日種五穀，凶”，另引《路史後紀》卷三注云：“神農丁亥

① 睡虎地秦墓竹簡整理小組編：《睡虎地秦墓竹簡》，207 頁。

② 劉樂賢：《睡虎地秦簡日書研究》，198 頁。王子今也認爲女媧每月死三次，每年死三十六次不合常理，他指出“果”應當讀爲“裸”，推測含義應當是在這些日子如果女子裸體就會死亡，同時這一天也不可以做“女子事”，也就是性事，這樣的看法也是有道理的。見其著《睡虎地秦簡〈日書〉甲種疏證》，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2003，296 頁。

③ 睡虎地秦墓竹簡整理小組編：《睡虎地秦墓竹簡》，236 頁。

④ 《新刊陰陽寶鑑克擇通書》，《續修四庫全書·子部·術數類》，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770 頁。

⑤ 王子今：《睡虎地秦簡〈日書〉甲種疏證》，508 頁。



日死,丁未日葬。”丁亥日被特別強調,這一干支或許是田忌的早期形態<sup>①</sup>。

其實,不僅人死之後有忌日,某些被認為有靈性的動物死的日子也要忌諱,例如《說文解字》馬部有“驚,駿馬也。以壬申日死,乘馬者忌之”<sup>②</sup>,也就是說,在壬申這一天忌諱乘馬,因為這一天是駿馬“驚”的死日。另外,睡虎地秦墓竹簡《日書》甲種和乙種都有馬良日和馬忌日,或可與《說文》中此條記載對讀:

馬良日,乙丑、乙酉、乙巳、乙亥、己丑、己酉、己亥、己巳、辛丑酉、辛巳、辛亥、癸丑、癸酉、癸巳、庚辰。·其忌,丙子、丙午、丙寅、丁巳、丁未、戊寅、戊戌、戊子、庚寅、辛卯。  
(八二正貳-八三正貳)<sup>③</sup>

不僅如此,《日書》此篇中還有“祠父母良日”“祠行良日”“人良日”“牛良日”“羊良日”“豬良日”“犬良日”“市良日”“雞良日”“金錢良日”,以及“蠶良日”等,劉樂賢將其命名為“諸良日篇”<sup>④</sup>。實質上,“諸良日篇”這樣的命名並不能完全概括此篇的內容,因為除了規定良日之外,此篇還有一部分內容與忌日有關。例如上面引文中不僅有馬的良日,還規定了馬的忌日,如“其忌,丙子、丙午、丙寅、丁巳、丁未、戊寅、戊戌、戊子、庚寅、辛卯”之類。此篇中人、牛、羊、豬、犬、雞也都各有忌日,其中人的忌日甚至還分為性別,如“男子龍庚寅,女子龍丁”。這些忌日的干支排列大多無規律可循,恐怕和壬申是“驚”的死日一樣,也各有傳說背景,不過材料所限,今天已經無法確知了!

人或者某些有靈性的動物死而為鬼神,並成為一種禁忌,這在先秦秦漢時期是一種頗為常見的現象。《淮南子·泛論》提到“羿除天下之害,死而為宗布”,高誘注釋云:“羿,古之諸侯。河伯溺殺人,羿射其左目,風伯壞人屋室,羿射中其膝。又誅九嬰、窋窋之屬,有功於天下,故死托祀於宗布。祭田為宗布謂出也。”<sup>⑤</sup>從《淮南子》的前後文意來看,宗布應當與灶、社、稷一樣,是神靈名稱,亦是祭祀名稱。然羿並非宗布神,他祇是因為有功,死後和宗布神一同被祭祀,即高誘所謂“托祀”。祇是后羿的死日不像夏桀商紂那樣與干支相配而成為固

① 而在傳世文獻和金文中,丁亥一般被認為是吉日。《大戴禮記·夏小正》云:“丁亥萬用入學。丁亥者,吉日也。”是將丁亥作為吉日對待。另外《儀禮》也有“來日丁亥”的記載,知此日是適合祭祀的。王國維說:“古人鑄器多用丁亥,諸鐘銘皆其證也。”(王國維:《齊國差鏞跋》,《王國維遺書》第二冊,上海書店出版社,1984年影印本,315頁)羅振玉曾經指出周人鑄器喜歡用丁亥日,岑仲勉又搜集丁亥銘文六十九條,知當時人對丁亥的重視,並引用《尚書·周書·多方》“惟五月丁亥,王自來奄,至於宗周”,或許古人歸行以丁亥為吉日亦未可知。作者還認為喜用“丁”可能與人丁、人口有關,而“亥”可能與孩提、孩童有關,或可備一說(岑仲勉:《周金文所見之吉凶宜忌日》,收入其著《兩周文史論叢》,北京:中華書局,2004,157頁)。也有學者認為丁亥為吉日之說是虛飾之詞,不必實有其日,就像漢代銅鏡銘文上的五月丙午一樣,見龐樸《五月丙午與正月丁亥》,《文物》1979年第6期。

② 段玉裁:《說文解字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463頁。

③ 睡虎地秦墓竹簡整理小組編:《睡虎地秦墓竹簡》,194頁。

④ 劉樂賢:《睡虎地秦簡日書研究》,123頁。

⑤ 何寧:《淮南子集釋》,北京:中華書局,1983,986頁。



定的忌日。

漢武帝曾聚會占家，詢問某日是否宜於取婦，面對擇日諸家辯訟不決，漢武帝最後決定“避諸死忌，以五行爲主”<sup>①</sup>。也就是說，漢武帝規定擇日以五行家之術爲主，但也要避開“死忌”。漢武帝所謂的“死忌”可能有兩層含義，一是能够給人帶來死亡的禁忌，例如睡虎地秦墓竹簡《日書》“稷辰篇”所謂：“以生子，子死。亡者，得，不得必死”等；另一種就是前文討論的父母親屬，或者重要人物、傳說人物，或者是某些具有靈性的動物的死日。漢武帝所認爲的“死忌”具體指兩種情況中的哪種不得而知，但這兩種情形在漢代擇日術中應當都是必須要避免的。

總的來說，擇日術所要避忌的其實是人們對凶惡和時間之間的虛擬聯想，雖然這種聯想是不存在的，但人們還是寧願選擇相信這種聯想。實際上這種思維方式並不難理解，歷史早期人們缺乏“科學”的逃避凶惡的手段，纔會把規避凶惡的時間也作爲一種手段，進而信任其真實效用。祇是歷史發展到一定階段，人們獲得了更多避免災禍的科學方式，擇日術中避忌凶惡却已然成爲一種習俗，固化在人們的思維之中。

## 二 日月運行與擇日術的起源

對時間及自然規律的遵循，也是擇日術產生的一個重要思想源頭。在古代人的神秘思維中，人間事物的安排需要遵從天的意志，而順天敬時的根源在於對天的秩序的尊重，這是古代神秘時間思維的一個根本原則。例如《左傳》文公六年說：“時以作事，事以厚生，生民之道於是乎在矣。”<sup>②</sup>而通常情況下，人們對時間的認知是以日月星辰爲標誌物的，例如《禮記·禮運》說：“故聖人作則，必以天地爲本，以陰陽爲端，以四時爲柄，以日星爲紀，月以爲量”<sup>③</sup>，下文就以日月運行為切入點討論尊天順時的時間思維與擇日術的起源問題。

人們對時間的認知幾乎都來自對太陽、月亮運行的觀察，而基本的時間單位年、月、日也就是由日、月的運行而來的。太陽的東升西落是爲一日，也是擇日術最基本的時間單位；而月亮在一個月內的圓缺變化也是擇日的主要標誌物；再者太陽沿固定軌道運轉一年帶來四季的變化，也同樣是擇日的參考依據。同時對日月的觀察也讓人們體會到“陰陽”的差异，春、夏、秋、冬四季的變化給人帶來“四時”冷暖寒暑截然不同的感受，正如《禮記·樂記》所說：“地氣上齊，天氣下降，陰陽相摩，天地相蕩，鼓之以雷霆，奮之以風雨，動之以四時，暖之

① 《史記》卷一二七《日者列傳》，3222 頁。

② 《十三經注疏》，1845 頁。

③ 《十三經注疏》，1424 頁。

以日月,而百化興焉”<sup>①</sup>,因而“理陰陽,順四時”也就成為古人行事的重要準則。

十二月的劃分很可能就建立在人們對四時認識的基礎上的,而先秦秦漢時期的“月令”類文獻,以及“月諱”類曆忌之書,也都是基於“順四時”的理念而來的。現在見到的月令類文獻主要有《禮記·月令》《呂氏春秋·十二紀》《淮南子·時則》《管子·幼官(玄宮)》等;而楚帛書《丙篇》可能是“月諱”類曆忌之書。<sup>②</sup>

首先來看《月令》類文獻的性質,蔡邕《明堂月令論》云:“《月令篇》名曰因天時、制人事,天子發號施令,命神受職,每月異禮,故謂之月令。所以順陰陽,奉四時,效氣物,行王政也。”<sup>③</sup>鄭玄也說:“《月令》者,以其記十二月政之所行也”<sup>④</sup>。以形式較為完整的《呂氏春秋》十二紀為例,月令類文獻的基本格式是以五行搭配四季,每個季節分為孟、仲、季,然後制定每月應該如何行事,以及如果不按照規定行事會有什麼樣的後果。但是按照江曉原的說法,月令類文獻和“月諱”類文獻還是有所不同,其區別是,前一類文獻講的是何時應該做何事;而後一類文獻講的是何時可以做何事以及不可做何事,也就是具體規定了吉凶宜忌。<sup>⑤</sup>

現在可以見到最早的“月諱”類文獻是長沙子彈庫戰國楚帛書《丙篇》,它與擇日術的關係極為密切,此篇有十二章,現將和《日書》關係最為密切的第一章抄錄如下:

取於下

曰:取,貳則至,不可以□殺。壬子、丙子凶,作□北征,帥有咎,武□□其敵<sup>⑥</sup>

餘下各章逐月規定吉凶宜忌,所當注意的是各月均有一幅神怪圖,李零指出:“每一章題,第一字是月名,代表所附神像,下面二字,每一季節最末一月皆表示該神職司,如司春、司夏、司秋、司冬,其他各月,也與帛書各章內容有關。”<sup>⑦</sup>

總體來看,楚帛書《丙篇》以月為時間單位規定吉凶宜忌,相對於《日書》以日,乃至以時為擇日計時單位,略顯疏陋。然而第一條中有“壬子、丙子凶”句,知楚帛書的吉凶設置也精確到日,李零認為壬子和丙子可能是“五子”中的兩種,並說此章的大意是:正月燕來,不可以

① 《十三經注疏》,1531頁。

② 陳夢家最早提出楚帛書與月令類文獻存在密切關係,參見其著《戰國楚帛書考》,《考古學報》1984年第2期。李零認為楚帛書丙篇“性質當與古代的曆忌之書相近,《月令》諸書應該就是從這種東西發展而來”,但兩者也有所不同,即楚帛書以列述宜忌為主,不像月令類文獻是以明堂十二室為核心,有着非常整齊的五行配數、配物系統,帶有濃厚的說禮色彩(見其著《長沙子彈庫戰國楚帛書研究》,北京:中華書局,1985,46頁)。而江曉原認為楚帛書丙篇就是曆忌之書(見《天學真原》,瀋陽:遼寧教育出版社,2007,172頁)。

③ 《蔡中郎集》,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藏本。

④ 《十三經注疏》,1352頁。

⑤ 江曉原:《天學真原》,172頁。

⑥ 釋文據李零《長沙子彈庫楚帛書研究》,74-80頁。

⑦ 李零《中國方術正考》第三章題為“楚帛書與日書:古日者之說”,分別詳細介紹了楚帛書和已出圖《日書》的情況,認為兩者均為古日者之書,可參看《中國方術正考》,北京:中華書局,2006,177頁)。

殺生，壬子、丙子之日凶，若用兵北征，則其帥有咎，出師不利。此條與《九店楚簡》所謂“【凡春三月】甲、乙、丙、丁不吉，壬、癸吉，庚、辛成日”<sup>①</sup>的干支吉凶設置方式有相似之處，其間可能有關聯。一般來說，每月有且祇能有壬子或丙子中的一日<sup>②</sup>，那麼此條的含義應是：正月的壬子或丙子日為凶日。

另外，楚帛書也說正月不可以北征，類似月份、季節與方位配合進行擇日在《日書》中也極為常見。例如《九店楚簡》中有“刑夷、夏夷、【享月，春不可以東徙】”（八八）<sup>③</sup>，刑夷、夏夷、享月是楚月份，對應的是秦的正月、二月、三月，也就是春三月<sup>④</sup>。春三月在日廷圖上位於東方，所以不可向東徙，同理夏三月不可南徙，秋三月不可西徙，冬三月不可北徙。類似的內容也見於睡虎地秦墓竹簡《日書》甲種“畜篇”：“春三月，毋起東向室；夏三月毋起南向室；秋三月，毋起西向室；冬三月，毋起北向室。有以者大凶，必有死者。”（九六正貳-九九正貳）<sup>⑤</sup>楚帛書說正月不可以北征，在方位吉凶的設置上和《九店楚簡》及睡虎地秦簡《日書》都不相同，應當出自不同的數術系統。

楚帛書和《日書》內容相同的僅此一處，其他各月都有不同程度的殘缺，是否還有與《日書》相似的內容，就不得而知了。但楚帛書的擇日術已經精確到了日，且與方位搭配預測吉凶，與稍晚的《日書》已無二致，則是應當引起注意的問題。

再者，觀察月亮的週期性圓缺變化是陰曆產生的基礎，周初人們對於月相變化就已經特別注意，金文中經常出現有初吉、既生霸、既望、既死霸等稱謂，都是表示月相的名稱。王國維有《生霸死霸考》一文，認為周初以從朏（陰曆初三的月相）到次朏間為一個月，分為初吉、既生霸、既望、既死霸四個部分，並提出“月相四分”之術，近來多有學者提出不同的意見<sup>⑥</sup>。而本文最為關心的是“初吉”這一月相是否與周初的擇日術有關。

陳遵媯指出，根據統計，周代的銅器中以“初吉”出現的次數最多，幾乎占了總數的百分之七十，而在初吉中，正月初吉最多，而初吉丁亥又占了初吉總數的一半以上。這樣看來，周

①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學中文系編：《九店楚簡》，北京：中華書局，2000，49 頁。近來有學者提出，西周以“五子”為大忌之日，禁絕一切典禮，見白光琦《試說西周的日辰宜忌》，收入其著《先秦年代探略》，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8，80 頁。

② 如果將六十干支從甲子至癸亥以 1-60 編號，丙子是 13 位，壬子是 49 位，兩者中間有 35 個干支，斷乎不可能在同一月內。楚帛書的設置方式顯示當時人對於干支紀日的規律掌握已十分純熟。

③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學中文系編：《九店楚簡》，54 頁。

④ 睡虎地秦墓竹簡《日書》有秦楚月份換算：“正月楚刑夷，二月楚夏夷，三月楚紡月”，“紡月”應當就是“享月”。

⑤ 睡虎地秦墓竹簡整理小組編：《睡虎地秦墓竹簡》，195 頁。

⑥ 王國維：《生霸死霸考》，收入其著《觀堂集林》，北京：中華書局，1961，21 頁。近年來的討論文章見張聞玉《王國維〈生霸死霸考〉志誤》，《貴州大學學報》1992 年第 4 期；景冰《西周金文紀時術語——初吉、既望、既生霸、既死霸的研究》，《自然科學史研究》1999 年第 1 期。

人喜歡在年初、月初(初旬)擇吉鑄器,可能有其原因<sup>①</sup>。也就是說,至少在周代就已經出現了根據月相進行擇日的習俗,這是應當引起注意的問題。

而在睡虎地秦墓竹簡《日書》甲種“取妻家女篇”中,出現了根據月相擇日的詳細記載:

月生五日曰杵,九日曰舉,十二日曰見莫取,十四日曰婁(謔)詢,十五日曰臣代主。  
代主及婁(謔)詢,不可取妻。(八背貳-九背貳)<sup>②</sup>

另外,“作女子篇”又說:

月生一日、十一日、廿一日,女果以死,以作女子事,必死。毋以戌亥家(嫁)子、取婦,是謂相。(一五五正)<sup>③</sup>

這兩段簡文中擇日術采用的曆法應當就是數位紀日,劉樂賢認為,古代“朔”字和“生”字意思相近,有時可以互用,那麼月生一日也就是當月的朔日<sup>④</sup>。應當注意的是,月生一日并非首見月亮之日,例如《宋書·天文志》云:“月生三日,日入而月見西方,至十五日而月見東方,將晦日未出乃見東方”<sup>⑤</sup>。

實際上,古人把月亮在一個月內圓缺的變化看作是一個由生到望,再到毀的過程,劉樂賢曾引《黃帝蝦蟆經》稱每月前十五日為“月生”,十六日開始為“月毀”<sup>⑥</sup>。《鶡冠子·天則》也說:“月望而晨月毀於天,珠蛤蠃蚌虛於深渚”,意思大概是說每月從月望開始就是月毀的過程<sup>⑦</sup>。而前一條中的“杵”“舉”“莫取”“謔詢”“臣代主”等語的意思,根據整理小組的注釋,“謔詢”是詈辱的意思,“臣代主”也非吉語。本文以為,這兩日之所以不適合婚姻嫁娶,是因為十四日、十五日恰好為月望,而月望不宜嫁娶則源自陰陽觀念。

另外,《日書》中還有“入月某日”,似乎和“月生某日”有些關聯。楚帛書《甲篇》第二行末尾有“內月”,第三行開頭有“七日”二字,李零認為應當讀為“內(入)月七日”<sup>⑧</sup>,如果此說無誤,那麼“入月某日”這樣的紀日方式的產生時間和應用範圍都要久遠和廣泛得多。現在

① 陳遵媯:《中國天文學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211頁注4。關於初吉和丁亥日的討論見黃盛璋《釋初吉》,《歷史研究》1958年第4期;岑仲勉《周金文所見之吉凶宜忌日》,收入其著《兩周文史論叢(外一種)西周社會制度問題》,157頁。另見姜亮夫《古史學論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143頁;白光琦《試說西周的日辰宜忌》,收入其著《先秦年代探略》,8頁。前引龐樸《“五月丙午”與“正月丁亥”》一文也提到至少在春秋時候,器物銘文中的“正月丁亥”不實際存在,正月鑄器的事大概沒有可能,且初吉丁亥可能並不真實存在。

② 睡虎地秦墓竹簡整理小組編:《睡虎地秦墓竹簡》,209頁。

③ 睡虎地秦墓竹簡整理小組編:《睡虎地秦墓竹簡》,207頁。

④ 劉樂賢引用《後漢書》卷六〇《馬融傳》李賢注云“朔,生也”,認為“朔日”的“朔”,其實是“甦生”“復生”的日子,見劉樂賢《睡虎地秦簡日書研究》,211頁。另見劉樂賢《馬王堆帛書〈出行占〉補釋》,簡帛網,2005年11月3日。

⑤ 《宋書》卷二三《天文志》,北京:中華書局,1974,679頁。

⑥ 劉樂賢:《睡虎地秦簡日書研究》,210-211頁。

⑦ 黃懷信:《鶡冠子匯校集注》,北京:中華書局,2004,43頁。

⑧ 李零:《中國方術正考》,191頁。

見到的“入月某日”大多出現在《日書》中，例如睡虎地秦墓竹簡《日書》甲種“鼠襄戶篇”：

鼠襄戶，見之，入月一日二日吉，三日不吉，四日五日吉，六日不吉，七日八日吉，九日恐。

廿二日廿三日吉，廿四日恐，廿五日廿六日吉，廿七日恐，廿八日廿九日吉。（二八正貳-二九正貳）<sup>①</sup>

整理小組注釋認為沒有十日至廿一日，可能是有脫文，甚確。劉樂賢認為，此篇可能是以每月某日見到老鼠上窗戶判斷吉凶<sup>②</sup>，推測應當屬於雜占一類。王子今討論“入月某日”究屬何意，引用居延漢簡簡文“王稚少入月五日食，董子文入月八日食”（E.P.T52:103B），認為入月某日均指具體某一日<sup>③</sup>。《日書》中有具體入某月的記載，如睡虎地秦墓竹簡《日書》有“入八月”，可證王說較確。此篇吉凶的劃分方式很簡單，即三天為一組，每月十組，前兩天吉，第三天不吉，祇是純粹的數術推演，並沒有考慮月相或者陰陽問題。

採用同樣的方式判斷吉凶的還有周家臺秦簡《日書》的“戎曆日”，每六天一組，每月五組，這六天按照一定規律和順序，劃分成“大徹”“小徹”“窮”三類<sup>④</sup>，文後還附有這三類的吉凶宜忌，如“凡大徹之日，利以遠行、絕邊境、攻擊，亡人不得，利以舉大事。”（一四〇貳）<sup>⑤</sup>。簡二六一至簡二六五一段簡文應當也是“戎曆日”，其內容中出現了“左之”“向之”“右之”等字樣，似乎與方位有關。總的來說，“戎曆日”的推演看似要複雜得多，但和“鼠襄戶”占卜時日吉凶的方法並沒有本質的區別。

放馬灘秦簡《日書》甲種和乙種都有“禹須臾行日”，都是“入月”相關的內容。甲種從簡四三到簡七二，共三十支簡，簡的上端書寫有“入月一日”到“入月卅日”，且將每日都分為“旦”“日中”“昏”“中夜”四個時段，以及這四個時段前往四方是否吉利，例如“入月一日旦西吉日中北吉昏東吉（中夜）南吉”（四三）<sup>⑥</sup>。乙種從簡二六到簡五四（脫入月一日），書寫大致相似的內容<sup>⑦</sup>。孔家坡漢簡《日書》也有大致相同的內容，不過書寫和排列方式略有不同，

① 睡虎地秦墓竹簡整理小組編：《睡虎地秦墓竹簡》，186頁。

② 劉樂賢：《睡虎地秦簡日書研究》，68-69頁。

③ 王子今：《睡虎地秦簡〈日書〉甲種疏證》，129頁。有關“入月”的討論詳見劉信芳《〈天水放馬灘秦簡綜述〉質疑》，《文物》1990年第9期，他認為“入月某日”是古人以序數紀日的句式，是一種很自然、很方便的紀日方式，與干支紀日并行，此說可參。

④ 孔家坡漢簡《日書》有“禹窮日：入月二日、七日、九日、旬三、旬八、二旬二日、二旬五日、不可行”（一五一壹），設置方式與此處的窮日不同（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隨州市考古隊：《隨州孔家坡漢墓簡牘》，北京：文物出版社，2006，146頁）。

⑤ 湖北省荆州市周梁玉橋遺址博物館：《關沮秦漢墓簡牘》，北京：中華書局，1970，120頁。相關研究可參見龍永芳《周家臺秦簡〈日書〉之“戎曆日”圖符說》，《出土文獻研究》第7輯，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176頁；夏德安《周家臺的數術簡》，《簡帛》第2輯，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402-403頁。

⑥ “中夜”二字原脫，據文例補。

⑦ 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編：《天水放馬灘秦簡》，北京：中華書局，2009，85、88頁。



例如“入月廿六日、廿七日、廿八日、廿九日、卅日，旦西吉，日中北吉，昏東吉，中夜南吉”(一六六壹—一六七壹)<sup>①</sup>。其實“禹須臾行日”大致可分為五組，從第一組到第五組分別有4日、6日、8日、7日、5日，實質上第一組的4日與第五組5日的內容完全相同。這些數字有規律地分布，應當是古日者刻意的安排。

與“戎曆日”相比，“禹須臾行日”的日期安排更加簡便，且加入了方位，並將擇日的時間精確到了每日的“四時”，看上去更加嚴密、“科學”。然而從“鼠囊戶”到“戎曆日”再到“禹須臾行日”，基本操作策略並沒有改變，都是將每月三十日按天數進行分組，然後判斷吉凶，這也是“入月某日”占卜吉凶的基本原則。

應當說，無論“月生某日”還是“入月某日”，都來自對月亮運行規律的觀察。然而相比之下，“月生某日”更關注月相的變化，是以月亮的“朔”“望”“晦”來占斷吉凶；而“入月某日”則幾乎不關注月相，祇單純將每月分為三十日，然後分組占斷吉凶宜忌。也就是說，前者判斷吉凶的方式更看重“物象”，而後者更看重“數術”。

總的來說，所謂尊天順時是對自然世界天體運行規律的遵從，是人們刻意按照自然的規律安排自己的生活，就像人們熟知的“春耕夏耘，秋獲冬藏”一樣，這其實是一種較為原始的思維方式。古日者在擇日的時候一般不會違背自然的規律，這也是古代擇日術的一般特徵；然而另一方面古日者也在刻意地運用天文現象，進一步豐富擇日術的體系。

### 三 結論

時間本身是客觀存在的，但人們在認識時間的時候難免會對時間進行情感添加，例如至親之人在某個時間去世，那麼此後再遇到這個時間，自然會有悲傷等情緒產生，這可以說是避忌的思想源頭。與此同時歷史早期的人們對於逃避凶惡的方式並沒有科學的認知，是以在凶惡和時間之間構建虛擬聯想，然後以之指導自己的生活。而天體的規律運行，也會對人們的生活和思想造成影響，歷史早期人們會自覺遵循天體運行的規律，這是人們在進行擇日行為時的另外一個思想源頭。實際上，所謂尊天順時一方面是對具體的天體運行的模擬，即在擇日的時候不違背自然的規律，另一方面古日者們也在試圖把天體的運行和天文分布“數學化”，即從人們的實際出發重新認識天文，然後用於擇日。隨之擇日術走向精確，也就有了更多解釋和演繹的空間，這也是後世擇日術趨向繁複的主要原因。

<sup>①</sup>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隨州市考古隊：《隨州孔家坡漢墓簡牘》，149頁。



## 漢代“過所”考辨

安陽師範學院歷史與文博學院 李銀良

**內容提要** “過所”之義有兩種：一種是所經過之處；另一種是通關憑證，與通關之“傳”的性質相同，但“過所”沒有通告文書之義。在“過所”史料的界定方面，無論是傳世文獻，還是出土文獻，“過所”之義大部分是所經過之處，而非被後世誤讀的通關或通告文書。至遲王莽時期，“過所”（通關憑證）已經出現，這可能與王莽改制有關。東漢以後作為通關之“傳”已為“過所”取代或行用不多。

**關鍵詞** 漢代 過所 傳 通關 憑證

漢代是我國歷史上大一統的王朝，疆域空前遼闊，國家的管理事務日益複雜，往來公務人員和普通百姓有時必須借助一定的信物才能通過關卡、就食止宿等，這些信物即為通關憑證。通關憑證對帝國加強政治管理、提高行政效率、強化武備、及時斷決軍機、維護和鞏固統一等具有重要的意義。漢代常見的通關憑證有“符”“節”“傳”“繻”“棨”和“過所”等，其中學術界對“符”“節”“傳”“繻”“棨”的研究比較全面和科學，而對“過所”的研究，雖然成果不

少,<sup>①</sup>但是還有一些可以商榷的地方。歸納學術界的研究成果,主要有以下幾個問題:其一,“過所”是什麼;其二,“過所”史料的界定;其三,“過所”出現的時間,今試逐一論之,以就教於方家。

## 一 “過所”

討論“過所”,首先我們要弄清什麼是“過所”?“過”,《說文》曰“度也”,<sup>②</sup>其義當為經過之義;“所”有處所、地方之義。“過”與“所”合起來,即為所經過(某地)之義。後來“過所”在“所經過之處”之義的基礎上逐漸演變出“通關憑證”之義。

“過所”作為過關憑證,較早對之作解的是東漢末期鄭玄與劉熙。鄭玄注《周禮·司關》時說“傳如今移過所文書”,<sup>③</sup>劉熙在《釋名》中注解“過所”為“至關津以示之”,<sup>④</sup>《漢書·文帝紀》“除關無用傳”,張晏注曰“傳,信也,若今過所”,李奇“傳,檠也”,顏師古曰“或用檠,或用繒帛,檠者刻木為合符。”<sup>⑤</sup>可以看出,無論是鄭玄、劉熙,還是後來的張晏、李奇和顏師古,均把通關之“傳”與“過所”視為相同之物,即通關憑證。因此,我們認為:“過所”文書就是通關憑證,與通關之“傳”性質相似,至於一些學者所說的通告形式的“過所”,文獻中無法找到立論依據。

## 二 “過所”史料的界定

“過所”有時表示“所經過”之義,有時表示通關憑證,但是一些學者往往把二者混為一

① 關於“過所”的研究,羅振玉、王國維、陳直、陳槃、薛英群、程喜霖、唐曉軍、李均明、黃兆宏、張德芳等先生論證較為集中,為了研究方便,諸位先生的觀點我們分成幾個方面分別做一總結概述,詳見正文。陳直:《漢晉過所通考》,《歷史研究》1962年第6期,後收入《居延漢簡研究》,天津古籍出版社,1986,35-41、179-180頁;陳槃:《過所》,收入其著《漢晉遺簡識小七種》,臺北: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75,107-108頁;李均明:《漢簡所見出入符、傳與出入名籍》,《文史》第19輯,北京:中華書局,1983,27-35頁;薛英群:《漢代的符與傳》,《中國史研究》1983年第4期,又見其著《居延漢簡通論》,蘭州:甘肅教育出版社,1991,141-142、410-444頁;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編,薛英群等注:《居延新簡釋粹》,蘭州大學出版社,1988,33-34頁;程喜霖:《敦煌漢簡所見關傳向過所演變》,《敦煌研究》1992年第2期,後又收入其著《唐代過所研究》,北京:中華書局,2000,1-54頁;羅振玉、王國維:《流沙墜簡》,北京:中華書局,1993,263-265頁;唐曉軍:《漢簡所見關傳與過所的關係》,《西北史地》1994年第3期;李均明:《漢簡所反映的關津制度》,《歷史研究》2002年第3期;黃兆宏:《過所制度研究述略》,《甘肅社會科學》2003年第6期;張德芳:《懸泉漢簡中的“傳信簡”考述》,《出土文獻研究》第7輯,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65-81頁,又收入郝樹聲、張德芳《懸泉漢簡研究》,蘭州:甘肅文化出版社,2009,134-161頁。

② [漢]許慎:《說文解字》卷二下,北京:中華書局,1963,39頁。

③ 《周禮注疏》卷一五,北京:中華書局,1980,739頁。

④ [漢]劉熙:《釋名》卷六,北京:中華書局,1985,97頁。

⑤ 《漢書》卷四《文帝紀》,北京:中華書局,1962,123-124頁。

談,也就是把含有“過所”字樣的史料大都作為文書來看待,因此,有必要對“過所”的史料進行界定。界定“過所”史料,牽涉到一系列的問題,其中核心問題是後人對傳世文獻與出土文獻中“過所”的注解。

### (1) 傳世文獻

首先,我們對傳世文獻中“過所”史料進行梳理與分析。“過所”之稱謂,傳世文獻中最早見於《漢書·匈奴傳》,茲錄如下:

明年(甘露二年)呼韓邪單于款五原塞,願朝三年正月。漢遣車騎都尉韓昌迎,發過所七郡郡千騎,為陳道上。”

顏師古曰:“所過之郡,每為發兵陳列於道,以為寵衛也。”<sup>①</sup>

引文中“發過所七郡”,從唐代顏師古注解中可以看出“過所”在這裏表示“所經過”之義。宋代司馬光在《資治通鑑》中也有類似記載,“詔遣車騎都尉韓昌迎單于,發所過七郡二千騎為陳道上”。<sup>②</sup>有些學者不同意顏師古之注,認為顏師古囿於古注,“不敢遽云西漢既有過所,故僅解為所過之郡,是望文生訓也”,在這裏“過所”不是“所經過”之義,而是一種類似於通告的文書。<sup>③</sup>仔細分析這段文獻,我們會發現一些問題。首先,上述《匈奴傳》引文中,顏師古的注解是可以說通的。其次,這些學者對顏師古之注的反駁缺乏有力的直接論據。

傳世秦漢文獻中,“過所”一般是指“所經過”之義,茲錄有關文獻如下:

往年已勅郡國,异味不得有所獻御,今猶未止,非徒有豫養導擇之勞,至乃煩擾道上,疲費過所。其令太官勿復受。明勅下以遠方口實所以薦宗廟,自如舊制。(《後漢書·光武帝紀下》)<sup>④</sup>

今雖有西屯之役,宜先東州之急。如遣使者與二千石隨事消息,悉留富人守其舊土,轉尤貧者過所衣食,誠父母之計也。(《後漢書·樊宏傳》)<sup>⑤</sup>

十五年春閏月乙未,詔流民欲還歸本而無糧食者,過所實稟之,疾病加致醫藥;其不欲還歸者,勿強。(《後漢書·孝和帝紀》)<sup>⑥</sup>

第一則文獻是光武帝下詔,要求各郡國不得進獻奇異美味,主要是因為進獻之物的傳送“疲費過所”,其中的“過所”是指“所經過”之地。後兩則文獻中的“過所”與第一則一樣。

① 《漢書》卷九四《匈奴傳》,3798-3799頁。

② 《資治通鑑》卷二七《漢紀十九·中宗孝宣皇帝下》“甘露二年”條,北京:中華書局,1956,886頁。

③ 陳直:《漢晉過所通考》,《歷史研究》1962年第6期。程喜霖基本贊同陳說,詳見程喜霖《敦煌漢簡所見關傳向過所演變》,《敦煌研究》1992年第2期。

④ 《後漢書》卷一《光武帝紀下》,北京:中華書局,1965,60-61頁。

⑤ 《後漢書》卷三二《樊宏傳》,1128頁。

⑥ 《後漢書》卷四《孝和帝紀》,191頁。

到了魏晉時期,在正史中“過所”具有了通關憑證之義。據《三國志·倉慈傳》記載:

太和中,(倉慈)遷爲敦煌太守……又常日西域雜胡欲來貢獻,而諸豪族多逆斷絕;既與貿遷,欺詐侮易,多不得分明。胡常怨望,慈皆勞之。欲詣洛者,爲封過所。欲從郡還者,官爲平取,輒以府見物與共交市,使吏民護送道路,由是民夷翕然稱其德惠。<sup>①</sup>

該史料講述了敦煌太守倉慈,爲那些要去魏都洛陽的胡商簽發通關憑證,即文中的“爲封過所”,根據文義我們容易看出,“過所”在此表示通關憑證。

另據《太平御覽》“過所”條中有兩則史例記載,一則引《廷尉決事》:

廷尉上廣平趙禮詣雒治病,博士弟子張策、門人李臧齎過所詣洛還,責禮冒名渡津,(廷尉)平裴諒議禮一歲半刑,策半歲刑。<sup>②</sup>

另外一則爲《晉令》:

諸渡關及乘舡筏上下經津者,皆有(過)所,寫一通,付關吏。<sup>③</sup>

以上兩則史料均說明了“過所”作爲通關憑證魏晉時期已經行用。

綜上,在傳世的秦漢文獻中,“過所”大都表示“所經過”之義,到了魏晉時期,“過所”作爲通關憑證屢見於史書。

## (二) 出土文獻

“過所”不但在傳世文獻中多次出現,也屢見於出土文獻。一些學者經常列舉一些簡牘材料來論證他們的說法。經過分析,這些所謂的“過所”簡文均非通關憑證,而是“所經過”之義。爲了研究方便,茲錄相關簡文如下:

(1) 四月乙巳,玉門候畸移過所□ 1921<sup>④</sup>

(2) □戊子,酒泉庫令安國,以近次兼行太守事,丞步遷謂過所縣。 102·6<sup>⑤</sup>

(3) 元康二年正月辛未朔癸酉,都鄉嗇夫□

當以令取傳,謁移過所縣道河□

正月癸酉,居延令勝之、丞延年□

印曰居延令印

213.28 AB, 213.44 AB<sup>⑥</sup>

(4) 元延二年十月乙酉,居延令尚、丞忠,移過所縣道河津關。遣亭長王豐,以詔書

① 《三國志》卷一六《倉慈傳》,北京:中華書局,1964,512頁。

② 《太平御覽》卷五九八,北京:中華書局,1960,2695頁上欄。

③ 《太平御覽》卷五九八,2695頁上欄。

④ 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編:《敦煌漢簡》,北京:文物出版社,1991,294頁。

⑤ 謝桂華、李均明、朱國炤:《居延漢簡釋文合校》,北京:文物出版社,1987,170頁。

⑥ 謝桂華、李均明、朱國炤:《居延漢簡釋文合校》,332頁。

買騎馬酒泉、敦煌、張掖郡中。當舍傳舍，從者如律令。守令史詡、佐褒。七月丁亥出。

居延令印七月丁亥出

170.3AB<sup>①</sup>

陳直先生認為簡文中所提到的“過所”均屬於文書，其中簡(1)至(3)類似於通告文書，簡(4)為通關憑證。<sup>②</sup> 結合簡文的具體文義，這些觀點還有討論的餘地。簡(1)“玉門候畸”是指一位名畸的玉門候，其中“移過所”後簡文缺少。簡(2)“過所縣”如果理解成“所經過之縣”更為合適。簡(3)“謁移”是古代文書的習慣用語，“過所”後為“縣道河”之類的地名，“過所”如理解成文書未免有些牽強，如理解成“所經過”之義，則更加符合簡文之義；其實，簡文中已經明確寫明“當以令取傳”，說明該簡應為通關之“傳”的傳文。簡(4)與簡(3)類似。

除了以上所列簡文外，我們還發現一些類似的用法，有助於我們進一步理解“過所”的確切含義。<sup>③</sup> 茲錄有關簡文如下：

(5) □□□□□馬二匹輶車一乘，謹移過所縣道河津關，毋苛留止，如律令

令史宗行丞事，移過所，如律令 / 佐定安世

73EJT5:72<sup>④</sup>

(6) 五月丙辰溫丞謹移過所縣邑侯國如律令掾縣令史□□

□丞印□□□□

3EJT10:236 AB<sup>⑤</sup>

(7) □過所縣邑侯國關門亭河津毋苛留□

73EJT9:247<sup>⑥</sup>

(8) 鴻嘉四年正月……毋官獄徵事當得□

正月庚戌，昭武丞奉親移過所肩水金關□□

昭武丞印□

73EJT9:177 AB<sup>⑦</sup>

(9) 六月癸未倉嗇夫成以小官印兼□

謁移張掖郡中過所縣邑毋苛□

□□□□□□□□□□□□

73EJT9:30<sup>⑧</sup>

簡(5)至(8)“×移過所××”為常見的句式，“謹移”“謁移”等詞均為文書習慣用語；“過所”後常綴以地理稱謂，如縣、邑(道)、侯國、河津關、門亭之類，與上文我們所列舉的簡(1)至(4)類似。但是，簡(9)與其他簡牘略有不同，該簡講述了要求在張掖郡中所過的縣邑，予以放

① 謝桂華、李均明、朱國昭：《居延漢簡釋文合校》，271頁。

② 陳直：《漢晉過所通考》，《歷史研究》1962年第6期。

③ 關於簡牘中“過所”前冠以“移”“謁移”，薛英群等人已有論述，但過於簡略。詳見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編，薛英群等注《居延新簡釋粹》，33-34頁。

④ 甘肅簡牘保護研究中心等編：《肩水金關漢簡(壹)》下冊，上海：中西書局，2011，57頁。

⑤ 甘肅簡牘保護研究中心等編：《肩水金關漢簡(壹)》下冊，145頁。

⑥ 甘肅簡牘保護研究中心等編：《肩水金關漢簡(壹)》下冊，118頁。

⑦ 甘肅簡牘保護研究中心等編：《肩水金關漢簡(壹)》下冊，113頁。

⑧ 甘肅簡牘保護研究中心等編：《肩水金關漢簡(壹)》下冊，103頁。

行,簡文中的“過所”祇能解釋為“所經過”之義才能說通。

在眾多的史料中,“過所”前冠的詞也有一定的規律,除上文“移”字外,還有其他稱謂,諸如“謂”“謁告”等,理清這些,更有助於我們正確解讀“過所”之義。

首先,“過所”冠以“謂”字,茲錄有關簡文如下:

(10) 甘露三年四月甲寅朔庚辰,金城太守賢、丞文,謂過所縣、道官,遣浩亶亭長奈(漆)賀,以詔書送施刑伊循。當舍傳舍,從者如律令。 II 0114④:338<sup>①</sup>

(11) 甘露三年九月壬午朔甲辰,上郡太守信、丞欣謂過所:遣守屬趙稱逢迎吏騎士從軍烏孫罷者敦煌郡,當舍傳舍,從者如律令。十月,再食。 II 0115③:99<sup>②</sup>

(12) 河平元年八月戊辰朔壬午,敦煌太守賢、丞信德謂過所縣、道,遣廣至司空嗇夫尹猛,收流民東海、泰山,當舍傳舍,從者如律令。八月庚寅過東。(A)

佐高卿二在所,官奴孫田取詣□□所。(B) II 0315②③

以上三則簡文,“過所”句式類似,均為“謂過所××”,其中“謂”是告之義,那麼,“過所”如果解釋成文書,則文義不通,祇有解釋為“所經過”之處,纔符合原文之義。如簡(10)講述了金城太守賢與郡丞文,根據詔書,派遣浩亶(縣名)亭長奈(漆)賀,遣送施刑徒到伊循(當時鄯善國屬城),告知所過往縣道,給予相關人員提供相應服務,諸如“當舍傳舍”之類,簡(11)與簡(10)類似。簡(12)是講述敦煌太守、郡丞派遣廣至(敦煌屬縣)司空嗇夫尹猛,前往東海、泰山等郡“收流民”,從敦煌到東海、泰山郡,路程遙遠,所過郡縣甚多,告知所過縣道提供相應的幫助。因此,以上“過所”祇能解釋為“所經過”之義。

其次,“過所”前冠以“謁告”,茲錄部分簡文如下:

(13) 元年七月庚子朔丁未,倉守陽敢言之:獄佐辨、平、士吏賀具獄,縣官食盡甲寅,謁告過所縣鄉以次續食。雨留不能投宿齋。來復傳。零陽田能自食。當騰期卅日。敢言之。/七月戊申,零陽葬移過所縣鄉。/齎手/七月庚子朔癸亥,遷陵守丞固告倉嗇夫:以律令從事/嘉手(正)

遷陵食辨、平盡己巳旦□□□□遷陵。

七月癸亥旦,士五臂以來/嘉發(背) 5-1<sup>④</sup>

(14) 卅五年三月庚寅朔辛亥,倉銜敢言之:疏書吏、徒上事尉府者牘北(背),食皆盡三月,遷陵田能自食。謁告過所縣,以縣鄉次續食如律。雨留不能投宿齋,當騰騰,來

① 胡平生、張德芳編撰:《敦煌懸泉漢簡釋粹》,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39頁。

② 胡平生、張德芳編撰:《敦煌懸泉漢簡釋粹》,153頁。

③ 胡平生、張德芳編撰:《敦煌懸泉漢簡釋粹》,44頁。

④ 陳偉主編,何有祖、魯家亮、凡國棟撰:《里耶秦簡牘校釋(第一卷)》,武漢大學出版社,2012,1-7頁。



復傳。敢言之。

8-1517

令佐溫

更戍士五城父陽翟執

更戍士五城父西中座

胥手(背)

8-1517 背<sup>①</sup>

以上兩則簡文,“過所”句式均為“謁告過所××”,“謁告”是文書習慣用語,表示告知之義,所謂的“謁告過所××”表示告知所經過的某地方。簡(13)講述了有關人員外出辦公時,要求途經之處給予提供飲食、住宿服務,簡(14)與之相似。因此,在這裏簡文中“過所”祇能解釋為“所經過”之義。

可見,冠以“謂”或“謁告”的“過所”簡文,如果解釋為文書,無法說通,祇能解釋為“所經過”之義。

在出土文獻中,是否有表示通關憑證“過所”的史料呢?通過整理,我們發現以下幾則簡文:

(15) 過所

175·20A<sup>②</sup>

新始建國地皇上戊二年十二月壬午,甲溝

(16) 過所回守候長魏移過所……秦□□

部卒……

□□□

EPT59:677<sup>③</sup>

(17) 過所回建武八年十月庚子,甲渠守候良遣臨木候長刑博

過所回便休十五日,門亭毋河(苛)留。如律令。

EPF22:698:AB<sup>④</sup>

簡(15)上祇書有“過所”二字,有學者認為它是“傳”之封檢,可備一說。我們也可理解為通關憑證,似乎也能說通。但是該簡信息量太少,我們無法判斷“過所”是封檢還是通關憑證,故而存疑。簡(16)、(17)均有“回”標誌,表示封泥印匣槽,當是封印之用,以示為官方頒發。簡(17)中“便休”是休息、休假之義,此種用法文獻屢見,《東觀漢記·彭寵傳》“大王解齋,吏皆便休”,<sup>⑤</sup>即為其證,該簡講述了臨木候長休假十五日,有關部門給他發放“過所”(通關憑

① 陳偉主編,何有祖、魯家亮、凡國棟撰:《里耶秦簡牘校釋(第一卷)》,344-345頁。

② 謝桂華、李均明、朱國炤:《居延漢簡釋文合校》,279頁。

③ 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編:《居延新簡》,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401頁。

④ 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編:《居延新簡》,522頁。

⑤ [漢]劉珍等撰,吳樹平校注:《東觀漢記校注》卷八,北京:中華書局,2008,278頁。

證),要求所到之處,“毋河(苟)留”。簡(16)與簡(17)相似,也是通關憑證。<sup>①</sup>

綜合以上分析,無論是傳世文獻,還是出土文獻,諸位學者所列舉的所謂的“過所”文書(證)史料,其中大部分不是表示文書,而是“所經過”之義。

### 三 “過所”出現時間的討論

“過所”作為通關憑證出現的時間,學術界一直爭訟不斷,主要有以下幾種觀點<sup>②</sup>:“漢武帝太始年間說”<sup>③</sup>“漢武帝元鼎年間說”<sup>④</sup>“西漢昭帝時期說”<sup>⑤</sup>“西漢昭帝至東漢光武帝建武八年之間說”<sup>⑥</sup>“西漢中期以後說”<sup>⑦</sup>“東漢以後說”<sup>⑧</sup>“東漢末以後說”<sup>⑨</sup>。比較以上幾種觀點,我們發現存在一些共同的問題。

首先他們所依據的史料中“過所”大部分并非通關憑證,而是“所經過”之義(詳見上文)。那麼由此推導出的“過所”出現的時間也就不能成立,諸如“漢武帝太始年間說”“漢武帝元鼎年間說”“西漢昭帝時期說”“西漢中期以後說”等。

其次是通關憑證“過所”與“傳”的關係問題。一些學者把“過所”出現的時間與通關之“傳”一起來探討,認為通關之“傳”的消失與“過所”的出現是同時的。在此前提下,采用排除法來斷定“過所”出現的上限或下限,也就是說如果史料中出現了“傳”,那麼“過所”一定晚於這則史料;如果史料中出現了通關憑證“過所”,那麼,“過所”一定不晚於這則史料。<sup>⑩</sup>

“過所”出現時間的上限或下限,學者們經常依據以下兩則史料來判斷。一是《三國志·倉慈傳》“過所”之例,斷定通關憑證“過所”最遲三國時期已經出現,這一判斷是合理的。

① 從簡牘形制和格式來說,文中所舉簡例(15)一(17)類似於封檢,上端的“過所”,也可以理解為該文書的接收者,即“過所縣道河津關”的略寫,從這個意義上說,也具有“所經過之處”的含義。大約正是因為這種略寫,逐漸演變出“通關憑證”之義。這也可備一說。

② 除了我們所列的幾種觀點外,還有學者認為“過所”文書唐代纔出現,顯然不科學,我們不再列出,詳見初世賓《懸泉漢簡拾遺》,《出土文獻研究》第8輯,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95頁。

③ 陳直:《漢晉過所通考》,《歷史研究》1962年第6期。

④ 程喜霖:《敦煌漢簡所見關傳向過所演變》,《敦煌研究》1992年第2期。

⑤ 陳槃:《漢晉遺簡識小七種》,107-108頁。

⑥ 唐曉軍:《漢簡所見關傳與過所的關係》,《西北史地》1994年第3期。

⑦ 薛英群:《居延漢簡通論》,141頁。

⑧ “過所”出現在東漢以後,這一觀點過於模糊,羅振玉、王國維兩位先生,以及後來《中國簡牘集成》編委會均持這種模糊觀點,故而列在一起。羅、王兩位先生認為“過所”為東漢以來行旅之券,所依據的是四則西晉簡牘和幾則魏晉傳世文獻,以及《釋名》、鄭玄、張晏之注,所得出的這一結論乃是推測之語,沒有直接證據,且此結論過於寬泛;《集成》編委會認為大約東漢以後或東漢中晚期以後,但沒有給出過多的立論依據。詳見羅振玉、王國維《流沙墜簡》,263-265頁;中國簡牘集成編委會《中國簡牘集成》第九、十冊,蘭州:敦煌文藝出版社,2001,181、29頁。

⑨ 李均明:《漢簡所見出入符、傳與出入名籍》,33頁。

⑩ 李均明:《漢簡所見出入符、傳與出入名籍》,33頁。

二是《後漢書·申屠蟠傳》中“傳”之例，說明東漢中晚期通關之“傳”仍在使用的，斷定“過所”應該晚於這則史料，這一判斷是不科學的。通過“傳”來判斷“過所”出現上限的前提是“傳”必須是通關憑證，否者，就失去了立論基礎，通過分析，《申屠蟠傳》中的“傳”并非通關之“傳”。據《申屠蟠傳》記載：申屠蟠“始與濟陰王子居同在太學，子居臨歿，以身托蟠，蟠乃躬推輦車，送喪歸鄉里。遇司隸從事於河、鞏之間，從事義之，為封傳護送，蟠不肯受，投傳於地而去，事畢還學”，<sup>①</sup>引文中給出了幾個地名：太學設在洛陽；濟陰，郡名，治所在定陶；<sup>②</sup>河、鞏之間，河指黃河，鞏為鞏縣，位於洛陽東邊。申屠蟠受托，送子居之喪從洛陽到濟陰，在河、鞏之間，遇到司隸從事（司隸校尉的屬官），司隸從事為申屠蟠“封傳”，目的是“護送”，而申屠蟠不受，“投傳於地而去”，並且最後到達了濟陰。如果把其中“傳”理解為通關憑證，顯然是有問題的，因為申屠蟠并未接受，也能到達濟陰，可見，文中的“傳”并非通關憑證，當為其他信物，這類“傳”的性質猶今之通知文書或介紹信，目的是見此信物，要沿途護送。因此，《申屠蟠傳》中的“傳”并非通關之“傳”，那麼由此推導出的“過所”出現的上限是有問題的。整理東漢時期有關傳世文獻，我們發現，東漢時期記載通關之“傳”的文獻幾乎絕迹。這使我們不得不認識到：東漢以後通關之“傳”已經消失或行用不多。

其實，“傳”的種類很多。“傳”，《說文》曰“遞也”，<sup>③</sup>可以指傳車、郵傳機構或乘傳來往的信使等，後來發展演化成一種憑證。作為憑證之義，“傳”有很多種類，除了通關憑證和上文《申屠蟠傳》中類似於如今通知文書或介紹信外，還有其他：可作為做官憑證，如《後漢書·陳蕃傳》中陳蕃“投傳而去”；<sup>④</sup>可作為兵符，如《後漢書·竇固傳》記載竇固攻擊西域，“詔耿秉及騎都尉劉張皆去符傳以屬固”；<sup>⑤</sup>也可作為乘坐公家馬車的憑證，如《漢書·平帝紀》：“在所為駕一封軺傳，遣詣京師。”如淳曰：“律，諸當乘傳及發駕置傳者，皆持尺五寸木傳信，封以御史大夫印章”，<sup>⑥</sup>引文中的“尺五寸木傳信”即為乘坐公家馬車的憑證；還可作為領取物品、兵器或調遣士卒的憑證，如“諸使而傳不名取卒、甲兵、禾稼志者，勿敢擅予”。<sup>⑦</sup>可見，“傳”作為一種憑證，并不僅僅祇有通關憑證一種。而“過所”文書祇與“傳”眾多種類中的一種即“通關憑證”相同。

判斷“過所”出現的時間，學者們也經常引用古注來說明。較早對“過所”作注的當屬鄭

① 《後漢書》卷五三《申屠蟠傳》，1751 頁。

② 《續漢書》志二一《郡國三》，北京：中華書局，1965，3456 頁。

③ [漢]許慎撰：《說文解字》卷八上，165 頁。

④ 《後漢書》卷六六《陳蕃傳》，2159 頁。

⑤ 《後漢書》卷二三《竇固傳》，810 頁。

⑥ 《漢書》卷一二《平帝紀》，359-360 頁。

⑦ 張家山二四七號漢墓竹簡整理小組編：《張家山漢墓竹簡〔二四七號墓〕》（釋文修訂本），北京：文物出版社，2006，37-38 頁。

玄、張晏。《周禮·司關》中“凡所達貨賄者，則以節傳出之”，鄭玄注曰“傳如今移過所文書”，<sup>①</sup>三國時人張晏注解《漢書·文帝紀》“除關無用傳”時曰“傳，信也，若今過所”。<sup>②</sup>鄭玄、張晏注中出現有“如今”或“若今”字樣，一些學者以此就斷定了“過所”行用的年代為東漢末期以後（鄭玄生活的年代），這一判斷是值得商榷的，很明顯鄭玄、張晏二人生活的年代雖相近，但並非完全一致，我們分析，鄭玄、張晏祇是陳述一個歷史事實，即通關之“傳”好像他們當時的“過所”文書，這並不能說明“過所”這時纔出現，此問題我們已有專門論述。<sup>③</sup>

“過所”（通關憑證）出現的時間，目前為止，最早的史料即為上文所引用簡（16）、（17），簡（16）是王莽時期，即“新始建國地皇上戊二年（21）”，簡（17）東漢光武帝時期，即“建武八年（32）”。因此，我們推測“過所”至遲王莽時期已經出現，若為王莽時期，有可能與王莽改制有關。因為王莽時期，進行一系列改制活動，諸如官名、官制、地名、幣制等，有可能把通關之“傳”改成了“過所”。

#### 四 結語

“過所”有“所經過”之義，秦漢文獻屢見。之後由“所經過”之義轉化成了一種通關憑證，與通關之“傳”性質相同。“過所”作為文書祇有通關憑證一種形式，一些學者認為“過所”還有一種通告形式的文書，這是不科學的，之所以出現這一論斷，是因為這些學者對傳世文獻和出土文獻的誤讀。在“過所”史料的界定上，一方面傳世文獻中所謂的“過所”大部分是“所經過”之義，而非通關憑證，另一方面，在出土文獻中，我們列舉的十余枚簡牘，通過比對，“過所”句式是有一定規律的，“過所”前除冠以“移”字外，還有其他稱謂，諸如“謂”“謁告”等，“謂”與“謁告”是文書習慣用語，表示告知之義，“過所”在這類簡文中祇能解釋為“所經過”之義；“過所”二字後常綴以地理稱謂，如縣、邑（道）、侯國、河津關、門亭等，相比之下，解釋為“所經過”之義更加恰當。在“過所”出現時間上，由於一些學者所依據“過所”史料出現了偏差，得出的結論很難站住腳。經過綜合分析，我們認為“過所”至遲王莽時期已經產生，似乎已經取代通關之“傳”，這可能與王莽改制有關，東漢以後的通關之“傳”已經消失或行用不多。

附記：本文承蒙匿名專家審閱并提出修改意見，特此致謝。

① 《周禮注疏》卷一五，739頁。

② 《漢書》卷四《文帝紀》，123-124頁。

③ 詳見拙文《漢代通關憑證——“傳”與“過所”關係考辨》，《殷都學刊》2015年第1期。

## 西北漢簡所見吏卒家屬研究

重慶師範大學歷史與社會學院 鍾良燦

**內容提要** 西北漢簡所見戍卒家屬名籍與戍吏家屬出入符為瞭解西漢中後期西北邊塞吏卒的家屬構成與生活提供了條件。卒家屬名籍是邊塞針對隨軍家屬所作的名籍,它反映的是隨軍家屬在邊塞的生活狀況。這些隨軍家屬多以妻子為主,並不是戍卒家屬的全部,因此很難據此反映戍卒的家庭結構與規模。而戍吏家屬出入符是戍所為長期服務邊塞的本地戍吏家屬提供的出入關塞的憑證,它反映的是邊地戍吏家屬的省親記錄。這些戍吏的家屬並不隨軍,而是居住在原戶籍單位。通過這些家屬符所反映出的家屬構成,可知西漢中後期邊郡的家庭結構和規模較為複雜和龐大,這可能與邊郡的生存環境有關。

**關鍵詞** 西北漢簡 戍卒家屬名籍 戍吏家屬出入符 家庭結構

隨着西北漢簡的出土與整理,<sup>①</sup>使得河西漢塞吏卒的屯戍生活得以比較清晰地呈現在世人面前。河西漢塞的吏卒多有家屬隨軍現象,對於這些隨軍家屬的研究,以往學者或討論這

<sup>①</sup> 本文所引西北漢簡,主要有:謝桂華、李均明、朱國炤:《居延漢簡釋文合校》,北京:文物出版社,1987;張德芳主編:《居延新簡集釋》,蘭州:甘肅文化出版社,2016;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編:《敦煌漢簡》,北京:中華書局,1991;孫家洲主編:《額濟納漢簡釋文校本》,北京:文物出版社,2007;甘肅簡牘保護研究中心、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甘肅省博物館、中國文化遺產研究院古文獻研究室、中國社會科學院簡帛研究中心編:《肩水金關漢簡》(壹)、(貳),甘肅簡牘博物館、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甘肅省博物館、中國文化遺產研究院古文獻研究室、中國社會科學院簡帛研究中心編:《肩水金關漢簡》(叁)、(肆)、(伍),上海:中西書局,2011、2013、2013、2015、2016。下文在引述時,分別簡稱為“合校”“集釋”“敦煌”“額濟納”“肩水”。

些隨軍家屬尤其是卒妻的邊塞生活；<sup>①</sup>或討論這些家屬的來源、在邊地的居住地以及其與吏卒的情感生活等；<sup>②</sup>或通過這些家屬的出入符及廩名籍討論居延地區的家庭結構。<sup>③</sup> 這些研究，對於我們全面認識河西漢塞吏卒家屬的真實生活面貌，無疑具有很大的幫助。儘管如此，很多問題仍有待進一步厘清，例如是否所有的吏卒家屬都要隨軍？這其中主要影響因素是什麼？隨軍家屬與不隨軍家屬，其家庭結構有何不同？本文在前人研究基礎上，欲就這些問題展開討論，以期增進對邊地屯戍吏卒家屬生活的認識。

## 一 戍卒家屬名籍

在存世的居延漢簡中，可見很多戍卒家屬名籍，如：

- (1) 省卒家屬名籍(合校 58·16)
- (2) 卒家屬在署名籍(合校 185·13)
- (3) 戍卒家屬在署廩名籍(合校 191·10)
- (4) 卒家屬見署名籍(合校 194·3, 194·13)
- (5) 卒家屬名籍(合校 203·15)
- (6) 第廿三部建平三年七月家屬妻子居署省名籍(集釋:E.P.T40:18)

這些戍卒家屬，顯然都是隨軍家屬，戍所製作這些名籍，是因為要給這些隨軍家屬發放口糧。因此，有的學者將上述各類名籍歸類為“卒家屬廩名籍”。<sup>④</sup>

有的學者注意到上引簡(6)與一般“廩名籍”不同，其所強調的可能是職守責任，並進一步認為所謂“在署”“居署”“見署”或許與睡虎地秦簡中的“守署”有關。<sup>⑤</sup> 這一觀點很具啟發，它使我們不得不對“卒家屬居署名籍”與“卒家屬名籍”是否為一類名籍這一問題做出思考。

首先，從上引簡文看，這些標明“居署”(“在署”“見署”)的家屬名籍，有的明確為“廩名籍”，如簡(3)；有些則否，如簡(2)、(4)、(6)。這些簡文性質是否一致，都是“廩名籍”？檢西北漢簡，可見標明“居署”(“在署”“見署”)的家屬廩食記錄如下：

① 賈麗英：《從居延漢簡看漢代隨軍下層婦女生活》，《石家莊師範專科學校學報》2004年第1期；王子今：《漢代軍隊中的“卒妻”身份》，《南都學壇》2009年第1期。

② 參見趙寵亮《行役戍備——河西漢塞吏卒的屯戍生活》，北京：科學出版社，2012。

③ 黃豔萍：《漢代邊境的家屬出入符研究——以西北漢簡為例》，《理論月刊》2015年第1期；姚慧琳、高凱：《漢代居延地區家庭規模及結構淺析》，《魯東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6年第4期。

④ 參見李均明《秦漢簡牘文書分類輯解》，北京：文物出版社，2009，361頁。

⑤ 王子今：《漢代軍隊中的“卒妻”身份》，3頁；王子今：《秦漢稱謂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4，277頁。



- (7) 第四隧卒伍尊 妻大 女女足年十五 見署用穀二石九升少 (合校:55·20)
- (8) [第五] 卒王褒 妻大女信年十八 見署用穀□ (合校:95·16-18, 95·20)  
弟大男輔年十九
- (9) 第四隧卒張霸 弟使男勳年七 見署用穀七石八升大  
妻大女年十九 (合校:133·20)  
妻大女胥年十五
- (10) 第四隧卒虞護 弟使女自如年十二 見署用穀四石八斗一升少  
子未使女真省年五 (合校:194·20)  
妻大女眇年卅五
- (11) 第五隧卒徐誼 子使女待年九 見署用穀五石三斗一升少  
子未使男有年三 (合校:203·3)
- (12) 第六隧卒寧蓋邑  
父大男偃年五十二  
母大女請卿年卅九 ●見署用穀七石一斗八升大 (合校:203·12)  
妻大女女足年廿一
- (13) 第廿三隧卒王音 妻大女貪年廿 居署卅日用穀二石一□  
(合校:203·16)  
妻大女捐年卅四
- (14) 毋傷隊卒陳譚 七月旦居署盡晦  
子小女小婢年八 (集釋:E.P.T40:17)
- (15) ●取凡十九人家屬盡月見 用粟八十五石九斗七升少 (合校:203·37)  
弟大男誼年廿三 居署盡晦
- (16) □弟大男政年十八 九石母威君取  
弟大男譚年十六 (集釋:E.P.T40:23)
- (17) △妻大女方年卅五 六月旦居署盡晦●用粟二石九升少  
六月乙卯妻取卩 (集釋:E.P.T44:39)
- (18) □弟大男田年十六 居署卅日用穀三石 (集釋:E.P.T48:30)  
·妻大女君憲年廿四 皆居署廿九日七月乙卯妻取卩
- (19) 止北隧卒王誼 ·子未使女=足年五歲  
·子小男益有年一歲 用穀四石少  
(集釋:E.P.T65:119)  
妻大女阿年卅五

- (20) 武誠隧卒徐親 子大男譚年十九 居署盡晦用粟八石一斗六升大子男張子取  
子大男朝年十六 (集釋:E.P.T65:411)  
母大女□如年六十二 見在署用穀二石九升少□
- (21) 第卅一隧卒王敞 子小男駿年一 見在署用穀七斗六升少□  
妻大女如年廿六 見在署用穀二石九升少□  
(額濟納:2000ES7SF1:11)

由上引簡文可知,標明“居署”(“在署”“見署”)者,都是卒家屬的廩食記錄,可見簡(3)與簡(2)、(4)、(6)本質上並沒有區別,都屬於“卒家屬居署廩名籍”。

其次,這些標明“居署”(“在署”“見署”)的卒家屬名籍,與一般“卒家屬名籍”有沒有區別?應該看到,“卒家屬名籍”與“卒家屬廩名籍”也是同一性質的名籍,這在簡文中有清晰的反映,如:

- (22) ●右省卒家屬名籍 用穀卅石 (合校:133·8)
- (23) ●右城北部卒家屬名籍 凡用穀九十七石八斗 (合校:203·15)

簡(22)是針對省卒家屬所作的名籍,<sup>①</sup>簡(23)是針對卒家屬所作的名籍,二者對象不盡相同,但目的却是一致:都是為了給這些戍卒家屬發放口糧。西北漢簡所見未標明“居署”的卒家屬廩食記錄有:

- (24) □妻大女止□年廿一用穀二石一斗六升大  
弟使男陵年十二用穀二石一斗六升大 凡用穀四石三斗三升少  
(合校:27·3)
- 妻大女止氏年廿六用穀二石一斗六升大
- (25) 制虜隧卒周賢子 使女捐之年八用穀一石六斗六升大  
子使男并年七用穀二石一斗六升大 凡用穀六石  
(合校:27·4)
- (26) 制虜隧卒張孝 妻大女弟年卅四用穀二石一斗六升大  
子未使女解事年六用穀一石一斗六升大 ●凡用穀三石三斗三升少  
(合校:55·25)

<sup>①</sup> 關於“省卒”,于豪亮先生最早指出其性質是“從各候、遂抽調出來從事勞動的士卒”。參見于豪亮《居延漢簡中的“省卒”》,《文物》1963年第11期,46頁;收入其著《于豪亮學術文存》,北京:中華書局,1985,217頁。儘管後來學者對“省卒”的研究不斷深入,但對於“省卒”的性質的認識,基本還是認可于先生的論斷。參見李振宏《漢簡“省卒”考》,《史學月刊》1993年第4期,9頁;邢義田《漢代邊塞的助吏、省卒、士吏、候長和精兵產地——讀〈居延新簡〉札記》,收入徐莘芳先生紀念文集編輯委員會編《徐莘芳先生紀念文集(下)》,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555-556頁。

- 妻大女君以年廿八用穀二石一斗六升大
- (27) 執胡隧卒富鳳 子使女始年七用穀一石六斗六升大  
子未使女寄年三用穀一石一斗六升大·凡用穀五石  
(合校:161·1)
- (28) 妻大女佳年十八用穀二石一斗六升大 (合校:203·4)
- (29) 武成隧卒孫青肩  
妻大女筭年卅四用穀二石一斗六升大  
子使女于年十用穀一石六斗六升大  
子未使女女足年六用穀一石一斗六升大 凡用穀五石 (合校:203·7)
- 妻大女嚴年十七二石一斗六升大
- (30) 俱起隧卒王并 子未使女毋知年二用穀一石一斗六升大  
●凡用穀三石三斗三升少 (合校 203·13)
- (31) □李護宗 妻大女女足年廿九用穀二石一斗六升大  
子使男望年七用穀二石一斗六升大  
●凡用穀四石三斗三升少 (合校:203·19)
- 妻大女待年廿七
- (32) □ 子未使男偃年三 省芟用穀五石三斗一升少  
子小男霸年二 (合校:203·23)
- (33) □用穀三石 父大男相年六十用穀三石  
□用穀三石 凡用穀九石 (合校:203·27)
- 妻大女君至年廿八用穀二石一斗六升大
- (34) □弟大女待年廿三用穀二石一斗六升大  
子使男相年十用穀二石一斗六升大 (合校:203·32)
- (35) 制虜隧卒張放 妻大女自予年廿三用穀二石一斗六升大  
子未使男野年二用穀一石六斗六升大□ (合校:231·25)
- 母大女存年六十七用穀二石一斗六升大
- (36) 俱起隧卒丁仁 弟大女惡女年十八用穀二石一斗六升大  
弟使女肩年十三用穀一石六斗六升大●凡用穀六石  
(合校:254·11)
- (37) □父大男賢年六十二用穀三石  
□弟大男宣年廿二用穀三石  
□子使女阿年十三用穀一石六斗六升大 凡用穀七石六斗六升大

(合校:286·6)

(38) 𠙴驚虜隧卒徐𠙴

妻大女商弟年廿八用穀二石一斗六升大

子未使男益有年四用穀一石一斗六升大

子𠙴𠙴年一用穀一斗

●凡用穀四石六𠙴

(合校:317·2)

弟大男𠙴年十七

(39) 郭卒史惕 弟使男正年十四用穀十石三斗三升少

姊大女正爲年廿

(集釋:E.S.C:55)

這些戍卒家屬的月廩糧標準大致是:大男用穀三石;大女、使男用穀二石一斗六升大;使女、未使男用穀一石六斗六升大;未使女用穀一石一斗六升大。<sup>①</sup>而標明“居署”者,情況則比較複雜:從廩糧記錄看,有些簡文顯然不是按上述標準執行的,如大女,簡(7)、(17)、(21)明確記爲二石九升少。同樣是“居署”的大女,爲什麼廩食會有二石一斗六升大與二石九升少之別?日本學者森鹿三認爲,這與大、小月的配給不同有關。<sup>②</sup>這一觀點無疑十分準確,簡(13)、(18)分別提到“居署”卅日的大女、大男,其用穀分別爲二石一斗六升大和三石,<sup>③</sup>可見上述未標明“居署”的家屬廩糧標準是以卅日,也就是大月的標準計算的。簡(19)提到“居署廿九日”,“廿九日”應是小月的計算標準。至於簡(10)、(12),按“卅日”與“廿九日”標準都無法對上,或許是當時計算上的錯誤。<sup>④</sup>

綜上可知,未標明“居署”的家屬廩食記錄,都是以“卅日”標準領取口糧的。而標明“居署”者,則有兩種:其一爲以“卅日”標準廩食者如前所述之簡(13)、(16)、(18)、(20);其二爲以“廿九日”標準廩食者如簡(9)、(10)、(11)、(12)、(17)、(19)。從這點看來,“卒家屬居署名籍”與“卒家屬名籍”性質是一致的,都是戍卒家屬的廩食記錄,祇是前者區分大、小月,後者均以大月爲標準。因此,以“居署”爲“守署”的觀點似不能成立,所謂“見署”“居署”“在署”,應該指的就是“在現署所、現處所”。<sup>⑤</sup>

那麼,爲什麼會出現“卒家屬居署名籍”與“卒家屬名籍”兩種性質一樣、名稱不同的名籍?森鹿三發現這些家屬廩糧記錄,其結計部分可分爲兩類:“凡用穀幾石”類和“見署用穀

① 參見[日]森鹿三《論居延出土的卒家屬廩名籍》,《簡牘研究譯叢》第1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3,105頁;徐揚傑《居延漢簡廩名籍所記口糧的標準和性質》,《江漢論壇》1993年第2期,69頁。

② 參見[日]森鹿三《論居延出土的卒家屬廩名籍》,106-107頁。

③ 原簡殘斷,“二石一”後面內容不知,但從簡文記載方式推測,應該是“二石一斗六升大”。

④ 森鹿三認爲這兩枚簡“把配給量總計記錯了”,這種情況也是可能存在的。參見[日]森鹿三《論居延出土的卒家屬廩名籍》,107頁。

⑤ 李天虹:《居延漢簡簿籍分類研究》,北京:科學出版社,2003,69頁。

幾石”類。前者“分別記載家屬的配給量細目”，後者則“不記載配給量細目”。因此，前者為申請配給穀物的記錄，後者為實際領取穀物的記錄。<sup>①</sup> 從上引簡文可知，森鹿三的前一說法尚屬絕對，“凡用穀幾石”類也有不記載配給細目的，如簡(39)；“見署用穀幾石”類也有記載配給細目者，如簡(21)。儘管如此，森鹿三的申請與實際領取說，無疑仍頗具啟發，它既能很好地解決上述疑問，同時也能幫助我們理解戍卒家屬的口糧發放程序與過程。

關於戍卒家屬的廩食程序與過程，我們知之甚少，祇能通過吏卒的廩食程序與過程加以推測。研究表明，吏卒口糧的領取，一般是各部製作其吏卒廩名籍，然後向候官或糧倉上報，上報時間一般為當月月底，而申報的則是下月的廩食需要。大概通過上級的核査後，各部再派吏卒前往領取。領取的時間一般是當月月底，最晚當月月初，“否則會有乏食之憂”。<sup>②</sup> 也就是說，吏卒的口糧是按月提前發放的。戍吏的口糧一般不受大、小月影響，而戍卒的口糧則與卒家屬一樣，因大、小月不同，而有“卅日”與“廿九日”標準之分。<sup>③</sup> 因為申報和領取可能都祇有一個名籍，因此，候官所轄各部或隧在製作這一名籍時，需將大、小月考慮進去。也就是說，吏卒廩名籍需寫清楚所領口食的月份，如：

(40) 建平三年六月庚辰朔戊申萬歲候長宗敢言之謹移部吏卒

廩七月食名籍一編敢言之

(集釋:E.P.T43:6)

簡(40)是申報的記錄，六月申報七月的廩食。吏卒領取口糧時，亦需明確記載所領口食的月份：

(41) 第三隧卒王譚 十月食三石三斗三升少 九月己卯自取

(集釋:E.P.T5:2)

(42) 第六隧長皇隆 正月食三石 正月辛巳自取

(集釋:E.P.F22:83)

從這點看，“凡用穀幾石”的簡文未記載這些家屬所領取口食的月份，而是統一以“卅日”為標準進行分述和總計，可能確如森鹿三所說，其性質祇能是申請口食的記錄。那麼，“居署用穀幾石”的簡文應是戍卒家屬實際領取的口食記錄。這些記錄里應記載領取人及領取時間，但從上引“居署”簡文看，明確記載領取人與領取時間的祇有簡(17)。從“居署盡晦”“居署廿九日”“居署卅日”等記載來看，戍卒家屬領取口食的時間可能是在月底，也就是晦日，因為祇有這樣，“居署”天數的考察纔有實際的意義。因此，簡(17)所述“六月乙卯”，可能就是六月的晦日。

這樣看來，儘管戍卒家屬與戍卒一樣，實際所廩口食受大、小月影響，但二者的待遇又有

① [日]森鹿三：《論居延出土的卒家屬廩名籍》，107-108 頁。

② 參見趙寵亮《行役戍備——河西漢塞吏卒的屯戍生活》，174-176 頁。

③ 參見趙寵亮《行役戍備——河西漢塞吏卒的屯戍生活》，168 頁。

不同：戍卒的口糧是提前發放的，因為戍卒要服務於戍所，不能乏食；而戍卒家屬是在“居署盡晦”之後才廩取當月口食的。也正因如此，居延漢簡中可見吏卒因不能繼續工作交還所領口糧的記錄，如因貧寒而被罷休的隧長需交還“十五日食”，<sup>①</sup>而不見戍卒家屬交還所領口食的記錄。<sup>②</sup>在居延漢簡中，倒是可見戍所拖欠戍卒家屬口食的記載：

(43) 尉史臨白故第五隧卒司馬誼自言除沙殄北未得去年九

月家屬食誼言部以移籍廩令史田忠不肯與誼食

(合校：89·2)

司馬誼是在第五隧的時候被抽調去殄北除沙，其身份應是省卒。所謂“移籍”，有的學者認為是因為司馬誼作為省卒被抽調走，其家屬因隨之附籍而產生“移籍”現象。<sup>③</sup>所以司馬誼自言“未得去年九月家屬食”，其所廩單位應該是殄北候官。司馬誼追要的家屬食是去年九月的，說明這一拖欠已過數月。由此看來，戍卒家屬應該是自備了一些糧食的，否則如司馬誼的家屬，九月一整月沒有領到口食，如果沒有存糧，似乎難以渡過難關。

戍卒家屬在赴邊與返鄉時，可能都需自備口糧。在邊地生活時，雖然有戍所發放的口糧，但因其發放的滯後性，導致其最初月份需有自備口糧。為貼補家用，戍卒家屬，尤其是戍卒的妻子，可能會從事些勞作。很多學者都注意到所謂女子“為士卒衣補”的現象，<sup>④</sup>西北漢簡也確實可見這樣的簡文：

(44) 妻治裘□□

(合校：552·2A)

□二女同居□□

(合校：552·2B)

簡文殘斷較嚴重，“妻治裘”前後文不知，但推測可能與“為士卒衣補”有關。王子今先生即認為，“卒妻”們可能是承擔“為士卒衣補”的主要人力。<sup>⑤</sup>

至於這些隨軍家屬的住處問題，從“居署”的含義看，大概邊地是給其安排住處的，這些住處統稱為“署”。<sup>⑥</sup>那麼，“署”具體指的是什麼處所呢？有一種觀點認為“署”指的就是烽燧，<sup>⑦</sup>烽燧為戍卒日常工作—候望的場所，其旁為吏卒居住之處，這些似乎都不可能是戍卒家

① 參見趙寵亮《行役戍備——河西漢塞吏卒的屯戍生活》，78頁；鍾良燦《〈居延新簡〉所見“寒吏”》，《南都學壇》2015年第2期，12頁。

② 有的學者認為戍卒家屬不到一個月就走了，其所領口糧不必交還。參見徐揚傑《居延漢簡廩名籍所記口糧的標準和性質》，67頁。筆者以為，居延漢簡中之所以不見戍卒家屬交還當月所領口糧，是因為他們是在月底領取口糧，如果沒到月底就走了，是否還能領取到當月的口糧還是一個疑問，因此不存在交還當月口糧的問題。

③ 汪華龍：《“省卒”及其相關問題補論》，《國學學刊》2015年第4期，113頁。

④ 王子今：《漢代軍隊中的“卒妻”身份》，3頁；王子今：《秦漢稱謂研究》，278頁；趙寵亮：《行役戍備——河西漢塞吏卒的屯戍生活》，362頁。

⑤ 王子今：《漢代軍隊中的“卒妻”身份》，3頁；王子今：《秦漢稱謂研究》，277頁。

⑥ 薛英群：《居延漢簡中的“秋射”與“署”》，《史林》1988年第1期，25頁。

⑦ 李天虹：《居延漢簡簿籍分類研究》，69頁。



屬居住之地。<sup>①</sup> 有學者指出，戍卒家屬應該居住在離烽燧不遠的邊地的“辟(壁)”或田舍中，<sup>②</sup>這些辟與田舍存在對應關係，田舍極有可能是在辟中。<sup>③</sup> 從已有資料看，這種觀點可能是正確的，在居延漢簡中，可見這樣一枚簡：

(45) 掾從謹責問第四候史敞第八隧長宗迺癸未私歸塢壁田舍(集釋:E.P.T:51:74)

趙寵亮即指出，這裏的“田舍”應當就在“塢壁”之中。<sup>④</sup> 按塢壁、田舍，也有可能是并列關係，“田舍”未必包含在“塢壁”之內。從已有資料看，“塢壁”和“田舍”均可住人，因此戍卒的家屬被安排住在“塢壁”或“田舍”中，是極有可能的。值得注意的是，簡(45)私歸塢壁田舍的是候史、隧長，這說明他們的家屬也隨軍來到邊地，被安置在塢壁田舍中。候史、隧長作為戍吏，也有家屬隨軍，這與上文所引戍卒家屬廩食的記錄多少有些不符。從前引戍卒家屬廩名籍看，廩食的主要對象是戍卒家屬，而不見戍吏家屬。這是否說明一般祇有戍卒家屬隨軍，而戍吏家屬則仍居住在原戶籍單位？

## 二 戍吏家屬出入符

在西北漢簡尤其是肩水金關簡中，有很多戍吏家屬通關記錄的家屬符，其中信息較為完整的有：

(46) 永光四年正月乙酉子

橐佗延壽隧長孫時符

妻大女昭武萬歲里孫第卿年廿一

小女王女年三歲

弟小女耳年九歲 皆黑色 (合校:29·1)

妻大女昭武萬歲里□□年卅二

(47) 永光四年正月乙酉

橐佗吞胡隧長張彭祖符

子大男輔年十九歲

子小男廣宗年十二歲

子小女女足年九歲

輔妻南來年十五歲 皆黑色

(合校:29·2)

妻子大女鰥得當穿富里成虞年廿六

子小女侯年一歲車二兩

① 參見趙寵亮《行役戍備——河西漢塞吏卒的屯戍生活》，240-241 頁。

② 王海：《河西漢簡所見“辟”及相關問題研究》，《簡帛研究（二〇〇八）》，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0，149 頁。

③ 王海：《河西漢簡所見“辟”及相關問題研究》，149 頁；趙寵亮：《行役戍備——河西漢塞吏卒的屯戍生活》，254 頁。

④ 趙寵亮：《行役戍備——河西漢塞吏卒的屯戍生活》，254 頁。

- (48) 橐他通望隧長成衰  
建平三年五月家屬符  
弟婦孟君年十五用牛二頭  
弟婦君始年廿四馬一匹  
小女護憚年二歲  
弟婦君給年廿五 (肩水:73EJT3:89)
- (49) 肩水候  
永光四年正月壬辰符  
除平陵歸□里公大夫  
大女□□長七尺……□ (肩水:73EJT6:40)  
· 兄妻屋蘭宜衆里井君任年廿一
- (50) 橐他勇士隧長井臨  
建平元年家屬符  
子小男習年七歲  
兄妻君之年廿三 車一兩用□□  
子大男義年十  
子小男馮一歲 (肩水:73EJT6:42)
- (51) 五鳳四年八月庚戌  
橐他石南亭長符  
亭長利主妻鰥得定國里司馬服年卅二歲  
子小女自爲年六歲 皆黑色  
入出止  
(肩水:73EJT9:87)
- (52) □ 橐佗聖宜亭長張譚符 妻大女鰥得安□□  
□ 光二年…… 弟大女…… (肩水:73EJT9:275)
- (53) 橐他上利隧長家屬  
建始四年正月己丑符  
金關□  
子小男恭年六歲  
子小女君倭年四歲□  
子小男相年二歲 (肩水:73EJT28:9A)  
(肩水:73EJT28:9B)
- (54) 初元四年正月癸酉  
橐佗殄虜隧長符  
隧長奉妻鰥得常樂里大女葉中孫年廿五歲  
子小女寔年五歲  
子小男忠年一歲 · 皆黑色  
奉弟輔年十七歲  
奉弟婦婢年十六歲 (肩水:73EJT30:62)
- (55) 初元四年正月庚申  
橐他馳馬亭長孫猛符  
兄子昭武萬歲里  
□妻鰥得□□  
子小女□耳年  
子小男建□ (肩水:73EJT31:40)
- (56) 橐他置佐昭武便處里審長  
建平二年家屬符  
妻大女至年卅五 牛車一兩  
子小女侯年四 用牛四頭

- 子小男小奴年一歲 (肩水:73EJT37:175)
- (57) 橐他□望隧長□□ 弟大男□□年□ 牛二頭  
 建平四年正月家屬出入盡十二月符 弟婦始年廿 車一兩  
 子小女倩卿年三歲  
 (肩水:73EJT37:176)
- (58) 建平四年正月家屬符出入盡十二月 男□年二  
 葆弟昭武宜春里辛昌年廿四歲  
 (肩水:73EJT37:177)
- (59) 橐他沙上隧長魯欽 妻昭武便處里魯請年十九  
 建平元年正月家屬符 (肩水:73EJT37:754)
- (60) 子男臨年十六  
 建平二年家屬符 子女召年廿 子女青年二歲  
 子女驕年十三  
 子婦君陽年廿三 子女君乘年八 子男欽年三歲  
 (肩水:73EJT37:755)
- (61) 妻大女鰥得安成里陳自爲年卅四  
 橐他收降隧長陳建 子小男憚年九歲 車一兩  
 建平二年正月家屬符 子小女護□年□□ (肩水:73EJT37:756)
- (62) 母昭武平都里虞儉年五十  
 橐他南部候史虞憲 妻大女醜年廿五大車一兩  
 建平四年正月家屬出入盡十二月符 子小女孫子年七歲 用牛二頭  
 子小男馮子年四歲 用馬一匹  
 (肩水:73EJT37:758)
- (63) 橐他曲河亭長昭武宜春里 妻大女陽年廿三 車牛一頭  
 陸永家屬符 子小女頃閭年三歲 用牛二頭  
 (肩水:73EJT37:761)
- (64) 橐他石南亭長王并 妻大女昭武宜衆里王辦年五十  
 建平四年正月家屬出入盡十二月符 子男嘉年十一歲  
 大車一兩  
 用牛二頭

用馬一匹

(肩水:73EJT37:762)

(65) 橐他駁南隧長孫章 妻大女鰥得壽貴里孫遷年廿五

陽朔三年正月家屬符 子小男自當年二

皆黑色

(肩水:73EJT37:1007)

母居延屏庭里徐都君年五十

男弟鰥得當富里張惲年廿

車二兩

(66) 橐他候史氏池千金里張彭

男弟臨年十八

用牛四頭

建平四年正月家屬符

女弟來侯年廿五

馬三匹

女弟驕年十五

彭妻大女陽年廿五

(肩水:73EJT37:1058)

妻大女鰥得常樂里宋待君年廿二

(67) 橐他通道亭長宋捐之

子小男自當年九

永始四年家屬符盡十二月

子小女廉年六

(肩水:73EJT37:1059)

符是秦漢時期人們過津關所用的憑證,<sup>①</sup>西北漢簡所見的符主要有兩種:其一為普通出入關憑證,即李均明先生所說祇署文號不署人名的普通通關憑證,<sup>②</sup>如:

(68) 始元七年閏月甲辰居延與金關為出入六寸符券齒百從

第一至千左居

官右移金關符合以從事●第八

(合校:65·7)

這種符作為個人出關憑證,因需要而發,事後即歸還。因為不記載通關人的個人信息,所以這種符可以反復使用。<sup>③</sup>第二種符即為“家屬符”,或稱“家屬出入符”,這種符是專為邊地戍吏家屬所發放的出入關憑證,因詳細記載了家屬的各項信息,故而是有針對性的、專用的符。

從上引“家屬出入符”看,其主要記載的信息有:第一,日期,正如有的學者所指出的,日期是家屬出入符使用有效期限。<sup>④</sup>日期的記載方式,有以下幾種:其一為記載具體某年某月某日的,如簡(46)、(47)、(49)、(51)、(53)、(54)、(55);其二為祇記載某年某月的,如簡(48)、(59)、(61)、(65)、(66),其中簡(48)是五月,其他均為正月;其三為祇記載某年的,如

① 參見陳直《居延漢簡研究》,北京:中華書局,2009,45頁;李均明《漢簡所見出入符、傳與出入名籍》,《文史》第19輯,北京:中華書局,1983,29頁;[日]大庭脩《漢代的符和致》,《中國史研究》1989年第3期,136頁。

② 李均明:《秦漢簡牘文書分類輯解》,434頁。

③ 李均明:《秦漢簡牘文書分類輯解》,434頁。

④ 黃豔萍:《漢代邊境的家屬出入符研究——以西北漢簡為例》,77頁。

簡(50)、(56)、(60);其四為記載某年正月盡十二月的,如簡(57)、(58)、(62)、(64)、(67)。從年份來看,有漢宣帝五鳳四年(前54)、漢元帝初元四年(前45)、永光四年(前40)、漢成帝建始四年(前29)、陽朔三年(前22)、永始四年(前13)、漢哀帝建平元年(前6)、建平二年(前5)、建平三年(前4)、建平四年(前3),幾乎貫穿西漢中後期各時段,可見當時的戍吏家屬出入符是制度化的產物。從月份看,有正月、五月、八月之別,其中以正月居多。按漢武帝太初曆改十月歲首為正月歲首,正月簡文反映出這種家屬出入符的製作和使用主要在一年之首。

第二,戍吏的職務,從簡文記載看,主要有隧長,如簡(46)、(47)、(48)、(50)、(53)、(54)、(57)、(59)、(61)、(65);肩水候,如簡(49);亭長,如簡(51)、(52)、(55)、(63)、(64)、(67);置佐,如簡(56);候史,如簡(62)、(66)。其中隧長和亭長顯然居大多數,反映出這些擁有家屬出入符的都是邊塞的基層戍吏。

第三,家屬籍貫,家屬籍貫記載大體分兩類,其一為記載戍吏籍貫時,家屬不再記載籍貫,如簡(56)、(63);其二為記載戍吏之妻的籍貫,如簡(46)、(47)、(48)、(49)、(50)、(51)、(52)、(54)、(59)、(61)、(64)、(65)、(67),也有記載戍吏之母的籍貫的,如簡(62)。也有幾例特殊情況,如簡(55)橐佗馳馬亭長孫猛符,既載兄子的籍貫昭武萬歲里,又載妻的籍貫鱧得,可見孫猛與其兄子并不是同一戶籍,故而需要分述其妻與其兄子的籍貫。再如簡(66),既載橐佗候史張彭的籍貫氏池千金里,又載其母籍貫居延屏庭里,同時還載其弟籍貫鱧得當富里。從簡(66)的籍貫記載方式看,張彭之母以及其弟張惲都不同戶籍,而男弟臨,女弟來侯、驕可能與張彭同戶。也就是說,張彭與成年弟弟張惲業已分居,而帶着未成年弟弟、妹妹同居。至於張彭的母親,或已改嫁他人,或是跟着張彭的另一個業已成家的兄弟生活,故而籍貫與張彭及張惲均不同。

上引簡文所載戍吏或戍吏家屬籍貫主要有:昭武縣,如簡(46)、(47)、(56)、(58)、(59)、(62)、(63)、(64);鱧得縣,如簡(48)、(51)、(52)、(54)、(55)、(61)、(65)、(67);此外簡(66)候史張彭籍貫為氏池縣,其母為居延縣,其弟為鱧得縣。據《漢書·地理志下》載,昭武、鱧得、氏池、居延同屬於張掖郡,<sup>①</sup>這也是這些人能成為戍吏的主要原因之一。從家屬籍貫記載看,這些戍吏的家屬應該是并未隨軍,而是仍居住在戶籍原單位。

第四,家屬成員,這些戍吏的家屬較為複雜,有同戶籍的家庭成員,如妻、子女、子婦、母、兄、兄妻、兄子等;還有不同戶籍的親屬,如簡(55)孫猛的兄子,簡(66)張彭的母、弟等。總的來看,“家屬出入符”所反映的戍吏的家屬成員十分複雜,下文將重點論述,此暫從略。

綜上可知,這些詳細記載家屬信息的“家屬出入符”僅適用於戍吏家屬。這些戍吏家屬

<sup>①</sup> 《漢書》卷二八下《地理志下》,北京:中華書局,1962,1613頁。

可能並不隨軍,而是仍居住在戶籍原單位。因為戍吏長期服務戍所,雖有制度性的休假,<sup>①</sup>但與家人相處的時間仍有限。因此,邊地為其家屬提供“出入符”,使他們有機會去戍所探望自己的家人。<sup>②</sup>從“正月家屬出入盡十二月符”來看,這些戍吏家屬來到戍所探望家人的機會還是相當多的。當然,這種全年有效的家屬符可能還是少數,大部分家屬符都有具體的時日限制。

居延漢簡里也可見戍卒家屬探親的記錄:

- (69) □□□□當遂里士五王惲年卅五 妻大女臨年整卅八□  
子小男崇年七  
子小男尊年三出入安  
(集釋:E.P.T65:121)
- (70) 鉞庭隧卒鳴沙里大夫范弘年卅四 父大男輔年六十三∟弟大男憲年十七∟□  
妻大女始年十八∟□  
(集釋:E.P.T65:145)
- (71) 甲渠三墩隧卒當遂里左豐 父大男長年五十□  
母大女丕年卅八□  
妻大女用年廿二□  
(集釋:E.P.T65:478)

居延縣有當遂、鳴沙里,從其書里不書縣的記載方式看,很有可能是省略了縣的記載。這些戍卒應該是居延本地人,他們的家屬出現在戍所,可能是前往戍所探親的記錄。<sup>③</sup>除此之外,也有本地戍吏家屬前往戍所為家人送日用物品的記錄,如敦煌漢簡:

- (72) 元康元年七月壬寅朔甲辰關嗇夫廣德佐熹敢言之敦煌壽陵里趙負  
趣自言夫訢為千秋隧長往遺衣用以令出關敢言之 (敦煌:796)

這是敦煌壽陵里女子趙負趣為夫千秋隧長送衣用物品而出關的記錄,從簡文可知,趙負趣作為千秋隧長的妻子,並沒有隨軍住在戍所附近,而是仍居住在敦煌壽陵里,為了給丈夫送衣用物,必須以令出關。這些家屬出入金關,有專門的名籍:

① 研究表明,邊地吏卒有制度性休假,且假期可以積攢,本地吏卒即可通過積攢的假期回家與家人團聚,參見趙寵亮《行役戍備——河西漢塞吏卒的屯戍生活》,97頁。如“鄣卒蘇寄九月三日封符休居家十日往來二日會月十五日”(集釋:E.P.T17:6),從往返兩日看,該鄣卒蘇寄家應該離戍所不遠。此外,簡文“休中得為母卜祠□”(集釋:E.P.T44:32)也反映出本地吏卒利用休假回家從事為母親卜祠的活動。

② 趙寵亮:《行役戍備——河西漢塞吏卒的屯戍生活》,331頁。

③ 趙寵亮:《行役戍備——河西漢塞吏卒的屯戍生活》,361頁。



(73) 鴻嘉五年吏妻子

及葆出入關

名籍

(肩水:73EJT21:35A)

鴻嘉五年五月

吏妻子出入關

及葆名籍

(肩水:73EJT21:35B)

(74) 橐佗候官與肩水金關爲吏妻子葆庸出入符齒十從一

至百左居官右移金關符合以從事(右齒)

(肩水:73EJT22:99)

(75) 橐佗候官與肩水金關爲吏妻子葆庸出入符齒十

從第一至百左居官右移金關葆合以從事 第卅一(左齒)

(肩水:73EJT24:19)

簡(73)是吏妻子及葆的出入關名籍,(74)、(75)是吏妻子及葆庸的出入符。關於西北漢簡中的“葆”,學界有“質保”<sup>①</sup>“擔保”<sup>②</sup>“身份”<sup>③</sup>說,這裡的“葆”與吏妻子、庸等并稱,顯然是一種身份。從“吏妻子及葆”“吏妻子葆庸”的記載來看,葆與庸應該都是吏妻子的一種私人隨從。賈麗英指出,身份性的“葆”指的是可包括男女的、長期從事庸作勞役的一般庶民。<sup>④</sup>現在看來,這種觀點可能是正確的。也就是說,上引簡文中的“葆”是長期在吏妻子家從事家務勞作的僱用工,其性質與庸相似。

我們在西北漢簡中也可看到吏妻子作爲“葆”而出現的例子:

(76) 平樂隧長毛武 葆子男鯨得敬老里公乘毛良年廿三 出入 三月癸丑北出  
三月癸酉南入

(肩水:73EJT37:83)

葆妻鯨得長壽里趙吳年廿七

(77) 橐佗野馬隧長趙何 子小女佳年十三

子小男章年十一

(肩水:73EJT37:846)

① 參見陳直《兩漢經濟史料論叢》,北京:中華書局,2008,44頁。

② 參見李均明《漢代屯戍遺簡“葆”解》,《文史》第38輯,北京:中華書局,1994。

③ 裘錫圭:《新發現居延漢簡的幾個問題》,收入其著《古文字論集》,北京:中華書局,1992,617頁。

④ 賈麗英:《西北漢簡“葆”及其身份釋論》,《魯東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4年第5期,69頁。

毛武之子毛良和趙何之妻趙吳的身份都是“葆”，即他們都是別人家的僱用工。賈麗英由此進一步認為，“葆”不僅本身從事庸作，其家人也可能要為其僱主及其家庭進行勞作。<sup>①</sup> 筆者以為這一觀點還有待商榷，從上引簡文看，毛良和趙吳的“葆”身份是否說明毛武、趙何的身份也是“葆”？毛武和趙何身為邊塞隧長，顯然不可能是其他個人和家庭的“葆”。因此，這裏的“葆”祇是其家屬的身份，可能出於貼補家用的需要，這些吏家屬也為他人提供勞作。

隨軍戍卒的家屬有時也需為他人提供勞役。在居延漢簡中，可見這樣的簡文：

(78) 匚為妻子葆處居匚

匚匚勞四月適奉匚

(合校: 243·25)

這裏的“葆”，其對象可能不是戍吏的家屬，而是戍卒的隨軍家屬。“妻子葆處居”，說明從事葆庸勞役的隨軍戍卒家屬是集中居住的，其目的可能是便於管理。如果這一理解不誤，那麼可以推測：即使同為“葆”，吏妻子仍居住在戶籍原單位，在原戶籍所在地管理之下；而隨軍戍卒的妻子則是集中居於“葆處”，受到統一管理。

### 三 吏卒的家屬構成

戍卒家屬名籍與戍吏家屬出入符是否如有的學者所說，能反映出漢代邊郡的家庭結構？<sup>②</sup> 首先，我們必須明確一個概念，所謂家庭，是以“同籍共財”為基本特徵的社會最基本單位。“共財”在簡文中似乎難以體現，但“同籍”是一個重要指標。從這點看，上引戍卒家屬名籍，幾乎不載籍貫。可以推測，這些隨軍家屬大概與戍卒祇能是“同籍共財”。而家屬出入符所反映的戍吏家屬却比較複雜，如前所述，有些家屬籍貫與戍吏並不一致，因此其與戍吏的關係應該不是“同籍共財”關係。這些非“同居共財”的親屬祇是來戍所探望親人，不能把他們等同於一般家庭成員。當然，這種情況畢竟還是少數，多數探親的家屬同時也是戍吏的家庭成員。

先看戍卒的家庭構成，從上引簡文可知，戍卒的隨軍家屬構成主要有以下幾類：第一，由妻、子女組成的家屬，如簡(7)、(8)、(11)、(13)、(14)、(17)、(19)、(20)、(25)、(26)、(27)、(28)、(29)、(31)、(32)、(35)、(38)；第二，由妻、子女、父母組成的家屬，如簡(12)、(21)、(33)；第三，由妻、子女、同產組成的家屬，如簡(9)、(10)、(24)、(34)；第四，其他特殊組成者，如簡(16)、(36)為弟與母，簡(18)為弟大男，簡(37)為父、弟、子，簡(39)為弟與姊等。由於資料的殘缺與不全，這些統計並不能完整反映戍卒家屬的全部面貌，但仍可看出大體的

① 賈麗英：《西北漢簡“葆”及其身份釋論》，74頁。

② 黃豔萍：《漢代邊境的家屬出入符研究——以西北漢簡為例》，77-78頁。

趨勢：由妻、子女組成的家屬無疑居主導地位。

妻子應該是最主要的隨軍家屬，這是因為妻子是編戶民家庭中最核心的家屬。因此，在以一夫一婦外加未成年子女組成的核心家庭中，其所謂家屬就是妻子。史書記載中的“家屬”，往往所指就是“妻子”，如《後漢書·段熲列傳》載：

光和二年，復代橋玄為太尉。在位月餘，會日食自劾，有司舉奏，詔收印綬，詣廷尉。時司隸校尉陽球奏誅王甫，并及熲，就獄中詰責之，遂飲鴆死，家屬徙邊。後中常侍呂強上疏，追訟熲功，靈帝詔熲妻子還本郡。<sup>①</sup>

同書《宦者列傳》載呂強上疏，內稱：“陛下既已式序，位登台司，而為司隸校尉陽球所見誣脅，一身既斃，而妻子遠播。天下惆悵，功臣失望。宜徵邕更授任，反熲家屬，則忠貞路開，衆怨以弭矣。”<sup>②</sup>“妻子遠播”即指“家屬徙邊”，“反熲家屬”則與“詔熲妻子還本郡”義同，則知段熲的“家屬”就是其“妻子”。

簡(6)提到“家屬妻子”，此外，西北漢簡中又可見“妻子家屬”稱謂：

(79) 校尉苞□□度遠郡益壽塞徵召餘十三人當為單乎(于)者苞上書謹□□為單乎者十三人其一人葆塞稽朝候咸妻子家屬及與同郡虜智之將業

(額濟納：2000ES9SF4:10)

(80) 居攝三年六月丙子朔丙子張掖……

吏妻子家屬夕客如牒謁移

(肩水：73EJT24:75A)

如律令敢言之

(肩水：73EJT24:75B)

史籍記載中也可見“妻子家屬”稱謂，如《漢書·陳湯傳》載陳湯“願與妻子家屬徙初陵，為天下先”。<sup>③</sup>陳湯此行是接受了解萬年的建議，解萬年的說法是“子公妻家在長安，兒子生長長安，不樂東方，宜求徙”，<sup>④</sup>可見陳湯的妻子家屬也就是其妻子。也正因妻子是最核心的家屬，因而妻子又被稱為“累重”。<sup>⑤</sup>

上引陳湯願與妻子徙邊的例子表明，漢代募民徙邊，可能是妻子自隨。漢代死囚減罪徙邊，作為家屬的妻子必須自隨，而父母同產則可自主選擇去留：

① 《後漢書》卷六五《段熲列傳》，北京：中華書局，1965，2154 頁。

② 《後漢書》卷七八《宦者列傳》，2531 頁。

③ 《漢書》卷七〇《陳湯傳》，3024 頁。

④ 《漢書》卷七〇《陳湯傳》，3024 頁。

⑤ 顏師古注“累重”，一曰：“累重謂妻子也”（《漢書》卷六九《趙充國傳》，2991 頁）；一曰：“累重謂妻子資產也”（《漢書》卷九四《匈奴傳》，3778 頁）；一曰：“累重謂妻子家屬也”（《漢書》卷九六《西域傳》，3912 頁）。可見妻子是“累重”的最核心部分。

詔三公募郡國中都官死罪繫囚，減罪一等，勿笞，詣度遼將軍營，屯朔方、五原之邊縣；妻子自隨，便占著邊縣；父母同產欲相代者，恣聽之。<sup>①</sup>

這是漢明帝時期的詔書，“父母同產欲相代者”，章帝時期的詔書作“父母同產欲相從者”，<sup>②</sup>其義更明。安帝時期，仍在施行這一政策：

詔郡國中都官繫囚減死一等，勿笞，詣馮翊、扶風屯，妻子自隨，占著所在；女子勿輸。<sup>③</sup>

值得重視的是“女子勿輸”，李賢解釋為“不輸作”。詔書特別指出“女子勿輸”，反映出之前自隨徙邊的罪囚之妻應該是要輸作的。“妻子自隨”，既是對徙邊罪犯的一種“仁政”，使其可享受家庭之天倫；同時對於“妻子”來說也是一種懲罰，作為罪犯之妻，徙邊“占著所在”後，還要輸作。

《漢書·李陵傳》載李陵與匈奴連戰失利，因而懷疑軍中有女子：

始軍出時，關東群盜妻子徙邊者隨軍為卒妻婦，大匿車中。陵搜得，皆劍斬之。<sup>④</sup>

關東群盜的妻子是要徙邊的，他們混進出戰的軍營，“隨軍為卒妻婦”，可能是為了逃避輸作，也可能是為求生存。不管怎樣，徙邊的妻子路途之艱辛，似不難斷言。<sup>⑤</sup> 因此，祇有對特殊人群，政府纔強制其徙邊。《漢書·宣元六王傳》載京房等因陷以陰陽災異“誑耀淮陽王”而被誅，“妻子徙邊”。<sup>⑥</sup> 東漢時期的黨錮之禍，受牽連下獄死者百余人，“妻子徙邊”，“諸附從者錮及五屬”。<sup>⑦</sup> 可見“妻子徙邊”是一個十分重的懲罰。

漢代罪犯徙邊，妻子自隨是強制性的，而對於父母、同產則並沒有強制要求。漢代戍邊的戍卒，其身份自然與罪犯刑徒不同，因此，其妻子乃至父母、同產的隨軍當然也是自主選擇的結果。上文已述，戍卒隨軍家屬主要為妻子，但也不乏父母、同產及其他親屬的存在。這些戍卒家屬做出隨軍的選擇，可能有各種的考量。作為戍卒妻子，也許是因為生存需要，畢竟戍所每月能提供一份口糧；作為戍卒父母，也許是因為與子同居，生活上無其他依靠；作為其他家屬，可能是生活上尚難獨立，必須依存於戍卒生活。不管是何種情況，隨軍家屬寄居邊地，對於戍卒與家屬而言，親情上有了安慰，情感上也有了寄托。在肩水金關簡中，我們看

① 《後漢書》卷二《顯宗孝明帝紀》，111 頁。

② 《後漢書》卷三《肅宗孝章帝紀》，143 頁。

③ 《後漢書》卷五《孝安帝紀》，224 頁。

④ 《漢書》卷五四《李廣蘇建傳·李陵傳》，2453 頁。

⑤ 參見王子今《居延漢簡所見“戍卒行道物故”現象》，《史學月刊》2004 年第 4 期。

⑥ 《漢書》卷八〇《宣元六王傳》，3318 頁。

⑦ 《後漢書》卷八《孝靈帝紀》，330 頁。

到這樣一枚簡：

(81) 母它昆弟 與□□  
病野遠爲吏死生恐不相見□

(肩水:73EJT6:35)

簡文內容殘斷，祇能作一些推測：主人公是一個遠在邊地服務的戍吏，有兄弟一人（毋它昆弟），因生病而心生“死生恐不相見”的感歎。<sup>①</sup> 隨軍家屬雖居苦寒之地，却也能一家團聚，享受一般家庭的天倫之樂，這可能是他們做出隨軍選擇的主要原因之一。而且，久居邊地的戍卒家屬可能與復原戍卒一道留在邊地、“著籍當地”。

那麼，在邊地擔任戍吏的本郡人，他們的家屬構成情況如何？前文已述，這些戍吏家屬出入符所反映的是戍吏的家屬前往戍所省親的通關記錄。這些家屬中有些是與戍吏同戶籍的，有些則祇是戍吏的親屬。同戶籍的家屬，其構成主要有以下幾種：第一，由妻、子女組成的家屬，如簡(51)、(53)、(55)、(56)、(61)、(63)、(64)、(65)、(67)；第二，由妻、子女、父母組成的家屬，如簡(62)；第三，由妻、子女、兄弟及兄弟之婦、兄弟之子女等組成的家屬，如簡(46)、(47)、(48)、(50)、(52)、(54)、(57)、(58)、(59)。顯然，戍吏的家屬構成與戍卒最大的不同之處在於：由妻、子女組成的家屬並不占據主流，而是以妻、子女及未成年兄弟組成的主幹家庭或以妻、子女及已成家兄弟、兄弟之妻、兄弟之子女等組成的聯合家庭占據很大比重。因此，居延地區的家庭結構可能與有的學者所指出的普遍較小的情況正好相反，<sup>②</sup>其家庭結構和規模較之戍卒隨軍家屬要複雜和龐大得多。

綜上可知，籠統地以西北漢簡所見吏卒家庭簡文分析漢代居延地區的家庭結構，這種做法恐怕是不妥的。戍卒家屬名籍所反映的戍卒隨軍家屬，其構成也許不能代表內地編戶民的家庭結構。而戍吏家屬出入符則大體能反映出邊郡地區編戶民的家庭結構和規模，因為這些戍吏家屬並不隨軍，而是居住在原戶籍單位，相對戍卒的隨軍家屬而言，他們是邊地的土著，他們的家庭結構和規模並未受到移徙的影響。

從戍吏的家屬情況看，漢代居延地區的家庭結構可能比較複雜，其家庭規模可能也較大。戍吏的家庭形態以主幹家庭與聯合家庭為主，這與我們所知漢代內地家庭形態以核心

① 參見趙寵亮《行役戍備——河西漢塞吏卒的屯戍生活》，333頁。

② 姚慧琳、高凱：《漢代居延地區家庭規模及結構淺析》，76頁。

家庭爲主的情況有所不同。關於漢代家庭的大小,有所謂“五口之家”的討論。<sup>①</sup> 儘管學界對“五口之家”的“五口”究竟包括哪些人還有爭議,<sup>②</sup>但毫無疑問的是,以一夫一妻外加未成年子女組成的“五口之家”顯然是其主流形態。前引漢明帝詔書說到死罪徙邊是妻子必須自隨而父母同產可自便,許倬雲據此指出,漢代社會“同居共籍的基本親屬圈子,恐怕仍是配偶與未成年子女,父母同產可以同居,也可以不同居,在兩可之間”,<sup>③</sup>所見甚爲卓識。

許倬雲所說,可能主要爲漢代內地的情況,與前述居延邊郡的家庭結構比較,則明顯可看出二者之間的不同:漢代居延地區本地戍吏的家庭結構,以父母妻子組成的主幹家庭以及父母妻子同產組成的聯合家庭爲主,而以“配偶與未成年子女”組成的核心家庭却不占主流。這也許與邊郡的生存環境有關,氣候的寒苦、疾病的困惱、<sup>④</sup>糧食的匱乏,<sup>⑤</sup>使得邊郡地區的人們必須相互依存。對於一個家庭而言,家庭規模的大小與其生存需求有着直接的關係。

附記:本文在寫作和修改過程中,得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曾磊先生和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趙寵亮先生惠助,又得匿名審稿專家提出寶貴修改意見,謹致謝忱!

① 對於秦漢的家庭規模,多數學者認可五口之家的說法,參見瞿同祖《漢代社會結構》,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葛劍雄《西漢人口地理》,北京:商務印書館,2014;許倬雲《漢代家庭的大小》,收入其著《求古編》,北京:新星出版社,2006;喻長詠《西漢家庭結構和規模初探》,《社會學研究》1992年第1期;杜正勝《傳統家族試論》,收入黃寬重、劉增貴主編《家族與社會》,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2005;李根蟠《從秦漢家庭論及家庭結構的動態變化》,《中國史研究》2006年第1期;梁方仲編著《中國歷代戶口、田地、田賦統計》,北京:中華書局,2008;管東貴《戰國至漢初的人口變遷》,收入其著《從宗法封建制到皇帝郡縣制的演變》,北京:中華書局,2010等。然而,也有學者表示不同意見,如韓國學者尹在碩以睡虎地秦簡《日書》所見“室”的結構來探討戰國末期秦的家庭規模,認爲“日書作爲戰國時期秦民間生活指針,反映了當時人立足於生活的共同的思維結構,在此基礎上得出的‘室’之家族結構——三世同堂家族類型,就是當時民間最爲普遍的家族形態,也是當時人們所認同和嚮往的家族類型。”這裏家族即家庭,可見尹在碩認爲一般所認爲以“五口之家”的小家庭爲標準家族(家庭)類型有很多局限性。見[韓]尹在碩《睡虎地秦簡〈日書〉所見“室”的結構與戰國末期秦的家族類型》,《中國史研究》1995年第2期,145頁。

② 參見李根蟠《戰國秦漢小農家庭規模及其變化機制——圍繞“五口之家”的討論》,收入張國剛主編《家庭史研究的新視野》,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出版社,2004,17-21頁。

③ 許倬雲:《漢代家庭的大小》,389頁。

④ 居延漢簡常見戍卒深受疾病之苦,很多疾病是與邊地的氣候、土壤、飲食等密不可分的,邊地居民自然也深受這些疾病影響。關於簡牘所見居延地區的疾病,可參李振宏《漢代居延屯戍吏卒的醫療衛生狀況》,《中原文物》1999年第4期;趙寵亮《行役戍備——河西漢塞吏卒的屯戍生活》,287-295頁。

⑤ 有學者認爲糧食供應之苦是居延地區家庭規模普遍較小的主要原因,參見姚慧琳、高凱《漢代居延地區家庭規模及結構淺析》,76頁。筆者以爲恰恰相反,正是糧食供應的緊張,才需要組成聯合家庭,集中勞動力從事農墾,以滿足家庭成員的口糧需求。



## 西北漢簡所見民爵分布與變遷\*

石家莊學院歷史文化學院 賈麗英  
河北師範大學歷史文化學院

**內容提要** 居延漢簡、肩水金關漢簡及文獻材料有關爵稱數量的數據統計顯示,“爵不過公乘”在西漢中後期,至少在元康元年(前65)已事實存在。爵過公乘可以移授、移賣他人。但是,移爵的實施,僅造成了公乘爵數量突增,爵級僅次于公乘的公大夫和官大夫人數却非常少。從爵制變遷的軌迹中探尋,公大夫和官大夫爵在漢初已出現爵等差別弱化、權益上從下靠的趨勢,漢中期以後二者更呈現區域性分布。最終,二個爵稱成為繼“公卒”之後,被裁并的第二和第三個爵稱,時間大約在東漢中期。

**關鍵詞** 漢簡 民爵 公乘 公大夫 官大夫

賜爵與承襲,是漢帝國統一後民爵獲得的主要途徑。<sup>①</sup> 有罪,爵則被減免或削奪<sup>②</sup>。在賜

\* 基金支持:2016 年度國家社科基金一般項目《出土簡牘與秦漢社會身份秩序研究》階段性成果。項目批准號:16BZS036。

① 早期有代表性的觀點是普賜民爵為漢代普通民衆獲取爵位的主要途徑。如西嶋定生認為漢代民爵賜與是“使秦漢時代廣大普通庶民成為有爵者的決定性機會”,參見西嶋定生著,武尚清譯《中國古代帝國的形成與結構——二十等爵制研究》,北京:中華書局,2004,138 頁,高敏《論兩漢賜爵制度的歷史演變》,《文史哲》1978 年第 1 期,收入其著《秦漢史論集》,鄭州:中州書畫社,1982,33-57 頁。楊眉《秦漢民爵獲得途徑略論》,《伊犁教育學院學報》2004 年第 4 期等。張家山漢簡公布後,爵位繼承也進入研究者的視野。參見李均明《張家山漢簡所反映的二十等爵制》,《中國史研究》2002 年第 2 期,收入其著《耕耘錄——簡牘研究叢稿》,北京:人民美術出版社,2015,112-120 頁。劉敏《秦漢時期的“賜民爵”及“小爵”》,《史學月刊》2009 年第 11 期。宮宅潔《漢初的二十等爵制——民爵に付帶する特權とその繼承》,轉自楯身智志《日本秦簡研究現狀・爵制、身份制度》,《簡帛》第 6 輯,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178-182 頁。凌文超《漢初爵制結構的演變與官、民爵的形成》,《中國史研究》2012 年第 1 期。等等。

② [清]孫星衍等輯,周天游點校:《漢官六種》:“男子賜爵一級以上,有罪以減。”(北京:中華書局,1990,85 頁)《漢書》卷一上《高帝紀上》:“施恩德,賜民爵”,臣瓚注曰:“爵者,祿位。民賜爵,有罪得以減也。”(北京:中華書局,1965,33-34 頁)史載事例甚多,不贅舉。

與奪、加與減的過程中，我們估測民爵的數量分布應大體均衡，尤其是在民爵有節制賜予的西漢時期。但是，不論文獻材料，還是簡牘材料，都反映了爵稱數量的分布與想像的不相合。西嶋定生整理元康四年（前 62）詔復家者爵稱時發現“公士、大夫、公乘特多，官大夫、公大夫特少”<sup>①</sup>，並將其原因歸于民爵賜予的不定期進行。朱紹侯從居延漢簡的統計中也發現公大夫、官大夫很少，但“至于為什麼這樣少，暫時還無法作出正確解釋”<sup>②</sup>。近幾年，肩水金關漢簡分批公布，其中涉及到爵稱的漢簡數量，也是前所未有的，這為我們進一步研究漢代民爵及相關問題提供了可能。本文試以肩水金關漢簡為基礎，結合居延漢簡、五一廣場東漢簡、東牌樓漢簡及相關文獻材料，對漢代民爵的動態分布及變遷作初步探討。

## 一 “爵不過公乘”與“移爵”的思考

《後漢書·明帝紀》李賢注：“漢制，賜爵自公士已上不得過公乘，故過者得移授也。”<sup>③</sup>這是在明帝即位之初中元二年（57）頒詔“爵過公乘”條所注。後東漢章帝、安帝、順帝時也多次頒布“爵過公乘”，“得移與子若同產、同產子”這樣的詔書<sup>④</sup>，因此，這個“漢制”不少人理所當然地理解為東漢之制。事實上，早在上個世紀八十年代，朱紹侯先生在與楊際平先生爭議的文中就提出過西漢存在“爵不過公乘”規定的可能。朱先生說之所以沒有在賜爵詔令中見到，下面幾種情況應估計到：一是西漢的詔令中沒有提到民爵不得過八級，不等于西漢就沒有這樣的規定；二是西漢賜爵次數相對來說少于東漢，而且每次賜爵的級數也較少，一般為一級。爵級累積，不易或不大可能超過八級，因此沒有必要在詔書中申明。東漢則多見一次賜爵二級、三級，一般吏民經三次累積，就達到八級，因此詔書中多見。<sup>⑤</sup>朱先生推論符合歷史常識，但未能引起足夠的重視。

事實上，從對居延漢簡和居延新簡爵稱的統計來看，“爵不過公乘”應已存在。筆者據《居延漢簡釋文合校》和《居延新簡釋校》《居延新簡集釋》統計所有爵稱，匯表如下：

① 西嶋定生著，武尚清譯：《中國古代帝國的形與結構——二十等爵制研究》，277 頁。

② 朱紹侯：《從居延漢簡看漢代民爵八級的政治地位》，《南都學壇》2012 年第 4 期。

③ 《後漢書》卷二《明帝紀》，北京：中華書局，1962，96 頁。

④ 《後漢書》卷二《明帝紀》：“爵過公乘，得移與子若同產、同產子”（96 頁）。《後漢書》卷三《章帝紀》：“爵過公乘得移與子若同產子。”（129 頁）《後漢書》卷五《安帝紀》：“爵過公乘得移與子若同產、同產子。”（220 頁）《後漢書》卷六《順帝紀》：“爵過公乘得移與子若同產、同產子。”（259 頁）

⑤ 參見朱紹侯《關於漢代的吏爵和民爵》，《河南大學學報》1984 年第 4 期，後收入《軍功爵制考論》，368-377 頁。

表 1 居延漢簡、居延新簡爵稱及數量匯表<sup>①</sup>

爵稱	徹侯	關內侯	大庶長	駟車庶長	大上造	少上造	右更	中更	左更	右庶長	左庶長	五大夫	公乘	公大夫	官大夫	大夫	不更	簪裹	上造	公士	公卒	士伍	總計
居延漢簡													102	1	3	33 <sup>②</sup>	7	5	13	40	0	6	
居延新簡		0 <sup>③</sup>										1 <sup>④</sup>	75	2	0	34 <sup>⑤</sup>	1	0	21	3	0	5	
合計												1	177	3	3	67	8	5	34	43		11	352
分段	1																						352

所有有關爵稱的統計中，除去律令簡和習字簡，能明確表明為個例的共有 352 枚。高爵者簡祇有五大夫簡 1 枚，占不到 0.3%。而且因漫漶，這枚五大夫簡“……淳于□五大夫（簡 EPT52:364）”<sup>⑥</sup>信息量過少，不能明確具體職位。西北漢簡所反映的主要是西北戍卒、戍吏的軍事屯戍情形，由此也可從側面證實文帝以後，免役的界爵為五大夫。這一點與文獻材料

① 版本採用謝桂華、李均明、朱國韶《居延漢簡釋文合校》，北京：文物出版社，1987。馬怡、張榮強主編《居延新簡集釋》，天津古籍出版社，2013。下同。居延新簡部分有疑問的，核對了張德芳主編《居延新簡集釋》，蘭州：甘肅人民出版社，2016。

② 本表統計為大夫爵。居延漢簡提及“御史大夫”“光祿大夫”“侍中諫大夫”等官職名，未錄入。“諸大夫”泛指官職的也未錄入。簡 76.61，《居延漢簡釋文合校》未釋，中研院史語所《居延漢簡（壹）》，釋為“□□□[御史大夫]”，中研院簡帛金石資料全文檢索系統釋為“□□□□里大夫”（參見 <http://saturn.ihp.sinica.edu.tw/cgi-bin/hangais>），從圖片來看，簡帛金石資料庫釋文正確，今從。

③ 簡 E.P.F22:45A：“建武四年五月辛巳朔戊子甲渠塞尉放行候事敢言之詔書曰吏三百石庶民嫁娶毋過萬五千關內侯以下至宗室及列侯子娉娶各如令犯者沒入所裔奴婢財物縣官有無”，為律令簡，未計入。列侯簡，同。

④ 簡 E.P.T 51:224A：“謹請邑大夫官仄中功仄君都謝敖等三人同食五大夫幸臨”，不是指稱個人，未計入。簡 E.P.T 52:364，《釋校》作“□□—□□□□□□五大夫□”，《集釋》作“……淳于□五大夫”，看似為個例。計入。

⑤ 本表統計為大夫爵。未統計諸如“御史大夫”“司馬右大夫”“大司空右大夫”的官職名稱，“秩上大夫”“秩下大夫”“大夫位”此類“祿位”名稱，以及王莽時期的特殊職官“六遂大夫”。另外有二枚簡不太明朗，“謹請邑大夫官仄中功仄君都謝敖等三人同食五大夫幸臨（簡 E.P.T 51:224A）”和“□幸甚幸甚為勝叩頭多請二兄同亭大夫（E.P.S4.T2:114A）”，其中邑大夫、亭大夫，不知與縣邑侯、亭侯有何關聯。因是孤例，不好判斷，也未收入表中。習字簡 E.P.T6:113B“大夫夫夫夫夫夫夫夫夫夫夫”也未計入。另簡 E.P.T 52:638，《釋校》本作“□魏武里五大夫□得年廿四”，《集釋》作：“魏□□里大夫朱得年廿四”，以大夫簡計入。

⑥ 張德芳主編，李迎春著：《居延新簡集釋（三）》，蘭州：甘肅文化出版社，2016，695 頁。

所反映的情形是相一致的。<sup>①</sup> 服役的普通吏民爵都在公乘及以下。

居延漢簡的斷代,陳直先生據月朔干支及郡國的建置沿革等信息,得出可繫年的居延簡自武帝太初二年(前 103)至和帝永元十年(98),有 200 來年。<sup>②</sup> 居延新簡據張德芳先生的研究最早為西漢昭帝始元二年(前 85),最晚為東漢安帝永初五年(111),前後也跨越 200 年之久。<sup>③</sup>

如果說居延簡有一定數量東漢時期的簡,對於“爵不過公乘”的說服力還不足。再來看肩水金關漢簡。

肩水金關漢簡為 1972-1974 年在肩水金關遺址所獲,約 11000 多枚<sup>④</sup>,其所反映的年代應為西漢中後期。目前 5 冊已全部出版,筆者統計了所有帶爵稱的簡。為了能一目了然,作表如下:

表 2 肩水金關漢簡爵稱及數量匯表<sup>⑤</sup>

爵稱	微侯	關內侯	大庶長	駟車庶長	大上造	少上造	右更	中更	左更	右庶長	左庶長	五大夫	公乘	公大夫	官大夫	大夫	不更	簪裹	上造	公士	公卒	士伍	總計
肩壹													105 <sup>⑥</sup>	4	2	25 <sup>⑦</sup>	27 <sup>⑧</sup>	9 <sup>⑨</sup>	8	5		6	

① 《漢書》卷二四上《食貨志上》:“令民入粟受爵至五大夫以上,乃復一人耳。”(1134 頁)王雲度將此條繫於文帝十二年(前 168)。參見王雲度《秦漢史編年》,南京:鳳凰出版社,2011,325 頁,武帝時出現了因五大夫爵增多,致服役人數減少的情形。《史記》卷三〇《平準書》:“兵革數動,民多買復及五大夫,徵發之士益鮮。于是除千夫五大夫為吏,不欲者出馬。”(1428 頁)《漢書》卷二四下《食貨志下》:“兵革數動,民多買復及五大夫、千夫,徵發之士益鮮。于是除千夫、五大夫為吏,不欲者出馬。”(1165 頁)

② 參見陳直《居延漢簡繫年》,《居延漢簡研究》,北京:中華書局,2009,689-789 頁。

③ 張德芳:《懸泉漢簡研究》,蘭州:甘肅文化出版社,2009,360 頁。

④ 參見張德芳《西北漢簡一百年》,《光明日報》,2010 年 6 月 17 日,第 010 版。

⑤ 甘肅簡牘保護研究中心、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編:《肩水金關漢簡(壹)》,上海:中西書局,2011。甘肅簡牘保護研究中心、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編:《肩水金關漢簡(貳)》,上海:中西書局,2012。甘肅簡牘博物館、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編:《肩水金關漢簡(叁)》,上海:中西書局,2013。甘肅簡牘博物館、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編:《肩水金關漢簡(肆)》,上海:中西書局,2015。甘肅簡牘博物館、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編:《肩水金關漢簡(伍)》,上海:中西書局,2016。

⑥ 淮陽西猛里公乘 尹自為年廿二歲 長七尺二寸黑色 (簡 73EJT10:190)按:從簡 73EJT10:190 的書寫格式來看,淮陽西猛里公乘為尹自為和史刑二人。

⑦ 本表統計為大夫爵。官職名稱如簡 73EJT10:114 “丞相臣衡御史大夫臣譚味死言執金吾章兼大”,未統計在內。泛指如簡 73EJT5:106 “□□常戶籍在官者爵大夫年(削衣)”,未計入。習字簡如簡 73EJT10:46 “□大大大夫大(削衣)”,未計入。

⑧ 簡 73EJT2:103 “□□里不更朱舍人年廿四庸同縣東陽里不(削衣)”,從文例來看,“不”字後應為“更”,指庸的爵位。計入。

⑨ 簡 73EJT9:3 “齊郡臨災吉辛里簪弱王光年廿三長七尺三寸黃色疾字子叔”,“簪弱”疑為“簪裹”之誤。計入表中。

續表

爵稱	徹侯	關內侯	大庶長	駟車庶長	大上造	少上造	右更	中更	左更	右庶長	左庶長	五大夫	公乘	公大夫	官大夫	大夫	不更	簪裹	上造	公士	公卒	士伍	總計
肩貳												1	48 <sup>①</sup>	0	1	20 <sup>②</sup>	9 <sup>③</sup>	4	13	3		2	
肩叁											0 <sup>④</sup>	0 <sup>⑤</sup>	50 <sup>⑥</sup>	4	1	26 <sup>⑦</sup>	40 <sup>⑧</sup>	3	9	3		4	
肩肆												1 <sup>⑨</sup>	126	3	2	52 <sup>⑩</sup>	21	3	5	8		12	
肩伍												1	58	0	3	7 <sup>⑪</sup>	3	2 <sup>⑫</sup>	10	5		1	
合計												3	387	11	9	130	100	21	45	24		25	755
分段	3												752										755

表2 肩水金關漢簡中排除律令簡和習字簡中的爵稱,有爵稱的個例簡共有755枚,高爵稱僅有五大夫簡3枚,占0.4%,與居延漢簡和新簡統計比例基本一致。三位五大夫二位是茂陵人士,一位是平陵人士。其中簡73EJT22:109“□茂陵息衆里五大夫□□……□”祇顯示

① 簡73EJT22:127“□陽被里公乘大夫莊廣年卅四□”,此簡中莊廣不知爵爲公乘還是大夫,此以公乘計。

② 簡73EJT24:339B“□賜記部中大夫願中叔……□”,“大夫”意義不好斷定,暫列入大夫爵。

③ 簡73EJT23:260“□爵庶更年十歲毋官獄徵事當□”,此處之“庶更”不能確定是否爲爵稱,未統計在內。此外,敦煌漢簡中也有“庶更”,簡278:“大煎都候長<sup>安西</sup>里庶更李鳳年<sup>文德</sup>十五”。暫無解。參見吳初驤、李永良、馬建華釋校《敦煌漢簡釋文》,蘭州:甘肅人民出版社,1991,27頁。張俊民先生告知,懸泉漢簡中無“庶更”。

④ 簡73EJT26:32中的左庶長,出現在律簡中,“爵左庶長中都官及宦者吏千石以下至六百石爵五大夫孝者爵人二級吏民爵人一級四年以前吏□□□”。未計入。

⑤ 簡73EJT26:32中的五大夫,出現在律簡中,“爵左庶長中都官及宦者吏千石以下至六百石爵五大夫孝者爵人二級吏民爵人一級四年以前吏□□□”。未計入。

⑥ 簡73EJT24:520“乘田清東里程亘年廿六長七尺二寸□”,本簡簡端完整,“乘”前無字,不能斷爲公乘爵,未計入。

⑦ 簡73EJT30:68“地節三年四月丁亥朔庚戌御史大夫相承書從事下當用者如詔書”,御史大夫,不計入。簡73EJT32:43,同。

⑧ 簡73EJT24:972“□更晉廣年卅二□”,從肩水金關漢簡的文例來看,“更”前應爲“不”。計入不更爵。

⑨ 簡73EJH1:24“□□主五大夫子長者爲王次□□”,從其內容表述來看,是對“五大夫子長者”權益的規定,非個例,未統計在內。

⑩ 習字簡,如簡73EJT33:71B“博博伏伏地大夫夫奉奉奉奉奉”,未計入。御史大夫簡,如簡73EJT37:1309“□御史大夫吉下扶風廐承書□”,未計入。

⑪ 王莽時期的官職,如簡73EJF3:344“前遂大夫史魯陽尚里龐適”未計入。

⑫ 簡73EJD:6“建始四年十一月癸卯朔己酉令史昌敢言之遣丞從史法昌爲丞取衣用饌得與葆鉗庭里簪……謁移過所……”,簡的左半邊殘,依文例,應爲簪裹爵。

籍貫和爵稱。簡 73EJT37:805B“肩水候茂陵息衆里五大夫□□□未得神爵三年四月□”，可以得知這位五大夫“□□”在神爵三年(前 59)任肩水候。簡 73EJC:652 中的五大夫則為廣地候，“廣地候平陵獲福里五大夫任晏年卅四 詣府”。

從肩水金關漢簡的紀年簡分布來看，主要為昭、宣、元、成、哀、平、孺子嬰、王莽時期。最早的紀年簡為昭帝元鳳二年(前 79)，最晚建武三年(27)。<sup>①</sup> 由公乘及以下爵稱簡能占到 99.6% 的高比例，可以說“爵不過公乘”在西漢中後期也已事實存在。

當然，不管是居延漢簡、居延新簡，還是肩水金關漢簡，目前發現的西北漢簡都存在大量沒有爵稱記錄的吏卒。諸如：

襄澤隧長昭武宜衆里閭樂成 本始三年九月辛酉除(10.36)<sup>②</sup>

戍卒汝南郡召陵倉里宋猜 年廿五(73EJT1:8)

鱧得騎士萬年里李喜(73EJT1:10)

田卒趙國襄國長宿里龐寅年廿六(73EJT1:13)<sup>③</sup>

西嶋定生在研究居延漢簡時就曾提到這種情況應考慮兩點：一是這些人本來就無爵；二是當時人名的記載方法在某些場合可以省略爵稱。<sup>④</sup> 除了這兩個原因，爵在當時社會生活中權益的弱化，恐怕也是吏卒名籍這類重要檔案材料爵稱缺省的重要原因。如果我們認為由于有相當數量無爵稱簡的存在，會影響數據統計的準確。那麼，再來看一組全部帶有爵稱，並且時間節點定在元康四年(前 62)這一年的一組數據。

表 3 宣帝元康四年(前 62)“詔復家”爵位表<sup>⑤</sup>

爵稱	五大夫	公乘	公大夫	官大夫	大夫	不更	簪裹	上造	公士	公卒	士伍	官首	乘鐸	總計
數量	1	29	3	2	21	9	12	13	31		2	1	1	125
分段	1	122										2	125	

本組數據來源于《漢書·王子侯表》和《漢書·高惠高后文功臣表》。漢帝國開國功臣後裔

① 參見黃艷萍《〈肩水金關漢簡(壹)〉紀年簡校考》，《敦煌研究》2014 年第 2 期。黃艷萍《〈肩水金關漢簡(貳)〉紀年簡校考》，卜憲群、楊振紅主編《簡帛研究二〇一三》，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4，188-200 頁。黃艷萍《〈肩水金關漢簡(叁)〉紀年簡校考》，《敦煌研究》2015 年第 2 期。《肩水金關漢簡(肆)》發現一枚建武三年(27)的簡，簡 73EJF1:25。

② 謝桂華、李均明、朱國昭：《居延漢簡釋文合校》，17 頁。

③ 甘肅簡牘保護研究中心、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編：《肩水金關漢簡(壹)》下冊，2 頁。

④ 西嶋定生著，武尚清譯：《中國古代帝國的形與結構——二十等爵制研究》，284 頁。

⑤ 本表來源于《漢書》卷一五上《王子侯表上》和《漢書》卷一六《高惠高后文功臣表》。兩表合計為 125 人。大夫 21 人。西嶋定生總計為 124 人，其中大夫為 20 人。與筆者統計差別 1 人。因西嶋定生著作沒有附表，不知具體差別在哪裏。參見西嶋定生著，武尚清譯《中國古代帝國的形與結構——二十等爵制研究》，277 頁。



“故逮文、景四五世間……子孫驕逸，忘其先祖之艱難，多陷法禁，隕命亡國，或云亡子孫。訖于孝武後元之年，靡有孑遺，耗矣。”<sup>①</sup>于是“孝宣皇帝潛而錄之，乃開廟臧，覽舊籍，詔令有司求其子孫”，經過幾年調查，于元康四年（前 62）將這些“咸出庸保之中”的功臣子孫“復除，或加以金帛，用章中興之德。”<sup>②</sup>這就是文獻材料中著名的“詔復家”。可能這項工作需辨別真偽，政府重視程度高，檔案材料身份登記細緻，每一位都錄有世系、縣邑、爵稱和名姓。這裏官首、秉鐸為武帝武功爵的第五級和第六級，低于可以免役的第七級千夫<sup>③</sup>。五大夫爵祇有一位，占所統計總數 125 位的 0.8%。也就是處於“庸保之中”的普通庶民的功臣子孫，99% 以上為公乘及以下爵。“詔復家”的詔令下達于元康元年（前 65），《漢書·宣帝紀》“元康元年……復高皇帝功臣絳侯周勃等百三十六人家子孫，令奉祭祀，世世勿絕。其毋嗣者，復其次”<sup>④</sup>。由此可見，至少在漢宣帝元康元年（前 65）“爵不過公乘”就已為社會現實。

如前述，一般來說，漢代普通吏民獲取爵位的途徑主要有因功授爵、普遍賜爵、承襲得爵。<sup>⑤</sup>西漢時期有沒有產生“爵過公乘”的可能？

據研究者統計，西漢朝（包括王莽時期）共賜爵 54 次<sup>⑥</sup>，僅以宣帝朝為例，自本始元年（前 73）即位第一次賜爵，至甘露三年（前 51）最後一次賜爵，22 年間賜爵 13 次<sup>⑦</sup>，其中地節三年（前 67）、五鳳元年（前 67）為賜爵為父後者爵一級，甘露三年（前 51）為賜爵新蔡民爵二級，其餘 10 次為普賜民爵。儘管賜爵多為一次一級，但一般吏民還是容易達到八級公乘爵，除了因罪奪免外。

那麼，達到公乘爵後，國家再賜與爵位時怎麼辦？西漢的文獻材料中沒有記述，結合漢帝國爵位移授的傳統，以及制衡社會的統治之術，應是“移授”。

張家山漢簡《二年律令·捕律》顯示漢初就有爵移的規定：

捕從諸侯來為問者一人，拜爵一級，有（又）購二萬錢。不當拜爵者，級賜萬錢，有（又）行其購。數人共捕罪人而當購賞，欲（150）相移者，許之。（151）<sup>⑧</sup>

① 《漢書》卷一六《高惠高后文功臣表》，528 頁。

② 《漢書》卷一六《高惠高后文功臣表》，528 頁。

③ 《漢書》卷二四下《地理志下》：“千夫如五大夫。”（1159 頁）

④ 《漢書》卷八《宣帝紀》，254 頁。

⑤ 劉敏：《秦漢時期的“賜民爵”及“小爵”》，《史學月刊》2009 年第 11 期。

⑥ 西嶋定生著，武尚清譯：《中國古代帝國的形成立構——二十等爵制研究》，151-172 頁。

⑦ 《漢書》卷八《宣帝紀》記載賜爵 13 次，分別為本始元年、本始二年、地節三年、元康元年、元康二年、元康三年、元康四年、神爵元年、神爵四年、五鳳元年、五鳳三年、甘露二年、甘露三年。（242-272 頁）

⑧ 張家山二四七號漢墓竹簡整理小組：《張家山漢墓竹簡〔二四七號墓〕（釋文修訂本）》，北京：文物出版社，2006，29 頁。

此處“相移”，應包括爵相移和錢相移。<sup>①</sup>當然，如果沒有共捕罪人，想將罪人轉給他人，幫助別人套取爵位，是要受法律制裁的。睡虎地秦簡《秦律雜抄·捕盜律》“捕人相移以受爵者，耐”(簡38)<sup>②</sup>。

武帝元朔六年(前123)將士們因征匈奴斬首虜“咸蒙厚賞”，但北方未安，將士們軍功不斷，“今大將軍仍復克獲，斬首虜萬九千級，受爵賞而欲移賣者，無所流貶。”應劭注曰：“貶，音移。言軍吏士斬首虜爵級多，無所移與；今爲置武功賞官，爵多者分與父兄子弟及賣與他人也。”<sup>③</sup>《說文·貝部》“重次弟物也。從貝也聲。”段注採用《漢書·武帝紀》應劭注，“應劭訓貶爲移。《上林賦》說果樹曰：貶丘陵，下平原。郭樸曰：貶，猶延也。按賣爵者展轉與人。蔓延丘陵者層疊茲長。皆重次弟之意也。”<sup>④</sup>指爵級按次第移贈、轉賣他人。

既然“移爵”在西漢中前期有慣例，那麼“爵過公乘”得移與兄弟、子侄，甚至轉賣他人也在情理之中<sup>⑤</sup>。

## 二 “公大夫”“官大夫”反映爵制變遷

上面我們通過西北漢簡分析了西漢中後期“爵不過公乘”的現實存在，以及由于賜爵的頻次，產生的“爵過公乘”及“移授”可能。那麼，移授他人會在爵位分布上產生什麼後果？

一般情況下，政府不斷地賜爵，達到公乘爵的人不斷增加，又不斷地移爵他人，爵級的累積必然會導致公乘、公大夫、官大夫、大夫這類高爵人數越來越多。但是從我們所統計的元康四年和肩水金關漢簡、居延簡的情況來看，現實情況遠比想像的複雜。下面將我們所統計的爵級分布表按年代順序以柱圖的形式直觀表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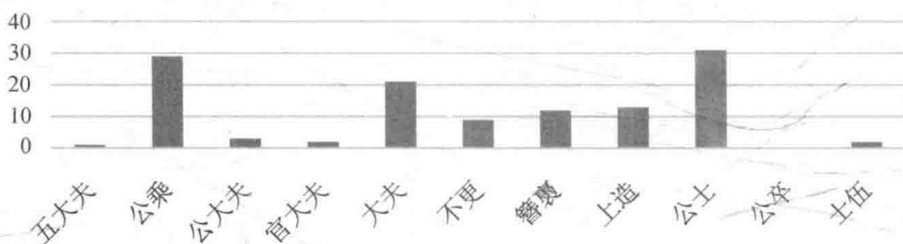


圖1 元康四年“詔復家”爵級分布柱圖

① 參見李均明《張家山漢簡所反映的二十等爵制》一文第三部分《爵位的繼承與轉移》，《耕耘錄——簡牘研究叢稿》，116-118頁。

② 陳偉主編：《秦簡牘合集（壹）》，武漢大學出版社，2014，189頁。

③ 《漢書》卷六《武帝紀》，173頁。

④ [漢]許慎撰，[清]段玉裁注：《說文解字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281頁上欄。

⑤ 劉敏認為爵可以買賣是秦漢封爵與周代封爵的差別之一，可從。參見劉敏《承襲與變異：秦漢封爵的原則和作用》，《南開學報》2002年第3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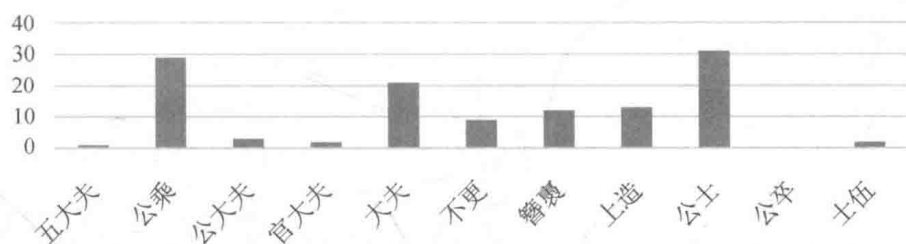


圖2 肩水金漢簡爵級分布柱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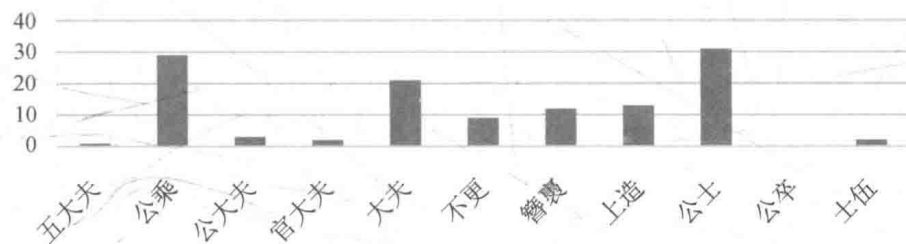


圖3 居延漢簡、居延新簡爵級分布柱圖

以上三個柱圖，有規律的共性有二個：一是公乘的數量突出地多，二是公大夫和官大夫數量突出地少。先來看第一個共性。圖1詔復家公乘有29人，公乘及以下爵人數共有124人，公乘的比例為23.4%。圖2肩水金關漢簡公乘及以下爵共有752位，公乘387位，占到51.5%。圖3居延漢簡和居延新簡公乘及以下爵共350位，公乘177位，占到50.6%。公乘爵人數比例高，是“爵不過公乘”實施的必然結果，而且時間段越往後，比例越高，這跟西漢中後期宣、元、成、哀時期不間斷賜爵有直接關係。

再來看第二個共性，公大夫與官大夫人數極少。詔復家公大夫3人，占公乘及以下爵2.42%；官大夫2人，占1.61%；肩水金關漢簡公大夫11人，占1.5%；官大夫9人占1.2%；居延漢簡和居延新簡公大夫3人，占0.9%，官大夫3人，占0.9%。時間越往後，比例越低。

理論上，由于“爵不過公乘”及“移授”的實行，爵級僅次于公乘的公大夫和官大夫人數也應僅次于公乘。事實上，人數却是異常之少。這就不得不讓我們考慮公大夫與官大夫爵瀕臨消失的可能性。

《漢書·百官公卿表上》記錄爵二十等，顏師古注一級公士“言有爵命，異于士卒”，二級上造“言有成命于上也”，三級簪裹“以組帶馬曰裹。簪裹者，言飾此馬也”，四級不更“言不豫更卒之事也”，五級大夫“列位從大夫”，六級和七級官大夫、公大夫“加官、公者，示稍尊也”，八級公乘“言其得乘公家之車也”<sup>①</sup>。每一級爵都有其具體釋義，祇有官大夫、公大夫，稍尊于大夫，沒有指出具體來源及意義。似與大夫爵級等差不够明顯。實際上漢初張家山漢簡中我們就發現有公大夫與官大夫權益上從下靠的律文，《二年律令·傳律》提及不為父

① 《漢書》卷一九上《百官公卿表上》，739頁。

後者在傳籍時的爵位承襲：

……五大夫子二人爲簪裹，(359)它子爲上造；公乘、公大夫子二人爲上造，它子爲公士；官大夫及大夫子爲公士；不更至上造子爲公卒。(360)<sup>①</sup>

公乘、公大夫一級，官大夫和大夫爲一級，公大夫與官大夫有被分割、爵級呈模糊化的傾向。有的律文中，直接將二個爵稱合并起來述及權益。如《二年律令·賜律》：

賜不爲吏及宦皇帝者，關內侯以上比二千石，卿比千石，五大夫比八百石，公乘比六百石，公大夫、官大夫比五百(簡 291)石，大夫比三百石，不更比有秩，簪裹比斗食，上造、公士比佐史。毋爵者，飯一斗、肉五斤、酒大半斗、醬少半升。(292)<sup>②</sup>

爵與秩之間的對等關係，公大夫與官大夫合并，秩比五百石。其他五大夫、公乘、大夫、不更等大多數爵級單獨開列。二者爵級差等的弱化趨勢已顯示出來。

柱圖采用的幾組材料中公大夫、官大夫數量少，我們可以單獨列出進一步考察。

表 4 史料所見宣帝及以後公大夫爵

序號	縣里	姓名	年齡	身份	簡號或出處	備注
1	除平陵歸□里 <sup>③</sup>				73EJT6:40	肩水金關 漢簡
2	長安新里	張駿	35		73EJT9:98	
3	東郡西邑利里	□□	29	田卒	73EJT9:116	
4	氐池廣漢里	徐齊	27	戍卒	73EJT10:401	
5	居延誠教里	蔡午	20		73EJT25:55	
6		孫長生		令史	73EJT30:89	
7	(屋蘭)福至里 <sup>④</sup>	徐熊	35	倉佐	73EJT30:168	
8	(居延)始至里 <sup>⑤</sup>	張延年	15	從者	73EJT30:185	
9	居延利上里	王外人		從者	73EJT37:28A	
10	鱣得始樂里	封賢	15	葆	73EJT37:745	
11		陳得	35		73EJT37:1328	

① 張家山二四七號漢墓竹簡整理小組：《張家山漢墓竹簡[二四七號墓]（釋文修訂本）》，58 頁。

② 張家山二四七號漢墓竹簡整理小組：《張家山漢墓竹簡[二四七號墓]（釋文修訂本）》，49 頁。

③ 除平陵，史書中未見。平陵，昭帝陵。《漢書·地理志上》隸屬右扶風。

④ 福至里，推測應屬屋蘭縣。肩水金關漢簡 73EJT30:168“屋蘭倉佐福至里公大夫徐熊年卅五黃色□”。

⑤ 始至里，推測應屬居延縣。肩水金關漢簡 73EJT3:102“車一乘·囚大男陳路等四人·居延始至里梁削等四人”。簡 73EJT9:125“居延始至里女子高襄年十八歲□”等。

續表

序號	縣里	姓名	年齡	身份	簡號或出處	備注
12	陳留郡雍丘邑中 ……慶里	爰祿	31		E.P.T56:111A	居延新簡
13	(居延)昌里 <sup>①</sup>	馬□	38	隧卒	E.P.T65:453	
14	氐池宜藥里	奚路人	47	隧長	179.4	居延漢簡
15	茂陵	繒賜			《漢書》卷一六《高惠高后文功臣表》	詔復家
16	長安	周賜			《漢書》卷一六《高惠高后文功臣表》	
17	南陵	呂得			《漢書》卷一六《高惠高后文功臣表》	

表 5 史料所見宣帝及以後官大夫爵

序號	縣里	姓名	年齡	身份	簡號或出處	備注
1	東郡東阿增野里	騶明		田卒	73EJT5:19	肩水金關 漢簡
2	東郡東阿當夏里	丁廐	26	田卒	73EJT9:90	
3	濟陰郡冤句亭里	爰聖	29	戍卒	73EJT24:41	
4	□□里	□□	30		73EJT25:204A	
5	居延雜里			從者	73EJT37:393	
6	京兆新豐西宮里	被長壽	21	葆	73EJT37:1002	
7	□市陽里	潘收	15		73EJF2:8	
8	濟陰郡定陶漆里	丁□		戍卒	73EJD:207	
9	氐池安民里	趙壽	58		73EJC:414	
10		夏氏		故民	10.10	居延漢簡
11	東郡東阿昌國里	孫壽 <sup>②</sup>	28	田卒	43.24	
12	□□里	□武	28		116.53	
13	長安	其益壽			《漢書》卷一六《高惠高后文功臣表》	詔復家
14		戚常		郎	《漢書》卷一六《高惠高后文功臣表》	

從漢宣帝及以後秦漢史料中共搜集到 17 例公大夫, 14 例官大夫。有意思的是, 這些人有籍貫記錄的, 除了不能顯示縣里名稱的, 其餘都集中在長安及三輔奉陵邑、張掖郡, 以及梁

① 昌里, 西北漢簡中較多見。大多為富昌里、廣昌里、益昌里、大昌里、安昌里、始昌里、西昌里、東昌里、宜昌里等, 昌里少見, 為居延縣昌里。居延新簡 E.P.T4:5“□戍卒居延昌里石恭三年署居延代田亭三年署武成”。E.P.T40:148“居延昌里徐威□”。肩水金關漢簡 73EJT8:5“□居延昌里梁輔年廿五□”。73EJT37:935“……三月辛酉朔丙子□□敢言之遣西鄉佐喜收流民張掖金城隴西郡中與從者昌里”。

② 中研院史語所簡牘整理小組編:《居延漢簡(壹)》, 臺北:中研院史語所, 2014, 143 頁。

國故地東郡、濟陰郡、陳留郡。

長安及三輔奉陵邑 7 例。

東郡、濟陰、陳留，爲梁國故地<sup>①</sup>。另外，官大夫戚常，臨轅堅侯戚鯁玄孫，師古曰：“仕梁爲郎而有官大夫之爵也。”<sup>②</sup>仕梁爲郎，是因爲梁？亦或是因爲郎？意義不明。與梁有關的 7 例。

張掖郡，《漢書·地理志下》載：“故匈奴昆邪王地……縣十：鱒得、昭武、刪丹、氏池、屋蘭、日勒、驪軒、番和、居延、顯美”<sup>③</sup>。上述有 10 例屬張掖郡。

在西北屯戍的吏卒來源于全國 20 多個郡國 130 多個縣<sup>④</sup>。公大夫與官大夫爵稱僅出現在上述幾地，讓我們不得不質疑這二個爵稱在西漢中後期的全國性授予是否存在。當然，也不排除官府遣戍本身的地域性限制對數據的影響。

衆所周知，二十等爵有一個漸行形成和完善的過程，也有一個漸行式微和衰落的過程。在這個衰落過程中，現在已知的爵稱變化是“公卒”在西漢早期的消失<sup>⑤</sup>。公卒，作爲一個身份性術語，傳世文獻沒有見到，祇出現在里耶秦簡、嶽麓書院藏秦簡和張家山漢簡中，並且在律令簡的身份序列中無一例外排在公士之後、士伍之前。但在西漢中後期的簡牘材料中却未見到一例（見上表和上圖），由此也可看出爵的式微的表現之一是爵稱的簡化。

綜上，我們可以看出在爵制變遷的過程中，公大夫與官大夫爵等差別弱化，附于爵的權益呈現上從下靠之勢，漢中期以後或在爵的授予中有區域性規定，最終，成爲繼“公卒”之後，被裁并的第二和第三個爵稱，時間大約在東漢中期或更早。因爲章帝時人王充在《論衡·謝短篇》曾發問文吏“賜民爵八級，何法？名曰簪裹、上造，何謂？”<sup>⑥</sup>從側面反應了當時爵八級的概念是存在的，也還有簪裹、上造這樣的稱謂，祇不過爵的涵義文吏們却不知道了。稍後，約在和帝和安帝時期，還能見到“公士”爵，長沙五一廣場東漢簡牘：

年卅四，爵公士，謹移人名如牒。（木兩行 CWJ1③:313）<sup>⑦</sup>

案：辟都、南、中鄉，未言。雄、俊、循、竟、趙辭皆有名數，爵公士以上。癸酉赦令後以來，無它犯坐罪耐以上，不當請。（CWJ1③:201-1）<sup>⑧</sup>

① 周振鶴：《西漢政區地理》第五章《梁國沿革》，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54-63 頁。

② 《漢書》卷一六《高惠高后文功臣表》，604-605 頁。

③ 《漢書》卷二八下《地理志下》，1613 頁。

④ 趙寵亮統計有 22 個郡國，138 個縣，參見趙寵亮《行役戍備——河西漢塞吏卒的屯戍生活》，北京：科學出版社，2012，27 頁。何雙全統計有 24 個郡，130 個縣，參見何雙全《漢代戍邊士兵籍貫考述》，《西北史地》1989 年第 2 期。

⑤ 參見賈麗英《秦及漢初二十等爵與士下准爵層的剖分》，《中國史研究》待刊文。

⑥ 黃輝：《論衡校釋》，第 2 冊，北京：中華書局，1990，572 頁。

⑦ 長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等編：《長沙五一廣場東漢簡牘選釋》，上海：中西書局，2015，146 頁。

⑧ 《長沙五一廣場東漢簡牘選釋》，221 頁。



犯罪的五人都是“爵公士以上”，未言明每人的爵級。而漢初的案件在敘述時會將每一人的爵級都交待得清清楚楚<sup>①</sup>。但是，爵的減刑功能還是存在的，後文提及“以劾律爵咸（減）論”。

東漢中期以後，隨着動輒二級、三級地賜爵，以及“爵過公乘”可以移授給兄弟子侄，普通編戶民得到公乘爵輕而易舉，甚至在承襲與移授并舉的情況下，我們懷疑有些人可能尚在襁褓已為公乘。東漢末年王粲《爵論》所言“今爵事廢矣，民不知爵者何也。奪之，民亦不懼；賜之，民亦不喜”<sup>②</sup>，恐就是當時爵制的現實寫照。

事實上，斷代為漢末的東牌樓東漢簡牘中確實也祇見到了“公乘”簡：

建寧四年益成里戶人公乘其卅九筭卒篤斧子公乘石……(79)

區益子公乘朱年卅□筭卒九十復(80)<sup>③</sup>

如果說東牌樓東漢簡牘數量少，殘斷嚴重，顯示爵稱的簡過少，那麼三國吳簡的出土，很大程度上彌補了不足。走馬樓吳簡有 10 萬餘枚，現正在分批公布<sup>④</sup>。已公布的簡中有大量帶有爵稱的，王子今先生稱此為“秦漢社會爵制的後期遺音”<sup>⑤</sup>。值得注意的是吳簡中祇存在二種與爵位相關的名稱，一是公乘，二是士伍<sup>⑥</sup>。此時在漢代前期業已形成的民爵八級，經過四百餘年發展變遷，存留的就祇有公乘這唯一一個符號化的爵稱了。

① 《張家山漢墓竹簡[二四七號墓](釋文修訂本)》，96 頁。《奏讞書》：“·蜀守讞：大夫犬乘私馬一匹，無傳，謀令大夫武爵舍上造熊馬傳，箸(著)其馬職(讞)物，弗身(58)更，疑罪。·廷報：犬與武共為僞書也。(59)”此類案例陳述，多見于秦時和漢初案例，不多舉。可參見睡虎地秦簡、嶽麓書院藏秦簡等。

② 《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第 2 冊，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850 頁。

③ 長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中國文物研究所編：《長沙東牌樓東漢簡牘》，北京：文物出版社，2006，107 頁。

④ 《長沙走馬樓三國吳簡·竹簡(壹、貳、叁、肆、柒、捌)》，北京：文物出版社，2003、2007、2008、2011、2013、2015。

⑤ 王子今：《走馬樓吳簡所見未成年“公乘”、“士伍”》，《湖南省博物館館刊》第 4 輯，長沙：嶽麓書社，2007，318-324 頁。

⑥ 沈剛認為士伍是編戶民一出生就具有的身份。參見沈剛《長沙走馬樓三國吳簡研究》第五章《公乘與士伍》，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3，188-199 頁。

## 漢代肩水塞東部候長駐地在 A32 遺址考

清華大學歷史系 郭偉濤

**內容提要** 西漢王朝驅逐河西地區的匈奴後，在此建立了一系列屯戍機構。其中肩水候官塞位於張掖郡的北部，轄於肩水都尉，下面劃設了包括東部塞在內的九個“部”。封檢、牒及相關文書顯示，很可能自宣帝至新莽末年，東部塞長官——東部候長——始終駐在 A32 遺址，也就是金關簡的出土地。這一發現，既豐富和深化了對肩水塞的認識，且有助於更準確地理解金關簡的性質。同時，亦利於從文書行政的角度深入研究“部”在河西屯戍防禦組織體系中的具體作用。

**關鍵詞** 東部候長治所 A32 遺址 封檢 文書

漢武帝反擊匈奴占領河西後，在弱水流域設置了張掖郡。張掖郡的北部，也就是弱水中下游地區，分別為肩水都尉、居延都尉統轄。肩水候官塞就是肩水都尉統轄的數個候官塞之一，<sup>①</sup>且負有拱衛驛馬屯田區的重任，其地位與作用更為重要。因為資料的缺乏，此前學界對

<sup>①</sup> 一般認為，肩水、橐他、廣地等候官塞轄於肩水都尉。此外，293.7/A35、73EJT21:47、14.21/A33、90.50/A35、73EJT26:110、513.18/A35 等簡顯示，宣帝本始年間庚候官塞亦轄於肩水都尉。另，263.14A/A33、73EJT9:101、73EJT21:427、73EJT33:79 等簡顯示，倉石候官塞可能也統轄於肩水都尉。可惜的是，庚、倉石兩候官塞資料甚少，無法做出更多判斷。

肩水候官塞關注較少，更談不上對轄下諸部的研究。隨着金關簡的刊布，<sup>①</sup>相關問題的探討有了較好的資料基礎。筆者研讀這批簡牘發現，肩水候官塞統轄東、西、南、北、中、左前、左後、右前、右後等九個部。<sup>②</sup>其中，東部塞不遲於地節三年（前 67）三月即已設立，最晚見於新莽天鳳年間（14-18）。<sup>③</sup>該部塞的負責人——東部候長——一直駐在 A32 遺址，換言之，東部候長治所就在此地。本文主要致力於揭示這一點。

推定某機構的駐地，或考察某遺址駐有哪些機構的工作，可稱之為“遺址定名”，前人已有不少研究，並且形成了一些典型做法，本文在先行回顧既往研究的基礎上，再展開對東部候長駐於 A32 遺址的論證。

## 一 遺址定名研究評述——以河西出土漢簡為中心

“遺址定名”研究，不僅包括給已知的考古學遺址確定其在當時作為官署機構的名稱，也包括據出土簡牘知曉某個官署機構或其名稱，進而確定其所處的大致或精確位置。最早利用簡牘進行遺址定名的當推王國維。前期因不知簡牘的具體出土地點，他依據郵書刺、封檢及相關簡牘僅能推定各烽燧次第，尚無法落實到具體的地理方位上；<sup>④</sup>後期利用斯坦因的原始記錄，不僅糾正了前面工作的部分錯誤，且將諸多烽燧地名落實在地圖上。<sup>⑤</sup>總結其定位官署遺址的資料，包括書信、呈文、封檢、郵書刺及牒。

居延舊簡刊布後，勞幹嘗試復原弱水中下游流域的諸屯戍機構，但是，一則沒有意識到簡牘出土地的重要性，二則當時無法充分獲知簡牘的具體出土地點，因此其結論頗多錯

① 本文所據金關簡，除非另有說明，全部引自甘肅簡牘保護研究中心（甘肅簡牘博物館）、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甘肅省博物館、中國文化遺產研究院古文獻研究室、中國社會科學院簡帛研究中心編《肩水金關漢簡》（壹、貳、叁、肆、伍），上海：中西書局，2011、2012、2013、2015、2016。所引居延舊簡，310.20 號簡之前均引自簡牘整理小組《居延漢簡》（壹、貳、叁）（台北：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2014、2015、2016），其它居延舊簡引自謝桂華、李均明、朱國炤《居延漢簡釋文合校》（北京：文物出版社，1987），圖版兼引臺北新出紅外線圖版、勞幹《居延漢簡·圖版之部》（臺北：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57）及簡牘整理小組《居延漢簡補編》（臺北：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98），部分圖版亦核以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藏漢代簡牘資料庫（[http://ndweb.iis.sinica.edu.tw/woodslip\\_public/System/Main.htm](http://ndweb.iis.sinica.edu.tw/woodslip_public/System/Main.htm)）。本文引用居延新簡，主要據張德芳主編《居延新簡集釋（1-7）》，蘭州：甘肅文化出版社，2016，釋文參以馬怡、張榮強主編《居延新簡釋校》，天津古籍出版社，2013。

② 參拙文《漢代肩水塞部隧設置研究》，《文史》待刊。

③ 關於東部塞紀年及候長編年，參拙文《漢代肩水塞東部候長繫年初編》，待刊。

④ 王國維、羅振玉：《流沙墜簡》，1914 年初版，1934 年修訂，此據何立民點校本，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3。該書雖為兩人合著，實際上羅振玉僅負責小學數術和簡牘遺文類，其它屯戍簿籍類文書的考證由王國維執筆。王氏僅利用簡文內容對官署遺址的考證，散見於第 3-11、50-56 頁。

⑤ 王國維、羅振玉：《流沙墜簡》，170-171、197-206 頁。

誤。<sup>①</sup> 隨後,陳夢家在掌握全部簡牘的出土地點的基礎上,<sup>②</sup>結合貝格曼的考古報告,依據簡牘的出土地點整理出郵書記錄,並按照南書、北書的次序排列出郵站表,輔以各遺址出土的封檢,據之判斷出這些遺址的機構名稱。此外,他還注意到官署機構與遺址的建築結構及出土簿籍的匹配。<sup>③</sup> 但陳夢家關於居延都尉府也位於破城子遺址(A8)的看法,受到永田英正的質疑。<sup>④</sup> 觀其方法,除延續陳氏之思路,重新整理解讀郵書記錄及封檢外,還據候官處存有“詣官簿”推測都尉府也有相應的“詣府”簡。另,永田英正分析甲渠候官第四隧出土的簡牘時指出,若要據某遺址所出簡牘判定該遺址的機構名稱,則可考慮從郵件(包括寫有收信者名稱的封檢及傳送的公文書)、安置在物品上的楬、簿籍等三項入手。<sup>⑤</sup> 此外,富谷至推定卅井塞南端的A21遺址即懸索關所在,<sup>⑥</sup>其關鍵證據就是,此地出土了與“關卡”這一機構身份相匹配的簡牘。最近,侯旭東撰文考定驛北亭位於A32遺址,綜合利用郵書刺、日迹檣、出入關紀錄、楬及亭問道里簿,進一步擴大了遺址定名工作所能利用的資料。<sup>⑦</sup>

另外,湖南龍山發現的里耶秦簡,其所從出的古井及遺址在秦代實際上是遷陵縣縣廷的官署。之前學界研究里耶秦簡時,一般未曾考慮到這些簡牘的屬性,或者默認為縣廷遺物。實際上秦代遷陵縣官署遺址當時都有哪些機構在此辦公,學界未曾措意或思考不深。土口史記綜合分析文書發件者、收件者信息及接收、發送記錄,並輔以封檢,探明此官署遺址當時除駐有遷陵縣廷外,還有少內、司空、庫、倉、都鄉等“諸官”的機構。<sup>⑧</sup> 同時也意味着,“里耶秦簡”即為這些部門的遺留物。觀其推定諸官機構,除巧妙利用文書的接收發送記錄外,還延續學界舊有範式,將出土封檢作為重要的定名材料。

① 勞榦:《居延漢簡考釋——考證之部》,1944年初版,此據作者《居延漢簡考釋之部》,臺北: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86,30-33頁。勞榦的失誤,一定程度上也算情有可原,畢竟全部簡牘的出土地信息要等到1980年《居延漢簡甲乙編》(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北京:中華書局)的出版方可為學界所利用。

② 貝格曼記錄,索馬斯特姆整理:《內蒙古額濟納河流域考古報告》,1956、1958年初版,此據張德芳等中譯,北京:學苑出版社,2014。1959年出版的《居延漢簡甲編》(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北京:科學出版社)僅查明部分簡牘的出土地點,使用起來多有不便,而標記全部簡牘出土地點的《居延漢簡甲乙編》雖然遲至1980年才出版,但記有全部簡牘及遺物出土地點的登記冊,早在1962年3月就已為考古所清理出來,陳夢家提到甲編、乙編已釋未釋的編號(陳夢家:《漢簡考述》,見其著《漢簡綴述》,北京:中華書局,1980,9頁)及標記冊(陳夢家:《漢簡考述》,見其著《漢簡綴述》,29頁),與考古所清理出來的登記冊(《居延漢簡甲乙編》,291頁)應是同一份文件,因此陳夢家得以利用。

③ 陳夢家:《漢簡考述》,見其著《漢簡綴述》,1-36頁。

④ 永田英正:《居延漢簡研究》,1989年初版,此據張學鋒中譯,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7,354-370頁。

⑤ 永田英正:《甲渠塞第四隧出土簡牘分析》,原載文化部省科學研究費補助金研究成果報告書《中國出土文字資料的基礎的研究》,1993年,此據中譯,收入中國社會科學院簡帛研究中心編《簡帛研究譯叢》第1輯,長沙:湖南出版社,1996,250頁。

⑥ 富谷至:《文書行政的漢帝國》,2010年初版,此據劉恒武、孔李波中譯,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13,263-268頁。

⑦ 侯旭東:《西漢張掖郡肩水候官驛北亭位置考》,《湖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6年第4期,32-37頁,插頁及封三。

⑧ 土口史記:《里耶秦簡にみる秦代縣下の官制構造》,《東洋史研究》第73卷第4號,2015,507-544頁。這一研究的意義,不僅體現在遺址定名上,對於從文書學的角度研究秦遷陵縣的行政運作也具有導夫先路的基礎性作用。

綜上所述,利用簡牘材料開展遺址定名的工作,必須把簡文與出土位置充分結合起來,並放在整個邊塞屯戍組織體系中予以考慮。其中,最為重要的資料就是封檢、郵書簡,標明物品的楬及相關官文書也值得留意。尤其是封檢,使用頻繁,且起到類似於門牌的重要作用。儘管學界對封檢本身的研究通常並不涉及遺址定名,但不可否認的是,封檢正中以醒目大字題署的單位或個人均為收件者,這一點迄今已成共識。雖然不能百分之百確定,祇要出土署有收件者的封檢,就一定意味着出土地即為收件者駐地,但驗之以往的研究,這一關係基本上是成立的。<sup>①</sup>有鑒於此,本文對東部候長駐地的考察,主要建立在對封檢、楬及相關文書等的綜合分析上。

## 二 A32 遺址出土封檢所見東部候長駐地

此前學界對封檢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封泥匣的有無及封緘方式等形制,<sup>②</sup>以及文字題署

① 鷹取祐司曾將河西地區漢簡中的封檢集成列表,計有 A7、A8、A22、A32、A33、P1、P9、D21 等遺址出土者,封檢題署與學界推斷出的遺址名稱並無扞格之處(鷹取祐司:《漢代官文書の基礎的研究》第二部第六章《文書の宛名簡》,東京:汲古書院,2015,415-440 頁)。唯 A7 有數枚甲渠候封檢、A8 有一枚居延都尉封檢(259.8)、A33 出土數枚金關封檢,與學界對甲渠候官與肩水候官駐地的認識相矛盾。但 A7 所出甲渠候封檢,乃采集簡,非發掘出土,可能屬於簡牘再利用或其它特殊情況。另外,A7 還有一枚令史受理的入粟登記簡(16.2),而該遺址乃一烽燧,既不應有入粟記錄簡也不應有令史,此簡出現於 A7 當為偶然,甲渠候的封檢也應如此。至於 A8 遺址出土的 259.5, A 面題署“都尉府都尉府”,B 面題署“居延”,當為習字。而現在標記出土地為地灣的七枚肩水金關封檢,筆者以為很可能原本出土於 A32 遺址,誤入 A33 出土簡牘(詳參拙文《漢代肩水金關關吏編年及相關問題》,李學勤主編《出土文獻》第 10 輯,上海:中西書局,2017,236-242 頁)。此外,高村武幸指出,里耶遷陵縣廷遺址古井出土的秦簡(第八層),約有三百余枚封檢,中有數枚與遷陵縣完全無關者(高村武幸:《里耶秦簡第八層出土簡牘的基礎的研究》,《三重大史學》第 14 卷,2014,31、38 頁),一個可能的解釋是郵書或文書傳遞經過此地而偶然遺留下來。需要指出的是,官署之間因業務需要,彼此文書往來頻繁,而且還存在簡牘重新利用及人事調動的情況,偶有一兩枚其它官署的封檢或文書也在情理之中,如永田英正就指出甲渠候官第四隧出土了甲渠第三十七隧長及臨桐隧長的文書(永田英正:《甲渠塞第四隧出土簡牘分析》,253 頁)。總而言之,封檢可視為遺址定名工作的有力證據。

② 王國維:《簡牘檢署考》,1912 年日文初版,1914 年中文初版,此據胡平生、馬月華《簡牘檢署考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75-99 頁;勞幹:《居延漢簡考釋——考證之部》,見《居延漢簡考釋之部》“簡牘之制”,2-3 頁;永田英正:《書契》,收入林巳奈夫《漢代の文物》,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1976,502-505 頁;大庭脩《漢簡研究》第二篇第五章《再論“檢”》,1992 年初版,此據徐世虹中譯,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1,176-204 頁;鄒文玲:《“合檄”試探》,卜憲群、楊振紅主編《簡帛研究二〇〇八》,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0,151-173 頁;何佳、黃樸華:《東漢簡“合檄”封緘方式試探》,《齊魯學刊》2013 年第 4 期,44-47 頁;富谷至:《文書行政的漢帝國》,160-170 頁;初山明:《魏晉樓蘭簡の形態——封檢を中心として》,原刊富谷至編《流沙出土の文字資料——樓蘭・尼雅出土文書を中心に》,京都大學學術出版會,2001,此據初山明《秦漢出土文字史料の研究》,東京:汲古書院,2015,62-100 頁。



的書式等方面。<sup>①</sup> 也有學者集成大量封檢,結合形制及書式探討封檢的使用與功能。<sup>②</sup> 鑒於封檢書式的分類,尚無統一標準,本文暫依照材料情況自行分類。

A32 遺址共見約 250 枚封檢,題署候長者共計 23 枚,其中 17 枚明確記作“東部(候長)”,有一枚較為特別,放在後面分析。另有五枚僅以候長開頭,未言何部。剩下 16 枚東部封檢,按照書式之不同,可分為五種類型。I 型封檢僅題署“東部候長”,如下:

1. 東部候長 73EJT25:16

沒有其它信息,共有三枚。II 型封檢題署“東部候長+名字”,如下:

2. 東部候長放 73EJT27:47

3. 東部候長廣宗 73EJT28:1

共計七枚。III 型題署“(東部)候長+某卿+治所”,如下:

4. 東部候長孫卿治所 73EJT21:22

5. 東部候長黃卿治所 73EJT29:124

共計三枚。IV 型封檢僅有一枚,在 III 型基礎上又加上傳遞方式,如下:

6. 東部候長王卿治所次亭行 73EJT29:123

V 型封檢共兩枚,皆有封泥匣,題署特別,如下:

7. 左前候長隧長黨寫傳至東部隧次行回 73EJT27:46

8. 佐前候長光等寫傳東部候長廣宗行者走回 73EJT28:20

兩枚結合看來,應是左前部將抄寫的一份文書傳遞至東部候長處,末尾還記有傳送方式。兩枚封檢小有不同,簡 7“左前候長隧長黨”應為隧長黨兼行左前候長之意,僅言至東部,未言候長姓名;簡 8“佐前”即為“左前”,記有東部候長之名。雖小有差別,但傳送目的地均為東部候長駐地。

上舉共 16 枚封檢,明確記有“東部候長”字樣。另有一枚與“記”有關的東部封檢,如下:

① 侯燦:《勞榦〈居延漢簡考釋·簡牘之制〉平議》,收入甘肅考古文物研究所編《秦漢簡牘論文集》,蘭州:甘肅人民出版社,1989,256-284 頁;李均明:《封檢題署考略》,《文物》1990 年第 10 期,72-78 頁;李均明:《秦漢簡牘文書分類輯解》,北京:文物出版社,2009,440-456 頁。

② 青木俊介:《封檢の形態發展》,收入初山明、佐藤信編《文献と遺物の境界Ⅱ》,府中:東京外国語大学アジア・アフリカ言語文化研究所,2014,229-246 頁;鷹取祐司:《漢代官文書の基礎的研究》第二部第六章《文書の宛名簡》,371-440 頁。據鷹取統計,河西地區出土的漢代封檢,絕大多數都無封泥匣,有封泥匣者不足 7%(376 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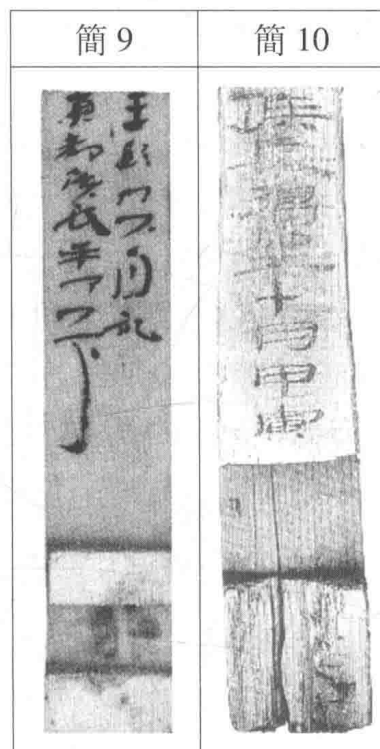
## 9. 王臨叩頭白記

東部候長平卿門下

73EJT27:49

這枚封檢有封泥匣，凹槽用於填充封泥按捺印文。題署顯示封緘的內容當為王臨呈送給東部候長平卿的“記”。據學者研究，“記”既有類似於個人書信的私記，也有嚴謹性弱於文書的官記，<sup>①</sup>簡 9 不好判斷屬於何者。凹槽內已無封泥，說明已經開封閱讀，據此則當時東部候長駐於 A32 遺址。簡文涉及的王臨與候長平卿，似僅此一見，無法判斷其年代。

綜上 17 枚東部封檢，結合此前學界利用封檢所進行的“遺址定名”研究，雖然與“東部候長”有關的封檢，其書式及形制各有不同，從題署來看，均要發送給東部候長或其駐地，途中截留或遺存的可能性較小，應該最終都到達了目的地，即東部候長駐地。換言之，既然這批封檢出土於 A32 遺址，也就意味着此地為東部候長駐地。此外，必須指出的是，金關簡中封檢頗多，但除去東部外，未見明確記載的其它部的封檢，如南、西、北等諸部。因此，另外五枚署名為候長的封檢（73EJT24:531、73EJT23:169、73EJT28:5、73EJT28:59、73EJT33:70），可能也屬東部，祇是簡文省略而已。下枚“候長”封檢，可能亦與東部有關：



## 10. 候長得望十月甲寅□□□□

73EJT4:51

該簡亦有封泥匣。凹槽下殘有三個字的輪廓，無法釋讀。“十月甲寅”可能表示發件地發出的日期，封泥槽下面殘損的幾個字很可能即為發件機構，“起××”。

“候長得望”當為收件者，據前述候長封檢的情況判斷，該簡雖僅有候長而未冠所屬機構，為東部候長的可能性比較大。

綜上，東部候長封檢共計 17 枚，加上 6 枚疑似者，幾占全部封檢的十分之一。此外，這些封檢涉及的候長部分可考證出其姓名及任職時間，本文不贅。<sup>②</sup>

① 鵜飼昌男：《關於漢代官文書的一點考察——“記”這一文書的存在》，原刊《史泉》第 68 卷，1988，此據中譯，中國政法大學法律古籍研究所編《中國古代法律文獻研究》第 2 輯，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4，105-123 頁；連劭名：《西域木簡中的記與檄》，《文物春秋》1989 年第 1 期，21-27、69 頁；汪桂海：《漢代官文書制度》，南寧：廣西教育出版社，1999，49-51 頁；李均明：《秦漢簡牘文書分類輯解》，109-128 頁；高村武幸：《秦漢簡牘史料研究》，東京：汲古書院，2015，38-57 頁；鷹取祐司：《漢代官文書の基礎的研究》，47-56 頁。

② 詳參拙文《漢代肩水塞東部候長繫年初編》，待刊。

### 三 A32 遺址出土候長之楬

掛在特定物品或文書上起到指示說明作用的“楬”，也可作為遺址定名的證據。<sup>①</sup> 按照形制不同，楬可分為兩種，一種是簡首呈半圓形，塗黑或畫以網狀格紋，且有鑽孔以便穿繩；一種無網狀格紋，簡首稍下刻削成缺口，用來繫繩。<sup>②</sup> 按照所附對象的不同，又可分為實物楬和文書楬。<sup>③</sup>

A32 出土兩枚與候長有關的楬，均為實物楬。首先看第一枚：

11. 候長陳長生

六石具弩一

73EJT6:19

簡 11 頂端為半圓形，且畫以網狀格紋，用來標識候長陳長生配備的兵器——六石之弩及其數量。當然，標識候長物品的楬并不一定僅僅發現於候長駐地，有些部隧的實物及文書上呈到候官，或者文書作業涉及到不同的部隧，候官存儲標識時應該也是按照部隧進行的，因此也可能候官處發現標識轄下部隧的楬。不過，簡 11 的題署僅有候長之名而無候長所屬之部，若此楬為候官所製作并附在候長武器上，當說明為某部候長，這樣體例較為完善。據此，這枚楬應該就是候長陳長生的駐地所使用的。而且，東部候長有名長生者，如“東部候長長生”(73EJT30:92)，當即陳長生，<sup>④</sup>很可能這枚楬所標識的就是東部候長長生的武器。

再來看第二枚：

12. 登山隧長紳五十丈傳詣候長王卿治所

各完全封相付屬毋留

73EJT28:10

簡 12 頂端為半圓形，雖無塗黑或網狀格紋，但存有繫繩的鑽孔，其形制為楬無疑。觀其內容“傳詣候長王卿治所”，又似用於傳遞的封檢。有可能這枚楬既標識傳送的物品——登山隧長五十丈紳，又順帶標明傳送目的地，實際上在運送時應該會有別的封檢。題署“傳詣候長王卿治所”，顯示目的地為候長治所。如前所述，該簡出土地——A32 遺址——僅見東部封



① 侯旭東曾對楬在遺址定名工作中的作用進行過詳細討論，參《西漢張掖郡肩水候官驛北亭位置考》，36 頁腳注⑤。

② 富谷至：《木簡竹簡述說的古代中國——書寫材料的文化史》，2003 年初版，2014 年增補再版，此據劉恒武中譯，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52 頁；李均明：《秦漢簡牘文書分類輯解》，457 頁；莊小霞：《東牌樓見“中倉租券簽牌”考釋》，武漢大學簡帛研究中心主辦《簡帛》第 5 輯，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415 頁。

③ 李均明：《秦漢簡牘文書分類輯解》，456-465 頁。

④ 東部候長陳長生活動於元康年間，參拙文《漢代肩水塞東部候長繫年初編》，待刊。

檢，故該簡候長王卿治所當即東部候長駐地。簡文涉及的東部候長王卿，可能為王武或王廣宗，王武見於地節三年（前 67），王廣宗活動於甘露年間。<sup>①</sup>

綜上，藉助 A32 遺址出土的封檢及牒，基本可以判定，此地為東部候長駐地。而且，綜合分析 A32 遺址出土的封檢，涉及某部或候長者，僅有東部而無其它部，故其它部未駐該地。

#### 四 A32 遺址出土文書所見東部候長駐地及時間

因工作業務上的需要，候長與轄下亭隧及上級肩水候之間必然有文書往來，進一步說，東部候長作為東部塞的負責人，假若駐在 A32 遺址，則必然有下列四類文書：（1）轄下諸亭隧需要向東部候長匯報工作，因此應當有亭隧的上行文書；（2）東部候長發文給轄下亭隧布置任務指導工作，因此當有下行文書的底本或草稿。同理，肩水候與東部候長之間存在直接的上下級關係，該遺址必然有：（3）肩水候發給東部候長的文書正本；（4）東部候長呈文給肩水候的文書底本或草稿。實際上，這四類文書，A32 遺址均有出土。

首先來看第一類東部塞轄下亭隧呈報的上行文書，

13. 甘露三年五月癸未朔甲午，平樂隧長明敢言之治所：檄曰□□□……移檄到，遣□□詣官，會己酉旦。謹案戍卒三人，其一人吳熹廼能莎上疾溫幸少愉其毛足進易皮□  
出 73EJT28:18

該簡形制為兩行，下殘，簡文尚能通解，顯示平樂隧長向候長匯報隧卒吳熹患病等事。簡文“平樂隧長明敢言之治所”，並未說明哪一級官吏的治所。河西地區，使者、塞尉、千人、士吏、候長等所駐烽燧均可稱為治所，<sup>②</sup>但以候長治所最為常見，如下述三簡：

14. □□適隧長安世敢言之東部候長陳卿治所：謹移疾 73EJT23:771

15. □敢言之候長治所□ 73EJT2:66

16. 謹移卒自言一事，唯治所移官，敢言之。 73EJT24:18

簡 14 為□適隧長安世上報給東部候長陳卿的文書，簡文徑稱“東部候長陳卿治所”。候長陳卿若與簡 11 的候長陳長生為同一人，當亦活動於元康年間。<sup>③</sup> 簡 15 殘損嚴重，文書發件人

① 拙文《漢代肩水塞東部候長繫年初編》，待刊。

② 使者（包括刺史）稱治所者，有“言之府移使者治所錄曰詔書”（EPF22:360）；塞尉稱治所者，有“執胡隧長李丹持當隧鼓詣尉治所”（EPF22:694）；千人所駐稱治所者，有“一封不可知詣居延千人彭君治所”（EPC:24）；士吏所駐稱為治所者有“甲渠士吏臧卿治所”（EPTS4T2:36）；候長治所較為常見，如“候長李卿治所”（EPTS4T2:38），“第四候長治所”（EPF22:738）等，此不贅舉。

③ 參拙文《漢代肩水塞東部候長繫年初編》，待刊。

不清楚,比對簡 14 可知,很可能也是東部候長轄下的某個亭隧。簡 16 上報內容為“卒自言”之事,卒的直屬上級為隧長,因此簡 16 的發件者當為某隧隧長,而據簡文“唯治所移官”,雖未明言呈送給候長,但“官”即候官,按照漢代文書逐級上呈下發的慣例,<sup>①</sup>當由候長向候官處匯報,則治所為候長駐地。這與破城子發現的隧長黨病書的文書運行流程也一致(詳下)。綜合看來,三簡皆顯示候長駐地為治所。當然,士吏、塞尉、使者的駐地也可稱為治所,不可武斷認為簡 13 匯報的對象就是候長。但發件人為平樂隧長,根據文書逐級上報的慣例,可排除塞尉、使者的可能性,而且也不見塞尉駐於 A32 遺址的材料。至於士吏,儘管也偶涉文書事,但其性質為武官,主要負責亭隧候望、通烽火、備盜賊等事務,<sup>②</sup>在文書行政上干係不大,迄今未見亭隧向士吏匯報工作的材料。因此,簡 13 的呈報對象不太可能是士吏。綜合各方面情況,簡 13 呈送的目的地當為候長治所,結合前述諸多東部候長封檢及簡 14“敢言之東部候長陳卿治所”的情況,簡 13 呈報的目的地為東部候長治所。若推測不誤,則簡文“檄到詣官”可解釋為候長援引的候官檄文,而非隧長直接向候官呈文,而且目前也未見到稱候官為治所的材料。

不過,儘管查明了簡 13 呈送的目的地為候長治所,並不足以表明其發掘地 A32 遺址即為候長駐地,因為在邊塞的文書行政中,尚存候長接到亭隧的報告後附以“按語”再轉呈候官的現象。如著名的候長黨病冊書:

17. 建武三年三月丁亥朔己丑,城北隧長黨敢言之:遇二月壬午,病加兩脾,雍種,匈脅丈滿,不耐食 EPF22:80

18. 飲,未能視事,敢言之。 EPF22:8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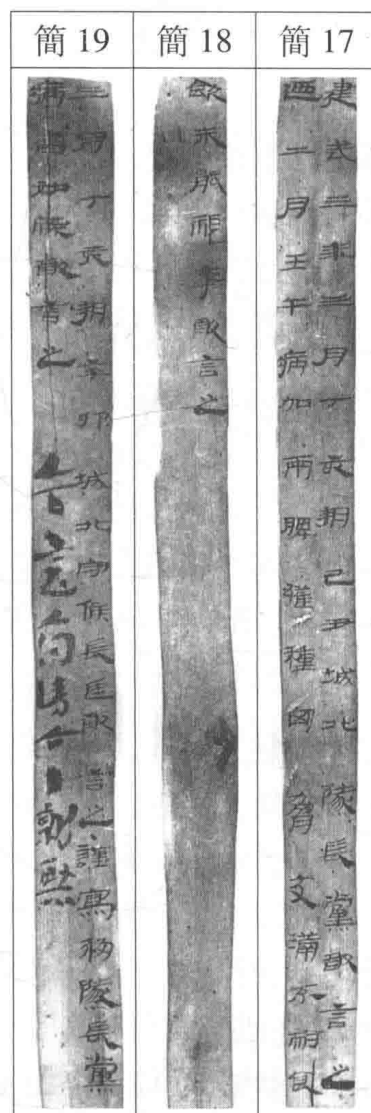
19. 三月丁亥朔辛卯,城北守候長匡敢言之:謹寫移隧長黨書如牒,敢言之。 今言府請令就醫 EPF22:82

① 卜憲群:《秦漢公文文書與官僚行政管理》,《歷史研究》1997 年第 4 期,44 頁。張家山漢簡《二年律令》顯示當時法律即規定逐級上報:縣道官有請而當為律令者,各請屬所二千石官,二千石官上相國、御史,相國、御史案致。當請,請之,毋得徑請者。徑請者罰金四兩(簡號 220,釋文據彭浩、陳偉、王藤元男主編《二年律令與奏讞書——張家山二四七號漢墓出土法律文獻釋讀》,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179 頁)。據此,在當時,越級請示還要罰金四兩。另外,甲渠候官遺址(A8)出土的隧長黨病書也反映了漢代文書逐級上呈的運行制度(詳下)。當然,也存在一些例外,如“元康二年二月庚子朔乙丑,左前萬世隧長破胡敢言之候官:即日疾,心腹四節不舉”(5.18+255.22/A33),“元康四年三月戊子朔甲辰,望泉隧長忠敢言之候官:謹寫移病卒爰書一編,敢言之”(255.40A/A33),兩簡皆有“敢言之候官”字樣,由隧長直接上呈肩水候,因此,越級上報的隧文書恐怕均綴以“敢言之候官”。

② 黎明釗:《士吏的職責與工作:額濟納漢簡讀記》,《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第 48 期,2008,15-34 頁;羅仕杰:《從居延漢簡看士吏的建置、遷調與職責》,《嶺東學報》第 31 期,2012,284-287 頁;最為全面的研究當屬王之璞《西北漢簡所見士吏研究》,碩士學位論文,西北師範大學,2015,74-78 頁。學界一般認為士吏為塞尉屬吏,但所據資料多為“告謂”格式的下行文書(陳夢家:《漢簡綴述》,53 頁;王之璞:《西北漢簡所見士吏研究》,67-73 頁),筆者以為此類資料不可徑從,有待進一步分析。

簡 17-19 發現於甲渠候官遺址(A8),三枚文書組成一份冊書。<sup>①</sup>除簡 19 末尾的批示“今言府請令就醫”外,其它內容字迹相同書風一致,疑由候長下的書記員書寫。據簡文可知整個流程為:(1)建武三年(27)三月三日(己丑)隧長黨向候長匯報病情申請休息或就醫,(2)候長接報後,於三月五日(辛卯)“寫移”隧長匯報書并附加“說明”呈給甲渠候。據學者研究,漢魏三國甚至隋唐時“寫”表示完整謄寫,與“鈔”表示部分謄寫不同,<sup>②</sup>因此簡 17 應不減一字照錄了隧長黨匯報的文書。據文末批語“今言府請令就醫”推測,應該尚有甲渠候向居延都尉府匯報并將都尉府的意見反饋給候長、由候長再下達隧長黨的步驟。這一流程也反映了漢代文書逐級上呈和下發的運行制度。<sup>③</sup>

據此反觀簡 13,很可能也存在東部候長接到平樂隧長報告後上呈給肩水候的情況,若如此則簡 13 的發現地當為肩水候的駐地。不過,一般而言,肩水候大本營在 A33 遺址,儘管因 A32 與之相距密邇,肩水候常常在該處停居,但陽朔元年(前 24)九月前大致常駐 A33 遺址,從鴻嘉元年起方常駐 A32 遺址,<sup>④</sup>而簡 13 紀年為甘露三年,因此該簡若存在類似隧長黨病書的情況,則應發現於地灣,而非 A32 遺址,故這種可能性基本不存在。總而言之,簡 13 的發掘地即為其呈送對象東部候長的治所。此簡形制為兩行,且字迹工整,應為平樂隧長呈送過來的文書正本而非草稿。<sup>⑤</sup>該簡顯示甘露三年平樂隧轄於東部塞,此前可能轄於其它部。<sup>⑥</sup>此外,還見另外一枚平樂隧呈文簡:



① 對這份冊書編聯及筆迹的分析,參邢義田《漢代簡牘公文書的正本、副本、草稿和簽署問題》,《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 84 本第 4 分,2011,609-611 頁。

② 童嶺:《鈔寫有別論——六朝書籍文化史識小錄一種》,《漢學研究》第 29 卷第 1 期,2011,257-280 頁。

③ 與隧長黨病書簡 19 性質相類的文書,還有 EPT52:108、EPT56:67,兩簡均有“謹寫移”字樣,顯示亦為轉呈。另外,甲渠候官遺址(A8)出土簡牘,如 3.14、6.8、127.9、262.33 等(文繁不贅),程序恐亦與隧長黨病書相似,皆由候長轉呈甲渠候官。

④ 關於 A33、A32 兩遺址的關係及肩水候駐地的移動,參拙文《漢代肩水候駐地移動初探》,《簡帛》待刊。

⑤ 角谷常子認為,文書草稿兼用單札與兩行,前者居多,正本當用兩行(角谷常子:《簡牘の形狀における意味》,收入富谷至編《邊境出土木簡の研究》,京都:朋友書店,2003,90-98 頁)。這點值得重視,但文書行政的實際過程中往往因陋就簡,例外者甚多,應視具體情況做出分析。邢義田即對正本必用兩行的說法提出質疑,見《漢代簡牘公文書的正本、副本、草稿和簽署問題》,629-630 頁及脚注 115。

⑥ 宣帝本始、元康年間,平樂隧可能轄於左後部,參拙文《漢代肩水塞部隧設置研究》,待刊。



20. 甘露三年四月甲寅朔丙辰, 平樂隧長明敢言之: □□病卒爰書一編, 敢言之。

73EJT28:16

該簡形制爲兩行, 字迹工整, 爲平樂隧長呈報的兵卒爰書冊書的呈文簡。雖未言呈報對象及帶有“治所”字樣, 比對簡 13 可知, 該簡亦當呈報給東部候長, 甘露三年四月, 東部候長駐於 A32 遺址。

與平樂隧類似者, 還有執適隧、樂昌隧的呈文簡, 如下:

21. 神爵二年正月丁未朔癸酉, 執適隧長拓敢言之: 謹移□□簿一編, 敢言之。 73EJT22:25

22. □丑執適隧長臘之敢言之□

□□罷軍廼丙子從省來道疾□ 73EJT28:113

23. 建始元年九月辛酉 朔辛酉, 樂昌 隧長輔敢言之: 謹移卒稟鹽名籍一編, 敢言之 73EJC: 603

三簡形制爲兩行。前兩簡均由執適隧長報告, 簡 21 爲某種簿籍文書的呈文簡, 簡 22 似匯報吏卒行道疾病。簡 23 爲樂昌隧長呈報的廩鹽名籍簿書的呈文簡, 且有兩處編聯留白。據學者對冊書編聯順序的復原研究, 21、23 兩簡皆當置於原冊書末尾。<sup>①</sup> 儘管 21、23 兩簡皆未言呈報對象, 所涉時間分別爲神爵二年(前 60)正月及建始元年(前 32)九月, 均在成帝陽朔元年(前 24)之前, 比對簡 13 可知, 呈報對象爲東部候長, 當時東部候長應駐簡牘出土地——在 A32 遺址。簡 23 爲采集簡, 與發掘出土的簡牘雖有不同, 但畢竟尚有明確的采集地點, 除非有堅實的反證, 一般而言, 在出土地點的認定上可與發掘簡一視同仁。21、22 兩簡皆爲執適隧呈文, 推測簡 14“□適隧”即執適隧。

不僅轄下亭隧需向候長呈文匯報工作, 東部候長亦須行文所轄亭隧指導工作, 故亦當有下行文書的底稿或草稿, 即第二類文書。如下簡:

24. 五月甲午, 東部候長充宗謂驩喜隧長廣漢: 寫移書到, □省卒芟, 它如候官書律令。 73EJF1:79

該簡紀月日而無紀年。結合簡文“寫移書到”及“它如候官書律令”, 可以推斷應爲候長轉發



<sup>①</sup> 侯旭東:《西北所出漢代簿籍冊書簡的排列與復原——從東漢永元兵物簿說起》,《史學集刊》2014 年第 1 期, 58-73 頁。



候官的下行文書，直接發給驩喜隧。據簡文主要是省卒伐茭工作，當與下簡相關：

25. 地節四年五月庚辰朔辛巳，肩水候房以私印行事謂候長充宗：官當空道，過往來乘傳客及斥□甚劇，毋以給。書到，充宗各以閒時省卒及美草盛時茭，各如牒。務得美草，毋假時。畢已，移□□□行茭須以給往來乘傳馬及斥候騎馬食，毋忽，如律令。

73EJF1:74

該簡爲寬木牘，下殘，三行書寫，字迹欠工整，候房簽名與其它文字無異，應爲一人所寫。據簡文可知，肩水候房發文給候長充宗，要求以閒時及水草豐茂時組織人力伐茭，供給過往吏卒，正好與簡 24 的信息相吻合。簡 25“如牒”，但所附“牒書”現在無存。另，簡 24 字距疏闊結字較正，簡 25 細密緊湊字體傾斜，兩簡或非同一人書寫。

綜合判斷，地節四年（前 66）五月二日（辛巳），肩水候房發文給東部候長充宗，要求其省卒伐茭。文書（簡 25）送達候長駐地 A32，東部候長接到後向轄下諸隧布置任務，在當月十五日（甲午）發文給驩喜隧，簡 24 應是這份文書的稿本或存檔底本，正本應該已經發往驩喜隧。若此說不誤，則兩簡皆可證東部候長駐於 A32 遺址，時間在地節四年五月。據上舉數簡亦可知，涉及的驛北亭、平樂隧、樂昌隧、驩喜隧、執適隧等應轄於東部塞。

如前所述，肩水候乃東部候長的直屬上級，在工作業務上聯繫緊密，兩者之間必然也存在上下行文書。首先分析肩水候下發給東部候長的下行文書，即第三類文書。如下：

26. 元康二年九月丁酉朔己未，肩水候房以私印

行事，謂候長長生：候行塞，書到行候事□

73EJT21:43A

令史利尉史義

73EJT21:43B

該簡形制爲兩行，下殘，筆力劣弱但不潦草，正背面書風一致，候房簽名字迹與其它文字相同，疑爲一人書寫。據簡文，候房吩咐東部候長長生，在候行塞時由其代行候事。元康二年肩水候駐在 A33 遺址，而該文書發給候長，雖無接收記錄，但既然出土於 A32 遺址，則表明應已送達，此地當時即爲東部候長駐地。

東部候長亦須向其上級肩水候呈報文書匯報事務，即第四類文書。如下：

27. 甘露三年二月乙卯朔辛未，東部候長廣宗敢言之：官下大守都尉府書曰案往者卒

過

73EJT25:6

該簡形制爲單札，字迹工整，應爲一人書寫。據簡文，肩水候轉發了一份都尉府的文書給東部候長，而簡 27 即爲東部候長上呈給候官的答復呈文。簡文開頭記年月日完整，則東部候長廣宗爲這份文書的負責人，而非逐級轉發文書中涉及的人員。因此，這件文書的出土地，或爲收件者候官所在地或爲發件者東部候長駐地，二者必居其一。甘露二年肩水候尚駐於

A33 遺址,故該簡出土地——A32 遺址——當時應為東部候長駐地,這份文書應為起草的稿本或存檔的副本,正本已發往 A33 遺址。

綜上四類 11 件往來文書,東部候長駐地當在 A32 遺址。所涉及的時間多在成帝之前。實際上,該地亦出土頗多成帝之後的東部候長文書,如下述兩簡:

28.元始四年五月庚午朔乙未,東部候長放敢言之:謹移亡人火出入界相付日時一編,敢言之。 73EJT23:855A

牟放印 令史發

五月乙未以來 君前 73EJT23:855B

29.□□年三月辛卯肩水東部候長憲受庫庶士宣□ 73EJT24:749+983<sup>①</sup>

簡 28 形制為兩行。正面書寫工整嚴謹,簡背字迹潦草隨意,應為接到文書後二次書寫。據簡文,元始四年(4)五月東部候長當向肩水候呈報亡人及表火簿書,該簡為簿書末簡。此時肩水候駐在 A32 遺址,故簡背“令史發君前”顯示令史在肩水候面前開封。簡 29 上殘,據簡文似為某種物資出入記錄。紀年不存,不過出現了“四”作“三”這一特殊寫法。據學者研究,“三”出現於王莽始建國二年至地皇四年之間。<sup>②</sup>查曆日,始建國元年至地皇四年間,四月干支含辛卯者有天鳳元年、二年、四年、五年,故該簡當在天鳳元年至五年間。“庶士”的用法亦見於王莽簡,<sup>③</sup>出現於天鳳元年(73EJF3:179)、天鳳五年(73EJF3:328),與前面推斷相符。兩簡雖不能直接證明東部候長就駐在 A32 遺址,但亦無法排除此種可能,鑒於此前東部候長駐在此地,亦未見駐在它處的材料,故筆者傾向於認為直到平帝及新莽時期,東部候長駐地一直在 A32 遺址。

此外,還有候史通關的簡牘,亦可作為旁證,<sup>④</sup>本文不贅。

① 該簡由姚磊綴合,見《〈肩水金關漢簡(叁)〉綴合(一)》,簡帛網,2016 年 11 月 22 日。

② 關於王莽時期“三”用法的研究,可參森鹿三《居延出土的王莽簡》,原刊《東方學報》33 期,1963 年,此據中譯,見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戰國秦漢史研究室編《簡牘研究譯叢》第 1 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3,13 頁;饒宗頤、李均明《新莽簡輯證》,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95,103-106 頁;焦天然《新莽簡判斷標準補說——以居延新簡為例》,《中國國家博物館館刊》2016 年第 11 期,103 頁。

③ 饒宗頤、李均明:《新莽簡輯證》,162-164 頁。

④ T37 出土了數枚出入關登記簡,均由候史丹放行,如 73EJT37:230、73EJT37:956、73EJT37:701、73EJT37:1565 等。另有三份候史丹開封的文書,如 73EJT37:651+727(建平二年)、73EJT37:828、73EJT37:1532 等。候史一般作為候長屬吏駐部,主要負責文書工作,個別情況下也有駐隧的(高榮、張榮芳:《漢簡所見的“候史”》,《中國史研究》2004 年第 2 期,15-23 頁)。因此,雖然候史丹負責出入關,應屬偶然,通常還是作為候長屬吏駐部的,不過,無法絕對排除其駐金關的可能性,故本文不將其作為候長駐在 A32 遺址的證據。

## 五 余論

綜上對封檢、楊及相關文書的分析，東部候長一直駐在 A32 遺址，該地即東部候長治所。通觀前述材料，絕大多數都出自該遺址的 T21—T29 諸探方，這一系列探方位於塢院的北部，與沿牆而設的房屋相重合。東部候長是否就在其中某（些）間房屋辦公，尚待進一步研究。另外，東部候長作為東部塞的負責者及轄下亭隧與肩水候之間的中層機構，在文書行政上必然發揮或大或小的作用，其所經手或處理的文書自然也存留於 A32 遺址。換言之，現在刊布的金關簡中必然有部分文書簿籍屬於東部候長的遺留物。此前，學界對“部”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轄區、命名、職掌及對候長任官資格的分析上，對“部”在文書行政上的運作詳情及其在整個邊塞防禦系統中所起的具體作用着墨不多<sup>①</sup>。恰當科學地分析這批東部候長名下的文書，亦不難考察“部”級機構的日常管理實態及其在整個邊塞系統中所起到的真正作用。本文對東部候長駐地的考證，在理清 A32 遺址複雜性的同時，可為實現這一目標奠定基礎。

此外，自貝格曼、陳夢家將 A32 遺址視作金關所在地以來<sup>②</sup>，這個說法一直為學界所沿用。20 世紀 70 年代初在此地進行了較系統的考古發掘，考古隊根據遺址勘察及所出簡牘初步認定此地至少有金關、金關隧和通道廄三個單位，兼具關卡、斥候、驛廄等多種職能<sup>③</sup>。近年來，李均明撰文討論了此地所駐通道廄的相關問題。<sup>④</sup> 實際上，該地是個複合型遺址，不僅駐有金關、通道廄、驛北亭，亦是東部候長的駐地。成帝鴻嘉年間起，肩水候亦常駐此地。因此，就整個肩水塞甚至弱水中下游流域的屯戍系統而言，A32 遺址在當時所起的作用是多方面的，不僅僅是稽查過往吏民、傳遞郵書、供給過往吏卒。作為東部候長和肩水候的駐地，也一度是東部塞及肩水候官塞的日常管理中心。因此，再以金關稱呼 A32 遺址，會遮蔽其完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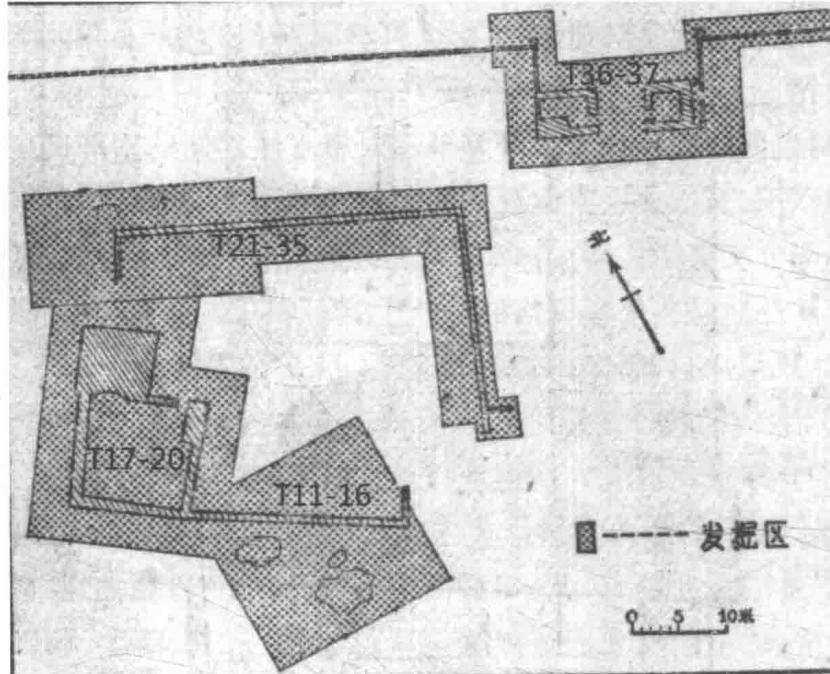
① 吳昌廉：《漢代邊塞“部”之組織》，《簡牘學報》第 11 期，1985，165—173 頁；永田英正：《居延漢簡研究》，307—308、320 頁；劉軍：《甲渠塞臨木部候長考——兼論候長的職責》，李學勤主編《簡帛研究》第 1 輯，北京：法律出版社，1993，184—191 頁；于振波：《居延漢簡中的隧長和候長》，李學勤、謝桂華主編《簡帛研究二〇〇一》，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1，304—315 頁；吉川佑資：《居延漢簡にみえる候長と候史》，《古代文化》第 63 卷第 2 號，2011，248—256 頁；初山明：《漢代エチナ=オアシスにおける開發と防衛線の展開》，收入富谷至編《流沙出土の文字資料——樓蘭・尼雅出土文書を中心に》，此據初山明《秦漢出土文字史料の研究》，278—292 頁；齊銀生：《從甲渠候官簡牘探析候部的運作及吏員管理》，碩士學位論文，西北師範大學，2015。

② 弗克·貝格曼考察，博·索馬斯特姆整理：《內蒙古額濟納河流域考古報告》，第 327 頁；陳夢家：《漢簡考述》，見《漢簡綴述》，第 33 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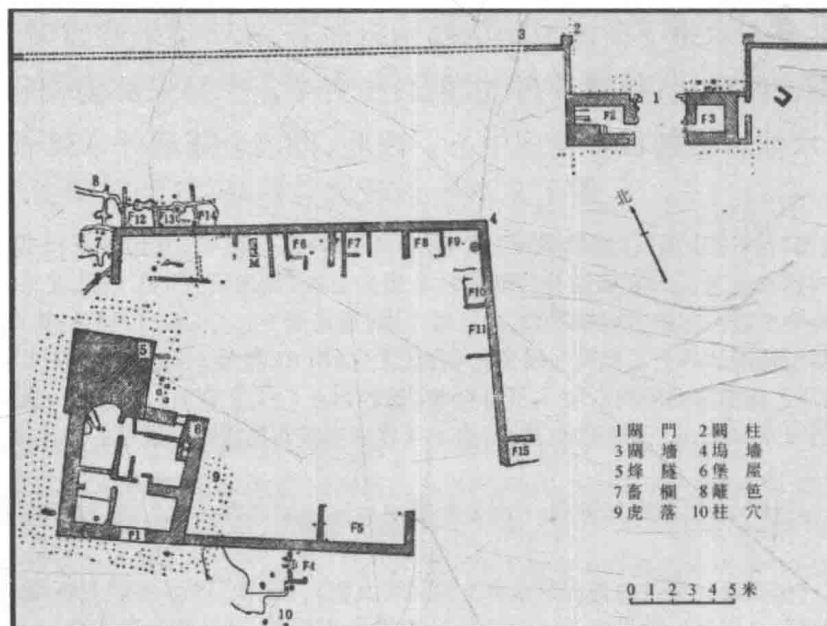
③ 甘肅居延考古隊：《居延漢代遺址的發掘和新出土的簡冊文物》，《文物》1978 年第 1 期，第 5 頁。

④ 李均明：《通道廄考——與敦煌懸泉廄的比較研究》，李學勤主編《出土文獻》第 2 輯，上海：中西書局，2011 年，第 254—266 頁。不過，確認屬於通道廄遺物的簡牘，僅數份散亂冊書，時間為昭帝元鳳五年、六年（73EJT10:107、73EJT10:150、73EJT10:209、73EJT10:295 等）。這批資料均出土自 A32 遺址南部的灰坑及垃圾堆內，其中簡牘當為駐在 A32 遺址的機構所拋棄。當然，理論上還存在通道廄駐在其它地方，因文書行政而向 A32 遺址的機構呈文的可能性。不過，昭帝元鳳年間，此地似僅駐有金關，通道廄無須向其移文，故這個可能性無法成立。綜合判斷，很可能昭帝時期，通道廄亦駐在 A32 遺址，後來廢棄或遷走。隗他塞轄有通道亭，或與此有關。

的功能與作用。當然,“金關”這一稱呼畢竟相沿成俗,而且現在刊布的簡牘也以其命名,沿用舊稱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我們對 A32 遺址的複雜性一定要有清醒的認識。祇有如此,在使用金關簡時,才不至於對其性質和作用產生誤判。



A32 遺址發掘區分布圖



A32 遺址平面圖

(兩圖取自甘肅居延考古隊《居延漢代遺址的發掘和新出土的簡冊文物》,《文物》1978 年第 1 期,13 頁)

附表 1: A32 出土東部候長 I 型封檢

序號	簡文	簡號
1	東部候長	73EJT7:28
2	東部候長 <input checked="" type="checkbox"/>	73EJT25:16
3	東部候長	73EJT32:34

附表 2: A32 出土東部候長 II 型封檢

序號	簡文	簡號
1	東部候長放	73EJT27:47
2	東部候長 <input type="checkbox"/> <input type="checkbox"/> <input checked="" type="checkbox"/>	73EJT25:215
3	東部候長廣宗	73EJT28:1
4	東部候長廣宗	73EJT29:120
5	東部候長長生	73EJT30:92
6	東部候長 <input type="checkbox"/> <input type="checkbox"/>	73EJT37:1490
7	東部候長彊	73EJC:335

附表 3: A32 出土東部候長 III 型封檢

序號	簡文	簡號
1	東部候長孫卿治所	73EJT21:22
2	東部候長王卿治所 <input checked="" type="checkbox"/>	73EJT25:18
3	東部候長黃卿治所	73EJT29:124

附表 4: A32 出土東部候長 IV 型封檢

序號	簡文	簡號
1	東部候長王卿治所次亭行	73EJT29:123

附表 5: A32 出土東部候長 V 型封檢

序號	簡文	簡號
1	左前候長隧長黨寫傳至東部隧次行 <input type="checkbox"/>	73EJT27:46
2	佐前候長光等寫傳東部候長廣宗行者走 <input type="checkbox"/>	73EJT28:20

附表 6: A32 出土“候長”封檢

序號	簡文	簡號
1	候長周 <input type="checkbox"/> <input checked="" type="checkbox"/>	73EJT24:531
2	候長治所	73EJT28:5

續表

序號	簡文	簡號
3	候長孫卿治所	73EJT23:169
4	候長王卿治所	73EJT28:59
5	候長楊卿治所	73EJT33:70
6	候長得望十月甲寅治□□□□	73EJT4:51

附記:本文寫作及修改過程中,承導師侯旭東先生提示資料、耐心指導修改,復承鄔文玲、凌文超、馬楠、孫梓辛、屈濤、祁萌、陳韻青、曹天江等諸位師友惠示寶貴意見,投稿後又得到匿名審稿專家的詳細指正,謹此一併致謝。



## 長沙東牌樓漢簡校釋拾遺\*

吉林大學古籍研究所

出土文獻與中國古代文明研究協同創新中心

徐俊剛

**內容提要** 本文對長沙東牌樓東漢簡牘的部分釋文作了新的校釋,認為2號簡“駟□亭”當為“駟望亭”;110號簡“苜一寵”當為“苜(管)一寵”;157號簡“昌孖”當為“昌友”。

**關鍵詞** 東牌樓漢簡 簡文 校釋

《長沙東牌樓東漢簡牘》出版於2006年,<sup>①</sup>至今已逾十載,學界從不同角度對其進行了深入的研究,成果豐碩。我們在研讀中發現仍有一些小問題可以補充,而新刊布的五一廣場東漢簡牘也為其提供了一些佐證,這裏選取幾例彙集成札記一篇,乞請方家批評指正。

東牌樓2號簡“光和六年東部勸農郵亭掾周安言事”封匣,簡文作:<sup>②</sup>

\* 本文寫作受到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簡牘學大辭典”(14DB027)的資助。

① 長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中國文物研究所編:《長沙東牌樓東漢簡牘》,北京:文物出版社,2006。本文援引東牌樓漢簡圖版及整理者觀點皆自此書,不更注明。


② 釋文引自長沙東牌樓東漢簡牘研讀班《〈長沙東牌樓東漢簡牘〉釋文校訂稿》,卜憲群、楊振紅主編《簡帛研究二〇〇五》,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8,146頁。

|||合檄一封

臨 湘|||東部勸農郵亭掾周安言事



廷以郵行|||詣如署

|||光和六年正月廿四日乙亥申時□駟□亭

文末“駟□亭”，第二字“”已漫漶難識，整理者僅注爲郵亭名。經過仔細辨認，該字很可能是“望”，其上部左半是表示人眼的“臣”，右半是“月”，下部也大體如“壬”形，所以我們推測“駟□亭”可能是“駟望亭”。

爲這一判斷提供了可能性依據的，是五一廣場東漢簡牘中兩次出現了“駟望亭”。一見於 19 號簡(CWJ1②:124)A 面，簡文作：<sup>①</sup>




永元元年正月癸酉朔廿日壬辰，東部勸農賊捕掾遷、游徼尚、駟望亭長范叩頭死罪敢言之。

其中“望”字作“”，亦已殘泐，勉強能看出大致輪廓。又見於 40 號簡(CWJ1①:112，圖 1)A 面，“”字迹清晰，簡文作：<sup>②</sup>

男子謝佑殺周

萇亡本事。

駟望亭主。

比對“”與“”的字形，二者確實十分接近，而且可以進一步發現，其下部所從皆非一般的“壬”形。目前所見漢簡文字中的望(望)字，下部一般皆從“壬”，但該字下部從“立”，若嚴格隸定應作“望”，這在漢簡中尚爲僅見。在傳世寫法中，望(望)確有從立的異體，如《集韻·漾韻》：“望，或從立。”《正字通·立部》：“望，俗望字”。<sup>③</sup>《隸辨》：雍勸闕碑作“望”，注曰“《類篇》：望或從立”。<sup>④</sup>另外，香港中文大學藏漢簡 229 號正面有望字作“”(頭~目顛)，整理者徑隸作本形，<sup>⑤</sup>現在看來，其下部雖不是立，也并非一般寫法的“壬”。

東牌樓簡與五一廣場簡同地出土，且時間上僅相距百年，地名未曾變化是很正常的。下表列舉了部分長沙郡下屬鄉、亭在兩批簡中互見的情況：

① 長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中國文化遺產研究院、湖南大學嶽麓書院編：《長沙五一廣場東漢簡牘選釋》，上海：中西書局，2015，137 頁。書中釋文皆作“望”，本文統一作“望”。

② 長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中國文化遺產研究院、湖南大學嶽麓書院編：《長沙五一廣場東漢簡牘選釋》，152 頁。

③ 引自漢語大字典編輯委員會《漢語大字典》(第 2 版)，成都：四川辭書出版社，2010，2902 頁。

④ [清]顧藹吉：《隸辨》，北京：中華書局，1986，152 頁。

⑤ 陳松長編著：《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藏簡牘》，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2001，102 頁。

表1 五一廣場簡、東牌樓簡互見鄉、亭對照表

	五一廣場	東牌樓
南山鄉	簡 112	簡 105
南鄉	簡 1、2、50、53、82、88、122、123	簡 131
廣樂亭	簡 128	簡 6+7

資料來源：《長沙五一廣場東漢簡牘選釋》、《長沙東牌樓東漢簡牘》

其中南鄉又見於走馬樓吳簡，而五一廣場簡中的小武陵鄉，亦見於吳簡，都說明了這一時期鄉、亭名的穩定性。由此，我們認為“駟口亭”應該就是“駟望亭”。

東牌樓漢簡中除了上述駟望亭、廣樂亭，還有安定亭（簡 3）、長蘭亭（簡 6+7），其中長蘭亭之名應是源於同簡所見的長蘭山。我們懷疑長蘭亭可能就是五一廣場簡中的長賴亭（簡 7、8、44、159），古音蘭屬來紐元部，賴屬來紐月部，聲紐相同，元、月陽入對轉。《後漢書·王丹傳》：“其惶嬾者恥不致丹。”李賢注：“嬾與賴同。”<sup>①</sup>這是蘭、賴可以通假的文獻例證。

## 二

東牌樓 110 號簡“槩等器物帳”（圖 2），釋文作：<sup>②</sup>

蔣十五枚 蓺席一束 苕一寵  
丈席一枚 平于一枚 馬汝櫟一雙  
丈二席一枚 大酒于一枚 南山……

其中所謂“苕一寵”，整理者謂“‘苕’爲‘苕苕’省稱，又作‘苕苕’，即車前草，可入藥。”王子今先生認為：<sup>③</sup>


可以與此對應的考古資料，可能如馬王堆一號漢墓“遣策”所見“苕一筍”（一五八），“苕一筍”（一五九），“|| 右方土衡苕三筍”（一六〇），馬王堆三號漢墓“遣策”所見“無夷一筍”（一八四），“苕一鈞一筍”（一八五），“苕一筍”（一八六），“苕十四囊”（二〇五）……簡文“苕一寵”的“苕”，也是有特殊功能的植物……我們目前對“苕一寵”的理解，也許祇能以“未詳”總結。

① 高亨：《古字通假會典》，濟南：齊魯書社，1989，192 頁。

② 釋文參見伊強《讀〈長沙東牌樓東漢簡牘〉札記》，《簡帛》第 6 輯，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418-419 頁。

③ 王子今：《蔣席·皮席·蓺席——長沙東牌樓簡牘研讀札記》，卜憲群、楊振紅主編《簡帛研究二〇〇五》，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8，171 頁。

從辭例格式上看,“苜一窰”與馬王堆遺策的記錄確實相近,但從簡文內容來看,除了“苜一窰”之外,其餘皆是器物,將一窰車前草與蔣、席、孟、櫟等其他不相干的器物放在一起,使人費解。回歸圖版考察,我們發現釋“苜”實誤。造成這一誤釋的原因,可能是將兩口形左側簡牘上的印迹看作“目”字相連的筆畫,事實上,在兩口的正中間有一筆相連,正是“呂”字的一般寫法,因而該字當釋為“苜”。

五一廣場東漢簡牘 26 號木簡(CWJ1③:306-1)亦有“苜”字作,釋文如下:

……竹苜凡五十六枚。到十二月不處日,角持苜

……賣與不處姓名男子,得米三斛,行道復從過

其注釋云:苜,即筩,竹筐。《玉篇·竹部》:“筩,盛米器也。方曰筐,圓曰筩。”《晉書·袁袞傳》:“父亡,作筩賣以養母。”<sup>①</sup>《隸釋》卷九收錄《費鳳別碑》亦有:“耕夫釋耒耜,桑婦投鉤苜”。<sup>②</sup>後來從“苜”之字,在漢簡中多寫作從“𠂔”(如“第”多作“苜”,“等”多作“苜”),“苜”和“筩”亦從其例。

由此,原釋“苜一窰”當為“苜(筩)一窰”,窰與籠通,亦是竹箱之屬,在這裏應該是用為量詞。這樣,苜(筩)與其他常用生活器物記在同一帳目上也就說得通了。

### 三

東牌樓 157 號簡(圖 3),整理者釋文作:

昌孖……不問起

其他釋文校訂者均未有異說。今按,“孖”字不見於漢代及更早的文字材料,《玉篇》釋為“雙生子也。亦作滋,蕃長也”,<sup>③</sup>《廣韻》:“孖,雙生子也”,<sup>④</sup>都是較晚的記載。

漢簡中“子”字寫法皆如本形,突出嬰兒頭顱較大的特點,從不作一筆而下的簡便寫法,即便作為偏旁時也是如此,茲舉幾例:<sup>⑤</sup>

① 長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中國文化遺產研究院、湖南大學嶽麓書院編:《長沙五一廣場東漢簡牘選釋》,143 頁。

② [宋]洪适:《隸釋·隸續》,北京:中華書局,1985,109 頁。


③ [梁]顧野王撰:《大廣益會玉篇》,北京:中華書局,1987,134 頁。

④ [宋]陳彭年撰:《鉅宋廣韻》,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31 頁。

⑤ 字形舉例引自李洪才《漢簡草字研究與整理》下編《漢代簡牘草字彙編》,吉林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14。

表 2 漢簡“子”字字形舉例

單字					
	尹灣 YM6D8B	敦煌 236A	居延新簡 EPT59·187B	肩水金關 73EJT2:12	東牌樓 66A
偏旁					
	字(肩水金關 73EJT7:36)	孤(尹灣 127)	存(敦煌 2278A)	孟(居延 173·28A)	孺(天長 M19:40-10A)

可見釋為從二子的“孖”是不正確的。





我們認為應該是“友”。漢代簡帛中“友”字依舊保留從二又的寫法,如,馬王堆帛書《稱》145 作“”,<sup>①</sup>銀雀山漢簡 747 作“”,<sup>②</sup>都與相同,故而簡文當改釋為“昌友……不問起”。



圖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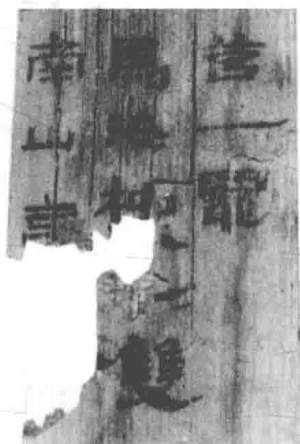


圖 2(局部)



圖 3

① 陳松長編著:《馬王堆簡帛文字編》,北京:文物出版社,2001,115 頁。

② 駢宇騫編著:《銀雀山漢簡文字編》,北京:文物出版社,2001,102 頁。

## 論走馬樓吳簡親屬稱謂詞語 在辭書編纂上的價值\*

西南大學文獻所、出土文獻綜合研究中心 陳榮傑 賈利青

**內容提要** 目前公布的走馬樓吳簡中共有 141 個親屬稱謂詞語,這些詞語在辭書編纂上具有增補辭書詞條、提前文獻用例、補充文獻用例、訂補辭書義項等多方面的價值。

**關鍵詞** 吳簡 親屬稱謂詞語 辭書編纂 價值

1996 年在長沙市中心五一廣場東南側走馬樓街建設區域內 J22 號古井中出土了大量的三國孫吳紀年簡牘(以下稱為“吳簡”),共 14 萬餘枚,有字簡近 8 萬枚,約 200 萬字,內容主要以戶籍和賬簿為主。吳簡現已刊布 48007 枚,其中近一半的內容為戶籍。數量如此多的戶籍簡在簡牘發掘史上實屬罕見。這些戶籍簡有大量的親屬稱謂詞語,真實地記錄了三國時期長沙地區下層人民的社會結構狀況和家庭成員情況。因此,吳簡親屬稱謂詞語在探討親屬稱謂發展變化、分析三國孫吳家庭結構、辭書編纂(尤其是稱謂專門辭書的編纂)等方面具有重要價值。這裏主要討論吳簡親屬稱謂詞語在辭書編纂方面的價值。

《漢語大詞典》作為一部大型的、代表當前辭書編纂最高水平的漢語語文辭書,在收詞上

---

\* 本文得到國家社科基金項目“走馬樓三國吳簡詞彙研究”(13CYY055)、中央高校基本科研業務費重點項目“走馬樓三國吳簡字形譜”(SWU1709234)和中央高校基本科研業務費專項資金創新團隊項目“基於出土文獻綜合研究的文化推廣工程”(SWU1509395)的資助。



主張“古今兼收，源流並重”；編纂上“着重從語詞的歷史演變過程中加以全面闡述。所收條目力求義項完備，釋義確切，層次清楚”。<sup>①</sup>這無疑是編纂辭書所追求的理想境界。然而中國歷史源遠流長，古代流傳下來的典籍浩如煙海，靠有限的人力（編纂者）是很難將全部文獻中的詞語搜羅殆盡，加之《漢語大詞典》容量巨大，出自衆手，疏忽遺漏，在所難免。蔡希芹先生編《中國稱謂辭典》，王火、王學元先生編《漢語稱謂詞典》，鮑海濤、王安節先生編《親屬稱呼辭典》主要依據傳世資料，也存在一些書證滯後、詞條漏收等情況。故我們以《漢語大詞典》（以下簡稱《大詞典》）《中國稱謂辭典》《漢語稱謂詞典》《親屬稱呼辭典》為例，從四個方面探討吳簡親屬稱謂詞語在辭書編纂上的價值。討論時以《大詞典》為主，兼論《中國稱謂辭典》《漢語稱謂詞典》《親屬稱呼辭典》。

## 一 增補辭書詞條

《大詞典》及相關稱謂類專書辭典由於涉及的資料所限，有不少失收、漏收親屬稱謂詞語的情況。親屬稱謂詞語在宗族和婚姻兩大主線的交織下構成一個龐大的網格系統，每一個親屬稱謂詞在這一網格下都有自己固定的位置，且由於性別、長幼、嫡庶的不同，親屬稱謂詞語呈現出很强的對稱性。如有“祖父”，必有“祖母”。據吳簡，《大詞典》等辭書失收、漏收了不少親屬稱謂詞語。

### 1. 男孫

文男孫斗年二歲。 (柒·852)<sup>②</sup>

湛男孫黑年四歲。 (捌·342)

文男孫仙年二歲。 (捌·1125)

《大詞典·女部》收有“女孫”一詞，而《大詞典·田部》“男”下却没有收“男孫”。有“女孫”則必有“男孫”。據吳簡，《大詞典》應增補詞條“男孫”。“男孫”又見於傳世文獻，如劉克莊《鵲橋仙·生日和居厚弟》：“女孫笄珥，男孫袍笏，少長今朝咸集。”<sup>③</sup>《中國稱謂辭典》《親屬稱呼辭典》《漢語稱謂詞典》亦無“男孫”，當補。

### 2. 男姪

□踵兩足，□男姪客年七歲。 (壹·1186)

① 漢語大詞典編輯委員會編，羅竹風主編：《漢語大詞典》第一卷《前言》，上海：漢語大詞典出版社，1990。

② 本文所引吳簡語料均出自走馬樓簡牘整理組編《長沙走馬樓三國吳簡·竹簡》[壹]、[貳]、[叁]、[肆]、[柒]、[捌]，北京：文物出版社，2003、2007、2008、2011、2013、2015。原釋文無標點，所引簡例凡文意完整者，均試予標點。下同。

③ 唐圭璋編：《全宋詞》，北京：中華書局，1965，2641頁。

·馬男姪碩年卅，給驛卒；□妻□年廿四。(貳·2285)

祐男姪南年卅五，給祐子弟限田，以嘉禾四年八月十一日叛走。大男(貳·7048)

《大詞典·女部》收有“女姪”一詞，而《大詞典·田部》“男”下却没有收“男姪”。根據吳簡及親屬稱謂詞語對稱性原則，《大詞典》應增補詞條“男姪”。《中國稱謂辭典》《親屬稱呼辭典》《漢語稱謂詞典》亦無“男姪”，當補。

### 3.寡弟、寡女弟

如寡弟大女[初]年廿，筭一，腹心病。(叁·5757)

妻大女頃年廿二，縣寡女弟姑年廿九。(貳·1872)

沙蓀孫仕伍諸年四歲，文寡女弟碓年五十六，踵(腫)兩足。(貳·1955)

“寡弟”，吳簡又作“寡女弟”。《大詞典·宀部》“寡”下收有“寡姊”，而無“寡弟”或“寡女弟”或“寡妹”。據吳簡，應增補詞條“寡弟”“寡女弟”。《中國稱謂辭典》《親屬稱呼辭典》《漢語稱謂詞典》亦無“寡弟”“寡女弟”，當補。

### 4.妻兄

高妻兄張年六十二。(壹·9430)

《大詞典·女部》“妻”下收有“妻弟”，而無“妻兄”。據吳簡，《大詞典》應增補詞條“妻兄”。《中國稱謂辭典》《漢語稱謂詞典》收有“妻兄”。“妻兄”多見於傳世文獻，如《史記·孔子世家》：“孔子遂適衛，主於子路妻兄顏濁鄒家。”<sup>①</sup>《親屬稱呼辭典》收有“內兄”而無“妻兄”。

### 5.妻父

宣妻父車年七十，踵兩足。(捌·1480)

文妻父元年六十四，腹心病。(捌·1969)

蚤妻父殷尼年八十一，盲右目。(捌·2003)

“妻父”指妻子的父親。《大詞典·女部》“妻”下無“妻父”。據吳簡，當增補。“妻父”多見於傳世文獻，如《漢書·董賢傳》：“遷賢父爲少府，賜爵關內侯，食邑，復徙爲衛尉。又以賢妻父爲將作大匠，弟爲執金吾。”<sup>②</sup>《中國稱謂辭典》《親屬稱呼辭典》收有“妻公”而無“妻父”。《漢語稱謂詞典》收有“妻父”，書證爲《水滸全傳》。

### 6.妻母

□妻母大女妾年六十二。(壹·10148)

① 《史記》卷四七《孔子世家》，北京：中華書局，1959，1919頁。

② 《漢書》卷九三《佞幸傳》，北京：中華書局，1962，3733頁。

·客妻母大女妾年六十二，腫兩足；客姪子男謀(?)年七歲。(貳·4667)

“妻母”指妻子的母親。《大詞典·女部》“妻”下無“妻母”。據吳簡，當增補。“妻母”又見於傳世文獻，如《魏書·安定王休附子願平傳》：“坐裸其妻王氏於其男女之前，又強姦妻妹於妻母之側。”<sup>①</sup>《中國稱謂辭典》《親屬稱呼辭典》《漢語稱謂詞典》亦無“妻母”，當補。

### 7.小母

胤小母大女汝年五十一。(壹·9344)

孝小母巡年卅三，筭一；巡子男□年十四。(柒·4919)

《大詞典·小部》“小”下收有“小父”，而無“小母”。根據吳簡及親屬稱謂詞語對稱性原則，《大詞典》應增補詞條“小母”。《中國稱謂辭典》《親屬稱呼辭典》《漢語稱謂詞典》亦無“小母”，當補。

### 8.舅女

文舅女綿年廿一。(柒·1060)

《大詞典·臼部》“舅”下“舅子”，“①舅氏之子，即表兄弟。”根據吳簡及親屬稱謂詞語對稱性原則，《大詞典》應增補詞條“舅女”，“舅氏之女，即表姊妹”。“舅女”又見於傳世文獻，如《北史·文成五王傳》：“琛妃，宣武舅女，高皇后妹。”<sup>②</sup>《中國稱謂辭典》《親屬稱呼辭典》《漢語稱謂詞典》亦無“舅女”，當補。

### 9.外孫男

□年□歲，□外孫男奴年六歲，□□(壹·4113)

《大詞典·夕部》“外”下收有“外孫女”，而無“外孫男”。“外孫男”指女兒的兒子。根據吳簡及親屬稱謂詞語對稱性原則，《大詞典》應增補詞條“外孫男”。《親屬稱呼辭典》也收有“外孫女”而無“外孫男”，《中國稱謂辭典》《漢語稱謂詞典》亦無“外孫男”，當補。

### 10.妻男姪

□妻男姪□□年十六，龍耳，筭一。(柒·850)

銀妻男姪□年七歲。(柒·4807)

《大詞典·女部》“妻”下無“妻男姪”，當補。“妻男姪”指妻兄弟之子。《大詞典·女部》收有“妻甥”，指“妻姐妹之子。”據親屬稱謂詞語對稱性原則，也應收“妻男姪”，指妻兄弟之子。

① 《魏書》卷一九《景穆十二王傳下》，北京：中華書局，1974，519頁。

② 《北史》卷一九《文成五王傳》，北京：中華書局，1974，687頁。

《親屬稱呼辭典》收有“妻侄”，而無“妻男姪”。《中國稱謂辭典》《漢語稱謂詞典》亦無“妻男姪”，當補。

《大詞典》等辭書除以上呈明顯對稱分布的親屬稱謂詞語當收而未收外，還有一些親屬稱謂詞語沒有收錄。茲舉例如下：

#### 11. 從小父

囊從小父堅年六十三。 (壹·8913)

子小女深年六歲；志從小父□年卅三，苦腹心□ (叁·6214)

《大詞典·彳部》“從”下無“從小父”。“小父”指父之幼弟，“從”是旁系親屬的標誌，“從小父”當指父親的堂弟。《大詞典》《中國稱謂辭典》《親屬稱呼辭典》和《漢語稱謂詞典》均失收“從小父”，當補。

#### 12. 寡女

河寡女爲年卅七，筭一。 (捌·1477)

文寡女綿年卅一，筭一。 (捌·1940)

《大詞典·宀部》“寡”下無“寡女”條。據吳簡，“寡女”當指失去丈夫的女兒。《大詞典》當補。“寡女”又見於傳世文獻，如《三國志·蜀書·張裔傳》：“裔臨發，權乃引見，問裔曰：‘蜀卓氏寡女，亡奔司馬相如，貴土風俗何以乃爾乎？’”<sup>①</sup>《中國稱謂辭典》《親屬稱呼辭典》《漢語稱謂詞典》亦無“寡女”，當補。

#### 13. 從姑

□子□□年七歲，□從姑□□年十二。 (柒·451)

□從姑妾年五十，筭一。 (柒·5857)

《大詞典·彳部》“從”下無“從姑”。“從”是旁系親屬的標誌，“從姑”指堂姑。《大詞典》失收，當補。《親屬稱呼辭典》《漢語稱謂詞典》亦無“從姑”。《中國稱謂辭典》收有“從姑”，“稱父親的堂姊妹”。所引書證爲《晉書》，晚於吳簡。

#### 14. 母父

彊母父□年八十二。 (壹·7426)

《大詞典·母部》“母”下無“母父”。《大詞典》收有“母兄”“母弟”。吳簡“母父”指母親的父親。《大詞典》失收，當補。《中國稱謂辭典》《親屬稱呼辭典》《漢語稱謂詞典》亦無“母父”，當補。

<sup>①</sup> 《三國志》卷四一《蜀書·霍王向張楊費傳》，北京：中華書局，1959，1012頁。

## 15. 寡姑

· □母大女縵年六十六, □寡姑大女芬年五十。 (貳·1589)

· □寡姑大女紆年六十六, 踵(腫)足; 紆子女易年卅, 筭一。 (貳·2396)

《大詞典·宀部》“寡”下無“寡姑”條。“寡姑”指守寡的姑姑。《大詞典》失收, 當補。《中國稱謂辭典》《親屬稱呼辭典》《漢語稱謂詞典》亦無“寡姑”, 當補。

## 16. 大妻

令大妻思年卅五, 在本縣, 嘉禾三年二月五日物故。 (壹·8216)

橋大妻曲年卅八, 橋小妻仕年卅。 (壹·8925)

難(?)父公乘大年八十九, 大妻大女銖年六十三。 (柒·3821)

《大詞典·大部》“大”下無“大妻”條。吳簡“大妻”和“中妻”“小妻”相對而言, “大妻”即嫡妻、正妻。《大詞典》失收, 當補。《中國稱謂辭典》《親屬稱呼辭典》《漢語稱謂詞典》亦無“大妻”, 當補。

## 17. 中妻

專族孫仕伍佰(?)年五歲, 專中妻大女純年五十, 已死。 (貳·1952)

狶中妻大女弼年卅五, 筭一 □狶小妻大女瑱(?)年卅, 筭一。 (貳·2405)

《大詞典·丨部》“中”下無“中妻”條。據吳簡, “中妻”指排行居中的妻子, 其在家庭中的地位低於大妻, 高於小妻。<sup>①</sup> 吳簡“中妻”不見於傳世文獻和其他出土文獻, 對於研究古代的妻妾制度具有重要的意義。《大詞典》失收, 當補。《中國稱謂辭典》《親屬稱呼辭典》《漢語稱謂詞典》亦無“中妻”, 當補。

## 18. 外男孫

□外男孫青年十歲。 (壹·5155)

到外男孫沙年八歲。 (捌·1017)

《大詞典·夕部》“外”下無“外男孫”條。“外男孫”與“外孫男”意義相同, 指女兒的兒子。《大詞典》失收, 當補。《中國稱謂辭典》《親屬稱呼辭典》《漢語稱謂詞典》亦無“外男孫”, 當補。

## 19. 外女孫

平外女孫并(?)年七歲。 (貳·1977)

① 趙國華:《從“中妻”管窺三國婚俗》,《歷史文獻研究》第28輯,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9,364-368頁。

外<sub>外</sub>女孫婢年二歲。

(肆·1817)

《大詞典·夕部》“外”下無“外女孫”條。“外女孫”即“外孫女”，指女兒的女兒。《大詞典·夕部》收有“外孫女”一詞。《親屬稱呼辭典》《漢語稱謂詞典》亦收有“外孫女(兒)”而無“外女孫”。《中國稱謂辭典》亦無“外女孫”。

#### 20.外男姪

□外男姪陳毛年八。

(肆·411)

元外男姪客年十三。

(捌·1510)

《大詞典·夕部》“外”下無“外男姪”。“外男姪”指外兄弟之子，即“表姪”。《中國稱謂辭典》《親屬稱呼辭典》《漢語稱謂詞典》亦無“外男姪”，當補。

#### 21.外姪子、外姪子男

乘外姪子李堂年卅五。

(壹·5177)

汙妻弟仕伍民年五歲，汙外姪子仕伍庄年七歲。

(貳·2108)

疆外姪子男<sub>斗</sub>年八歲，腫兩足。

(壹·4979)

《大詞典·夕部》“外”下無“外姪子”“外姪子男”。“外姪子”“外姪子男”和“外男姪”意義相同，指外兄弟之子。《中國稱謂辭典》《親屬稱呼辭典》《漢語稱謂詞典》亦無“外姪子”“外姪子男”。當補。

#### 22.外姪孫

范外姪孫果年十。

(肆·396)

《大詞典·夕部》“外”下無“外姪孫”，當補。“外姪孫”指外姪之子。《中國稱謂辭典》《親屬稱呼辭典》《漢語稱謂詞典》亦無“外姪孫”，當補。

#### 23.妻外姪子男

妻<sub>外</sub>(?)姪子男狗年四歲，妻外姪子男仲年五歲。

(柒·3634)

妻(?)外(?)姪子男張碩年十二，腹心病。

(柒·3650)

《漢語大詞典·女部》“妻”下無“妻外姪子男”。“妻外姪子男”指妻外兄弟之子。《中國稱謂辭典》《親屬稱呼辭典》《漢語稱謂詞典》亦無“妻外姪子男”。當補。

#### 24.妻從男弟

□妻從男弟胡達年十五□

(壹·1329)

《大詞典·女部》“妻”下無“妻從男弟”，當補。“妻從男弟”指妻子的堂弟。《中國稱謂辭



典》《親屬稱呼辭典》《漢語稱謂詞典》亦無“妻從兄弟”。當補。

## 25. 妻從兄

妻從兄公乘

(壹·1256)

《大詞典·女部》“妻”下無“妻從兄”。“從兄”指堂兄，“妻從兄”指妻子的堂兄。“妻從兄”又見《資治通鑒》卷二五二：“殷裕妻父太府少卿崔元應、妻從兄中書舍人崔沆、季父君卿皆貶嶺南官。”<sup>①</sup>《中國稱謂辭典》《親屬稱呼辭典》《漢語稱謂詞典》亦無“妻從兄”。當補。

## 二 提前文獻用例

《大詞典》的文獻用例是以初始用例為標準，但由於《大詞典》的編纂工程浩大，出自衆手，其所列文獻用例却未必就是真正的初始用例。《漢語稱謂詞典》在《凡例》第六條中指出“詞目的注釋中之‘見於’表示：其書面語最早見於古代文獻作品。從這裏大體可以看到這個詞條的來源狀況”。今據吳簡親屬稱謂詞語發現《大詞典》《漢語稱謂詞典》等辭書的一些文獻用例還可以提前。

### 1. 姑父

都市掾潘玕叩頭死罪白：被曹敕，推求私學南陽張游發遣詣屯，言：案文書，輒推問游外王母大女戴，取辭。游昔少小隨姑父陳密在武昌，密以（於）黃龍元年被病物故。游轉隨姊郢州吏李恕，到今年六月三日，游來（？）取家。其月十三日，游隨故郭將子男欽，到始安縣讀書，未還。如取辭，曹列言，南部追發遣詣大屯。又游無有家屬應詔課者，謹列言。玕誠惶誠恐叩頭死罪死罪。

詣 戶 曹

十一月十五日辛丑白

(肆·4550(1))

《大詞典·女部》“姑父”，“姑母的丈夫”。所引書證為近人沙汀《獸道》：“我的姑父是一個廩生，在女學校教國文”。晚於吳簡 1700 餘年。《漢語稱謂詞典》所引書證為《白話聊齋》，書證亦晚。《親屬稱呼辭典》“姑父”條無書證。《中國稱謂辭典》收有“姑夫”而無“姑父”。

### 2. 舅嫂

盡舅嫂怨(?)年廿二。

(柒·1154)

<sup>①</sup> 《資治通鑒》卷二五二，北京：中華書局，1956，8163 頁。

《大詞典·白部》“舅嫂”，“妻之兄弟之妻”。所引書證為晚清吳趸人《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晚於吳簡 1600 餘年。《中國稱謂辭典》收有“舅嫂”，無書證。《親屬稱呼辭典》收有“大舅嫂”無“舅嫂”，“大舅嫂”無書證。《漢語稱謂詞典》失收“舅嫂”。

### 3. 姪子

轉妻烝年□□，轉姪子信年五歲。 (柒·163)

船(?)妻□年卅四，船(?)姪子急(?)年五歲。 (柒·327)

《大詞典·女部》“姪子”，“②稱弟兄或其他同輩男性親友的兒子”。所引書證為清吳敬梓《儒林外史》第二三回：“牛奶奶帶着姪子復身走出來。”“姪”在吳簡中意義已經泛化，既指姑姪，又指叔姪、伯姪。上揭簡柒·163“轉”、簡柒·327“船”為男性無疑，“姪子”指轉、船兄弟的兒子。《大詞典》書證晚於吳簡 1500 餘年。《漢語稱謂詞典》所引書證為《白話聊齋》，書證比《大詞典》更晚。《親屬稱呼辭典》“姪子”條無書證。《中國稱謂辭典》收有“侄兒”而無“姪子”。

### 4. 外孫女

□□大女仕年八十三，□外孫女□年四歲。 (肆·2020)

《大詞典·夕部》“外孫女”，“女兒的女兒”。所引書證為清曹雪芹《紅樓夢》第三回：“況且這通身的氣派竟不象老祖宗的外孫女兒，竟是嫡親的孫女兒似的，怨不得老祖宗天天嘴裏心裏放不下。”《漢語稱謂詞典》所引書證亦是《紅樓夢》，晚於吳簡 1500 餘年。《親屬稱呼辭典》“外孫女”條無書證。《中國稱謂辭典》失收“外孫女”。

### 5. 孫子

妻大女梨年八十四，平孫子仕伍軍年七歲，聾耳。 (貳·1640)

岑孫子仕伍奴年十，瘐死。 (貳·2104)

《大詞典·子部》“孫子”，“②兒子的兒子。”所引書證為宋王讜《唐語林》。晚於吳簡 800 餘年。《漢語稱謂詞典》所引書證為近人林漢達《前後漢故事新編》，書證更晚。《中國稱謂辭典》僅引《爾雅》。《親屬稱呼辭典》無書證。

### 6. 小父

妾小父鄧得年五十七，雀左足。 (壹·5170)

謬小父文年五十八，筭一。 (捌·1129)

《大詞典·小部》“小父”，“稱父之幼弟”。所引書證為宋王安石《寄吳氏女子》：“自吾捨汝東，中父繼在廷。小父數往來，吉音汝每聆。”晚於吳簡 800 餘年。《中國稱謂辭典》《親屬稱

呼辭典》《漢語稱謂詞典》失收“小父”。

### 7. 外父

種外父張建年八十六，盲左目，十二月三日被病物故。（捌·1705）

赤外父胡南年六十，苦風病。（捌·2040）

《大詞典·夕部》“外父”，“岳父”。所引書證為宋无名氏《潛居錄》。晚於吳簡許多年。《漢語稱謂詞典》所引書證亦為《潛居錄》。《中國稱謂辭典》《親屬稱呼辭典》“外父”條所引書證為清代梁章鉅《稱謂錄》。《大詞典》等辭書書證均晚於吳簡。

### 8. 族孫

專族孫仕伍佰(?)年五歲，專中妻大女純年五十，已死。（貳·1952）

《大詞典·方部》“族孫”，“同族兄弟的孫子”。所引書證為唐趙璘《因話錄》。《漢語稱謂詞典》《親屬稱呼辭典》“族孫”條所引書證亦為唐代趙璘《因話錄》。晚於吳簡 600 餘年。《中國稱謂辭典》失收“族孫”。

### 9. 寡姊

·衣(?)弟仕伍心年九歲，前寡姊大女□年七十□。（貳·2530）

《大詞典·宀部》“寡姊”，“守寡的姐姐”。所引書證為唐趙璘《因話錄》。晚於吳簡 600 餘年。《中國稱謂辭典》《漢語稱謂詞典》《親屬稱呼辭典》失收“寡姊”。

### 10. 姪男

□姪男□年□十。（肆·4475）

算(?)男弟碓年四歲，算(?)姪男沐年六歲。（柒·3039）

《大詞典·女部》“姪男”，“猶侄兒”。所引書證為唐顏真卿《祭伯父豪州刺史文》。晚於吳簡 500 年左右。《親屬稱呼辭典》“侄男”條所引書證為清代翟灝《通俗編·倫常·侄男》，書證更晚。《中國稱謂辭典》《漢語稱謂詞典》失收“姪男”。

### 11. 從姪

鳴從姪魯年十一。（肆·777）

□從姪范(?)敬年十三。（柒·5099）

□從姪助年十三。（柒·5794）

《大詞典·彳部》“從姪”，“堂房侄子”。所引書證為唐杜甫《醉歌行》。晚於吳簡 500 年左右。《中國稱謂辭典》《親屬稱呼辭典》《漢語稱謂詞典》失收“從姪”。

## 12. 女姪

丹女姪婢年廿六,筭一。

( 柒 · 5538 )

志女姪思年八歲。

( 柒 · 5902 )

《大詞典·女部》“女姪”,“侄女”。所引書證爲唐李朝威《柳毅傳》。《漢語稱謂詞典》《親屬稱呼辭典》“女姪”條所引書證亦是唐代李朝威《柳毅傳》。晚於吳簡 500 餘年。

## 13. 從姊

取郡吏費暉從姊思

( 叁 · 2048 )

了從姊年六十二。

( 柒 · 5431 )

“姊”,吳簡多寫作“姊”,爲“姊”的俗體。《大詞典·彳部》“從姊”,“堂姊”。所引書證爲《北史·司馬膺之傳》。晚於吳簡。《中國稱謂辭典》《親屬稱呼辭典》收有“從兄”“從弟”,而無“從姊”。《漢語稱謂詞典》亦失收“從姊”。

## 14. 姪女

一,桐(?)姪女橋年六歲。

( 貳 · 2508 )

黃姪女逆年七歲。

( 肆 · 475 )

《大詞典·女部》“姪女”,“弟兄的女兒”。所引書證爲《魏書》。晚於吳簡。《漢語稱謂詞典》所引書證爲清代李汝珍《鏡花緣》,書證更晚。《親屬稱呼辭典》“姪女”條無書證。《中國稱謂辭典》失收“姪女”。

## 15. 子女<sup>①</sup>

其師佐十八人母妻子女五人,見今送。

( 壹 · 6671 )

《大詞典·子部》“子女”,“③兒女”。所引書證爲北齊顏之推《顏氏家訓》。晚於吳簡。《中國稱謂辭典》《漢語稱謂詞典》《親屬稱呼辭典》所引書證爲《穀梁傳》。

# 三 補充文獻用例

辭書中有些詞條僅有釋義而無書證。王力先生在《理想的字典》中曾說:“這樣沒有例證,就不知道它們始見於何書(字典舉例,向來以始見之書爲限……),也就不知道它們是什麼時代的產品。這是極艱難的工作,但是,字典如果做不到這一點,決不能達到最高的理

① “子女”在吳簡中有兩個意思,一是指兒和女,二是指女兒。這裏所討論的是第一個意思。

想。”<sup>①</sup>吳簡親屬稱謂詞語可補充辭書文獻用例之缺。

#### 1. 外王母

都市掾潘玕叩頭死罪白：被曹敕，推求私學南陽張游發遣詣屯，言：案文書，輒推問游外王母大女戴，取辭。（肆·4550(1)）<sup>②</sup>

《大詞典·夕部》“外王母”，“外祖母”。僅引《爾雅》，而無文獻用例。《親屬稱呼辭典》亦僅引《爾雅》。吳簡“外王母”可補充文獻用例。《漢語稱謂詞典》失收“外王母”。

### 四 訂補辭書義項

吳簡親屬稱謂詞語可訂正補遺辭書中相關詞條的義項。這裏先討論修訂辭書釋義的親屬稱謂語，再探討補充辭書義項的親屬稱謂語。

#### 1. 姪

汙妻弟仕伍民年五歲，汙外姪子仕伍庄年七歲。（貳·2108）

·客妻母大女妾年六十二，腫兩足；客姪子男謀(?)年七歲。（貳·4667）

轉妻烝年□□，轉姪子信年五歲。（柒·163）

鍾妻惕年卅二，筭一；鍾男姪□年□歲，盲左目。（柒·5906）

□□里戶人公乘區步年五十四，步男姪別年十五，筭一。（捌·2534）

萬歲里戶人終妾年六十二，子男確年十九，妾姪子男誌年九歲。（捌·5512）

《大詞典·女部》“姪”，“②晉以後男子始稱兄弟之子為姪”。據吳簡，三國孫吳時期“姪”已經開始指稱男子之兄弟之子。<sup>③</sup>如上揭簡貳·2108 汙妻弟名民，汙外姪子名庄，則汙為男性無疑。簡貳·4667 客妻子的母親名妾，客姪子男名謀，則客也為男性無疑。簡捌·2534 和捌·5512 之“戶人”即戶主，也應是男性。因為吳簡戶主為女性者必標以“戶人大女”。如：

萬歲里戶人大女管妾年卅八，子男難年十一，難男弟符年九歲。（柒·202）

萬歲里戶人大女買年七十七，子男高年卅六，踵足。（柒·310）

富貴里戶人大女□□年□九，子男黨年十三，風病；子女姑年七歲。（柒·510）

① 王力：《王力文集》第19卷《理想的字典》，濟南：山東教育出版社，1990，69頁。

② 簡肆·4550(1)完整的簡文詳參“姑父”條，此處僅摘引相關語句。

③ 關於吳簡“姪”的具體研究詳參韓樹峰《中古時期的“姪”與“兄子”、“弟子”》，《歷史研究》2010年第1期；陳榮傑《試論走馬樓吳簡中的親屬稱謂“姪”》（未刊稿）。

高遷里户人大女烝肥年卅□,筭一訾五十

(柒·2661)

吳簡中“姪”稱謂非常發達,有姪子男、姪子女、男姪、女姪、從男姪、從姪、外姪子男、外男姪、孫姪、寡姪等。這些“姪”稱謂既可以指稱男子之兄弟之子,也可以指稱男子之從兄弟之子,還可以指稱男子之妻兄弟之子。故《大詞典》“姪”的第二個義項可修訂為“三國孫吳時期男子始稱兄弟之子為姪”。

## 2. 從父

平從父蓋年六十五,苦風病。□

(壹·9778)

高從父石明年五十六,筭一。

(柒·1829)

□女弟□年十二,從父公乘待七十一,腫足。

(柒·2423)

暘男弟岑年九歲,暘從父□年卅一,腫足。

(柒·2425)

□客從父回年六十二,回妻大女萬年六十一□

(捌·5338)

□從父區道年五十二。

(捌·2696)

《大詞典·彳部》“從父”,“父親的兄弟。即伯父或叔父。《三國志·蜀書·諸葛亮傳》:“亮早孤,從父玄為袁術所署豫章太守,玄將亮及亮弟均之官。”<sup>①</sup>“從”是旁系親屬的標識,如“從兄”指“同祖伯叔之子年長於己者。即堂兄”;“從伯”指“父親的堂兄”;“從弟”指“堂弟”;“從姊”指“堂姊”;等等。吳簡父親的兄弟稱為“世父”“伯父”“叔父”“季父”“小父”。戶籍要求標明本人和戶主(吳簡稱“戶人”)的關係,吳簡“從父”出現在戶籍簡中,此“從父”當不應指父親的兄弟,而是指父親的堂兄弟。《大詞典》“從父”的釋義可訂正為“父親的堂兄弟”。

## 3. 子女<sup>②</sup>

半子女麦年四歲。

(壹·4910)

待子女汝年十七。

(壹·5194)

客子女張年二歲。

見

(壹·5818)

新子女鼠年二歲,在本縣。

留

(壹·5888)

新子女姑年六歲,在本縣。

留

(壹·5890)

□社子女思年十歲,見 社子男聿年一歲。

見

(壹·6010)

阿母汝年卅,見阿子女婢年四歲。

見

(壹·6606)

① 《三國志》卷三五《蜀書·諸葛亮傳》,911頁。

② “子女”在吳簡中有兩個意思,這裏討論的是“女兒”義。



龍妻能年廿六，龍子女婢年三歲。

(壹·6741)

堅妻兼年五十三，堅子女姑年十五。

(壹·8951)

《大詞典·子部》“子女”有3個義項：“①男和女。②美女；年青女子。③兒女。”由上揭諸例知，《大詞典》關於“子女”的三個義項均與所舉“子女”意義不符。這裏的“子女”應是指“女兒”。簡壹·6010記載了“社”子女、子男的姓名及年齡信息，子女和子男在同一枚簡上對舉出現，子男指兒子，子女則指女兒。吳簡“子女”表“女兒”義達600多例。據吳簡，《大詞典》“子女”應增加“女兒”這一義項。

此外，《大詞典·子部》“子男”收有“②兒子”義。根據親屬稱謂詞語對稱分布的原則，“子男”和“子女”在表“兒子”和“女兒”義上是相對稱的。吳簡“子男”指稱“兒子”義達1000多例。

《中國稱謂辭典》“子女”有2個義項：①兒子和女兒的統稱；②專指女子。據吳簡，《中國稱謂辭典》“子女”亦應增加新義項“女兒”。

《漢語稱謂詞典》“子女”亦有3個義項：兒子與女兒；指女子；封建統治者稱人民大眾。據吳簡，《漢語稱謂詞典》“子女”亦應增加新義項“女兒”。

《親屬稱呼辭典》失收“子女”。

#### 4. 兄嫂

惕兄嫂大女□□

(叁·6846)

從兄嫂(?)萇年六十二，苦填(?)宮病。

(肆·1869)

《大詞典·儿部》“兄嫂”，“哥哥和嫂子”。無文獻用例。上揭兩例“兄嫂”簡是戶籍，據其文意，顯然“兄嫂”不是指哥哥和嫂子兩個人，而應是指一個人，據簡叁·6846“兄嫂大女”，則“兄嫂”當指“兄之妻”，即嫂嫂。據吳簡，《大詞典》“兄嫂”應增加“兄之妻”這一義項。《中國稱謂辭典》《親屬稱呼辭典》《漢語稱謂詞典》失收“兄嫂”。

## 五 小結

《大詞典》作為目前國內最具權威的大型語文辭書，由於出自衆手，白玉難免無瑕，故自其出版以來，不斷有學者對其釋義、書證、收詞等各方面進行補正，以期其修訂時能夠更完善、更完備。應學界要求，2012年《大詞典》啟動了修訂工作。吳簡作為三國時期真實可靠、典型鮮活的“同時”語料，對於補充、豐富、修訂《大詞典》具有重要作用。本文僅討論了吳簡親屬稱謂詞語對《大詞典》詞條的訂補，已多達45條，若將吳簡全部詞語納入研究範圍，其訂補《大詞典》的條目無疑會更多。這也是我們下一步要展開的工作。

當前學界“稱謂詞語”的研究成果已經非常多,僅檢索中國知網 2000 年以來的碩博士論文,就搜索到 229 篇研究稱謂詞語的論文,其中以研究親屬稱謂詞語的居多。有關稱謂的專門辭書也非常多,有:王火、王學元《漢語稱謂詞典》(遼寧大學出版社,1988 年),鮑海濤、王安節《親屬稱呼辭典》(吉林教育出版社,1988 年),楊應芹、諸偉奇《古今稱謂詞典》(黃山書社,1989 年),陸瑛《簡明稱謂辭典》(廣西人民出版社,1989 年),蔡希芹《中國稱謂辭典》(北京語言學院出版社,1994 年),吳海林《中國古今稱謂全書》(黑龍江教育出版社,1991 年),吉常宏《漢語稱謂大詞典》(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 年),計 7 部。以上有關稱謂的專門辭書主要出版於上世紀末、本世紀初,所用語料主要是傳世文獻和方言資料,基本沒有涉及出土資料。出土簡帛資料中有大量的日常文書,這些文書中含有豐富的稱謂詞語,對於訂補有關稱謂的辭書具有重要價值。如傳世文獻“子男”有“兒子”義,根據親屬稱謂詞語對稱分布的原則,“子女”應有“女兒”義,但傳世文獻找不到“子女”用作“女兒”義的用例,吳簡却有大量“子女”用作“女兒”義的用例,可彌補傳世文獻之缺。又如“小父”,“稱父之幼弟”,既然“父之幼弟”稱為“小父”,則“小父”之配偶應有稱“小母”者,然傳世文獻却無用例,吳簡“小母”的簡例彌補了長期以來“小父”稱謂不對稱的缺憾。倘若有關稱謂的專門辭書開展修訂工作的話,應高度重視吸收出土簡帛語料,尤其是吳簡語料。

附記:匿名審稿專家提出了寶貴的修改意見,謹致謝忱。

## 走馬樓吳簡《竹簡[柒]》、 《竹簡[捌]》釋文、注釋補正

長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 黎石生

**內容提要** 將《長沙走馬樓三國吳簡·竹簡》系列之《竹簡[柒]》《竹簡[捌]》釋文與圖版對照,可知其中存在一些有疑問或疏漏的釋文和注釋,應予以補正。

**關鍵詞** 《竹簡[柒]》《竹簡[捌]》 釋文 注釋 補正

繼《竹簡[肆]》之後,文物出版社於2013、2015年先後出版了《長沙走馬樓三國吳簡·竹簡》系列之《竹簡[柒]》和《竹簡[捌]》。筆者在閱讀時,對照圖版,發現其中有些釋文和注釋存在疏忽或疑問,今將其簡號、相關簡文及注釋逐條列出,下加“按”語,以供讀者參考。文中凡引自該系列之簡,均在簡號前加標卷號,不標頁碼。“按”語所涉簡文和注釋,均錄在其後的“〈〉”符號中。為精減文字,與“按”語無涉者省略未錄。謬誤之處,敬請批評。

### 一 釋文補正

#### 1. 頭男弟 □年三歲(柒·976)

按:釋文“弟”“□”間留有空格。圖版清晰,“弟”“年”之間僅有一“困”字。故簡文當改

釋爲“頭男弟困年三歲”。空格和“口”或爲排印疏誤。

2.陽貴里户人公科雷<sub>奴</sub>(?)年卅四(柒·1693)

按:“公科”之“科”,圖版清晰,顯爲“乘”字,“科”字或爲排印疏誤。

3.陳蔣年六十五卅刑<sub>左</sub>足(柒·1807)

按:圖版清晰,“五”“刑”之間并無“卅”字,衍之或爲排印疏誤。

4.東溪丘男子莫<sub>得</sub>(?)關搏閣李嵩付倉吏黃諱史潘慮受(柒·2221)

按:圖版雖較模糊,仍可辨“關”“閣”之間爲簡中常見的“墜”字,“搏”字或爲排印疏誤。

5.新成丘大男張石關閣董基付倉吏鄭<sub>口</sub>(柒·2792)

按:圖版清晰,“關”“閣”之間有一“墜”字,漏之或爲排印疏誤。

6.右杲家口食六人 其<sub>二人男  
三人女</sub>(柒·3593)

按:圖版清晰,“二人男”之“二”,顯爲“三”字,釋文誤之。如釋文無誤,則男女人數相加與口食人數不符,需出注。

7.入三州倉運船帥張盖備建安廿六年折咸米(柒·4473)

按:“船帥”之“帥”,圖版爲“師”,釋文誤之。

8.<sub>口</sub>男姪舉年十六籌一(柒·4806)

按:“籌一”之“籌”,圖版爲“筭”,“籌”字或爲排印疏誤。

9.<sub>彙</sub>小妻營年廿(捌·2083)

按:“彙”字的“口”符號在本卷“凡例”中未見,此字圖版模糊,當加標補字符號“口”,“口”或爲排印疏誤。簡[捌]2084“彙女<sub>姪</sub>角年十五”、[捌]2086“彙男弟寐年卅六”、[捌]2127“變<sub>中</sub>里户人公乘張彙(?)年卅”亦屬此類。

10.宜陽里户人<sub>彊</sub>男弟户年十三臨病年六十<sub>口</sub>苦風病(捌·2328)

按:據圖版,此簡當釋爲“宜陽里户人公乘樊如年六十<sub>口</sub>苦風病”。參以相鄰的簡[捌]2325“<sub>彊</sub>男弟户年十三臨病”,此簡釋文或爲排印疏誤。

11.<sub>口</sub>户人大女<sub>區</sub>妾<sub>口</sub>妾年七十七(捌·2531)

按:圖版模糊,然可辨“大女”與“年”之間祇有二字,或可釋爲“<sub>口</sub>妾”。“<sub>區</sub>妾<sub>口</sub>妾”或爲排印疏誤。

12.<sub>口</sub><sub>口</sub><sub>四</sub><sub>百</sub>三人 其<sub>二百五十人男  
口百五十二人女</sub>(捌·2705)

按：據圖版，“五十”與“人男”之間有“一”字，釋文漏之。依簡文，“□百”當爲“一□百”。

13. 嘉禾元年賊帥限米七斛四斗東部丞口倉吏孫陵備黃龍元年耗咸稅(捌·3092)

按：“耗咸”之“耗”，圖版較清晰，左部從“禾”無疑，右部似“走”，或可改釋爲“𥝵(?)”。釋“耗”文意可通，但字形不符。釋“𥝵”字形雖符，然此字在簡中似爲首見，尚無可爲佐證的相關文例，《漢語大字典》(第二版，漢語大字典編輯委員會編纂，武漢：湖北長江出版集團·崇文書局、成都：四川出版集團·四川辭書出版社，2010)亦未收錄，其意不詳。參照簡[捌]3410“其七斛四斗東部丞口倉吏孫陵備黃龍元年稅咸稅米”之文例及“稅”字寫法，頗疑書簡者本欲作“稅”，筆誤而如此也。

14. 其卅五斛嘉禾元年賤帥限米(捌·3437)

按：“賤帥”之“賤”，圖版清晰，顯爲“賊”字。其書法與簡[捌]3092(見前文)中的“賊帥”之“賊”如出一轍。“賤”字或爲排印疏誤。

15. 右諸鄉起十二月七日訖月廿九日入五年銀賈錢(捌·3507)

按：據圖版，“訖”“月”之間尚有一字，字迹較模糊，似可釋爲“正”或“正(?)”，釋文漏之。

16. 其二戶子弟限米 其□戶下品 (捌·3636)  
其□戶下品之下

按：據圖版，“二戶”之“二”釋文無誤，故兩“□”補字均祇能是“一”。

17. 備入米一百一十二斛六斗 八 升 付閣堅郭嵩(捌·4041)

按：據圖版，“閣堅”當改釋爲“堅閣”，倒之或爲排印疏誤。

18. 百廿六錢悉已出付閣郭嵩倉吏謝靖張脩黃瑛鄧隆 穀營等(捌·4149)

按：據圖版，“付”“閣”之間有一“堅”字，漏之或爲排印疏誤。“穀營”之“穀”，圖版爲“谷”。據文意，此簡之“穀營”與簡[捌]4001“倉吏鄧隆谷榮等”、[捌]4065“鄧隆穀榮黃瑛等受餘米”、[捌]4129“倉吏鄧隆穀榮”、[捌]4152“穀榮等受餘米”、[捌]4162“倉吏鄧隆穀榮等受餘米”、[捌]4168“倉吏鄧隆谷榮張脩”、[捌]4332“張脩黃瑛鄧隆穀營”、[捌]4561“隆穀榮等受□□”中的“谷榮”“穀榮”“穀營”當爲同一人。筆者認爲，“谷”“穀”當據圖版直釋爲是。

19. 嘉禾五年六月廿二日中賊曹吏張惕白言(捌·4754)

按：“中賊曹吏”之“吏”，圖版爲“史”，釋文誤之。

20. 已入畢付郎中堅閣李嵩倉吏 厶(捌·5453)

按：“郎中”之“郎”，圖版較模糊，其書法筆意似“州”。如釋文無誤，則簡文“郎中堅閣”

似有語序顛倒之嫌。

21. 嘉禾二年稅吳平斛米廿二斛六斗四升爲廩斛米廿三斛(捌·5632)

按:“廩斛”之“廩”,圖版較模糊,但似無“广”部,或當改釋爲“稟”。

22. 入南陽杜鈞所買夷生口小男武賈錢六□□(捌·5682)

按:據文意,參以同類簡如簡[柒]1645“醴陵男子黃昭買生口大女□□直錢四萬”、[柒]1653“右□□所買生口四人合直錢十六萬”所記生口價錢,簡文“六”下當爲“萬”字。

## 二 注釋補正

1. 嘉禾元年子弟句守禾還米五斛(柒·122)

按:據圖版,釋文無誤。然目前簡中所見,凡涉及“子弟”“帥客”“私學”“吏客”等特殊身份者,“禾還米”前均有“限”字。如簡[肆]4306“入平鄉嘉禾三年還貸食嘉禾元年故帥張斤子弟限禾還米四斛”、[肆]5245“龍元年帥客限禾還米一斛四□”、[柒]84“入平鄉二年所貸食嘉禾元年私學限禾還米四斛”、[柒]2237“入中鄉二年所貸嘉禾元年吏客限禾還米七斛七斗”即屬此類。未提及身份者,則均作“稅禾還米”,如簡[柒]95“入都鄉二年所貸食嘉禾元年稅禾還米七斛”即是。參照簡[柒]2247“入都鄉嘉禾二年所貸元年禾還米二斛一斗”之注例“‘禾還米’上脫‘稅’字”,此簡亦應出注:“禾”前或脫“限”字。

2. 力孫子和年七歲(柒·180)

【注】“孫子”下疑脫“男”字。

按:注釋表述欠精准。簡[貳]1676“足孫子女取年五歲”可爲佐證。此注可改爲:“孫子”下疑脫“男”或“女”字。

3. 緝男弟開年七(柒·1092)

按:依簡[柒]815“□子男力年七”注例“‘七’下脫‘歲’”,應出注。

4. 入模鄉嘉禾二年私學限米三斛四斗畢(柒·1601)

【注】“畢”上應脫“胄”或“餽”字。

按:注釋表述欠精准。簡[壹]3234“入平鄉嘉禾二年吏客限米一斛胄米畢”、[叁]3751“入廣成鄉黃武七年郡卒限米廿斛就米畢”等可爲佐證。此注可改爲:“畢”上應有脫字,如“胄”“餽”“胄米”“就米”等。



## 5. 草吏趙□□小□十一頭事(柒·3049)

按:依簡[柒]4703“草部鄉吏謝韶殷連私學……”注例“‘草’下應脫‘言’或‘答’等字”,應出注。

## 6. 入模鄉嘉禾二年貸食元年禾還米三斛一斗(柒·3079)

按:依簡[柒]2247注例(見前文),應出注。

## 7. 崗(?)妻大女汝年卅 崗(?)男山年七歲(柒·3577)

【注】“男”上脫“子”字。

按:注釋表述欠精准。簡[貳]4667“客妻母大女妾年六十二腫兩足 客姪子男謀(?)年七歲”、[柒]2346“宜陽里戶人區平年……妻汝年卅九 平男姪顏年七歲”等可為佐證。此注可改為:“男”上或下應有脫字,如上脫“子”或“姪子”,下脫“姪”字等。

## 8. 入平鄉嘉禾二年縣吏吳凶子弟限米七斛胄(柒·4281)

【注】“胄”下應脫“畢”字。

按:注釋表述欠精准。簡[柒]1579“入桑鄉嘉禾二年私學限米十七斛胄米畢”及簡[壹]3234(見前文)等可為佐證。此注可改為:“胄”下應脫“米畢”或“畢”字。

## 9. 錢(?)女青年五歲(捌·48)

【注】“女”上應有脫字。

按:注釋表述欠精准。簡[捌]2“楊女弟東年三歲”、[捌]713“蔣女姪唐年六歲”等可為佐證。此注可改為:“女”上或下應有脫字。

## 10. 道女細年三歲(捌·101)

按:依簡[捌]48(見前文)注例,應出注。

## 11. 猗男弟騎年三歲(捌·1540)

【注】“男弟”下□右半殘缺,左半從“馬”。

按:據圖版,“弟”下之字釋為“騎”,筆者認為可從。但注釋與釋文不符,應予刪去。

## 12. 從男夏鼠年廿三(捌·1858)

【注】“男”下應脫“姪”字。

按:注釋表述欠精准。簡中亦常見“從男弟”。如簡[捌]373“典從男弟頭年十歲”、[捌]799“從男弟文年十八”即是。此注可改為:“男”下應有脫字,如“弟”或“姪”字。

13. [富]貴里户人公乘周[厚]年六十一 龔苔(捌·2005)

按:依簡[捌]1307“□從兄大年八十三 龔苔”注例“按吳簡格式,‘龔苔’下應脫‘病’字”,應出注。

- 14.從[姪]恙年廿一男(捌·2320)

按:依簡[柒]5155“[棠][孫][姪][常](?) [監]年卅六男”注例“[男]爲補字,應補在[姪]上”,應出注。

- 15.其二户佃帥私學限[米](捌·2610)

按:依簡[捌]718“其一户佃帥出限米”、[捌]229“其五户私學出限米”等文例,“限”前或脫“出”字,應出注。

- 16.其五斛三斗賊黃勳黃龍三年早賈米(捌·2953)

按:依簡[捌]3763“入郡掾張祇所買賊黃勳黃龍三年早賈米四斛一斗五升”注例“‘早’應爲‘旱’之誤”,應出注。

17. [樂]從男弟□年廿一(捌·3577)

【注】“廿一”上應脫“年”字。

按:據圖版,“廿一”上有“年”字,故注釋當刪。“□”處之字,左部從“金”,右部似“居”,當可改釋爲“鋸”或“鋸(?)”。

- 18.郡吏黃蔣年廿九妻葛卅六(捌·3646)

【注】按吳簡格式,“卅六”上應脫“歲”字。

按:依吳簡格式,“卅六”上應脫“年”字,而非“歲”字,故注釋當改。

19. □□年八月十[九]日[緒][中]丘男區蔣關壘□(捌·4696)

【注】按吳簡格式,“男”上應脫“大”字。

按:注釋表述欠精准。簡中亦常見“××丘男子”。如簡[捌]3810“□年十月廿一日唐中丘男子常南關壘閣李嵩付倉吏黃諱史潘慮[受]”、[捌]3824“□廿二日平支丘男子朱掙關壘閣李嵩付倉吏黃諱潘慮[受]”即是。鑒於簡中此類文例尚未見“老男”和“小男”,此注可改爲:按吳簡格式,或“男”上脫“大”,或“男”下脫“子”字。

20. □□丘[鄧]□各□(捌·5052)

【注】按吳簡格式,“各”應爲“關”之誤。

按：簡文僅殘留數字，難以推定文意。佐以簡[肆]1763(1)“男子唐調雷送(逆)郡吏張橋各私買生口合三人直錢十九萬”，若“□丘”“鄧□”爲人名，則“各”字文意可通，並無訛誤，故注釋當刪。

21. 月廿九日廉丘大殷陽關壁閣(捌·5117)

【注】“大”下應脫“男”字。

按：注釋表述欠精准。簡中亦常見“××丘大女”。如簡[壹]87“□□八月九日厭梁丘大女區廉關□”、[叁]3616〈嘉禾元年十月十九日空洩丘大女謝埂付三州倉吏谷漢受〉即是。此外，簡中女性取名亦常見男性化趣向，如簡[柒]996“耀妻大女捕年卅五筭一”、[捌]202“年軍糧所賣生口大女李志等”即是。此注可改爲：“大”下應脫“男”或“女”字。

22. 其□斛九斗五升三州米(捌·5426)

按：依簡[捌]3331“其一千六十斛九斗七升三州倉米”、[捌]3358“其一千九百卅二斛六斗三州倉米”等文例，簡文“州”下或脫“倉”字。簡[捌]5435“其十二斛六斗三州米”同此。

23. 其四斛九斗州吏高覓黃龍二年租米(捌·5648)

【注】“租”應爲“限”之誤。

按：據簡[貳]204“入中鄉州吏黃□嘉禾元年租米四斛□□”、[捌]3733“其四斛九斗州吏高賓黃龍元年租米”等文例，此注當刪。

附記：感謝匿名審稿專家對小文提出的修改建議！

## 走馬樓吳簡研究方法述評\*

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 蘇俊林

**內容提要** 20 年的吳簡研究成果頗豐,研究方法不盡相同。學者使用的研究方法主要有二重證據法、古文書學方法、統計學方法和結構分析法等。古文書學方法具體有文書集成研究和冊書復原研究兩種模式。這些研究方法各有優長與局限。吳簡研究方法的發展和創新,既需要對現有研究方法的總結、反思和細化,也有待於現代技術在吳簡研究上的運用,更需要學界的共同努力。

**關鍵詞** 吳簡 二重證據法 古文書學方法 統計學方法 結構分析法

1996 年 10 月,長沙市文物工作者對長沙五一廣場走馬樓街平和堂商貿大廈的建築工地進行搶救性發掘時,在編號為 J22 的井窖中發現了一批紀年主要為三國孫吳的簡牘,總數約 10 萬枚(其中有字簡 76438 枚),總字數約達 150 萬。<sup>②</sup> 走馬樓吳簡不僅數量眾多,而且內容豐富,包括賦稅、戶籍、倉庫管理、錢糧出入、司法文書、屯田、往來書信及公文等,涉及孫吳政治、經濟、軍事、社會、法律等諸多方面,具有重大的史料價值。

經過整理者的不懈努力,走馬樓吳簡得以及時公布。截止 2016 年 12 月,已公布資料 7 卷,分別為《長沙走馬樓三國吳簡·嘉禾吏民田家荊》和《長沙走馬樓三國吳簡·竹簡》(以

\* 基金項目:國家社科基金重點項目“走馬樓吳簡與孫吳縣政研究”(13AZS009)。

② 胡平生、宋少華:《長沙走馬樓簡牘概述》,《傳統文化與現代化》1997 年第 3 期。

下簡稱《竹簡》)[壹]、[貳]、[叁]、[肆]、[柒]、[捌]。<sup>①</sup>《長沙走馬樓三國吳簡》和《湖南出土簡牘選編》等也刊載了部分簡牘圖片和釋文。<sup>②</sup>

資料的及時公布為吳簡及孫吳歷史的研究提供了契機。吳簡出土 20 年來，中外學者對其進行了深入的、多視角的研究，涉及到孫吳政治、經濟、軍事、社會、文化等諸多領域，取得了許多令人稱道的研究成果。截止 2015 年 12 月，已出版學術專著、論文集 23 部，發表相關論文 600 餘篇。<sup>③</sup> 2016 年 8 月，嶽麓書社出版了長沙簡牘博物館編寫的《走馬樓吳簡研究論文精選》一書。該書是走馬樓吳簡研究成果的彙編，較為全面地展現了 20 年間吳簡研究的狀況。另外，長沙簡牘博物館編寫的《嘉禾一井傳天下：走馬樓吳簡的發現保護整理研究與利用》一書也於同月由嶽麓書社出版。該書對吳簡的發現、保護、整理和利用有詳細介紹，其中第五章“研究綜述篇”對吳簡 20 年的研究情況進行了概述。此文是最新、最為全面的吳簡綜述性文章。<sup>④</sup>

20 年來，吳簡的研究成果頗豐，研究方法不盡相同。于振波、凌文超等先生曾撰文討論吳簡的研究方法問題，<sup>⑤</sup>鄧瑋光先生也曾提出“橫向比較復原法”和“縱向比較復原法”等研究方法。<sup>⑥</sup> 不過，專門討論走馬樓吳簡研究方法的文章并不多見。本文旨在對過去 20 年的吳簡研究方法進行回顧，對吳簡研究方法進行反思和展望。

① 長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中國文物研究所、北京大學歷史學系走馬樓簡牘整理組編：《長沙走馬樓三國吳簡·嘉禾吏民田家莧》，北京：文物出版社，1999；長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中國文物研究所、北京大學歷史學系走馬樓簡牘整理組編：《長沙走馬樓三國吳簡·竹簡》[壹]，北京：文物出版社，2003；長沙簡牘博物館、中國文物研究所、北京大學歷史學系走馬樓簡牘整理組編：《長沙走馬樓三國吳簡·竹簡》[貳]、[叁]，北京：文物出版社，2007、2008；長沙簡牘博物館、中國文化遺產研究院、北京大學歷史學系走馬樓簡牘整理組編：《長沙走馬樓三國吳簡·竹簡》[肆]，北京：文物出版社，2011 年；長沙簡牘博物館、中國文物遺產研究院、北京大學歷史學系、故宮研究院古文獻研究所走馬樓簡牘整理組編：《長沙走馬樓三國吳簡·竹簡》[柒]、[捌]，北京：文物出版社，2013、2015。

② 楊友吉、宋少華：《長沙走馬樓三國吳簡》（1—5），長沙：湖南美術出版社，2001；宋少華、張春龍、鄭曙斌、黃樸華：《湖南出土簡牘選編》，長沙：嶽麓書社，2013。

③ 李國斌、管震：《10 萬餘枚走馬樓吳簡完成保護整理》，《湖南日報》2015 年 11 月 28 日第 1 版。

④ 此前已有不少學者寫過關於走馬樓吳簡的綜述文章，詳見長沙簡牘博物館編《嘉禾一井傳天下：走馬樓吳簡的發現保護整理研究與利用》，長沙：嶽麓書社，2016，225 頁注釋 1。此處不再贅述。

⑤ 于振波：《統計學方法與走馬樓吳簡研究》，西北師範大學歷史文化學院、甘肅簡牘博物館編《簡牘學研究》第 5 輯，蘭州：甘肅人民出版社，2014，263—272 頁；凌文超：《走馬樓吳簡簿書復原整理芻議》，彭衛主編《歷史學評論》第 1 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3，250—262 頁，後修訂為《吳簡文書學研究芻議》，收入其著《走馬樓吳簡采集簿書整理與研究》，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5，455—472 頁。

⑥ 鄧瑋光：《走馬樓吳簡三州倉出米簡的復原與研究——兼論“橫向比較復原法”的可行性》，《文史》2013 年第 1 輯；《對三州倉“月旦簿”的復原嘗試——兼論“縱向比較復原法”的可行性》，《文史》2014 年第 2 輯。

## 一 吳簡研究方法的回顧

大致而言,現有吳簡研究主要運用了以下幾種方法:

### 1. 二重證據法

吳簡中常用的研究方法是二重證據法,即將出土簡牘與傳世文獻相互印證以研究歷史的方法。一般認為,二重證據法的首倡者為王國維先生。1925年,王國維先生在《古史新證》講稿中說到:

吾輩生於今日,幸於紙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種材料,我輩固得據以補正紙上之材料,亦得證明古書之某部分全為實錄,即百家不雅馴之言亦不無表示一面之事實。此二重證據法,惟在今日始得為之。<sup>①</sup>

不過,也有學者認為比王國維先生更早運用二重證據法的是王鳴盛。<sup>②</sup>王鳴盛曾在《十七史商榷·序》中說到:

二紀以來,恒獨處一室,覃思史事,既校始讀,亦隨讀隨校,購借善本,再三讎勘,又搜羅偏霸雜史、稗官野乘、山經地志、譜牒簿錄,以暨諸子百家、小說筆記、詩文別集、釋老異教,旁及於鐘鼎尊彝之款識,山林塚墓、祠廟伽藍、碑碣斷闕之文,盡取以供佐證,參伍錯綜,比物連類,以相互檢照,所謂考其典制事迹之實也。<sup>③</sup>

王鳴盛用“旁及於”三字將傳世的紙質文獻與金石資料兩分,某種意義上已經構成了事實上的“二重證據”。不過,王鳴盛沒有明確提出“二重證據”的概念。隨着學術的傳承和發展,直到王國維先生時才明確提出“二重證據法”。

二重證據法已為歷史學界特別是簡牘學界廣泛運用,走馬樓吳簡研究也不例外。總體而言,對走馬樓吳簡進行內容研究的文章——新聞報導類、綜述類和方法論文章之外的文章,幾乎都用到二重證據法。二重證據法在吳簡研究中的運用,大致有以下兩種模式:(1)是將吳簡資料與傳世文獻相結合的互證研究,即以吳簡檢驗傳世文獻的記載,或以傳世文獻來解讀吳簡的內容。(2)是將吳簡的記錄納入到孫吳三國乃至秦漢魏晉南北朝的歷史背景之中,對當時的制度、社會及其變化等進行研究。

① 王國維:《古史新證》,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10,2頁。

② 巩富文:《二重證據法溯源》,《西北大學學報(哲社版)》1993年第4期。

③ [清]王鳴盛撰,陳文和、王永平、張連生、孫顯軍校點:《十七史商榷·序》,南京:鳳凰出版社,2008,2頁。



前一種研究模式在吳簡研究中十分常見。大體言之，對吳簡中的“二年常限”田、餘力田、火種田、熟田、旱田、限米、折咸米、加減米、賈米、行錢、具錢、何黑錢、僦錢（或“地僦錢”）、財用錢、芻錢、八億錢、酒租錢、口錢、邸閣、士、郵卒、復民、還民、夷民、諸吏、私學、中妻、小妻、弟子、腫足、刑手、刑足等與田地、錢米、身份、疾病等相關詞彙進行考證的文章，都試圖在傳世文獻中尋找證據。不過，與孫吳相關的傳世文獻較少，祇有《三國志·吳書》20卷和《建康實錄·吳》4卷，以及一些史家注疏，且多為郡縣以上重大事件的記錄。正因如此，學者利用二重證據法進行互證研究時，因為資料匱乏，推測的成分很重，某些觀點也有不小的分歧。比如“還民”。有學者將“還”理解為“返還”，認為“還民”是“返還（鄉里）之民”；也有學者曾認為“還”是“歸還”，“還民（限米）”是“歸還的民（限米）”。此種爭論直到《竹簡》[柒]、[捌]公布之後才算“塵埃落定”，將其確定為身份名詞。<sup>①</sup>雖然“還民”的身份已經確定，但另一種民——“復民”的身份，因為傳世文獻中缺乏直接證據，雖然學者利用二重證據法試圖從多方面進行“互證”，但目前還祇是推測。<sup>②</sup>

後一種模式的研究多是在前一種模式研究成果的基礎上，對傳世文獻所載制度、事件等進行研究。關於吳簡中的“調”，學者都將其與賦稅制度聯繫起來進行分析，但在其是“戶調”還是“雜調”之間產生了不小的分歧。<sup>③</sup>吳簡中有“上品”“中品”“下品”“下品之下”等與戶品相關的記錄，學者都認為其與戶等制度相關，但也存在“戶為三品”“戶為九品”以及三

① 關於“還民”的研究成果及後續討論，可參看拙文《走馬樓吳簡所見“還民”及相關問題》，“出土文獻與中國古代文明再認識青年學術論壇”會議論文，河南大學，2016年10月28-30日。“還民”是身份名詞，是曾經脫離戶籍而返還鄉里、且登錄在戶籍的民衆。

② 關於復民的研究情況，可參看拙文《吳簡所見復民身份考辨》，楊振紅、鄔文玲主編《簡帛研究二〇一六（春夏卷）》，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6，281-293頁。

③ 王素先生持“戶調”說，高敏、于振波、楊際平等先生持“雜調”說。分別參見王素《吳簡所見“調”是“戶調”》，《漢唐歷史與出土文獻》，北京：故宮出版社，2011，186-188頁；高敏《走馬樓吳簡所見“調”的含義》，《長沙走馬樓簡牘研究》，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8，131-142頁；于振波《漢調與吳調》，《走馬樓吳簡初探》，臺北：文津出版社，2004，77-104頁；楊際平《析長沙走馬樓三國吳簡中的“調”——兼談戶調制的起源》，《歷史研究》（北京）2006年第3期。另，阿部幸信、凌文超等先生認為吳簡中所見的“調”有定制化傾向。請參見[日]阿部幸信：《長沙走馬樓吳簡所見調納入簡初探》，《立正史學》103，2008，該文後依據新出資料修改成《長沙走馬樓吳簡所見的“調”——以出納記錄的檢討為中心》（付晨晨譯），長沙簡牘博物館等編《吳簡研究》第3輯，北京：中華書局，2011，226-251頁；凌文超：《走馬樓吳簡采集庫布帳簿體系整理與研究——兼論孫吳的戶調》，《文史》2012年第1輯，後收入其著《走馬樓吳簡采集簿書整理與研究》為第6章《庫布帳簿體系與孫吳戶調》。

品向九品演變等認識差異。<sup>①</sup>王素、汪力工先生認為吳簡中的“中書典校事呂壹”與孫權時期的“校事”制度和呂壹事件有關，<sup>②</sup>邱東聯先生則將吳簡的埋藏與呂壹事件聯繫起來。<sup>③</sup>

需要說明的是，兩種模式的研究雖然可以在某些論文中明顯區分，但也並不完全對立，常見的研究是二者的結合使用。

此外，凌文超先生提出的“二重證據分合法”也值得關注。所謂“二重證據分合法”，就是“先從新、舊材料中產生相對獨立的認識，暫且擱置并積累差異，是為‘分’”，“當條件成熟時，再在眾多新、舊材料認知差異中推演出新的更有說服力的結論，是為‘合’”。<sup>④</sup>

## 2. 古文書學方法

中國學者所熟知的古文書學方法，緣起於日本學者對居延漢簡的研究。此研究方法發端於日本學者森鹿三先生的《關於令史弘的文書》一文，<sup>⑤</sup>後經英國學者邁克爾·魯惟一先生、日本學者永田英正先生的實踐和修正，<sup>⑥</sup>古文書學作為一種比較成熟的研究方法，已為中國學者所接受并被廣泛使用。

古文書學方法大致可以分為兩種研究模式：<sup>⑦</sup>(1)是文書集成研究，主要以出土地點、年代、記載格式、筆迹、人名、內容等為依據，將零散簡牘集成起來，“讓一枚一枚單獨的簡牘變成一組一組的某種格式的簡牘”，<sup>⑧</sup>然後再對其進行研究。此方面以森鹿三、魯惟一、永田英正等先生為代表。(2)是冊書復原研究，以出土地點、原簡編號順序、筆迹、簡的材料、內容等

① 王素、宋少華、羅新等先生認為這反映了當時戶分三品和九品兩種形式，戶稅按舊標準三品收錢，戶調按新標準九品收物；高敏先生認為這是孫吳時期戶分三等九級的制度；張旭華先生贊同戶調按九品徵收的觀點，並將其與“九品中正制”相聯繫；李均明、于振波、張榮強等先生則認為祇有上、中、下三等，“下品之下”並非下品之中又分三等，而是指財產較少的貧窮民戶；凌文超先生認為孫吳雖然名義上遵循戶為三品的舊制，但在實際執行中不斷增加戶品，“下品之下”逐漸成為實際的戶品并制度化，從而逐漸形成了戶九品制度。分別參見王素、宋少華、羅新《長沙走馬樓簡牘整理的新收穫》，《文物》1999年第5期；高敏《吳簡中所見孫吳時期戶等制度的探討》，《長沙走馬樓簡牘研究》，92-102頁；張旭華《吳簡“戶調分九等收物”的借鑒與創新》，《許昌師專學報》2002年第4期；于振波《略論走馬樓吳簡中的戶品》，《走馬樓吳簡續探》，臺北：文津出版社，2007，59-72頁；李均明《長沙走馬樓吳簡所反映的戶類和戶等》，饒宗頤主編《華學》第9、10輯，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265-278頁；張榮強《吳簡中的“戶品”問題》，《漢唐籍帳制度研究》，北京：商務印書館，2010，163-176頁；凌文超《走馬樓吳簡上中下品戶數簿整理與研究——兼論孫吳的戶等制》，《中國經濟史研究》2016年第3期。

② 王素、汪力工：《略談走馬樓孫吳“中書典校事呂壹”簡的意義》，《文物》2002年第10期。

③ 邱東聯：《長沙吳簡與呂壹事件——試析長沙吳簡的埋藏原因》，《中國文物報》1999年12月8日第3版。

④ 凌文超：《吳簡文書學研究芻議》，《走馬樓吳簡采集簿書整理與研究》，470-471頁。

⑤ [日]森鹿三：《令史弘に關する文書》，《東洋史研究》第14卷第1、2號，1955，137-150頁；中譯稿《關於令史弘的文書》（姜鎮慶譯），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戰國秦漢史研究室編《簡牘研究譯叢》第1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3，21-38頁。

⑥ [英]邁克爾·魯惟一著，于振波、車金花譯：《漢代行政記錄》，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5；[日]永田英正著，張學鋒譯：《居延漢簡研究》，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7。

⑦ 此分類為凌文超先生的研究成果，本文借用之。詳見氏著《走馬樓吳簡采集簿書整理與研究》第一章《緒論》，7頁。

⑧ [日]永田英正：《居延漢簡研究》，323頁。

為原則進行冊書復原。<sup>①</sup> 此以大庭脩先生為代表。

關於古文書學方法，永田英正先生曾這樣描述：

依據簡牘的樣式對斷簡零墨進行集成，將之復原到原來冊書的樣子，或盡可能使之接近於原來冊書的樣子，從樣式這個角度來使簡牘組化、體系化，在把握了簡牘固有性格的基礎上再對其內容進行研究。這可以說是簡牘的古文書學研究。

作為方法，應該是多種多樣的。以出土地點為依據、以年代為依據、以記載樣式為依據、以人名為依據、以內容為依據，等等，甚至還可以集以上數種方法為一體。但是，簡牘的研究，說到底應該是古文書學的研究。<sup>②</sup>

古文書學方法大致如此。古文書學方法雖可細分為“文書集成研究”和“冊書復原研究”兩類，但在具體操作時却有共通之處。大庭脩先生就曾指出魯惟一基於同一筆迹和同一出土地集成的同類簡牘，“實際就是在復原冊書”。<sup>③</sup> 永田英正先生也認為森鹿三先生復原的對象主要是簿籍，大庭脩先生復原的主要是文書。<sup>④</sup> 雖然某些時候表現出共通之處，二者也都重視書寫格式和內容，有時也可能集成或復原出一份簿籍或文書，但作為古文書學方法的兩種模式，文書集成研究和冊書復原研究依然存在明顯區別。其主要區別在於是否要求使零散的簡牘形成為一份冊書。冊書復原要求在復原出一份文書的前提下進行研究；文書集成則不一定要復原出一份簿籍，其主要強調內容和性質相同，集成結果可能來自同一性質的多份簿籍。

文書集成研究在吳簡研究中運用普遍，大多是以記載樣式、內容、名詞等為依據進行集成研究。名物考證文章多是先集成相關名詞的簡文，再結合傳世文獻進行考證。文書集成研究運用最廣的是在簿籍研究領域。簿籍方面的集成研究主要是以書寫格式和內容為依據。汪小烜先生《走馬樓吳簡戶籍初論》一文，<sup>⑤</sup>是研究戶籍書寫格式較早的文章。韓樹峰先生對師佐籍的格式進行了分析。<sup>⑥</sup> 沈剛先生《長沙走馬樓三國竹簡研究》一書中，對戶籍、師佐籍、錢出入記錄、納布記錄、入皮簿等的書寫格式進行了研究。<sup>⑦</sup> 日本學者特別注重文書的書寫格式，安部聰一郎、中村威也、伊藤敏雄、谷口建速、鷲尾祐子、石原遼平、阿部幸信等先

① [日]大庭脩著，徐世虹譯：《漢簡研究》，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1，10-13頁。該書中運用此方法進行了多種冊書的復原研究，可參閱。

② [日]永田英正：《居延漢簡研究》，30、39頁。

③ [日]大庭脩：《漢簡研究》，10頁。

④ [日]永田英正：《居延漢簡研究》，37頁。

⑤ 汪小烜：《走馬樓吳簡戶籍初論》，北京吳簡研討班編《吳簡研究》第1輯，武漢：崇文書局，2004，143-159頁。

⑥ 韓樹峰：《長沙走馬樓三國吳簡所見師佐籍》，《吳簡研究》第1輯，167-189頁。

⑦ 沈剛：《長沙走馬樓三國竹簡研究》，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3。該書中多篇文章涉及到對簿籍的格式研究，此不一一列舉。

生都曾對吳簡中相關簿籍的書寫格式進行研究。<sup>①</sup>當然,這些研究書寫格式的文章也同樣注重記載內容是否性質相同。總體而言,中國學者研究書寫格式的文章并不多,多數情況是跳過對書寫格式的專門討論,而以相同格式和內容為基礎,直接對同類簿籍進行名詞考證和制度研究;日本學者則往往先對所集成簿籍的書寫格式和內容進行較為細緻的分析。

吳簡的冊書復原研究中,學者較為重視揭剝圖所反映的簡牘位次關係,以此復原出某份簿書,然後對其內容進行研究。冊書復原研究的早期成果有侯旭東先生《長沙三國吳簡三州倉吏“入米簿”復原的初步研究》一文,<sup>②</sup>該文主要依據書寫格式和內容進行復原。其另文《長沙走馬樓吳簡〈竹簡〉[貳]“吏民人名年紀口食簿”復原的初步研究》中,<sup>③</sup>揭剝圖已成為冊書復原的重要依據。冊書復原研究方面較早、成果最為顯著的應是凌文超先生。他依據揭剝圖、盆號、坨號、清理號以及竹簡形制、內容等,對吳簡中的多種簿籍進行了整理與研究。<sup>④</sup>關尾史郎先生借鑒侯旭東先生和凌文超先生的研究方法,綜合運用簡牘遺存信息和考古學信息,通過書寫格式的文書集成、書法風格的比較等,對嘉禾六年廣成鄉吏民簿進行了

① [日]安部聰一郎:《長沙吳簡にみえる名籍の初步的検討》,長沙吳簡研究會編《長沙吳簡研究報告》第2集,東京,2004,39-53頁;[日]安部聰一郎:《実見報告:書式と形態からみた“戸品出錢”簡》,南北科研・西南班編《長沙吳簡研究報告2009年度特刊》,新潟,2010,95-105頁;[日]安部聰一郎:《走馬樓吳簡中所見“戸品出錢”簡の基礎的考察》,[日]藤田勝久等編《東アジア出土資料と情報伝達》,東京:汲古書院,2011,77-99頁;[日]安部聰一郎:《典田掾・勸農掾の職掌と郷——長沙吳簡中所見“戸品出錢”簡とりみろ——》,[日]伊藤敏雄、窪添慶文、關尾史郎編《湖南出土簡牘とその社会》,東京:汲古書院,2015,117-141頁。中譯稿《典田掾、勸農掾の職掌與郷——對長沙關簡中所見“戸品出錢”簡的分析》(劉峰譯),楊振紅、鄔文玲主編《簡帛研究二〇一五(秋冬卷)》,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5,238-256頁。[日]中村威也:《獸皮納入簡力い見太長沙の環境》,《長沙吳簡研究報告》第2輯,54-68頁。中譯稿《從獸皮納入簡看古代長沙之環境》,長沙簡牘博物館、北京吳簡研討班編《吳簡研究》第2輯,武漢:崇文書局,2006,245-257頁;[日]伊藤敏雄:《長沙走馬樓吳簡中の“邸閣”再検討——米納入簡の書式と併せて》,[日]太田幸男、多田狷介編《中國前近代史論集》,東京:汲古書院,2007,301-326頁;[日]伊藤敏雄:《長沙吳簡中の邸閣・倉吏とその關係》,《歴史研究》(大阪)49,2012;[日]谷口建速:《長沙走馬樓吳簡にみえる“限米”——孫吳政權の財政に関する一考察》,《三國志研究》3,2008,49-65頁;[日]谷口建速:《長沙走馬樓吳簡にみえる穀物財政システム》,[日]工藤元男、李成市編《東アジア古代出土文字資料の研究》,東京:雄山閣,2009,182-206頁;[日]鷲尾祐子:《長沙走馬樓吳簡連記式名籍簡の検討——家族の記録について》,《中國古代史論叢》7,2010,中譯稿《走馬樓吳簡連記式名籍簡的探討——關於家族的記錄》,《吳簡研究》第3輯,65-87頁;[日]谷口建速:《長沙走馬樓吳簡にみえる“貸米”と“種根”——孫吳政權初期における穀物貸與》,《史觀》162,2010,43-60頁;[日]谷口建速:《長沙走馬樓吳簡に見える“塩米”:孫吳政權の財政に関する一考察(その2)》,《早稻田大学大学院文学研究科紀要》第4分冊第57號,2011,111-129頁;[日]鷲尾祐子:《長沙走馬樓吳簡にみえる“限佃”名籍について》,《立命館文学》619,2010年,第368-387頁;[日]石原遼平:《長沙吳簡名籍考——書式と出土狀況を中心に》,《中國出土資料研究》14,2010,59-85頁;[日]阿部幸信:《長沙走馬樓吳簡所見的“調”——以出納記錄的檢討為中心》,長沙簡牘博物館、北京大學中國古代史研究中心、北京吳簡研討班編《吳簡研究》第3輯,北京:中華書局,2011。

② 侯旭東:《長沙三國吳簡三州倉吏“入米簿”復原的初步研究》,《吳簡研究》第2輯,1-13頁。

③ 侯旭東:《長沙走馬樓吳簡〈竹簡〉[貳]“吏民人名年紀口食簿”復原的初步研究》,《近觀中古史:侯旭東自選集》,上海:中西書局,2015,81-107頁。

④ 凌文超先生此類研究成果較多,部分成果收入其著《走馬樓吳簡采集簿書整理與研究》,可以參閱。限於篇幅,其他文章不一一列舉。



### 復原研究。<sup>①</sup>

冊書復原研究方面的研究成果很多,除了以上幾種復原方法外,值得一提的還有鄧瑋光先生的“橫向比較復原法”與“縱向比較復原法”。“橫向比較復原法”是尋找同一事件的多方記錄來復原文書的方法;“縱向比較復原法”是從歷時性角度還原某事件動態過程、利用揭剝圖及簡牘內部的“加成”關係進行復原的方法。鄧氏用這兩種方法對三州倉、州中倉的出米簿、月旦簿等進行復原研究,用此方法復原出多份簿籍。<sup>②</sup>

此外,雖然沒有特別提出方法論上的概念,但伊藤敏雄先生利用揭剝圖及簡文內容等,對木牘與竹簡進行關聯研究以探尋文書編聯的成果,<sup>③</sup>既在朝着復原文書的道路邁進,也用到文書集成方法整理相關竹簡。這也將是未來吳簡文書研究的又一方向。

### 3.統計學方法。

統計學方法是歷史學借用其他學科的研究方法。在當前歷史學研究中,統計學方法已被廣泛運用。吳簡研究中的統計學方法,首先是對相關內容進行數量統計,在統計所得數據的基礎上,結合傳世文獻的相關記載,對其進行多方面分析。

此方面首先值得介紹的是關尾史郎、阿部幸信、伊藤敏雄等先生編制製的《嘉禾吏民田家莧數値一覽(I)》和《嘉禾吏民田家莧數値一覽(II)》,<sup>④</sup>其對嘉禾吏民田家莧中的土地數額、米納入狀況、布錢的折算等進行了多角度的統計,對學界貢獻巨大。內容研究方面,運用統計學方法進行研究的學者很多,其中以于振波先生和鷺尾祐子先生的成果尤為顯著。于振波先生運用統計學方法,對吳簡中民戶、師佐、奴婢等的性別與年齡結構、戶人的性別與年

① [日]關尾史郎:《長沙吳簡吏民簿の研究(上)——“嘉禾六(二三七)年廣成鄉吏民簿”の復元と分析》,《人文科學研究》137,2015,27-98頁。

② 鄧瑋光:《走馬樓吳簡三州倉出米簡的復原與研究——兼論“橫向比較復原法”的可行性》;《對三州倉“月旦簿”的復原嘗試——兼論“縱向比較復原法”的可行性》;《對中倉黃龍三年十月旦簿的復原嘗試》,樓勁主編《魏晉南北朝史的新探索:中國魏晉南北朝史學會第十一屆年會暨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5,645-677頁;《走馬樓吳簡“出米簡”的復原與研究》,楊振紅、鄔文玲主編《簡帛研究二〇一五(春夏卷)》,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5,201-217頁;《對中倉黃龍三年十一月旦簿的復原嘗試》,楊振紅、鄔文玲主編《簡帛研究二〇一五(秋冬卷)》,182-214頁;《對中倉十二月出米簡[肆]4012組的復原嘗試》,蘇州博物館編《蘇州文博論叢》總第6輯,北京:文物出版社,2015,45-55頁。

③ [日]伊藤敏雄:《長沙吳簡中の生口売買と“估錢”徴収をめぐる——“白”文書木牘の一例として》,《歴史研究》(大阪)50,2013,97-128頁;《長沙吳簡中の“叩頭死罪白”文書木牘小考——文書木牘と竹簡との編綴を中心に》,《歴史研究》(大阪)51,2014,29-48頁;《長沙吳簡中の“叩頭死罪白”文書木牘》,[日]伊藤敏雄、窪添慶文、關尾史郎編《湖南出土簡牘とその社会》,35-59頁。

④ [日]關尾史郎、阿部幸信、伊藤敏雄編:《嘉禾吏民田家莧數値一覽(I)》,平成16年度科學研究費補助金(基盤研究(B)(1))“長沙走馬樓出土吳簡に関する比較史料學的研究とそのデータベース化”(課題番号16320096)資料叢刊,新潟,2005;[日]關尾史郎、伊藤敏雄編:《嘉禾吏民田家莧數値一覽(II)》,平成18年度科學研究費補助金(基盤研究(B))“長沙走馬樓出土吳簡に関する比較史料學的研究とそのデータベース化”(課題番号16320096)資料叢刊,新潟,2007。

齡結構、戶的規模與結構、女子婚齡等進行了數量統計與分析。<sup>①</sup> 鷺尾祐子先生則對家庭成員的年齡進行統計,進而分析家庭的構成、婚姻與年齡的關係等問題。<sup>②</sup> 此外,森本淳先生和滿田剛先生對嘉禾吏民田家荊中姓名、姓氏的統計分析也值得關注。<sup>③</sup>

#### 4. 結構分析方法

在以上研究方法之外,結構分析法也是研究吳簡的重要方法。于振波先生與鷺尾祐子先生對民戶的性別與年齡結構,婚姻結構與家庭構成等進行了結構研究,成果見“統計學方法”部分,此不贅述。町田隆吉先生在復原“戶”的基礎上,對家庭構成進行了研究。<sup>④</sup> 孫聞博先生和賈麗英先生在數量統計的基礎上,分別對孫吳家庭的結構進行分析。<sup>⑤</sup> 林益德先生對兒童的性別和年齡結構進行過研究。<sup>⑥</sup> 拙文曾用統計學方法與結構分析法,對嘉禾吏民田家荊中的數值錯誤進行統計,進而對其所反映的孫吳身份等級體系進行研究。<sup>⑦</sup>

#### 5. 其他

還有一些值得介紹的研究方法。安部聰一郎先生曾利用竹簡背面的反印文來研究名籍的位次關係。<sup>⑧</sup> 蘇衛國、岳慶平先生曾用 UCINET 軟件來描繪吳簡中鄉、丘的對應關係。<sup>⑨</sup> 這些研究方法雖然成果較少,但也可見吳簡研究方法的多樣性。

吳簡研究雖然成果豐富,但就研究方法而言,主要有前述數種。當然,前文未能述及的諸如文獻分析法、比較分析法等歷史研究方法,在吳簡研究中也很常見。需要說明的是,很多文章並不祇使用一種研究方法,而是混合使用多種研究方法。

① 于振波先生的此類研究成果很多,大多收錄於其著《走馬樓吳簡初探》和《走馬樓吳簡續探》兩書中。

② [日]鷺尾祐子:《走馬樓吳簡から見える家族の状況について——夫婦間の年齢差などから》,《長沙吳簡研究報告 2009 年度特刊》,35-55 頁;《分昇の時期と家族構成の変化について——長沙吳簡による検討》,[日]伊藤敏雄、窪添慶文、關尾史郎編《湖南出土簡牘とその社会》,167-196 頁;《嘉禾四年~六年(235-237)長沙の婚姻慣行:婚姻と年齢》,《東洋學報》第 97 卷第 1 号,2015。

③ [日]森本淳:《嘉禾吏民田家荊にみえる同姓同名に関する一考察》,長沙吳簡研究會編《嘉禾吏民田家荊研究——長沙吳簡研究報告》第 1 集,東京,2001,68-79 頁;[日]滿田剛:《長沙走馬樓吏民田家荊に見える姓について》,《嘉禾吏民田家荊研究——長沙吳簡研究報告》第 1 集,80-93 頁。

④ [日]町田隆吉:《長沙吳簡よりみた“戸”について——三国吳の家族構成に関する初步的考察》,長沙吳簡研究會編《長沙吳簡研究報告》第 3 集,東京,2007,27-47 頁。

⑤ 孫聞博:《走馬樓簡“吏民簿”所見孫吳家庭結構研究》,卜憲群、楊振紅主編《簡帛研究二〇〇七》,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2010 年,246-261 頁;賈麗英:《從〈長沙走馬樓三國吳簡〉看三國吳的家庭結構》,《中國史研究》2010 年第 3 期。

⑥ 林益德:《走馬樓吳簡所見兒童性別和年齡結構分析》,武漢大學歷史學院主編《珞珈史苑(2014 年卷)》,武漢大學出版社,2015,55-69 頁。

⑦ 參見拙文《嘉禾吏民田家荊與孫吳身份等級體系》,《文史》2015 年 3 輯。

⑧ [日]安部聰一郎:《試論走馬樓吳簡所見名籍之體式》,《吳簡研究》第 2 輯,14-24 頁。

⑨ 蘇衛國、岳慶平:《走馬樓吳簡鄉丘關係初探》,《湖南大學學報(社科版)》2005 年第 5 期。



## 二 吳簡研究方法的反思

吳簡研究方法主要有二重證據法、古文書學方法、統計學方法和結構分析方法等。一般而言，學者不會將倉庫的出入米簡與記載家庭成員的戶籍類簡相混淆進行統計研究，也不會將簿籍和文書混在一起進行結構分析。不過，也有學者以人名、丘名等為中心，打破簿籍格式和內容上的限制，對多種不同性質的簿籍進行關聯研究，取得不錯的成果。<sup>①</sup>但總體而言，考證、統計和結構分析的基礎，多是集成或復原所得的格式和內容相同的記錄。相對其他研究方法而言，古文書學方法具有吳簡研究方法上的“基礎”地位。

二重證據法既可單獨使用，與傳世文獻相結合進行“互證”研究，也可以在其他研究方法所得成果的基礎上，將成果納入傳世文獻所載的歷史中進行研究。事實上，不論是古文書學方法還是統計學方法，或是結構分析法，其所得結果都會被放到孫吳三國乃至秦漢魏晉的歷史中去尋找意義，分析時也需要利用傳世文獻的資料。意即，研究方法最終都會指向二重證據法。某種意義上講，二重證據法具有吳簡研究方法上的“歸屬”意義。

多種研究方法的使用，促成了吳簡研究成果的豐收。但整體而言，目前所見吳簡的研究方法，尚不能說已讓人十分滿意。首先是因為對吳簡研究進行方法論思考的文章并不多見，更為重要的原因在於這些研究方法自身也存在某些缺陷，在吳簡研究中面臨諸多困難。

二重證據法在吳簡研究中被廣泛運用，並取得了不少成果。但我們也注意到，學者運用相同的材料，相同的研究方法，却可能得出完全不同的結論。這是否說明二重證據法本身存在某些缺陷？二重證據法的“二重”主要是針對研究資料而言，強調研究資料的多樣性。對於其方法論上的論證作用，有學者持懷疑態度。日本學者西山尚志先生認為二重證據法具有以下問題：（1）沒有設想出土文獻的記載有“偽”；（2）出土文獻與傳世文獻的記載不一致的場合，不能確定誰“真”誰“偽”；（3）即使出土文獻與傳世文獻的內容一致也不能“全為實錄”；（4）二重證據法具有不可證偽性；（5）二重證據法是典型的證實主義。<sup>②</sup>即便考慮到材料之間能夠“互證”，二重證據法更多的是具有方法論上的原則性指導意義，而在操作性上略顯不足。已有學者指出，二重證據法不過是用新的文字材料來印證原有的文字材料，並不具

① 侯旭東先生曾以人名為中心，將嘉禾吏民田家莧與《竹簡》[貳]進行關聯研究，參見其著《長沙走馬樓吳簡“嘉禾六年（廣成鄉）弦里吏民人名年紀口食簿”集成研究：三世紀初江南鄉里管理一瞥》，《近觀中古史：侯旭東自選集》，108-142頁。需要說明的是，此文還使用了揭剝圖等進行研究。

② [日]西山尚志：《古書新辨：先秦出土文獻與傳世文獻相對照研究》之“緒論”《我們應該如何運用出土文獻？——王國維“二重證據法”的不可證偽性》，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1-17頁。

有方法論上的普適性。<sup>①</sup> 二重證據法自身的缺陷也影響着吳簡的深入研究。另外,吳簡檔案記錄“過於”詳細而傳世文獻中孫吳相關資料却非常匱乏,這種資料上的“矛盾”也影響着二重證據法在吳簡研究中的運用。<sup>②</sup>

文書集成研究和冊書復原研究等古文書學方法在吳簡中的大量運用,極大地推動了吳簡特別是吳簡中簿籍的研究。近年來冊書復原研究有漸受重視的傾向,實際上二者各有優劣。文書集成研究依據格式和內容以確定是否屬於同類簿籍,進而對此類簿籍進行研究;冊書復原研究則利用揭剝圖等復原出簿籍冊書,然後對其進行研究。文書集成研究可以打破揭剝圖等的限制,對各卷吳簡中所有同類簿籍進行整體研究,但也容易將不同簿書且不同含義的材料夾雜在一起進行研究。凌文超先生已經指出應避免此種情況發生。<sup>③</sup> 文書集成研究不會將標題簡和內容簡、合計簡等集合在一起——此類研究一般屬於冊書復原研究,因此也就不能得知簿書的完整形態,某些時候也難以窺知簿籍間的相互關係。

冊書復原研究往往局限於單個簿籍的復原,并強調揭剝圖的作用。但正如宋少華先生曾經提醒的那樣:

吳簡揭剝圖不是萬能的,它所起的作用也無須過度放大。它自身存在的不足與缺陷,如受擾亂、扔棄、擠壓,人為分割等諸多因素的影響,其所能發揮的作用可能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仍有待研究者用更為科學的方法,細緻地加以梳理,謹慎地甄選剔抉。<sup>④</sup>

宋少華先生關於揭剝圖的提醒值得重視。鷺尾祐子先生曾在《竹簡》[貳]的同一揭剝圖(作者稱為“示意圖”)中,以簡牘長度和記載格式區分出兩種構成不同、由不同機關製作的名籍。<sup>⑤</sup> 僅就記載格式而言,除了戶人簡上是否記載其他成員這一差異外,兩種名籍的內容簡和合計簡的格式沒有任何差異,內容上也看不出有明顯差別。這些內容相同、格式相同但却屬於不同名籍、長短不一的簡,在此揭剝圖中混雜存在。此種現象正好印證了宋少華先生所言,對待揭剝圖需要謹慎,復原研究需要更注意内部的位次關係。此外,冊書復原研究在面對某些關鍵信息(如鄉名、丘名、人名、時間年月等)缺失的殘簡時,其歸屬的依據可能略顯不足。復原研究,存在需要細化之處。

另外,某些冊書復原的成果要避免“以偏概全”的危險。鄧瑋光先生利用“橫向比較復原法”和“縱向比較復原法”復原出的多份簿籍中,分簡合計數額與簡文所記總數,有些完全相

① 喬治忠:《王國維“二重證據法”蘊義與影響的再審視》,《南開學報(社科版)》,2010年第4期。

② 凌文超先生也對“二重證據法”在吳簡研究中面臨的困境有所認識,參見其著《走馬樓吳簡采集簿書整理與研究》第一章《緒論》,6頁。

③ 凌文超:《吳簡文書學研究芻議》,《走馬樓吳簡采集簿書整理與研究》,468-469頁。

④ 宋少華:《長沙三國吳簡的現場揭取與室內揭剝——兼談吳簡的盆號和揭剝圖》,《吳簡研究》第3輯,8頁。

⑤ [日]鷺尾祐子:《長沙走馬樓吳簡連記式名籍簡的探討——關於家族的記錄》,《吳簡研究》第3輯,65-87頁。

合,有些十分接近(差額幾乎可以忽略不計),整體而言數據基本無誤。但徐暢先生《走馬樓吳簡竹木牘的刊布及相關研究述評》一文所刊布の木牘中,<sup>①</sup>牘 369、牘 366、牘 99+35 等木牘中都存在數值誤差。將簡牘中所載各項米數合計與簡文所記總數相較,牘 369 前者較後者多出 3.57 斛,牘 366 多出 0.3 斛,牘 99+35 則多出 476 斛。<sup>②</sup>雖然不能以此斷定鄧氏的復原成果錯誤——或許其復原出的簿籍正好數值無誤,但完整木牘上的數值誤差現象提醒我們,要謹慎對待數值無誤的冊書復原研究。如果試圖將其普遍化,則可能因忽視數值誤差等諸多情況的存在而帶來“以偏概全”的危險。

此外,冊書復原研究雖然能剔除性質不同的竹簡,<sup>③</sup>但難以確定冊書內部的竹簡次序。學界基本認同,要完全對吳簡中的簡牘進行復原,其難度是非常大的。

相對其他簡牘而言,目前公布的吳簡內容較為特殊。各種家庭簿籍和租稅賬簿是目前所見吳簡的主要內容,行政文書在《竹簡》[柒]、[捌]中才有明顯增多。對這種內容略顯單一的檔案資料進行研究,統計學方法可能不失為一種簡單易行而又行之有效的研究方法。中日學者運用統計學方法得出的結論大多能得到學界認同,而爭論之處往往是用其他方法研究所得。但是,統計學方法的運用也面臨一些問題。其一,數據統計的基礎在於同類數據形成的“數據庫”,這正是中國學者缺失的地方。日本學者編製有《嘉禾吏民田家莧數值一覽(I)》和《嘉禾吏民田家莧數值一覽(II)》,但中國的吳簡研究缺乏這樣專門的數據整理資料。吳簡總數約 10 萬枚,有字簡 76438 枚,其中已公布吳簡資料 7 卷共 48072 枚。<sup>④</sup>面對數額如此龐大的資料,製作數據庫需要耗費大量精力。即便能製作出數據庫,也不能保證一定能取得良好的研究成果。在目前簡牘資料層出不窮、選擇愈來愈多的情況下,要求學者進行前期工作枯燥乏味、後期成果難以預料的吳簡統計學研究,有些強人所難。其二,統計學方法往往是依據記載格式和內容集成的簿籍進行研究,這也難以避免混淆簿籍性質等情況的發生。事實上,要完全區分吳簡中某些簿籍特別是與家庭相關的簿籍是很難做到的。僅以統計家庭人口的合計簡格式看,合計簡就可分為 3 大類 10 小類。<sup>⑤</sup>此外,吳簡中可能還存在

① 徐暢:《走馬樓吳簡竹牘的刊布及相關研究述評》,武漢大學中國三至九世紀研究所編《魏晉南北朝隋唐史資料》第 31 輯,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25-74 頁。

② 參見拙文《孫吳吏民的數值計算與基層生活的實態——以走馬樓吳簡為中心》,“紀念長沙走馬樓三國吳簡出土 20 周年長沙簡帛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會議論文,湖南長沙,2016 年 8 月 26-29 日,後修改為《孫吳吏民的數值計算與基層社會的數學教育——以走馬樓吳簡為中心》,待刊。此處祇列舉了分項合計數額多於簡文所記總數的木牘,前者少於後者的情況同樣存在。可參見前文。

③ 冊書復原研究剔除的性質不同的竹簡,實際上利用記載格式和內容也能做到,文書集成研究一般也是集成同類性質的竹簡。

④ 已刊布各卷所載吳簡數量,除可查閱各卷外,亦可參看長沙簡牘博物館編《嘉禾一井傳天下:走馬樓吳簡的發現保護整理研究與利用》,93-94 頁。

⑤ 參見拙文《孫吳基層社會身份秩序研究——以走馬樓吳簡為中心》,湖南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16,37-39 頁。

屬於同一單位的多份名籍。關尾史郎先生曾研究認為，廣成鄉平樂里存在4種以吏、民為對象的吏民簿，同一年中可能製作了多份吏民簿。<sup>①</sup> 鄧瑋光先生也認為，吳簡中的戶籍與一般名籍很難區分，且存在連續兩年重造戶籍的情況。<sup>②</sup> 如果不能對這些簿籍予以區分，極可能導致數據的重復統計。或許是出於以上考慮，雖然于振波先生撰文《統計學方法與走馬樓吳簡研究》，專門討論將統計學方法用於吳簡研究的問題，但其呼籲未能引起中國學者的足夠重視。

### 三 吳簡研究方法的展望

很早就有人提出了“吳簡學”的概念，<sup>③</sup> 謝桂華先生也認為“三國吳簡”定會成為一門獨立的學科。<sup>④</sup> 王素先生曾言：“預計不久將會迎來一個對象研究的高潮。而‘吳簡學’的創立，也應該指日可待！”<sup>⑤</sup> 若要成為一門獨立的學科，應有自己獨特的研究方法。就方法論而言，二重證據法不僅對簡牘學適用，對甲骨學、金石學等同樣適用，其不是吳簡研究獨有的方法。古文書學方法在研究居延漢簡時率先使用，本就有限於吳簡研究。此外，各種研究方法雖能有所收穫，如前所述也存在各自的缺陷。王素先生也曾指出，目前吳簡學的建設“僅停留在呼籲層面，缺乏實際的建設性的內容”，吳簡學的基礎研究理論和基本的研究方法等條件“沒有完全具備”。<sup>⑥</sup> 目前的吳簡研究方法並不十分讓人滿意，也難以從方法論上支撐作為獨立學科的“吳簡學”。

當然，吳簡研究者也在此方面進行了諸多努力。凌文超先生提出建立吳簡文書學，利用考古學整理信息（即揭剝圖等）與簡牘遺存信息（即簡牘形制、編痕、筆迹、簡文格式和內容等），對某些可以復原、集成的簿書進行整理與研究。<sup>⑦</sup> 多位學者在研究方法上進行積極探索。這都不失為對吳簡研究方法的有益嘗試。不過，專門對吳簡研究方法進行思考和總結的文章較為少見。此方面應是以後吳簡研究努力的方向。

① [日]關尾史郎：《簿籍の作成と管理からみた臨湘侯国——名籍を中心として》，[日]伊藤敏雄、窪添慶文、關尾史郎編《湖南出土簡牘とその社会》，95-116頁。

② 鄧瑋光：《試論吳簡名籍的製作周期及相關問題》，卜憲群、楊振紅主編《簡帛研究二〇一二》，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3，165-181頁。

③ 石見：《“敦煌百年”的曲折與“長沙吳簡”的未雨綢繆》，《中國文物報》2001年1月17日第3版。

④ 張邦衛：《“三國吳簡”可成為一門獨立的學科——中國社會科學院簡帛研究中心主任謝桂華訪談錄》，《長沙晚報》2001年8月18日第B3版。

⑤ 王素：《長沙走馬樓三國吳簡研究的回顧與展望》，《吳簡研究》第1輯，31頁。

⑥ 王素：《關於吳簡學學科建設的思考》，“第二屆簡帛學的理論與實踐學術研討會”會議論文，北京，2016年11月4-6日。

⑦ 凌文超：《吳簡文書學研究芻議》，《走馬樓吳簡采集簿書整理與研究》，455-472頁。

目前吳簡研究方法似乎已遇到“瓶頸”，成果雖多但研究方法却漸趨雷同。這極大地限制了吳簡研究的深入。未來的吳簡研究，如果要取得新的發展，除了期待新資料的公布，做好簡牘實物調查、數據庫建立等基礎性工作之外，研究方法也應有所突破和創新。目前利用揭剝圖的研究愈來愈受學者重視。不過，如前所言，此種研究需要做更為細緻的工作。比如殘簡歸屬、竹簡次序等問題，都有繼續深入的空間。此外，超越簡、牘等記載材質而進行的關聯研究，伊藤敏雄先生已進行過嘗試，但此類研究成果尚不多見。據悉，長沙簡牘博物館已經完成了 390 余枚竹木牘的釋文，將於 2018 年出版。<sup>①</sup> 這些竹木牘的公布，將為簡、牘之間的關聯研究提供新的契機。利用這些竹木牘的內容，可能會糾正某些前期成果，也可能發展出一種新的研究模式和方法。再者，利用現代技術對吳簡進行研究的成果也不多見。已有學者利用計算機信息處理技術，在簡牘圖像和文字的識別與處理、殘簡綴合等方面進行過有益的探索。<sup>②</sup> 目前的吳簡研究多限於傳統的研究方法。計算機信息處理技術等現代科技手段的引入，可能會對吳簡研究產生深刻影響。

吳簡研究的深入需要研究方法的發展。未來的吳簡研究方法，不僅需要對現有研究方法的總結、反思和細化，也有待於現代技術在吳簡研究上的運用。吳簡研究的繼續深入，吳簡文書學的成立，“吳簡學”獨立學科地位的確立，都有賴於吳簡研究方法的發展和創新。作為獨立學科的吳簡研究方法的創立，還有很長的路要走。未來的吳簡研究方法，需要學人的共同努力和艱苦探索。

後記：業師湖南大學于振波先生和匿名審稿專家提出了不少修改建議，本文多有採納。特此致謝。

本文所舉研究成果多為此方面代表作品，但難免有掛一漏萬之處。吳簡研究成果十分豐富，本文未能一一列舉。祈學者海涵。

① 此消息載於長沙簡牘博物館編《嘉禾一井傳天下：走馬樓吳簡的發現保護整理研究與利用》，94 頁。

② 此方面的成果可參見以下幾篇學位論文：楊斯涵《圖像分割技術在簡牘保護中的應用研究》，成都理工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06；劉瑛《OCR 技術在簡牘圖像數位化中的應用》，成都理工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07；張娜《簡牘圖像增強與分割的研究》，成都理工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07；陳瑜《基於輪廓曲率的殘斷簡牘匹配拼接關鍵技術研究》，成都理工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08；覃慶炎《簡牘數字圖像增強演算法研究與應用》，成都理工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08；張偉《簡牘圖像中文字修復的研究與應用》，成都理工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08；張陽潔《基於閾值的圖像分割技術在簡牘中的應用》，成都理工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0。另有數篇期刊論文，內容多在上述學位論文之中，此不再重複。



# 律令簡新獲與秦史研究

——讀《嶽麓書院藏秦簡(肆)》\*

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

出土文獻與中國古代文明研究協同創新中心

孫聞博

## 一 引言

出土文獻中,秦律令簡的發現與整理有着特殊的意義。

始皇廿六年,秦并兼天下,完成一統,中國歷史上第一個中央集權帝國由此建立。秦國祚短促,然垂範深遠,前人有“百代都行秦政法”之說。不過,廣受重視又深具魅力的秦史研究,一直因傳世史料寡少而多受制約。《史記》及《戰國策》《商君書》《呂氏春秋》等典籍中可供參考的材料,固顯有限。學人若翻檢向稱蒐采詳贍的清人嚴可均輯《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對《全秦文》部分也會有同樣的感受。自孝公任商鞅行變法以來,秦政雖時有波動,秦制仍多循其舊。嬴政立號為“皇帝”後,繼續奉行商君“重法”的政治路線,“事皆決於法”,“欲有學法令,以吏為師”。律令制是當時帝國的核心統治制度。秦代律令研究也因此成為探求秦帝國歷史面向的要徑所在。

二十世紀至今,出土文獻的重要發現層出不窮,推動了歷史研究在深度與廣度上的不斷拓展。而秦律令類簡牘對秦史及法制史研究,更具有決定意義。1975年12月湖北雲夢睡虎

---

\* 基金項目:中國人民大學科學研究基金(中央高校基本科研業務費專項資金資助)項目成果(項目批准號16XNB012)。



地秦簡的發現，“開啓了秦史研究的新紀元”。<sup>①</sup>

2007年10月，湖南大學嶽麓書院從香港搶救性購藏一批秦簡；2008年8月，又接受收藏家捐贈同類的少量簡牘，二者合計有2176個編號。其中，秦律令簡數量最多，達一千二百餘枚，占總量一半以上。這是繼睡虎地秦簡之後的又一次重大收獲。嶽麓秦簡整理小組對此高度重視，投入了較多力量，安排在最後推出。近年出版的陳松長主編《嶽麓書院藏秦簡（肆）》，<sup>②</sup>就是相關整理成果中的第一種。

陳松長先生在先前發表的《嶽麓書院所藏秦簡綜述》一文中，<sup>③</sup>曾對律令簡進行了整體性介紹。陳松長、于振波等學者後續撰文，亦對相關資料有零散披露。<sup>④</sup>本書則是嶽麓秦簡律令類簡牘的首次系統公布。

嶽麓秦簡律令簡在此前曾暫定名《律令雜抄》，後又作《秦律雜抄》《秦令雜抄》，今稱《秦律令（壹）》。全書選收391枚竹簡，內容為秦律、令及決事比。具體分為三組：第一組，108個編號，拼合後為105枚，內容主要為《亡律》；第二組，178個編號，涉及《田律》《金布律》《尉卒律》等19種律文；第三組，108個編號，主要為秦令，包括“內史郡二千石共令”“廷內史郡二千石共令”“內史戶曹令”等。本書正式出版前，整理小組成員周海鋒先生撰有《〈嶽麓書院藏秦簡（肆）〉的內容與價值》，<sup>⑤</sup>介紹有關材料的具體內容及學術價值，可與本書“前言”對讀。

## 二 簡牘整理的新進步

相較以往的簡牘整理著作，本書除增加對紅外線圖版、揭剝示意圖外，還有諸多創新體現。

一是製作了每組簡重新編聯排列後的簡冊圖版，有助於學者認知與把握簡冊的整體形態、原始樣貌。這些簡冊圖版均列于單簡圖版、釋文與簡注之前，反映出整理者的良苦用心。

二是特別重視簡背信息。本書公布了每支簡的簡背照片。此前的簡冊部分，也同樣提供了每組簡冊的背面圖版。這類內容在以往簡牘整理著作中，多難見到。這種盡可能全面提供簡牘物質形態信息的做法，值得提倡與推廣。

三是充分注意反印文信息。地下埋藏過程中，卷束簡冊容易發生擠壓，造成簡牘文字墨

① 侯旭東：《秦簡整理的新里程碑》，《中華讀書報》2015年8月12日，第10版。

② 陳松長主編：《嶽麓書院藏秦簡（肆）》，上海辭書出版社，2015年。

③ 陳松長：《嶽麓書院所藏秦簡綜述》，《文物》2009年第3期。

④ 陳松長等：《嶽麓書院藏秦簡的整理與研究》第七章，上海：中西書局，2014，243-277頁。

⑤ 周海鋒：《〈嶽麓書院藏秦簡（肆）〉的內容與價值》，《文物》2015年第9期。

迹印留在疊壓簡上,習稱反印文。重視反印文的分析,已成為當今簡牘學研究的趨勢。本書特列“正背反印文對照圖”,以便學界參考,正是對這一新趨勢的積極回應。

四是在單簡釋文之外,提供了釋文連讀本。此前學者在整理天一閣藏明鈔本天聖令時,在校錄本後,附有清本。本書製作釋文連讀本,方便讀者閱讀律令內容,也是較為可取的處理辦法。

五是在繪製揭剝示意圖基礎上,提供了俯視角度的“卷冊復原示意圖”。嶽麓秦簡(壹)(貳)(叁)的復原研究,陶安已有專著問世。<sup>①</sup> 伴隨相關資料的陸續公布,我們相信未來會有更多學者關注與從事簡冊復原工作。

此外,整理小組在簡冊編聯、復原上,工作更趨細緻。如在第三組簡整理過程中,整理者不僅注意到“一枚簡上書手不同的現象”,而且留意“同一條律令中,也有不同書體並存的現象”。第三組簡的簡背劃痕,整理者已加關注,並指出“劃痕的編聯却多與簡文的屬讀不對應”,且解釋了相關原因。這對於近年簡牘整理中簡背劃痕問題的探討,亦有幫助。

### 三 法制史研究:“漢承秦制”與秦令特徵

嶽麓秦簡律令簡的發表,將會對秦漢法律制度研究有很大促進。這裏從深度與廣度層面,各舉一例。

秦漢法律中的“漢承秦制”問題,隨着本世紀初張家山漢簡《二年律令》的公布,引發人們進一步的思考。在睡虎地秦簡、龍崗秦簡與西漢初年《二年律令》的比較研究中,漢律基本繼承秦律的一面,得到人們肯定。劉邦在反抗暴秦時所提出的“約法三章”,似未代表漢帝國建立初葉的律令特徵。秦、漢法律差異及前後演變的一面,學界雖多有關注;但秦律與文帝刑罰改革前漢律的比較研究,仍是以往的一個薄弱環節。韓樹峰先生在研究秦漢徒刑結構時,敏銳注意到:秦代鬼薪白粲、隸臣妾、司寇,均有“告人”的權利;然至漢初,鬼薪白粲的這一權利已被剝奪。又如秦代肉刑與城旦舂、鬼薪白粲、隸臣妾等徒刑均可搭配使用,而漢初則將肉刑使用上移,僅與城旦舂組合使用。<sup>②</sup> 嶽麓秦簡公布後,此類論題有望更好展開。如本書整理者即注意到《亡律》對城旦舂、白粲、城旦司寇逃亡,均黥為城旦舂,而《二年律令·亡律》對鬼薪白粲相關行為笞一百。<sup>③</sup> 嶽麓秦簡中,尚有多條律文可供此類對照分析。

秦漢時期令的性質,與唐令有別。《唐六典》卷六云“令以設範立制”,偏重行政法規及

① 陶安:《嶽麓秦簡復原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

② 韓樹峰:《漢魏法律與社會——以簡牘、文書為中心的考察》上篇第三章,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1,74頁。

③ 陳松長主編:《嶽麓書院藏秦簡(肆)》“前言”,1頁;又見周海鋒《〈嶽麓書院藏秦簡(肆)〉的內容與價值》,84頁。

各種條例的規定。而漢令主要“是對‘律’的補充、修正和說明”。<sup>①</sup> 關於漢令的輯佚與探討，近代以來中日學者已做了不少工作。《二年律令·津關令》的出土，更使我們得睹漢初令文的具體面貌。此外，張家山 336 號漢墓尚發現《功令》一百八十余支，如能在未來順利公布，漢令材料將更加豐富。然而，秦令的內容與格式，我們以往所知很少，學界甚至一度對秦令的存在產生懷疑。本書第三組簡屬秦令的首次系統公布，學術意義自然毋庸置疑。參照時代接近的《津關令》，我們可以看到，《內史郡二千石共令》《廷內史郡二千石共令》等秦令同樣多保留了帝王“制”“詔”的基本內容，多就具體事務下達旨意或對奏“言”加以批復，通則性較律文為低。《二年律令·津關令》令文似可分為兩類：依“制書”所編令文；依“詔書”所編令文。前者以“制詔御史”“制詔相國、御史”開頭，中間或有“相國、御史請”，結尾或有“制曰可”。第二類實際又可細分為相國、御史大夫上“言”奏請，朝官討論後相國領銜“議”奏，相國、丞相轉奏中央、地方其他官吏上書三種。<sup>②</sup> 本書所收秦令，多可與之對照。如“制詔丞相御史：……丞相御史請：……”，可對應《津關令》“制書”類令文。又，嶽麓簡“昭襄王命曰：……●三年詔曰：復用”，顯示最初令文參據秦昭襄王時期“命書”編成，秦王政三年又下詔重申行用。“御史言：……，請，許。……丞相議：……”，“各謹明告縣道……丞相議……”中，有以《津關令》“詔書”類令文第一種開頭，中間提及第二種相國領銜“議”的內容。此外，嶽麓簡還有“秦上皇時內史言：……議：……。●二年曰：復用”，“內史言：……請：……”，“東郡守言：……請……。●制曰：可”，大體對應《津關令》“詔書”類令文第三種。但二者又有不同。《津關令》對於中央長信詹事、中大夫，地方內史、南郡郡守、長沙國丞相、魯國御史大夫、備塞都尉上書言請某事，均由相國、丞相奏上。目前所見嶽麓簡幾條令文則徑作“內史言”，“東郡守言”，未經轉奏。秦內史、郡守地位是否較後世為高，抑或秦上行文書運轉有自身特徵，有待進一步研究。嶽麓秦簡目前所見令文，似可分為三類：1.“命書”“制書”類令文（後或經詔書確認）。2.“詔書”類令文。漢初中央卿大夫、諸侯國卿相、內史、郡二千石官上“言”須經相國、丞相轉奏。秦中央、地方官吏上書除丞相轉奏外，也見到直接上“言”奏請的記錄。其中一些復經集議，再由君主批准。3. 詔令節文。只交代具體規定而不復出現某官“言”“議”及“制曰可”等用語。這與此前在河西漢塞發現的《功令》《北邊絜令》等令文，<sup>③</sup> 格式更為接近。

① 孟彥弘：《秦漢法典體系的演變》，《出土文獻與漢唐典制研究》，北京大學出版社，2015，1、25 頁。

② 楊建：《西漢初期津關制度研究》第一章，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18-23 頁。

③ 高恒：《漢簡牘中所見令文輯考》，《秦漢簡牘中法制文書輯考》，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8，166-170、181-182 頁；李均明：《秦漢簡牘文書分類輯解》，北京：文物出版社，2009，209-222 頁。

#### 四 秦史研究：官制、軍制與社會身份

嶽麓秦簡律令簡還會對秦官制、軍制、賦稅徭役、基層管理及社會身份等方面的研究，產生積極的促進作用。這裏復舉六例。

本書第二、三組簡中數次出現“有秩吏”，如“置吏律曰：縣除有秩吏，各除其縣中。其欲除它縣人及有謁置人為……有秩吏，能任者，許之。……縣以攻（功）令任除有秩吏”（1272、1245），“有秩吏及縣令除有秩吏它縣者”（1303），“●獄史、令史、有秩吏、及屬、尉佐以上”（0559），及“屬、尉佐、有秩吏，執灋免之”（0520）。與之相對，嶽麓簡中又見有“小佐毋（無）秩者”（1396），又稱“佐吏”（1367、1378）。西漢初，“有秩”祿秩高於百石，在張家山漢簡中為二百五十石至百廿石。秦“有秩吏”秩級當與之相近。官吏類別上，“有秩吏”主要對應都官及縣下諸官嗇夫。商鞅第二次變法所推行的縣制，《史記》卷一五《六國年表》曾提到“初為縣，有秩史”的舉措。相關斷句及文義理解，學界一向眾說紛紜。嶽麓秦簡“有秩吏”的材料有望為思考這一問題，提供新的線索。<sup>①</sup>

而“內史郡二千石官共令”的表述，也值得注意。整理者以“‘內史’亦為郡名，內史郡是秦中央官署所在地，其地位遠高於它郡”（“前言”，3頁）。按秦稱都城咸陽為中心的京師地區為“內史”，秦郡則在惠文王以降陸續設立。郡相當於內史橫向擴展的行政單元，早期軍事管理區的意味尤為濃重。嶽麓秦簡中，內史與郡相對，稱“中”，如郡縣道外，有“中縣道”。雖然《史記》卷一七《漢興以來諸侯王年表》“漢獨有三河、東郡、潁川、南陽，自江陵以西至蜀，北自雲中至隴西，與內史凡十五郡”，在統計漢廷直轄郡數時，計入“內史”，但“內史”一般不使用“內史郡”的名稱。漢武帝置十三州部刺史時，未將京畿地區包括在內。後一區域稍後置司隸校尉加以管理，仍不在州部名數之中。西漢司隸部與十三州部，為并列關係。及至東漢，重新調整後的十三州部始將“中州”即“司隸”包含在內。西漢相關制度傳統，或可溯至“內史”“郡”并列連稱的秦代。

漢代每年於地方舉行軍事演習，稱“都試”，或“大試”。“都試”一般由郡守主持，時間在八月或九月。西北漢簡《功令》更對邊地“秋射”考核規定有所交代。不過，筆者在重新句讀、分析張家山漢簡《二年律令·徭律》“縣弩春秋射各旬五日，以當繇（徭）戍。有餘及少者，隕後年”（四一四）時，注意到戰國、秦及西漢初年的軍事集訓檢閱，多為春、秋兩季。《管子·七法》提到“春秋角試，以練精銳為右”，《嶽麓（壹）》所收《為吏治官及黔首》有“春秋肄

<sup>①</sup> 拙文《商鞅縣制的推行與秦縣、鄉關係的確立——出土文獻與傳世史料結合下的再審視》，待刊。

射、謝室毋廡”(0931/0937)。<sup>①</sup> 今嶽麓簡《廷內史郡二千石官共令》復出現“令所謂春秋試射者,皆必以春秋閒時毆(也)。今縣或以黔首急耕、種、治苗時已乃試之,而亦曰春秋試射之令毆(也),此非明吏所以用黔首毆(也)”(0317、0318、0319)。這為分析相關問題,提供了新的論據。

漢代,傅籍成年男子原則上一般須“屯戍一歲”,即赴邊地服兵役1年。董仲舒以此制承襲自秦,如淳則有“天下人皆直戍邊三日”之說。關於秦代行戍制度,以往學者或采信如說,或以為仍為“屯戍一歲”之制。近年,楊振紅先生在於豪亮等學者研究基礎上,充分重視《史記·漢興以來將相名臣年表》高后五年八月條“令戍卒歲更”、《資治通鑑·漢紀五》“初令戍卒歲更”的記載,對相關問題重做考析,指出“高后五年以前每年要服多長時間的戍役呢?雖然文獻中有‘戍邊三日’的說法,但是筆者仍然認為一個月的期限較為合理”。<sup>②</sup> 今嶽麓秦簡發現有“●戍律曰:戍者月更。君子守官四旬以上為除戍一更”(1299)內容的簡文,基本可以證實秦代成年男子原則上每年大體服一個月的戍役。楊氏所論,堪稱卓識。

唐代強調當色為婚,違反唐令相關規定而良賤為婚者,“皆離之”。秦漢與李唐有別,允許良賤為婚,並由此產生後代歸屬與身份問題。<sup>③</sup> 張家山漢簡《二年律令·裸律》對良賤為婚、賤賤為婚的相關問題已有涉及,但多為一般情形下的規定。嶽麓秦簡《亡律》“奴亡,以庶人以上為妻,婢亡,為司寇以上妻,黥奴婢顏(顏)顏,畀其主。以其子為隸臣妾,奴妻欲去,許之”(0168、0167),則對逃亡奴婢與司寇、庶人以上結為夫妻的情況做出處理,並兼及後代的身份判定。又,睡虎地秦簡《法律答問》“女子為隸臣妻,有子焉,今隸臣死,女子北其子,以為非隸臣子毆(也),問女子論可(何)毆(也)?或黥顏顏為隸妾,或曰完,完之當毆(也)”(一七四),對平民、隸臣結為夫妻的後代身份進行司法解釋。而嶽麓秦簡“●傅律曰:隸臣以庶人為妻,若群司寇、隸臣妻懷子,其夫免若冗以免、已拜免,子乃產,皆如其已免吏(事)之子。女子懷夫子而有罪,耐隸妾以上,獄已斷而產子,子為隸臣妾,其獄未斷而產子,子各如其夫吏(事)子。收人懷夫子以收,已贖為庶人,後產子,子為庶人”(1256、1268、1275),反映的情況更為複雜。當與庶人為婚的隸臣改變身份時,後代身份也相應發生變化。而女子被判耐為隸妾,產子發生在斷獄前抑或斷獄後,後代身份同樣存在明顯不同。這些前所未有的信息,大為充實了我們對相關制度的了解與認知。

① 拙文《兩漢的郡兵調動:以“郡國”、“州郡”的行政變化為背景》,《中華文史論叢》2014年第3期,183頁。

② 楊振紅:《徭、戍為秦漢正卒基本義務——更卒之役不是“徭”》(原刊《中華文史論叢》2010年第1期),修訂稿收入其著《出土簡牘與秦漢社會(續編)》第八章,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5,206頁。

③ 拙文《秦漢簡牘中所見特殊類型奸罪研究》,《中國歷史文物》2008年第3期。



“亡人”是秦漢時代社會群體的重要構成。“亡人”的內地流動與邊地“越塞”，引起執政者的高度重視。《漢書》卷九四下《匈奴傳下》載元帝時郎中侯應議邊事，就提到“自中國尚建關梁以制諸侯，所以絕臣下之覬欲也。設塞徼，置屯戍，非獨爲匈奴而已，亦爲諸屬國降民，本故匈奴之人，恐其思舊逃亡，四也……往者從軍多沒不還者，子孫貧困，一旦亡出，從其親戚，六也。又邊人奴婢愁苦，欲亡者多，曰‘聞匈奴中樂，無奈候望急何。’然時有亡出塞者，七也。盜賊桀黠，群輩犯法，如其窘急，亡走北出，則不可制，八也”，涉及“屬國降民”、“從軍多沒不還者”子孫、“邊人奴婢”、“盜賊桀黠，群輩犯法”等多類群體。“亡人”，已成為當時帝國邊地嚴峻的政治與社會問題。王子今先生較早注意并開展對秦漢“亡人”問題的系列研究，先後撰寫《漢代“亡人”“流民”動向與江南地區的經濟文化進步》，《論西漢北邊“亡人越塞”現象》，《略論秦漢時期朝鮮“亡人”問題》，《漢代北邊“亡人”：民族立場與文化表現》，<sup>①</sup>《漢代西北邊境的“亡人”及相關行政對策》，<sup>②</sup>《漢代北邊“亡人”與民族文化交融》，<sup>③</sup>《秦漢交通史稿》（增訂版）第十三章之“‘客民’和‘亡人’”等，<sup>④</sup>引起學界廣泛重視。所論將傳世文獻與出土文獻充分結合，注重解釋“亡人越塞”現象的生成、“亡人”的人群構成、邊地防範“亡人越塞”的措施、“亡人”的民族立場與文化表現、“亡人越塞”與“亡人”流動的文化傳播意義。有意思的是，嶽麓秦簡《亡律》在“亡人越塞”之外，還涉及到對“亡故塞徼外蠻夷”“亡徼中蠻夷”“亡縣道”（2065+0780）等行爲及“來誘者”懲處量刑的具體規定，大爲豐富了以往認知。相關律文，有待進一步深入探討。又，此前公布的睡虎地秦簡《秦律十八種》《法律答問》，張家山漢簡《二年律令·捕律》《亡律》《奏讞書》中，已見有針對逃亡行爲的法律規定。而嶽麓秦簡《亡律》《尉卒律》除體現律文承續性一面，如對匿、舍亡人行爲明顯區分，細則多可對照外，還揭示了以往了解較少的其他秦制側面。對匿亡人的連坐及連帶責任追究，不僅涉及室人、奴婢，還對典、田典、伍、鄉嗇夫的相關責任及處罰，有明確說明。亡人群體方面，嶽麓簡對不同官府機構的亡者，特予交代。如“佐弋隸臣、湯家臣，免爲士五（伍），屬佐弋而亡者，論之，比寺車府。內官、中官隸臣妾、白粲以巧及勞免爲士五（伍）、庶人、工、工隸隱官而復屬內官、中官者，其或亡”（0782、2085），“寺車府、少府、中府、中車府、泰官、御府、特庫、私官隸臣，免爲士五（伍）、隱官，及隸妾以巧及勞免爲庶人，復屬其官者，其或亡盈三月以上而得及自出……”（1975、0170），“泰廐城旦不將司從馬，亡而得者……”（1997），“……及左樂、樂府謳隸臣妾，免爲學子、炊（吹）人，已免而亡，得及自出……”（2149、2016）。這類記錄形式本身，就很值得注意。相關律文對思考機構運行、社會身份、秦律纂集等問題，也很有意

① 參見王子今《秦漢邊疆與民族問題》，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1，83-95、135-165、431-448頁。

② 王子今：《漢簡河西社會史料研究》，北京：商務印書館，2017，300-313頁。

③ 王建平主編：《河套文化論文集（三）》，呼和浩特：內蒙古人民出版社，2008，2-9頁。

④ 王子今：《秦漢交通史稿（增訂版）》，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3，437-442頁。



義。至於“闕亡”“將陽”區分，乃以十二月爲界，更是新鮮信息。此點整理者已提及，不贅。伴隨嶽麓秦簡《亡律》《尉卒律》相關材料的刊布，圍繞這一議題的探討，應會持續開展。

全書錄文句讀謹嚴可信，釋義引據簡潔精當。如整理者所言，“本書的刊布必將在簡帛學界，特別是秦漢史和秦代法律制度研究領域掀起新的研究高潮”。

## “紀念走馬樓三國吳簡發現二十周年 長沙簡帛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參加小記\*

[日]新瀉大學大學院現代社會文化研究科 關尾史郎 撰

北京師範大學歷史學院 米婷婷 譯

湖南省省會長沙市的建筑工地發現三國吳時期的簡牘(長沙走馬樓吳簡),屈指算來是1996年10月的事。此後,隨着長沙城市開發建設事業的進一步推進,在與走馬樓相鄰的東牌樓和五一廣場兩地,又分別於2004年和2010年相繼出土了東漢時期的簡牘。2003年,在位於湖南省南端的郴州市蘇仙橋,出土了吳簡和西晉簡;2013年,在益陽市兔子山遺址,也出土了大批簡牘,時代涵蓋先秦至六朝,詳細情況尚不清楚。這些簡牘全部出土於古井之中。將2004年南京市船板巷出土的吳簡和西晉簡與各地古墓出土的簡牘等合并考慮,可以毫不過分地說,在東漢到魏晉時期的歷史研究中,簡牘作為不可或缺的史料,早已占據了一席之地。這批可與戰國至西漢歷史研究史料相匹敵的簡牘史料,對於理解當地行政、司法系統及其運轉,以及理解當地人群的社會關係和世界觀為主的諸多問題,都有着重大意義。因此,長沙走馬樓吳簡(以下簡稱為“吳簡”)的發現,自然具有劃時代的意義。此後,一系列東漢魏晉時期簡牘陸續發現,到2016年,正好是吳簡發現20周年。從標題中本次學術研討會的名稱亦可得知這一點。此次會議於8月26日到8月29日召開(26日報到,29日考察唐代銅官窯遺迹,隨後參觀新裝修的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會場設在長沙市區的中共湖南省委

\* 本文原載日本《東方》2016年第12月號(總第430號),2016年12月5日,2-6頁。

招待所。主辦單位爲：北京故宮博物院、湖南省文化廳、長沙市人民政府。承辦單位爲：長沙市簡牘博物館，故宮研究院古文獻研究所。長沙吳簡研究會（日本）等 14 個組織和機構爲協辦單位。

會議召開前會場及會議日程有所變更，令我稍感不安，但到長沙後，證明純屬杞人憂天。在日本、韓國、美國、中國臺灣等大陸以外參會代表到達後，會議便隆重地拉开了帷幕。根據《會議手冊》，正式代表 84 名，嘉賓 6 名，“工作人員”（大部分是長沙簡牘博物館的員工）多達 22 名。會議論文集收錄了 56 篇報告，現場新分發了 6 篇文章。此外，很多年輕研究者祇用 PPT 作報告，省去了紙版論文的印製和分發。8 月 27 日上午舉行開幕式與大會報告，下午及 28 日上午舉行分組討論，28 日下午舉行閉幕式。開幕式上，窪添慶文代表日本參會學者介紹了日本的吳簡研究情況，他的介紹以日本吳簡研究的特色及獨創性爲中心。接下來是大會報告，共 5 篇，分別爲：長沙簡牘博物館館長李鄂權的主題報告，王素（故宮研究院）的《“畫諾”問題縱橫談》，侯旭東（清華大學）的《湖南長沙走馬樓三國吳簡性質新探》，楊振紅（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的《出土簿籍與秦漢三國時期的“編戶齊民”》，以及我本人（關尾）的《長沙走馬樓出土吳簡所見臨湘地域社會的特質》。這 5 篇大會報告，任何一篇都不是針對個別簡牘進行的研究，而是將整體的簡牘作爲史料進行研究介紹，進而得出結論。根據後文所提圖錄（譯者按：指《湘水流過——湖南地區出土簡牘展》）的解說詞，雖然吳簡總數約 76000 枚，但大部分是關於長沙郡臨湘縣（當時爲臨湘侯國）的簿籍與官文書。我的報告旨在說明：作爲縣級單位，臨湘縣在三國時代中國全境所置縣中，信息量是獨一無二的。瞭解縣一級單位地域社會的真實面貌，應充分利用這批吳簡。下面的兩場分組討論，自然以吳簡爲中心的報告占多數。部分報告也涉及吳簡以外的簡牘，這些簡牘有五一廣場簡，里耶秦簡，湖南大學藏嶽麓秦簡，以及敦煌漢簡（湖南大學簡帛文獻研究中心與甘肅簡牘博物館也是協辦單位）。

如所周知，吳簡大半是竹簡。大型圖錄本《長沙走馬樓三國吳簡》全 11 卷，竹簡占 9 卷（其中已出版 6 卷）。剩餘尚未出版的爲大木簡，即“吏民田家莧”與“竹木牘”兩卷。另外，半數以上的竹簡屬名籍“吏民簿”和應稱爲賦稅納入記錄的“倉庫莧”，都是所謂簿籍簡（“倉庫莧”具有複合功能，作爲可以編綴的簿籍，被保管和廢棄）。我們也正在嘗試簿籍復原，但困難重重，以至每每對此敬而遠之。因而我們目前進行吳簡研究的主要對象，是混在竹簡中出土并與竹簡一起公開發表的木牘（多數是簿籍的呈送狀），和一部分先公布的“竹木牘”等。本次學術研討會亦然，第一組的討論彙集了此類報告。但如前所說，由於木牘不多，內容有爭執的報告僅有兩類：一類是討論上段中間明確記錄縣令（臨湘侯相）命令“教”的木牘（君教牘），一類是討論圍繞許迪這個人物的司法關係的文書木牘。與此不同，第二組的討論中，涉及簿籍中特定的語句（含姓氏）的報告較多。

閉幕式程序包含第一組總結、第二組總結和大會總結。第一組總結人羅新(北京大學)與大會總結人王素不約而同地提到了北京的吳簡研討班與日本長沙吳簡研究會長期的交流與成果,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27 日晚餐後,我們觀看了在長沙簡牘博物館舉辦的特別展。該展不僅展出了長沙簡牘博物館收藏的吳簡,還展出了湖南省各地出土的簡牘,包括郴州出土的西晉簡,該簡與吳簡同樣重要,我們對此十分關注。該展不乏第一次公開展示的簡牘,這在今後的研究中會有所反映。28 日晚餐後,我們得到出乎意外的照顧,在沿湘江新設的濱江文化園內的長沙音樂廳中,聆聽了年輕鋼琴家牛牛的音樂會。長沙博物館也被移設在濱江文化園內毗連音樂廳的地方,呈現一派新文化中心氣象。

北京吳簡研討班的研究者引領了中國這 20 年的吳簡研究。由他們編集的《吳簡研究》已刊行到了第三冊。開幕式的主題報告和閉幕式的大會總結,除李鄂權與我,都是吳簡研討班的成員以及北京的研究人員。這次學術研討會,儘管有湖南省內的湖南大學、湖南師範大學以及湘潭大學等的研究者參會,但他們在會議上報告的多為嶽麓秦簡及吳簡以外的簡牘。對此我百思不解,作為簡牘出土的本地研究者,從歷史學的角度理解出土資料與出土地的關係,進而對本地區的歷史進行研究,這不是很重要嗎?形成這種現狀的原因,或許是因為他們雖屬於湖南省教育研究機構,但并不能很方便地閱覽吳簡這一原因所致。我的這些不解也許離了題。分組討論中,熊曲《論走馬樓吳簡中的“以下戶民自代”》、楊芬《“君教”文書牘再論》、金平《對走馬樓吳簡製作與書寫等相關問題的探討》,以及雷長巍《孫吳臨湘“宗族”勢力及鄉里管理初探》等吳簡報告的提交者,皆為長沙簡牘博物館的年輕員工(作為“工作人員”也很活躍),值得好評。2008 年博物館曾在長沙組織長沙簡牘研究會,他們都參與其中。長沙簡牘研究會的誕生,晚於北京的吳簡研討班和我們的長沙吳簡研究會。在此我衷心祝願長沙簡牘研究會取得更多成果。

會議給參會代表分發了由長沙簡牘博物館編集的《走馬樓吳簡研究論文精選》(上、下二冊)和《嘉禾一井傳天下——走馬樓吳簡的發現保護整理研究與利用》(均係嶽麓書社 2016 年 8 月出版),還有長沙簡牘博物館特別展的圖錄《湘水流過——湖南地區出土簡牘展》。《論文精選》含自薦和他薦,收錄中國大陸、中國臺灣和日本的吳簡論文,共 75 篇(日本的論文全部被譯為中文)。這些論文皆已發表。《嘉禾一井傳天下——走馬樓吳簡的發現保護整理研究與利用》的內容儘管位於副標題,但對長沙簡牘博物館的活動成果進行了多角度歸納總結,還在《研究綜述篇》中,按照問題和種類特別整理和歸納了吳簡研究的最新成果。如果吳簡論文的數量在這 20 年,達到了 500 篇,那麼可以說這種整理歸納大有裨益。與特別展的內容相對應,圖錄先分別介紹流經湖南省的四大水系——湘江、資水、沅江、澧水的遺迹、古墓和出土遺物,再按年代概述水系周邊出土的簡牘(最早為 1987 年張家界市古人堤遺迹出土的東漢簡,最晚為 2013 年益陽市兔子山遺址出土的秦簡),最後將主要簡牘以楚簡

(1953年長沙市仰天湖古墓出土)到西晉簡(郴州市蘇仙橋出土)的時代順序排列,并附解說,十分嚴謹周詳(在最末的“簡影遠去”標題下,還介紹了樓蘭和吐魯番出土的紙文書等)。結合解說去閱讀資料,對吳簡研究大有裨助。會議還分發了以吳簡為特集的兩冊《中國書法》雜誌、《出土文獻綜合研究集刊》與《簡帛研究》最新號等刊物。在這些刊物中,《簡帛研究二〇一六(春夏卷)》(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6年6月出版),就是以“慶祝長沙走馬樓三國吳簡發現二十周年”為題的吳簡小特集。

我很久沒有參加中國的學術研討會了。“紀念走馬樓三國吳簡發現二十周年長沙簡帛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前後,中國各地的國際學術研討會正如火如荼地召開着。我所知的國際學術研討會有簡牘學國際學術研討會(8月16日~8月18日,甘肅省蘭州市)、秦漢魏晉南北朝史國際學術研討會(8月17日~8月19日,湖北省襄陽市)、紀念莫高窟創建一六五〇周年國際學術研討會(8月19日~8月23日,甘肅省敦煌市)以及南北朝時期東亞歷史與社會學術研討會(9月2日~9月4日,吉林省通化市)等。王素、侯旭東、張榮強、凌文超等學者,會後還要參加上述學術研討會。這樣的研究者並不在少數。與前一段時間相比,這種“研討會熱”已經逐漸降溫,但暫時還會持續下去。按照每個學術研討會的主題準備報告並不容易。但由於參會往往包含參觀遺迹和博物館等活動,出於收集資料的需要,也不得不撥冗參加。這一點也是事實。本次學術研討會的環節之一,便是安排參觀博物館的特別展。有鑒於此,事前對相關研究者進行調整,使之能夠分擔參加學術研討會的任務,或許不失為一種可行的辦法(日本的唐代史研究會每年召開的秋季工作坊,報告參加國外學術研討會的情況已經常規化,不失為一種對策)。

(譯文由王素審訂)

## 附录:《簡帛研究》文稿技術規範

《簡帛研究》文稿技術規範在原有基礎上進行了適當調整,從《簡帛研究二〇一四》輯開始執行,敬請同仁垂注。

一、作者投稿,敬請惠寄打印稿或電子稿(WORD+PDF 文檔)。文稿務請達到齊(內容提要、關鍵詞、正文、注釋均完整無缺)、清(整齊清晰)、定(係作者定稿)。

二、文稿全文繁體橫排(如果需要保留格式,個別簡文可豎排)。標題下標出作者工作單位、姓名。如果是國外學者,請在工作單位前添加國別,並加“[ ]”,如[韓]。內容提要 300 字以內,關鍵詞 3—5 個。

三、文內分層或小節的標題數字順序依次是:一、二、三、四、……;(一)、(二)、(三)、(四)……;1、2、3、4、……;(1)、(2)、(3)、(4)……。文內一級標題漢字數碼後用頓號,後出標題題文,文內二級、四級標題後緊接標題,三級標題阿拉伯數字後加“.”。如:

一、名籍的格式

(一)物價波動狀況與換算失誤

1.臨潼銀鋌與安邑分司

(1)婺源縣的事例

四、為突出引文的重要而另立段落者,引文第 1 行起首空 4 格,從第 2 行起,每行之首均空 2 格。引文的首尾不加引號。引文的注釋號標在引文最後標點之後。

五、系統在默認狀態下不能處理錄入的文字,請造字或以圖片形式插入正文。

六、關於數字的用法:

(一)數字用法以國家技術監督局 1995 年 12 月公布的《出版物上數字用法的規定》為基本依據,並考慮到本專業的的特殊性。

(二)如下情形使用阿拉伯數字:

1.作者的一般性敘述。如:

漢武帝實行鹽鐵官營,在全國 40 個郡國中設立鐵官 49 處。

2.公曆世紀、年代、年、月、日。如:

1922 年 12 月初,顧頡剛到商務印書館編譯所任專任編輯。

3.公制的度量衡單位計數與計量,包括正負數、分數、小數、約數和百分比,各種物理量值。如:



中國歷史博物館藏唐武德元年銅權重 464.2 克。

清代農業人口占人口總數 90% 以上,構成全國人口的主體。

4. 表示順序號、數據及計量單位均用阿拉伯數字。

(三) 如下情形使用漢字:

1. 古籍文獻中的數字。如:

《晉書》卷一一《天文志上》:“古舊渾象以二分爲一度,凡周七尺三寸半分。”

2. 古籍文獻中的卷數。如:

《冊府元龜》卷三五《帝王部·封禪一》

3. 中國朝代的年號及干支紀年使用漢字,其後加括號標出公元年代,但不寫出“公元”、“年”字。如:

乾道六年(1170),元狩四年(前 119)

4. 數字作爲詞素構成定型的詞、詞組或慣用語。如:

相差十萬八千里,十之八九,四分五裂

5. 帶有“幾”字的數字。如:

幾千年以來

七、文內標點符號用法

(一) 標點符號以國家技術監督局 1995 年發布的《標點符號用法》爲依據。

(二) 連接號“—”爲短橫(一字綫),占兩個字符。

如:中國秦嶺—淮河以北地區屬溫帶季風氣候。

(三) 引文或行文中的省略號,前、後均不加逗號或句號。

如:《左傳》隱公十一年《傳》:“與鄭人蘇忿生之田……盟……”

八、表格需注明表題,文中含一個以上的表需注明表序號,表中或表後應注明資料來源。

如:

表 1 明天啓元年(1621)北京五城鋪甲戶數統計表

五城	鋪數	甲數(名)	戶數(戶)
中城	53	2544	25440
東城	173	3608	36080
南城	135	4330	43300
西城	101	3764	37640
北城	63	873	8730
合計	525	15119	151190

資料來源:《明熹宗實錄》卷九。

### 九、注釋格式

(一) 注文採用頁下注,每頁連續編號。

(二) 注號採用阿拉伯圓圈數字,如:①、②、③。

(三) 正文中的注號,無論隨文還是提行引用,一律標注在引號、逗號、分號、句號的後面。

(四) 徵引古籍

1. 徵引古籍標注一般順序:撰寫時代/撰寫者/著作名/卷數/版本/出版地點(出版社社名中已標示其所在地者,可不必再標地名)/出版社/年份/頁碼。影印古籍、未經今人整理的古籍亦出冊頁。撰寫者時代以[ ]標出。如:

[宋]張齊賢:《洛陽縉紳舊聞記》卷五,文淵閣《四庫全書》本,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第231冊,45頁。

2. 習見古籍如二十四史、十三經、十通、《太平御覽》等書,徵引時可不出撰寫者時代和撰寫者。如:

《晉書》卷一四《地理志上》,北京:中華書局,1974,406頁。

《資治通鑑》卷一八五《唐紀一》貞觀元年,北京:中華書局,1956,5777頁。

(五) 近人專著標注一般順序:責任者與責任方式/著作名/出版地點/出版社/年份/頁碼。

1. 多卷本著作標明卷名,多人撰寫的著作應標出具體責任人。如:

林甘泉主編:《中國經濟通史·秦漢經濟卷》上冊,第1章《緒論》(林甘泉撰寫),北京:經濟日報出版社,1999,8頁。

2. 文集責任者與析出文獻責任者相同,省去文集責任者。如:

徐中舒:《殷人服象及象之南遷》,《徐中舒歷史論文選集》,北京:中華書局,1998,78頁。

3. 文集責任者與文集析出者相同,但字面關係不明,可在文集前加上“收入其著”。如:

齊思和:《毛詩穀名考》,收入其著《中國史探研》,北京:中華書局,1981,24頁。

4. 文集責任者與文集析出者不同,應標出責任人。如:

顧頡剛:《九州島之戎與戎禹》,中國社會科學院科研局組織選編《顧頡剛集》,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1,101頁。

5. 期刊文章標注順序:責任者與責任方式/著作名/期刊名/年期(或卷期,出版年月)。同名异地刊物應有區別說明。如:

潘明娟:《從鄭州商城和偃師商城的關係看早商的主都和陪都》,《考古》2008年第2期。

李濟:《創辦史語所與支持安陽考古工作的貢獻》,《傳記文學》(臺北)第28卷第1期,1976。

6. 報紙文章標注順序:責任者與責任方式/著作名/報紙名稱、出版年月日/版次。如:

楊伯達:《東北夷玉文化板塊的男覲早期巫教辨》,《中國文物報》2008年4月9日第7版。

7. 網絡文章標注順序:責任者與責任方式/著作名/網站名稱/年月日。如:

邢義田:《漢代簡牘的體積、重量和使用——以中研院史語所藏居延漢簡為例》(修訂稿),簡帛網,2008年4月5日。

(五) 外文文獻標注順序。西文專著:責任者與責任方式/著作名/出版地點/出版者/出版時間/頁碼。著作名用斜體,出版地點後用英文冒號,其餘各項間用英文逗點隔開。西文期刊:責任者與責任方式/著作名/期刊名/卷冊及出版時間。著作名用英文引號標出,期刊名用斜體。引文跨頁用“pp. X-X”。日文、韓文等專著和期刊標注方式基本相同。日文、韓文等中的漢字請遵照其本來寫法,如發展的“發”,日文寫作“発”;“變”寫作“変”,“學”和“國”仍用簡體等。如:

T'ung-tsu Ch'ü, *Han Social Structure*. Seattle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72, p.121.

Brain E. Mcknight, *The Quality of Mercy: Amnesties and traditional Chinese Justice*. Honolulu: University Press of Hawaii, 1981, pp.37-72.

宮崎市定:《九品官人法の研究——科擧前史》,京都:同朋舍,1971,179頁。

中村圭爾:《魏晉時代における“望”について》,《中國-社會と文化》2,1987,25頁。

方東仁:《韓國의國境綫劃定研究》,首爾:一潮閣,1997,100頁。

金文植:《조선후기 지식인의 자아인식과 타자인식》,《大東文化研究》39,2001,19頁。

(六) 譯著格式:責任者國別/責任者與責任方式/翻譯者/著作名/出版地點/出版者/出版時間/頁碼。國別以[]標注,責任者需以括號標出本名,責任者和翻譯者間用逗點間隔。

譯文格式:責任者國別/責任者/翻譯者/著作名/刊名/出版時間或卷冊。國別以[]標注,責任者需以括號標出本名,以書代刊出版物標出出版單位和時間。如:

[英]柯林伍德(R.C.Collingwood)著,何兆武、張文杰譯:《歷史的觀念》,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6,155頁。

[德]科卡(Juegen Kocka)著,景德祥譯:《全球化時代的社會史研究》,《史學理論研究》2007年第1期。

[日]大庭脩著,徐世虹譯:《〈居延漢簡補編〉的出版》,《簡帛研究二〇〇一》,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2,567頁。

十、各朝代的簡帛資料,參照所引底本內容、格式、符號、標記、編號照錄,或采用通行方法,如《吳簡研究》第3輯(北京:中華書局,2011,405頁)附錄的“吳簡徵引格式”。引用簡牘是否斷句、加標點,不做統一要求。

十一、其他

(一)凡徵引文獻以“參見”、“詳見”、“并見”等引導,責任人直接與文獻連接。如:

參見傅衣凌《明清社會經濟變遷論》,北京:人民出版社,1989,152 頁。

(二)同一文獻再次引用時,注釋中祇標出責任者、著作名和頁碼。一律不采用“前揭”、“前引”、“同前注”、“同上注”等。

(三)出版物的出版時間均采用公曆。

(四)需要標出基金項目、資助等,在文章標題後加注,注釋符號為“\*”號,在頁下腳注寫出說明性文字。

(五)文稿附加文字如鳴謝等置於全文後,另段標出。

## 徵稿簡約

一、本刊作為中國社會科學院簡帛研究中心的專業性學術刊物，歡迎與下述內容相關的論文投稿：

1.出土簡帛的辨識、考證；2.根據出土簡帛考辨史實，研究中國古代的各種制度、思想文化以及社會發展狀況；3.有代表性的國外簡帛研究譯文；4.簡帛研究綜述；5.簡帛研究論著評論；6.簡帛研究論著索引；7.簡帛學理論與方法的總結、探討。

二、本刊提倡嚴謹的學風，堅持“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堅持相互尊重的自由討論。本刊發表的文章均不代表本刊意見，由作者文責自負。

三、本刊祇接受首發投稿。已在正式出版物和網絡上刊發者，均不視為首發。

四、來稿請提交一份文本稿，一份電子文稿（電子郵件或磁盤）。

五、本刊實行雙向匿名專家審稿制度。稿件中請勿出現作者個人信息。有關作者姓名、單位、聯繫方式等，請另紙提供。

六、本刊對刊登的稿件擁有為期兩年的專有版權。作者如有異議和特殊要求，請於投稿時聲明。請勿一稿兩投。

七、本刊處理來稿期限為60個法定工作日。逾期未接到通知，作者有權對自己的稿件另行安排。因本刊經費緊張，來稿一律不退，請作者自留底稿。

八、來稿請寫明作者真實姓名（發表時筆名聽便）、工作單位、職稱或職務、通訊地址、郵政編碼、電話號碼和電子郵箱，以便聯繫。

來函請寄：

北京市建國門內大街五號 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戰國秦漢史研究室

曾磊 收

郵編：100732

電子郵件請寄：jbyj2005@126.com

辨析字形  
理解文義  
璣珠重聯  
審系篇題  
終成圖籍  
補史之逸

政煥學書



ISBN 978-7-5598-0465-5



9 787559 804655 >

定價: 100.00元